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⑩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⑩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王卫星 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⑩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王卫星 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王卫星编.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06. 1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4227-4

I. 日... II. 王...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8991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十册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王卫星 编

责任编辑 何民胜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7.625 插页 4

字 数 50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4227-4/K·523

定 价 32.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 皓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周福龙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家峰 孙宅巍 吴 静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周 红 孟国祥 经盛鸿 夏 蓓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琳	吕斌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李庆华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曹大臣	南京大学讲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 |
|-----|--------------------|
| 经盛鸿 |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吴立新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郭整风 |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
| 罗 锋 |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章开沅 |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
| 刘家峰 | 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夏 蓓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周 红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杨建明	东南大学副教授
高晓星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袁静文	中国药科大学副教授
刘玉飞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奚欣华	安徽大学副教授
罗文文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费仲兴	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教授
戴袁支	中国青年报驻江苏记者站主任 记者
刘海宁	德国巴登符腾堡州驻江苏办事处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

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 19 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 8 月 15 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 年 8 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 20 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 1116 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 年 5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其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和回忆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和学者们对幸存者所作的调查口述材料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为了方便读者利用,还将江苏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修订后收入再版。在此,向两部书的原编译者表示感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许多日本官兵被派往中国。同时,日本的一些媒体也纷纷派遣随军记者,跟随日军,采访报道。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作为加害方的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他们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加害者和亲历者。与此同时,许多日本的随军记者也随日军来到南京,他们耳闻目睹了日军攻占南京和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他们是南京攻击战、南京大屠杀的目击者和见证人。战争结束后,一些当年的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回忆文章,回忆当年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以及所见所闻,并在日本出版发行。还有一些原日军官兵,为了编写自己所在部队的战史,也撰写了回忆文章,编入部队战史之中。此外,战后被关押在中国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经过认真学习和中国管教人员的耐心教育,也供述了自己在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战后,日本少数极端民族主义者在日本出版、发表了一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文章,全面或部分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对此,一些当年的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出于内心的良知和正义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将自己当年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公之于众,以警示后人。

2003年,编者专程前往日本,收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料。在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下,编者收集到了数十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原日军官兵的回忆和证言,以及日本随军记者的回忆录或见闻录。这些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的回忆录、见闻录,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攻击战和

2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形。

本册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十册，收录了数十位日军官兵及日本随军记者的回忆录、见闻录、证词和供词。由于这些回忆录、见闻录等大多是时隔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后撰写的，因此，在这些回忆录中难免存在记忆上的错误，如时间、地点、部队番号等等。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为了忠实于原文，所有的史料均未做修改，以保持原貌。对史料中明显的错误，如人名、地名等，在翻译时作了订正；对一些原意不清的内容，则保持原文，以注释的方式加以说明。对一些与主题无关的内容则采取省略的方式处理，并注明“略”、“前略”、“中略”和“下略”等字样。此外，部分回忆录的作者或出版者出于某种考虑，隐去了当事人的真实姓名，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回忆录、见闻录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本册史料的收集和编辑过程中，得到了笠原十九司教授、吉田裕教授等日本学者的大力帮助；日本日中和平研究会及其共同代表林伯耀先生和松冈环女士也提供了部分史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语言的翻译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字斟句酌，永无止境。在编译过程中，尽管译者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但错误、疏漏在所难免。另外，对史料中一些日军的军事术语，编者虽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注释，但难免存在差错，希望专家学者予以指正。

王卫星

2005年10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日军官兵回忆	1
1. 从市谷台到市谷台 ——最后的参谋次长回忆录	1
2. 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	7
3. 黄河、扬子江、珠江 ——回忆在中国的工作	10
4. 南京大屠杀证言 ——想说的全说出来	20
5. 最前线出现异常 ——因屠杀而对立的南京攻击战的士兵们	22
6. 被吊起的尸体	29
7. 蚁狮	34
8. 南京大屠杀	40
9. 奔波于炮火下的摄影班	44

2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10. 三十一年来的宪兵生涯	53
11. 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	56
12. 我的战争	76
13. 日中战争实战记	92
14. 参加南京攻略战	99
15. 我们在中国干过的事 ——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人们	112
16. 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	120
17. 现在是揭开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时候了 ——进攻大陆日本军队的犯罪证词	132
18. 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	142
19. 在那遥远的山野	150
20. 野战邮政旗	165
21. 众所周知的事 ——百万支那派遣军造成的中国妇女受难记	185
22. 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 ——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	196
23. 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续) ——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	246
24. 战争与人	343
25. 手记：一个特务兵的证词	379
二、日军官兵证言与供词	383
1. 田俊六的询问调查书	383

2. 朝香宫鸠彦询问调查书	384
3. 藤田进的询问调查书	385
4. 佐佐木到一口供	387
5. 太田寿男供述	388
6. 中野忠之寿供述	401
7. 东口义一供述	407
8. 日本军官黑漱市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	417
 三、日本随军记者回忆	 418
1. 日中战争侧记	418
2. 上海时代	
——记者的回想	427
3. 步行随军	433
4. 侵略	
——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	495
5. 南京城内的大屠杀	528
6. 石川达三询问调查书	537

一、日军官兵回忆

1. 从市谷台到市谷台^①

——最后的参谋次长回忆录

河边虎四郎

编者注：河边虎四郎，1891 年出生，1913 年入伍，1922 年毕业于陆军大学。曾任日本驻苏联使馆武官、日本关东军参谋、近卫野战炮兵联队长、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航空总监部次长等职。1945 年 4 月任参谋次长，同年 8 月被派驻马尼拉，任驻马尼拉使节团团长。1961 年 6 月去世。

(前略)

“不扩大”的招牌要插到哪里

驻北支那地区军司令部处理时局的策略与当年发动奉天事件^②时驻当地军司令部的策略几乎完全相反，他们一边谨言慎行地与中央司令部保持联络，一边推进战事。

当然，那时陆军中央司令部和驻北支那地区的军司令部之间有无无线

① 东京地名，当时为日本陆军省所在地。

② 即九一八事变。

2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电联系。

但是,不幸的是中国军队方面也显示出了一种挑战性的或积极抵抗的态度,因此,在交涉期间不时发生不愉快的冲突事件。当时双方相互牵制着,充满了欲遏制冲突的气氛。

山里响起一声枪响。从枪声响起的那个傍晚直至以后的约二十天里,我们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昭和12年7月27日,日本正式实施了军事行动,日本军队被不断运送到北支那地区,在8月、9月、10月三个月里,在山西、河北、山东的部分地区不断发生大规模战斗,北支那山区、黄河沿岸都是战场。

在这之前,一名驻支那的司令官田代中将因病去世了。作为他的继任,原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中将出任了该职。随着兵力不断增加,先后组建了第一军和第二军。第一军司令官由香月清中将担任,第二军司令官由西尾寿造中将担任。同时任命寺内寿一大将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中央司令部方面,原参谋次长今井中将病逝后,由多田骏中将(后升为大将,已故)接任该职。原参谋部第二部长渡中将病逝后,由本间雅晴少将(后升为中将,战后作为战犯被处以死刑)接任该职。

满洲事件^①发生四五个月后,上海也发生过一次事件^②。两次事件后又引发了上海一起更大的事件。从8月13日起,首先是海军陆战队投入战斗,接着又将陆军大部队派遣过去。由松井石根大将(战后作为战犯被处以死刑)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率领部队出征上海。

在这种状态下,日本政府已顾不上插好那块所谓“不扩大方针”的招牌了。特别是北支那战局在势不可挡地扩大;上海方面,松井率领的各部队从登陆那天就遭到了中国军队极其顽强的抵抗,虽然在奋战后,开进到某些地带,但很快又落入蒋介石中央军大部队的包围中。军队陷入了激烈的苦战之中。尽管国内已经开始了迎战动员,但短期内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前线炮弹缺乏,各种传染病也在将士中肆虐横行。松井大将

① 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② 指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

手下有五个师团的兵力,虽然未必会输掉这场战斗,但照此下去,是根本无法打开局面的。陷入僵局的日子就这么持续着。

更换作战部长

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石原少将似乎根本不同意第三课制订的向上海增兵的方案。

我由于工作关系,对指挥作战这一点平时是尽量不插嘴的。但是有一天,我进入部长室时,谈了对上海方面增兵的意见。部长听了我的话,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领我看那些贴满四周墙壁的作战地图,并对我说道:“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派多少兵也是杯水车薪。”石原一味地以他的观点来解释,脸上完全是一副不屑听我意见的神情。记得刚刚爆发事变时,他曾经训斥我道:“你想想看,我难道会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兄弟旅团全军覆没不管吗?”而此时他的态度完全变了。

当我正要走出部长室时,石原部长又说道:“不过,如果陛下说要增兵的话,那肯定是要增兵的!”说这话时,他的嘴角浮现出一丝怪异的难以察觉的笑容。每当石原氏提出有把握且含蓄的警告时,总会露出这副表情。就在石原部长与我交谈后的没几天,我突然接到更换第一作战部部长的命令。石原少将被调任满洲关东军副参谋长。而迄今为止一直担任第四作战部部长的下村定少将接任了他的职务。

完全占领大上海的准备

下村上任之后,立即着手准备展开杭州湾登陆战,并付诸实施。决定打这场战役时,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大将就被升任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了。因此,决定由他与当时杭州湾陆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已故)共同指挥那场战役。

新方面军参谋长由参谋本部第三部的部长塚田少将出任,而迄今为止一直担任第三课课长的武藤大佐出任副参谋长。

新上任的第一作战部部长改变了作战部中第二课和第三课的任务。

4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他决定让第二课承担原有业务之外,再增加一项作战的业务,而把第三课的任务基本限定在动员组编的范围内。我依然担任第二课课长。原关东军参谋绫部橘大佐(后升为中将)被调任为第三课的新课长。

在我的部下中,又新增加了几位得力干将,包括矶矢五郎中佐(兵站班长,后升为中将),木次中佐(作战班长,后升为中将,战死),三好康之中将(航空班长,后升为少将)等人。

杭州湾登陆战大获全胜,盘踞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大部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对外宣布“完全占领大上海”,华中战局也到此告一段落。

但并没有因此出现敌方战败已成定局的迹象。“下一步该怎么办?”这是中央部要求我们解决的彻底扭转时局的重大问题。

各国列强对日态度分歧明显

随着中国战事的不断进展,政府对内对外推行着一条积极政策。9月1日,政府把“北支事变”改称为“支那事变”。同月9日,政府发表了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内阁通告。同月25日,政府拒绝了国际咨询委员会的邀请。10月9日,政府以外务省名义,发表了日本对华行动不违反现存诸条约的公告。同月27日,关于是否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一事,政府对国内外发表了声明。声明称:政府明确表明不参加比利时政府竭力邀请的九国公约会议,并表明了不参加的理由。11月20日,政府设置了大本营。其中陆军部被划分到参谋本部,海军部被划分到军令部。为了便于政府与大本营之间的联络,设立了“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的机构。

列强中,英国外相艾登早在7月28日就对日本政府发出了警告,不承认日本吞并中国领土的行为。9月27日,国际联盟23国咨询委员会通过了谴责日本军队大肆轰炸南京城的决议。10月5日,美国总统在芝加哥进行了意在牵制日本的演说。10月6日,美国国务卿又发表了内容为日本是《洛迦诺非战公约》的违反者的演说。

而另一方面,10月6日,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在本国有影响的报纸上发表了亲日文章。10月14日,罗马教皇向全世界发出了内容为必须反对共产主义、协助日本的通告。与日本政府态度一样,德国政府在10

月 29 日拒绝了参加九国条约会议的要求。

就这样,日华事变爆发后,列强在对日本的态度上,明显地分成了两派。

攻陷中国首都南京

大上海周边残敌被肃清之后,为了与驻扎在当地的方面军司令部磋商有关今后作战任务,我奉上司命令出了一趟差。当时,方面军司令部设在他们所占领的上海郊外的大场镇附近一所学校里。我到达司令部那天,战斗还处在一种所谓的“追击战”中。来自各兵团有关追击进展的报告源源不断送到司令部。甚至冒雨作战的飞行部队也送来了类似报告。据塚田参谋长说,原上海派遣军的各兵团自盛夏以来,已苦战了七八十天,部队确实陷入了极度疲惫的状态之中。

关于今后作战问题,我征询了松井方面军司令官手下的参谋长以及副参谋长的意见。并向他们转达了中央部为了对广东开战,计划从上海方面抽调一个半师团兵力的想法。

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最终得出下列结论。即:首先,停止目前正在进行的追击战,让部队在上海西面至杭州附近的某地区稍做休整。在休整期间,密切注视南京方面和沿途所经之地的敌情以及其他方面局势。最后,再重新研究南京进攻战是否实施。

对于抽调一个半师团兵力作为他用,方面军司令官们没有任何异议。作为个人意见,松井大将本人就是一个极力主张一定要攻打南京城的主战派。而且他还确信无疑地断言:即使抽调走一个半师团兵力,这场进攻战也必定获胜。但是对于清理战线,让 8 月份以来一直在拼命打仗的各兵团短暂休整这点上,他与参谋长们的意见一样,认为这样做十分必要。

虽然是私下闲聊,但是在预测攻打南京城结果时,副参谋长武藤氏和我抬起了杠。他硬说一旦打下南京城,蒋介石就会举手投降。我则坚持说蒋介石不可能投降。他还说:“当我凯旋而归,从东京站进宫拜见天皇时,我不要坐汽车,我要坐马车。”他的话把我逗笑了。

6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大雨连降数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也没有方便的飞机可乘。于是我先乘船从上海到长崎,然后再换乘火车回到了东京。就在我返回东京后不久,松井军司令官给大本营发来电报称:“自河边大佐从上海出发后,战场局势骤变,敌军溃不成军,上海与南京之间长江沿岸的各军事要塞敌军纷纷弃之不顾。我们准备趁此机会,一鼓作气追击到底,可以直捣南京城。”根据这份电报,中央部最终做出了攻打南京城的决定。

不久,从上海送来了作战计划。计划将攻打南京时间定在昭和 13 年 1 月中旬。

可是,向南京进军的速度远比预料的要快得多。在穷追猛打溃军中前进的华中方面军各兵团,在 12 月 13 日就占领了南京城。同月 17 日,松井大将顺利地结束了他的南京入城仪式。

(下略)

[河边虎四郎:《从市谷台到市谷台——最后的参谋次长回忆录》,
时事通信社(东京),1962 年 11 月 5 日。]

(袁静文 译)

2. 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

武藤章

编者注：武藤章，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步兵大佐。该回忆录由武藤章著、上法快男编，但从内容看，实为两人共同的回忆。

(前略)

武藤大佐对进攻南京的意见

11月上旬，总司令部第一科长福留繁大佐前往上海与武藤副参谋长等人进行了会谈，11月7日返回后向上司作了如下汇报：

“华中方面军的方针是，现在依然根据中央的指示，占据常熟、苏州、嘉兴一线，将眼前的作战暂告一段落，为进攻南京做好准备，并制定此后的计划。”

由此可见武藤副参谋长已经有了进攻南京的想法。也许在从东京出发之时他就已经有了不进攻南京就无法结束事变的考虑。

因为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从东京出发时，向杉山陆军大臣提出过进攻南京的建议，而武藤副参谋长的意见与方面军司令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以也许松井大将是同意的。

目前上海的敌人已经开始败退，那么在中央，废除制令线便成了问题，因此决定将河边作战科长派至当地再做决定。

在当地，松井大将说：“尽管不是现在，但进攻南京势在必行。”塚田参谋长以下很多幕僚的意见是：“由于上海派遣军极其疲惫，必须停下来休整一下，现在要追击的话非常困难。”

河边大佐从武藤大佐那里听说了这样的意见——“以部队现在的状态要实施进攻南京的作战方案是很困难的”——这话的背后可以看到有

进攻南京的意图存在。

虽说河边大佐于11月18日在当地就废除制令线之事发了一个电报,提出意见说“可以暂且观望事态发展”,但第二天即19日,第十军部署了向南京追击的行动。得知这一情况的多田参谋次长大吃一惊,提出了务必退至制令线之后的强硬意见。

但是,华中方面军在22日发出了这样一份电报:

“为了尽快解决事变,必须进攻南京。”

在这之前的11月20日就已经设立了大本营,因此24日召开了第一次御前会议,闲院参谋总长发表了作战方针,接着,下村作战部长解释了作战计划的概要。其中关于进攻南京事宜是这样说的:

“华中方面军利用上海附近的战果,正在果敢地乘胜追击,由于他们的推进力度受到了相当大的制约,所以没有想过能一举直达南京。

作为统帅部正在考虑根据今后的形势而令该方面军进入新的准备态势,并使其进攻南京等地。”

这一天,大本营向华中方面军发出命令,废止已经做出指示的作战地域。从那个时候起,大本营真正开始了对南京进攻战略的研究。

下村作战部长负责做反对进攻南京的多田次长的说服工作,但次长并没有轻易地同意。

11月27日,下村部长向方面军参谋长发了一份内部联络的电报,内容如下:

“本部在下定进攻南京之决心的基础上,对此事正在进行审核。包括还没有最后做出裁决的意见。”

对此,方面军参谋长回电说:“看到贵电甚是安心。可按照贵方意见积极地行动起来。”我似乎感到武藤副参谋长以及公平中佐积极行动的姿态浮现在我的眼前。

第二天即28日,向次长解释了先前在作战科写就的“作战指导纲要”,次长终于下定了决心,同意进攻南京。

进攻南京最大的问题就是,由于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都是为适应上海周边的限定性作战而编成的,因此缺乏机动力,如果要远程进攻南京的话(约四百公里),必须动员并增加后方部队,尤其是运输部门。

于是,笔者^①于11月29日飞抵上海,带着应该动员并增加的部队这一方案去征求当地部队的意见,我造访了华中方面军司令部。

武藤副参谋长、公平作战主任参谋、二宫兵站主任参谋等人都非常热情地欢迎我的到来。由于在一个月前我们还是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所以我似乎有种鸟儿归巢的感觉。

我立刻将在东京研究过的提案拿出来征求意见,武藤说道:

“如果等到在日本重新动员起部队再来集结、作战的话,那就会失去战机。如果现在立刻接到进攻南京的命令的话,作为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还是可以将南京攻下来的。

失去良机、放松追击的话,等于是给敌人一个重新站起来的机会。那样的话进攻南京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损失惨重的上海方面军也在恢复元气,新锐第十军势如破竹的追击现在暂且停了下来。”

公平中佐以及二宫少佐等人也表示现在只要接到进攻南京的命令,接下来的事情,方面军会加以处理。

于是,笔者立刻将方面军的意向和希望电告了大本营。

大本营于12月1日发出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协同海军进攻敌国首都南京。”多田参谋长于当天飞往上海,向华中方面军司令传达了命令。

第二天,笔者随多田次长在湖州的第十军司令部住了一晚,接着经过常熟的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返回了日本。

武藤大佐的判断是,只要管制住经济都市上海,攻克政治的中枢南京,就能够抓住结束战争的良机。他认为即使不能结束战争,蒋介石政权也仅仅成了一个地方政权,所以进攻南京的意义在政治战略上是重大的。

在支那事变的初期,第十师团长矶谷说过:“轻轻地一击,不深入内地,立刻撤退。”但在进攻了南京之后蒋介石也还是没有投降,因此对武藤大佐来说,今后如何解决支那事变也是一桩棘手的事吧。

[武藤章著、上法快男编:《军务局长武藤章回忆录》,

芙蓉书房(东京),1981年4月1日。]

(赵仲明 译)

① 指编者上法快男。

3. 黄河、扬子江、珠江

——回忆在中国的工作

宇都宫直贤

(前略)

第四部 回东京任职不久发生的各种事件

我一回到东京便接二连三地听到对日本事关重要的消息。一是误炸“帕奈”号事件，二是炮击“瓢虫”号事件，最后是“南京大屠杀”事件。

一、误炸“帕奈”号

根据美国方面的说法：南京沦陷后的12月12日^①，“帕奈”号(美国内河炮舰，450吨)在南京上游27海里处被炸沉。舰长在第一次攻击中受了伤，因无法操作舰船而命令全体船员弃船。第二次攻击是从低空向正在沉没的“帕奈”号进行机枪扫射(2人死亡，48人负伤)，还打坏了该舰旁边美孚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的两艘油船和一艘小型船只。这些船和“帕奈”号一样，都在甲板上和甲板上的帐篷上画上了美国国旗。上海总领事还将炮舰位置通过日本总领事通知了日本海军支那方面军舰队司令。

另一方面，我第二海军联合航空队接到第三舰队(兼支那方面舰队)某参谋的电话报告，报告称：“大小汽船十艘及不少戒克^②满载着中国士兵正逆流向南京上游逃去。陆军部队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所以一定希望海军航空队进行攻击。”于是，就向第十一、第十三航空队下达了攻击命

① 原文有误，南京陷落为12月13日。

② 原文为日语外来语，意思不明，此为音译，疑为帆船。

令,共出动 24 架飞机(舰载战斗机、舰载轰炸机、舰载攻击机)。

在这之前,美国政府为了避免美国驻南京大使馆馆员,在南京遭受轰炸期间受到伤害,就让他们乘上长江上的警卫舰。而且正如前述那样,已经将标有该军舰正确位置和航线的地图提供给了日本海军。所以美国方面不能不认为这种攻击行为完全是故意的,是公开的挑衅。美国陆军武官助理罗伯特大尉当时也在“帕奈”号上。

长谷川长官派遣杉山参谋长向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官(耶乃鲁)提督道歉的同时,还让军医等人一起,乘两架飞机去现场负责处理救治伤员等事务。另外,就连海军省也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先生道了歉。我们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然而,《纽约时报》特派员德丁先生当时就在该舰上,他在发表的现场报道中指出:“参加攻击的不只是日本海军飞机,附近的小艇也用机枪进行了扫射。”美国舆论骤然强硬起来。格鲁大使透露说:“很有可能这会演变成第二个‘缅因’号事件(据说在 1898 年,美国因其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炸沉,引发了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我担心美国会因此与日本断绝外交。”就像是为了证明此事似的,美国众议院很快采纳了鲁多罗决议案,即“在对日宣战生效前应先进行公民投票”。但在行政当局的高压下,该决议案仅以 21 票之差没有通过。

后来才查明炸沉“帕奈”号的是第十三航空队的九六式舰载轰炸机。该航空队长奥宫(正武)大尉因此受到米内海相的警告。另外,用机枪扫射“帕奈”号及其他船只的,经查明是占领芜湖的陆军冈崎支队派遣的舟艇机动部队。但由于陆军方面部队长下达了缄口令,从而为查明真相花费了很长时间。

日方再次派遣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中将、陆军省柴山军事课长等前往格鲁大使处,坦率地承认日方先前的答复有误,并再次表示道歉(这期间,过了两个星期)。日本国民也为美国的强硬态度而忧虑。连学生儿童也向美国大使馆送去了慰问信和慰问金。日本政府在表示道歉之意的同时,还声称准备赔偿,所以美国舆论的语调也逐渐缓和下来。在这以后,在一部分美国人中间就兴起了“记住帕奈”的口号。

事件发生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为了避免和日本军队发生摩擦,命令驻守中国天津的第十五步兵联队撤往菲律宾。

二、炮轰“瓢虫”号事件

同一天,日本飞机飞走后,扬子江上的英国护卫艇“瓢虫”号和“蜜蜂”号在芜湖江面遭到桥本欣五郎大佐(23期学生,野战重炮兵第十三联队长,前参谋本部俄国班班长)炮兵部队的炮击,船只受损。英国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但陆军根本不想坦率认错,反而强词夺理地说,是“英国军舰施放烟雾收留溃逃的中国兵”。虽然最后陆军还是决定向英国道歉,但没有严肃处理责任人预备役大佐桥本。这件事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不满。

(注:海军方面,米内海相没有处罚海军部相关人员,只是严重警告了第二联合航空队司令官的国内勤务人员;首席参谋;第十二、第十三航空队司令;各飞行队指挥官。)

听说10月事件的关键人物——桥本大佐是个俄国通,然而一被征召回来即担任前线部队联队长,这应该说是问题的根源吧。

还有,关于日本方面对“瓢虫”号和“帕奈”号这两件事的处理方法,当时的东亚局长石射在其著作《外交官的一生》中描述道:“那时的日本,可以说存在着重美轻英的意识,德国轻英的态度,也在日本军部中有所反映,藐视英国的思潮充斥整个军部。”

三、南京大屠杀事件

我是回到东京后才听说了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当时,我正在申请延长任职,欲将任职期延长至中支那方面军占领南京,目的是在南京攻击战中,负责对外宣传任务,协助方面军涉外部长广田。但为时已晚。

我见了参谋本部的本间(雅晴)第二部长、支那课渡(左近)课长、美国班的西(义章)班长及部下,并提出个人各种建议。当然这只是建议,并不是为制定对策出谋划策。最终决定由美国班班长、大本营参谋西义章中佐(31期学生,陆军大学同期)立即前往南京去现场调查,协助广田大佐努力查清和解决问题。接着,应杉山陆相要求,让本间第二部长也迅速去南京调查情况。

虽然日本方面禁止报道有关南京大屠杀事件,但十分遗憾的是,此事已传遍整个世界,日本成了众矢之的。

当然,此事和大东亚战争中的“不忘珍珠港”、“巴丹死亡行军”一样,国民政府试图以此激发民众的抗战意识,多少还添油加醋地进行了渲染,还有基督教传教士的推波助澜。但无情的事实是:我在担任日军发言人期间,随着战线从上海向南京逐渐扩大,就经常听说军队的强暴和抢劫事件了。

还有一种说法。说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15期学生,后任南京警备司令)效仿拿破仑在越过阿尔卑斯山进攻意大利时,俯瞰着伦巴第平原,并朝着官兵大声怒吼的典故,在紫金山山麓说过“攻下南京后,掠夺强奸,可为所欲为”。但这一说法未免过于离谱。中岛中将在陆军大学毕业后又在法国陆军大学学习过战略战术,并作为和平条约实施委员派驻德国三年,很难立刻让人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举动。

宪兵在南京城内的举止的确优秀,他们军纪严明,就连外国记者也很佩服。但其人数太少,无法严格管制军纪十分涣散的士兵。我以为,在上级司令部方面,不也应该迅速组编辅助宪兵部队吗?皇军、圣战之类的口号为此瞬间崩溃。现役部队的骨干中支那方面军有如此行为,可以断言这是遗恨千古之憾事。

自上海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精神及中国民众高昂的爱国心,也是激发日军抵触情绪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国内在教育国人认识中国人方面,陆军、海军报道部及新闻界也做得不彻底,这也是重要因素。

南京似乎也在效仿雅坎诺神父在上海南市设立难民区的做法,在南京设立了难民区。但我认为,因所选地点不当(日本大使馆、金陵大学等都划分在难民区内。乍一看是不错),加之区域范围过大,指导监督又不完善,从而加重了灾难的程度。

很久以后,在和广田大佐交接军涉外部长工作时,偶然谈及南京屠杀事件。大佐说:“中国方面宣传的被屠杀人数完全是天文数字。尽管从某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夸张的,但从我和驻南京日本领事们在当地耳闻目睹的真实情况看,非常遗憾的是,许多妇女在金陵大学院内被强暴和杀害的确是事实。当时的景况实在是惨不忍睹。”

《南京大屠杀之虚构》(铃木明著,文春社出版)虽获大宅壮一报告文

学奖,但相传扇谷正造先生在其祝贺会上对该书高度赞扬说:“该书告诉新闻工作者,应该对自己写的东西负责。”该书证实了臭名昭著的“斩杀百人”是编造的。他的努力应予以高度评价。

山本七平先生也在《我心中的日本军》(文艺春秋社出版)一书中,明确地谈及了此事:认为这样做,对旧日本军的名誉以及消除社会上的模糊认识,都是值得大大庆祝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曼彻斯特卫报》(注:该报发行于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市,也是英国最激进的、自由主义的地方报纸之一。)的田伯烈先生于次年4月出版了《战争意味着——驻中国日本兵之恐怖》一书。他也赠给我一本签有赠呈字样的书。书中收录的是日本兵在中国各地施暴的事情,第一件写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中方为了宣传,很快出版了此书,并将书名改为《日本人兽行记实》,郭沫若作了序。开头几页还转载刊登了原著中没有的日本兵施暴、强奸时不堪入目的照片。

田伯烈先生在原作序言中说明:“本书目的决不是要将日本人视为仇敌,不是为了挑衅,只想让全世界了解日本军队对待中国民众的事实……让世人认识战争这悲惨的现实并解除战争这虚伪怪物的魔力……”然而,中文版译本则完全背离和歪曲了作者本意,带来了截然相反的效果。

(中略)

哪里都存在“法官偏心”的现象,但在上海周围的战斗中,这些情况尤其明显。基督教传教士团在大力进行反日援蒋宣传的同时,与各种报社联合起来,瞪大眼睛四处寻找收集获取全世界同情的新闻。

筑波大学的大江志乃夫教授(陆军士官学校,60期学生)在其所著的《朝日研究备忘录》(1977年3月29日)中论述说:“……众所周知,政府及军队的负责人是优待俄军俘虏的。……但与南京大屠杀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扎根于日本军队本性里的成分,却没施放在俄军俘虏身上,这倒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之后,他又偶然得到一本名为《日俄战争从军丛话》的小册子。于是他向世人介绍了这本小册子,并说道:“类似于日

中战争期间攻占南京的战役中,以杀害俘虏、进行斩杀百人竞赛的杀人取乐事件,在日俄战争战场上,也是司空见惯的。”

这书好像是在反驳中公^①出版的新书《松山收容所(俘虏和日本人)》(才神时雄先生著)。但我特别想推荐给读者读一读才贺先生书中“草花谈——结束语”那段。作为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的学生兵,作者从军去满苏边境^②后,在西伯利亚一待就是三年。此外,我还想推荐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就是建国大学教授寺田刚先生著的《虏囚第21号(中共幽囚记)》。该先生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任教于满洲建国大学。战后,被苏联、中共辗转关押。昭和31年才回到国内。

(中略)

第五部 “从中国方面看”支那事变的军事及政治

迄今为止,从日本方面看支那事变(日中战争)的书籍,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以下是以中国参谋本部重要军官——刘大校的观察为主线,从中国方面来看日中战争。刘在解放后去了美国。

第一章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的宛平至 1938年10月汉口失陷)

1937年7月7日,进行夜间演习的日军和驻守宛平(县城)的中国守军交上了火。宛平位于卢沟桥东侧。北平周围的战斗也于7月27日开始了。只用了两三天,北平便落入日军手中。有悠久历史的北方首都如今已落入日军手中。为此,中国被迫下决心展开全面战争。东京方面,据说杉山陆相上奏天皇:日军可在一个月内结束战争。中国舆论与多数中国首脑主张的回避战争论相反,主张最好进行战争。

当日本政府确定中方决心封锁和守卫长江下游后,立刻命令扬子江

① 即日本东京的“中央公论社”。

② 指中国东北与苏联的边境。

一带各城市的日本侨民撤往上海(日方既不是担心中国封锁长江,也不是预料到中方会开展全面战争,只是为了保护侨民的生命财产)。

1937年8月13日,战火烧到了上海。上海—南京区域的防御,是事关中国首都安全的重要环节。国民政府将大量精锐中央嫡系军队投入到上海战场,一半是基于这种理由,另一半也是为了缓解日军对中国北方的压力(8月20日,上海周边驻扎了14—15个中央嫡系师团)。

中国政府之所以下定决心在上海周围地区进行顽强抵抗并进行部署,是因为中国方面判断,日本战略重点不仅仅是征服北支那(不只是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恐怕还包括山西、陕西各省),还企图动用大部队侵略重要的上海—南京地区。中国将其军队主力部署在上海地区的决心,严重拖延了日军进攻北支那各省的进度(日本军队在北支那投入八个多师团的兵力,另外还使用了察哈尔兵团的三个旅团)。对于日军来说,要和数量优势的中国军队抗衡,必须决定将相当多的兵力(合计为五个师团)派往该地区。

最初阶段的三大战役是:上海—南京(1937年8月—12月)、台儿庄—徐州(1938年3月末—6月)和围攻汉口(1938年6月—10月)。在这些战役中,发生在上海—南京地区的最为惨烈。日本军队在此投入了数量庞大的20万兵力(使用了七个现役师团和两个特设师团)。海军和陆海军航空部队也给予了强大的支援。而中国最高司令部部署的兵力主要是中央嫡系军队的精锐师团(当时判断为35—40万人)。因为日本距离上海不远,日本海军和航空队能够进行震慑性炮击和空袭。中国四五万守备军人,有60%在殊死奋战中倒下。日本军队的损失也与此相当,数量巨大(中国方面判断日本在上海战役中阵亡40 000人。实际是阵亡9 000人,负伤31 000人)。

中国付出如此高昂的牺牲,为在内地继续抵抗赢得了准备时间。此外,加强抵抗力度后,在某种程度上,在国内外达到了政治性目的。尽管在三个月时间中付出了昂贵的牺牲,但激烈的战斗还一直持续着。日本军队通过包围中国军队右翼(11月14日,日本军队的柳川兵团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而取得了胜利。能够取得此次战役胜利,还由于驻守杭州湾的防御部队数量不多。

一、进入南京的功与罪

11月11日,中国军队开始从上海全面撤退(11月8日,柳川兵团第六师团到达松江以南的黄浦江后,朝昆山方向展开了切断上海方面中国军队退路的行动)。中国军队是向南京方向撤退的。中国军队被迫在环绕着城墙的首都南京再次进行殊死抵抗,从而遭到更惨重的损失。当初,中国统帅部计划再次将守卫上海的部队部署在苏州—福山(吴福阵地)一带,据守坚固的防御工事,挡住日本军队进攻。(经过三个月拖拖拉拉的攻击而急不可待的日本军队,开始迅猛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但缺乏经验的中国军队指挥官们却将从上海有秩序的撤退搞得一团糟。而且,乱作一团的败退士兵人潮,彻底将“马其诺防线”(吴福阵地)化为泡影。[我中央统帅部受中支那方面军强硬作战方针影响,没有继续执行“在南京附近一带暂停,让因战斗而疲惫的士兵恢复后再作战”的一贯方针,于12月1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参加攻占南京的部队以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上海派遣军)、第六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十军)四个师团为主。另外,让第十三师团在镇江附近渡过扬子江去切断津浦线;让第十八师团去占领芜湖]。

中国最高司令部为了固守四周环绕着城墙的首都,让最精锐的战斗部队在南京进行顽强抵抗,结果白白耗费了十多万兵力。尽管蒋介石提醒过有关指挥官“不要在南京进行呆板的防御战”,并警告“为了迅速弥补因上海战役及此后的战斗而遭受的损失,应利用更有利的地形击退敌人,目标是短期防御”。但防御阵地中的中国官兵还是殊死奋战,顽强抵抗。日军进攻一时间也难以奏效(尤其在第九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方面)。但最终他们的退路被切断了。(进攻南京城西南侧的第六师团和进攻南京城北的精锐部队第十六师团的部分队伍占领下关,切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南京于1937年12月12日—13日沦陷。蒋介石在南京沦陷前乘飞机逃脱)。

不过,南京政府早在11月就将首都转移到了汉口。

12月17日,举行了盛大仪式,迎接松井方面军司令官一行进入南京城。但在之前的12月13日夜至15日,发生了“南京大屠杀”,日军虐待中国俘虏和普通民众的暴行传遍全世界。事件起因是为了实施警备司

令官中岛中将(前面已介绍过)的警戒方针:在入城仪式前,扫清残兵败卒嫌疑者(中国士兵擅长换便装扮当地百姓)。遗憾的是,有人趁机干了让圣战蒙羞的掠夺、放火、强奸等恶性事件。

我军通过正面攻击和包围攻击,重创了中央军的最精锐部队,这原本是促使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要求的好机会。但不幸遇到第十六师团长那样操之过急的指挥官,导致在南京发生了掠夺、强奸及不加区别屠杀俘虏及市民的事件,进而促使中国再次下决心抗战。

说起来,希特勒在欧洲各地搞的入城仪式之类的事,根本就是落后时代的東西。山下将军在新加坡就不搞入城式。另外,山下将军在市内驻守极少量警备部队的做法,大概也是因为不希望重蹈覆辙吧。

尽管如此,还是有部分军人在英国陆军医院干坏事并屠杀华侨而广受谴责。义和团事件时,英、法和日军之外的其他联军大肆进行掠夺、强暴。如今仅留在了历史的扉页上,早被世人忘到脑后了。南京大屠杀的出现,恰好中了中国的下怀,于是,中国毫不迟疑地将南京屠杀事件告诉了全世界。

1866年6月15日,普鲁士的大宰相俾斯麦在萨多瓦(柯尼希格莱茨)粉碎了奥地利主力军队后,禁止其军队为炫耀胜利而进入战败国首都维也纳。如何判断政治家是否有手腕,就看他是否具有控制因胜利带来政治性兴奋的能力。这点最能准确测试政治家能力。不幸的是,日本没有俾斯麦那样有才略的政治家。军队也没有倾听政治家建议的肚量。

进入敌国首都南京,除了更加激发中国人抗战意志外,没有任何作用。

一位外国军事评论家说过:“日中战争存在两个最大的战略性错误。一是主张让中国军队最精锐部队英勇作战、付出牺牲来固守南京;二是日本军队没有迅速利用有利形势继续进攻几乎没有设防的汉口。由于拖延了时间,日军错失击垮中国组织、摧毁其战争能力的好时机。”但就当时情况看,日本军队犹豫不定,没有进攻是有原因的。因为日本觉得希特勒进行的让日中停战的努力也许会成功(德国认为,扩大日中两国之间战争,将会影响他们在中国市场的活动,不利于德国经济。于是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于1937年11月5日开始了促进和平的工作。但日本

在这一段时间已经对陶德曼先生的斡旋失去了信心)。另一方面,从军事角度看,由于中国军队在上海的英勇抵抗,大大挫败了日军斗志,遏制了战争状况的进展。

还因为战斗部队已竭尽了全力,担心如果再进一步扩大战线,也许会遭遇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导致悲剧性的失败(1937年末,日本军部将16个师团的60万大军派到中国)。即使单纯从战略角度看,日本军队也无法立即继续向西方进攻。况且,日本军队指挥官们敬佩的李宗仁指挥的强有力的中国军队(包括中央军10个师,共约有50个师),正一边搜寻试图开往西部,而且战线过长的日军,一边做好了断其后路的准备。还扼守着具有战略性的淮河地区以北的扬子江咽喉部。另外,李宗仁军队还封锁着北支那战区和中支那战区两支日本军队之间的联系路线。

(下略)

[宇都宫直贤:《黄河、扬子江、珠江——回忆在中国的工作》,
石仲印刷(非卖品),1980年4月1日。]

(罗文文 译)

4. 南京大屠杀证言

——想说的全说出来

中村弥咲

7月3日晚,NHK电视台播出了据说是在美国发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少量纪录片,同时还报道说现在有各种说法:有人说屠杀了30万;有人说10万;也有人说:不,只有数千人;还有人说这是没根没据的事,等等。

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并发生大屠杀那天,我就在南京,目睹了整个实际情况。我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只是想对那些事实提供证据。

当时,我是第三舰队第一扫雷队一号扫雷艇(90人,600吨)的船员。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内地,延长了补给线。扬子江是重要航线,许多巨轮穿梭往来,中国军队为了炸沉它们,到处投放了机械水雷。我们扫雷队(6艘)的任务就是用单艇或双艇,夜以继日地奋力清除这些水雷。在这期间,曾经和中国陆军发生过数次炮战和枪战,这里就不说了。

12月13日,天气晴朗无风,明镜般的长江水缓缓地流着,我们船队和陆军相互协作,以南京为目标快速溯江而上。3时许,冲到下关栈桥并靠了岸。在这之前捕获了七名中国俘虏,半夜里就在甲板上将他们杀死并踹进长江。我所见过的残酷景象就从那时开始了。

我们很长时间没有上岸了,经允许我们上岸观看战场。整个南京城除了一面朝着长江下关城门外,其他部分全被城墙(高10米、宽4.5米)所围绕。许多地方有坚固的城门。陆军从外面控制着所有的城门,城里的人一个也出不去。进城一看非常吃惊,南京这个大城市成了一座死城。国破山河在。没有人、车和马,就连猫狗都看不到。能见到的只是连绵不绝、无限延伸下去的累累尸山。道路上、广场上、河堤上,都是一堆堆的尸体。有军人,有商人,有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死了。因天

冷的原因，干涸的血液呈黑色，而尸体下方还有鲜血。

海军很少上岸，也很难见到女性。也许是这个原因，其中竟有狠心的人用木棍挑开女尸胸部的衣服，还有人撩起衣服下摆看。

次日清晨，看了栈桥边上的河滩。这里也是尸骨累累的尸山，还没有腐烂。沙土上还有鲜血流淌过的痕迹。尸体没有一点刀伤，看上去都是被枪杀的。

以上是我见过的真实情况。但是，这些是谁造成的呢？其数量是30万？10万？还是1万？我不知道。我认为，在那种混乱情况下，看来没有人能确确实实了解这些事。但肯定不止数千人。

第二天往后就没听到过一声枪响。舰艇边上，有中国孩子在天真地嬉戏。他们胳膊上套着日章旗臂章，大概是妈妈做的吧。我非常喜欢他们。

我现在手边还有当时因作战有功长官奖给我的部队感谢信复印件、炮战中我们舰艇的照片、那天晚上处理的俘虏照片以及来到我们艇边玩耍的孩子们的照片。

[《沼津朝日》1991年7月10日。]

(罗文文 译)

5. 最前线出现异常

——因屠杀而对立的南京攻击战的士兵们

问罪屠杀责任被判绞刑

看到昭和12年12月18日的《朝日新闻》晚报,上面用大标题登着以下的消息:(今井特派员17日发自南京)呜呼!令人激动的一天,一亿同胞的共同欢呼响彻云霄。今天,响彻南京城头的“万岁”声,让世纪惊异和欣喜。正在轰轰烈烈地举行雄伟壮观的伟大的入城仪式。皇军进军中支那开展圣战,历经四个月,取得了辉煌战果,并攻占敌人首都南京,控制了全支那,最终奠定了东亚的和平基础。仰望着飘扬在国民政府门楼上的日本国旗,谁能不流下激动的眼泪呢?

可是,注视着松井石根大将、朝香宫殿下,以及紧随其后的队伍的观众,只有身着与士兵一样土黄色军服的随军报道人员。没有一个来迎接的民众。因扫荡残敌而疲惫不堪的前线士兵也都蹲在城外。

虽然日本国内报纸只字未提,但此时大屠杀的消息已传遍全世界。惊慌失措的中央陆军部迫不得已将松井大将及相关人员传来了解情况。

松井大将列出几点理由进行辩解:1. 上海之战的恶战苦斗。2. 随着快速追击,补给严重短缺。3. 难以区分身着便衣的军人和普通民众。

于是,中央陆军部只是象征性地警告处分了松井。

战后,松井大将被远东军事法庭追究屠杀责任,尽管他一直否认,但仍被处以绞刑。

他在临刑前,向在巢鸭监狱里教诲囚禁者的东京大学佛教学的花山信胜教授这样表白:“我召集大家,流着眼泪怒吼:‘好不容易才让皇威放射光芒,可就因这次暴行一切都完了。’可大家一听都笑了。一个师团长竟然说:‘那是应该做的。’日俄战争时,我就作为大尉一直随军转战。与

那时相比,这个师团长是坏透顶了。从武士道及人道方面说,现在和那时大不一样啊。”

虽然不清楚松井大将具体指的谁?但让人觉得指的就是那个柳川平助中将。他是杭州湾登陆作战以来的司令官,在演讲中曾叫嚣:“山川草木皆是敌人。”

第二次去随军的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先生曾亲眼见到过送到各师团的命令文件。文件中写道:“农民、工人自不必说,女人、孩子都要全部杀光。”这好像是事实。

《大分联合报》登载的《家乡部队奋战记》一文中也提到“第六师团司令部收到那份命令”的事。不过,第六师团高级副官就将该文件弃之一旁,并说:“有这么混蛋的命令吗?”但……

上次说过,谷寿夫师团长被追究“仅第六师团就屠杀了23万人”的责任。战后,南京法庭判以枪决。前面已提到过,他的师团参谋长——下野一霍先生(81岁,住在东京都中野区)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南京屠杀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的,虽然有些过激行为,但第六师团是冤枉的。”

屠杀是后续部队强行干的

听下野一霍这样说,于是我去了大分县。第六师团的第四十七联队是大分县部队,该部队因最先冲上南京中华门而以勇敢闻名。

三明保真先生(63岁,大分县今津留)是第四十七联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中队长,就是他的中队最先登上中华门的。

据说,在杭州湾敌前抢滩登陆后,在南京战役前夕,第四十七联队因发现霍乱患者,被隔离了一星期。听说当时他们还非常担心,怕赶不上进攻南京城呢。可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又追上了部队。

南京城墙厚达十余米,一般的炮击是无论如何也炸不坏的。城门的大铁门也是双层结构,再加上门后有成堆的石块支撑着,很难打开。“因此决定架上事先准备的梯子进行攀登,可因为梯子要连接成二段,所以很危险。正在攀登的士兵,有的倒栽葱掉下来,有的被当成了靶子被击中摔下来。城墙上的守兵也许以为日本兵不可能上来,从而放松了警

惕,于是我们就翻越进去了。”

三明先生给我的名片上印着这样的头衔:大分县伤残军人会副会长、大分县金鷄会副会长。他是因为在那次战斗中负的伤,所以立了头功并荣获金鷄勋章。

那么谈谈屠杀。在伤残军人会事务所里,三明先生露出失望的神情说:“现在不就是把占领后的扫荡战说成屠杀了吗?因为当时分不清便衣队和一般百姓,所以也许是有一些‘喂,将这里的人都干掉’这样的事。但我们这些第一线的人,转告后续警备队后就转移到了城外,所以以后发生了什么就不知道了。”

曾经是三明先生的部下,担任过炮兵伍长的津崎觉寿先生(57岁,福岡县宗像郡福间町)是在京都的禅寺长大的,是从佛教大学应召入伍的。入伍后,其任务是将阵亡人员的遗骨、遗言等寄给其家人。

据说,阵亡人在临死前往往无法开口,即使有声音也只是“痛、痛”地叫。但按规定对家人全部都要说死者是“三呼天皇陛下万岁后死的”,并且要将自杀者都说成是阵亡者。

为了处理遗骨,要将阵亡人的胳膊砍下来,做成便于区分的遗骨,挂在背包上。据说津崎先生行军时就背着它们。可他也说绝对没有屠杀行为。“屠杀是后续部队干的,是辎重兵之流干的。他们又有物资,还没有敌人,是他们闹着玩干的!行军时经常看到插着人头的竹竿竖在庄稼地里,还看到被杀死的女人的那个地方被塞满了弹壳。是啊,我自己在南京作战时也放过火,杀过有间谍嫌疑的人。但屠杀的定义是指杀害无辜民众。杀有罪的人不应该叫屠杀。”

因此,说自己没有干过屠杀的津崎先生复员后认为:“虽说当时是战斗,但毕竟杀了人。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说的呢?”于是他没有回禅寺,而当了八幡钢铁厂的轧钢工人。两年前退休了,现住在北九州市郊外的公寓区里。他说话时始终一副空虚茫然的样子,但他太太的话则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很古怪,和小区的人几乎不来往。”

罄竹难书的暴行

现在经营影院,并是保守派的大分市议会的议员井上基喜先生(53

岁,大分市草场町三组),当时是第四十七联队机枪队伍长。他说:“九州士兵性情鲁莽暴烈,说干就会蛮干起来。”但据他说,他也不知道屠杀何时发生,是怎么干的。“总之,因为我们是入城仪式后进的城。如果从清理战场这个角度讲的话,可以认为是入城仪式之前干的,但……”

井上先生虽是挎着刀应召入伍的,但自己一次也没有拔出过刀。据说在去南京之前,曾有一次奉命砍杀有游击队嫌疑的女子,但他无论如何下不了手。因为看到哭着求饶的女子,感到很可怜。不过,“一个当过警察的一等兵要求把刀借给他,于是就借给了他。结果他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乱砍。当时我还年轻,也不会强奸。”

最终,在大分县只能听到有过“扫荡残敌”、“处死俘虏”的事。但没有人一口咬定屠杀是毫无根据的事,都以多少行为过火这样的言词,给人留下他们私下里是承认的印象。

但是,为什么一提到有关屠杀的话题,他们就顽固地缄口不语了呢?刚刚还一直啰里啰嗦地讲自己的勇敢经历,而一涉及到屠杀,脸马上就绷紧了。这种现象从许多人身上都看到过。

不过,茨城县水户市的神官田所耕三先生(53岁),比这些人则坦率得多。

田所耕三于昭和11年毕业于东京芝浦工业中学。刚满18岁的田所先生作为一年志愿兵参了军,次年6月,作为安装重炮的必要人员被派往马绍尔群岛等地^①。10月,刚返回原部队就被派去参加杭州湾敌前的抢滩登陆。所以,在南京战役中,他是第一一四师团(宇都宫)重机枪队的一等兵。该师团自杭州湾登陆以后,基本上是与第六师团协同作战的,攻城时也同样是从中中华门进去的。

以下是田所先生的谈话:

去南京之前,可以说是没吃没喝的两星期。开始还有米,但补给跟不上,看到农民吃红米饭,反正语言也不通,就用枪砸他们脑袋,然后抢红米饭吃。头一旦被砸基本都死了。反正跟他们说他们也听不懂。

一路烧光了一座又一座村庄啊,为的就是让对方感到“敌人来了!”

^① 原文有误,当时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不可能被派往马绍尔群岛。

估计居民一看到火,就认为“大军来了”。尽管如此,还是佩服支那百姓胆量大,因为他们冒着不断飞来的子弹,还能不慌不忙地用木棒敲打着灌入葫芦中的种子在田里播种。

胡扯什么占领区孩子们唱“士兵先生啊,谢谢你”的歌,全是一派胡言。我们在中国没走多远,只是在靠近海的地区。不过我们经过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孩子唱歌这些事。因为日本兵所到之处,道路两侧都是一排排被刀砍下的人头。那是在南京城外,那些都是仙台的辎重兵干的。

虽然我们是南京沦陷那天进的城,但次日就被派往城外了。当时虽然分得一壶恩赐的酒,但因为是大伙的,所以每人只能象征性地尝一点。士兵们都流着泪激动地分享了那点酒和十支恩赐的香烟。……入城仪式上列队行进的只是一些没有受到损伤的部队。

从田所先生说话的表情中看不出犹豫,倒是显得极其平淡。

再继续说点吧。

在城里扫荡残敌,逮到军官及士官学校毕业的家伙时,便将他们绑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及刺杀的方法,并让他们实践。让军官及下士官砍掉坐在坑前俘虏的头。我吗?因为我是二年兵,是学习刺杀方法的。……城里城外,这样的事大概持续了十天左右吧?当然,这都是奉命行事的。

那段时间,我们在下关解开铁丝网上的铁刺,用它将抓来的家伙每十人一组捆起来,塞进井里,浇上油烧。我们称之为“捆麻袋”。感觉就像杀猪一样。经常干那种事的话,杀人就满不在乎了,因为成了家常便饭了。……而且,因为是命令,就肆无忌惮了。

还用机枪扫射杀人。把机枪架在左右两边的山上,“哒哒哒”地扫射。刚开始时,支那人还哇哇哭,但到最后关头都成了勇敢的人。看到日本兵出去侦察时当了俘虏,被逼着在敌人阵地那边打水干活,因为看着可怜,我们这边就“乒”地一枪打过去。如果没打中,他就趴在地上逃掉了。我们本来打算不让他受羞辱,这是出于“日本人的爱”而干的,但……

我也干过为警告俘虏而打伤人的事。割耳朵、砍鼻子,将剑插入对

方口中划开,将剑横着划过眼睛下方,结果眼球就会有鱼眼似的粘糊糊的白东西耷拉下来,拖有五寸多长呢。如果连这种事也不干的话,就没有其他乐趣了。

这是登陆后很久没有过的娱乐啊。你问军官吗?他们都假装不知道。

但是,妇女是最大的受害者。老的小的,全给强奸了。从下关坐烧木炭的卡车去村子,抢来女人分配给士兵。每个女人要接待15—20个左右的士兵。挑选仓库周围之类的向阳之处,铺上树叶什么的弄个地方,士兵们手里拿着盖上中队长印章称作“红票”的纸条,解开兜裆带排队等候。我曾干过几天抢女人的班长。每到一个地方,女人都陆续逃跑了。因为不能杀人,所以抓她们也很费劲。支那女人技巧不错,大概是不想被杀,所以就拼命配合吧,相当不错。总之,大家自登陆以来一直没有碰过女人身体,所以就摸个遍,还上下舔。我们把这叫做“舔死”她们。

有个新泻的家伙,一个人去城里强奸妇女,很晚了还没回来,大伙就去找他。将那里的男人全抓起来,要他们告诉我们那个士兵在哪儿,并当着大伙的面用力砍掉一个人的头,于是他们就坦白了。在一处防空洞里有一个储存苹果的仓房,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尸体。他带女人刚进去,就被人用三齿耙砍在背上,倒在苹果上了。那是……

没有哪个士兵没干过强奸的事,而且大部分是强奸后就杀掉。一松手,她们就会飞一般地跑走,于是就从后面“叭”地一枪把她们打死。如果不杀死,以后会带来麻烦的。宪兵知道了会召开军法会议的。不想杀也得杀。……不过,南京几乎没有宪兵。

在南京待了两个月左右,就前往武州。此时我已当了班长。是以上等兵身份被命令从事下士官工作的。就在那时啊,干了撕裂大腿的事。在一个村落,为了警告其他人,我把一个女人绑在柳树上,将捆在两只脚脖子上的绳子绑在两匹马的马鞍上,分别给左右的马一鞭子,人就从大腿处撕拉开了,一直撕裂到乳房那里。部队士兵观看了整个过程,中队长什么都没说。

田所先生平静地叙述着。在谈了前线下层士兵怎样拼命战斗后,也坦率地提及有关屠杀和强奸的事。

身为二年兵被提升到担任下士官勤务的上等兵,从这点来看,可以看出田所先生是多么有能力的士兵。是的,是忠实服从命令的士兵。虽然做得多少过分了些,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不正是前线浴血奋战的皇军士兵的形象吗?

[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最前沿出现异常——因屠杀而对立的南京攻击战的士兵们》,载《アサヒ艺能》1971年1月28日。]

(罗文文 译)

6. 被吊起的尸体

铃木春男(化名)

编者注：铃木春男(化名)，原陆军兵长。昭和12年7月进入重机枪队。转战于中国川沙镇、罗店镇、马桥、朱家宅等地。在南京负伤，同年10月被送返日本。在中国各地体验了战争的悲惨。

我是在昭和12年7月14日应征入伍的，12月18日进入步兵第四十四联队，编入第二重机枪队。

昭和12年7月20日凌晨3时从联队出发，6时到达多度津港。7时，我们部队乘上巡洋舰“青叶”号离开港口。7月22日凌晨5时，在敌方的眼前开始登陆。经过五天的交战，我们登上了川沙镇，接着转战于罗店镇、马桥、朱家宅。9月2日与后续部队换防后，向南京进发。10月12日，在南京的作战中^①，我的右上臂和右胸部受到枪伤，被收容到野战医院。10月21日我被送回日本，第二年的7月30日解除了兵役。

在服兵役期间，我在重机枪部队从军。重机枪就是重约七十公斤、固定在地面、一次可以发射800发子弹的那种机枪。我的部队由八个人组成，平时属于大队本部，战斗时被派遣到各小队、中队。重机枪和子弹是由马来运输的。战斗时由分队长作指示，两人负责重机枪，三人负责子弹，剩下的两人负责牵马。在参加战斗时，首先与中队、小队取得联系，确定好目标，然后就对该目标进行扫射。连射1600发子弹之后枪身会变得通红，必须换掉，所以事先要准备好两三支枪身。战斗中，打完子弹后舍弃重机枪后撤，有时等到敌方的子弹也用尽后，再带着子弹重新回到原地进行交战。战斗中，先由步兵持轻机枪前进，我们重机枪部队跟在他们之后前进。敌军开始撤退后，步兵向前推进，在占领某个村落

^① 原文如此。10月12日，南京攻击战尚未开始。

之后,重机枪小队再进入。敌方的步兵因为都被抓了,所以见不到他们的身影,我所见到的尽是一些来不及逃走的老人。

对俘虏的处置,按照军令,“白天用他们做杂役,晚上关在小屋里。部队转移时,或将他们带上,或遣散他们。”开始时确实是按照军令,抓到了俘虏后,给他们吃,让他们为日本兵干杂活。部队行进时让他们背背包,或为了获取情报带着他们,或遣散他们。但有时我们收到情报说:“被遣散的俘虏为中国军队提供消息,使得日军被夹击。”曾经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日本部进入某个小镇,理应不会被中国军队发现,但遭到了迫击炮非常准确的攻击,当日本兵一进入人家,大炮则停止了攻击。这样一来,日军感到非常奇怪,搜查了一下,原来是带着的俘虏在给中国军队打暗号。那以后就决定杀死俘虏。不过我们的重机枪部队,正如前面所说的,从来没有看管过俘虏。我们所抓到的俘虏,都是一些没能来得及逃走的老人,我们私自让他们做饭,要他们把藏起来的鸡蛋拿出来。遇到他们肚子痛、拉肚子等情况,就让他们喝碳与牙膏调制在一起的东西,以及用水稀释过的碘酒,我们没有杀过俘虏。而步兵部队,由于抓的都是正规军的俘虏,所以残杀俘虏的事情非常频繁。

正因为有了前面已经说到过的理由,在部队要转移的时候,将俘虏杀掉成了一种惯例。将四五个俘虏关进一间小屋,由一个分队二三十个日本兵将小屋包围起来,用枪对着小屋射击,直到小屋里完全没有声音发出为止。这种情景让人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

“救命!”

他们也许是在这样呼喊。射击一直持续到听不见这种声音为止。在作战时什么都不去想,只管开火,而对着手无寸铁的人射击,当然不会有什么好心情。等到小屋里安静下来之后,由于急着要去追赶在这之前已经出发的大部队,所以只好不再去理会小屋中的俘虏。如果放火烧小屋的话,冒起来的烟就会成为中国军队的目标,所以也不能放火烧。由于没有确认小屋里俘虏的生死,据说在日军离开之后还是有人从小屋里逃出来。部队在离开一个村落之前会一直听见从各处传来“砰、砰”的枪声。

每当听到这样的枪声,我们就会说:

“干得真漂亮啊。”

那是昭和12年8月，在马桥发生的事。步兵们说是要杀俘虏来试一下枪。要试的是步兵手里的来复枪，它的性能可以将子弹打出4000米，再穿过三厘米的铁板。我想那天应该是个大晴天吧。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步兵们为了要证实一下枪的性能，饶有兴趣地谈论着：

“打打看啊。”

“行，那就打打看。”

好像就是这样心血来潮地开始的。俘虏人数有十三四人。在棉花地里打上一排木桩子，将反抗的俘虏绑在桩子上。接着站在一边开始看能射中几个人。俘虏中既有放弃反抗、有气无力地耷拉着脑袋的人，也有叫喊着拼命挣扎的人。日本兵有的站着射击，有的单膝跪地射击，也有的趴着射击。随着第一个日本兵开始射击，在“砰——”的枪声响起的同时间，子弹击中俘虏的身体，一个、二个、三个……宛如击在沟堤上，发出“噗、噗”的声音。

被击穿身体的俘虏口里发出“哦”的一声，脑袋一下子垂了下来，立刻毙命。俘虏一个接着一个身体被击穿，身体没被击穿的俘虏，他们发出的痛苦呻吟声我至今还记得。尽管到了这种地步，日本兵仍然交替着射击。射击完了的日本兵被问道：

“怎么样啊？”

“像打在豆腐上。”

“好厉害的手感。”

等等。他们这样回答道。这样一来其他的日本兵则说：

“那我也来试试。”

就这样，又有几个日本兵开始试枪射击。周围的日本兵饶有兴趣地嘻嘻哈哈地观赏着。等到所有人的射击完了之后，在地面挖了个坑，将被打死的俘虏尸体埋了起来。日本兵也许有着战场上的某种集团主义的心理吧，让人产生一种明天连生命都是否存在的自暴自弃的心情，现在回想起来，当然也不会令人愉快。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同年9月，是在朱家宅发生的。吃过早饭之后，我为了与中队商讨作战时机枪的配备位置之事，离开大队本部去两公里

外的中队。为了完成任务,我在村中小路上小跑了起来。农田和农田之间有一条用于灌溉的小渠。小渠对面有一户农家,院子里种着一些用来晾晒衣服的高大树木。其中的两棵树木之间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垂挂着。我定神望去,原来是三个中国兵,被一根很粗的铁丝从两耳穿过吊在那里。俘虏看上去已经死了。我只是经过时看到的情景,其原委就无从得知了,但据我猜测,要将三个人抬起来的话至少要有十个左右的士兵,我想应该是昨晚将他们吊起来的。要将铁丝穿过活人的耳朵,俘虏也一定经过了拼命地反抗吧,一定也叫喊了吧。这只是我的猜测。现在想来,干这种事的日本兵的心理大概也可以称作集团主义心理吧。我为了自己的任务马上离开了现场,之后的处理工作也许是按照中队长的命令立刻将他们放下来埋了吧。因为这事如果传到大队长耳朵里的话,想必会引起一场很大的骚动吧。在我周围也有日本兵在说:

“搞得过分啊。”

像这样残杀俘虏的行为,除了我前面提到的理由外,还有就是在支那事变中,住在北京的普通日本人被中国兵残杀的消息经常传到日本。年轻的士兵们说:

“干掉他们。”

“过去,日本人也被这样干掉过。”

“如果我们被敌人抓住了也会被这样干掉的。”

就这样,一半是兴致,一半是愤懑,还有就是集团主义心理所驱使。虽说将校们对此不加以制止是违反军规的,但他们不会说一些严厉的话,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说到为什么会这样,那是因为如果出来制止的话,反而会被说:

“子弹不一定从前面飞过来,也会从后面来哦。”

我再稍微说一下野战医院的事。战斗结束后,回到原来作战的地方,收拾战友的尸体,给受伤的人治伤,将重伤员送往野战医院。虽说称作野战医院,也只是在烧剩下来的农家的土屋里铺上稻草而已。只是让伤员在这种算不上医院的房子里躺一下,处理一下伤口之后可再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好不容易再一次轮到处理伤口,也就是在化脓长蛆的伤口上用竹片刮一刮而已。尽管如此,到了那种时刻还是有一种说

不出的高兴。如果是死了的话,挖一个坑,一次性地将十几个人放进去烧掉。经常会发生由于火焰窜得很高而招来中国军队袭击的事情,就靠还能动的伤兵和军医以下的卫兵同他们交战。医院的船只在回日本时有很多人就死在了船上,有时候早晨醒来后发现战友已经死在自己的身旁。结果当我被收容到日本医院去的时候,所认识的人只剩下很少了。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鲜血染红中国大陆——加害者亲身经历的记录》,第三文明社(东京),1983年8月15日。]

(赵仲明 译)

7. 蚁 狮^①

前原寿

编者注：前原寿，原陆军步兵(迫击炮)。昭和12年8月进入三枝部队。同月，从吴港出发，在上海登陆。同年12月进入南京，昭和13年1月向扬州进军。之后，又转战安庆、九江、武昌，12月回到上海。昭和14年1月回国。

我是昭和12年8月20日被征兵后到达上海的。沿着扬子江一直向西征战。当时正值支那事变，我30岁。

我们一接到征兵的命令，立刻在姬路集中，由从冈山、岛根、鸟取和四国方面来的人编成一支部队，部队的名字就叫三枝部队。我们部队其实在步兵中还是有点与众不同的，称作炮兵，是用迫击炮援助第一线的部队。我们的任务是，当前线作战的部队遇到战况不利而撤退或者乱了阵脚时，我们在离他们大约五百米的后方布上炮阵，用迫击炮掩护他们。说是后方，其实只有短短500米的距离，有时会变成前线打得最不可开交的战场。我们在姬路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学习了迫击炮知识，还训练了拉迫击炮的马。8月30日，我们乘上了船只，从广岛的吴港出发开往中国，最初在上海登陆。

“即将要上战场。为了祖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豪情壮志来的。由于当时正由满洲事变转变成支那事变，日本处在上风，所以我们的斗志尤其高昂。

在上海，有一家叫日化纺织的日本大公司，我们就是在该公司布好了炮阵开始战斗的。在此打了近一个月，有些战斗损失非常大。前线的战斗遇到了不利，阵地崩溃，开始撤退。我们急急忙忙开炮应战。有三颗敌人的炮弹落在正打得火热的我们的炮阵中。虽然炮弹没有直接击

^① 蛟蜻蛉的幼虫。

中迫击炮,但还是损失惨重。有被炸飞起来后又摔到地面上的人,有被炸飞到五米远撞在建筑物上的人,大部分是因为被炸飞后摔得不巧而摔死的人。有一个人被炮弹的碎片击中胸部,血一下子喷了出来,成了血人,当场死亡。他翻着白眼,死相极其恐怖。还有一个人,同样被炮弹碎片击中腹部,肠子几乎全流了出来。卫生兵立刻赶到,将他的肠子重新塞进肚子里,解下腿上的绷带,绑住伤口,总算是止住了血,但由于伤口太大,无法治疗,不久就断气了。在临死前他使出最后的力气叫道:

“他妈的,好悔啊,我怎么死在这种地方,难道我真的回不了日本了吗?”

还有的人虽说没死,但有一些手脚骨折的、摔得无法动弹的伤员。虽说是较小的炮,但让我们见到了比想像中的迫击炮更大的威力。一瞬间,18个同胞战死在炮下。

在那种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输!根本没有时间去想战死的同胞。到了战斗结束时,顿时感到非常疲惫,坐在那里不想动弹。刚休息了一会儿,就接到命令,收集战死了的战友尸体,然后烧掉。烧完之后要捡些骨头,与阵亡通知书一起寄回日本。不过一下子要烧18个人的尸体,柴火不够用。于是将中国人的房子拆掉一半,将可以用来烧的木板带回去,浇上汽油烧掉。看着被火焰包围着的同胞尸体,我想到的是:“这样的话是没法活得长的,必须做好随时可能死亡的准备。”还想到:

“让我们的战友死得那么惨,中国人,你们等着瞧!”我第一次感到了对敌人的强烈憎恨。

就连这样的话我都想到了:

“我们来到这么遥远的中国打仗,我们如此吃尽苦难,这都是中国人的罪过。是你们要发动战争,都是你们的错。”

这些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大家都这么想。就因为这样想,所以第二天,在我们驻地抓了三个路过的普通中国人,用来做日本刀的试验品。三个人都穿着破衣服,是30岁到35岁之间的男子。我们将他们的手绑在身后,让他们跪在泥地上。大概他们已经想到了会被杀死,所以都闭上了眼睛。当要用日本刀来砍头的时候,我们让他们向前弯着身

子,用日本刀的前端一下子砍下去。仅一刀没法将头砍下来,接着又砍第二刀、第三刀,终于将头砍了下来。日本兵从脸上到衣服上,浑身沾满了鲜血,那种疯狂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可怕。结束之后我们这样谈论道:

“今天太不争气,没有一刀砍下来,下一次一定一刀砍下他们的脑袋。”

看着这一情景,我一方面感到他们很可怜,同时也在想要杀就杀吧,我以出乎意料的冷静看着眼前所发生的一切。如果这些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军人的话,我肯定会鼓掌的。也许因为现在是别人干的,所以能够较冷静地看着。

11月、12月,我们向南京进军,12月底进入南京城,迎来了昭和13年的元旦。从1月到3月,我们向扬州进军。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心境,因为不知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在战斗中死去,如果不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的话会是一种损失。所以在进军途中哪怕遇到的是平民百姓也会毫无理由地殴打他们、抢他们的东西,渐渐这种行为变得越发野蛮起来。因为战争是带来让人感觉不到自己在杀人那样的异常心理状态的罪魁祸首,所以即使不是军人,哪怕是对敌方的平民也要打和抢,变得完全没有罪恶感。上司下过强硬的命令,尽管是战争,也绝不能有抢劫平民的事情发生,但大家完全无视这种命令。

只要我们一占领某个城镇,那个城镇的老百姓就会逃到什么地方去避难,屋子是空着的。我们撬开房门,砸碎玻璃窗。拿出橱子中所有的东西扔在地上,再用脚蹂躏。厨房里的餐具也全部摔碎在地上,最后翻倒床铺。就这样干一些并没有目的的破坏,并将看上去值钱的东西全部带走。田里的蔬菜也逃不过厄运,我们直到全部拔光才离开,并且毫无理由地将房屋毁掉。这是一种全面的掠夺。我们肆无忌惮地干完我们所干的事情,然后离开。而那些原本一直躲着的老百姓们回到家之后,看到这样一种惨不忍睹的光景时会是怎样的心情呢?但是我们也并非完全没有自己干了坏事的意思。当我们看着自己抢回来的东西时,便会想到自己干了残忍的事情,这时候心情又变得十分空虚。不过我们还会找一些借口来安慰自己。比如这比起杀害平民总要好一些吧;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等等,试着对自己的行为给予正面的肯定。对于不断在干这

种事情的日本兵，平民百姓虽然沉默，但我想他们心中是充满仇恨的。事实上，我自己就曾经被这种目光盯视过，心情变得十分糟糕。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他们一定是在想：“我们现在被你们打败了，被你们随便怎么处置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沉默着，咬紧牙关在忍受着。

昭和13年4月从扬州出发，直到夏天，一直向安庆、九江进军。9月底到达武昌。在这个城市的战斗，日军稍占了一点上风而取得了胜利。我们接到在原地驻扎的命令。到10月底变得越来越冷。在遇到警备值班时更是苦不堪言。当我们一用柴火生火，周围就会围过来二三十人，这样一来柴火马上就不够了。于是大家几个人一组分头去拆那些还住着人的民房，而且不止一间两间。把那些可以烧的东西都带回来。平民百姓含着悲伤的泪水任我们胡为，只是用仇恨的目光盯着我们。当我们在拆一户人家的房子时，正准备将在那里发现的耕田用的铁锹、镰刀以及其它一些东西带走当柴火烧时，一个一直藏着的老太婆突然跑了出来。老太婆弓着腰，穿得破破烂烂，大概70岁左右。她拼命地上前来夺那些农具。她高声地叫喊着，大概是在叫喊：“还我，还我！”开始我们还兴致十足地逗她，但她毫不放弃，向我们冲过来。她一人对我们三人，又打又踢。我们只想让她放弃打斗回家去，谁知她还是一点不退却，用憎恶的眼光死盯着我们，非得要回农具不可。但她面对的是身强体壮的日本兵，无论如何是没法拿到那些农具的。被日本兵欺负的老太婆，最后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嘴里叫喊着。一个日本兵怒吼道：

“闹什么闹，你给我住嘴。”

怒吼的日本兵轻轻地将老太婆抱起，一下子将她扔进烧得正旺的火堆中。就连围在旁边看的我们也被惊呆了。

“啊……”

我们不禁失声地叫了出来。老太婆被烫得在那里打起滚来。她的头发被烧掉了，脸也烧伤了，其状十分悲惨。见到这一场景没有人笑得出来，大家一个个地离去，但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止这种行为。我也没有去阻止他，我用眼角瞥了一眼被火烧伤的老太婆，所能做的就是从这儿离开。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想到这种行为太残忍，但谁都说不出口。在不断的战斗中，“只要是中国人，无论是谁，都是敌人，都该杀。”这样的心情

变得越来越理所当然,哪怕有一点稍加同情的话都是决不能说出口的。最终老太婆在慢慢的挣扎中死去。那真是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啊,实在太残忍了。然而我只能用“这是战争”来说服自己。就是说老太婆也有一半的错,她藏得好好的、不跑出来的话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天晚上我对和我睡在一起的日本人说:

“今天的事,不管怎么说都是太过分了。”

听我这么一说,他告诉了我更加耸人听闻的事情:

“今天不就一个人嘛,还发生过一次活埋很多平民的事情呢。”战场上到处可以看到炸弹落下后炸出的大坑。深度有6米,直径从20米到30米左右,形状就像一只缸,是倒过来的圆锥体。一旦掉进了这样的坑里是无法爬上来的,与蚁狮相同。就是这样的坑,平民女性两个人、五个人、十个人地一个个被扔进去,每当人被扔进去的时候,周围的土就会塌下来将人的身体埋在里面。人的脸上沾满了泪水和泥土,口中也含着泥土,完全就像泥人一般。上面的日本兵一边兴致十足地看着,一边笑着。最后他们越发来了兴致,一下子把泥土推下去,将十个人活埋了。听着这些,再加上刚才发生的老太婆的事情,实在是太残忍了。面对我们日本兵所做的这一切,我从内心感到了一种空虚、孤寂和厌恶。在离开日本出征之时,谁都想“为了祖国而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现实是,在自己的面前展示的是以战争为借口的杀戮。我们不得不参加战争,而这与自己的意愿并没有什么关联,如果不杀人的话自己就会被杀,我们仅仅是为此而战。远离所爱的亲人,每天只能见到男人的这种生活,使我们内心变得十分暴躁,哪怕是同胞之间也会为了一点点小事而打斗不休。出征一年有余,人生变得如此凄惨。然而,尽管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只要有两三天没有打仗,心情马上就会变得祥和,互相之间谈论一些自家小孩、自己故乡的事情,还有人因此而落泪。我也想起了在日本的妻儿。

“真想活着回去啊。”

我不由得自言自语起来。当时我大儿子7岁、小儿子3岁,正是最可爱的时候。就这样只要稍稍远离战斗,我们的心情就会变得祥和,甚至还会唱起歌来。但是,每当一进入战斗就变得杀人也不当回事。在和

朋友亲切地谈话时,长官一声令下:

“敌人来了,准备战斗!”

瞬间我们就变成了一名战士。在整装待发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就充满了上战场杀敌的雄心,不过也经常会产生厌恶的情绪。但是上级的命令是绝对不能违背的,我们必须去参加战斗,哪怕那并不是自己的愿望。即便是厌恶,也必须变成战士,变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战士……到战斗开始的时候,连这种想法也没有了,只是变得视死如归地凶猛。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话自己就会被杀。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11月中旬左右,我在修理运输用的卡车时,有人误将引擎启动了起来。

当时我正在卡车底下,一只脚被压在轮下而骨折了。因为是在第一线,没法接受良好的治疗,过了一些日子后身体变得虚弱起来,又患上了疟疾,终于不能打仗了。我被大家称作没有用的战士而于12月被送到了上海。在上海一家不错的医院里接受了正规治疗后,等到自己稍微能够走动时就被送回了日本。那时刚过了新年,是昭和14年1月。我回到了原本以为不会再回来的日本、不会再回来的我的家。尽管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来的,但好歹是回来了。然而只要一想到还留在中国的战友,我无论如何高兴不起来。更何况我不断回想起边呼唤着儿女的名字边死去的人、那些死去的中国兵——尽管他们是敌人,以及边哭叫着救命边死去的中国的平民百姓。这一年半有余的战斗真是充满了艰辛和残忍,使我无法马上恢复正常的生活。

之后,战争发展成为大东亚战争,本想不用再去的中国大陆又不得不去了两次、三次。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鲜血染红中国大陆——加害者亲身经历的记录》,第三文明社(东京),1983年8月15日。]

(赵仲明 译)

8. 南京大屠杀

法城家安男(化名)

编者注：法城家安男(化名)，原日军伍长。昭和11年应征进入姬路的野战炮兵第十联队。由于学生时代曾是和平运动活动家，在部队中被重点监视。在中国参加了上海、吴淞的敌前登陆战，随之经过徐州之战，进入刚刚沦陷的南京，经历了南京大屠杀。

我是昭和11年被应征入伍的。入伍后被分配到姬路的野战炮兵第十联队。我们的野战炮队拥有口径100毫米的加农炮，由六匹马牵引。

昭和初期，我在旧制中学学习期间，就有了反战思想，到了专门学校时期成为了一个反战思想小组的活动家。由于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被军队当局视为具有危险思想者，因而被分配在野战炮队最前线位置的观测班中。

观测班的工作是侦察我军到敌人阵地之间的距离，以及敌人的装备、人数，再与后方的炮兵部队联络。鉴于这种工作的性质，观测班由三到六人组成，执行的是部队中最容易遇到敌人、随时都有可能被打死的危险任务。部队中，通信班和观测班都要求具备专业知识，所以大部分都是大学毕业生。我不但是大学生，而且还是学生时代具有和平主义思想的人，所以更是理所当然地被派到这种工作岗位上。我想当局是希望我尽快地被杀掉吧。

昭和12年，我们部队出征后的最初任务就是华中地区的上海、吴淞的敌前登陆战。这一战斗，是在中国军队的几百门大炮组成的炮阵中，冒着弹雨从大海上的强行突破。这次战斗虽然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而实际上6000人的部队战死了有4000人之多。在称作赤紫部队的突击部队之后就是我所属的野战炮兵第十联队。那时我还是新兵。登陆上海，新兵的我所体验到的就是“战争的悲惨”。

这是我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

例如,在占领上海之后,如果日本兵一个人走在市区的话,一定会被平民百姓用拳头或者用枪打死。反过来,日本兵也会朝平民百姓开枪或者虐待他们,其惨状宛如“血债要用血来还”这句话所表达的那样。我们野战炮队在行进中还受到了来自上海租界地区(美国、英国、俄国领事馆等所在地)的重机枪射击。我们原以为已经击败了中国部队而能够放心地行进,但想不到会遭到如此袭击。在这次袭击中我们死了 270 人,负伤达 1 000 人。

虽然我应征入伍,但我还持有反战思想。虽然我参加了部队的实际战斗,但内心常常在想战争是不应该进行的。但是一旦遭到敌人的袭击,子弹朝自己打来的时候,这种想法就会忘记。再加上看到成百上千的战友在自己眼前倒下时的惨状,便会燃烧起对敌人仇恨的火焰,待到上司的命令一下,便立刻将炮弹射向敌人。来自租界地区的袭击,以后再细细一想,也许这就是将日本卷入太平洋战争泥沼的一个原因。

接着我们部队向徐州进军,这一进军也十分悲惨。举个吃饭的例子,对我们来说惟一的一件开心事就是吃饭。但是粮食不够吃,只有在夜间才会烧一点米饭,因为午饭时如果生火的话,黑烟立刻会引来敌人的袭击。因此在夜里烧饭吃后,到了早晨看一下周围的话,敌人和我们的部队已经在战斗中死了无数人,尸体都已经腐烂了。我们经常在他们的阵地上取水用来做饭。

接着,在攻克南京之后,我们跟在步兵的后面进入了南京城。我们的部队是从南京城的南门进城的。一进城门,立刻映入我们眼帘的尽是在战斗中倒下的堆积如山的尸体。从南门开始一直到十公里之外都堆积着尸体。敌人的和我们战士的尸体混在一起,战斗的激烈程度一目了然。我们野战炮兵部队在堆满尸体、坎坎坷坷的马路上运载着沉重的迫击炮和野战炮前进。我们踩着倒下的战士的身躯、头、脚和手前进。因为是才攻下南京城,尸体堆中有人还在呼吸。尽管他们还有着求生的欲望,但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沉重的车辆从他们身上碾过,将他们压死,行军部队如同海啸般,以排山倒海之势不断涌过。即便是有人高喊救命,但他们的声音也将淹没在行军的脚步声和军马的嘈杂声中。

进入南京之后,驻扎了一段时间,就在这一段时间中发生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当时,我是伍长。这一期间日军的行为完全是残酷的和非人道的。一方面是我自身的思想使然,再加上我有剑道六段的技能,我经常接到上司命令,再命令手下的四到五人去残杀敌人的士兵。现在回想起来仍是毛骨悚然。

有一次,我们接到命令,要烧死敌人的便衣队俘虏。为了不让他们逃跑,我们将俘虏的手反绑起来,将他们关进一家已经空了的民居里。等到将他们全部关进去之后,我们将汽油浇在房子上,再点上火。俘虏的人数不是10人、20人,而是数百人。火焰窜起来之后我们听到了叫喊声。有人想要打开门往外跑,但门从外面锁上了。偶尔有逃出来的人也立刻被站岗的士兵开枪打死。听着被火焰包围着的俘虏们发出临死前的惨烈的叫声,看着他们在火焰中打滚并被活活烧死的情景,无论上司怎么说“这是战争!”、“他们是敌人!”而作为一个与他们相同的人类,无论如何是无法忍受的。难道这真是“红莲地狱”在眼前的展现吗?

这样的事情以后还在不断地发生。

另外,由于我有剑道六段的技能,便经常接到上司的命令:

“去! 砍死敌军的俘虏!”

在部队里“上司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所以上司的命令是必须绝对服从的,如果不服从的话自己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上司从来不会自己动手的,都是命令部下下手的。

“你有经验,你去干!”

他说着便会将俘虏带给你面前。

“砍掉他的手!”

他如果这样说的话,你就要砍俘虏的手。

“砍掉他的耳朵! 砍掉他的鼻子!”

他这样说的话,你就要砍掉俘虏的耳朵和鼻子。

“砍下他的头!”

这样一说,我就要在上司的面前砍下俘虏的脑袋。

人的头部不是那么容易就被砍下来的。尽管如此,上司还是很轻易地下这种命令。就这样,我因为有技能就经常被命令干这样残酷的事,

因此常常受到良心的谴责。有时我实在忍受不住了,便请求上司:

“不要老让我干了,你让别人干吧。”

但他根本不理睬我的恳求:

“别多嘴,还是你干!”

这样一句话就拒绝了我。

我多次被命令干同样的事,实在无法忍受,我曾多次提出请求,但他根本不听,有时我自己也受到上司的惩罚,还发生过差点被处死的事情。

就这样,虽然我反对战争,但应征被派往日支战争^①的最前线,我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无视人性的残酷行为不是在战争这两个字的掩护下就可以恣意妄为的。如果日军取得胜利而统治了支那的话,那么疯狂的军国主义时代一定还会持续下去吧。

今后,我要和大多数爱好和平的人一起为了不再发生战争而斗争。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鲜血染红中国大陆——加害者亲身经历的纪录》,第三文明社(东京),1983年8月15日。]

(赵仲明 译)

^① 即日中战争。

9. 奔波于炮火下的摄影班

寺田与之助

编者注：寺田与之助，隶属日军第三师团卫生队本部附属摄影班。

(前略)

辻村曹长因这一次的负伤而住进了野战医院，虽然接受了治疗，但还是在左颈部留下了很大的刀疤。战后在名古屋市中区铁炮町的冈谷钢机中设立了一个驻军宪兵队总部，他就在那里工作，之后就没有了消息。

第三师团紧随第一线兵团的第九师团之后向南京进发。12月12日，我们到达了距南京东南六公里的土山镇附近。在这里才接到突击编入第六十八联队、参加进攻南京的命令。第九师团胁坂部队的右翼配备了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和第三大队。

我们部队为了要抢第一个进入南京的头功而连续发起了猛攻，终于在第二天，即13日下午，第二大队占领了武定门，第三大队占领了通济门。比我们先到达南京城南部光华门的胁坂部队，经过与疯狂反击的中国军队进行激烈的短兵战，最后通过拼命爆破城门并取得成功，完全占领了光华门，他们第一个将日章旗插上了城门。

在胁坂部队占领光华门的五天前——12月8日，指挥日军完成了包围南京任务的南京攻城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对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发出了在12月10日正午之前投降的最后通牒。最后通牒是这样写的：

百万日军已经席卷江南。南京城已经被包围。从战局来看，今后的交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江宁是中国的旧都、民国的首都。这里

集中了明孝陵、中山陵等名胜古迹，宛然东亚文化之精髓。日本军队对抵抗者是极其严厉和不能宽恕的，而对无辜的民众以及没有敌意的中国军队，我们将予以宽大，不予冒犯。至于东亚文化，我们怀着将其保存下来的热忱。但是贵军如果坚持交战，南京势必难免战祸之灾。千年的文化将化为灰烬，十年的经营将变为泡影。

因此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军队向贵军发出通牒。

立刻和平敞开南京城门，按照下列事项执行。

大日本陆军总司令 松井石根

我们将于12月10日正午在中山门—句容公路的流动哨线上接受对本通牒的回复。如果贵军派遣代表司令的负责人的话，我们将在哨所准备好与本司令官之间商定关于接受南京城事宜的协议。如果在指定的时间内我们得不到任何回应的话，日军将不得不开始进攻南京。

但是中国军队无视这一最后通牒，并以猛烈的炮击作出了回应。于是日军在预定的12月10日下午1时开始对南京发起总攻。

我很想摄下攻克中国的首都——南京的情景，于是我穿过营地，跑到最近的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所占领的武定门。武定门城外，在通向城内的大道两侧，排列着看似商家的房子，它们正在战火中燃烧着，冒着黑烟。我走在很宽敞的道路中央。快到城墙的地方，外侧有条护城河，护城河的堤坝上挖了好几层战壕，我想他们一定会在这战壕里抵抗到最后的。这一带，在护城河与城墙之间有一段大约二十米的空地，两岸的战壕内以及空地上满是战死了的中国人。一眼望去有数千人之多。中国正规军士兵的服饰是草绿色的军装，加上别着青天白日旗徽章的军帽，腿上缠着绑腿，而现在躺在地上的尸体几乎全都穿着一件平民穿的藏青色服装，还有人脚上穿着草鞋。他们的腰间都挂着两三枚手榴弹，还有人拿着机关枪或步枪。他们中年龄有从十二三岁的少年到五六十岁的老人。

在那个时期中国有便衣队这样的组织,他们穿着与一般平民相同的衣服,见到单独行走或者人数不多的日本兵时,使用手枪或手榴弹攻击、杀害他们。这是一支公开的秘密部队。

据我推断,这支便衣队在各地活动,他们抵抗不住如怒涛般汹涌而至的日军追击,便撤退到首都来了。但由于城门紧闭,他们进不了城,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只好与日军战斗到最后死去。如果按照日本的方式来说的话,我想他们是为了保卫家乡,建立了一个类似警备防卫团这样的组织,他们被派遣到第一线,最后死得很惨。在这些穿平民服装的死者里面也混杂着很多穿正规军军服的死者。

我拍了刚被攻克下的南京城武定门城外的照片,以及上面所说的那些极其悲惨的战死者的照片。拍完照之后我走近城门,抬头仰望城墙,我发现与从远处眺望时的高度截然不同。城墙的高度应该有20米吧。在用特大黑砖层层堆砌起来的城墙上留下了无数大小不等的弹痕,向人们叙述着那场激战。

我对守卫武定门的第六十八联队的岗哨说:“我是师团卫生队摄影班的,能不能让我进去?”“现在城门附近正搜索残敌,不能进。”他一口拒绝了我。我还是不死心:“我是要拍第六十八联队占领的这座武定门,我不去别的地方,你让我上一下城墙吧。”我请求他。“只能上城墙。”他同意了。城门被土包堵住了,我从一个缺口进了城,登上了城门。

这一带城墙的厚度有十五六米,有的地方窄,有的地方宽。我感到吃惊的是,所使用的城砖非常大。每一块砖居然长达40厘米、宽30厘米、厚20厘米。城墙上有的地方还可以行车。

我眺望城内,到处冒着黑烟,非常清楚地表明到处发生着火灾。扬子江岸(北面)好像还在进行战斗,可以听见机枪声和炮声。

仅在这座武定门上眺望的话,可以望见城内很多房屋由于炮击被破坏了,但看不见中国军人的尸体。

这是12月13日下午4时左右,我所看到的刚刚被攻下的南京城的状况。

因为这天我没有请示便离开了部队,所以早早地回到了部队。我对自己无视纪律的行为多少进行了一下反省。

第二天——12月14日清晨,我将这件事对卫生队五岛兽医准尉说了,他一边斥责我道:“寺田,别做目无纪律的事。”一边又说道:“今天我去看一下,你跟我一块儿去。”我被他很巧妙地利用了。于是这天早晨两人决定一起进城。我们考虑到从其他师团占领的城门当然是不可能进城的,所以决定今天从第六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占领的通济门进城。

与武定门相同,通济门的城门外也有一条护城河。河上有一座临时桥梁,我们越过那座桥向城门走去。城门被好几层土包堵着,但中间被打开了一个让人能徒步通行的缺口。我们对第六十八联队的岗哨说,我们是师团卫生队摄影班的,便让我们进了城。我们先登上城门,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个门是由三重门组成的,内侧还有两座门。城墙上走动流动哨。

我们向城外望去,满地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数不胜数,他们穿着平民的服装,握着手榴弹。这种情景与武定门外完全一样。

我们向城内望去,大火还在燃烧,各个方向都是黑烟滚滚。

下面我从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中选取一段在攻克南京当日,光松秀一少尉在通济门附近所见所闻的感想文。

出了通济门,门外的异常光景不禁让我魂魄顿失。护城河的水里、岸边全是男女老少的尸体,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有铁船排列在那里,虽然可以过河,但我所能看到的,城墙下成了尸体的海洋。不踏着尸体是没法往前走的。“鬼门关”正是这个场面的写照。他们从上海到南京,被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夹击着逃到了南京城外,但又进不了城,眼前就是被卷入战火的平民百姓的悲惨结局。

我与五岛准尉在城墙上走过去看胁坂部队占领的光华门。这座城门比武定门、通济门都要大,是一座坚实的二重门。从外侧门向里,内侧还有三四十米高的更坚固的门。无论哪扇门都在内侧堆了好几层土包,不能进出。城门上原来有一座像庙一般的瞭望塔楼,但在空袭和炮击下被摧毁了。

尤其是这一带的城墙宽达20米左右,非常坚固,但好像遭受到过重炮的轰击,城墙的外侧倒了下来,变成了日军的突击之路。

在光华门外,同样是手持手榴弹或手枪、穿着中国平民服装的尸体堆积如山。不知何故,那中间很少见到穿中国正规军军服的军人尸体,这一点各城门都一样。

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城内几乎见不到战死者的身影。

光松少尉在感想中说,从上海逃到南京的难民,这里成了他们的最后归宿,我与光松有着不同的看法。

我所见到的尸体,从他们手里拿着的东西来判断的话,我认为是为了保卫首都,从首都圈内外的平民百姓中强行征来的,而且男女老少不限。他们被强迫去干从挖壕沟到直接参加战斗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从穿正规军军服的尸体很少这一点上也可以加以推断。可以用来做证据的还有,中国人外出逃难必定会用扁担或者驴子,但这些物品在哪里都没有见到。

毫无疑问,中国军队将这些数量达几万人的一般平民作为防波堤,他们自己则从惟一可以逃跑的出入口——南京下关的港口渡过扬子江,向北方逃跑。

昨天还能听见城内的北部地区(扬子江北面)“砰、砰”的枪声,今天却是十分的宁静。我和五岛准尉看了光华门附近一带之后,决定去市中心看一看。

我们想到如果进入小巷的话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我们走上了大马路。首先进入眼帘的是每个道口都有宪兵站岗。

他们在严格地监视是否有日军掠夺、放火、对残留居民实施暴力的行为发生。更何况这里是中国的首都,也还残留着外国大使馆的人员,他们一定在关注着日军的行动。

我所看到的市内的状况是,日军昨天才突入城内,而大马路上从大商社、银行到一般的商店,非常明显已经遭到了掠夺。银行、公司的门都被砸坏了,朝里瞧一眼就可以看到里面连站脚的位置都没有。一般的商店,外面的橱窗都已打碎,不剩一件商品,看上去像是遭到了洗劫。稍微进到小巷中看了一下,无论哪一间房屋都遭到了很残忍的破坏,桌子、椅

子、炊具都被扔到了街上。显然这些不是日军所为,因为日军为了扫除残敌正在拼死地战斗。

一目了然,这是眼看南京就要沦陷的中国军队或者残留的居民所为。

在我们走过来的马路上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的身影。在一条大马路的十字路口,树立着一块标着警备队长名字的告示牌,上面写着:“这里开始进入难民区,禁止日本兵进入。”警备队员在入口站岗。我们朝难民区的方向望去,那里聚集了很多中国人。

那天(12月14日),我们到处走了走,市内巡查的警备队员告诫我们说:“市内还隐藏着很多残兵,非常危险。”听了他的告诫,我们便回到了部队。

12月15日,我们接到通知:“部队暂时在现地休整。”因此,那天我带着照相机又去了市内。我不记得是和谁一起去的。那天我特意向副官请示了,借用了一个公用袖章,骑着备用的自行车离开了驻地。有了公用袖章我就可以自由行动了。

卫生队总部驻地在南京城外的南部,由于我没有一张与驻地相反方向的北部的照片,于是我就朝着那个方向而去。南京城内的大马路既宽敞无比,又有很多现代化的建筑物,是与上海情调稍有不同的现代化都市。

朝北走了一个小时,我见到了叫“挹江门”的城门。当然有卫兵在站岗,当让他看了公用证后我便出了城门。城门与光华门以及通济门不同,是一重门,有座瞭望塔楼。但是这座漂亮的瞭望塔楼也在空袭或者炮轰中被摧毁了,连形状都看不到了。因为从前天到昨天上午,附近一带有残敌在抵抗,进行过战斗,还残留着战场的痕迹。

出了城门,直走了200米左右,便见到扬子江从左边向右边流动着。这是南京的码头,对岸是叫“浦口”的城镇,它连接着华北。从城门向右走了100米左右便有一座叫“南京下关车站”的火车站。这是把南京和上海连接起来的京沪铁路线上的南京火车站。

车站前的广场上有防空壕,但已被炸毁了。防空壕内有很多军人的尸体,他们死后一直就弃置在那里。

我向江岸附近走去，扬子江和城墙之间挖了好几层散兵壕，一直向下游方向延伸。无论是壕沟内还是壕沟外都躺满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多得连脚都插不进去。

这一带的尸体几乎全都穿着中国正规军的军服，腿上缠着绑腿，其中还有光着身子的，也许他们原本打算横渡扬子江。他们的服装与南部的光华门、武定门、通济门外的尸体完全不同。我想是这样吧，在城内一直战斗到最后的士兵们逃到了这里，但没有办法过江，于是死在了这里。他们的人数据推断超过一万人。

缴获的武器都是机枪、步枪和手榴弹等小型武器，它们被集中到了南京火车站。南京火车站的后面，也就是东面方向有太平门和和平门两座城门，没有遭到太大破坏。

我拍下了挹江门外以及扬子江岸的战场遗迹后回到了市内，去看了一下原是蒋介石总统官邸的建筑物。

令人吃惊的是，官邸的后面向东方向挖了一条又深又宽的交通壕。听警备队员说，这条交通壕通往城墙下，一直延伸到紫金山。12月16日这天，我和总务部主任今枝曹长一起去参观了中山门以及紫金山上的孙文墓地即中山陵。由于要在第二天——17日举行南京入城仪式，各部队接到了清理南京城内外的命令，卫生队也被要求派遣一个中队参加。

所谓打扫，主要是埋葬城墙内外遗弃着的中国战死者的尸体。各部队的清扫队拿着十字镐、铁锹，一大早就在各城门开始往沟里埋尸体。这个工作一天是完成不了的，一直进行到17日入城仪式开始之前。

我们出了中山门，往前走了一段之后便到了中山陵。中山陵利用紫金山建设而成。这个用于纪念孙文的中山陵规模真是巨大，使人有一种被这个宏大建筑物所征服的感觉。像是用芦苇一样的东西所编的帘子覆盖了整个主殿，我想，从上空往下看的话大概只不过像一片原野而已吧。中山陵没有受到一发炮弹的轰击，完全没有遭遇战火。

紫金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天文台，这里也没有受到破坏。看得出这是日军费了心思的。

从这一带看南京城内可以一览无余。玄武湖熠熠生辉，真是一幅

绝景。

不过,据说在占领南京时也发生了遗憾的事情。这就是日本战败后远东军事法庭审判的结果:日军在南京对平民实施了大屠杀。当时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①因此被判处绞刑,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但在我所见到的范围内,我确信并没有这样的事实存在。也许有人会嘲笑我,事到如今你还说什么,但我有我自己的见解。

我从攻克南京的12月13日到举行入城仪式的17日这段时间内,每天在南京城内外到处走动、拍照,没有见到那类事情的踪迹。尽管我没有见到过远东审判的纪录,但我要问何时、何地,用何种方法来实施的大屠杀?既然加上大屠杀这样的名称,就应该有大量与战争无关的善良的南京普通市民被杀害的事实。

我见到的攻克南京的第二天——14日,就已经在各处设置了收容市民的难民区,市民被收容保护起来。在街头的各个路口以及重要的地域都有宪兵站岗,严密监视日军,不使放火、掠夺、暴行等事情发生。没有关系的其他部队全部停留在城外,城内相当安静和稳定。再加上我还目击了各国大使馆的留驻人员开着轿车,车上插着自己国家的国旗。不能否认当战斗进行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将一般市民卷了进来,使他们中的很多人死在了战火中。但这不能成为大屠杀。

话题回到上海之战。日军在攻克了上海之后,我与卫生队总部的战友一起,先去看了陆战队战斗过的闸北一带的战场,返回途中,在外白渡桥附近遇见了一位自称是德国领事馆官员的外国人,他称赞说:“日本军队纪律非常严格,这一点我十分钦佩。”我听了非常高兴,便让德国人和我们一起照了张相。

在南京,光华门、武定门、通济门、中山门、挹江门各城门外见到了总数达到几万人的尸体,他们全部是为国捐躯的阵亡者。

至于所谓的死于大屠杀的尸体,限于我走过的地方,以及我所目击到的,我能断言绝对没有。

有份报纸也写道,南京事件是不是没有发生过?

^① 原文有误,松井石根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不过,最近我从熟人那里借来一本名为《知识分子·禁止言论》的书,读了之后我对那里面所记录的意外的事情深感吃惊。那本书是由白石书房发行的,作者是黑田秀俊。

该书的第二章“攻克南京和大屠杀事件”中,有笔者直接听当时的东京《朝日新闻》特派员今井正刚介绍后写下的东西及其注释。当时,今井记者进入南京中山门时,那里设有一个临时支局,他说的就是在那里住宿时的事情,这在书的前言里提到了。

这里介绍的是我目击的事实。

[寺田与之助:《奔波于炮火下的摄影班》,
综合编辑中心,1983年发行。]

(赵仲明 译)

10. 三十一年宪兵生涯

上砂胜七

编者注：上砂胜七，日军第十军宪兵。

(前略)

为攻打南京，新组建了柳川军团^①。该军团分乘由十多艘船组成的船队，浩浩荡荡前往杭州湾李宅浜，在敌前抢滩登陆。并于昭和12年12月5日拂晓，升起了“百万日军登陆杭州北岸”的宣传气球。然后马不停蹄地连续击溃金山、嘉兴、湖州方面敌人的行进队伍。不断向着南京前进、再前进。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大将(A级战犯，被处以绞刑)。为了进攻南京，让朝香宫指挥的军队从东面向南京进军；柳川中将率领的军队从南面进击。柳川军必须与朝香宫军紧密配合，不能落后。因此，每当得知朝香宫军某天突破某地防线后又前进了、某天进攻了某处阵地等等，作战参谋就焦急起来。

一天，在柳川军召开的幕僚会议上，作战课长藤本铁熊大佐(诺门坎事件^②时是少将)提议，我们柳川军要以夺得进攻南京头功的斗志，用快攻快进的战术进攻。因此，希望制定出相应计划，确保后方联络线和弹药粮草的供给。

① 即日军第十军，因司令官为柳川平助中将，故名。

② 1939年5月12日，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在中国内蒙古的东北和蒙古国交界的诺门坎地区向驻守在该地区的苏联红军发起了进攻。8月29日，苏、蒙军由诺门坎前线发起总攻，击溃、歼灭日军主力第二十三师团，日军第六集团军也损失近六万人。9月15日，日本被迫与苏联在莫斯科签订《诺门坎协定》。这就是“诺门坎事件”。

中国有句俗语,叫“南船北马”。柳川军行动的地区以河渠(小的运河)众多而出名,登陆地点是钱塘江入海口。据说钱塘江是闻名于世的潮汐落差极大的河流。虽然船队平安地停泊在杭州湾,并且部队开始向前进攻,但武器弹药和粮食等卸货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部分运输船为了卸货,竟然要驶回吴淞,给养供应还要从上海运来。为此,前线部队携带的粮食很快就吃完了。由于给养跟不上,必须采取就地“从敌人那里获取粮食”的战术,从而开始了强征强抢行动。如果按照《征集令》进行正当征集的话,由于当地官民已四处逃散,根本无法实施,因此自然就成了强行征缴。随之而来的就是种种破坏行径。目睹这些情况,军的军需部长气愤地说:“有这种乱来的作战计划吗?如果是这样的计划,作为军需部长根本负不起补充给养的责任,让我离职回国吧。”在参谋长田边盛武少将的劝说下,这事才平息了下去。要配合这种作战并及时补充给养是相当困难的。在古代的宇治川战役中,也有过佐佐木高纲和梶原景季争抢头功的闻名传说。此情此景使我痛切地感到,这样的心理乃古今相通啊。

如上所述,随着军队向前挺进,各类事件随之多了起来。尽管煞费苦心设法杜绝这类事件,无奈相对于几个师团的20万大军,只配备不足百人的宪兵,无论如何是管制不了的。尽管也要求过配备辅助宪兵,这在部队驻扎时也许管用,但在大敌当前的进攻推进中,各部队都希望使用尽量多的兵力,根本不会同意我们的要求。我们只能制止实在看不下去的现行犯。然而,因处于马不停蹄地推进、再推进的进军中,无法召开军法会议。只好将一部分人交给其所属部队监管,另一部分由宪兵队带着去南京。

这些情况传到了东京中央部门,当时的参谋总长闲院宫殿下发布了《关于严整军纪的训示》。

随着战区的逐渐扩大和参战兵力的增多,许多战斗人员都是没有经过充分教育的新入伍者或征召来的退伍官兵。意想不到的不良行为日益猖獗,这其中固然有指挥者的责任,但也让人痛心地感到,我国国民的基本教养是多么的低下。

虽然一个劲儿地叫着“皇军皇军”,但皇军知道这些事也会感到愕

然。所以每占领一地，宪兵就会避免使用露骨的、会被敌人利用或戏弄的词句，在那些城市和村庄的入口处及主要场所，醒目地写上“预防火灾、杜绝盗窃、爱护居民”三句告示，委婉地提醒日本士兵。曾经有位部队长质问宪兵：“这次配备的宪兵是日本军队的宪兵还是支那军队的宪兵？管得太过分了！”宪兵回答说：“如果行为不愧为皇军，我们就是日本宪兵。反之，就会把我们看作是支那宪兵了吧。”

如果是名副其实的皇军，丝毫不干有愧于皇军的事的话，即使不花千万金钱安抚民心，不费口舌使用百万语言进行演讲，大概更能让当地居民信任我军，服从皇威吧。

南京入城仪式一结束，柳川军团就奉命前去占领上海西南方的杭州。12月15日从南京出发，28日，兵不血刃地进入杭州。

在杭州首次召开了军法会议，建立了拘留所。

[上砂胜七：《三十一年来的宪兵生涯》，

东京ライフ社，1955年发行。]

(罗文文 译)

11. 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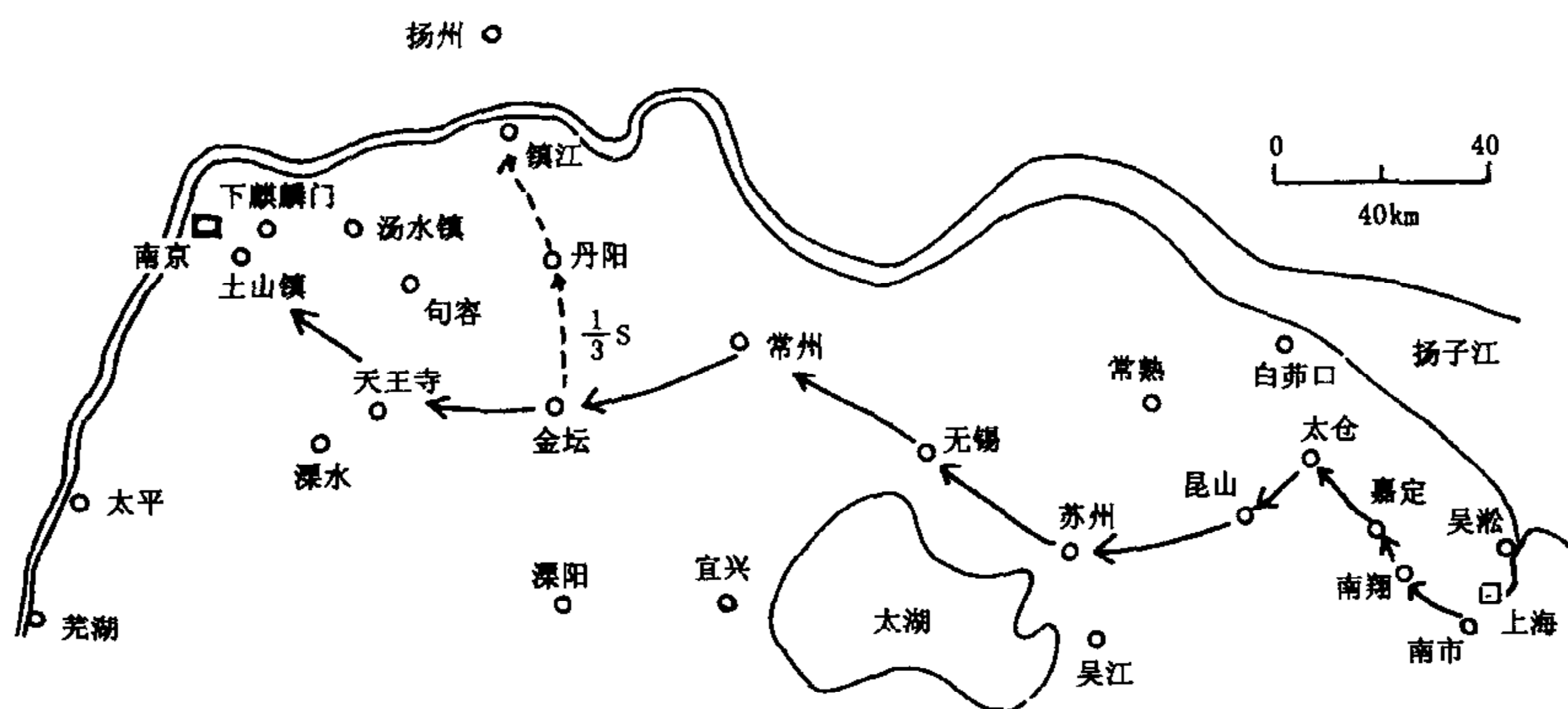
(前略)

一、进 攻 南 京

经过苏州河战斗之后,在上海西部地区对上海实施封锁的第三师团接到了追击命令,说要经南翔向太仓方向追击。11月14日,第三师团在到达太仓后,划归华中方面军直接指挥,并在该地进行一段时间的休整以恢复战斗力。

卫生队在太仓城外的新手镇集结,准备武器、器材、被服等,为接下来的机动作战做好准备。

11月18日,重新纳入上海派遣部队指挥的第三师团,接到命令于12月2日在苏州集结。此时,第十、第三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九师团、第一一四师团、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已经以破竹之势接连向南京以及芜湖发起了迅猛的进攻。第三师团虽然是在第二线,但还是获得了参加进攻南京的机会。



卫生队进攻南京时的前进要图

12月1日,卫生队从太仓出发,12月2日到达了苏州,接着向南京进发。12月10日,担架第三中队、卫生队第一部、车辆中队第二小队大小行李第一班(卫生队的三分之一)在金坛被编入天谷支队向镇江进发,卫生队主力由天王寺方面直接向南京进发。

12日,进入距南京东南面六公里的土山镇,三分之一被编入急进部队。在急进部队步兵第六十八联队一次接一次的猛攻之下,第二大队占领了武定门,接着第三大队占领了通济门,到了12月13日,首都南京终于被攻陷了。



南京入城仪式

(一) 松田大尉阵中日记拔萃

第二担架中队 松田武雄

昭和12年11月12日 晴转雨 顾家卓—南翔

上午10时,第三师团根据作战命令从顾家卓(东漕河泾附近)出发,按照第三中队、本部、绷带所、第二中队、车辆中队的行军序列向南翔进发。下午2时30分左右开始下起雨来,接着风也越刮越大。道路泥泞,再加上桥梁也遭到破坏,随处可见停着的炮车、战车、卡车、装甲车等,各个中队也完全没有了队形。我们在黑暗中经受着风吹雨打,终于在晚上9时30分到达南翔。

11月13日 多云转晴 南翔—嘉定

其他各部队的人马一个接着一个上路,我们好不容易才插到行军的队伍中,11时终于出发了。尔后,第三师团根据作战命令,按照第二中队、本部、第三中队、绷带所、车辆中队的顺序前进。下午5时到达嘉定,宿营在城墙外西端的桥梁附近。

11月14日 晴 嘉定—太仓

上午8时30分出发,今天公路上也是挤满了车辆。今天的行军,因为天气很爽朗,所以心情也好。下午5时到达太仓城外的南码头。道路极其狭窄,挤满了步兵部队,晚上7时,终于进入了宿舍。

11月15日 多云转雨 太仓—南码头

11月16日 多云转雨 南码头—新手镇

11月19日 雨 新手镇(17日、18日略)

今天也是一天持续不断地下雨(15日以来一直在下雨),上午9时召开了临时队长汇报会。随后,第三师团根据机动作战命令出发去寻觅、捕捉和歼灭敌人,第三师团原计划是到达扬子江的北岸,但现在的任务是进攻南京,在现在的地点进行冬营。各部队必须在21日那天完成出发的准备工作,考虑到机动作战,所以必须减轻行李,不能带走的行李集中在指定地点,委托第三师团保管。

11月22日 晴 新手镇(20日、21日略)

今天从补充队补充进四人,编入中队。

11月23日 多云转小雪 新手镇 新尝祭

上午11时30分,第三师团的将校在太仓城内的基督教堂集合,师团长在教堂前面的广场上训话,内容大致为:“皇军的威德,其中的威已经充分地发扬了出来,希望今后要指导部下发扬德。”之后,举行了庆祝

新尝祭的喜庆宴会,以纪念登陆满三个月。

11月26日 晴 新手镇(24日、25日略)

卫生队按照命令,指挥第二中队、绷带所、车辆中队向蓬阁镇、钱门塘镇、葛龙镇、新手镇(约十六公里)进发。这一行军,目的是为了探明路况以及收集情报,所以上午9时40分出发,下午6时30分左右就返回了。出发前还接受了师团军医部长的视察。

11月27日 多云 新手镇

上午10时由片桐队长检查武器。之后,中队检查武器,11时结束。下午1时检查马匹(五岛兽医准尉)。

上午10时30分,从上海市出发的担架第一中队(塚本部队)以及第三部绷带所到达此地。

11月28日 晴 新手镇

上午7时,铃木少尉前来听师团的瓦斯教育课,下午2时回去。上午8时,棚桥少尉从师团经理部领取了被服保修材料回去。下午,塚本大尉来玩,与他进行了交谈。下午6时,举行了卫生队慰安余兴会^①,参加者是各中队选拔出来的,一直到9时结束。

11月29日 晴 新手镇

昨天下午,一等兵村田忠雄和大野福次外出征缴,看见残兵带着迫击炮逃跑,他开枪打死了残兵,缴获了该炮。今天近藤副官向师团报告了此事。师团里大家为此事兴奋不已。

根据第二十九师团^②的请求,派会唱浪花节小曲的平间去该师团。

11月30日 晴 新手镇

上午11时,卫生队按照命令进行了一个小时行礼训练的个别辅导。

① 原文如此,意思不明。

② 原文如此,应为步兵第二十九旅团。

下午5时,第三师团收到内部命令,明天出发进军苏州。夜里,整理好了出发的行装。

(11月1日至24日无阵中日记)

12月1日 出发开赴苏州。

(二) 水谷会计阵中日记

会计 水谷剑治

昭和12年11月12日 多云转雨 南翔

第三师团步兵第二十九旅团在达到了占领南市的目的之后,决定今天急速回旋,经过南翔向太仓进发。

早晨,前往上海张家宅仓库领粮草,途中下起了雨。卫生队的主力于上午11时从顾家卓出发,朝着南翔方向进发。我们在杨木桥暨南大学附近赶上了大队,一起向南翔方向前进,但是由于公路上挤满了步兵、炮兵、卡车、马匹,根本无法前进。再加上正在下雨,道路又泥泞又滑,非常难走。

从杨木桥到南翔大约有三里^①路。到达南翔时天已经一片漆黑了。我们宿营在城中看上去有点像寺院的名叫“西安王龙宫”的地方。到点燃的柴火快要熄灭的时候,变得非常寒冷,无法入眠,夜里我被冻醒了好多次。

据说南翔昨天刚被攻陷。

11月13日 晴 嘉定西部

我们向着嘉定进发。从南翔到嘉定三里路,公路很不错。途中,很多中国难民扛着行李四处逃窜。也有坐小船从运河中逃跑的。船的桅杆上挂着日章旗。

南翔到嘉定之间以运河为最前沿,建筑了相当坚固的阵地。战壕上

^① 日本旧式长度单位。1里=3.924公里。

植着树，树干非常挺拔。那些战壕不是为了应急才挖的，肯定是很早就开始有计划地挖就的。

我们向嘉定城的西部进发，在嘉定西郊一座非常漂亮的西式公馆里过了一夜。

11月14日 晴 太仓城

今天向太仓进发。昨天我的袜子破了，脚被鞋子摩擦得生疼生疼的。从嘉定到太仓大约四里路。据说太仓和昆山都是今天才攻陷的。第十一师团、第六师团等的第一线部队正在向苏州方向追击逃跑的敌兵。太仓城非常大，但街道非常窄，有点脏。民居几乎没有被破坏。

第三师团、第一〇一师团作为大部队的预备队在此临时结集。

到了夜幕降临之时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宿营地，结果宿营在西门附近的民居里。

11月15日 晴 太仓城外南部

由于卫生队稍微有点跑过头了，今天计划由太仓城稍稍后退一些，但是由于工兵队刚刚修好南面的运河桥，南行的部队不能通过，于是在城外的民居中过了一夜。

连续处于追击的状态，所以军需物资的运输非常困难。道路上挤满了兵、马、车辆，交通堵塞，使得粮草都无法补给。卫生队也吃光了携带的口粮，今夜开始没有米吃了。到了傍晚，终于等到了两天内在南翔和外冈镇（嘉定西北部）收下的庞大行李。

虽说粮草缺乏，但士兵们还是有办法搞到吃的。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中国米，还搞来了一些蔬菜、鸡、猪肉等。

11月16日 多云、有时有雨

卫生队从太仓向后退到新手镇。我因为队长之事要去上海。酒井药剂中尉、松井君、第二担架队的三浦伍长、岩田一等兵与我同行。师团还要再借兵站车辆总队的车，车辆抵达时是下午3时30分左右。从太仓出发已经很晚了，再加上在张家宅的野战仓库附近汽油用完了，给车

加了油,到上海的大每支局已是夜里 10 时许了。

从闸北穿过上海的街区到达大每支局,我们一路上看到两侧的店铺都被破坏了,用铁丝网拦着。在路口都有陆战队的哨卡。

11 月 17 日 多云转雨

上海的物价贵得惊人。

谢家宅(顾家卓)的原址里放着卫生队的行李,大概有能装六卡车的数量。在雨中返回太仓已经是夜里 9 时左右了。不知大队转移到了什么地方,所以在太仓西门开设的绷带第一所第一部里住了一晚。

11 月 22 日 晴 新手镇

服部伍长、西胁君去了南市,那里有配备给步兵第六联队的卫生队。

小林少尉、伊藤君去上海征用卡车。

小泽君去谢家宅(顾家卓)取行李。

今夜只剩下我和今枝曹长、松井君三人。

11 月 23 日 多云 新手镇 新尝祭

上午 11 时,在太仓城基督教堂的广场上,师团长对师团全体将校进行了训话,结束后举行了简单的庆贺。

下午 2 时在总务部举行了师团各部队的总务主任会议。

11 月 24 日 晴 新手镇

去太仓领粮草。从西码头到南码头的仓库用船运了一部分粮草。

因为可以将行李包裹等送还日本,所以将行李包裹等打好了包。

11 月 27 日 晴 新手镇(25 日、26 日略)

被派遣到南市的担架第一中队终于与大队会合了,服部君等人也一起回来了。

11 月 28 日 晴 新手镇

晚上,举行了由担架第二中队主办的即兴慰问表演会。

11月29日 晴 新手镇

早晨,去太仓领取了粮草。晚上,举行了将校的会餐。

小林君去上海取回了56个邮包。

11月30日 晴 新手镇

打开邮包,里面有很多信件。整个上午都在整理邮件和报纸,下午去太仓的仓库取了生面包。师团司令部明天要向苏州移动,野战仓库也做好了准备。晚上,在车辆中队的平松少尉处,他请我吃了日本牛肉饭。

夜里11时30分,接到向苏州进发的命令,几乎一夜都在为行军做准备。

昭和12年12月1日 晴 昆山西部

清早,在天亮之前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据说在大宗粮草中,携带的罐头食品不够了,所以稍微早走了一步,在太仓野战仓库进行了补充。

快到昆山市区的时候,可以看到丘陵上的塔。市区有非常漂亮而宽敞的马路。除了上海之外,这是我所见到的比任何城市都要宽阔的马路。

我们在昆山西面两公里左右的京沪铁路^①桥旁的村落里宿营。

12月2日 晴 苏州东部

早晨9时出发,途中有一个看上去很坚固的碉堡。左边的湖泊非常漂亮。进入苏州,在东郊的村落里宿营。

12月3日 晴 苏州西部 木渎镇

为了在苏州西部的野战仓库补充粮草,我们比大队早一步出发。虽然没有进入苏州城内,但可以想像那是一座非常大的城市。城外也有一排排很漂亮的商店和旅馆。苏州到木渎镇的道路非常宽敞,往前走着走着就见到了山。登陆以来我第一次见到了中支那的山脉。

^① 指南京至上海的铁路。因为当时南京是首都,故称京沪铁路。

中途开始骑马前进。木渎镇也是个很大的城镇。我们睡在一家的西式洋房里。

12月4日 晴转多云 木渎镇

粮草的补给渐渐变得困难起来了。早晨,小林君去苏州补充大宗的粮草,与此同时我和服部君一起去木渎镇内的粮草供应站领取一天的粮草。只有中国米、马粮、中国酱油,全部是征缴来的。有相当多的中国米。这一带蔬菜不少,只要有调味品,总可以对付着做些菜吃,但是行军中的补给不知究竟该怎么办才好。香烟也越来越少了。

12月5日 晴 通安桥镇

早晨8时,以绷带所第三部山冈大尉为指挥官,将人马分别配备到担架第一中队、车辆中队(今川君)、大行李(长屋君)各小队、第一分队中后,就从木渎镇出发了。本部作为师团的第三梯队前进,担架第三中队和绷带所第一部也加入进来。第一梯队有担架第一中队、绷带所第二部,服部君就在其中。我们是第二梯队。

木渎镇附近的灵岩山上有座净土宗的寺院很漂亮,据说有个在日本留过学的和尚住在里面。早晨十分寒冷,行军一停下来便立刻要生火。行程相对来说比较短。

现在所有的大宗粮草一共有16袋,其中中国米5袋、日本精米2袋、酱1樽、腌辣茄子1樽,分配给了300名人员。

12月6日 晴 高巷上

早晨,本部8时出发。我们稍微早了一点出发,在望亭领取了马粮、酱三樽、什锦酱菜和腌梅干各一樽。

太阳渐渐落了下去,影子很长。傍晚5时左右到达宿营地。天色立刻变暗了。与大行李队的人员一起在一个私立小学的二楼就寝。

12月7日 晴 雪堰桥镇

早晨,定于8时30分出发,但必须在无锡领取粮草,所以8时以前就

离开了住宿地。附近一带一片霜白。

无锡的粮草供应站位于大队经过的大路拐进去的小道上,很远。无锡山上的塔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绕过这座山,在吴桥附近有师团的粮草供应站。在这里领了中国米、马粮、罐头、腌萝卜、酱和酱油。

从无锡出发,经过梅园,穿越山道,通往雪堰桥镇的公路修得非常好。梅园里有着可以看到太湖的饭店。这里驻扎着海军的横川部队。过了梅园,出现了好几条翻越山麓的山道,美丽的太湖在我们的左侧流淌。

12月8日 晴 谢家村

今天也是在温暖的阳光下行军。早晨8时从宿营地出发,向西,到达漕桥,在此地补充了马粮。

在漕桥用午餐,从这里开始向北转了个弯前进。下午6时左右,在距常州约两里半的谢家村宿营。今天的行程约七里。

到达时天色已微暗,分配粮草时遇到了难题。由于预定在常州补充大量的粮草,所以今天将两天的粮草都分配完了。

12月9日 晴 琵琶墩镇(常州西)

早晨7时30分出发。因为要领取粮草,所以向常州进发。常州的粮草供应站设在路旁,由于罐头、米、酱不足,陷入了互相争夺的状态。我们还得到了香烟(一人十支)、大饼等额外的食品。

(三) 太仓集结

行李队 山本芳夫

攻克苏州河之后,部队转入了追击战,对上海南市的封锁也结束了。11月14日到达太仓,第三师团要在太仓休整,以恢复战斗力,这样我们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休息。我想这是对两个月来我们连续激战所立战功的奖赏吧。在这段休养期间,第一次与中国人面对面地会话,记住了两三句并不明白意思的中国话,真的很开心。再加上酒保和商人也来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再高兴不过的事了。

在太仓一直呆到12月1日的早晨,为了参加进攻南京的战斗,部队要稍稍向前推进,我们做好了出发的准备。可是,正要出发时却死了一匹马。眼前只有一辆车,无论将行李怎么分配都难以装上去。将班长的马也用来当驮马用,因此不能用于拉车。我们想着无论如何都要偷一匹马来。总之我们已经做好了行军的准备,正在待命。正好此时野战医院也正在加紧做着出发的准备工作,幸运的是他们还有不少马匹尚未派上用场,我们从中牵了一匹过来,给它装上班长用的马鞍,请野战医院的人员先将马带到今晚的宿营地,这样就算完成了行军的准备。

现在说来都是后话了。我在第二次应招去满洲时,与同一个班的伊藤君谈论过支那事变当时的情况,最棘手的是在太仓我们被偷了一匹马。那正是要出发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事,马不够用,急得无计可施。最终只好放弃乘车,重新将行李分装,总算没有耽误出发。当时大家都叫苦不迭,我说,就算我自作主张将马借给别人了吧,还请多多原谅。说到当时的情景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还因此成了朋友,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中。

(四) 南京攻击战

行李队长 吉次重之

上海外围两个多月的激战终于以进入上海南市而告结束。进入南市后,没有丝毫的休整时间,立刻转入南京攻击战,全军以怒涛般的气势向南京进发。大雨倾盆的道路上挤满了士兵、车辆、马,不分昼夜地行军。卫生队本部在太仓集结,短暂的宿营。

12月1日,卫生队开始行动,从太仓出发,经过水乡苏州,一边眺望太湖,一边向南京进军。途中,在金坛,卫生队的三分之一人员被配备到进攻扬州的天谷支队,大小行李队的三分之一人员被分派走了。卫生队本部继续向南京前进,经过几天连续的行军,12月12日在土山镇集结。与集结同时,三分之一的人员接到紧急命令,小行李队的一个班改装成运输马队,配备给急进部队。进攻南京将要进入高潮。可以听到频繁响起的炮声,友军的飞机在天空中盘旋。

终于在12月13日攻克了南京,卫生队本部在南京城外的敌人军营中宿营。

12月17日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参加战斗的所有部队都有代表参加了这场世纪性的入城仪式,我也代表大小行李队参加了仪式。光华门^①外,松井司令官、藤田师团^②,以及部队首脑中的大多数将星骑着马,在队列整齐的士兵队前通过,威武庄严地进入南京城。看着这一切,我感慨万千。那正是皇军威仪震撼着中支那天地的感觉。这一感慨一生都印刻在我脑海里,无法忘记。

(五) 乘车开赴南京

卫生部 宫田久治

在进攻南京的前进途中,为了修理在上海南市征缴的汽车,以及监管行李,我与松田伍长、田边上等兵会合,和练兵休息的人员一起在无锡附近离开了部队,与汽车一起行动。

在常州附近由于汽车出了故障而进行了修理,所以我作为大队的联络兵和一位担架兵一起向南京方向追赶部队。

(六) 战线随想

卫生部 伊藤光信

战争速写。

连日的硝烟弥漫在空中。那是苏州河的战斗。

兄弟部队的飞机作了蜻蜓点水式的轰炸。一个血战接着一个血战,终于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

我们卫生队在本部的最先头,接着是担架中队、绷带所的人员。我们在太仓结集后出发,以南京为目标前进。

我们在风尘、沙尘、被遗弃尸体的扑面恶臭中前进。竹林被枪弹打得一塌糊涂,枝干全部折断,足以想像战斗的激烈程度。

① 原文有误,应为中山门。

② 即第三师团,因师团长为藤田进中将,故名。

(七) “担架小队长”

担架第三中队 光松秀一

(1) 小队长走马上任

我们的船在吴淞口停泊下来,然后我们坐上小船被运到吴淞的栈桥上。那是昭和12年11月28日清晨,我们的脚步第一次踏上大陆。

我眼前的任务就是将50名卫生下士官送往第三师团司令部,我本人接受第三师团卫生队长的指挥。在吴淞口,司令部告诉我:“大部队应该还在太仓,也许已经出发向南京进发了。”所以我们从才发生过激战的吴淞向太仓前进,一共走了70公里的路程。

第三天的夜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太仓。

在向城门外的卫兵打听了第三师团司令部的位置之后,总算是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漆黑的居民院子里,我在铁皮油灯下向师团参谋报告:“我带领新生下士官50名前来报到。”此时,我心里对自己终于完成了第一项任务而感到万分喜悦,直到今天为止所受的艰辛一下子全都烟消云散了。

之后,我向卫生队长片桐中佐报到,向医长、中队长、第二小队长、准尉、曹长,以及其他几名分队长分别作了汇报。然后我在曹长的引导下去了一间放着木制小床的房间休息,这时已经过了12时了。我一边为自己顺利到达而喜悦,一边想像着从明天开始的生活,怎么都难以入眠。不过,不久就被周围的闹声吵得下了床。那是凌晨4时,参加进攻南京的命令下达了,士兵们做起了各种准备工作。到差不多准备完毕时已经是早晨6时了。在微暗的天色中,我向第一小队做了上任后的第一次讲话。从现在开始,我成了名副其实的担架小队的小队长。

(2) 休息日

苏州被称为水都,是一座四面环水的美丽城市。为了不使通过的部队破坏城市,宪兵和卫兵严密地守卫着城门。

当通过苏州西郊的寒山寺时,因为我知道可以买到有名的张继的诗碑拓本,因此就跑去买了三张,我想等到通邮之后就寄回日本,送给那些

曾经帮助过我的人。顺便提一下,这一诗碑由清代的俞樾所书,诗是这样写的:“月落乌啼霜满天……”

这天,卫生队在苏州西北面的灵岩山西麓的小街上宿营。中队干部住的是学校校长的家。那家人都逃走了,屋子空着。原本以为只住一天,但接到通知说第二天也在原地休息。于是值班的战士就在门的内侧挖了坑当厕所用。挖开后发现地下埋了一只直径30厘米的瓶子。瓶子里塞满了银元,底下还有一些小口袋,里面装着金质的和宝石的耳环饰品。尽管是偶然的发现,但在人家里挖出宝物后拿一些带走的话,我想以后这家人不知会有多么悲伤呢。中国人的家里没有厕所,使用的是马桶,由于这一不同的习惯才引出这种事情。

第二天是休息日,我在街上四处转悠了一下。我看到一家酿造酱油的店老板正在拨着算盘,我的职业意识立刻萌动起来,想要了解一下中国的珠算法以及算盘的利用率。那老板也比较闲,于是我耐心地向他交谈了很长时间。虽然我们的国家之间进行着战争,但中国酱油店的老板和日本的珠算教师之间却用不着互相憎恨。我们交谈得就像是相识几十年的知己。对我这个珠算教师来说,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可以说这个休息日利用得极其有效。

(3) 常州住院

在吴淞登陆以来,除了一天的休息之外,整整行军了七天。两脚跟肿得都无法穿鞋了,于是我穿上了捡来的草鞋。草鞋虽然轻巧,但不久鞋底就磨穿了,穿不了很长时间。最后脚痛得连走路都很困难。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不能掉队,但与队伍尾巴的距离越拉越远。在我后面追赶上来的同一个部队的军医不忍心看我这样,便劝我住院。据说在前面不远处的常州设有野战医院。我说没有中队长的同意是不能住院的。他说:“我替你和中队长联系,你安心住院。”被他这么一说,我终于决定住院了。

(4) 一氧化碳中毒

在常州医院住院时,据说穿着将校衣服容易遭受袭击,于是我借来

了士兵服,只有戴的领章是少尉的,所以我被带到了战士病房。等了一会儿,他们给我肿起的两脚涂上了黑黑的气味难闻的热敷药。

病房里的床是水泥做的,上面铺了棉花。我想,棉花很容易引火,并且瞬间就会使火势扩散,应该非常危险。这一担心立刻就变成了现实。大概是抽烟引起了火灾。这里有很多相同的屋子并排着,我对面有四五间屋子发生了火情。虽然每个屋子都是用水泥墙隔开的,但光是热量的传导都足以使火势扩散。

我感到立刻就会烧到我们这一边,我用铺着的毛毯包好自己的东西,在将东西扔出窗外的同时,我也紧接着跳了出去。一只脚上的支撑板从绷带内滑出掉到了地上,但我没有时间去捡。随着“啪”的一声响,屋子的一边成了火海。在屋子里睡觉而安全逃出来的除了我还有其他几名战士。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是在屋子变成火海之后才跳出来的。

通过这次事故,他们知道了我是一个将校,于是将我移到了二楼的病房。与我同室的有年长的野战炮队大队长和同是炮兵士官学校出身的青年将校。他们两人患的都是呼吸系统的毛病。吃过晚饭后,感觉屋子里变得寒冷起来了,于是点上炭火取暖。非常怕冷的我一直在炭火边守到最后。

当我的意识一下子变得迷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中毒了。我趴在地上伸手去抓门把手,在门被打开30厘米左右时我晕了过去。听说是值夜班的卫生兵发现了倒在地上的我。也许可以说是半开的门给了我幸运吧。据说我是在打了第二针之后醒过来的。我昏死了差不多两小时。意识的恢复是从耳朵开始的,尽管我可以听见说话声了,但是手脚无法动弹。当别人看到我的脸上泛起了红晕而兴奋不已时,我本人也在朦胧中感到高兴。

(5) 逃出医院

发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之后,终于迎来了10日的清晨。同屋的S少尉是个士官学校毕业的将校,他听说了即将攻陷南京的消息后就再也待不住了。如果攻克南京、支那事变结束,那么作为职业军人的地位就一定会变得无足轻重了。他来找我商量是不是从医院逃走。我的

脚也基本上不痛了,想到也应该尽早地回到中队,于是便同意了。

经过 S 少尉的活动,我们打听到外面停着的同盟通信社的卡车中午出发开往南京。

过了 11 时,瞅准卫生兵正在准备做午餐的当儿,我们两人翻过砖墙逃了出来。我们偷偷地钻进同盟通信社的卡车,躲在货物之间,上面用帆布紧紧地盖上。记者和司机上了驾驶室,卡车在预定的 12 时准时出发了。直到现在为止是很顺利地逃了出来。俗话说好事多磨。刚跑了一个小时卡车就停了下来。往外一张望,周围是清一色的田野。我们听见他们在说:“好像是将水当汽油灌了进去,向过往的车辆要点汽油吧。”

等在那里的时候就是不见车辆过来。两人想要小便了,商量之后便决定出来向他们表明身份。因为他们也正在犯愁,一见到我们,记者们也非常高兴。于是一边啃着从货物箱里拿出来的苹果一边等待。过了不久,金色徽章闪闪发光的黑色警车从后面开了过来。客座上并没有人坐着,我们便请他带上我们两个,他很爽快地同意了。这之后则成了非常愉快的坐轿车的前进。

过金坛的时候,看到了我们中队的士兵正在那里休息。在这里下车归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一瞬间我似乎着了魔,我想到部队应该在句容宿营,于是就决定先去句容,在那里等候。就是这种不该有的想法使得我开始了下面的流浪生活。

(6) 流浪记

到了句容市街的入口处我下了轿车,在那里等待中队的到来(根本没有来的可能性)。天色暗了下来,肚子开始饿了。我向野战仓库的卫兵要了点硬邦邦的面包填饱了肚子。我存着侥幸的心理,在街角一直等到 10 时,最终部队还是没有出现,我只好放弃等待,潜入附近的商店里睡觉。

第二天是 11 日,我考虑再向前线靠拢一点,便搭上了开往前线的卡车。在到达上麒麟门之后,卡车被禁止前行了,说是前面还在战斗。我在这一带的部队中打听第三师团的下落,全然不见他们的影子。

将近傍晚,我见到了有很多将校的部队,于是请他们让我留宿一晚。

他们非常爽快地答应了,并让我加入了他们谈家常的圈子中。这个部队带着氢气球,承担的任务是观测炮击、轰炸时炮弹的落点及气象情况。当说到被困在南京城内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够乘着帆船逃向扬子江对岸,是因为有美国炮舰“帕奈”号掩护的时候,我们一个个都恨得咬牙切齿。

晚上,我客气地请他们让我睡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夜里2时左右,两个浑身是血的骑兵跑了进来,说道:“敌人来夜袭了,部队一片混乱。请告诉我们步兵部队在哪里?”又过了两个小时,又来了两个和先前差不多的联络兵,他们说第三师团受到袭击的地方和我们睡觉的地方在一条直线上。我不想迷了路的自己就这样被卷入到战斗中去,天一亮便早早地道了谢后离开了。

我得知华中派遣军司令部^①就在靠句容北边的汤山镇,因此我坐上了卡车去了司令部。司令部使用的是温泉旅馆(?)。卫兵说请上二楼,我便漫无目的地上了二楼,进了一间正在开会的房间。我对坐在离入口最近位子上的参谋说:“我是从医院出来的,请告诉我第三师团的所在地。”见到我们在说话,正面位子上的司令官把我叫到他的身旁,这时我才发现这个司令官正是朝香宫鸠彦王殿下。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身边。“哪里受了伤?”他问。“脚受伤了。”我脱口而出。我变成了在战场上负伤的伤病员了。战场上负伤的伤病员和一般的伤病员待遇完全是不一样的。他赐了我很多标有菊花图案的米粉团,并说今天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下。事情变得如此重大起来。负责的将校将我带到了一间豪华的房间,我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高规格礼遇。

麒麟门附近的敌袭,是从紫金山半山腰的山道中跑出来的残兵败将所为,他们出其不意地偷袭了露营在紫金山东麓的第三师团骑兵团。我在司令部的屋顶上用望远镜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司令部直属的战车队剿灭那些残兵败将的情景。在这里,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双眼见到了真实的战斗场面。那一刻的强烈印象至今都无法从脑海中抹去。

① 原文如此,应为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7) 攻陷南京

我在司令部迎来了攻陷南京的12月13日这一天的早晨。

虽然我知道第三师团司令部在土山镇,但地图上画着好几个土山镇,不知道我应该去哪个才好。参谋告诉我差不多应该是在东南方郊外的土山镇,于是我决定按照他所说的地方去寻找。据说穿过南京城内去那里是最好找的。

我拜托了开往南京城内的卡车,让我坐上了助手座。到了中山门,宪兵说所属部队不明确,哪怕是将校也不能进城,把我挡了下来。于是我便拜托其他卡车,躲在后面的帆布下,顺利地潜入了城内。我在中山东路的中段下了卡车,准备往通济门的方向走去。街角处站着个卫兵,正在清查日本兵的违法行为。于是我穿过商店,从后面的街道像鱼穿过网眼一般悄悄潜行,到达了通济门。

出了通济门,门外的异常景象不禁让我魂魄顿失。护城河里和岸边全是男女老少的尸体,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有铁船排列在那里,虽然可以过河,但我所看到的是城墙下成了尸体的海洋。不踏着尸体是没法往前走的。“鬼门关”正是这个场面的写照。他们从上海到南京,被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夹击着逃到了南京城外,但又进不了城,眼前就是被卷入战火的平民百姓的悲惨结局。

就这样我到达了目的地土山镇。虽然我见到了卫生队长,但他告诉我第三中队不在这里,我一下子泄了气,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失望过。他告诉我,中队在金坛从公路上向右折了过去,开往镇江,参加了天谷支队对扬州的进攻,现在应该是驻扎在距扬子江北岸十公里的扬州。现在要立刻去扬州追赶中队简直是不可能的,他叫我暂时留在卫生队本部为副官做个帮手。于是,我开始了食客般的生活。

(8) 南京入城仪式

攻克南京是在昭和12年12月13日。南京的入城仪式在12月17日举行。前一天即16日傍晚,驻在南京城外的卫生队本部接到了这样的命令:“17日9时前,将中山门到南京中央转盘的中山东路两侧掘开的交通壕沟全部填平,以使10时开始的入城仪式顺利进行。”

我接到了片桐卫生队长的命令负责指挥这项工作,而且军营里的任何器具器材都可以使用,并说给我配备 100 人。突然接到这样的命令,我有点不知所措。幸运的是,在潜入城内时我见过交通壕沟,基本上可以想像这个工作该怎么做,只是时间太短,感到心中没底。无论怎样,还是在当天夜里集中好了够 100 个人使用的圆锹、十字镐、锯子、竹畚等东西。

我命令大家 17 日早上 6 时 30 分集合。我将每十人编成一个班,共十个班,7 时出发。不能慢吞吞地走,我们是边喊着“嗨,嗨……”边跑步前进的。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中山东路的中段。

交通壕沟在道路的两侧延伸着,其宽度可以并排站立两个人,深度有一个人高。各班定好自己负责的区域后,立刻投入了工作。要用全部泥土将壕沟填平在时间上是不可能的。我们采用的方式是,首先将门板、桌子等填到壕沟中,泥土只在最后覆盖上去。9 时,各班都按照预定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挥舞着军旗前往中山门外集合的部队在我们这些作业队面前通过。手里拿圆锹要对着军旗行礼,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再加上不断有军旗从面前经过,如果一直敬礼的话我们就没法走动了。于是我们决定上到民居的二楼,从窗户中观看入城仪式。

终于等到了部队入城。原本期待着这是一个大山元帅奉天入城仪式的再现,但戴着围巾、身材矮小的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入城仪式稍微有些逊色。尽管如此,北支那、中支那部队的军旗全都集中在这里了,我想差不多有 100 面之多。外加军舰旗,还有重炮部队、战车队。飞行部队是从空中入城的。场面之壮观绝对是百年不遇的。只是士兵和军马太靠马路两端,我们一边担心刚填好的道路不要陷下去,一边透过窗户观看。(松井大将的围巾是皇太后陛下赐予的。对于失礼的描述我表示歉意。)

(9) 全军慰灵祭

入城仪式后的第二天——18 日,在南京城内的飞机场举行了全军的慰灵仪式。与昨天的天气完全不同,空中飘起了雪花,一下子变得极其

寒冷。我作为近藤副官的代理,与片桐队长一起参加了仪式。

纵队最前面的是各部的队长,我站在他们的后面。各部的队长一个接一个地进香。这期间,我拔出刀架在肩膀上。由于寒冷,握着军刀的手指渐渐失去了感觉,我不由自主地怀疑自己是不是受了伤而变得不安起来。接着,脚趾间的寒冷也渐渐地通过膝盖传到了腰部。

也不知是从谁开始的,不知不觉中大家开始跺起脚来,只有祭坛上和各队列的前列还保持着严肃的气氛。各队列的尾部更是有人点着枯草开始取暖,骚动慢慢地蔓延开来。

就这样,在这种与祭奠战友很不相称的气氛中,伴随着寒冷对身体的侵袭,仪式在经过了几个小时之后结束了。

[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编辑委员会:《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非卖品),第三师团卫生队回忆录刊行会(爱知县),
发行时间不详,序文注明为 1987 年。]

(赵仲明 译)

12. 我的战争

金丸贞行

编者注：金丸贞行，隶属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前略)

三、进军首都

(一)

行军开始了。那是11月18日的事情，目的地尚不清楚，不过我们是背向苏州朝着东方前进的。小雨从前天开始就一直下着，看来不像要停的样子。这个地方好像降雨很多。江南平原的中心地带，稻田辽阔无垠。这里以盛产稻米闻名。据说提起昆山米，在中国也是很有名气的。大小无数的河流纵横交错在平原之中，起着与道路同样重要的交通作用，维系了各个乡村、城镇。

来到战场只有四个月，从杭州湾登陆以来只过了两个星期，可感觉像是已经在战场上呆了一年以上了。每逢难得的大休整或者露营时，我们就在河里擦洗一下被汗水和泥水弄脏了的脸，然后用饭盒煮饭。经常可以看见河面上漂浮着马粪和水牛的粪便，而且还有士兵蹲在水边草丛里大便。这些污秽之物都排在河里，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有时候甚至连人畜的尸体都浮在河面上，已经浸泡得鼓鼓的。士兵……不如说是人吧，是一种能很快适应环境的动物。特别是在战场上，不适应的话就不能生存。所以也就顾不得什么肮脏和干净了。

随着远离前线，枪声一点也听不到了，不过攻防战之激烈还是可以从被破坏殆尽的城镇和村庄的状况中看到痕迹。各处留下的还没来得及收割的稻子都像刚刚受到了暴风雨袭击一样倒在田里。这些稻子已

经成熟了,如果不早日收割的话,就会长出芽来,不能吃了。何况百姓们肯定正在什么地方心急火燎地牵挂着呢。

我们必须再次经过一周前行军时曾经遇到过的遍布尸体的道路。在战场上,无论敌我都必须做好经历这种场面的思想准备。我的目光所到之处都接触到这样的悲惨情景,不禁深深感到人类之无助和命运之莫测。人世间真是有神灵和佛祖吗?即使有,也只能从高处默默地注视着世间一切的夙愿和命运吧。

跟着队伍一边行军,一边想着这些,现实中的战争和神佛的关联及影响等念头在心中乱作一团。

想当时,天将黎明,城墙近在眼前,我为了向尖兵传达联络事项,追过一列纵队的士兵,尽快赶到最前头。这时,看到了扛着轻机枪正走在日高小队队伍中的松冈九州男君。他也看到了我,对我咧嘴一笑,说了句什么。松冈君战死就在这15分钟之后,想不到又再次看到了这地方……

墓地看不大清楚,掩埋着他的土堆已经杂草丛生了,现在看来,当时竟然是停留在如此仅有小小起伏的地方的。再看看巍然坐北的青浦城,相比之下心中又涌出新的感慨来。正是风雨交加、寒气逼人的江南晚秋时节。

11月19日。今天还是行军。所过之处,许多房屋被破坏和烧毁了。看来居民们还没有返回,到处不见人影。有几只狗在闲逛。河里有一群家养的鸭子,像是在痛悼被扰乱了的和平似地在嘎嘎地叫着,勾起人们的悲哀。

20日到达松江。北风强劲而寒冷。城外竹林中了炮弹,有几根孟宗竹一样的竹子被炸裂了,倒在那里,实在是大煞风景,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见到了松冈末义君。他出生在岛山,和我同村。应征入伍时是辎重兵,作为上等兵进了第一大队的大行李队。大行李和小行李^①各队长之下设有两名上等兵,带领着众多的特务兵。只有队长下士官和两名上

① 日军运送战斗、宿营所需的弹药、粮草、机械等物资的部队。为补给前线部队非急需的粮食、衣物等,在师团后方行动的部队叫“大行李”部队,而搬运前线部队急需的卫生器材、弹药等物资的部队叫“小行李”部队。

等兵能骑马,其他的兵则牵着马拉车。末义君是位老资格的上等兵,身体魁梧,一般来说他本应该是骑在马上指挥特务兵的,可当在泥泞的道路中行军时,他常常不骑马,浑身泥水地在拉陷在泥里的车。我曾好几次看到末义君这种辛苦得令人可怜的情景。

还有一位同乡住在今江的山谷君(海军大尉)说:“我也参加了松江的战斗。那次攻击是我驾驶飞机去轰炸的。”这当然是战后才知道的事情。我满以为会在松江宿营,谁知就此通过,到了城外南面的地方宿营,所以城里街上是什么模样一点也没有印象。

21日经金山到达枫泾镇。金山与之前走过的城镇一样,街道都荒废了。在枫泾镇领到一袋零食,已经忘了是什么东西,可得到零食是件稀罕的事情,所以大家都像小孩子似地欢蹦乱跳。回想起当时,记得折小野中队长问了我们下面的问题:

“有支部队,御赐的清酒到了中队,但这酒只有满满一饭盒这么多。好,你们想一想,把酒领来,中队里负责给养的人是如何把御赐的酒分给中队全体士兵的?要是你们的话,又将如何分配呢?”

队长脸上浮现出狡黠的微笑,看着大家。我们几个人在一旁谁都没能回答。这时队长一口气告诉我们:

“不知道了吧。那我就把那位给养下士官所采取的办法告诉你们吧。他首先把筷子发给大家,集合全体士兵,把御赐品的意义向大家做了说明以后,让大家按顺序用筷子蘸饭盒里的酒来舔。这样,只是一饭盒酒也很快就能让中队全体成员尝到了。”

脸上得意的表情像是在说:怎么样,绝妙吧?是吗……原来答案是这样的啊,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真是佩服他的聪明。虽然也学了一手,可总觉得像是在讲一休和尚机智的故事。当然,这个故事肯定确有其事,不过这次战争,时日尚短,所以御赐清酒之类的事还没听说过。我认为,这可能是满洲事变^①时,或者是日本国内大演习时发生的事情吧。总之根据当时所处的地点和情况,能够随机应变就是好事。

这次转移重武器部队,利用河流展开行动,到了枫泾镇又再次成为

^① 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联队主力,与大家在一起了。由水路而来的这些部队与我们不同,带着丰富的物品,真是令人羡慕。宿营中发现几名霍乱病患者,还出现了死亡。部队为了预防,决定逗留两天。我们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大家都很高兴。

(二)

第六师团的目的地仍然是南京。24日早上,从枫泾镇出发,我们步履轻盈,因为难得地休养了两天。

在嘉兴宿营时,中队长说:“这里很像北支那的石家庄。”我没有进入过石家庄,而且不知为什么,我对嘉兴连一点记忆都没有。只知道第二天11月25日早上出发之际,当地下了初霜。

连绵不绝的我军大纵队继续行军,在长兴附近先转向广德。从这里,到现在为止已经看惯了的河流及稻田慢慢地都变成了小山坡或丘陵。松林多了起来,这风景在日本国内也常常可以看到。道路相当宽阔,所以汽车很容易通行,但是途中的桥梁已全部被中国军队烧毁或破坏了。

那是暂短休息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已经到了出发时间,可中队有一名队员不见人影,同一分队的士兵也都不知道他的去向。大家马上分头去找,不久他就回来了。一问,说是去找粮食去了。说起当时白石曹长震怒的样子,那可不得了。平时见不到他对士兵发怒,这次却面红耳赤地在厉声训斥。这也难怪他,一个士兵擅自离队的话,谁也不知道会陷于什么样的境地,这里可是战场……因为稍有差错就会有生命危险,白白丢掉一条性命。

中队长接着白石曹长的话进一步提醒大家说:“有事情一定要告诉大家自己的去向,特别是干部,如果不讲明自己的去向,那他的人品将受到怀疑……”云云。

前进到下泗安附近时,友军有七八辆军用卡车被烧得不成样子,丢弃在公路上。两侧有小小的山坡,中间是一条狭路。我们的汽车开到这里后可能遭遇了敌军,或者是遇到了敌人的伏击,总之都有可能。看到一排排被烧得只剩下金属残骸的汽车,我的心情沉重,难以释怀。由此

可知,在广大的战线上即使局部进展越来越有利,但可以肯定,即使是这一局部的进展也已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时值漫山遍野寒气笼罩,这是部队行军的最佳时候,我们步履轻盈,行走如飞。

牛岛旅团^①行军神速,仅仅在到达下泗安的11月30日这一天,就创造了踏破50公里的纪录。

广德也成了无人街。据说,广德正因为是守卫南京侧背最重要的防线据点,所以中国军队的抗战非常顽强,战斗极为激烈。听说在这次战斗中,日本军是以战车队冲击城门,破门而入的。我军占领广德城也就是两三天前的事。担任攻击任务的是杭州湾登陆后向西挺进的其他师团的部队。

城内的一个院子里有一棵橘子树,长了许多橘子,我们立刻将橘子打下来吃了,可是酸得难以下咽。以前在故乡农村有个习惯,就是把一种叫做“生醋”的酸味很重的橘子用来做调味料,可能就是这类橘子的一种吧。一般能吃的橘子,也不可能在枝头留到现在了,因为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都相继在这城里进出。与第三大队的山内军曹相遇,他把自己的羊羹分了一半给我。我又把羊羹分给我带来的小手川和蓑轮,三人一起吃了。每个人也只能吃到脚大拇指大小那么一块,但心情非常高兴,永远不能忘怀。在广德连香烟也没有。在战地生活中,完全抽不到烟的日子也并不是常有的,总是能找到的,不过,这次却毫无办法了。结果,三日来,一直没能沾上烟。

听说联队在广德附近补充了弹药粮食,还分发了其他慰问品。可是我们却没有得到。可能是因为大部队出了什么差错,结果没能分配给我们的吧。山内军曹有羊羹,事后想来,似乎证明了他们部队是分到了补给物品的。记得在广德宿营了一夜。脱了衣服一看,有好几只虱子沾在上面。不光是我,好几个士兵都发现了虱子。

南华秋水北苑春山

东壁图书西园翰墨

① 即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因旅团长为牛岛满,故名。

屋子两面的墙上相对挂着两幅美丽的字画。

自广德起,旅团成了先遣部队,开始向北和西北挺进。一望无垠的平原和广阔的丘陵连绵不绝。

“越过高坡向前走啊……”

不知是哪个士兵小声唱起了歌。高坡上生长着低矮的松树、竹丛和杂草。我们行进在其间,日本国旗也行进在其间。回归到本队行军时,见到了骑着马的牛岛旅团长。旅团长一如既往,脸上始终挂着笑容。当我和折小野中队长并排的时候,他对我说:“噢噢,很精神嘛,要努力哟。”还给了我四五粒栗子。

旅团长在陆军中作为精英出身的将军,其人品也是少见的,受到许多将士的敬慕。对士兵也会完全用萨摩方言跟他们轻松地交谈。有时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在最前沿中队的队伍里。他有胆魄,沉着冷静,但脸上总是浮现着温厚的笑颜。一接触到这温厚的笑容,就令人自然而然地感到一种安详。据说第二年,当旅团长调任他职时,当地的居民及苦力们都来送行。还听说旅团长对这些人也是诚恳地打招呼说:“承蒙各位的协助。”感谢他们。人品这个东西不管到什么样的社会都会自然表露出来的。处于高级军官的地位,尽管没有一点想表现威严的意识,也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某种威严。

离开广德,我们第二天就行进在山地的小道上。与大道不同,路不好走,排成了一列纵队行军,所以前进很不顺利。经郎溪上定埠,理应在12月7日左右到达溧水附近的,但当时完全弄不清是在什么地方行走。

“日暮道犹远。”我吟着这样的诗句。

星星在夜空中闪烁,我们燃烧起红红的火炬,照亮前路,向北挺进。

日本军队的目标是进攻南京城,从各个方面进击,看样子已经到达了内部防线。我们的部队还没有真正接触到敌人,这是因为从昆山附近转战,采取了大迂回作战计划。但是不久就将和敌人遭遇——谁的心中都有这样的预感。第六师团从南京的南面和西南逼近。右翼是第一一四师团,左翼是第十八师团,我们可能就在这两者之间吧。

第二天夜里,中队在田野中的一个小村落露营。我和白石曹长进

入一间狭小的屋子，用饭盒吃饭。虽然为取暖我们生了火，但柴火烧不着，烟熏得厉害，弄得小屋子都是烟，没法待。对白石曹长来说这是最后一个晚上，遗憾的是，我们两人那天晚上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记不清了。

(三)

天亮就是12月9日。一早，我们作为尖兵中队向宿营地出发。不知不觉穿过了小路来到铺有煤渣的大道。这是通往南京的主要道路。我想，这数公里的前方，中华门以及与其相连的城墙正等着我们。尖兵中队又经过一个村落，走过在村外附近的一座小桥（天宝桥？）。突然，砰！砰！砰！枪从右上方高地打来。敌人好像是朝前进中的尖兵川田小队射击。小队长川田准尉把有敌人的高地指给跑过来的折小野中队长看，一边做着简单的汇报说明。隔着旱田，这里与高地的距离约有三百米。中队长马上命令日高小队向高地进攻，主力为确保道路沿线的前方村落，边进攻边前进。回想起来，当时（其他部队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对我们第一大队来说，是第一次直接与保卫首都的中国军队交战。此后，随着逼近南京城，每天都重复不断地在众多坚固的防御阵地展开攻防战。作为中队右翼第一线的日高第二小队尽管受到敌军的射击，还是在旱田的平地上冲锋，冲上了154高地，一举打退了高地上的敌军。但是，从隔着山谷的下一个高地，立刻又有敌人朝这边猛烈扫射。可能是预定的行动吧。日高小队继续与这股敌军交火。

中队主力沿着干道前进，傍晚时分到达汪家村。也就是说从今天早上开始，作战区域幅度大约有八公里。好像第一大队和联队主力走的也是同一条干道，跟随第三中队前进的。在日高小队的右侧，第二大队与之协同作战。这一方面的战线虽然受到了各高地上敌人的顽强抵抗，但都被我们逐一清除，夺取了阵地，看样子攻击进展得很顺利。

不久，日高小队回到了中队，但白石曹长最终没能够活着回来，在今天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他与日高小队一起行动，占领了154高地，接着又与前方的敌人交战。记录上记载着他牺牲的时间是下午2时。曹长深得上下的信任，在联队也是公认的最优秀的下士官，是大有前途的

一个人。特别是我，自出征以来一直和他同食共寝。我想，我从白石曹长身上得到的裨益很大。昨晚不是还一起在屋里吃饭睡觉的吗？唉，前途无量、风华正茂的白石松男氏，在南京城凋零了。

部队在汪家村附近集合后，已经上了道路东侧丘陵小高地的友军重机枪突然开起火来，还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听说，是中国军队的纵队在离我们400—500米的地方，正由东向西北移动中。是重机枪队长从高地最早发现的，便不失时机地命令射击。据说，遭到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击，中国军队受到了很大打击，逃走了。

到了傍晚，战斗渐弱，枪声也少了。大队干部集合在一起正谈着话，旅团副官江口八郎中佐那健壮的身躯出现了。江口中佐说：“明天一早必须突破前面敌军的各个阵地，进而转向进攻南京城。炮兵及其他炮火都还没到达，看样子赶不上这次进攻了。不过这也没什么，我们在没有炮火配合的情况下攻克敌人的首都，这将载入史册。”中佐的话语豪壮有力。我目睹了攻打保定、正定、青浦及其他的城市，当时那些激烈的战斗情景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海。即使如此，也无从了解到战斗的全貌，所以也就认为：“不就是这回事么？”没有炮火配合就要进攻南京城？怎么说也太离谱了，因此，当时这也许只是鼓舞士气的言词吧。当夜，作为中队的传令员，我留在了本部。大路往东北方向稍进去一点的地方是民宅。金田大尉一直在蜡烛的灯光下在信纸上不断地写着什么。不一会儿，好像是写好了，回头把它交给了站在他身边的本部的长浜军曹，并对他说：“这是今天的战斗略图，可以用于大队的战斗详报吧。”

12月10日，想起来正好是我的生日。但是当时我完全忘记了，根本没有这份闲心。进攻主要阵地的帷幕即将拉开了吧。首先，大队作为左翼第一线，受命负责进攻小米行的东北侧和蚕丝试验场附近的高地，接下来攻击北面的敌军阵地，一早就开始了行动。折小野的第三中队为第一线先头部队，向蚕丝试验场高地发起进攻。我们在山坡上稀疏的灌木丛中穿梭着不断往上跑。拂晓时分，进攻战斗全线展开，枪炮声越来越密集。看样子是联队炮中队昨夜连夜赶上了本部。

第三中队对顽强抵抗的敌人发起攻击，终于夺取了作为第一目标的

蚕丝试验场高地。大队本部及各队也乘胜前进,完全占领并确保了这个要地。高地上格外宽阔,虽然有的地方起伏稍大,但总的感觉还是很平坦的。高地上到处都可见到褐色的泥土,那是敌人为了构筑坚固的阵地而挖出来的。既没有树木也没有杂草,可以看得很远。这是个很好的要地,既可守,又可攻。

对高地情景的记述,只不过是弹雨中穿行时散见的点滴印象而已,可能有误。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从仅有一谷之隔的前方高地上又有密集的枪弹扫射过来,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敌军的行动。有部队在东面高地上散开前进,那一定是来到右翼第一线的第二大队,因为比我们所在的高地要高,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情况。只见以携带轻机枪的士兵为中心,五六名士兵成散开队形向前冲去,到了山坡附近啪地卧倒,轻机枪的火力就射向了前方目标敌军阵地。这完全是遵照执行了在雾岛山麓演习时经常训练的动作。

敌我双方的炮声越来越激烈,战斗愈益白热化。到处烟尘飞扬、火光冲天,凄厉的爆破声与步枪、冲锋枪、掷弹筒、轻机枪、重机枪等射击声相互交错,使得战场更加喧嚣,激战正酣。在丘陵地带的旷野里展开的两军攻防战的场面,甚至令人感到了悲壮中的一丝绚丽之美,就像看到了一幅画卷深深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大队虽然占领了蚕丝试验场附近,但因敌军炮火猛烈,占领之后一直动弹不得。在这种情况下,驹泽大队长把我从各队的传令员中叫了出来,命令说:“第三中队立刻向前方敌军阵地发起进攻!”我口头重复一遍后,立刻跑去传令。中队从自己所在位置向东面前进。那是宽阔的高地表面,子弹不断飞来。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与我军对峙的敌方阵地,同样,我们的情况敌人也应该看得很清楚。我冒着敌军的枪弹一口气飞奔而过。到那儿约有130米,中队长就在那连绵不断、细细长长的战壕里。大家都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枪,神情紧张地看着跳入战壕的我。

我传达了大队长的命令,折小野中队长默默地点了点头。敌人的射击持续不断,战壕周围子弹乱飞,抬不起头来,右翼斜前方高地正进行着近距离战斗。勇敢的日军士兵们向敌军阵地发起冲锋,中国军队的士兵从阵地的战壕中探出身子,投掷手榴弹,这些都是一瞬间发生

的事情。双方都很勇敢。在战争的名义下，公然将生命作为赌注在进行着争斗。

我出了战壕，经硝烟四起的山坡回到了大队本部。此后不久，这里的高地好像成了敌人的主要射击目标。轰！轰！轰！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飞来，这就是所谓的连续射击吧。爆炸声及其厉害。

“啊！”

“哇！被打中了！”在扬起的滚滚尘土中，闪现着几个正在蠕动的人影。

(四)

噗地一声，我的头部受到了冲击，全身都感到隐隐作痛。这时，听见附近好像有谁在喊着“天皇陛下万岁”。在意识蒙眬中，随着这声音，又听到有两三个人也在高喊“万岁”，霎时脑海里闪过“我这也就到了最后时刻了”的念头。我被抬到附近的蚕丝试验场。这里昨天可能还是中国士兵的兵营吧。攻克后是中川卫生队在此负责收容伤员。到了傍晚时分，我终于苏醒过来。看看周围，大约有一百五十名伤员。大队长驹泽少佐的身姿就在附近。长浜军曹也在。那时，我们疏散在大队本部附近，由于受到敌人密集炮火的攻击，有几个人战死了，还有几个人负伤了。我们这些负伤的人只是在接受包扎之类的应急处理后用担架抬来的。其间，又有许多伤员不断被抬来，看着看着就增加了许多人。宽敞的院内弥漫着伤痛引起的呻吟声、难受的喘气声和叫喊声。谁都不耐烦地等待着能尽快得到治疗。遗憾的是，这种愿望一时难以得到满足。随着周围的战斗越发激烈，收容负伤的战斗人员已经是很勉强了。轻伤人员也就罢了，但对重伤员来说只能说是无情了。在离我躺着的地方不远处，有人在大声怒骂：

“哦！哎哟！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没有人管我们吗？”

接着又说：

“啊啊！这就是日本卫生队吗？这就是日本的……哎唷！”

好像是受了重伤，那叫声十分悲惨。在这附近看到了第七中队山野伍长的身影。山野伍长一直不断地在唠叨着什么。他好像也负了重伤。

有的士兵为了缓和痛楚唱起了军歌。漫长的一夜过去了。好像夜里断了气的士兵也不少。山野伍长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已经咽气了。而且,一夜之间,宽敞的院内又增添了数百名伤员。

第二天(我想是11日),师团长谷中将^①带领着伊豆富人议员来到院内。师团长只是站在入口处巡视了一圈,然后说:

“现在战斗仍然在进行中,但南京如今完全在我军的包围之下。城池陷落近在眼前……”

他简单地做了如此说明就离开了。留在印象里的是他一只眼睛的眼睫毛上方贴着药膏。我见到谷师团长,前前后后就这么一次。

今天,分到了一个饭团。这饭团只是把没有盐味的饭捏在了一起而已,味道极香……这也难怪,因为从昨天到现在什么东西也没吃过了。

大队会计井上大尉来到了驹泽大队长的身边,好像是在说着什么,但是大队长看上去很为难,脸上露出了不安。可能是因为在这最重要的时刻,虽说是负了伤,可离开战斗部队心里感到痛苦,难以心安理得地待着吧。我推测他该不会是在想要重返战场吧。因为驹泽少佐的性格就是这样。从我们被敌人迫击炮打伤的蚕丝试验场所在的高地到南京城还有三公里或四公里。我是在第一天,也就是12月10日白天负的伤,在这以后的战斗情况就无从知道了。

大队长驹泽少佐负伤后,由重机枪队长金田大尉代理指挥大队。大队已经转为进攻作为第二防线阵地的安德门高地,阵地设有铁丝网、碉堡、战车壕等障碍,敌军凭此进行着殊死的抵抗。特别是当夜,曾在第一防线负责进攻的第二中队破坏了铁丝网冲入阵地,夺取了高地的一部分。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反击十分猛烈,整个晚上他们一直与多次反攻的敌军进行着战斗。据说在激烈的夜战中,小队长、分队长以及战友们的伤亡接连不断。在这天夜里的战斗中,绀屋准尉代替已经负伤的第一小队长进行指挥,在他激励下,部下击退了敌军的多次反攻。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他组成了突击队,深入阵地纵深,被敌军的手榴弹炸中,右腿负了伤。我军的进攻越来越困难,敌军像是察觉到了我军的进攻受

① 指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

挫,接二连三地试图反击。准尉不顾负伤的身体,聚集剩余的少量兵力,以必死的决心展开战斗,死守着夺取的高地。近黎明时分,按沟口中队长的命令,他被送往了野战医院。

在这之后不久,第二中队就遭到了敌军的大反攻。沟口队长毫不畏惧,灵活指挥,激励部下击退了敌军,可是他却因头部被子弹打穿,最终壮烈牺牲了。据说这是11日拂晓发生的事情。

我军不顾接二连三的伤亡,继续咬住敌人的防御主阵地不放。在代理大队长金田大尉坚强的指挥下,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重要据点,一步步向南京逼近。然而,这位金田大尉也在当天傍晚指挥战斗时胸部被子弹打穿而倒下了。听说金田大尉当时一边接受军医的紧急包扎,一边还继续下达命令。与第二中队联合作战,处于左翼第一线的第四中队正面也在激战中出现了伤亡,小队长五代准尉、有村准尉负了伤,还有其他死伤者。代理大队长金田大尉负伤后,第三中队长折小野大尉接替指挥大队。这样,连干部们都不断伤亡,自然下士官和士兵牺牲者也接连不断。尽管我是在自己生日的10日中午在蚕丝试验场高地负伤后被收容到卫生所的,但我能记下当天夜里到第二天的以第二中队为首的部队战斗概况是有原因的。第二中队在先前进攻北支那的正定城时,冲入城内展开了长时间的激战,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占领了正定城。而今又是在南京城外遭遇了严峻而激烈的战斗,以至沟口队长及其他人作出了牺牲。因此,我想,迄今为止,不仅是在大队,而且在联队中,可能也是第二中队作出的牺牲最大。这或许就是所谓运气吧。

联队占领南京城墙西南一角是在12月12日下午4时44分。是肥后大尉的第九中队负责这项任务的。第一大队这时正将第一线换防给第三大队,自己则变为联队的预备队。

从参加攻击的日本军队整体来看,胁坂部队的一队从光华门突破并在城墙上竖起日本国旗,是在12月10日下午5时20分。可见这与第二十三联队占领西南角整整相差了36个小时。这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这也证实了胁坂部队的队伍登上城墙以后,两天来在城墙周边很大范围内展开了如火如荼的攻防战。

说到城墙,这与我国的江户城或者是熊本城等城墙的概念完全不

同。特别是南京城,周围五公里,数一下城门,竟有 16 座,城大得难以置信。前线各部队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我们的部队才是第一个。”这也是因为他们只知道自己面前的战况而已。另一方面,拼死进行防御战的中国军队方面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一样的。在连绵不断的城墙一角,进攻部队的一小部分登上城墙,或许其他部队的人也不可能知道。在战场上能够最先冲入敌军阵地,作为战功,这在我国自古以来就一直评价甚高。在这次战争中,也掀起了同样的风潮。这要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但是在当时那种困难的状况下,大致上都必须采取必死的行动,所以成功的话,当然应该受到高度评价。但普遍情况是,舆论往往倾向于报道我军是如何占领大城市的,但其实每个村落、每个山头或者是地面上的战斗,很多都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同样拼死往前冲才完成任务的。

从前的对阵战等经常有“争当先锋,争取建立头功”的事,现在的战斗当然与那种历史时代的战斗不同,就算是最先冲入了敌军阵地,也不是每个部队都有相同机会的。要遵循战斗程序,上有师团到旅团、联队、大队,下有中队、小队,必须根据编制采取行动。就以我们步兵为例,大队以下的队伍中,有作为第一线的,或是作为第二线预备队的,一般来讲大致是交替着上前线的。第一个登上南京城之类的事情虽说被看作是千载难逢,可要说的话,难道不是越是到比较上级部队的指挥机关,这种愿望就越是强烈么?这也是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吧。

由“第一个冲进敌军阵地”这句话首先联想到的是,源平合战中宇治川的争当先锋,甲午战争中第一个冲进玄武门等事例。可是,对我来说还有比这些更加难以忘怀的事情,那就是一幅画,是关于大阪城夏季战役中一个场面的插图。画面上在城门附近敌我双方的武士们严阵以待。双方相距很近,大概只有四五米的样子。在最前一排,武士们的姿势像是被后面的人群推出来似的,双方都一样向前弯着腰,于是最前列中就有人高喊一声:“哇——!”就冲入敌军中去。所谓“第一个冲进敌军阵地”就是这么一回事吧。在那样的状况下,能够采取这种行动的武士,就算是古代武士,我想也是罕见的。那幅插图画的绝对不是什么勇猛的场面,不过非常之逼真。我记得那幅插图好像是少年时代在旧的历史书里看到的。那种无处可走的场面中“第一个冲进敌军阵地”的武士应该算

得上是一个豪杰吧。虽然可以迈出这通向胜利的第一步,但有可能不是被打死就是使对方崩溃,或是成为一场混战。一般场合下,打仗占先机,先动一步的一方较为有利。在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那样相互拼刺相互砍杀,时间虽不是很长,在一瞬间就有哪一方溃败而去。我想在这一点上,古时和现今都一样。我想那幅夏季战役的插图是出现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初期的小学教科书上的,一定是按照以前留下来的图画翻刻的吧。要是这样的插图现在还保存着的话,我真想再看一看。

四、野战医院

我被转送到城内的野战医院是在攻陷南京的数天之后。医院是两层楼,朝南,宽敞的前院面临着大道。转到了这座大楼里以后,治疗也很周全了,我们的伤日渐好转。我的伤是头部左侧被炮弹片打破了,所以负伤的时候出了很多血,我自己很担心。来到医院后,头部被绷带一圈一圈地全部包扎起来,只有两只眼睛、鼻子和嘴还露在外面。有一天,同房间的黑木恒幸伍长手上拿着子弹头从诊疗室回来,他说这颗子弹是从眉毛和眼睛之间取出来的。虽然子弹钻了进去,但眼球以及周围的骨头都没有碰到,子弹刚好就在差一点就要命的地方停住了,这是很少见的。要是无论从哪个方向再偏几毫米的话,那就……只能说是一个奇迹了。想必是子弹擦过钢盔在内侧转了一下之后就停住了。我们的房间里光下士官就进来了七八人,餐具和衣服都由自己洗。他们年龄都比我大,是结了婚以后来当兵的下士官。这房间没有重伤患者。随着身体情况好转,同房间的人开始喝起酒来了。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中国酒,一点一点地喝着。野口音之助、宇田须枡吉君等劝我说:“今天是7日,是正月,不喝一杯吗?”到了第二天又说:“喂!今天是8日,是正月,野口君就喝一杯吧。”据说早上喝酒是早上的乐趣,到了晚上又有晚上的安排,“怎么样,来一杯吧。”

有一天早上,我为了洗碗,来到前院一个角落的盥洗室。刚要进去时,我遇到了同村的川添藤市先生。川添先生正在医院大门口站岗,他看见我就叫住了我。我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真的也会当兵来到战场,

感到很意外。他带着一等兵的肩章。因为他的年龄已经过了35岁,应该说预备役早就结束了。

“藤市先生,为什么你这岁数的人,一开始就被征召来了呢?”

“我也不清楚,中队里像我这样年龄的士兵倒是一个也没有。”

川添先生说着寂寞地笑了笑。听说他是应我们联队的征召,被编入了第六中队。年龄这么大的人在以现役士兵为主的部队里服役,而且这么早就征召入伍,这就给人留下一个疑虑:一定是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即使是在我们第三中队里,也没有像他那样的老兵。藤市先生曾在大正末年应征入伍。暂且不说到了以后怎么看,在还是战争初期的当时看来,也只能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兵。到了第二年的昭和13年,一些人可能是因为不该编入要上战场的第一〇六师团吧,据说第一一〇师团和第一〇六师团被称为特设师团,主要是由担任后备任务的征召兵编成的部队。就是应征被编入这些部队的人,也都是些比川添先生要年轻的人……真是奇怪的事情到处都有。明明知道是搞错了的话,理应尽快做出适当的改正,可……

虽说是野战医院,但开设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设施和人员也不齐全。当然也不是只有护士一人。不过,野战医院的生活过得还算安稳。战火不知不觉地从我们身边远离而去,甚至像是与我们无关一样。

上村军曹带来了一架风琴放在狭小房间的角落,当当地弹着。我潜心在读《俊宽》及《日轮》等小说。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分得了一个装着日用品的慰问袋。日用品袋与普通的慰问袋不同,不是由个人赠送的,而是由军队抚恤部门分发的。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有毛巾、肥皂、漱口杯、牙刷等各1个,还有草纸150张、信纸1本、明信片10张、铅笔1支。我得知自己所在的第三中队就驻在医院附近,于是得到许可后便前往探访。自住院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外出。折小野中队长也挺精神。分队长津江伍长、卫生兵是泽上等兵等几个人在南京附近战死了。回想起来,出征途中一起在京城宿营的人当中,白石曹长和是泽卫生兵两人战死,我负了伤,只剩下河野卫生兵一人安然健在,得以进城。与战友们久别重逢,话题特别多,但是究竟讲了些什么,却一点儿也记不清了。只有一件事记得,那就是有关川田小队长的事情。

“占领南京,或许战争就结束了。因此到了凯旋之日,你们可是最有荣誉的了,因为不管怎样,你们是在攻打南京时光荣负伤的……”

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觉得“事情竟也可以这样来看的”,可怎么也引不起我的激情。可能是看到了我头部被绷带包扎住的样子,小队长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吧。在我探访时,第三小队的城下、畑中、增永、甲斐(满)等也来到了指挥班的房间。增永上等兵拿出两个罐头,畑中伍长拿来了一只大大的陶罐,里面装满了菜。就像是回到了自己家一样高兴。“哇——!真丰盛哪!”我只有感谢的份。畑中君是我第一次负责接待新兵时分到我们班来的,学习科目和实践科目都很优秀,他出征时是上等兵分队长。听说他长年以来转战在大陆各地,之后去了南方,在塔罗基纳^①战斗中牺牲。

在野战医院,负责我们房间的军医是个年轻快活又亲切的人,不时来我们房间,与我们无话不谈。对伙食等也很关心,觉得对不起我们,常常自责。

一个月过去了,医院也有了变动。决定根据收容的患者受伤程度,有的送回日本,有的回到原队,有的继续住院治疗,基本上分成以上三大类。军医来到我们房间,对每个人的病症作了说明以后进行分类。

“金丸先生还年轻又是独身,能否归队呀?”军医称我“先生”,十分礼貌。从他的用词及举止来看,可能是位应征入伍的军医吧。

“多亏您了,我的伤也好了。让我归队吧,多谢了。”我边回答,边向他行礼。我记得当时那军医的名字好像是叫新村。住院时,只是去了暂时宿营在附近的中队探望了一次,就再也没有出过医院一步。所以对我来说,首都南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城市,我最终还是一无所知。

(下略)

[金丸贞行:《我的战争》(1),朝日新闻西部本社编辑
出版中心(宫崎),1984年7月15日。]

(何慈毅 译)

^① 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上的一个半岛。

13. 日中战争实战记

伊藤勇

编者注：伊藤勇，隶属日军第九师团辎重兵第九联队，中队长。

(前略)

11月13日前后，我们从上海开始向南京方向追击，我们的联队在上海—南京的铁路沿线突击前进。运河在涨潮，水路相当发达，而道路大多数是用石子铺设的小道，对于大军的通行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由于敌军在后撤时炸毁了铁桥，因此要架设或修复桥梁，以便从铁路上追赶。11月17日，来中国之后第一次见到了有山有水的美丽的昆山。

为了攻击无锡(工业城市)附近的敌军阵地，以昆山为基地花了几天时间进行区间运输。在昆山东部地区，由从杭州上陆的第六师团(熊本)实施奇袭，由于切断了从上海撤退的敌军退路，全歼了大约有一公里长的敌军行军纵队。那是一幅人马炮车散乱、诚如百鬼夜行的地狱般的悲惨景象。

人马的尸骸一天天变黑、腐烂，发出奇臭，尸体上的兵器被收走后，被服也一天天地被掠夺了，尸体就变成了蛆虫的集中地。战场始终没有打扫，几天来我忙于南京追击战的补给工作而来往于这一悲惨、发臭的地狱般的地区，没有办法收拾，我真实地见到了战争的惨烈情景。

(南京作战图 昭和12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略)

由于不断有病马出现，使运载量不足，我们对此倍感棘手。因为在上海—金坛城之间建造了比道路更好的运河，我们征缴了隐藏在小河深处的船只，将它们集中起来编成水路运输队。由于船只的载运量大，运输大获成功。



向南京进军！进军！（远处为南京紫金山）

11月19日，一边眺望着远方的苏州高塔和城墙，一边点燃田里堆积起来的稻草用于取暖。就这样，我们沿着被破坏了的铁路前进。

为了进攻南京，第十六师团（京都）沿着扬子江向紫金山、南京中山门进攻；我们第九师团（金泽）从铁路两侧经过常州向南京光华门进攻；第一一四师团（宇都宫）从太湖以南地区出发向南京中华门进攻；第六师团（熊本）同样向南京雨花台附近发动了猛烈进攻。

无锡、常州是平原，从金坛城往南京方向去，地形渐渐变成了丘陵地带，可以隐约地看到南京北侧的紫金山。南京的主要防御线淳化镇配置了里外三层的防御堡垒，它们之间用掩体壕沟连接起来，还构筑了两道屋顶型铁丝网和战车壕沟，还在各处铺设了地雷。敌方中央军的抵抗意志十分坚定，我方步兵第三十六联队（胁坂步兵联队）的进攻怎么都难以向前推进。

12月8日，胁坂部队终于在恶战苦斗之后突破了敌人阵地，得以向南京突击前进。

在金坛城，我们收到了三田村联队长的命令，要我们迅速前进，为胁坂部队补给弹药。我立刻下达了追赶中队的命令，与两名班长一起，一边眺望着紫金山，一边快马加鞭冲到了部队的先头位置，以与胁坂部队取得联系。



淳化镇敌军阵地

淳化镇的阵地内有友军树立的“小心地雷”的标牌,空气中还残留着硝烟的气味,并可以看到敌我双方阵亡者的尸体。我们突破了危险地带——在那个地带说不准会突然遭遇来自掩体壕沟里的伏兵狙击。



最先登上光华门的胁坂部队长

我们在南京城墙东南面的一个像是小学的地方见到了胁坂联队长,根据指示,我们退至侯村为他们补充了弹药。胁坂步兵第三十六联队长是贱之岳七本枪的胁坂安治的后裔,总是带着红色的指挥棒,蓄着被公认为代表刚毅沉着的勇将胡须。

12月10日,胁坂部队的伊藤大队第一个抵达南京光华门,树立起了日章旗,但是遭到了敌方的奋力反击,日章旗迅速地被夺了下来,伊藤大队长也战死了。光华门的高度有13米,有着宽度100米的

护城河,进口处堆着土包,更铺设了带电的铁丝网。城墙上架好了十几挺机关枪,城门有两道门。



南京入城式中的松井石根大将

我军用山炮进行破坏性的攻击,以及通过空中轰炸,在城门东侧开出了一条突击的路线,但是这场攻防战持续了三天,在伊藤大队岸中队山际少尉的护卫下,12月13日上午5时,军旗在城墙上飘了起来。



南京下关战后的痕迹

我们的中队在南京东侧的侯村待命。第十六师团(京都)部队正面的紫金山足足燃烧了三天。城内被禁止进入。

12月17日举行了松井司令官的入城仪式。在中山门,从中队选拔出来的士兵作为代表接受了检阅。之后,南京城内的视察才被许可。我们登上了光华门城墙上的那条突击之路。那里树立着日章旗和纪念木牌,木牌上写着:

胁坂部队 12月10日下午5时,光华门

13日凌晨5时,同城墙上

陆军少佐 伊藤善光阵亡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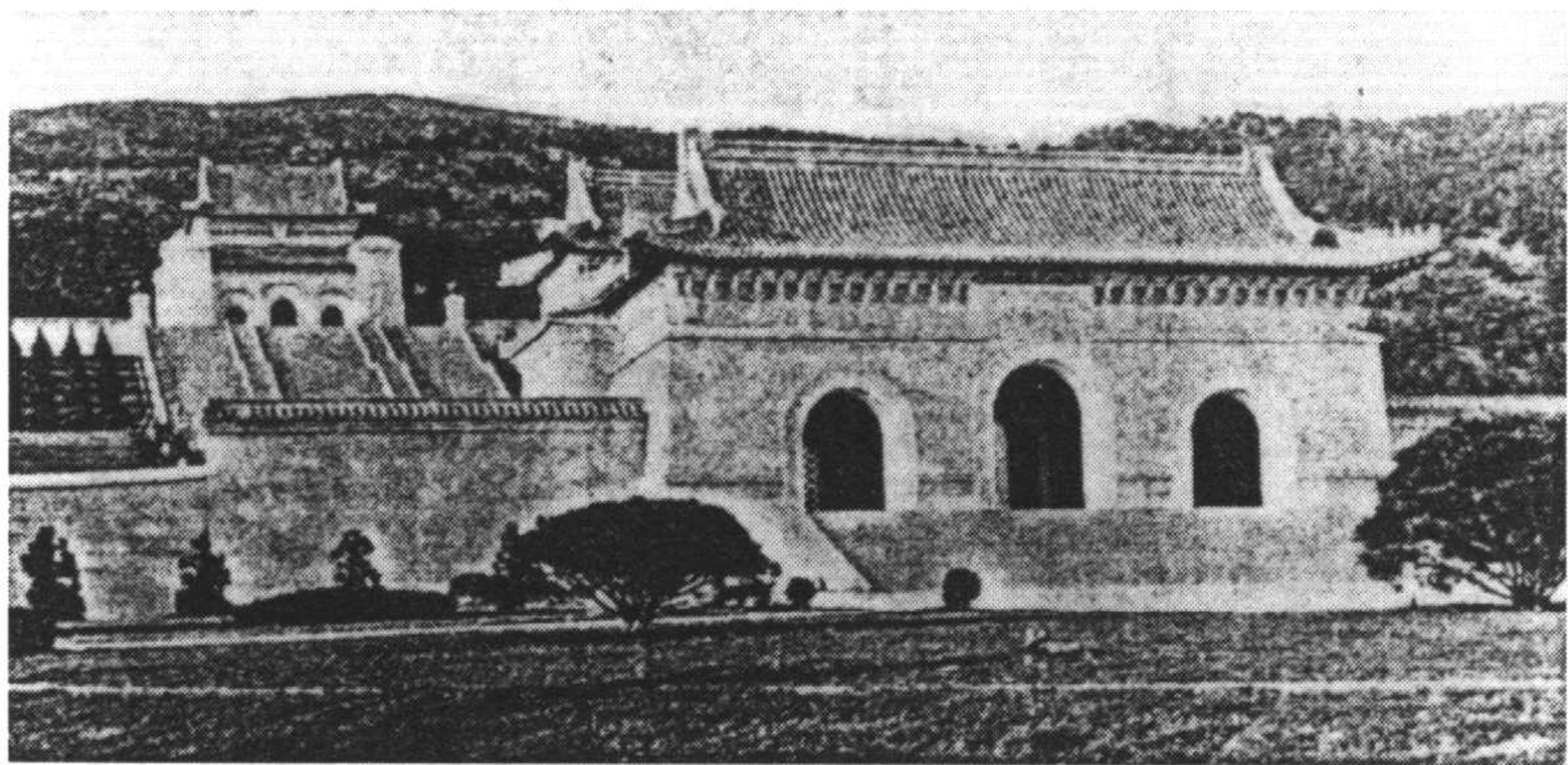
木牌上供着钢盔。并为南京之战以来的战死者默哀。

从城墙上眺望弥漫着硝烟的南京市内之时,突然,我们的一架带着日章旗标志的飞机遇到了故障,坠落到城内的空地上,在火焰和黑烟的包围中燃烧着。



南京中山门城外侧

由于有危险而不能接近,面对勇士的牺牲我闭上了双眼。从光华门可以见到城内北面很远处的中央军官学校。国民政府以及诸多官邸散见在各处。一般居民的房子破损较少,大木板门都紧闭着。



中山陵

街上各处可以看见人马的尸骸。居民都集中到了难民区,市内被禁止进入,并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中,所以市内空空如也,无人居住。我出了被土包封住的中山门的小门,一边眺望着丘陵地带的巨大的石佛和石马,一边登上了紫金山。在紫金山的中部,有白色的宏伟的孙文陵,由于战斗和各部队在此宿营,里面完全荒废了。在墓前孙文塑像的大理石背后,不知什么人用木炭写上了“亡国之父”几个字。我感到了羞耻而将字迹抹掉了。出了南京西侧的挹江门,我继续向下关方向走去。那里就像遭遇过狂风暴雨的袭击,一切都荒废了,让人联想到战斗曾经多么激烈。

我听说敌方的残兵败将被第六师团(熊本)拦住了退路,并遭遇机关枪的扫射而死在扬子江中。但对这在战后会成为南京大屠杀事件,我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由两重门组成的光华门



光华门

12月22日,部队从南京郊外的侯村出发,每天持续行军,经过南京、句容、丹阳、无锡,在走完大约二百五十公里的坎坷路程之后,在12月31日傍晚抵达了驻扎地苏州。

(下略)

[伊藤勇:《日中战争实战记》,北国出版社(金泽),
1980年11月15日。]

(赵仲明 译)

14. 参加南京攻略战

梶谷健郎

编者注：梶谷健郎，日军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骑兵少佐。

下面要叙述的是我自己的行动记录，和这部联队史无关。只不过我是骑兵出身，又碰巧参加了被称为世纪大会战的“南京攻略战”，有不少宝贵的经历。我想这对不知道战争的人们来说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想试着照原样把它记录下来。

关于这件事说来话长，因为首先有必要得到读者的理解，所以我决定从出发点开始讲起。我们被征召是在昭和12年11月7日，在位于大阪市东区马场町的现NHK广播电视台南侧的步兵第三十七联队，是作为补缺征召而入队的。

自己是骑兵，为什么加入了步兵联队呢？对此我觉得很奇怪，原来那是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是各个兵种的混合。其中的骑兵军曹是小矶茂三郎、下中丈太郎、乾圆之助和我；骑兵伍长是中尾实、安栗富太郎、泉谷九兵卫这三人。这些人都是骑兵出身，所以感到很受鼓舞。暂且不说前任者，中尾、安栗、泉谷三人和我是老相识了。部队名叫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不是出动到所谓第一线的战斗部队，而是专门利用船舶运输军需品和军队的部队。但我们入队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好不容易等到离开了宇品港，部队长及有关将校在船内对我们作了说明，我们这才第一次知道了事情的全貌。

说明中提到的都是我们未知的世界，所以听的时候并没有一一理解，其概要如下。这种司令部当初是以中支那及南支那为中心组建的，但随着战线的扩大，在新加坡、马尼拉、莱特岛、腊包尔、爪哇以及其他重要港口也设置了这种司令部，作为中央的直属部队从事特别重要的任务，对军队的紧急使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刚才稍微提及了一下,不仅输送军队和军需品,如果有医院的船入港的话,要负责把从前线送来的患者送回到国内。另外还利用回国的船来装载当地的煤、矿石、棉花等等。大体划分一下就是上面这些工作,这样当然就需要有人直接从事这些工作。于是水上运输队被分配到了司令部。这个司令部里也有以中尉、少尉为首的两百名左右的士兵。在这些人员仍然不够的情况下,在南京使用了300名当地的苦力。这些苦力在司令部的指挥下,将从停泊中的大船上用起重机卸载下来的物资搬运到驳船上,或者通过栈桥把驳船上的物资堆放到港口的岸上。负责指挥监督这些工作能够高效的运行,就是我们司令部成员的任务。我想通过以上说明,您应该大体知道我们工作的内容了。

我们于11月13日下午4时到达了下关^①,随即坐上了“泰山丸”号。暮色已快降临,我们想这是最后一次看国内的群山了,要把它深深地刻在脑中,在埋骨大陆的决心下,我们久久地站在甲板上眺望暮色渐浓的天空。

其后,在所有出征军人都经历过的行程下,一路向支那大陆航行,船上发生的事就略去不提了。

在支那大陆迈出第一步

11月20日下午3时,在扬子江口上游西岸的浒浦镇开始上岸,左右两边有无数的枪眼,我在期盼已久的支那大陆迈出了第一步。由于第一战队的奋战和激烈的追击战,民房被烧塌了。道路因为这天早上开始下雨而变得泥泞。我们在离上岸地点上游三百米左右的村子宿营。吃了压缩饼干和水,晚上点了较粗的蜡烛钻进了毛毯。雨不停地下着,极其寒冷。江面上停着十几艘驱逐舰和运输船,没有实行灯火管制,亮着灯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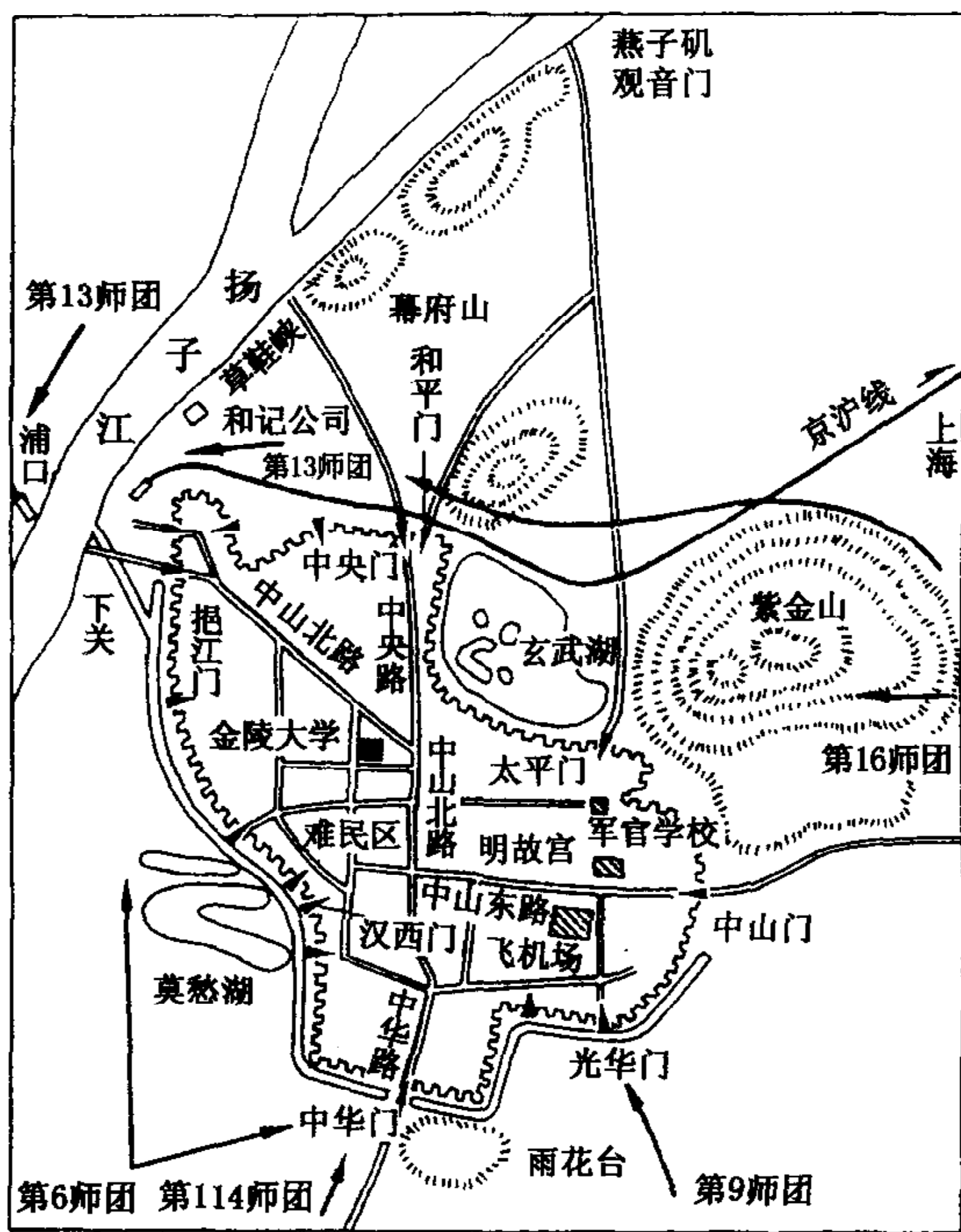
为了侦察南京港与安达少佐先行

此后,司令部分乘机动船沿着小河不停地左拐右拐,经过常熟,12月

^① 此处指日本的下关。

7日到达无锡。据情报称,眼下正在猛攻南京,攻陷还需要几天。司令部决定为前进做准备而逗留两天。

到了11日,铃木司令官下达了以下预备命令:12日,安达少佐带领梶谷军曹和另外三名士兵迅速先行至南京,对港口设施的情况进行侦察,为此提供三七型丰田汽车一辆。安达少佐把我叫去,向我说明了这件事。



南京城攻占图

根据司令部副官武田贞辉少尉作出的人选,原田上等兵、司机一名,另外一名一等兵(姓名均不详)共五人,在12月12日上午10时接受了安达少佐的简单训示后,坐上了土黄色的丰田车,我坐在助手席,安达少佐坐在司机后面,左边是两名士兵,有四五个人来给我们送行。离开无锡后首先向江阴驶去,在石子路上前进比较顺利,3时30分到达江阴,下车向前往南京方向的步兵部队打听了关于道路的情况后,来不及休息就90

度左拐,少佐不知道该向金坛前进还是直接去丹阳,最终还是决定去丹阳,继续北进。但从这附近开始小河多了起来,只有匆忙间临时搭建的仅能供人马通行的桥,屡次需要我们下车加固。我们还曾经进入无人村落,拆民宅的木板。渐渐到了黄昏,我们在村口的一间屋子里拿出了准备好的饭团。

尸体引来猫群

吃饭时看到前方的路上有狗一样的东西在动,我想会是什么呢?就用手电筒一照,竟然看见七八只猫聚在一具烧焦的尸体旁边。这可能是房子被战火焚烧时没来得及逃走吧。猫用发光的眼睛看了一下我们这边,但只是稍微动了一下,没有逃走的迹象。原来猫也没东西吃。老百姓一定是在十天前把所有的粮食都带走了。车发动后少佐也看见了这一幕,但只是沉默,什么也没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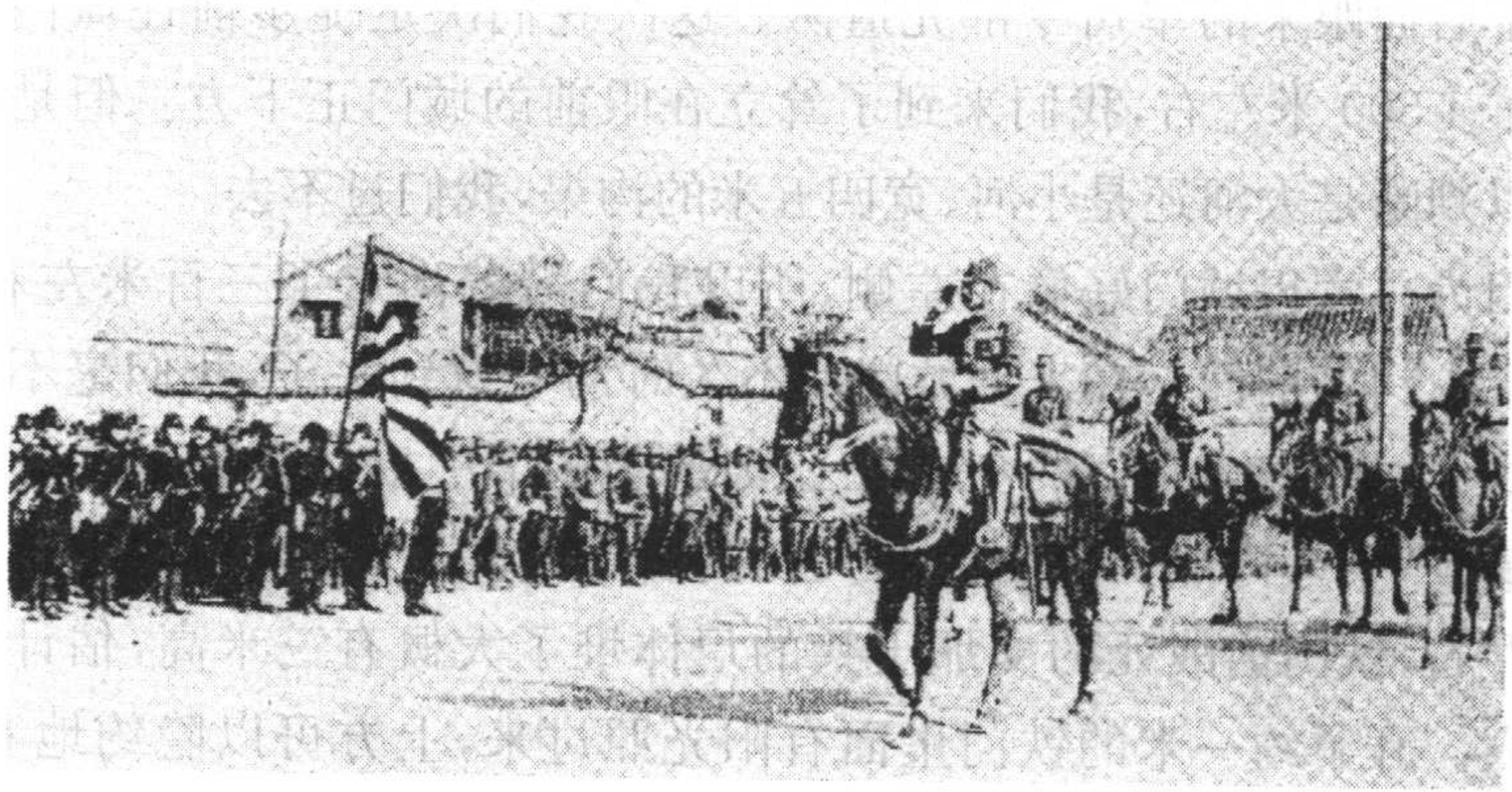
接着就是夜行军,少佐一边看着简陋的地图和指南针,一边指示前进方向。时间已经是9时多了。当来到据估计离丹阳还剩十公里左右的地方时,因为感到前方突然暗了下来,我猛然感到情况有变,大声制止司机说:“停!”但为时已晚,前轮已经伸出了堤岸,悬在了空中。我想如果大家都下车的话车子将就此落入河中,于是用预备的绳索系在后面的保险杠上,因为正好有一棵不太大的柳树,就把绳子的一端牢牢地系在树上,除了司机以外所有人都下车,我让司机倒车,同时大家一起拉绳子,好不容易把车往回拉了五米左右。少佐也对我的做法很满意,表扬了我。我以瞬间之差使大家脱离了危机。

12时30分左右到了丹阳。这之前不久在快到丹阳的地方遇见了夜行军的步兵联队。他们好像也前往丹阳。在丹阳镇的中央,白色的砖房里有“清”部队(修理汽车和补给燃料之处),经交涉我们决定把车停在这里。据车队的下级军官说,刚从前线回来的联络员说敌人在顽强抵抗,友军不断有人负伤。

我担心这样下去的话,也许就不得不在句容停留两三天以等待时机了。少佐睡在别的房间,我们四人则和衣而睡,醒来时天已经亮了。13

日,原田上等兵成了主要人物,我们用热饭和罐头填饱了肚子,补充了汽油和机油,9时不到的时候沿着通往南京的大道北进,每隔约一千米贴着一张白纸,上面有重藤支队画的指向南京的箭头,作为掉队士兵的路标。这条路虽然是地方上的道路,但很宽,行进起来很有效率。正午时分通过了句容,这里的飞机场比较现代化,面积很大,修整得很好。

下午1时通过了汤山镇。随着离南京越来越近,被破坏的桥梁也渐渐多了起来,只能下车渡河。这样,断定不能坐车行动的少佐返回了负责这方面的军司令部先遣队,归还了汽车,并指示原田上等兵等三人加入后续的主力部队,然后借了两匹马,少佐和我4时许在离南京八公里处的麒麟门向左拐,一边寻找可以通过河流的地方,一边前进。因为一公里的路程花了两个小时之久,所以冬天的太阳很快就下山了,周围变得一片黑暗。



首次进入首都南京

我想少佐那时才理解了这么做是有道理的,即考虑到可能会骑马行动,才选中我这个骑兵的。我们和马一起进入了路边的小屋作为今晚的野营地,晚饭吃了压缩饼干和罐头。在这之前我的头开始疼起来,脸发烫,自己也意识到发烧了。少佐在用手电筒看地图,但马上就注意到我的情况,他从里面的口袋拿出两片白色的阿斯匹林给我,说:“梶谷你感冒啦,好像在发烧。吃点这个看看。”我道了谢,在对少佐细心得连阿斯匹林都准备了一事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深受感动,觉得这就是所谓的军

人的谨慎。

我和少佐在小屋里过夜,我睡觉时用毛毯盖住全身,到了第二天,14日,头痛彻底好了,精神也很爽快,今天终于要进入盼望已久的南京城了。天气晴朗,给马吃了足够的食物和水,8时左右骑马朝着中山门疾驰而去。大约骑行了20公里,我们登上右侧的高地,少佐手拿望远镜说:“看见南京城了。”然后眼睛仍然看着前方,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处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凹凸不平的城墙。不知道城门是在左边还是右边,总之让我联想到了万里长城,胸中充满了终于千里迢迢来到了南京的感觉。

这时正好有一名身为联络军官的步兵中尉带了五六名士兵从我们想要去的城门方向走了过来,看见骑马的我们后说,城门关着,进不去,然后就继续前行,走到我们后面去了。于是我们不得已又折回去,把马还给了后面跟来的军司令部先遣队。这次我们决定徒步前往城门。大约走了1500米左右,我们来到了耸立在眼前的城门正下方。但是有一条难以判断是大河还是小河、宽四五米的沟渠,我们过不去。

因为总觉得城门好像在左侧,所以我们沿着沟走了三百米左右,来到了中山门的前面。在来到城门前不久时沟渠就到头了,我们毫不费力地来到了城门前。我们两个进入了微暗的城门中,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异样的情景,令人愕然。中山门的大铁门右半边关着,左半边向里打开了一米左右,铁门前战死的支那士兵的尸体堆了大概有三米高,估计有二百多人。开了约一米的铁门里面有阳光照过来,上方可以隐约地看见,脚下则比较昏暗,看不清楚。我和少佐两人开始踩着那些尸体往上爬,但因脚打滑而滑下来两三次。在尸堆的上部附近发现了像敌军军官穿的服装,所以就挪开其他尸体的腿,但是找不到中弹的伤口在哪里。也许是被压死的。从服装来看好像是名中尉。他右手拿着手枪,我就拿了过来,是那种枪身较小的捷克制手枪,在此后三年,一直到我离开南京为止,我用这手枪护身,片刻也没离开过我身边,我外出时必定带着它。我曾经在司令部的后院摆了一排空罐子进行试射,但因为治安比较好,所以没有实际使用过。

想来那些在中山门铁门附近的战死者尸体是大部队撤退时的殿后

部队,可以说是为了主力顺利撤退的牺牲品,一般认为战斗中撤退战比追击战难打。如果开始时就有生还的想法的话是完全无法完成殿后任务的。因此,据说上司往往难以决定其指挥官的人选。而我军在缅甸时的殿后,也可以找出很多应该反省的地方。这样想来,我觉得中山门的战死者虽然肯定是没有来得及逃走,但作为值得尊重的牺牲者,他们是达到了使大部队顺利撤退这一目的的一等功臣,全部应该被授予金鵄勋章。后来他们的遗体怎么样了。虽然我无从知晓,但现在有时眼前也会浮现出那些堆积得很高的尸体,在感到沉重的同时,也对他们的忠诚表示敬意。

下面说点题外话,我和少佐两人沿着宽阔的道路一直走到了市中心。我想有三公里。左右两边排列着气派的建筑物,像是政府机关集中的地方,好像还有军官学校。但是一个人影也没有,狗也看不见。在这个大都会完全看不见人的踪影不知道是可怕还是异样,仿佛完全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们从市中心往斜右方走的时候,后面来了一辆驾驶室顶上架着一挺轻机枪的军用卡车,我们拜托他带上我们去扬子江边的港口。司机拒绝说,如果他不按时去警备司令部的话会受罚的,但少佐写了一张便条,大意是因为战略原因借用这辆车 30 分钟左右,然后给了司机。即便如此,司机嘴里还是在嘀咕着些什么。我们约好把车开到南京西面的挹江门,但司机可能是不高兴,把车开得飞快,拐弯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甩出去。在开了三公里左右的时候,看到在和这辆车相同的前进方向上有四列敌军俘虏在被引领前行,大概有一个联队以上的人。

眼看着就超过了这些人,步行要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 10 分钟左右就完成了,到了挹江门,警备兵的车立即返回了城内。挹江门的铁门完全被打开,两侧站着手持刺刀的哨兵,但因为仅仅是攻陷后的第二天,可能警备力量不足,只有五个人,谈不上是卫兵。第二年的 2 月,设立了连卫兵司令在内共 15 人的卫兵所,这是后话了。我和少佐两人没有去下关(南京的港口),而是到处寻找部队住的临时宿舍。有一栋德国技师负责的发电站的房子,我们想这个应该可以,就上到二楼检查了各个房间。但是没有人,房间都是空荡荡的,令人扫兴。

傍晚4时许,铃木部队长和主力部队到了。副官说大概有十个人会从后面赶上来。接下去就是宿舍的清扫和厨房的设立等事,一直忙到了16日。

这位安达由己少佐出身工兵,是陆军军官学校26期学生,当时45岁左右。眼睛很大,安静中带有气度,脸色白皙,为人严谨,对部下很体贴。但听说后来在南方登陆作战时阵亡了,地点不明。就我来说受过他的很多恩惠,从他那里拿过阿斯匹林,对他有着无尽的思念。现在只有为他祈冥福了。

南京事件

被称为南京事件的事情实际上是有还是没有?根据支那单方面的报告,是20万或30万这样一个夸大的数字。究竟是不是如此呢?我和同事两人由于偶然的机会目击了这一事件,所以我想把在距今44年前的昭和12年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作一陈述,以明确其真相。

那是日本陆军的步兵部队所做的令人悲伤的事实,被称为南京事件的事情实际上发生过的。据说入城后不久,在南京市附近抓到的敌人俘虏达到了数万人。我们亲眼看到的人没有支那方面报告的那么多,我想最多也就三千人左右,但这并不确切。以后如果有当时的指挥官或者知道详情的人的证言的话,我想那是正确的。那些被俘的士兵是在我军进入南京时被捕的还是在上海到南京的路上被捕的,另外是在什么地方被捕的,我们一无所知。只不过那不是一般的百姓,而是支那军队的正规兵,这一点是没错的。我充分地考虑过,发表这一事实会对我国军队的名誉有重大影响,但事实就是事实,是不能歪曲的,另外在纠正众多错误的报道这一意义上,我也决心如实记述事情的本来面目,以明确其真相。

在进入首都南京后不久的昭和12年12月15日,凌晨2时左右,住在临时宿舍的我们听到了一阵猛烈的像是重机枪发出的枪声,我和同屋的轻部米三伍长两人觉得这个时候应该不会是敌人的袭击,就把手枪举在肩上,整装急忙赶往扬子江的港口。跑了相当远的路,大概有1000米,正好那个晚上是满月无云的冷天,月光皎洁,连草的影子也看得很清

楚,视野很宽阔,就算在 50 米开外也足以分清人的脸。

那是如今在日本几乎看不到的胜似白昼的惊人的月光。不久,我们知道了那枪声是怎么回事,对那骇人的场景感到愕然。那是正在处死敌军的俘虏,他们被迫站成四列纵队的行军队形,虽然脚是自由的,但是手被反绑着。纵队沿着马路弯弯曲曲地向后方延伸。纵队的两侧每隔四五米左右就有一名手拿刺刀的监视哨兵,只要有人稍微说点话或者弯下腰,他们就会无情地拿枪殴打。他们被迫半步、一步地前进。下面讲一下处死的方法。执行任务的是两挺重机枪,那时正好是扬子江的枯水期,在岸和江水之间是四五十米的臼钵形的底,他们就被赶到水边。两挺重机枪微微向着下方开火。其间隔大概是五米左右。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对于即将到来的死亡,或是绝望地认为已经毫无办法了,或是试图想办法从九死中得一生而跑下坡道。

我看见其中八成都成了重机枪的牺牲品,剩下的人拼命地解开绳索,飞快地跳进了水中。已经顾不上彻骨的寒冷了。但重机枪并没有继续向他们射击,因为没有空闲。跳入水中的人游了很远才浮出水面,在急流中向下游游去。因为月光很亮,所以看得很清楚。我想那些人运气不错,心头感到一阵暖意。岸边的尸体逐渐增多,那种情景直到我死都不会忘记,极其深刻地留在了我的印象里,就像发生在昨天的事一样,怎么也不觉得是 44 年前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也是个军人,已经做好了死的心理准备,所以想努力保持平静,但还是完全被这种场景惊呆了。我稍稍侧过身子,觉得这肯定是一个梦。为了不让监视哨兵发现,我稍稍低下头,相当用力地拧了一下脸颊,感到痛。而且旁边还有轻部伍长。这不是梦而是现实。但我想,真是遭遇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

我很想知道这个行刑部队的现场指挥官是什么样的人,于是前进到了离不断开火的重机枪五米左右的地方悄悄起身想确认一下,一瞬间看见了军官外套上的少尉、中尉的肩章。我想军官有三人,但也许是四人。但好像没有大尉级别的军官。射手好像不时地更换,一挺机枪有三人,一共六人,我觉得是伍长和上等兵。也许还有更多的替补士兵。虽然看到了步兵的领章,但联队的番号和我们一样都摘掉了,所以无法判断是哪个联队,到现在也不清楚。

话归原题,我并没有特别打算去确认到底有多少俘虏,不过走了七八十米去后面的队伍看了一下,其数量出乎意料地多,一直延伸到对面,我越发觉得不得了。这期间重机枪的声音没停过。

过了30分钟,我惊魂未定地对轻部伍长说:“可真不得了啊。把这事讲给谁听都不会相信吧。”我在和缓慢行进中的队伍并行回到机枪旁的途中,兴致勃勃地观望了俘虏的样子。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都光着脚,没有帽子,没有佩带任何表明级别的东西。和日本军队一样剃的是光头。经确认全部是军人。队伍中有时可以看到蹲着的人,不知道是累了还是讨厌走路。其中还有哭出声来的人。日本军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哭吗?不过这样做的仅有四五人,大部分人不知道是不是月光的原因,看起来脸色苍白,好像已经绝望了。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在队伍的左侧行走,我发现在四列纵队从右数第二列中有一个个子特别高、骨骼强健的男子,他给人感觉非常沉稳、优秀。一眼就能看出,很明显是一位军官,年龄约45岁左右,据我判断他不是尉官,是少佐或更高级别的人物。我想他可能是接到了死守南京的严格命令,承担了殿后这一重要任务的指挥官之一吧,然后才成了今天这种结果。他肯定应该是“军官学校”(相当于日本的士官学校)出身吧。给人感觉他对一切都持达观态度,月空下他的风采让人觉得他很值得信赖,肩膀的宽度也正合适,一脸凛然,甚至让我产生了不禁要行举手礼的错觉。我觉得很可惜。那张脸至今还留在我的眼中,虽然不是我下的手,但有时还是觉得对不起他。

他对抱着以上想法在看着他的我毫无兴趣,不知道是在思考自己人生的过去以及不久后的命运,还是在考虑完全不同的别的事情?他脸微微朝上,而且甚至感到他脸上浮现出了一丝微笑。我很挂念他,在离开了队列后也回头看了他两三次。虽然令人悲伤,但也只是凄惨的战场上的一个棋子,我现在都记得很清楚。这时我和轻部伍长来到现场已经20分钟左右了。虽然我无从知晓轻部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来目睹这一情景的,可能只说了一句:“可真不得了啊。”就因为过于震惊而说不出话来了。

我们决定在纵队的左侧沿着队伍回到机枪那边。那时一名手拿刺

刀的监视哨兵看到我戴着骑兵的领章和军曹的等级章,于是立即断定我们是其他部队的人,他微微点了点头,小声说:“我不认识你啊,不过这是上面的命令,你们去别的地方吧。”这肯定是对我们说的。我想这也难怪,就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如果是年轻的现役士兵的话是很难说出这句话的。也许他是年近三十的应征兵吧。是上等兵还是一等兵我不记得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出这么镇静的话,他一定是参加了南京到上海之间的各地的战斗,赌上性命走到今天的身经百战的勇士。在家乡妻子还在等着他吧。这名监视哨兵是什么样的心境呢?我想应该很复杂。

天突然冷了起来,所以我们开始返回临时宿舍。但枪声仍然毫无间断地持续着。那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俘虏的队伍中发出了两三声高亢的叫声,紧接着七八个人带着绳索或者挣脱开绳索,开始向着江的相反方向也就是城门方向跑去,简直就像逃跑的兔子。在月光下看得很清楚。监视哨兵迅速用步枪朝逃走的俘虏开了五六枪。但这时在机枪附近的一名军官斥责道:“不许打!”也许他是担心会误伤友军。这期间眼看着逃走俘虏的身影越来越远,不久就在视线中消失了。他们完全达到了目的,捡了一条命。但是以后怎么办?就算能过两三天,但是没有粮食,怎样逃脱日军严格的警戒?当然他们白天是无法行动的。他们怎样越过城墙呢?

因为他们能够忍受困苦,所以我想,他们中有几个人会绞尽脑汁地平安脱离了生命危险,混入了市民的人群中。而且那一情况也一定被毫无遗漏地报告给了支那方面。有谁会想到,这在八年后日本战败时会成为重大的国际问题呢。

尸体处理班

12月26日,经决定要清除堆积在港口的大量的行刑后的尸体,由于这之前在为设立司令部做各种准备,所以一直没着手清除工作。在前一天也就是25日,司令部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命梶谷军曹带领士兵10名、苦力40名进行港口尸体的清除工作。

需要用的机动船和各种工具应与工务课联系,迅速筹备。有关细节由副官指示。”于是我从26日清早开始接收了所需人员,在左臂带上“尸体清扫班长”的袖章,在五艘机动船(这种机动船是木制的,有大小之分,后部装有柴油发动机,发动的时候要用手用力向右旋转。我们俗称它为大蜻蜓)上各自安排了两名士兵和适当的苦力,让他们拿着赶制的在两米左右长的棍子上装上L型金属钩的“救火钩”,一边操纵机动船,一边不停地把尸体拉过来,然后让它漂到江面上去。虽然是冬天,但自行刑以来已经过了十天,所以那种尸体特有的恶臭很刺鼻,而且交通也不方便,所以进展很慢,好像直到第三天的正午时分才结束。这样,港口码头终于得以毫无障碍地装卸货了,这时已经开始准备徐州作战了,其后每天频繁地从入港的大船上卸货。

舢舨横靠在栈桥上,宽50厘米、长5米左右的木板被架在支柱上当成踏板。以大米等为例,两名苦力从两侧用“鹰嘴钩”把米袋抬到略微弯下腰的负责搬运的苦力肩上,这时监视哨兵就递给他一根用来确认数量的竹制的棒子。递这个棒子的士兵叫做计数员。那时搬运机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全靠人力搬运。我少年时在大阪见过码头装卸工像他们一样用肩膀扛东西的劳动场景。总之超过300人的苦力在那座木板桥上排成一行纵队,肩上扛着米袋,一手拿着竹棒,每迈一步就“嗨哟”一声喊着号子,一边喊一边向岸边的堆集地走去,这种情景就像蚂蚁在行进一般,看起来很壮观。闲话少说。

关于尸体的处理我曾经想过。暂且不提南京事件为什么会发生,而只说这里曾经有过大量的尸体这件事。看见这些尸体的人是我们司令部的所有成员以及来进行联络的一部分军人,我想这里的问题是40名苦力确认了这件事。他们一定作证说,自己在日军的监视下将尸体挪到江面上去。另外,也许有人悄悄地仔细数了一下大概的数量。还有,可能有其他人拍了现场照片,这可能是日军中的某人拍的,中国方面做不到这一点,如果被发现的话会倒大霉的。清除尸体的时候我也充分注意了,恐怕将来不会有照片证据。此前我曾经看过香港的周刊上有关南京事件的照片,完全是胡说八道,不是那样的。

到这里我亲眼所见的事件的始末就结束了,这是我所见到的原原本

本的东西,没有任何夸张。虽然还有点想补充的,但由于篇幅的原因就不写了。用一句话来总结,纵观整个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期间,这起事件无疑是罕见的大事件。

但是,这种事件只把战败一方所做的提出来,而战胜国同样的行为却全部被隐匿起来,没有发表,并且严禁发表,这不公平。战胜国一方的态度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令人无比愤慨。

我国的玉碎部队在太平洋诸岛,特别是在新几内亚东部附近的结局如何呢?敌人对用完子弹进入壕沟的日军喷射火焰,没有留下一个人,全部消灭。另外在战争末期的缅甸内地,据说中队或大队那样的大部队就那么失去了消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结局。还有美军投下原子弹的大罪又怎么样呢?那是涉及老人、妇女、孩子等二十几万非战斗人员的悲惨杀戮,而且还有现在仍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数千人。可能是对友好国家有所顾虑吧,几乎看不到指责,这是怎么回事?我从心底感到愤怒。

最后对敌我双方光荣的战死者的英灵表示景仰,称颂他们为了各自祖国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崇高精神,祈祷他们的灵魂永远安息。

和我一起先行去南京的安达由己工兵少佐后任独立工兵第十联队长(中佐),昭和17年8月在达沃转任其他部队长。昭和18年在登陆作战中战死。另外文中提到的轻部米三军曹回国后于昭和35年4月病死在大阪市南正鰻本东町之町。他家人现在还在。

[产经新闻生活情报中心编:《骑兵第四联队史》,

大阪骑兵会总部发行,1981年11月3日。]

(李斌 译)

15. 我们在中国干过的事

——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人们

(前略)

第一章 南京事件和三光战术

——不可饶恕的罪恶

在东京都杉并区老人保健设施的一个房间里,永富浩喜(别名博道,84岁)坐在床边,妻子光野(76岁)躺在床上。永富曾两次因脑梗塞倒下,走起路来显得步履蹒跚,躺在床上的妻子也患有糖尿病等疾病,还患有白内障,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妻子讨厌我告诉别人自己在中国做过的事。”永富边说边注视着妻子的身体。

去年(1999年)12月,永富讲述了自己很久以前的战争经历。他坐着轮椅合掌出现在台上并开始讲话:“有人说‘没有南京大屠杀’,但是,我自己当时就在南京杀过中国人。还多次耳闻目睹了屠杀。我还活着,我觉得将自己的罪行告诉大家是我的使命。”他凝视着远方,回忆着久远的昔日往事,寥寥数语,却中断多次。同时,他因悔恨自己的行为而流下了眼泪。

在南京第一次杀人

1916年3月永富生于熊本县阿苏町,兄弟姊妹六人,他排行老大,父母在火车站前经营一家旅馆。他自小体弱,父亲对他进行彻底的斯巴达式教育,并反复告诉他:“在这个世界上,天皇陛下是最伟大的。”13岁时,全家迁移到日本侵略统治下的朝鲜平壤。17岁,中学毕业的永富独自回到国内东京。1934年进入“国土馆专业学校”(现在的国土馆大学),师从一贯倡导“忠君爱国”的同县人蓑田胸喜教授,由于一次次被介绍给当时

的“右翼”而扩大了人际关系。同时,他七次拜访右翼大人物——头山满的家,并成了他的门生,坚定了军国主义思想信念。

1937年12月,永富作为“爱国学生联盟”国土馆的代表,和其他11所学校的代表一起由上海去南京进行考察和慰问旅行(到达南京是12月下旬)。随着火车接近南京,他惊愕地看见铁路两侧逐渐增多的中国人尸体。

一天,他们被领到南京难民区(安全区)。尽管是寒冬腊月,穿着破旧衣服的中国人仍然躺在水泥地上。还看到为领取“良民证”而通宵排队的人们。他想,这是因为反抗日本军队才弄成了这样。

永富回忆着当时情景,流着眼泪说:“当时,对中国人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在这个难民区里,一个日军军官对两百来个中国人说:“皇军进了城,已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日本军队要发给大家‘良民证’,让你们自由回家。可是,这里如果有国民党军队的士兵,要出来告诉我们。因为有人受蒋介石的欺骗,可能好几个月没有领到薪水了。由我们来发给未付的薪水,我们还帮忙介绍工作。”于是有七八个男子上前表明自己身份。军官命令他们:“上卡车!”又对永富等人说:“东京学生也一起上去。”

这七八个中国男子和永富等十二三个学生上了没有车篷的卡车。随后,刚才那个军官和其三四个部下也一起上来了。卡车开始高速行驶。

刚开到离长江不远的下关附近,同车的日本士兵同时双手抓起自己的钢盔猛击坐在车厢板上中国人的脑袋。中国人蹲在车厢中忍受着殴打。永富说他为突然发生的事感到吃惊,只是在一边看着。

到了下关让他们下了卡车,并把他们领进四周用许多苇席围住的地方,让他们一个接一个进入仅供一人勉强才能通行的通道。据说,通道两侧扔着数千具冻僵的几乎裸体的尸体。往前走二三十米就到了江边。不远处,从中间断开的栈桥悬吊在江面上,大概是被日军炸断的吧。

到了那里,那个军官向永富等学生们说:“你们就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试着杀了这些家伙!”学生中有不少人擅长空手道和柔道。于是有几个人上去击打中国人,尽其所能地拳打脚踢、连摔带掳。但是,不管怎么

打也没能杀死。永富说他当时没有参加。

过了一会儿,军官让一个中国人来到前面跪下,然后拔出日本刀,对永富等学生说:“你们好好看着!因为俺现在要干的是‘试劈’,你们就带着这一旅途见闻回到东京去!”军官绕到中国人背后,“呀!”地大吼一声,同时挥刀向脖子劈去,头颅咕咚一声掉在地上,刀口处喷着血沫,身体扑通一声向前倒去。

看到这一惨状,跟在后面的中国人惊恐地跑起来,从要断裂的铁桥上跳入江中。永富马上借了一个日本士兵的枪走上铁桥,朝着浮在水面上的男子打了一枪,那男人身上流着大量的鲜血,顺着江水向下游漂去。

“刚开始是害怕得发抖,但我在国土馆是剑道四段啊,所以我想,不能让别人看出我胆小……就杀了人。”这样对我说完后,永富就紧紧地闭上双眼,咬紧牙关,流着眼泪叹了口气。他说,剩下的中国人也确实当场都被杀掉,但怎么杀的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自愿刺杀俘虏

1938年1月,永富回日本后,立刻前往上海。提起当时的心情,永富闭着双眼开始吟起了诗:

西去一苇通大陆

……

月儿从东照到西

月儿从东照到西

我以为,惟有拥戴天皇陛下的神国日本才应该统治亚洲,然后统治世界。去惩罚反抗这一宗旨的中国人是自己的使命,于是再次去了中国。当时,大学寄给我“回来接受毕业考试”的通知,但我想,国家处在这么重要的时刻,毕业之类的事就随它去吧,就没有回去。后来,由于我文武两方面成绩都好,毕业得到了特别认可。

从1938年2月到1940年末,我作为军队的文职人员,在上海、吴江、安庆的特务机构等部门从事情报收集和民众工作。有时也拷问中国人,

将中国人捆起来用棍棒殴打。

1940年末,回了一趟熊本,过了两个月又返回中国。然后从1941年4月左右,在山西省河津县的第三十七师团第三十七旅团第三大队第三机枪中队接受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训练的最后阶段是用刺刀真的刺杀双手被反绑在木柱上的两个中国人。在一个中队二十来人的新兵里,我经常得到长官夸奖:“永富是最优秀的。”因而感到自豪。所以,自愿第一个用刺刀刺穿中国人的心脏。

“当时是什么心情呢?”我问他。永富低着头,呼吸慢慢地急促起来:“那种事……不能说啊!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岂止是残酷啊!”说着说着便老泪纵横。他向前张开双手使劲摆动,头也一个劲儿摇,拒绝回答我。

忠实地执行三光作战政策

永富在山西省内先后待过几个部门。有第三十七旅团司令部情报室(1942年初至1944年1月左右)、霍县保安大队四县联合联队(1944年2月左右至1945年1月左右)、第五独立警备队第二十七大队本部情报室(1945年1月左右至日本战败)。但他几乎都是作为独立部队的部队长,领着二三十人在山西省内四处作恶。“根据上面命令,吩咐部下(在‘敌对地区’)看到中国人就杀掉。”回顾当时的情景,在被日本军队认为是抗日根据地的地区,有组织地进行了所谓三光作战(当时称作全灭扫荡作战)，“杀尽(杀光)、抢光(掠光)、烧尽(烧光)”。永富是忠实执行者并且也成了领导者。

1943年10月,永富部队突袭山西省沁源县自强村,将妇女儿童共计11人推进室内,往里塞入木材和干草再点上火,用大石块堵住出口。当时,11人中有就8人被烧死,3人保住了性命。活下来的人中有个叫党翠娥的妇女,在逮捕永富后的1956年6月,在太原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作证。我迄今仍然忘不了当时的情景,那位妇女号啕大哭着来到被告永富面前,诉说包括自己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侄子等共八人被永富这些日本兵烧死了。永富跪在地上流着泪不停地谢罪。

“她的话,我都明白,能够充分理解那种痛苦。不管怎么向她道歉,

死去的孩子们是回不来的。所以我感到实在对不起她。”永富回想起当时情景眼泪汪汪地说。

他说,同一时期,在一个小村子里还逮捕了两个二十来岁的女子,怀疑她们是“共产党工作人员”。永富让部下在地里挖了个方坑,将两个女子推进去。两个女子在坑中死了心地闭上眼睛,端端正正地坐着,并说着什么。永富和几个部下用铁锹不停地往下填土,活埋了她们。她们既没哭也没叫,被埋进土里时,仍是一副仇恨的表情。

另外,那个时期在闻喜县、绛县等地,永富部队经常将几个或二十来个中国人当作抗日嫌疑分子监禁在地牢里。而且,每次从牢里提出审问时,都用棍棒、鞭子殴打。有时,用烧红的铁棒去烧身子。有时,让他们喝大量的水后再踩踏肚子令其吐出来。就像这样连续进行拷问。永富作证说:“他们太虚弱了,最后就带到外面,命令部下用枪或其他武器把他们杀了。”

永富部队就这样实施“三光政策”,在山西省内的“敌对地区”袭击村落,拼命杀人。虽然他说:“干了的确很残忍的事。”但他的罪行并不仅限于此,他亲自动手杀的、加上命令部下杀的中国人有近三百人。

以下介绍一下经过上述法庭核实的、有关永富的部分罪行(全部发生在山西省内):

一、1943年3月,在闻喜县南白石村,拷打、杀害村民12人;在盖寒村杀害村民13人;在元凹村杀害村民8人;在汾村杀害村民5人;在界元村刀砍32人,杀死29人。

二、1943年2月,在闻喜县下峪口村,永富自己将刺刀戳进三个村民的屁股并将其杀害,部下也用同样的方法杀害了其他五人。

三、1943年3月,在闻喜县横水镇,永富拷打一个村民后,将其绑在马车上拖着来回跑,最后命令部下将其枪杀。

四、1943年10月,在沁源县正中村杀害妇女儿童等十几人。

五、1944年10月—11月,在霍县朱家庄村和李润村,永富这些人在各村将村民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地拷打并杀害;在贾孟村、张望村、靳壁村将村民一个个地杀死。

六、1942年冬天,在闻喜县小山村,永富拷打一个男性村民时,用烧

红的铁棒插入大腿，烧掉阴茎后杀死了他。

“我干了惨无人道的事。”永富说着低下了头。他说，根据上级指示，有一段时期他们彻底实施了这种“三光战术”。听说周围其他日本军队也干了相同的事。

每天都在进行思想斗争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日。可尽管如此，永富却认为：“为天皇而战的真正战争不是现在才开始吗！这样怎能回日本呢！”于是为实现“天皇的‘确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愿望”而留在了山西省内，协助阎锡山率领的山西军队对抗共产党军队。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军队解放了中国大地，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次年12月，永富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收容在河北省的训练团许多年。1946年结婚的妻子ミツノ也带着两个女儿被收容在另外的建筑物中。

他们在那里学习历史、世界形势等。每天的主要活动是做搬运砖头之类的简单劳动。同在训练团的人，也相互进行一些交谈及互相批评。可是，对于像永富那样经过千锤百炼的“忠君爱国”者来说，中国方面为恢复人性所做的教育毫无效果。据说，在“坦白罪行”活动之前，永富从未交代过自己具体的罪行。

提起那时的心情，他说：“当时我认为，我是为天皇而杀了许多中国人的国家英雄，完全没有罪恶感。许多年来，思想认识和以前几乎没有改变。”于是，永富被送进集中看管的“直属中队”，那里关押的都是罪大恶极且死不认罪的人。

1952年12月左右，以永富等“直属中队”为中心的一百三十余人被集中在广场上。接着，永富第一个被叫到名字，并当场戴上了手铐。其余几十个人也同样被戴上了手铐。

永富等人就那样被移到太原战犯管理所。在那里，没有劳动，每天进行读书之类的学习。学习有关社会结构、历史等内容。而在进行这种学习的同时，吩咐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写在纸上交上去，就是坦白交代。据说，永富起初毫无罪恶感，认为：“俺是为天皇尽忠而杀

了许多中国人的。俺是国家英雄。”因为永富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就将想到的罪行全写出来交了上去。虽然多次要求他重写，但第一，他根本没有做了坏事的认识；第二，他写的罪行太多。因此每次重写他都因很难详细回忆起具体事情而苦恼。

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指导员和班长们忘我奉献的帮助下，就连这样的永富的心也被温暖了。开始能客观地一点点思考自己的行为并理解中国人的痛苦和愤怒了。一旦认真地回忆那一桩桩罪行，自己也对其数量之多和其状之惨而感到吃惊。那时他不停地流着悔恨的眼泪。

“我每天都进行思想斗争。因为接受并实践过彻底的军国主义教育的人，哪能那么容易改变呢。太原时期的认罪意识，我认为还只是初步阶段。”永富就这样分析当时的自己。

1956年6月，如前述那样，永富被起诉并受到审判，处以13年（从逮捕之日起）监禁，被宽大处理了。随后被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重新学习，1963年9月被释放并允许回国。其时，永富已经47岁了。

终身继续学习认罪

回国后，永富必须立刻担负早期回国（1953年）的妻子和三个女儿的生活。可是，他不仅什么技术也没有，而且还被警察到处跟踪，因为被当作“被中国共产党洗过脑的危险人物”。警察甚至还屡屡到他的工作地点去，使得他不得不经常换工作。不得已而取得针灸师资格，在东京都杉并区开了针灸治医院维持生计。随后，他立志不再造就和自己一样的军国主义者，不再发动侵略战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中归联）的同伴们一起开展活动，在全国巡回演讲自己的战争体验。

但与此同时，他仍然为不能彻底认识罪行，不能心服口服地认罪而苦恼。因此从1989年3月6日起，独自一人徒步走访了分散在日本全国的数百名中归联伙伴。永富有效地发挥了与生俱来的体力和行动能力，背负着几十公斤重的背包从北海道出发，日复一日地走访同伴，交流“我们的战争责任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做才是认罪？应该做什么？”但出发两个月后的5月6日，在去访问住在新泻县的第57人的途中，因急于

上楼而导致腰骨折,不得不取消了旅行念头。

随后在1991年10月,永富和一起收容在太原多年的汤浅谦等人,访问了太原解放纪念馆。永富想让最小的女儿知道自己的罪行,就带着她一起去了。在那里,向纪念碑献上从日本带来的谢罪书,为自己所犯下的无数罪行流着泪进行道歉。汤浅说到当时的情形说:“永富先生看上去的确非常痛苦,是在由衷地谢罪。因情绪过于紧张和激动,归途中他多次吐血而被送进了医院。”

即使到现在,永富仍然珍藏着1963年回国前考察南京时带回来的石头。他显得很郑重的样子给我看了放在玻璃瓶里的六七块石头。他对我说:“当时我想我在此犯了罪,在今后的日子里决不能忘记这些,于是便带回了这些石头。”

他说,一遇到痛苦的事情,就看看这些石头勉励自己。“我正在考虑,最近和中归联的伙伴去中国时,希望那儿能接纳这些石头。”永富两眼生辉地说,并用迄今为止没有过的生动表情微笑着。

我在想,他现在已经很少离开这老人保健设施了。尽管如此,他还是希望亲手清除自己人生的症结。

(下略)

[星彻:《我们在中国干过的事——中国归来者联络会的人们》,
绿风出版(东京),2002年5月15日。]

(罗文文 译)

16. 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

奥宫正武

(前略)

一、空中目睹的南京攻击战

昭和12年8月中旬,日中两国军队在上海开始了军事冲突。日本为此派遣松井石根大将率领上海派遣军与敌作战,虽然作战得到了以航空部队为主力的海军部队的配合,但直到11月上旬为止,派遣军一直处于苦战的境地。

为了打开苦战的局面,11月5日,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抵达杭州湾。结果战局渐渐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到了11月末,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一起成功地进入了太湖以西的地区。

11月29日,占领了南京以东约二百七十公里的常州;11月30日,占领了地处上海和芜湖之间的广德,因而使得海军航空部队在中国华中地区的作战变得容易起来。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事变长期化,11月20日,东京方面在宫中设立了大本营。

同样是11月20日,由第三、第四舰队组成了中国方面舰队;12月1日,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组成了华中方面军。中国方面舰队的司令官为长谷川清中将,华中方面军的司令由松井石根大将亲自担任。

12月1日,大本营陆军部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发出了奉敕命令:“与海军配合进攻敌国的首都南京。”同一天,大本营海军部也向华中方面舰队司令官发出了相同的奉敕命令。

注:之后才得知,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华中地区不利的战局判断,于11月19日决定将首都迁移至重庆。但在一段时间里我方并不知道

这一决定。

当时,配合这一方面的陆军地面作战的主要是在上海公太基地的第二联合航空队,其司令官是三并贞三少将。这支联合航空队是由第十二、第十三航空队组成的。第十二航空队司令是三木森彦大佐,第十三航空队司令是千田贞敏大佐。

第二联合航空队以这两个主力航空队持续对南京进行了空袭。到9月25日,我方的空袭成功地歼灭了南京的中国航空部队。此后我航空部队接到上级命令,继续支援陆军部队向西进攻。接受这一命令后,三并司令官于9月30日下令,命第十二航空队配合第三师团的战斗,第十三航空队配合第九师团的战斗。

我前往上海的公太基地赴任是在12月5日。

根据同年7月11日陆海军首脑部的协定,进攻南京的航空作战由海军航空部队担任。协定中这样写道:“华北方面,歼灭敌方航空兵力的任务主要由陆军承担;华中、华南方面,歼灭敌方空军兵力的任务主要由海军承担。陆军承担用于自卫的航空作战任务。”因此,我到上海赴任之后直到占领南京为止所见到的陆军飞机,仅仅是12月12日在常州基地见到的两架九四式侦察机。

12月6日,我到上海赴任仅仅六天后,就率领六架九六式舰载轰炸机参加了对南京对岸的浦口火车站的轰炸。这是为了阻止中国军队渡过扬子江撤退的行动。

12月7日,向上海进发,并以从前一天开始可以使用的常州基地作为中转站,在轰炸了地处距芜湖较远的上游位置的安庆飞机场之后回到上海。

12月8日,进入常州。以常州为基地,轰炸了处于第九师团(该师团正在向南京方向进攻)前面的敌军阵地。

12月9日,这天我没有轰炸任务。第十三航空队的七架九六式舰载战斗机与第一联合航空队的12架九六式陆上轰炸机一起对南昌实施了轰炸,获得了重大战果。在这次轰炸中,我目睹了桎村驾驶的飞机在失去了单边机翼的三分之一之后,经过百般艰难的挣扎,在好不容易降落到公太基地时,飞机翻了个跟斗几乎毁灭。

12月10日,我率领六架舰载轰炸机向上海方面飞行。在南京附近,对第九师团前方的光华门进行了轰炸。此时才知道,该师团的先遣敢死队是胁坂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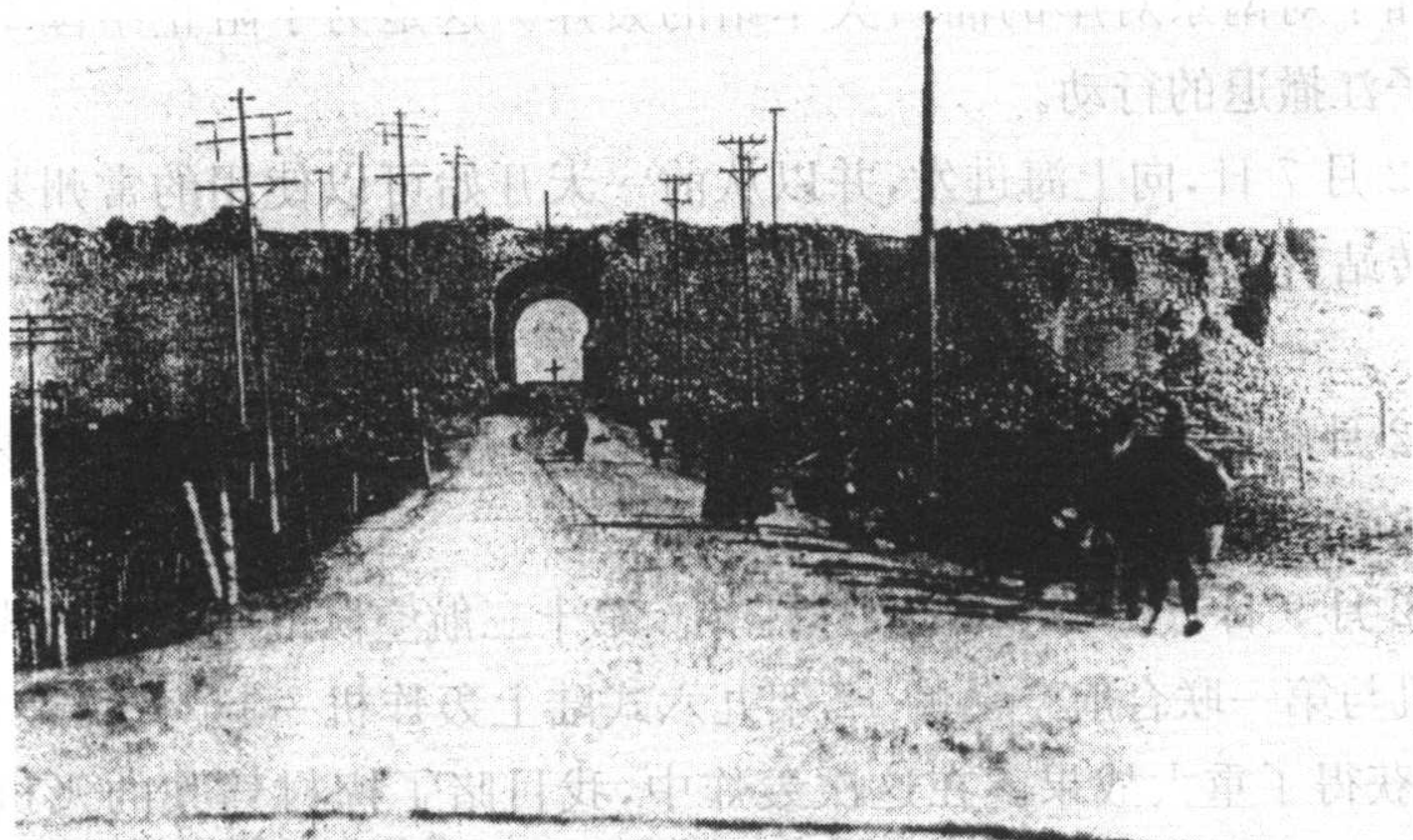
12月11日,我率领舰载轰炸机,轰炸了南京城内的故宫飞机场。那里有中国军队的炮兵阵地。

12月12日,我率领六架舰载轰炸机向上海进发,在对南京城东的中山门进行了轰炸之后,在常州基地着陆。紧接着收到了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的青木武海军少佐,向在常州的第十二航空队司令三木森彦大佐发出的作为陆军司令部的紧急请援书,请援书中这样写道:

“满载着残败兵和伤残兵的中国船队正沿着扬子江向南京上游逃跑。由于陆军没有攻击的手段,希望海军航空部队予以攻击。如果该攻击得以成功,陆军不胜感激。”

接到紧急请援书之后,三木大佐决定,以在常州可以出动的全部轰炸机对敌人的船队进行攻击。

参加这一攻击的有:第十二航空队的潮田良平大尉率领的九五式舰载战斗机9架、小牧一郎大尉率领的九四式舰载轰炸机6架;来自第十三航空队的由我率领的九六式舰载轰炸机6架、村田重治大尉率领的九六式舰载攻击机3架,共24架飞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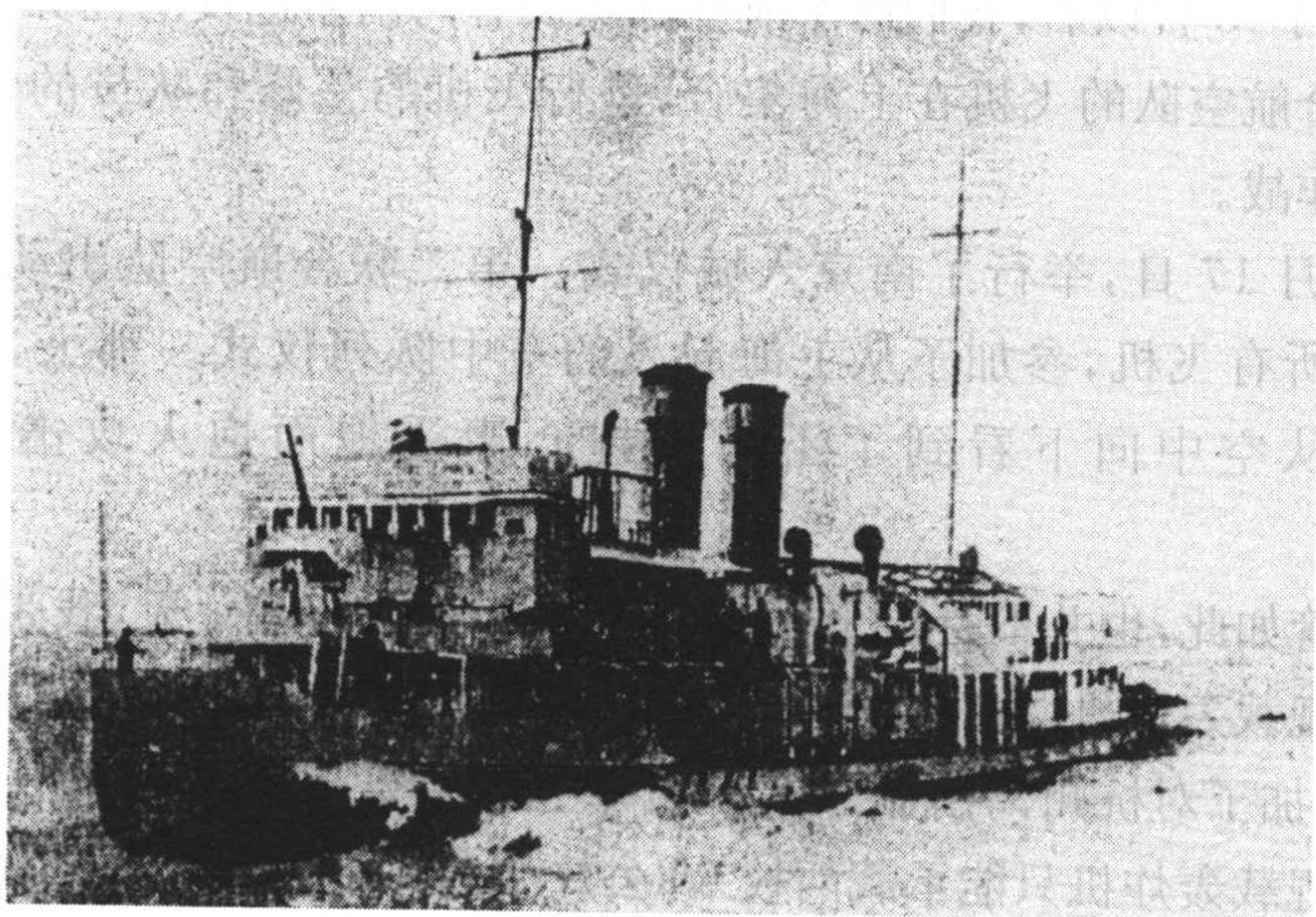
1938年1月前后的南京光华门(第十五航空队摄)

那天,南京上游一带天气晴朗,能见度极佳。

各攻击部队由于非常信任陆军所提供的情报,做出了没有必要对目标进行确认的判断,从3 000—4 000米的高度进行了轰炸,并在南京上游大约二十八海里的地方发现了四艘船的船队。第一个投弹的村田重治大尉编队的炸弹击中了在最上游的船只(之后判明是美国炮舰“帕奈”号)。之后的舰载轰炸机的轰炸和舰载战斗机的扫射将所有四艘船只全部击沉。

我的编队离开现场时,有一艘船只没有沉没。第一个回到基地的我向三木大佐报告了此事。大佐立刻向我的编队发出再次返航将其击沉的命令。

我的编队又一次回到现场的上空,那里已经没有了那艘船的踪影。上游也没有。于是在向南京方向继续搜寻敌船的飞行中,在南京上游约十海里的地方发现了四艘与刚才看到的几乎同样大小的船只。我立刻急速下降,将携带的两枚60公斤级炸弹中的一枚投向其中的一艘船。就在将机头回升的瞬间,我发现了该船甲板上的英国旗帜。我大吃一惊,立刻命令后续的其他飞机停止轰炸。所幸的是,后续的五架飞机中跟在我机尾部的三架飞机都停止了轰炸。



美国炮舰“帕奈”号

接着,我集合起全部的飞机,朝着南京方向飞去,将剩下的炸弹投在了激战中的光华门内侧的阵地上,之后回到了已经天色昏暗的常州基地。基地中的全体人员都喜形于色地庆贺这次攻击的成功。那天夜里,我在大火之后残留下来的中学的教室里忍受着寒冷,穿着飞行服而卧(关于此事将在第六章第三节中追加详述)。

第二天(13日),因为寄希望于陆军部队突入南京城内,所以没有进行空中攻击。就这样,伴随着对南京的进攻,我的航空攻击任务结束了。

二、第一个到达大校场飞机场

我们海军的飞机机组人员对地面战的大致情况看得很清楚,所以对陆军部队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具体地说,比如我们看得出上海派遣军从南京的东面和东南面、第十军的主力从南京的南面和西南面朝着最近的城门前进。在当时,我特别关心的是在第九军团进攻的光华门和第十六师团进攻的中山门附近发生的战斗。

12月13日以后,我们海军航空部队没有向南京进发的任务。因此,第二联合航空队的飞机在上海集合,进行飞机的整修和队员的休养,以备下次作战。

12月17日,举行了南京入城仪式。第二联合航空队出动了可以出动的所有飞机,参加了从上海起飞的空中队列仪式。那天,我终于静静地从空中向下看到了不用再担心遭受地面炮火攻击的南京市内。

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上海就完全没有战斗。有一天,我带领部下的六架舰载轰炸机,在三架第一联合航空部队的九五式地面攻击机的掩护下,参加了对杭州湾南岸以南铁路线上的主要火车站的攻击。当时,我们的舰载轰炸机只能承载两枚60公斤级的炸弹,因此,目睹九五式地面攻击机一架接着一架连续不断地投下24枚60公斤级的炸弹时不由得十分惊讶。

17日的人城仪式之后,南京城内看上去还进行了清剿和战场打扫。不过,这可以说是暂告一个段落了。

三并少将命令第十二、第十三两支航空队向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进发。尽管南京城内的东南部有故宫机场,但是该机场太小,不能用于作战。

12月24日下午,我率领六架九六式舰载轰炸机从上海出发,先于陆海军的航空部队向大校场机场进发。当时,由于地面人员晚到了,所以飞机场内不见一个人影。因此,我们在上空非常仔细地确认了之后才降落到地面。

飞机场上的很多的建筑物从外观上来看,由于遭到我们海军航空部队的反复轰炸,所以被破坏得极其严重。

这种事态暂且不论,自从到上海赴任以来,我常常想起众多在进攻南京中阵亡的战友。因此我决定在进入南京之后尽快地找到战死者的遗体、遗物以及他们驾驶的飞机的下落。因为在他们中有我熟识的前辈和同事,还有作为部下的下士官兵。

于是,飞机一着陆,我立刻留下十个部下守卫飞机,我同一个部下徒步在飞机场内转了一圈。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悲惨的场面:一组战斗机机组人员被铁丝反绑着双手,已经死了。接着看到了舰载轰炸机机组人员的两具尸体,看上去他们还保持着飞机坠落时的姿势。

(注:在我们进入之前,陆军部队已经做了埋葬被遗弃的尸体、修补飞机跑道、填平被炸弹炸出来的弹坑等工作。但是,也许是人手不够,也许是对飞机场的构造不熟悉的缘故,我们还是看到了上面所说的情况。当时在我们海军中还没有跑道这个词。)

完成了对飞机场的初步调查,我回到了飞机的所在位置。这时,地面的先遣人员已经到达。不过,不用说下榻的准备了,就连饭都没有人给我们做,只好用随身携带的干面包就着水壶里的水简单地吃了一顿晚饭。

当天夜里,我们决定睡在被炸碎了玻璃窗,看上去像是飞机场指挥所的一幢小建筑物里。所幸的是附近有很多成捆的麦蒿,将麦蒿梳理了

一下,大部分铺在水泥地上,剩下的一部分盖在飞行服上,脚上穿着飞行鞋就躺了下来。但实在太冷,怎么都难以入眠。那个夜里,无数只野狗在远处和近处不停地叫着,让人感受到了战场般的氛围。

第二天(12月25日),得到了上司的许可,我决定大约花一周的时间,在从南京城内到南京城外的大范围内打探亡友的下落。

我身着深藏青色的海军第一兵种军装,头戴战斗帽,腰挎从昭和7年第一次上海事变^①起就开始使用的长长的日本刀,皮带斜挂肩膀,将放在褐色皮套里的手枪挂在腰间。在一名翻译、一名卫兵以及一名护送兵等三人的陪伴下我坐上了黑色轿车。

经过一阵搜索之后,结果发现了二十多具遗体。之所以不能得出准确的数字,是因为很难辨别已经成为遗骨的尸体数量。

到昭和12年12月中旬为止,在南京及其郊外的很大范围内,像我一样,一个人非常仔细地进行搜寻的陆军将校究竟有多少呢?因为有很多将校由于部队的构成、任务等缘故,其行动范围一定是受到限制的。还听说很多的参谋并不是很积极地去探查当地的情况。

三、两次目睹屠杀现场

第一次。

我第一次搜索机组阵亡人员是在12月25日、第二次是在12月27日。

第一次搜索,我决定主要在南京市内的东部和东北部,以及城外的东部巡查。吃完早饭后,我离开飞机场,朝着离机场最近的西北方向的光华门进发。那里据说是第九师团(金泽)的胁坂部队(以后才知道是第三十六联队长胁坂次郎率领的部队)第一个到达南京的地方。

在那里,我仔细地在城门里面进行了巡查,在由两层、三层构成的复杂的结构内部,散乱地遗弃着四具中国兵的尸体。在第一次上海事变时我见过很多中国兵的尸体,而在这次的事变中还是第一次见到,

^① 即1932年一·二八事变。

我又一次重新体验了战争的残酷。尽管南京市沦陷已经过了12天,但仍然是这样一幅情景,因此我感到我们的陆军部队无暇顾及所有的一切。

从光华门进入城内,我立刻看到了左侧被我曾经轰炸过的故宫机场。但是附近不见一个人影。我迅速地走上了将南京市内分成南北的大路。接着向右拐,在向东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看见了中山门。那里是第十六师团欲以第一时间拿下目标而反复发生激战的地方,我的舰载轰炸机队也曾经轰炸过一次。通往中山门的道路可以一眼望到头,没有发现日本飞机的任何线索。

从中山门走到城外,在附近进行了大范围的搜索,没有日本飞机的影子。但是见到了高处耸立着极其壮观的中山陵,我向中国的伟人孙文之灵表示了敬意。

之后,我再一次通过中山门进入城内,准备在城内的东部进行搜索。但那里曾经是中国政府以及军队的设施,现在被陆军部队所占用,因此我无法搜索。于是,我尽可能多地在车辆能行驶的路上四处搜寻,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市内南北向的宽阔的大路。在这条路上向北走,不知不觉中我见到了玄武门,它在我的右侧。

我在那附近搜索了一阵之后出了玄武门,那里有一片宽阔的玄武湖。在那里,我见到了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湖岸上以及较近的湖面上漂浮着无数中国人的尸体。我想向人询问为什么会是这么一种状况,但是附近不见一个人影。这件事,表明了直到现在为止,在南京发生了异常的事态(注:有记录说在13日,部分部队在此处死了败下阵来的残兵,而我所见到的似乎并不仅仅如此)。

从玄武门再次进入城内,我上了最近的大路向北走,对附近作了一番调查。之后,向西、向南、再向西行进,走上了连接市中心和下关的中山北路。随后,沿着大路向西北行进,到达了挹江门,再从挹江门第三次出城,搜索了下关以及附近一带。

下关与南京和扬子江对岸的浦口一样,都是交通要塞。浦口是我到上海赴任以后立刻进行轰炸的地方,也是第一次轰炸的地方。下关有规模很大的火车站和码头,在那一带巡视时我见到了陆军部队——正如文

字本身所表现的那样——大量“残杀”中国人的现场。

码头的最下游部分,可以见到一条沿着扬子江的平坦的岸壁,还有将一大片空地围起来的仓库群。在仓库群中,每辆大约装载着30名中国人的无篷卡车一辆接一辆地开了进来。我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为了要确认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和站岗的陆军哨兵打了声招呼,走了进去。可能是因为我穿着海军的军服,佩带着军刀以及手枪,并且是从海军的车上下来的缘故吧,没有人上来阻止我。附近也没有新闻机构的人员。

进入中间的广场,我看到双手被绑在身后的十几个中国人。他们一个个隔开数米,沿着江岸被拖了过来,在被军刀以及刺刀残杀之后又被抛入扬子江中。

在离岸较近的地方,由于水很深,又有着眼睛都可以看出来的流速,尸体都朝着下游方向漂去。但也有部分没有完全死去的人,挣扎到了距离岸边很近的浅水处,因此沿岸附近成了血水。没有完全死去的人还要被补上一枪。

这一连串的处刑,就像流水作业一般,非常有条不紊。也没有人大声地发出指示。从这一点上来看,毫无疑问可以断定是陆军长官所指示的行动。所以,我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外人,没有开口说话的余地。

于是,我向附近的一位年轻陆军士官询问道:

“为什么那样做?”

他这样回答:

“听说几天前的夜里,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侵入我们陆军小队长的青年士官的寝室,那里面睡着十个还是十一个士官我也不太清楚,中国人把他们全都杀了。所以他们的战友和部下们为了复仇而要处死那个宿舍附近的居民。”

他的回答是否正确我不得而知,也许是有人要求他这样来解释的。

那天,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并看了一连串的处刑。在确认总共有十辆大卡车开进仓库地带之后我离开了现场。随后,我一边重点搜索市内的东部,一边回到飞机场。

人,似乎带有不可思议的性格。在下关最初见到处刑的时候,我受

到了极大的刺激。但是,在现场待了一段时间之后,渐渐地我感觉不到异常了。也许在实施处刑的官兵中也有与我同样感觉的人。那个现场的气氛,是平时无法想像的,有着特异性的东西。

另外,在现场的官兵中,也有些人抱有另样的感情,这些人从上海到南京的战斗过程中,或是失去了自己的长官,或是失去了同僚,或是失去了部下,他们有些愤怒。

但是,有着这种异常感情的人并非局限于军人和男人。在昭和7年的上海事变暂告一段落之后,我巡视交战后的战场,在那里遇见了居住在上海的日本女人,她们边用手指着放置在地上的中国兵的尸体,边用我难以想像的词汇神情坦然地谈论着。

26日,为了执行任务我没能离开基地。

第二次。

12月27日。我计划在这天对市内的西部进行搜索。由于前天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所以为了加以确认,我决定再一次前往下关。

到了下关附近,我看到这天也有载着中国人的无篷卡车不断地从城内开来,又不断地消失在仓库一带。

我再一次向站岗的哨兵打了声招呼,刚一进门,就看见与前一天一样在实施处刑。于是,我产生了某种疑虑。

“为什么能够将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在毫不混乱的情况下带到这里来?”

于是,我向站在处刑场附近的一个下士官询问。那位下士官不假思索地告诉我:

“在城里,对那些被派去清理战场的中国人说‘肚子饿的人举起手来’,然后假装带他们去吃饭的地方,将举手的人送上卡车。”

我进一步问道:

“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处死他们?”

“那是因为上级有命令,要节约弹药。”

他这样回答我。

这样的处刑,距占领南京差不多两个星期后的25日和27日连续不断地进行着。26日和25日之前,以及27日以后还实施过怎样的处刑我

就不得而知了(注:根据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手记,到12月24日为止共处死了15 000人以上,12月24日到第二年的1月5日,共处死了几千人)。从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来看,我并不认为这是战场上常有的、一时的、处于亢奋状态下的敌对行动。这一天,一连串的处刑,又一次让我感觉到那是某种有组织的行动。

那两天在下关看到的大约二十辆卡车,换言之,至少有计500名以上的中国人被处死,我确信光凭这一点就是大屠杀。尽管人们对于多少人被杀害才算是大屠杀也许会有不同的见解。

再加上玄武湖中以及湖岸上看到的大量尸体,综合起来考虑的话,虽然不能得到确切的数字,但是不能不说有众多的中国人被杀害了。

如果真如我所想的那样,那么毫无疑问,那是违背国际法的重大问题。但是,那时的我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些问题。因为在那之后不久,我不得不去从事我的飞行作战。

在确认了第二次的处刑地之后,我重新开始了遗体搜索。我先看了下关一带,然后再一次从挹江门进入城内,主要调查了市内的西北部和市中心的难民区。

在城内,我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沿着主干道,以每间隔一公里为基准,深入到主干道两侧的道路中去打听日本飞机的消息。难民区内有很多中国人,限于从车上所看到的,似乎与平时中国的其他城市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我听说了一件很悲惨的事,一架日本飞机坠落到一家民房,那家人因此全部死亡。飞机的机体已经被收拾掉了,机组人员的遗体也被运走了。

之后,我出了市区南部的中华门,在往雨花台的方向进行调查时,一共看到了九具遗体。其中两人是九六式舰载轰炸机的机组人员,七人是九六式陆军攻击机的机组人员。他们都是被土葬的,遗体被放在非常不错的木制棺材中。我不得不对做出如此善良举动的红十字会人员表示感谢。

这一天,我接触了很多中国人,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在城外,很多人都积极地回答我的问题。还有在去雨花台的马路上所遇到的农民们,他们

脸上露着微笑,点着头与我们打招呼。这与在我们国家的农村里见到的情景是相同的。

(下略)

[奥宫正武:《我所目睹的南京事件》,
PHP 研究所(东京),1997 年 9 月。]

(赵仲明 译)

17. 现在是揭开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时候了

——进攻大陆日本军队的犯罪证词

在那个炎热夏季,战争结束了。虽然有很多青年及孩子们不知道那个日子,但仍然存在着消除不掉的,与核武器、冲绳、中国有关的战争后遗症。之所以现在要重新寻求战争的证词,是因为良心驱使我们再一次进行反省。

会议主持人饭干晃一

尽管向居民发出了避难通告

(会议程序)当时号称昭和 12 年日支事变后,紧接着发动了大东亚战争。整个战争始于昭和 16 年,结束于昭和 20 年 8 月 15 日。无论选择哪个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却一去不复返了。但对于会聚在这里的三位老人,不,应该是“老青年”来说,往日的记忆还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昨天。

不久就是第 26 个“终战纪念日”了。在这期间,似乎所有的一切都被公开,并交代清楚了。其实,还有很多人有着和在座的战士们一样的经历,被深深地埋藏在记忆底部。这些经历是那样的残酷,有时可以说是难以启齿、极其残忍的。

战争到底是什么?

“现在年轻人都认为去打仗是很酷的事。简直是胡扯! 战争是最可怕、最肮脏的事”。

三人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之所以这么说,一定是因为他们经历过惨烈的动荡的日日夜夜。

小笠原清先生(61 岁)作为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的特别辩护人,介

绍了“屠杀”真相。当初谷寿夫中将被追究“南京屠杀”责任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大塚清先生(65岁)谈了他自昭和13年以后前后共六年期间,担任特务队长在上海租界经历过的非同寻常并紧张的日日夜夜。

石井仙人先生(69岁)谈了他26年前的经历。他说:身为开拓移民,在大陆生活了二十多年后,经历了最后的残酷战斗和逃亡。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终战诏书已下,继续毫无意义地抵抗强大的苏联军队。

座谈时,三人都直挺着腰干,时而白发冲冠,时而发出怒吼般的叫声。座谈会历时四个小时。

饭干:首先请小笠原参谋给我们谈谈南京战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小笠原:(拿出一叠稿子和细心画好的示意图)决定攻占南京是在昭和12年12月前夕。全军开始行动是进入12月之后。位于右侧的是金泽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这是京都师团。然后是第三师团。沿着这条铁路(边指着地图)前进。接下去是插到敌军背后的柳川兵团,该兵团在左翼展开,有上宇都宫第一一四师团和熊本第六师团,全面进攻就是这样开始的。当时,在南京高达18米的雄伟城墙上,东边的紫金山和南边的雨花台等处,都设立了主要阵地等设施,敌军设置了三道防线进行防御。

饭干:……

小笠原:首先针对这些防线开始进攻。12月4日命令夺取第一道防线。各部队一边齐声高呼:“绝不能输啊!”一边跳出来冲向敌军阵地。

饭干:小笠原先生当时在哪里?

小笠原:(声音顿时低下来)我不在(笑了)。

饭干:那在哪呀?

小笠原:我是陆军大学三年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声音又大了起来)第一道防线很快被突破了。10日左右,开始进攻第二道防线。

饭干:这时,敌我兵力如何?

小笠原:敌军有10万人,是唐生智指挥的。我军大约有12万人。我们略占优势。总之,9日那天,在两边都是山谷中前进的第九师团,很快抵达了最后一道防线,即,城郭阵地前。

饭干：这么说，只有第九师团冲在前面了？

小笠原：是的。所以各师团也都喊：“加油啊！不要落后啊！”并一起向前冲。但军部此时让各部队暂停攻击，尔后向南京居民散发了印着“有危险，请躲避”内容的传单，同时也向敌军喊话：“停止无谓的抵抗，想逃就快逃！西边敞开着。否则就投降。”

结果是，当时 70 万左右的当地居民，好像逃走了 30 万左右。是啊，我想，当时如果再给他们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不会发生迫害市民这种日本军队的最大丑事了。如果那样，敌军也全逃光了。因为不能丧失时机，于是下令继续总攻击。

四千居民死亡

饭干：因此造成了南京市民的损失。但现在人人都说有 40 万人。

小笠原：问题就在这里。所说的 40 万就是指所有留在城里的居民？绝不可能都杀了吧？

首先，敌人位于西面叫做“下关”的渡口，他们不断地从那里渡过扬子江向对岸逃跑。有三分之一，计 35 000 人。一部分敌人留在了市里，利用民房进行巷战。从结论来说，10 万敌兵中有 4 万当了俘虏，2 万具遗弃的尸体，35 000 人逃跑了，剩下的 5 000 人在城里打游击。还有，在此谈一谈谷中将指挥的第六师团的事，但实际上该师团根本没进城。

饭干：你的意思是……

小笠原：那时，已命令最后抵达的京都第十六师团在城里进行扫荡。在这期间，杀死杀伤了传教士、市民……就这样变成了南京屠杀。在下关，枪毙了逃到那里的人，这是战斗行为（大声）。已经撒了传单让大家不要去那里，但还是有人去了，所以……

饭干：那么，居民的死亡情况是……

小笠原：下关 2 000 人，城里 2 000 人，合起来估计有 4 000 人。我以为，将 4 000 变成了 4 万，4 万说成 40 万，实际上膨胀了上百倍，和松密事件一样，难道这不是趁机利用日本人自虐性主张的、不负责任的意见吗？

饭干：说得有道理。

小笠原：虽说如此，作为特别辩护人，当我出席军事法庭的时候，也还有很多肩伤、胸伤、跛脚之类的人前来作证。

也就是说，4 000 人死亡之外，三倍数量的受伤人，为 12 000 人，总共为 16 000 人受到了伤害。当然，这也是相当严重的情况。

饭干：有这么多数量，所以南京事件让指挥官们内心感到痛苦不堪啊。

小笠原：是的。要是没有南京事件的话，也许战争结束得更快些。那次失败也是导致日本和蒋介石政权最终没能握手言和的原因之一。

宁死不屈的谷中将

（简介）三人用了午餐。吃得真快，仍还是老“军人”的共同点吧。

战后，小笠原清先生一直未过上工薪生活，一直跟随上司冈村宁次中将^①（已故），担任过台湾蒋政权的军事顾问。现在担任社团法人日本乡友联盟常务理事。他有一头染过的短发，身材肥胖，左耳孔露出一束白毛，一副精力旺盛的风貌。他是原陆军中佐。

大塚清先生目前是机械出口商社小林捨次郎商店的董事、营业部长。是原宪兵中佐。和小笠原先生同为陆军大学学生，高他两届。身材矮小，不胖不瘦，说话时一副使劲收缩下巴、咬紧牙关的样子。

石井仙人先生居住在琦玉县新庄市，经营个体建筑业。他身材消瘦，是三人中个子最高的。生于福冈县，很早就去了大陆。军籍为兵长。

饭干：下面请小笠原先生谈谈，关于审判谷中将时作过辩护的事……

小笠原：我当时担任派遣军参谋，独身，但已 37 岁。就凭这也操纵了 105 万的军队。可是战败了。奉冈村阁下“担任和中国军队联络主任”之命，也就是作为“外交部长”帮助 207 万同胞从中国大陆回到祖国。

① 原文如此。冈村宁次 1941 年晋升为陆军大将。

当时,最高负责人、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和武藤章中将参谋长都已在东京被判刑。中国方面开始在我们军内到处查找“南京事件”责任人。

饭干:那么,就是谷寿夫中将了。

小笠原:不!真正想抓的好像是第十六师团、也就是负责扫荡城里的中岛今朝吾中将师团长。可是,他已在战争结束前病故了。

但如果将此事置之不理的话,各个国家及民众是不会同意的。因此,谷中将就成了众矢之的。谷先生在国内被拘留后送到南京。

饭干:因此,您就成了辩护人。

小笠原:这是因为我正好是合法留在当地的惟一军人。就这样被任命了。当然,谷中将递交了上诉书,我也反复提出了“屠杀责任不在谷中将”。法庭数次开庭,地点在国会议事堂这种叫“大礼堂”的地方。当时有上千人在那旁听。

饭干:是在南京吧。

小笠原:是的。在那里,台上站着一大排五十来个证人,有的裸露出背上的刀伤,有的有枪伤,有的失去一只手,有的跛脚。就连法庭外还有熙熙攘攘的两三千人哇啦哇啦叫喊着。新闻记者不停打闪光灯,简直让人窒息。在谷中将和我答辩时,旁听的人就大声喊叫着要“立刻杀了这两人!”但谷中将沉着冷静、堂堂正正地大声回答:“没有屠杀事实。”坚决不屈服。可最后做好了死的精神准备,就说:“给我贴身的白衬衣、纸和笔。”

饭干:什么时候行刑的?

小笠原:昭和22年4月26日。是在雨花台执行的。我也穿着中国服装,由中国司令部派来的两个警卫跟着我。我在人群中间悄悄地偷看。

遭遇电话推销棺材的上海特务队

这是法庭最后一天的情景,据说旁听人群发出非同寻常的欢呼声。战史研究学者的某著名私立大学教授(希望匿名)说:“屠杀的正确数字直到今天也没有明确。”但这里有一份资料。向东京法庭提交的证据资

料中,这样写道:“当时,日本军队命令在南京的‘红十字会’和‘崇善堂’两个志愿服务团体埋葬了 20 万具遗弃的尸体。有这样的事实。”教授说。当然,这里面也包括战斗人员,所以这不能当成“屠杀”民间人士的正确统计。

小笠原:当时燃放鞭炮、万余民众大声呼喊,刹那间一切都静了下来,蒙着眼睛的中将被带进了山谷。五名行刑人员举枪:“叭叭”开了枪,中将倒下了。立刻进行验尸并放入棺材。等到晚上,我向看守棺材的卫兵提出:“请把棺材交给我。”卫兵也帮忙将它埋葬在附近民众的墓地里。村里人也来帮了我。帮忙的还有妇女、老奶奶。我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把坑挖得深深的。“终于结束了。”村民自言自语地说着。第二天各家报纸都整版称赞他堂堂就义的消息。其中也有登载遗书的。“不幸的是中日开战了,希望今后永远以和平为宗旨不再战。我以平静的心态承担日本军队的责任。”最后甚至还写道:“希望新中国繁荣富强,实现东方理想。祈祷罹难的人们成佛,愿他们安息。”

饭干:很清楚了。那么,这次请大塚先生您说说吧。

大塚:自昭和 13 年到 18 年,我以上海为中心一直活动在南京和长江上。

饭干:在上海租界?是最困难的时候啊。

大塚:是的。开战是在昭和 12 年,而我则是在昭和 13 年,成立南京汪精卫政权之前去的。租界这个地方是有治外法权的。

饭干:而且,您是宪兵中佐吧。

大塚:叫特务工作队长,这是我起的名称,穿中国服装去的。要穿军服的话,马上就会被杀掉。当时在上海有 48 个国家的人,11 所总领事馆。其中心是英国和美国,还有法国。总之,我们是在没有任何权益的情况下强行进入的。两三百名宪兵都穿着中国服装,第一处据点设在位于英国租界的“扬子饭店”,包下了二楼,我们都睡在带去的厚草席上。

饭干:那又是为什么呢?

大塚:子弹。为的是一旦出事,可以竖起草席挡子弹啊!(笑)电话一到深夜 3 时左右就来了,“依棺材要哦?”意思是你要不要棺材啊?总之,这座饭店是抗日分子的藏身处。(大笑)

饭干：是一些让人讨厌的、说挖苦话的电话。

大塚：是啊。每晚都有电话。每次都要说“不需要”。对方就说些“中国人对您的评价非常好，但住在这里很犯嫌的。”之类的话。

饭干：意思是：要想活，就快滚出去。

小笠原：这人的心理战，首先是进攻对方内心，让人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让我们的人背叛，真了不起啊。（笑）

饭干：其他隐藏地点是哪儿？

大塚：是上海最有名的“大东亚旅馆”，这里约有一个联队的妓女。下面是杂耍场。

饭干：是娱乐中心。

小笠原：如同浅草一样的地方。

大塚：仍然是借用这里的二楼。（笑）还有一处是租用了苏州河畔的横浜正金银行。

饭干：那么，下面谈一谈特务工作吧。

大塚：在法国租界，也叫“公共租界”，当时有个名叫（法布鲁）的中佐，是那儿的头，有个白俄男人叫（森考夫斯基），一直跟着这个头。这个白俄人碍事得让人讨厌。他大肆打击日本人，妨碍我们活动有两个多星期了。我只对有关方面稍微打了个招呼，结果第二天他就死了。（笑）我就穿着军服参加了他的葬礼。

饭干：那也太残酷了。（笑）

大塚：总之是恐怖主义横行。抗日分子他们也搞定时炸弹之类的。那可不像现在的学生运动。

小笠原：还有蓝衣社、三民主义青年团和左派分子。而且，还有号称的十万兵力，还夸口说是天下无敌的铁军。

大塚：我们管辖的“三派”也很厉害啊。昭和13年，航空部队的少佐就在宪兵队眼前被手枪打死了。和我们友好的中国人接连不断地遭到杀害。我自己每天晚上也有电话来问：“要棺材吗？”（笑）我让士兵们每天换新的兜裆布。我在戒指的这边（说着把手翻了过来）还镶上镜子……

饭干：是后视镜吧。

大塚：这样一来，行动就凭直觉了。你懂这个意思吗？

清津白白送死的六万人

租界是各国推行殖民地政策并与当时中国政府缔结通商条约而形成的居留地，享有治外法权。大塚宪兵中佐就在那儿开始开展活动。当时的工作也就是现在的间谍，大塚是当时间谍的头领。据说抗日分子悬赏 50 万元赏金要大塚先生的人头。当时上海中产阶层的工资据说才有 50 元钱。

饭干：是很了不起的工作啊。

小笠原：有的是理发的，有的是卖西服的。不知哪个是日本人！（笑）

大塚：情况复杂起来时就使用定时炸弹。有个叫毛全森的抗日分子头领，把他带进我的房间，对他说：“你也可以从这里跳下去死，不然的话……”就把他老婆叫到这里来，折磨她让他招供。用这种手段将已钻进我们内部的恐怖分子一举消灭光。（笑）

饭干：揭开战争的另一面，可真是极其可怕啊！

大塚：通过各种手段，杀掉蓝衣社的大人物。这样进行“大东亚战争”时就可以放心地腾出手来对付“中共”和有敌意的外国人。

饭干：等着 12 月 8 日那天到来了。

大塚：是的。

小笠原：日本擅长于这种危险勾当。不过像美国那样随便杀人放火是不行的。

饭干：那么，最后请石井先生给我们说说吧。

石井：（端正了身子）没错，我虽然当过兵，但我在此只想对大家表白一句，或是拜托大家一句，那就是：当日本国民远离真实之时，就会发生这次这种灾难。希望彻底明白这句话。

战争已经结束，但普通居民并没有打仗也死了三五万。根据我的经验，全部原因归结于不了解真实情况。东条先生也不会预测到“要死几百万日本人”才那么干的。

饭干：那么，石井先生 8 月 15 日在哪里？

石井：在清津。正在建造日本海军当作最后法宝的所谓“NZ 工场”，也就是第 Z 号的意思。Z 是 Z 旗，是制造原子弹的工厂。

饭干：原子弹啊。

石井：是的。接管了“日本纺织”，说是干到昭和 20 年 10 月就可以竣工的，可是只干到了 8 月 8 日。

饭干：是苏联人登陆那天啊。

石井：清津这个地方被称作世界三大雾港之一。这一天雾很大。有个年轻人说：“好像有说话声音。”因为我是当地“警防团”（以在乡军人为主成立的自卫组织）的队长，就立刻去看了。没想到，清津东海岸那儿没有任何警备。当地许多年轻人当了共产党员陆续去了苏联，在那训练了一段时间又返回来。

饭干：那么，那天出了什么事啊？

石井：11 时左右，我们什么也没发现就回来了。刚开始吃饭时，雾散了，突然发现一长串的苏联军舰，炮弹“咚咚咚”地不断落下来，登陆艇“嘎嘎嘎”地蜂拥向岸上开过来。我们以及妇女和孩子就这么只穿着身上的衣服、未拿任何东西就逃了。最后定下神来一看，发现我们已夹在苏联军队前沿和日本军队前沿之间了。后来天黑了。然后过了 15 日，一直到 8 月 21 日……

饭干：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

石井：是的。和外部没有一点联系。听说空投过通信筒，但当时那个东西大概也被秘密藏起来了。吧。

饭干：这一来就进行战斗了吧。

石井：因为义务兵到 45 岁，所以虽是最后一批，但还有 8 000 人参加了队伍。至 21 日前在清津打了三天三夜，是近距离射击啊。这一仗真是可怕啊。“咣咣咣”的枪炮声就像在 100 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用电线杆撞击奈良大佛似的。

饭干：什么时候知道战败了？

石井：是在 21 日。总之，2 岁以下的人 90% 都死了。如果早三天取得联系，许多人就不会死了。

饭干：清津有十万日本人吧？

石井：是的。其中百姓死了 25 000 人，士兵大致也这么多，共计 5 万人，还有 15 000 人当了俘虏。即便如此，120 人的中队每天发给一个牛头。能有一个被削去肉的牛头骨就不错了。大概就是变相的屠杀吧，因此很快又死了 1 万人。

饭干：那么，有哪些地方知道这真相？

石井：是啊，战争不是什么很帅气的事，是要吃真枪子的。那种痛苦，没经过战争是体会不到的。所以绝对要禁止战争。

小笠原：是的。再也不能打了。

[《产经周刊》1971 年 8 月 16 日。]

(罗文文 译)

18. 填满了扬子江的尸体

赤星义雄

昭和12年7月30日，一纸征召令送到了我家。

四年前，我18岁的时候，曾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接受一次检查然后参军的话，那就主动参军，培养军队精神，锻炼自己的身心，积累经验，为国而战吧。”因此，我曾作为志愿兵加入第六师团，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当征召令到来的时候，我没有任何抵触，倒不如说是理所当然地应征了。但是，对于中国和其他国家，我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仇恨或敌视。

傍晚，一到达兵营，就作为甲种合格者进了部队，被编入步兵第十三联队当了二等兵。

8月4日，匆匆忙忙从兵营出发了。

8月11日抵达天津。据说正好在两天前，发生了中国百姓的暴动。街上到处都有明显的激战痕迹，尸体也到处都是。

在离火车站两公里左右的地方有日本人疏散地，拉着铁丝网。谁都觉得“快到战场了”，因而战战兢兢。

9月上旬，从天津开赴永定河一带。火红色的火辣辣的太阳从高粱地里升起，又沉入高粱地中。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天左右。

不久到了永定河岸边。在河面无比宽阔的永定河岸边，是一大片棉花田。对岸有很多树，能看到中国士兵在匆忙地移动。

在那个瞬间我想，战斗终于要开始了。在河堤上，排成一列的机关枪枪口闪闪发光，野战炮的炮口在后面严阵以待，构筑起了阵地。

现在真的是已经布阵完毕了。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大战的威容。因为紧张而感到了心脏跳动的加剧。

大概是下午1时许的样子吧，响起了震天的轰鸣。大约八十门野战炮一起开火了。周围充满了炮弹飞行的啸叫声和爆炸声。沙尘飞扬，中

国士兵都跑掉了。紧接着,机关枪也哒哒哒地不停地开火。我紧握步枪,一时间把身体往后仰,觉得好像身体缩小了。接着腿开始发抖,感到脸色发青。

正在这时,小队长用好像从肚子里挤出来的声音喊了一声:“冲啊!”我就下意识地在一片哇哇的叫喊声中一口气冲下河堤,来到了河滩上。在枪林弹雨中,我们在无法藏身的河滩上匍匐着向河里前进。

过河时,在河水深的地方,我们的肩部以下都浸在水里。但是在河水浅的地方,有人无法藏身而成了敌人的靶子,倒在了河中。顾不上去确认战友是死是伤,只是一味地进攻、冲锋。当抱着必死的想法突入对岸的中国军阵地时,敌兵惊呆了。我们毫不留情地用锋利的刺刀刺杀那些毫无抵抗的、“哎哟、哎哟”叫着的士兵,也不确认他们是死是活,只是不停地摆好架势,然后朝着中国士兵刺去。

有些人第一下没被刺到要害,一边流血一边痛苦地挣扎,“哎哟、哎哟”地叫着,对这些人我们也毫不留情。我们已经忘我了。永定河作战就这样结束了。那是9月15日下午5时或6时左右。

接着,9月24日攻占了保定。然后又攻陷了正定。我们队作为预备队在石家庄西部行军。

10月初,听说其他师团的第一线部队攻占了位于山脚下的石家庄的要塞。

10月25日,在石家庄坐上了军用列车。27日,在山东省太沽港上船的时候,大家都以为要回日本了。但是,第二天也就是28日,在朝鲜的南方海面上停泊了两天。大家不安地讨论这次会去什么地方。

11月4日,我们得知为了杭州湾登陆的总攻,各机动部队正在陆续向着杭州湾海面集结。

在猛烈的舰炮射击的同时,空中有几十架轰炸机组成编队用500公斤的炸弹展开波浪式攻击。这一波进攻结束后,陆军立即开始了杭州湾登陆。大概是在5日早上7时左右,陆海空三军一体的总攻开始了。

我们坐上舢板,在离河岸约二十米的地方,有两个人跳到了海里。水大概淹到脖子,不久我也跳了下去。那时水淹到腰部。我们在海中冲锋,进行了激烈的攻防战,最后赶走了登陆地点的中国军队。

就这样,到了中午时分,已有大批的日军登陆。当时在上海战斗的中国军队听说我们登陆的消息后,好像过了中午就开始撤退了。

我所在的中队和师团司令部一起,从登陆点不断向内陆进发。因为我军行进的速度比从上海方面撤退的中国军队要快,结果成了我们好像被中国军队追赶着一样。我想我军知道这一点,而中国军队不知道。我们登上了高约两百米、上有天文台的山,然后分散到了建筑物的附近。

半夜1时或2时左右,下方通往上海的马路上传来了卡车的引擎声和车灯的亮光,是中国军队撤退过来了。数百辆卡车组成的队伍连绵不绝。他们没有注意到日军正在严阵以待,走了过来。

我们先等中国军队完全进入我们的射程范围,然后一起用机关枪射击。以前从来没像这次这样用了这么多子弹。过了两个小时左右,下方的灯光消失了,周围一片寂静,令人害怕。

过了30分钟左右,突然感到眼前20米左右的地方有人在移动的迹象。定眼一看,发现了敌兵正屏住呼吸,手里拿着手榴弹状的东西爬上来。

我立刻扔出了手榴弹,随着轰的一声爆炸声,他临死前痛苦挣扎的声音逐渐消失在了黑暗中。我们在那样黑暗中等待着早晨的来临。

不久就到了早上。下山后吃了一惊。在晨雾中,昨夜激战的痕迹活生生地显现在我们面前。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周围像地狱一般,一片血海。

堆积成山的尸体和无数卡车的残骸堆满了宽约八米的马路。我觉得敌人死了有几千人。那种情景让我想起了惨不忍睹的地狱图,如实地诉说着对撤退军队持续无情的杀戮。

不久我们从天文台向南京进发。我们从早上开始出发,但是到了晚上也没有遇到一个敌人。在前进了很长一段距离以后,我们来到了一条小河边。晚上,我们在庄稼地里布下了阵。

天色变暗以后,又有撤退的敌人军团随着引擎声和嘈杂的人声出现在了小河对面约三十米的马路上。

敌人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们。凝神一看,对方人非常多,我们害怕起来。我们紧握着枪。不久,下达了“射击”的命令。

我们隔着小河,一起开始向对方开火。敌人也慌忙重新摆好架势进行反击。整个晚上,零星的互相射击一直持续着。临近黎明的时候,互相射击停止了,敌方的撤退军逃走了。

过河之后,又有许多年轻的中国士兵一堆一堆地死在那一带。另外,小河里还到处漂浮着尸体。

从这里开始,经过苏州向南京进发,昼夜兼程的急行军持续了很多天。

在南京总攻的三天前,12月10左右,我们来到了挖有战壕的由中国军队把守的练兵场遗址的雨花台入口附近,这里离中华门有两公里。在入口处前方一公里的战壕中,迫击炮、机关枪猛烈地开火,殊死的攻防战开始了。

我们没有遮蔽物,遭遇狙击而不得不陷入苦战,只能趴在地上,边匍匐前进边进攻。

临近傍晚的时候,我们投掷了发烟筒,在烟雾中冲到了离战壕大约十米的地方。我匍匐在地上用军靴的鞋跟部磕了一下手榴弹,等了大约3秒,然后把它向着敌人有机枪的战壕扔了过去。随着轰的一声爆炸声,小队长喊道:“冲啊!”我们一起哇哇地叫喊着冲了过去。

11日傍晚,敌军好像已经逃进城内,一个人都没有。我们通过了雨花台,朝着城外被破坏的街道突进。

被破坏的街道上好像一个人都没有,但是对身着百姓服装的游击队和残兵败将不可大意,总是保持着警惕。

在中华门的城墙上,每隔大约五十米敌人就架着一挺机关枪,机关枪之间大约架着三十门左右的迫击炮。

在那样的猛烈攻击中,我们前进到了离城墙约二百米的地方,冲进了被破坏的密集的民房。这里也是空空如也。

12日黎明之前,5时左右,开始了对中华门城墙的协同进攻。在轰炸机波浪式进攻的同时,野战炮也对着城门一齐开火。但是,紧闭的城门和20米高的城墙岿然不动,没有倒塌的迹象。接着试图用75吨的轻型坦克^①撞开城门,但是城门仍不为所动,没有任何变化。另外,前进到

^① 原文如此,75吨显然不是轻型坦克。

离城门 50 米处的工兵部队在城门上摆放了炸药,试图爆破,但也告失败。

敌方大量的迫击炮和机关枪从坚固的城墙上持续对我们进行着无情的攻击,我军则从后方不断发射野战炮弹,另外在马路上用轻型坦克应战。白热化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天。

我们无法前进,只能在中华门右前方 200 米的民房待命,度过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12 月 13 日,从早上开始对中华门城墙发起了总攻。野战炮对着曾被认为坚不可摧的中华门,不断从城墙下方向上方集中开炮,不久垂直的城墙开始变形,可以爬得上去了。

在轰炸机对中华门及城墙上的迫击炮和机关枪进行了波浪式攻击之后,手拿轻机枪和步枪的三人组成的敢死队冲上前去,在变形的城墙上挂上绳梯,在我们的掩护射击和敌人的攻击下爬了上去。其后,在猛烈的枪声中,约有四十名步兵跟着上去了。敌人的反击好像仍在持续。

过了一段时间,日章旗在中华门上高高飘扬起来。这是 1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

那一瞬间,所有人都举手高呼:“万岁! 万岁!”都大叫:“太好了! 太好了!”感动的同时我在想,能够平安无事地到这一步真是太好了。我们把“首先攻陷南京”作为口号。

敢死队爬上城墙后足足过了两三个小时,中华门的城门终于被打开了。随着小队长一声“入城!”的命令,我们走向城门,然后进入了城内。城内堆满了长 10 米、宽 4 米左右的沙袋。民房被无情地破坏或者正在燃烧。到处都留有明显的轰炸和炮击的痕迹,空中弥漫着硝烟的味道。

另外,到处都被血染得鲜红,地上散落着被炸掉头或者内脏外露的尸体,以及粉身碎骨的肉块,令人目不忍睹。

城内除了红十字难民区,已经看不到一个游击队或者残兵败将模样的人了。

现在南京城已经真正落入了日军之手。

我们在市内反复进行扫荡,但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那天晚上,即 13 日晚,在城内的一角进行警备。

到了第二天,12月14日,我们通过城内,向扬子江岸边进发。我们去了有重炮阵地的狮子山,那里正好和中华门是相反的方向。

敌人凿开山岩,造了一条能通过一辆车的路,每隔约五十米架一门巨大的炮。听说是为了阻止日本海军而设置的。当然,没有敌人的身影。

从那个炮台远望下方的扬子江,可以看到无数的木棒状的东西在流动。

我们下了狮子山,向着扬子江岸边走去。途中看到中国士兵的尸体倒在地上,有些没有头,还有些只有上半身,好像在向人们诉说着攻击的恐怖。

扬子江岸边和普通的码头一样,是船出发和到达的地方。但站在那里看扬子江水的时候,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令人难以相信的情景。

在2000米,不,可能更宽阔的江面上,漂满了无数的尸体。放眼望去,除了尸体,看不到别的东西。岸上有,江里也有,那不是士兵的尸体,而是普通百姓的尸体。大人、孩子,男男女女,就像漂浮在江上的木筏一样慢慢地流淌着。把目光移到上游,后面还跟着尸体堆成的山。我觉得好像后面跟着的尸体是无穷无尽的。

少算点也有5万人以上,而且几乎都是普通百姓的尸体,扬子江真正化成了“尸体之河”。

关于这件事我听说了如下情况。

前一天,从南京城撤退的多达几万人的中国军队和难民,在前方八公里处的扬子江流域的下关港挤上可容纳五十人左右的渡船,想逃往对岸。

在进攻南京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海军带着大炮、机关枪沿扬子江逆流而上,准备伏击撤退的军队和难民的船只,在他们的渡船到达对岸之前,所有的枪炮一齐开始射击。随着轰鸣声,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一样射出。船被直接命中,炸得粉碎,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

我在听说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想:“为什么连无关的人都……”后来我想,可能这就是被称为“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情况吧。

在南京城休养了两天后,我们分别乘坐五六十辆卡车出发,傍晚到

达了芜湖。在这里执行了约四个月的警备任务之后,开始讨伐三山镇的敌军阵地。

不走运的是,攻击的时候得到了中队长战死的消息。他被机关枪打穿了头部。因为中队长的战死,我们中队被迫进行了苦战。

不断有战友中弹倒下。我想:“明天会轮到我吗?”这样一想,不管是对正规军还是老百姓,仇恨的心情越发高涨。

“正因为有中国士兵,才必须一直进行战争,一直回不了日本。”这种现在想来不讲道理的想法似乎在每个人心中越来越强烈。

武汉攻略战开始的时候,是昭和13年的夏天。

在这次作战中,或者说日中战争中最大的激战是田家镇攻略战。武汉的正面大门是扬子江。在扬子江江面最窄的地方,面对武汉右侧的山上,架着二十多门大炮,对沿扬子江而上的日本舰船起着威慑作用。而且,据说要塞中有好几个师团的庞大兵力。该要塞作为保卫武汉的据点,以山炮、野战炮为中心,在附近一带的山岳地带构筑了坚固的碉堡,形成了一大防线。其中心就是田家镇要塞。整个山的四周挖有多处战壕,配备有轻、重机关枪和迫击炮。

我们所处的位置在这个要塞的正对面。

进攻终于开始了。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我们不断破坏战壕,持续前进。到了离要塞500米的地方后,敌人的反击变得猛烈起来。即便如此,我们还是逐步前进,到了离要塞400米的地方,终于一步也前进不了了。战斗呈白热化状态,仅仅前进了100米,却花了大约一天时间。

我不断射击,手中250发子弹只剩下十发左右。不断有战友中弹倒下死去。另外,伤兵也被担架抬走了。

最终,来自辎重队的弹药和其他物资的补给断绝了,子弹用完了。

到了晚上,中国军队吹响了冲锋号,从下方十米处的斜坡爬了上来。我们没法开枪,就对着敌人扔石头反击。我们一开始扔石头,敌人就逃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别的敌人爬了上来。这种情况不分昼夜地持续了两天左右。

我们处于被全歼的危险中。我想我可能要死了。

进攻开始后第三天的傍晚,辎重队在海军的掩护下沿扬子江而上,

把物资装在舢板上,在离我们阵地约一百米的地方登陆。因此我们得以充分地补充了弹药物资。第二天,两个大队的增援部队也到了。清晨,舰炮、野战炮、轰炸机开始了同时攻击。在波浪式轰炸和我军大炮及敌人大炮轰鸣声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一声“冲啊!”的命令下向着要塞冲去。大概是11时或者12时左右的时候,在激烈的枪战之后,终于攻陷了要塞。

这时,联队的3000名士兵只有1000人左右还活着,听说在参加进攻的部队中是损失最大的。不久开始向武汉进攻。在田家镇战斗中人数降至一半以下的我队也成了预备队,从武汉到了武昌,执行了三个月的警备任务,然后从武昌向岳州移动。这是昭和14年4月的时候。

在这里大约执行了一年的警备任务。从武汉出来后的警备出乎意料的轻松。

第二年,昭和15年3月,我在岳州接到了回国的命令。

从昭和12年7月离开日本后大约三年间,我只是一味地忘我地在生死之间战斗,好不容易回到了日本。那时才第一次感到自己是活着的。

因为我在一次接一次的进攻中常常战斗在最前线,所以没有见过对普通百姓的残忍行为。

有一次,我看到一名士兵让敌人的13名便衣兵竖着排成一列,然后在离他们约一米远的地方用步枪射击。十个人当即死亡。没打中要害的两三个人他就用刺刀刺。我没做过这种事。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进行战争,不,从我们到达之时开始,就一直在单方面地威胁着中国人民的生存权利。

我想绝对不应该再次发动战争。因为那对双方都是一件悲惨的事。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记录》,

第三文明社(东京),1979年9月5日。]

(李斌 译)

19. 在那遥远的山野

八田隆幸

编者注：八田隆幸，1936 年入伍，作为现役志愿兵编入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第三中队，上等兵。

(前略)

湖州至南京之间的战斗

在接受了 12 月 1 日—12 月 13 日做好设防的任务之后，我们早上 5 时从南浔镇出发，为追上联队主力，开始了以长兴为目标的急行军。10 时 30 分穿过了湖州。湖州是傍依在太湖湖畔的一座很现代化的美丽城镇。但是，到了距长兴还有一里的地点时，走在头里的其他部队已挤满了长兴，大部队只好后撤了三里多路，汽车部队此时变得碍手碍脚，我们也因此有幸坐上了汽车。这是自北支那转战中支那战场以来第一次坐汽车。对一直急行军而筋疲力尽的我们来说，有这样的好运气，我们对汽车部队真是感激不尽。12 月 3 日，大队变成了师团的后备队，接受了为师团司令部担任后方警备的任务。早上 7 时从宿营地出发，下午 1 时穿过了广德。因为选择了走近道，所以又是一次翻山越岭的艰难行军。

向谷师团长敬礼

12 月 4 日，我在非常近的距离向谷师团长敬了礼，我还真有点手足无措。谷师团长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将军，蓄着八字胡须，英武的脸庞晒得黝黑。我们的队伍渐渐接近司令部队伍的尾部，也走上了大道。据说

附近一带本朝第三大队消灭了与己数量相同的敌方部队。第二天(5日)一早又出发,行进在与日本国内相似的起伏的山峦中。连日来的强行军,使腿脚的感觉变得很奇特,看看前后行进中的部队,多数士兵都一样地以外八字步伐行走着。特别是走在前面的人,从后面看上去就和鸭子走路的样子差不多,用腰带动着下半身左摇右摆地前行,非常滑稽。不过,现在如果让我模仿,我肯定走不来。大家都默默无闻地一个劲儿地前进着。到达宿营地时已经是晚上10时30分了,每个人的身心都疲惫不堪。这是一个无名的小村落,可在这儿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这里村民的每一家都备有很多砂糖,真是感谢上苍。长期缺乏糖分的身体得到了充分的补充,一下子就有了精神。12月6日,一路向着南京持续地前进。行军途中还得到了工兵水上部队的补给,分到了许多香烟。以溧水为目标的快速急行军,使每个士兵都甚感疲惫。虽说是12月,可每个人的脸上满是被风吹干后留下的汗渍,盐分像白粉似地沾满一脸,看上去就像挂着的撒了白粉的风干柿饼。终于走上了真正的道路,此时的行军路上,是各兵种俱全的大行军。大东亚战争要进行如此这般的行军真是连做梦都没想到。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绝对的制空权,才能有这样的行军阵势。机械化部队渐渐超越步兵部队前行而去,看着他们的数量和装备,更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兄弟部队的飞机低空盘旋着,一边打招呼一边抛下了通信筒。飞机机身上的日章旗鲜艳夺目。看着他们雄壮的飞行英姿,真有点后悔自己当初为什么没报名参加航空兵。这些已成了遥远的回忆。根据飞机通信筒传递的前线战况,下午4时师团举行了会议。我军的前卫部队已于昨日占领了南京的前沿阵地溧水,离南京城还剩十公里的距离。第九师团也到了距南京还有11公里的地方。为此,第六师团为了尽快赶到前线,决定开始日夜兼程地强行军。第一天就前进了五十多公里。第二天(7日),大概是考虑到强行军已进行了两天,在距南京还有50公里的时候,师团命令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在无名村落,匆忙地生火做饭。下午2时又接到了出发命令,前进了12公里。第二天(8日)凌晨6时,又出发向前线挺进。大约前行了四公里,中队接到了新的命令,独立成队作为师团进攻南京的右翼队向敌方的左侧发起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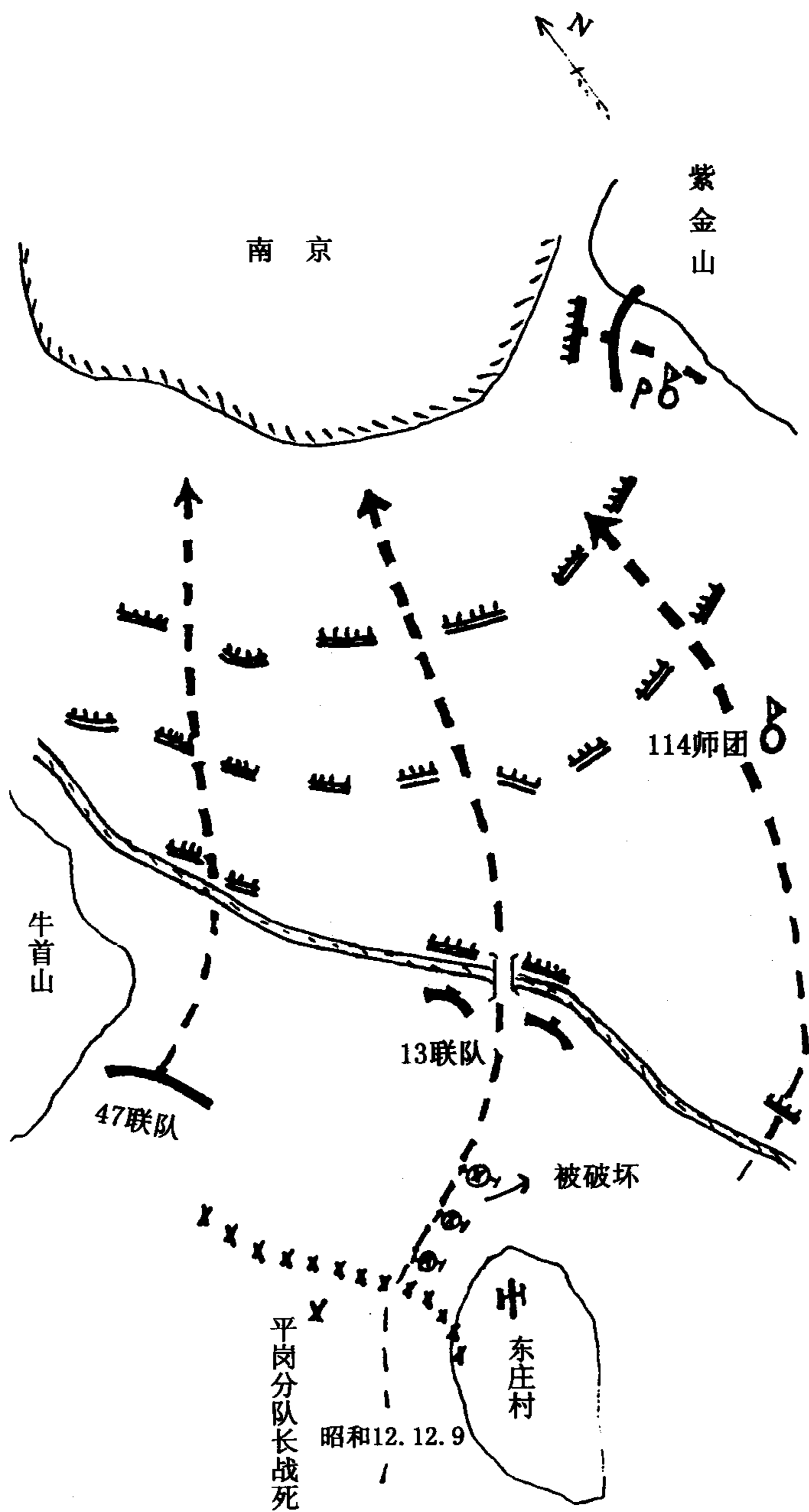
速进攻。我们前进了四公里多,便追上了前边的第一一四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从几天前开始就与敌方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战斗,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我们遇到的是负责护送激战中伤亡人员的收容队。我们越来越接近进攻南京的最前线了,兴奋和紧张的情绪也愈加高昂。第一一四师团的士兵知道了第六师团前来增援,他们高兴之余又增添了信心。从现在开始我师团与第一一四师团配合,从同一方向进攻南京,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右有第一一四师团、左有第六师团两面夹击的强有力的进攻态势。

向南京城发起总进攻

12月8日,进攻南京的战斗打响了,第六师团也开始了真正的进攻战。连日来的强行军使人疲惫不堪,四周还不断地落下敌方的迫击炮弹,但大家仍边前进边进攻。黄昏时分,攻占了东庄村的一个小村落。这儿让人大为吃惊的是,放眼望去,在向南京进攻的必经之路上,到处都修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用以阻击我军。一整夜,为了防止在山坡布阵的敌人进行反扑,第一中队和工兵平石小队果敢地偷袭敌方阵地,听到传来的激烈枪声,我们在心里祈祷兄弟部队的胜利。

第三中队一人阵亡四人负伤

12月9日一早,从山坡阵地撤出,中队坚守在通向南京道路的右侧,第一小队在右路第一线上展开阵势,等待进攻的命令。上午8时,小队在田野的正中摆开阵势,我方野战炮兵第六联队与敌方炮兵的炮战就在我们头上打响了。在我们阵地后方约百米处是炮兵阵地,共有五门大炮。炮兵队长奋勇迅猛的指挥身影看得清清楚楚。与敌人的炮兵阵地大概也就相距七百米左右吧。不停地在双方阵地上落下的炸弹,在周围掀起尘土,使得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拼命地睁眼张望,只见我方的炮兵个个都脱下上衣扔在一旁,赤膊上阵地战斗着。我们被夹在中间非常孤立,却又一点也动弹不得。炮战越来越激烈,双方似乎都抱着同归于



南京雨花台附近战斗图

尽的架势。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激战,不知在何时,敌方阵地在硝烟中已完全哑了下来,我军好像大获全胜。此时,不知谁起了个头,大家便一起用掌声和着欢呼声庆祝这场英勇无比的炮战的胜利。由于艰难的取胜,耽误了时间不能前行,只好在田野中过夜。大约是晚上9时左右吧,防守在道路上的小队士兵看见了由井上中尉指挥的小型装甲车队向前行进而去,马上传令告诉他们前方已无我军部队,他们只是回答知道了,却依旧我行我素地向前开进。正当我在想着他们一会儿就会返回吧,前方却传来了激战声。原来车队没有步兵护卫,已深入到敌方阵营,遭到了对方的偷袭。激战的结果是四辆装甲车全部被毁。当增援的步兵赶到时,虽说两台引擎还能启动,但车轮上的履带已悉数断裂,车辆完全不能动弹了。



1937年12月2日从广德向南京进军的步兵第十三联队

遭遇地雷阵 平冈分队长阵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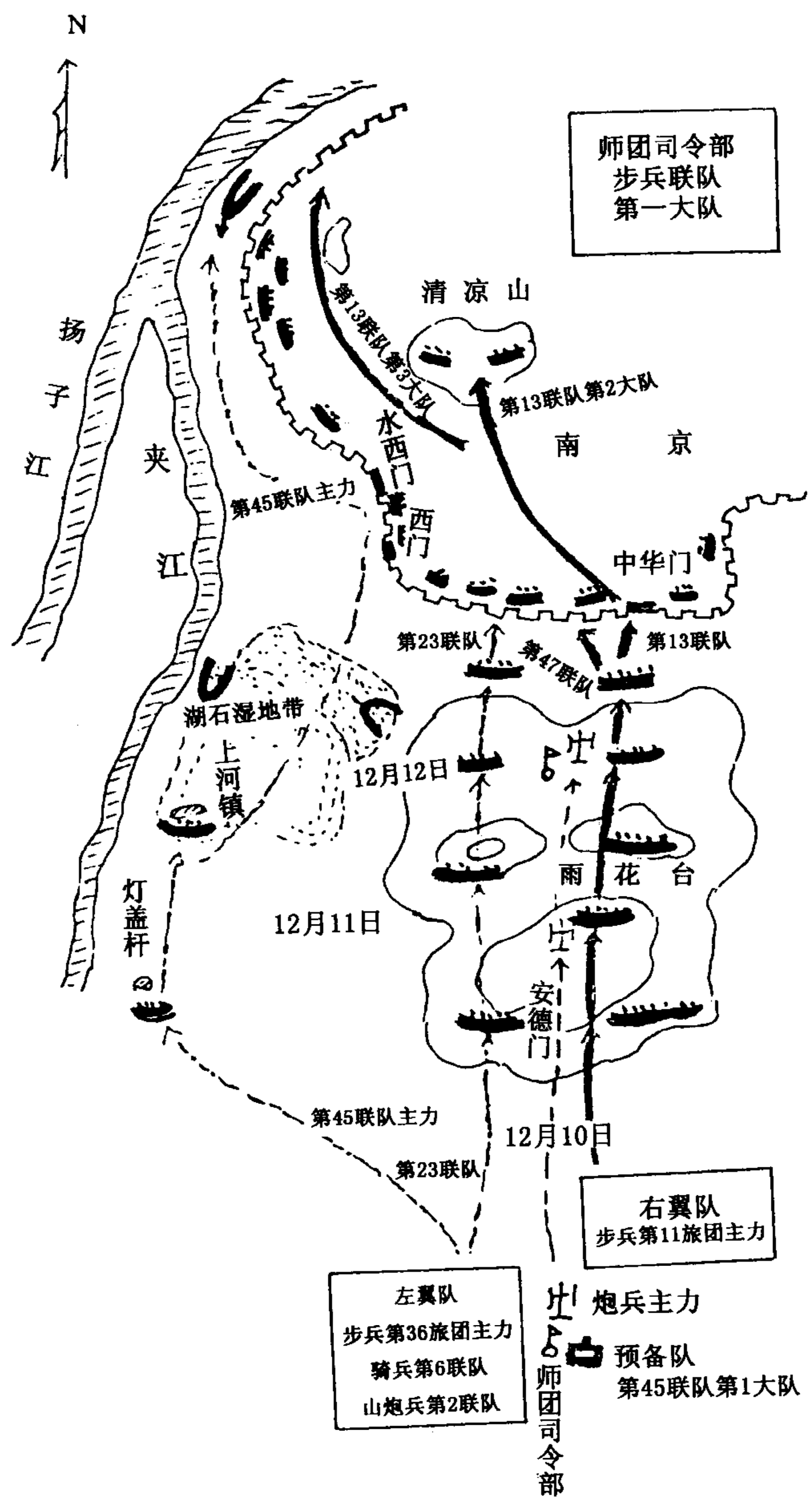
我军终于开始了与敌军主阵地的正面作战。战线的右翼是第一一四师团的第六十六联队,左翼为第六师团的第四十五联队、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配属一个工兵小队)、第四十七联队。我中队被派到左侧的最前沿。整个阵地给人一种一触即发的感觉。右侧看过去与紫金山悬崖

峭壁相连是高低起伏的丘陵地带,严实地布着铁丝网防线。从小队战场的正面望去,南京城的街道就在右边,近在咫尺。收割后的稻田里,还残留着昨晚遭到偷袭的装甲车的残骸,而在残骸的右手处,铁丝网一角竟有一个宽约一米左右的缺口,是正适合分队通过的通道。头顶上不时传来敌方发射的零星炮弹的爆炸声。为了便于穿越铁丝网的缺口,大家呈一字纵队排开。平冈分队长带头,接下来是我,我后面是轻机枪射手一等兵塔本及排列开来的分队全体人员。在我们跑着冲向距缺口还有三米处,一刹那,眼前突然出现一道强烈的闪光和震撼全身的巨大声响,接着我感觉身体被抛向了天空,“哗——哗——”地从空中落下来很多东西,恍若梦中世界。随之沉重的压迫感使我觉得透不过气来,极力想挣脱却力不从心,周围漆黑一片。渐渐地有两三处地方露出了些许光线,我聚集全身的力量抬起上半身,看清了四周。强烈的火药味儿扑鼻而来,浓浓的白烟还飘浮在空中。脑海中的记忆渐渐恢复。我用手抹了一把脸,擦掉满脸的尘土,手上除了尘土还沾着血迹。向前望去,有一个宽三米的大坑,坑底还在冒出淡淡的烟雾。那儿正好是平冈分队长跑去的地方。我问仍匍匐着保持侧面队形的射手塔本:“分队长呢?”“不知道”。其他人也都是一脸茫然不知的神态。“上等兵八田君,你鼻子流血了。”塔本告诉我。原来刚才用手擦脸时,手上的血迹是鼻血。看来我们是踩上了敌方事先埋好的地雷了。铁丝网上的缺口正是他们引诱我们的陷阱。身体飞起的感觉是被爆炸时的气浪掀起的,沉重的压迫感是落在身上的土块,黑暗中透出的几道光线则是从土块缝隙中射进的阳光。塔本还说:“上等兵八田君刚才被掀起了三米多高。”我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立刻想到要赶快找到分队长。环视周围,发现了从土块中露出来的裤腿一角,跑过去迅速扒开土块拽出裤脚,令人惨不忍睹的是,那只是分队长右脚的一部分。没有任何遗物,分队长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间是上午9时。分队长出身于现矢部町字下名连石,和我是邻村的老乡加兄长。现役是近卫兵,应征后作为补充要员编入中队,继任我担任了分队长,是一个非常为部下着想的好人。与我有着如此缘分的分队长就死在眼前,悲伤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一星期前在行军途中歇脚时我们还一起给家乡写了信,这居然成为他的绝笔,难道这就是命运?平时我隶属第十三

联队的第三中队,以前第四中队的宿舍曾借给小型装甲车中队使用。在宿舍前,大家一起接受不分兵种的白刃战时的剑术指导,因此与装甲车队的中队长井上有过几面之交,此时我只好将平冈分队长的遗骸之事郑重地嘱托给了井上队长。因分队长阵亡,我再次被任命为分队长。当天的战况,除了分队长的牺牲和我的跌伤之外,再无其他伤亡。接着,我们继续向雨花台进攻。负隅顽抗的残敌不堪一击,一直打到了距南京城外六公里处,整个战局也越来越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激战雨花台

12月10日一早,战场部署又有了变化,右侧为第十三联队第一大队,中间第四十七联队,左侧第三十六旅团。第一大队的右侧第一线是第三中队,左侧第一线是第二中队。用望远镜观察敌方,可看见分布在阵地的炮兵。敌人的炮火攻击开始了,重型迫击炮弹不停地在前沿阵地爆炸。我们心中祈祷着家乡常胜将军氏神守护神的保佑,开始一边进攻一边前进。一个劲在迅跑的士兵,只有脸上充血的目光闪现出生机。他们仿佛鬼神,或者说这是一种已经感觉到死亡就在眼前的人的身影。越来越逼近南京城了,敌人依仗坚固的防御阵地及四周的地雷阵进行着顽强抵抗。事后才知道,从这儿的阵地到南京约六公里,是中国军队平时的演习练兵场。无边的丘陵延伸着,如果没有不停落下的炮弹,就和日本的大矢原野演习场一样。正因如此,敌方炮击的命中率也很高。炮兵部队的增援不断增加,空中的战斗机也一架接一架地扫射敌方阵地。南京城四周是雷鸣般的炮击声和飞机的轰炸声。到傍晚6时,被敌人称为坚不可摧的第一道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我军的猛烈进攻而开始瓦解。战后的寂静随着黑夜的到来又被打破,敌方又从第二道防线发起了猛烈的炮火反击。中队的进攻由正面移向右侧,整晚在炮声中待命出击。在战场上,没有比枪林弹雨中的待命更让人难熬的事了。心中惶恐不安,真不如马上出击英勇杀敌来得痛快。但作为战场上的战术,这也是常常遇到的情况。在焦急的等待中,连眨眼的工夫都没有就迎来了曙光。



第六师团南京城攻击经过要图

小田小队长的战死

12月11日凌晨3时,进攻部署完毕。8时,为了安置炮兵的大炮,派出了观察阵地的勘察队。正用广角望远镜观察阵地的炮兵中队长被敌方射来的子弹击中胸部牺牲了。上午8时40分,昨晚只吃了一些干粮,肚子已经饿得唱空城计了,这时总会让人想起预备队送来的他们亲手捏的美味饭团。躲闪着从敌人阵地射出的子弹,在坑洼的稻田里奔跑了两百多米,擦身而过的子弹,不仅可以听到“嗖嗖”的呼啸声,甚至可以感觉到炙人的热气。右侧百米处正在指挥作战的第二小队长小田少尉被一弹打中胸部,当附近的勤务兵赶到时,他嘱托勤务兵将他的遗言转达给中队长及各分队长,随后用微弱的声调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英勇地牺牲了。后来,在小田的遗物中发现了 he 随时准备牺牲而写下的遗书,内容如下:“我是一个男儿,即使战死也会升天成仙的。父母应该感到高兴。给家里的遗书放在部队的统一存放处,请替我转给家人。”这是军人的典范,是一颗热爱祖国的赤诚之心。让现代的年轻人知道这种精神一直是我的心愿。小田小队长出身于东京,其父亲当时据说是宪兵大佐。接到儿子的遗书,他父亲不知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啊。在战后45年的今天,小田武夫少尉的遗书一定还在家供奉着,早晚被家人祭拜吧。小田小队长是我当兵的第三年从士官学校毕业的,当时分配在第三中队做新兵教育工作,是一个工作尽责、深受部下信赖的优秀青年士官。在我的心里一边浮现起小田小队长的温和面孔,一边祈祷他的在天之灵早日安息。

进攻南京城中华门

昨晚,即12月12日,进攻到了距南京城两公里处,为了防备敌方的反扑,我们利用墓地挖了一整夜的战壕。向敌人第三道防线进攻的战斗打响了。第四中队长松冈中尉在进攻中壮烈牺牲。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下,敌方第三道防线终于在下午2时被彻底攻破,战败撤向南京

城的敌军大约有几万人吧,似满天的云朵向后涌动,从雨花台看过去好像触手可及。不能错过这个战机,上级下达了追击的命令。顶着夕阳我们冲向田野,一直追上了通向中华门的大道。同时追击的还有冲在前头的第一一四师团的军旗中队,大家展开了竞赛般的追击战。第六师团的先锋是步兵第十三联队十时中佐率领的第一大队,而第一大队的先锋则为第三中队濑户本准尉属下的我们第一小队,因为关系到整个师团的荣誉,所以决不能轻易输给其他部队。明知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我还是不停地激励士兵们奋勇追击。追至中华门前,发现兄弟部队的七辆小型装甲车已停在城门外,开始了对城内的火力进攻。这儿虽说是离城内有一百五十多米的城外,但也是有着众多民居的大街。四处可见火光,呈现出一派战后的惨状,连中华门上的瞭望楼也在燃烧。在向装甲部队打听后,才知道通向城门的护城河上的桥梁已经断了,所以不能前进。是哪个部队的装甲车队我倒没来得及问。从车辆中间看过去,只见中华门的城门紧闭着。这时,一个与后续部队一起上来的新闻记者,穿过街巷跑过我的身边,我劝他说,危险,不要再向前了。他不听,一心只想拍摄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就在他跑向装甲车的一刹那,突然一颗子弹飞了过来,打中他的脖子,他当场阵亡。那是一个非常年轻的记者,遗憾的是我回忆不起来他当时带的是哪个新闻部门的臂章了。中华门外的护城河宽约三十米左右,沿着河走再向左拐是条有零星小店的商业街,顺着街上的一条小路向前跑百米左右,发现这儿的城墙因受到炮火的轰击,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奔跑途中看到,在很多燃烧着的民房中,竟有一处结实的、砖瓦结构的房屋幸运地没有起火,我们马上冲了进去。原来,这儿也是中国军队驻扎过的地方,地上还散落着一些救护伤员用的卫生用品。屋内有三处齐腰的窗户,从左前方窗户正好可以看见那段残破的城墙,与这儿相距有五十米左右。护城河对面的城墙表面全部烧毁坍塌,现在还在冒着余烟。再仔细观察整个房间,发现从房屋的西侧滑下可以到达护城河,而那儿居然有一个简陋的栈桥,一定是中国军队撤退时搭建的,他们将栈桥留给了我们,真是老天保佑。敌人当然也知道我们进入了这个房间,他们从城墙上开始猛烈地扫射。大概以为我们只有几个人不堪一击吧。“好,等着瞧!”我心里一边考虑着战术,一边开始了

反击。中队主力好像也从别的路冲到了后街的中央,到处都是烧焦的糊味儿。虽然心里焦急想尽快登上城墙,但现在看来不太可能。虽然炮兵队为我们轰出了一个突破口,但在现在的情况下绝对难以攀登上去,因为突破口离墙根部分有五米高。敌人又紧紧地盯着我们,把钢盔挑在木棍儿上,稍一探出窗口,“砰”的一声就会引来命中率极高的射击。眼前能做的除了加大突破口的破坏度,就是制作攀登用的梯子了。小队长跑过来给我们传达了中队的命令:“小队在此待机到黄昏,再与工兵配合攻克城墙。”敌人不停地瞄准我们射击。一等兵高村突然拎起轻机枪冲出去想从屋角予以还击。我高声大喊:“高村危险,快进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子弹穿过他的右肩射进左腹,当场毙命。密集的火力使我们一时无法去抢回高村的遗体。弹药手上等兵松本为了抢回高村,冲出去负了伤。一等兵塔本为了救回松本上等兵,冲出去也伤了左脚。才2分钟,就伤亡了三名士兵。黄昏之前,中队长加川带着村上卫生员冲了进来,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重要命令,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大队的第三中队与第一中队及工兵的一个小分队配合,于今晚发起决死进攻。以第三中队的濑户本准尉长为首,挑选十名队员组成突击攻城敢死队。行动时间另行通知。”



向南京城中华门攻击的战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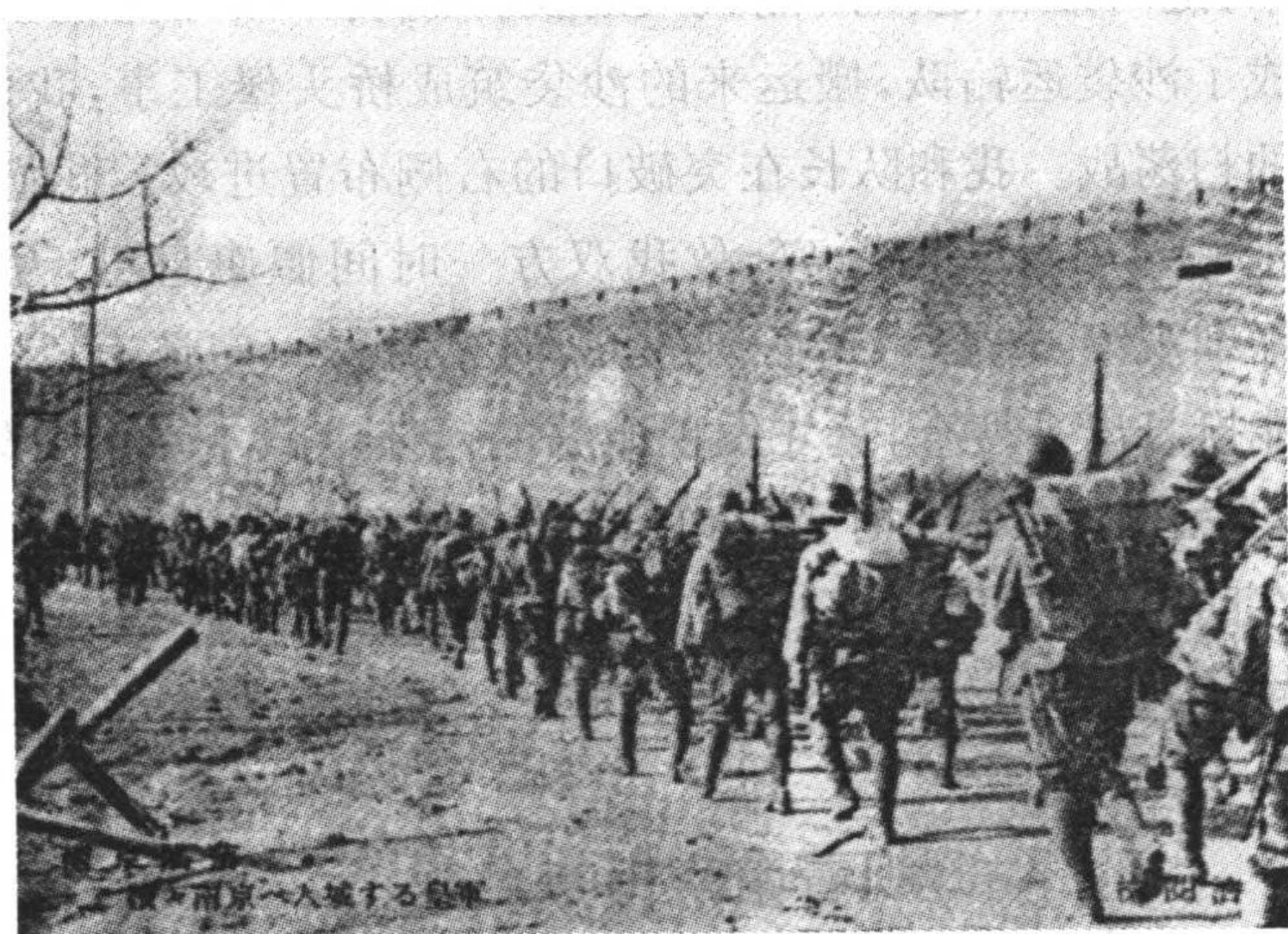
组建攀登中华门敢死队

12月12日,为了攀登进攻中华门,组成了敢死队。被挑选出的队员是队长准尉濑户本、伍长井手丰信和八田伍勤、上等兵中村、一等兵塔本、中村、本田、中原、松永、吉本、宫原。在一阵沉默之后,加川中队长又说了一句:“八田,你也好好干吧。”一会儿,又递给我一个小型手电筒说:“登上城墙之后,用它打信号。”然后中队长又将水壶盖儿当杯子,从水壶里倒了满满一杯酒为我们壮行,大家轮流喝光了酒。当时大概还没到黄昏时分吧。“好,行动吧!”就这样下定决心的我,想起刚冲进屋时看见敌方一个将校的死尸上穿着防弹背心。我赶快跑过去,把尸体拖到子弹打不到的地方,脱下背心检查了一下,发现胸部有一个子弹打穿后留下的小拇指大小的洞,“唉,凑合吧。”虽说不能挡住子弹,但至少可以防御白刃战时敌人的锋利刀剑吧。这样想着,只能对不起那位将校了。我擦干血迹将防弹衣穿在了身上,感觉非常沉重。暮色渐浓,我带领两名士兵想去摸清一下栈桥是否可以使用。可是刚冲出房屋,就被城墙上敌人的探照灯发现,遭到了猛烈的炮火攻击,根本不能前进,只能返回。在小队的射击掩护下,我们好不容易才撤了回来。队长也认为这样渡河只能全体战死。城墙上的敌人好像发现了我们准备强行突破的作战意图,持续地进行着炮火反击。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到了晚上10时,敌人的火力骤然加大,隔着护城河仔细观察,发现有一百名左右的敌人从城墙上滑下,想趁机偷袭我们,双方相距只有50米。我向中队发出传令,并补充弹药,做好了全歼来敌的准备。装好子弹,“打!”一声令下,所有人集中起全部的火力猛烈射击。轻机枪的枪管打得通红通红,我一边用水壶往机枪上浇水,并向老天祈祷不要打坏武器,一边猛射。对岸的敌人似乎也始料不及,被打得鬼哭狼嚎,四处逃窜,没几分钟便静寂无声了。这是一场给了敌人沉重打击的枪战。现在再看,要从城墙上下来还是可以做到的,而要从下面登上城墙,还必须做进一步的破坏。在这个时候,工兵部队所能起的作用充分地显示出来了。我深深地感觉到,这里完全体现了步兵和工兵联合作战的真正价值。

攻克南京城中华门

上弦的月色淡淡地照射在渡河的栈桥上,水面泛起一层薄薄的暮霭。夜幕中我依稀看到了中队长为我们送行的身影。在敢死队队长濑户本发出开始行动的命令时,我还留心看了一下时间,是12时55分。点燃两颗烟幕弹,在扔向通往栈桥路上的同时,我们也一起冲上了栈桥。后方的兄弟部队也将白天准备好的火力搬上屋顶,用猛烈的炮火掩护我们。壮烈的攀登进攻战就这样拉开了序幕。我不顾一切地带头在敌人搭建的栈桥上向前冲,眼看离对岸只有五米远了,可是桥却突然消失了。我一时间呆立住了,后面的人也一个个停了下来,栈桥经不住如此大的重压,开始下沉,转眼间我就掉进了水里。幸好水不深,只到脖子,我拼死地游上对岸。大家认准了突破口就在前方的20米处的城墙下,于是一个接一个像落汤鸡似地游上岸,迅速散开,冲向墙根,贴上墙壁。工兵小队长平石带领三名工兵,在我们侧旁的突破口处拼命而快速地装置炸药。我们等了一会儿,却没有任何反应,炸药未点着。第二梯队马上又冲了上去,几十秒后,在他们返回的同时,一道耀眼的闪光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大爆炸声响起,把人的耳朵震得嗡嗡直响。到底是50千瓦^①的炸药啊,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让人觉得头上的城墙似乎全被炸塌了。遭到爆破摧毁的东西在空中飞舞,过了好一会儿才渐渐落下。“成功了,成功了。”工兵们高喊着。城墙上往下扔手榴弹进行抵抗的敌人,好像也被吓破了胆,一段时间变得静寂无声。接着,后面紧跟上来了扛着竹子、绳梯的工兵队,在焦急的等待中,两架十五米左右长的梯子终于完成了。“上!”濑户本队长一声令下,带头冲了上去,跟在队长那雪亮的大刀后面的是我。爬到梯子一半左右时,忽然听到脚下传来中国话,我回头一看,发现头戴德制钢盔的敌人正和我们一起在梯子上攀登。“喂,有中国兵混在这儿”我高喊着。往下看,有好几个中国兵夹杂在队伍中正准备爬上梯子,他们一定是惊慌失措把我们当成自己人了。因为在梯子上比较难出手,为

^① 原文如此。



进入南京城

了解决夹在我和井手伍长之间的敌人，我们费了不少工夫。这些中国兵一定是先前想要偷袭我们而从城墙上下来的一部分，因回不了城内，就躲在什么地方，刚才的爆炸声让他们惊慌失措，以至于敌我不分，一心只想爬上梯子逃回城内。梯子离城墙顶部还差两米，但我们还是爬了上来。成功了，成功了！我高兴极了，想起中队长“八田事成之后，用这个小手电筒给我们打信号”的话，我马上掏出中队长交给我的手电筒拼命地向我方阵地挥舞。阵地上的部队在“快了吧、快了吧”的焦急等待中看到了我的信号，一起跳了起来，各处响起了“万岁”的欢呼声。我看了一下时间，正好是凌晨1时05分。从队长下达开始行动的命令到现在也只不过10分钟，可感觉上是那么漫长。在这一时间里决死进攻的过程恍如梦境一般。听着身后传来高呼“万岁”的响彻云霄的声援之声，我登上城墙极目眺望，发现了十几个神态惊恐的敌人，我解决了身旁的一个，随即又展开了几分钟激烈的肉搏战。已接近霜降的12月中旬，敌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虽说我对刺杀很有信心，但要随便刺死一个敌人也不那么容易。因为是在战场上，攻与防的心境从一开始就有着很大的差别，面对我军独特的白刃战，敌军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力量，被我们毫不费力地全歼了。以突破口为中心，我们占领了前后三十米左右的地方。大

家分散开来,随时准备迎接两侧敌人的反扑偷袭。敢死队突击成功后,中队又组成了沙袋运输队,搬运来的沙袋筑成桥头堡工事,我们又进行了城墙上的扫荡战。我和队长在突破口的右侧布置进攻。我们推测,到中华门为止大约一百米的距离,敌我双方一时间偃旗息鼓,互探动静。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却看不到任何敌人,但总觉得一定还有不少人没被消灭。只能挺身出去搜查,这才发现城墙的掩体中藏了众多无处可逃的敌军。我们不断地向他们扔手榴弹,进行了彻底的扫荡,并等待黎明的到来。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不过是十二三分钟的战斗,却成就了永垂青史的丰功伟绩,能为国奉献,至此终生无悔,这也是我最为感怀之处吧。

观看南京街市全貌

12月13日夜晩,在明亮的月色下我们登上了城墙。中华门附近的城墙高约十五米左右,城墙上宽度八米。右侧城墙的尽头可以望到紫金山,左侧与波涛滚滚的长江相接,四周总长据说超过11里。激战后的市街到处火光冲天,黑烟弥漫。我第一次从中华门城墙下到城内,看到的就堆在城门后的数千个装满沙土的麻袋。这些沙袋将城门严实地封闭了起来,抵御一般的炮战毫无问题。第一大队的城内扫荡工作由第二大代替,第一大队到城外进行战后整休。回想一下,在一刻不停地向南京进发的强行军中,从未有过好好休息的机会。从雨花台到现在为止的战斗,自己竟能生存下来,真是万幸。这种幸福感从未有过像现在这样强烈地感觉到。战争中能有这样的好运,一定是托家乡氏神、守护神的洪福,是亲人们为我祈祷的结果,是因为有祖国无数民众的关怀和鼓励。面向东方,我在心里深深地鞠躬致谢,多谢了!

(下略)

[八田隆幸:《在那遥远的山野》(非卖品),

米田印刷,1983年4月25日。]

(赵仲明 译)

20. 野战邮政旗

佐佐木元胜

编者注：佐佐木元胜，1904 年出生于日本群馬县，1927 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同年进入日本邮政省工作。1937 年从军，为日军上海派遣军野战邮政官。1944 年开始作为日本陆军司政官（掌管行政的官员）从军东南亚。

（前略）

12 月 6 日，传来了已经攻克南京的消息。我立刻制定计划，调动卡车，把邮件送到即将进入南京城的部队那里去。因为完全不知道哪个部队会进城，所以我把寄往吉住部队、中岛部队的邮件全装到了卡车上。

12 月 8 日 5 时 10 分，寺内外一片漆黑。两辆从前一天开始就待命的卡车满载着邮袋出发了。与我同行的还有中川书记官、小櫃、冈部邮政员、军中杂役筑地司机四个人，以及后勤部过来的增井伍长等七名运输兵和押车的卫兵。为了预防万一，这次还带上了能驾驶卡车的小櫃和冈部两位邮政员。我们兴冲冲地出发后不久，就在快到嘉定时候，后面一辆卡车爆胎了。经南翔而来的这一段



日军邮戳

路况很差。卡车怎么也修不好。有一辆车从旁行驶而过，消失在远处，让人很是羡慕。东方逐渐泛白，天色渐亮，降了大霜。天大亮后，我们又出发了。从嘉定出发后开了六里路，来到太仓。这一带道路很不好，非常颠簸。城墙上满是用大字书写着的抗日标语，很是显眼：

驱逐倭寇

还我河山

太仓也有去昆山的道路。我们在空寂无人的乡间小路上朝着常熟行驶。行驶了八九里路,来到了常熟城外的街道上。这里的道路绵延向前,连着无锡,路况不错。路旁家家户户的墙壁上画着成药、肥皂类的广告,此外还有抗日标语。

东洋鬼子……

这话是说日本兵的,令人不快。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句标语容易记住,到处都是。是说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要出钱、出力以备国家征用^①的意思。

锻炼心身强种报国

这句话倒是不常见。不知道是不是抗日标语。我只看见过一回。

从常熟到无锡的十里路程,卡车有三四次从躺在路上满是灰尘的尸体上碾过。为了避开路旁蜿蜒绵长的辎重队,卡车从尸体上碾过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在无锡附近,十六七个姑娘脸色苍白,抱着猫一般大小的婴儿站在道路旁边,很是可怜。大概是分娩后没多久吧。一进无锡就看到很多死尸,有的死尸一丝不挂。一群想看看荒废的旧房子里有什么可拿的贫民们,沿着那些破房子战战兢兢地走着。有个皮肤黑黑的女孩子,眼中充满恐惧,那极度的畏缩和怯懦让人以为她是有意装出来的。卡车在城里的汽车厂加油。我向邮局方向走去,来到了街中大桥旁边。躺在这里的尸体被烧得焦黑(下腹部是被狗吃了吧,像被劈成两半挖去瓜瓢的西瓜一样,满是鲜红的血)。卡车追上来了。我们过了河来到市郊像是一所师范学校或者是野战司令部宿营的地方。院子很大,前面一角有草地,院子里还有方形的建筑物和图书馆。那儿就是邮局了。泛黑的墙壁上用油漆刷上了抗日标语,像是血滴下来似的。三楼四周的架子上摆满了书,局长和邮递员就在这里。

下午1时,我们从无锡出发,在庄稼地里路况很差的道路上行驶了

^① 在本书序文中,作者将“征用”解释为“态度相对和善的掠夺”。

十里,4时到达常州。常州四周环绕着坚固的城墙,市内有大型寺庙,看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我们从常州向距此十八里左右的镇江进发。一路上,看到笔直而绵长的水路,许多木材被做成木筏,有的木筏还着了火,燃烧着。渔网的四角被支着。我们来到了七里开外的夏墅镇,看到桥被烧塌了。由于工兵正在修桥,所以我们从原路返回常州。路边废弃的房子里躺着尸体,头部溃烂,脑髓流了出来,看上去好像无花果或者石榴一样。此外,还有在田地里呈蹲坐状、头上戴着支那兵钢盔的死尸。常州街上随处可见燃烧着的房子。我们在城门内的修车场宿营。这栋建筑由混凝土砌成,像个大型百货集贸市场,上层是公寓式的。屋子里有落满灰尘的床。楼下散乱地放着桌子、椅子、纸类、破布等。里面的井被人胡乱汲水,发出恶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先做了饭。看了前面的小房子一眼,发现那里侧躺着一具被杀害没多久的尸体,他的一只手被炸烂了。夜里,传来汽车发动的声音,虽然很吵,我们还是睡得很熟。这里宿营的士兵们亲切地把他们自己的床铺让给我们睡,可是那床铺真是很差劲。

12月9日,晴空万里。快到8时的时候,我们从常州出发了。这一天,我们改道向金坛进发。在这十里的路程上要是碰上桥梁倒塌就坏了,大概没关系吧,我们含含糊糊地估计着,出发了。9时55分到达金坛。这是座有城墙的古老城镇。可以看到大型建筑屋顶上的瓦,可是这些在城里毫无用处,城里除了乞丐和一些缺胳膊少腿的人之外,什么都没有。我们直接朝天王寺驶去。那里距此处十里。一路上都是丘陵起伏的要塞,却丝毫没有支那军队抵抗的痕迹。他们真是不中用。大家都不由得说道:

“要是日本军队的话,大概会在这里奋勇抗敌吧。”

偶尔看到路旁草葺屋顶的房子只剩下烧过的土墙。在草木枯萎、低矮房屋稀少的田野上,只有太阳还在明亮地照射着。我们在略微隆起的路旁吃了午饭,吃了部队“征用”来分给我们的甜煮杏子,很好吃。这儿离天王寺很近。在机密的军事地图上,天王寺和红笔标示的卡车线路呈十字形交叉。大阪的天王寺给人以非常繁华的感觉,但是这儿完全是个小村庄,只有步哨警卫兵站在那里。这里离句容六里。一路上都是不高

的山地,有一座坍塌的桥梁。我们在田里绕行了三百米左右的路程,经过一座临时架起的桥梁。因为是赶修的道路,卡车陷在泥里,几十辆车进退不得,道路被严重堵塞了。摆脱这种困境之后,道路一直很平坦。

“南京陷落了吗?!”

筑地司机问对面来的相识的卡车运输兵。

“陷落了,我刚从南京城回来,路上战壕是有的,不过以后的路况就好了。”丢下这话,这位卡车司机就开着车走了。确实如他所说,左右都是河沟的道路上有挖好了的战壕。1时50分,我们到达句容。句容有古塔,是丘陵上的城镇,距南京十里。战斗司令部设在县政府。附近起了火,冒着浓浓的黑烟。见到佐佐木参谋,我向他行礼。“恭喜恭喜。”我突然这么一说,却被告知南京还没有陷落,我军还在进攻。我讲起刚才那位运输兵的话,参谋笑着说那是谣言。

我们来到城外的机场,挂有青天白日旗的飞机库被炸毁了。这里有弹药库,部队肯定会来这里取弹药的,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吉住部队的邮件放在炮兵分厂,让来取弹药的车拉过去。卸下行囊一看,里面尽是中岛部队的邮件。所以,我们就朝着中岛部队本部所在地,即南京城外五里多的支那步兵学校进发了。路旁耸立着几栋西式楼房。这就是支那的会计学校了。上面贴的纸上写着“中岛部队野战仓库”。我派中川书记官向仓库负责人致意说还请多加关照。这所学校的校园一角成排地摆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迫击炮,这些都是支那军队以前一直使用的,被收拾得很像样。草地上有几个士兵正在休息,看到卡车上插着印着“干”的邮政旗帜,他们就匆匆忙忙地给家里写信。

装甲车、牵引车、卡车、辎重车、马匹在这一带的路上来往着,道路混乱拥挤,丝毫不能前进。大家都很兴奋。插着邮政旗帜的卡车要和一辆黑色、气派的车会车,无法前进。那辆黑色车里的一位美髯高级将校(原注:军参谋长塚田攻中将。凯旋的时候,我去送他和军司令官,这才注意到原来他就是那位美髯高级将校。)冲着卡车驾驶室里的我大喊:“作战区域内,邮件不来也行!”“送邮件的话,挑路上没人的晚上!”

我们满载邮件的卡车旁边,是运送桶装酒以庆祝攻陷南京的兵站卡车队。车与车之间仅保持一点车距蜿蜒前行。插着邮政旗帜的卡车在

狭窄的道路上多次和蒙着黄色帆布、带有退了色的红十字标记的运送战场伤兵的辎重车擦身而过。4时50分到了坐落在汤山镇道路左边的步兵学校。这里白天发生过激烈的战争。白发的部队长官在校园里放置了桌子,在看地图。前方的群山着了火,火焰从一个山头蔓延到另一个山头。我们在校园里支那兵睡的双层床上铺上些东西就睡了。这个屋子里还有供部队驱使的苦力。局长吉川书记官一个人跟随中岛部队。我们快速把能够交托的邮件交给部队后,广田高级副官以及大家都非常高兴。有的将校从北支那的石家庄出来以后,这还是第一次收到邮件。他对我说,一次就收到七封信,真是太高兴了。剩下的邮件是寄给山那边正在作战的部队的,所以现在还不能交到他们手里。我们想随部队一起进入南京城。

12月10日,阴。发生了一件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这就是从常州出发的那天早上,搭我们便车去吉住部队的两名士兵总是跟着我们。在句容县政府里,我曾说希望他们下车。这两位士兵和中岛部队真是没有缘分。部队长官向前进发了,我们在空无一人的步兵学校里又待了一会儿。我们找出了爆竹,点燃后炸翻了敌人的装甲车模型。山腰上有几栋校舍。有一个厕所,跨脚下面的坑呈葫芦形,没有挡板。有的屋子里丢着很多长靴。我们“征用”了两三双能穿的长靴。一栋房子起了火,稻草搭的房子跟着就烧起来了。照明弹似的东西,红红白白的,像焰火一样从火焰中“嗖——嗖——”地飞出来。我们房间旁边是堆放石灰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个茅草搭的房顶也开始燃烧。正好管理部的卡车最后出发,我们就一起离开了这里。走了两里多路,就上了一个叫麒麟门的坡道,坡道旁有个废弃的小村庄。我们在这个非常简陋的屋子里宿营。一辆运送邮件的卡车追了上来,是中岛部队的邮政员们。这样人数就多了四个。我们从管理部领来了米,开始自己做饭。临近黄昏,好多抬着伤员的担架从这里经过。有些伤兵的脸看上去和死人一模一样。想必是发生了一场恶战。在隔着陋屋和道路的空地上,也就是在我们做饭的道路旁,横躺着死去的马匹,一名支那兵的尸体被卡车或其他什么车碾烂了(宛如熟透了的石榴。血是红的,脑浆是白的,整体看过去,裂口处发白)。他右脚负伤了,缠着绷带。野战炮的声音不绝于耳。山上

和着了火的民居在燃烧着。暮色中,兵马在道路上拥挤着向前行进。在石子路上行驶的辎重车的声音持续着。上弦月高悬头顶,这一切都成了南京城的挽歌。我躺在铺在破房泥巴地上的稻草里,做着疲惫的梦。

运送野战炮弹

12月11日,万里晴空。虽说房子破得像马厩一样,但是可能是极度疲劳的缘故吧,大家睡得都很香。我们把行囊搬到屋子里,在门口插上邮政旗帜。这间土屋的旁边有位《日日新闻》的记者。早上,宪兵从这间陋屋所在的道路上跑过。步兵卫兵长羽田小尉先行来到这里。

朝香宫殿下登上山顶观战。我们能够很清晰地看到站在山脉分水岭上警戒的士兵身影。中山作为队长出去征用食物。我在前面的空地上烧开水,用借来的肥皂刮胡子。此时,前面百米外的田地里尘土飞扬。刚看到的时候我还没理会,原来那是敌人射来的炮弹爆炸了。对面天空中飘着墨绿色的观测气球。看来那发炮弹是瞄准这个观测气球发射的。炮弹在气球附近爆炸,白色烟雾像焰火一样。和炮兵阵地用电话线连着的这个观测气球真是可怕,它成了敌人炮击的目标。可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对方却总是击不中这个观测气球。炮兵大尉对我说:“如果不是专家,是无法打中它的。因为这个靶子只是一个点而已。此外,这个点还在不停地运动着。”

但是驻守在气球附近的士兵可就觉得讨厌了,因为敌人的炮弹会因为攻击气球而落下来。

出去的弟兄们挑着黑猪、红薯和菜回来了。(因为农民家里有个支那女孩),所以这批人干了危险而有趣的事情。他们一边嚷嚷着这件事,一边做着饭。前面空地上有两头牛,其他部队没有食物了,到我们这儿来要吃的。水牛肉很难吃,所以我们毫无异议地同意了。别的部队从远处的山里用双筒望远镜发现了水牛。我们决定把水牛拉到一间被烧塌的房子里去,然后用枪把它打死。可能是水牛老老实实的缘故吧,我们觉得很是不安。我们冲着牛的眉间打了一枪,血从水牛的鼻子滴滴答答地直往下流,水牛的前腿向下跪了下去。

麒麟门是距离南京城两里半的小村庄,行政上隶属南京,我军已经占领了这里,但是“南京陷落”这个谣言却传到了上海。实际上我们搞错了。有人说:“神将不再保佑我们了。”

邮件交接完毕,没什么事了。管理部有 26 个人,而我们就有 16 人。此外,还有从常州开始搭便车的两名士兵。因为向管理部要求的食物过多,我首先请那两名来路不明的士兵离开。这两个士兵离开时连句谢谢也没有说。因为以前一直听说管理部只有两辆卡车,所以我通过吉川局长提出申请,希望把空着的三辆卡车酌情提供给部队使用。下午 2 时,我们坐着卡车,刚从麒麟门出发就被拦住了,前方被敌军炮弹炸过。在这里,我见到了兵器部长,决定用三辆野战邮政卡车运送炮弹。炮轰中山门的部队弹药就要用光了,负责提供炮弹的将校说野战炮弹只剩下 30 发了。敌人是毕业于南京军官学校的一群青年,力量很强。他们决意以血来捍卫祖国的首都。我军的炮击现在决不能中断。

我和大仲少佐一起乘卡车出发去丹阳。到了句容,碰到了装着野战炮弹的辎重车,就从辎重车上取了炮弹。句容那高得让人仰视的桥梁已经被毁坏了,从桥两侧的破路下到河底,然后再上对岸的卡车、士兵、马匹、水牛、苦力等拥挤着来来往往,很是混乱。用青竹竿拍打着蠢笨的水牛、许多推着车轮的士兵,一片吵吵嚷嚷的呐喊声。拉辎重车的马乱蹦乱跳,人们还没反应过来,马就掉到谷底的河里去了。士兵们脱掉衣服,跳进寒冷的水中。苦力们从河对岸把装着野战炮弹的箱子背过来。长着吓人的黑色凯撒胡子的将校一边用鞭子抽打着弹药箱,一边叫着:“快快的!快快的!”

苦力们一面哭一般地呻吟着,一面拼命搬运着这些将要打死支那士兵的野战炮弹。正在这最为忙乱的当口,我的佩刀突然掉了下去。怎么回事?原来是吊刀的皮带上的金属零件处的线断了。出征前打制这把刀的时候我曾说过“怎么都行,能用就行”的话,现在这样打制出来的刀已经暴露出了它的缺点。除了到上海修理,此外别无他法。幸好,吉川书记官和我同行,我就借了他的佩刀。三辆卡车装着四五百发炮弹返回麒麟门。天开始黑了,我们去了前方一里处的马群镇。我打算夜里自己背着野战炮弹的箱子彻夜工作,但是这一次中川书记官带头干了起来。

三辆卡车出发了。从句容回来的路上,中间的一辆卡车在河流上临时搭建的桥上翻了。临时搭建的桥的圆木头只有一尺五寸宽,翻倒在桥上的卡车的左前轮悬空着,差一点就掉进了河里。坐在这辆车驾驶室里的中川书记官快速从卡车顶部出来,向车里司机打招呼。诙谐的司机回答说:“没事没事!”

我们把后面的卡车停下来,从河里把野战炮弹捡起来,重新装车,顺利地回到麒麟门。运送完炮弹,我们去拖翻了的那辆卡车。大仲少佐也一起去了。绳子断了两次,第三四次终于把卡车拉上来了。我们回到麒麟门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月光清冷,整夜炮声不断。雾霭中可以看到大炮的火光。

第二天也是个晴天,稍微暖和一些。8时左右,在中川书记官的指挥下,卡车从堆积弹药的地方向紫金山后面尧化门附近的部队炮兵阵地运送炮弹。这辆邮政卡车的上方,时不时地有敌军的炮弹呼啸而过,随后就在附近爆炸。下午,我和中川书记官两人在弹药堆积地马群指挥着。从麒麟门到这里有一里路,四面丘陵环绕的街道上,兵马熙熙攘攘,让人无法通过。弹药堆积处附近飘着一个肾脏形状的墨绿色的大气球。三发敌军的炮弹落在背后的山上,它们的目标可能就是这个大气球吧。轰地一声炮响,起初我一直以为这是友军的炮声,不料却是敌军的炮击。这一发落在了部队本部附近。一只信鸽在鸽巢、弹药箱和缓坡上飞来飞去。士兵悄悄地靠近,想把它抓住,却抓不到。卡车回到这里之前,我们也回不了在麒麟门的宿舍,单纯等车让人觉得很无聊。即使到了晚上,两辆卡车还得去丹阳运送野战炮弹。其中一辆卡车的车灯坏了,于是立刻半路返回了。

第二天一早,卡车从丹阳返回了。至此,部队需要的炮弹基本都运来了,我立刻带头,打算领着已经成了多余人员的横山、冈部、小樫、福岛等邮政员和筑地司机出发回上海。我们把能够交付的邮件都交给对方了,运送炮弹的任务也结束了,而且还必须再次执行运送邮件到南京的新任务。就像攻陷上海时那样,南京也有拉锯式的巷战,要攻克南京,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快速从上海返回的话,也许还赶得上看到攻陷南京。我这样考虑着,就和邮政员们约定,肯定会让他们再次看到南京的。即将出发的时候,报社的人对我说:“中岛部队今天早上占领了中山

门的一角,你们要回上海了?”这时,后面的山上出现了残兵,征讨的部队分散追去。已经决定并下过的命令必须实行,我们出发了。

到句容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从句容朝天王寺行进,但桥梁坍塌了,战车落入河中,于是我们又返回到句容,通过恶劣的道路,经过丹阳来到金坛。在金坛城外我们看到一具沾满鲜血的臀部裸露的尸体。风起尘扬,荒凉的田野中呈现出一派国内早春的景象。到了常州,看到被大火熊熊燃烧的房子。附近有堆积的弹药,情况很危险。我们勉勉强强穿过火海,给卡车加了油后来到了江阴。6时15分到达无锡。在局舍的图书室里,下釜司机和一名山室部队的使役兵看守着剩下的邮件,此外还有三个你公^①。我把早上从麒麟门出发时分来的猪肉加上酱汤汁煮,放上从外面“征用”来的蔬菜。我拿出两瓶葡萄酒,请大家吃了一顿。在漆黑的图书室里,你公干活干得很好,我们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即使听到什么东西“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你公们也会非常惊恐。

9时,卡车出发。筑地司机熟睡着,不能开车。不得已让邮政员横山开车。我们快速行驶着,奔驰在既荒芜又空旷的田野上。偶尔碰到单独行驶的卡车或者是车队。车头灯在远处闪耀着。正是因为这路我们走过一次,所以我们才能在这令人不快的月夜中继续赶路。我们数次把卡车停下来,从河里汲水,灌到冷却器里。车上的人们冻僵了,还打起盹来。我们倍感疲劳。星星从眼前划过,好像消失了一样。我时不时地把面包撕碎,放到一直开车、手不离方向盘的横山的嘴里。车窗外,小小的废墟黑漆漆的。无人的水乡如海底一般浮现出来。我们到达太仓的时候,已经是1时30分了。半个月亮金灿灿的。驾驶室里的我不断鼓励横山,小心,不让卡车走错路。4时30分,到达大场镇周宅的寺庙。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我疲劳困倦,睡意沉沉,还像个孩子一样,把袋子里的干面包撒得到处都是。我想在自己的床铺上好好睡一觉,谁知进去一看,不知怎么搞的,里面空荡荡的,积满了灰尘,一个人也没有,也没有一张椅子,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有一张中村书记的贴纸。他们前一天

^① 你公。日本人对中国人轻蔑的称呼。

搬走了。我累极了,感到从未有过的灰心和丧气。5时30分,我们去了上海邮局汇山路的宿舍。这里的电灯亮堂堂的,有很不错的床铺,但是已经快到拂晓了,我就没睡。我的头脑像冰一样清凉,也不觉得疲惫。

12月7日下午5时30分,卡车的仪表显示为332390。9日下午4时在南京郊外步兵学校变为336818。从上海到南京(城外五里处),我坐的卡车已经快速行驶了442.8公里。换算成里的话,有大约110里。13日早上8时35分,我们从南京郊外麒麟门(城外2里半处)出发的时候,卡车的仪表显示为52984。14日凌晨4时30分到达大厂镇周宅的时候显示为53360,5时30分到达上海汇山路宿舍的时候是53372。从南京到上海,我坐的卡车已经快速行驶了388公里了。

我们昼夜兼行,卡车疾速行驶了100里,一口气从南京到了上海。在破破烂烂的卡车上,我和没有驾驶执照的司机一起,在这恐怖的战场荒野上狂奔!

攻克南京

迫不得已耽误了一天的行程,12月15日,天没亮我们就起身了。三辆卡车出发的时间比预定时间推迟了15分钟。和我同行的有六名邮局工作人员、九名士兵、一个勤务兵,此外还有梅森书记官。因为带了被褥、食粮和水,所以装有邮件的行李非常少。

卡车一路顺利。天气晴朗。路上很少有其他部队往来。从太仓开始,我们看到稀稀疏疏的尸体。出了太仓不远,看到支那兵的尸体被狗咬得乱七八糟的。你公被驱使着用泥土把几具尸体埋到路旁干涸的水沟里。攻击战所经过、战斗司令部所在地古里村的路况特别差。数了一下马匹的尸体,不到一里路竟然发现了一百二三十具之多。澄澈的水里漂浮着支那士兵那冰冷的尸体。昨晚的月光下,卡车疾驰而过的荒寂无人的地方是一派水乡景色。我们在常熟的岔路口吃了午饭。路旁有两具积满尘土的支那兵尸体。一具下半身赤裸着,另一具腐烂了,鼻子、嘴巴里都渗出血来。两个都是20岁左右。

无锡的街道依旧荒芜。前些天,街道桥边横躺着的被烧焦了的一丝不挂的尸体,被狗啃得只剩下脚骨头了。前面的司机弄错了道路,朝苏州方向走了好多路,又折了回来。途中,我们看到日本士兵们让你公把一些黑糊糊的尸体烧了。可能是经历了激烈战斗的缘故吧,无锡市内外的居民们是最战战兢兢的了。他们不停地敬礼,那动作搞的太阳都会觉得晃眼。很多贫民拿着锅碗、衣服等来供我们“征用”。大人们让孩子手上举着日本国旗,自己把拿来的东西搁到秤上,之后就排队回到郊外去了。这种情形,我们在其他地方都见过,但是觉得无锡真是很过分。

从无锡向江阴进发的途中,一具尸体靠在比卡车行驶的道路低一些的庄稼地的那端。惟独这一带的水清澈,一片皆绿,很是难得,所以我停下了卡车,在这里做饭。另外两辆卡车不注意和我们的联络,已经在前面走了很远了,他们就在前面烧饭。从上海带来的水好像已经用完了。我乘坐的卡车赶上去的时候,大家都去“征用”葱、菜、猪仔去了。我的卡车独自先往常州驶去。在汽车厂要了两小桶汽油和一个汽油桶。做好各项安排之后,我们吃了晚饭。城门内战壕般的坑里,趴着几具正规兵的尸体。一个人的侧胸挨了刺刀。

月色苍白。三辆卡车本应向南京进发,可是出了城后,森山司机驾驶的卡车却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在南京郊外的军司令部附近,发现了两千名左右武装的敌方残军,这一路上很危险。因此,出于职责,我中止了夜行计划。当初是打算赶夜路的,所以没有联系住处。我在驾驶室里和司机一起睡觉。我们把装面包的大白口袋当成枕头,睡得迷迷糊糊的。夜里,膝盖发冷,冻得很



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疼。早上4时,我从车里出来,正碰上街角的警备兵在点火。火焰赤红。6时左右,月亮下山,一片漆黑。天没亮,我们就出发了,到达金坛时已是

7时15分了。11时20分到达丹阳。在小山上我们眺望古塔。泛黄的河水里浮着死乌鸦,我们汲水做饭。从这里到句容的路非常差,有的地方有十几个农民来到路上,自发地铺砖。天稍有些阴,风势很强。

战斗司令部在距句容四里、离南京五里半的汤山镇。局长滕田事务官从无锡开始随军,在汤山镇也设置了邮政局。我们在这里见到了中川书记官。听他说,我们从麒麟门走了之后,夜里他们就遭到敌方残兵的袭击,那情形很是壮烈。我就两天没在,这里就好像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晚上敌军炮轰麒麟门,十分危险。白天,宿营的兵站里的警备兵也用刺刀杀了一些人。正如所计划的,我军占领着南京的支那邮政局。原来,因为支那的邮政局和外国权益有联系,所以,我军一直是采取避免触及的政策。但是,当敌都南京的形势发生转变后,我军就打算占领敌人的大型建筑物,大肆宣扬野战邮政的存在。卡车如暴风般各自踊跃奔了出去。我们互不联系,都想着哪怕早一秒也好,要早日进入南京城。

很多穿着青蓝色衣服的苦力模样的人,蹲在麒麟门前右边的公路实验所的广场上。这是被解除武装的4000名支那兵。道路两旁也有很多支那兵。他们那瞪着的大眼睛甚是骇人。在弹药存放地马群镇,正进行着针对200名支那残兵的扫荡。我坐在疾驰的卡车上,看到这个弹药存放地又有了两个新墓碑。新的墓碑是为了纪念可怜的抗日女民族英雄而特意修建的,上面用墨写着:“支那女军士之墓”。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来到南京城墙的中山门。几面日本国旗飘扬着,像神宫球场门口一样。城墙一角遭到炮击坍塌了。堆积着木材、沙袋,封得严严实实的城门只有一边开着。南京被攻克了!攻破城门那激动人心的一瞬间,有人感动、兴奋,但是也有人并不如此吧。(从上海出发以来,把卡车要到达的地方和规定的时间都详细记录下来的我,都完全忘记了汤山镇之后下一站是什么地方了。)

进入南京城。混凝土的大路上也飘扬着新的日章旗。兵马纷纷勇猛前行入城。中岛部队的邮局旗帜插到了上海银行的前面,但是我却没进去,而是驱车在繁华的街道上行驶着。国民政府的门口富丽堂皇,院后却是些破旧低矮的建筑物。

南京和上海不一样,没有电车,城里平静安稳。(听说此时南京城内

外的俘虏大概有 42 000 人。)街角的残火还在燃烧,临近黄昏,火焰愈发变红。大路上,从军政部到海军部相距不过几町^①,却让人觉得这里曾是地狱。大概是经过一番整理了吧,尸体很少,但是步枪、钢盔、衣服等狼藉不堪,让人不禁猜想,在这里可能是一下子扫射了一两万支那兵吧。这情景又像是支那兵在这儿脱了军服,换穿便衣。

太阳红红的,就要落山了。被焚毁的卡车残骸散乱着,让人不由得想起用木材和沙袋加固的挹江门发生过凄烈的厮杀。出了挹江门,我们朝扬子江畔火车站附近的支那邮政局驶去。江岸上留有无数支那兵被杀戮的痕迹,扬子江里停泊着驱逐舰。城外的下关一带,和上海闸北一样,被烧得一片狼藉。

在像一家大银行似的支那邮政局前,支那兵的尸体(从脚到腹部都被焚烧了)仰面躺在燃烧着的火堆里。这具尸体看上去是个军官,骨骼坚实,两只眼睛瞪着。在烧过的破烂砖灰堆里,有一具刚刚被杀的中老年尸体,嘴和鼻子里都流出了血,包袱则放在旁边。卫兵从卡车上下来,打开包袱一看,里面是值不了几个钱的衣服和一个空空的小钱包。这个巨大的三层楼建筑物,一楼是邮局,二楼往上是江苏邮政管理局。我把从上海带来的邮政局员和警备兵留在这里,自己则返回中山门附近的中岛部队的邮局。

大批苦力被身佩刺刀的士兵押着,一个接一个地排成队在天色渐晚的街道上走着。这些人都是俘虏。我坐在卡车驾驶室里问押送的士兵,士兵回答说,这些人都是换上了便衣的支那军人,他们一共有三个队,都被我军一网打尽了。带着“日之丸”图案袖章的人很多。有背着深灰色铺盖卷、腰里挂着饭盒的人;有不想掉队急急忙忙奔跑的人,其中还有三个人肩并肩、互相挽着胳膊,好像去郊游一样喧嚷着。他们只要走得稍微慢点,“啪!”就会被押解的士兵殴打。还有十五六个勤杂工模样的人。苍白的月亮升上了天空。今晚是这一大群俘虏历史性的一夜!亡国的悲哀!回到中山门附近的邮局的时候,天色已经漆黑。山森事务官和梅森书记官给原本无精打采的运输兵一些钱,调动起他的积极性,让他去

① 日本旧式长度单位。1町约等于109米。

下关的邮局。

（夜已经很深了，这个卡车运输兵腾腾腾地回来了。他说，下关发生了严重的事情。）

那一夜，下关邮局附近的江岸边响起了激烈的扫荡敌方残兵的枪声。江上的驱逐舰上亮着灯，给人以凄壮的感觉，舰上的士兵们用机关枪扫射试图想顺着浊流逃跑的支那俘虏。

入 城 仪 式

12月17日，晴空万里，天气暖和。今天举行南京入城仪式。仪式的次序是绝密，印刷品等都没有发给我们。国民政府附近很寂静，警备森严。在街角，有一个可疑分子被击毙，然后被踢到公共防空壕里。下午1时30分，我和山森事务官、藤田事务官从国民政府的大门进入院内。从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和海军将校也到了。飞机在晴朗却有薄雾的上空飞翔。大概有61架飞机。将校们紧张地整好队之后，松井大将、朝香中将、宫殿下、柳川中将、海军的长谷川中将，以及一群参谋便开始入城。在院内的台子上，除宫殿下之外，松井大将、柳川中将、长谷川中将起立，在日本国歌《君之代》的吹奏声中，巨大的日本国旗悬挂在国民政府正门最上面的柱子上。他们一起朝东方遥拜。在松井大将的带领下，大家声音洪亮地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庆祝宴会就设在曾经遭到炮击的这座楼里面的一间宽敞的房间里。四位司令官在台上，军乐队的吹奏、御赐的酒和香烟，一片喜庆的景象。还有一些用来纪念胜利的晒干后去了皮的栗子以及干鱿鱼、海带菜和蜜橘。大家虽然简简单单地站着吃，但是今天各位将校的心情很是特别。仪式从2时开始，一个半小时后结束了。

我来到门外，和中岛部队兵器部的片冈少佐一起拍了张纪念照。因为我们用野战邮政的卡车运送了炮击中山门所需的野战炮弹，所以我和片冈少佐已经成了好朋友了。由于少佐曾向中川书记官提议过，所以中川书记官就把缴获的摩泽尔手枪赠送给我。

今天早晨，一个你公被击毙后扔在防空壕里，我来到防空壕所在的

这个街角,看到路面湿湿的,闻到一股浓烈的味道。这是酒的味道。这和我们从苏州的豪宅“征用”来的蔷薇酒的味道一模一样。因为当时我醉得昏睡过去,以至于倒了大霉,所以对于这种酒的味道记得非常清楚。只要走进酒铺一步,光那酒香就让人似乎醉了一般。士兵们把酒坛子抱了出来。店铺里大酒坛的封口被揭开了,士兵们各自舀着酒。小酒坛被打破了,在地上滚动着。因为支局离这里不远,所以我就让士兵用卡车运五小坛酒过去。虽说是小酒坛,但是每个酒坛也能装将近一斗^①酒。地面上酒坛间堆有粪便。我站在柜台旁边指挥,长靴上沾到了粪便,还被酒弄湿了靴子。墙边堆着的很旧的小酒坛还剩下三四个,真是饮之不尽。由于搬运酒坛的缘故,士兵们的胸部都脏了,沾着像红砖灰尘一样的污渍。

我们一起乘卡车出发去中山陵。出了中山门,在右边是山坡松林的道路上走不多远,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了。我们刚开始登中山陵那宽阔的台阶时,一队去“征用”汽油罐的士兵回来了,其中一个人拿着崭新的青龙刀。一个败兵被反绑着双手,被粗绳子强拽着,对此我感到很吃惊。汽油罐好像应该在坐落于通往陵墓的台阶旁的附属建筑里。败兵是摇摇晃晃地出现在附近的松林中或者什么地方而被抓的。他高而清瘦,瞪着眼睛,活像只斗鸡。他好像是负了伤。可能是饥饿或者疲劳吧,从台阶旁的草地下山去大路时,他倒了下去。他接二连三地摔倒,胸膛摔到地面上,很是可怜。被人押着走是不舒服的。在中山陵前面松林中的枯草地上,只见白光一闪,这个年轻败兵就被砍断了脖子。那亡国的悲哀,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在顺着中山陵那高高的台阶而上的时候,我看到从上海开始一直押车的士兵的颈肌。这个士兵是个给人印象很好的年轻人,那脖子的后颈柔软,很有魅力。我多次偷看着那脖子,心想,被一刀砍断的就是这样的脖子吗?中山陵的门和殿堂上面都覆盖着竹子做的临时性架子,这是用来防空袭的迷彩伪装。石阶很宽,十分壮观。中间放着青铜大鼎,上面留有小型炮弹和枪弹的痕迹。石阶上还有威武的白色大理石狮子。山

^① 日本容积单位。一斗约 18 公升。

顶殿堂中有白色大理石的孙中山半坐雕像,雕像上的鼻梁被击穿了。有个房间用钥匙也打不开,我们把门打破后进去一看,里面的绒毡子还有其他东西正在燃烧,冒着烟。我们在中山陵上瞭望笼罩在暮霭中的南京街道,附近的天空飘着炮兵阵地的两个气球。我们从几百级石阶上面一步一步走下来的时候,一个士兵向远处抛出铜钱,那铜钱就咕噜咕噜地滚走了。在乘卡车回去的路上,从中山门前,我们碰到了大批被解除武装的支那士兵(大概有7200名吧)。这是大规模的乞丐行列,没有一个像样的人。

傍晚,我们回到邮政局本部。本部前面有纸店,我们去征缴来了手纸。纸店旁边是性病医院。进去看了看,没什么特别的,厨房后面有防空壕。本部隔壁是钟表店,阁楼架着梯子,闹钟被搬到本部了。本部的后面有个石头小圆井。红色铅笔、毛笔、笔记本等都被“征用”了过来,杂乱而繁忙的邮局事务中能用得着的东西都被利用了。晚饭是用正宗的中国大米做的,筷子没法把毫无粘性的米饭夹起来。傍晚,见到了一个被士兵带到局里来的小人物。他是个穿着黑衣服、老实的13岁少年,非常听士兵的话。这个男孩子来自句容的寺庙,所以认得不少汉字,苦力很佩服他。他的母亲被杀了。离开句容的时候,他悲痛万分,号啕大哭。到了晚上,远近的大火还在继续燃烧着。

18日5时,传来了军队嘈杂的脚步声。7时,天色昏暗,伊东部队的两辆卡车出发了。新闻记者和电影班的人也顺便搭乘这两辆卡车。这两辆卡车是由伊东部队专门调拨给上海邮局本部的,用它们为军队运输邮件。现在来到了南京,雪花纷纷落到车前灯上。中山书记官的卡车迟了25分钟才出发。天气阴霾。森田书记官乘飞机从上海局本部带来了航空信件。乘军用飞机从上海到南京需要三个小时。藤田部队的局长渡边书记官也来了。因为下釜和筑地司机的卡车已经到了,我就到城外二里远的藤田部队本部的所在地土山镇去了。谈完要事之后,回来时在城外走错了路,我跑到一片肮脏的房子边。地上躺着五六具尸体,一位胖墩墩的白发老太婆也横躺在地上。她和我的母亲相像,不快的感觉涌上我的心头。晚上,在邮局本部的院子里,我们围着火堆聊了很多。大家心情很好,说话就无所顾忌了。南京陷落这一引起巨大震动的“巨涛”

使无锡、常州那些废墟之地发生了什么？军中司机老道地对同事们说：“别光谈那些好听的事了。”

最初，我们从上海出发的时候，预定的南京陷落纪念邮戳已经做好了，所以我就把邮戳也带到南京来了。邮戳图案是请从军画家田代君画的，图案中，城墙上林立着大日本帝国的国旗。我们要用红色来盖这个邮戳。

“本处加盖南京陷落纪念邮戳”。

18日，这张告示大受欢迎。进入南京城的士兵们都去邮局本部要求加盖南京陷落纪念邮戳，因而邮局所在地上海银行拥挤不堪。其中有人穿着鞋子站在柜台上，被将校呵斥。有个中队长带来满满一包袱明信片，说士兵们每人一张，都想在明信片上加盖纪念邮戳。邮局关门之后，局里的工作人员点着蜡烛，一个一个地加盖邮戳直到深夜。21日，两枚邮戳中的一枚被偷了，场面就更加混乱。一个士兵在南京军官学校的信封上加盖了陷落纪念邮戳之后，正准备捎信给家里说进入南京城了，这时一个古董商要用20日元收购这信封。因为《日日新闻》报道了纪念邮戳的事，所以日本国内也有大量的人要求加盖纪念邮戳。

21日，邮局本部开始受理汇兑业务。这一天共办理了19 000日元的业务。士兵们蜂拥而至。单据用光了，太繁忙了，连我也在帮着把“征用”来的白纸裁开做单据。

卡 车

南京下关的支那邮政局是个气势磅礴的大型建筑物。江边被扫荡的残兵白骨累累，重重叠叠地堆在道路上、码头下面和堤岸上，其凄惨景象无与伦比。此外，还不知道有多少尸体被长江的浊流所吞没冲走。关东大地震的时候，我在国内的绿町河岸边看到过好多死人叠在一起，但是和眼前这一情景根本无法比拟。夺命的子弹、刺刀，猛烈地施加在他们身上。也有半裸的尸身。还有浇上汽油被烧焦的尸体。尸体旁，从船上卸下来的用草席包着的大酒桶，像庆祝胜利似的堆积如山，哨兵们就站在酒桶上警戒。这是个战胜国和败亡国形成鲜明对比、令人印象深刻

的情景。

我们自从上海战役以来,在邮局本部非常辛苦。因此在南京的时候,战斗司令部还在汤山镇,我们就和主任参谋商量好,让我们接收城里的支那邮政局。因此,12月16日,我们像松鼠一样敏捷地占据了那儿,并且上面贴上了野战邮局的标牌。但是,工兵队小池部队却冲进来占领了支那邮政局,结果发生了一场纠纷。他们说这样不行,因为他们是拼了命才占领这儿的。最终,标牌上写成了“野战邮局 佐佐木”,其原因是因为主任参谋是佐佐木大尉,所以决定采用他的姓氏,而邮政局则完全由我们所占有了。绿色的支那邮政旗帜从屋顶的柱子上被降下来,而野战邮政旗帜则迎风飘扬。

这个邮政局的入口处堆着沙袋,成了野战工事,邮局内外扔着敌人的机关枪、佩着抗日袖章的衣服等,都是些没什么大不了的東西。邮局有八辆绿色的大型道奇卡车,这可是非常棒的车辆。在敌人要逃跑的时候,因为这些车里的零件被拆了,所以敌人无法挪动它们。我们仅仅留下被工兵部队开坏了的一辆支那车辆,把其余的道奇卡车全都牵引到城外的工兵学校去了。卡车是野战的脚和身子,是野战的支柱。进攻中山门的时候,三辆卡车承担了运送炮弹的任务,由此可见卡车是多么重要了。

12月20日,晴朗。我去了汤山镇战斗司令部。出了南京城,看到田里、小河里都结着薄冰。在司令部,我见到了佐佐木参谋,请他在名片上写下对卡车的分配意见,然后就出发去工兵学校。半路上,卡车陷在田地里,无法前进。我为了询问不清楚的事情,去见了部队长官。我接收了被扣押的三辆卡车。时间已经是中午了,他们请我吃了烤饭团。回去时,我来到了光华门。这里有名的战场,是胁坂部队第一个攻进来的。有两重高大而坚固的城门,上面血迹和硝烟非常明显。在城门,我见到了部队长官人见大佐。松井部队本部在大场镇周宅的时候,他是从高级副官之任调到前线,才成了部队长而奋战沙场的。由于宫殿下巡视的车将要通过,于是我把卡车停在岔道上,下了车。

我们一回到邮政局,中村书记乘森山司机驾驶的卡车就已经在局里了。他们早上7时30分从上海出发后,像参加赛车一样急速飞驰,傍晚

4时30分到达南京。毫无疑问,我们就是再拜托森山,他也不会再开车了。因此,下釜司机和我又出发去工兵学校,把两辆涂成绿色的卡车拖回来。给后面两辆被拖着的车也都配了司机,以掌握方向盘,真是煞费苦心。天色已近昏暗。在光华门,激烈战斗的痕迹以及造成的堵塞刚刚被迅速清理了,但坡道还很陡,卡车上行了很多次,但都后滑而无法过去。卡车一辆一辆地被分别拉着,通过了这个英灵长眠的城门。由于火灾,街道上的天空全都映红了。我们终于回到邮政局,大家为成功而欣喜,然而,这一切转瞬之间却又都消失了。次日,我们起床一看,发现昨夜拖过来的卡车里,有一辆被偷走了。用绳索拴得好好的卡车竟然被盗!怎么会出这种事情?!这次的丢车事件使我以后对所有的事情都严加防范。经我煞费苦心才归野战邮局所有的三辆卡车,其中一辆被偷了,其余两辆被拖到汽车厂里,因为没有零件,总是无法修理。“征用”的卡车在兵器部没有记录,所以,修理的事情总是没什么进展,最后,剩下的两辆卡车也在汽车厂里不知所踪了。

22日,晴朗。7时,我们乘卡车出发了。和中村书记去了下关火车站。天气寒冷。月台上有血迹。昨天,货车第一次试运行,而半路在镇江脱轨,一节货车落到了河里。这四节简陋的货车要回到上海没有两个晚上是不行的。因此,我打算不乘火车而坐卡车回上海。城外飞机场驻扎着吉住部队,局长新谷书记亲自把我们从上海运送过来的邮件中的一些信件交给了部队长官,他非常高兴。局长终于露了一把脸。由于部队出发前往苏州,邮局也必须撤回去。卡车乘得满满的,除了局长新谷书记官之外还有分配来的士兵。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被抛下来的话,那是令人无法忍受的。12时15分,我们过了中山门。汤山镇的战斗司令部今天也撤离这里,邮局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真是严冬萧瑟的丘陵地带。大家都去附近的温泉了吧。汤山镇的水温过热,却是支那少见的温泉地。这里以后成了受伤、生病士兵的疗养地。

从这儿出发之后,卡车以时速45公里到75公里的速度飞速行驶着。森山司机的驾驶技术很好。在江阴附近,车突然停了下来。森山司机下了车,拎来一只鸽子,它的翅膀和头耷拉着。这只鸽子飞过的时候没有及时避开疾速行驶的卡车而撞到卡车前部,它的尾巴和翅膀被撞掉

了,当场死亡。在这儿,有人用在南京捡到的支那枪开枪射击。江阴附近有很多野鸡,它们时常出没在道路旁,这枪声就是打野鸡的。你公纷纷从田里逃向丘陵。啪!子弹落在道路上,你公便突然倒在地上装死,然后再爬起来逃跑。还看到有些人拼命地拉着孩子的手逃跑。我们开枪是闹着玩的,所以让人觉得他们又可怜又可笑。森山司机拿着枪追赶着,离野鸡十米的时候,野鸡低低地飞走了。胖乎乎的森山司机在田间小路上拿着枪追赶野鸡的样子真像个孩子。

司机不在,大家就休息了。道路旁边被火焚毁的荒废的房子里,有只瘦瘦的黑母猪,它虽在暗处,但还是被我们抓住了。士兵们把母猪放了,然后又去追它。士兵们用枪托殴打母猪,它在烧塌的土墙边被抓到了。母猪的鼻子被踢出了血,四只蹄子被士兵们用绳索、布条捆绑着吊在卡车尾部。森山司机玩够了打野鸡后,回来了。卡车又出发了,可是没走多久,轮胎就爆了。这个轮胎是司机昨天在汽车厂的时候从别的卡车上偷偷卸下来安在自己的卡车上的。

(下略)

[佐佐木元胜:《野战邮政旗》,
现代史资料中心出版会(东京),1973年4月20日。]
(吕斌 译 何慈毅 校)

21. 众所周知的事

——百万支那派遣军造成的中国妇女受难记

藤原审尔

(前略)

上海附近

所谓上海北部地区的战斗,就是将我头脑里那种国内人的思维方式一下子摧毁殆尽的战斗,那是一场接一场的苦战啊!

可是仔细一想,觉得是理所应当的。本来就是我们侵略了他国,完全不熟悉当地情况,而中国军队的谍报工作又非常优秀,当时觉得已没有生还的希望了。

我要讲的是登陆几天后的事。当时我们看到一张遗留在上海郊外一农户家地上的报纸,报纸准确地报道了我们从宇品港出发的时间,连获洲部队的编制情况、战略目标,直到部队长官的经历都详细描述了。那些情况我们也是看了报纸后才知道的。

从那一刻起,我们就非常惧怕当地的中国人,并开始按照命令将偶尔抓到的百姓及俘虏都杀死了。

是啊,没有比杀人更讨厌的了,但我们却被比杀人更可怕的一种无形的恐惧缠绕着。好像突然间哪儿被袭击似的。甚至连老老实实地任我们劳役的老人,也因他是中国人而让我们寝食不安。

而且,被深深地灌输了“必须习惯杀人”的思想。那些杀了人的士兵受到赞扬并且很快得到晋升。

我们干的那些暴行,连魔鬼都觉得惨不忍睹。那些暴行更加激发了敌人的斗志。敌人顽强地抵抗我们,好像要将我们在日本长期灌输的蔑视中国的本性撕去似的。部队长训示时说:“到处都在围歼敌人。”这根

本就是无影无踪的漂亮话！实际上我们是一对一地相互射击，进行堑壕战。

要说的事发生在上海郊外的棉花地里，情况是这样的，当时双方彼此相隔三百米左右，不时地还能听见对方夹杂着女人的说话声。敌军战壕不是我们那种简易壕沟，敌军是从馒头状的厚厚掩体下的射击孔向我们射击的。对方如果不是盲目射击的话，我们必须蹲在壕沟里。有时手刚伸出去想支起枪身，早已准备好的敌军就“哒哒”一下扫射过来。

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才知道那一带过去是敌军十九路军的演习地点。毫不知情的我们竟来到了敌军早已架好枪，经过充分准备的地方。敌军正等着呢，“你来啊！来啊！”近十天时间，一直持续着那种战斗，每天都有人伤亡。

作战时，伤员就无人过问地躺着，等天黑后再送往后方。伤员沾满泥土的伤口肯定是红肿流脓，散发着恶臭，长期无法痊愈的。不知为什么，在这布满河渠的地带，泥土中好像有特殊毒菌似的，它使我军的斗志迅速下降。

曾经有一天，刚被送到后方的士兵一瘸一拐地归队了。他说，在野战医院里，部队长亲自解开轻伤员经过治疗的伤口上的绷带，并用力撕下伤口上的膏药，严格检查后觉得没有问题，就说：“不要紧，没问题。这点伤，前线多得很！部队长不允许有人偷懒！军医，让这个士兵立刻回部队去。”听说部队长就以这股劲在野战医院的帐篷里检查了大半天。

在那之后不久，我的军人手册中记载着这样的内容：自11月3日至11日，在罗店镇南北战线进行防御战。

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中国军队的抵抗也非常顽强。即使日本军队擅长防御战，但在炮火的集中打击下也显得一筹莫展。

那以后，我们进入罗店镇南北战线以北一处叫“王宅”的村落露营，当时又受到狠狠地打击。

那天，我们在竹林后面挖了战壕，宰了征来的猪，正在用火烤着的时候，敌人发现了我们做晚饭的炊烟，于是事先瞄准好等着。天一黑就集中火力向我们猛烈射击，我们慌忙应战，可是天黑再加上前面的竹林挡住了视线，根本就是盲目射击。而且我方一射击，敌人的弹着点反而更

准确了。不一会儿，战壕中就因堆满战友们的尸体而无法走动了。硝烟味和流出的鲜血使我们充满了紧张感。我们只是紧紧地握住枪，将枪架在尸体上滑来滑去地胡乱射击。当东方发白，周围开始亮时，我们环视一下四周，不禁吓出一身冷汗，许久无人吭声。

地面以上五尺来高处的竹梢全都朝着一个方向垂了下来，不用说是敌人用机枪、步枪打折的。而且，当时还让我们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事实，即敌人在那天晚上射出的几乎都是日本造的三八式步枪子弹。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裁军时，日本的政治家曾经强迫中国大量购买三八式步枪。也有人说：“是不是就是那时的货啊?!”因果轮回，我们看着吃了这枪弹的士兵尸体不由得怒火中烧。

活 体 实 验

有个叫新井田的见习士官军医，虽然不知道他是在民间医科大学受过的教育，还是毕业于军医学校，但作为军医，只要看看他收治罗店镇战斗的伤员时变了的脸色，就知道这位速成新手是多么不成熟，作为医生是多么没经验了。看到被迫击炮弹片削去右腿上肉的伤员，他吓得脸色煞白，真不知受伤的到底是谁了。伤员要摊上这么无能的军医，可算倒霉透顶了。

可结果怎么样呢？随着我们一次次投入新的战斗，新井田军医也迅速成长起来了。他技术娴熟，盲肠之类的手术不用 20 分钟就解决了。对新井田来说，每天连续不断地做外科手术。或许是因为在短期内被迫做了在民间医院几年做的手术量，当然是既锻炼了胆量，也提高了技术。问题是，新井田在技术熟练的同时，每时每刻也在失去人性。这远不是粗暴冷淡地对待患者这种程度。

话题说远了。那是在南京沦陷后，我们驻扎在安徽省定远镇郊外时的事。是登陆后第二年 3 月至 4 月间的事，那段时间比较安定，没什么事。野战医院收到一批预防传染病的注射用新药，即军事用语称“三种混合”、“四种混合”的药物。就是说，如果注射一种药就可以预防三种或四种传染病。由于打过针会发烧，需要盖上毯子睡觉休息一天。于是，

士兵们都踊跃地接受注射。

然而,这种药不断发生事故,就连我们班的士兵也有人摊上了。接受注射的胳膊上部又红又肿,发起高烧来就像得了疟疾,痛苦不堪。此时,我们才听说,有通知说是因为发错药了,要停止使用。我感到万分愤慨。

“被当成豚鼠了,能受得了吗?”我们这样叫嚷着,可毕竟发生在士兵身上。哈哈,哈哈,军医笑了两三声,事情就了结了。

那时,我接到新井田军医的命令:明天上午,带四个俘虏到野战医院来。新井田军医在命令书上用非常拙劣的字写上附加条件:特别需要体格强健、倔强的人。因此,我对为什么要带俘虏去,大概心中有数了。

我管理着16个俘虏,都身着便服。因为都没认真调查过,所以对姓名、经历之类的情况都不清楚。据说是附近没来得及逃跑的农民。那段时间虽要求抓到就杀,但如果对方不抵抗,一般不会逮到就杀的。至少命令不是强制的。

我挑选了四个人,告诉他们,明天上午要转走。他们点头致谢说:“谢谢!”那天晚上,让他们吃了很多特别伙食。

次日清晨,我把四个俘虏交给了新井田军医(此时他已晋升为少尉)。我无法忘却当时的情景。

要去的地方是野战医院,一看到身着白色手术服出来的新井田军医,四人好像一下猜到了什么,全都泄了气似的瘫软地蹲在地上。一个最年轻的、20来岁,看上去聪慧的青年人向前跨了一步,使劲地摇晃着同伴,向同伴们说着什么。好像在说:“既然要死,就要死得像堂堂男子汉!”他勉强地朝那些胆怯的人微笑着,温柔地注视着每个人。突然,他将身体转向离他们不远的我,从衣服里面拿出似乎一直藏着的银元,“送给你吧……”说着伸手递给我。好像说:“俺已经不需要钱了,用这买个馒头吃吧……”他用力挺起宽阔的胸膛,笑着一动不动地伸着手。我气得直想张口大骂:该死的!小看我了。然而,我却被他的气势压倒了,吓得说不出话来,竟身不由己地接过了钱。

在那个青年眼里,我一定是像狗一般卑贱的动物吧。至今我仍忘不了那位青年当时的眼神。

将俘虏和豚鼠等同看待的想法,不仅仅只是满洲关东军干过的、成为国际性问题的活体实验。在整个支那派遣军中,从上到下活体实验都横行无阻。因此,也不能说只是那位公子哥般的新井田军医特别没人性吧。

总之,之所以毫无顾忌地断定那四个俘虏成了活体实验品,除了那以后听军医说,这种事情是极平常的之外,还有以下的事实——

那时候,在定远近郊的警备范围内,我们养了一个从中国方面接收来的慰安妇,二十五六岁,皮肤略黑,圆脸。只要一见到我们当兵的,就立刻仰面朝上掀起衣服呆呆地笑。她是个花痴。曾被本国军队的士兵强奸过,最终则成了日本军队专用的慰安妇。即便是疯子,也许她也知道只要毫不犹豫地让日本士兵做那事,生命就有保障了吧?那个女人也被她的中国同胞所抛弃,最终成了附近惟一的中国人。

我们不断地去这可怜的女人那里,但不久就发布了严禁的命令,因为知道她被传染上了严重性病。

有一天,我值勤后,背着军医及下士官偷偷地喝着兑了水的医用酒精时,当过药剂师的卫生上等兵慢悠悠地出现了,他恶作剧般地笑着说:“让你看看非常有意思的东西。这东西难得一见啊。”我悄悄擦干嘴巴,若无其事地跟着他去了。途中,新井田军医也来了。边走边听他们说话,我才知道他们两人现在正打算将那个花痴大卸八块。大概是92度医用酒精起了作用,我居然满不在乎地跟去了。在有支那特有风格院子的那个女人家里,我帮忙在门板上铺上毯子做了个临时手术台。卫生兵很轻易地就把那女人带了进来。新井田军医指示她躺下。那女人全然不知这是死刑台,露出领会了的神色躺了下来。因为知道这种事军官优先,甚至用献媚的眼神一边朝着新井田军医点头示意“是您吗?”一边开始脱下了裤子。

新井田军医用眼神向我示意按住仰卧着女人的脚,一边不慌不忙地将藏在背后的注射器拿到自己胸前。他用敏锐的目光飞快地扫视了一遍完全暴露的女子下腹及阴部。当脊髓麻醉生效、女子完全失去知觉时,新井田军医用手术刀划进下腹部,对手术习以为常的卫生兵一边看着女子脉搏,一边摆出随时注射强心剂的架势。

“就是想快点看到阴道里面啊。”

“这个色鬼，嘿！别那么急嘛。”

两人像在烹调一条美味大鱼那样交谈着。我再也看不下去就走开了。这类情况，甚至没有一点医学的探讨价值，只是产生了卑鄙的好奇心，想夸耀自己能满不在乎地划开活生生的女人腹部，并切碎生殖器这野蛮行为的胆量。

五个月前，一看到迫击炮炮弹造成的伤口就止不住打颤的满脸孩子气的男人，如今竟兴致勃勃将一个废人般的女人活活地大卸八块。

我也完全成了同犯。虽然我中途离开了，但不是因为憎恨、愤怒和抗议军医，只不过是因为不习惯，感到恶心罢了。

我拼命地向被扔进院子里坑中的女尸上盖土，对自己的神经在不知不觉中适应这种事而感到恐惧。我回忆起从前的我，那时的我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做这种事。我感到再也无脸回到老婆孩子身边了。

俘 虏

从无锡市向扬子江畔的江阴城进攻是在12月上旬。从这时起，战况终于有利于我方了。俘虏数量也骤然增加了，我们已知道使役他们的好处，为所欲为地用完后便一个个杀掉，然后继续进攻。

使用时是工具，可杀的时候毕竟是人啊。

杀人渐渐成了负担。每天分摊杀的俘虏中，即使有一点像自家亲人，就用钱与其他士兵换俘虏杀。怎样才能既杀了人又不触动我们的神经呢？大家互相交流各自想出的方法。

结果，最受欢迎的方法是让迅猛行驶的坦克用履带碾压。只要在瞬间下决心，就了结了。从感受上来说，这种方法最轻松了。

比如当我们艰难地沿着山路或泥泞道路行军时，友军坦克从后面开过来。坦克部队是绝不会因为本国部队的士兵聚集在那里而停下来的。曾经见过因发愣而跑慢一步的士兵被坦克碾死的。当然，可恶的不是压死人的坦克，而是妨碍坦克行驶速度的士兵。此时，我们拼命地紧贴山壁，给后面的坦克让路。但可以利用这种机会“干掉他们”。那天晚上，

我们突然猛地一下将准备杀死的俘虏向坦克踢去。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杀死俘虏的方法似乎越怯弱的家伙干得越多。

还有一次,大概发生在从镇江附近的村落开拔、即将要夜行军之前吧。我们堆起抢来的家具、椅子等,点燃大火堆驱寒时,突然听到有人大叫:“我要干了!”刚回过神来,只见一个叫川添的年轻士兵突然从后面一把抱起正盘腿坐在熊熊火堆旁的人,扔进正熊熊燃烧的火堆。那人此时正吸着别人给的“誉牌”日本香烟,是个当天挑了一整天重担、50来岁的农民俘虏。“哎呀!”农夫绝望地喊叫着,像从火堆里弹起来似地冲出火堆。川添用不亚于那农民的力量张开手抱住他,再一次猛地将他推进火堆里。

被推了回去的俘虏屁股着地摔倒在火堆里,就像焰火猛地爆发出无数火花那样,激起了更加猛烈飞舞的火星。但他紧接着在火焰中再次“腾”地站了起来。他高举着双手,就像一座凝固的巨像般威严震慑。他确实要比活着的时候高出了五寸多,那一定是因为四肢及腰的关节发生了变化,所以那人的身高变长了。那不自然地绷着的双手和双腿,伸长至极限后又慢慢地垂落在火焰里。

喘着粗气的川添仍旧直挺挺地站着,瞪着大大的茫然的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儿。

我知道在中午时,军官就曾用手戳了戳川添说:“喂!怎么搞的?还不快点收拾那家伙。”

“快干掉他!”军官每朝他喊一次,川添的身子就禁不住哆嗦一下。

南京大屠杀

这是自上海登陆两个月后的12月8日前后发生的事。那时我们抵达了距南京还有一天路程的地方。当时南京已经沦陷,正在进行以城里普通居民为对象的、臭名昭著的大屠杀。我虽然幸好没有直接参与城内的惨剧,取而代之却是必须清理位于南京城北乌龙山麓的数万具被屠杀的尸体。

我们宿营在据称是官立学校的校舍里。次日凌晨,刚吃过早饭,突

然传来“带着午饭行动,全体立即轻装集合!”的命令。在全然不知目的地和任务的情况下,步行了近八公里,一下子被带到乌龙山麓的屠杀现场,到达时间大概是10时左右吧。

那里的地势是,一面是乌龙山麓,沿着山路下坡来到扬子江边的一片地势平缓而开阔的大沙滩上。整个沙滩活生生地展现出一幅上半夜制造的地狱般人间惨景。看惯了战场,对一切已经满不在乎的我们,都惊骇得呆立着说不出话来。

听说在这里杀死了两万多人。还有的说是四万人。这些都不是南京城里的居民。据说是南京周边地区被战祸所逼准备去城里避难、完全没有战斗力的逃难民众。但部队让他们集中在这片沙滩上,断绝一星期左右的粮食。既不给吃,也不给喝,就这么弃之不顾。在我们来清理的前夜,两个机枪小队奉命一起从路上朝集中在下面沙滩上的人群射击。发布此命令的高级军官大概认为:对方没有防备,加上已断粮一星期,体力已消耗殆尽,两个小队的机枪就足够了。而他们失算了。他们忽视了那些面临死亡的人们发疯般挣扎所爆发出的异常力量。没喝一滴水的两万民众,对日军的仇恨所形成的能量是多么可怕的力量。那些因暂时胜利而得意忘形的军官们是根本无法估计的。

夜幕刚一降临,机枪就咆哮着开始射击了。“哇”地一声,难民们的怒火一下爆发出来。刹那间,他们意识到喷着火舌的机枪意味着什么。他们大声呐喊着像雪崩似地朝着机枪小队冲过去。毕竟是潮水般人群,就像聚集着覆盖整个宫城前广场的人群,满腔怒火地蜂拥而至,两个机枪小队一下被冲垮了。

汽车队的士兵们正在略高一点的路上观看屠杀,此时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卸下车上的汽油桶,让油桶顺着斜坡倾倒,再点火把油桶推下去。

车队部队原先就准备在机枪部队单独完成杀人任务之后,往尸堆上浇汽油,干净利落地把尸体烧光的。这多少还能消除一些罪证。结果根本没能按计划进行。因这瞬间果断的决定造成的迅猛前进的熊熊火墙,挡住了蜂拥逃离人群的去路。无法逃跑的结果就是统统死光。然而,听说其代价是友军的两个小队也葬身其中,随人群而去了。

这是后来从那天晚上在车队里的一个士兵那儿听来的。

不知实情的我们沿着山边道路来到现场。首先让人吃惊的是丢弃在路上那无数的钱币。有铜钱、银元，还有像蒋介石政府当时发行的小小圆形硬纸上贴着银纸，如同玩具一般的钱币。几百米长的路面上撒落得到处都是。我们一边受到异样的好奇心的驱使，一边沙沙地踩在它们上面。这些一定是从牺牲者那里没收来的，但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它们抛撒在路上呢？也许是吝啬钱财的中国人大概已意识到了什么，让他们集结到沙滩的途中，自己就一路扔着钱走的吧。

我们奉军官的命令将现场的尸体扔进扬子江。现场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恶臭，当时，大家都慌慌张张地拿出布手巾包住嘴巴和鼻子，捂得简直透不过气来。

“俺们也不是为了摆弄死人才到大陆来的！”

也有人这样嘟囔着，唠唠叨叨地说的也有道理。与其做这样的事，还不如去做更危险的、和敌人作战的事。

因为靠近江岸，干起来还比较容易。我们苦着脸、闷声不响地慢腾腾干起来。虽然从其他部队也调来了许多人，但不管使多大劲，处理如此多的被烧死的尸体也不是件容易事。我们竭尽全力搬运，可进展还是很缓慢。我们盼着“停止干活”的命令。马上就下令了吧？下令了吧？就那么急切地盼望下令歇工。军官也没了平时那股傲慢劲，用妥协的口气说一些“每人只要扔十个就休息吧”之类的话。

那天真不巧，天气很好。随着气温升高，变得越来越无法下手了。原先尸体是被夜里的寒气冻住的，但一回暖，恶臭就愈加刺鼻，搬运起来也越发难以下手了。有人想了个主意，折断江边的柳树，将一头削尖，用它当鱼叉使用，将尸体两具、三具地穿成串，两人一组拖至水边。

最上面的尸体烧成焦黑色。但搬掉上面的一两层后，越到下面尸体越新鲜，还像活着似的。使劲猛一戳的话，鲜血便喷得到处都是。布袜子、绑腿上糊满了鲜血和泥土，脏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干也干不完呀，干这么久了还像一点没干似的。”

状况一点没变。满眼望去，全是烧焦的尸堆。无论我们费了多大力气，简直就像赶米仓里的老鼠似的，永远清除不完。加之河边已经堆满

了尸体,就像浮在死水上的垃圾,一个劲地扩大面积。两三个士兵找来一只小船,划到尸体集中的地方,想借助水流将尸体冲走,但只推走五六具尸体就因无法干而放弃了。

下午3时左右,我们自行停下不干了。军官也不吱声,装作没看见。

“以后打算怎么处理呢?是不是还要再烧一次?”

我在心里茫然地想着。我甚至还觉得,也许是这些无辜者的仇恨,不允许日本军做这种毁尸灭迹的事的。

归队后,足足有两三天我们谁也吃不下饭。一看到饭,就被涌上来的呕吐感折磨。无论怎么换衣服、洗澡,也消除不了渗透到每个毛孔,甚至渗透到鼻腔黏膜里的尸臭味。大家见了面也是相互耷拉着眼皮不说话。

有关南京城内无数更残忍的事,时至今日也不想再说了。那一来是因为太著名,二来也因为不是我亲眼所见。

我也参加了好像是在12月14日举行的南京入城仪式,只是从表面看,我们行进的道路上的屠杀痕迹已被清除干净了。

12月23日,我们在下关集结,准备离开南京去安徽省。大家正排着队,等着乘船去扬子江对岸的浦口,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有个士兵正指着系在岸边的一只小船。原来那儿有一艘酷似日本河船的狭窄的船。据他说,日军先让南京市民坐满一船,然后,有时是用一艘摩托艇猛地一拽,船就被一下子拽翻了;有时则等船被拖到江心,然后只要打上几枪,那时船上的人会被这突如其来的残忍举动所惊吓而一下子站起来,从而引起混乱,船体也因此摇晃并失去平衡,这样船也很容易翻沉。据说,船员越是用计谋让坐在船上的人放心,其效果就越佳,从而越具有娱乐性。南京附近江水中的旋涡非常可怕,会游泳的人也难以逃脱,更不要说是在这隆冬季节了。

我还目睹过比这更加残酷的情景。那是一大片堆积着几千具中国正规军士兵尸体的景象。真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正规军士兵的尸体,他们死的样子也是很奇特的。首先是没有外伤,然后是倒地的位置都在下关大堤下方。看起来好像都是艰难地才爬到那里便气绝身亡了。也就是说,他们的目标都是要往河里逃。但逃跑的方向不合

理,所以他们不是为了逃跑才往河边爬的,只能推测他们都是想去那里找水喝的,不可能有其他原因。

“是中了毒气弹造成的吧?”我们互相嘀咕着。

“是的,是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这样肯定地说。

(下略)

[藤原审尔:《众所周知的事——百万支那派遣军造成的
中国妇女受难记》,春阳堂书店,1957年4月15日。]

(罗文文 译)

22. 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

——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

曾根一夫

(前略)

一、南京屠杀

昭和战争

近来,每当我与别人谈起战争的事情时,常会感到对方的理解力似乎愈来愈淡薄。也许这是因为战争结束至今,已有一段很长的岁月,时代的变迁,使知道战争的人愈来愈少,不知道战争的人愈来愈多,所以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

而且,体验过战争的人和未曾体验过战争的现代人,对理解战争情形所具备的基本常识完全不同。即使很简单的事情也必须一一加以注释,否则他们就无法了解。时代的变迁,说者和听者的时代背景不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另外,谈到战争的事情时,最感到头痛,就是事变或战争的名称太多太复杂,明治和大正时代的战争,因为名称都很单纯所以容易懂,但昭和时代的事变和战争的名称实在太繁多了,太复杂了。

从1931年9月发生满洲事变到1945年8月太平洋战争结束为止,其间就有满洲事变、上海事变、北支事变、支那事变、日华事变、日支事变、日中战争、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等数不清的名称。

因为战争的性质很复杂,所以对当时战争不了解的现代人而言,当然会怀疑为何有这么多的名称?到底何者才是真正的名称?这么多的事变和战争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实在令人费解。

因此在说明战争的事实之前,不得不先说明有关这一方面的问题。

我想就满洲事变开始,依次向大家说明。

满洲事变是日本在满洲(中国的东北地区)进行的一项军事行动。它主要的目的,是想在满洲造成五族共和的局面并将它建设成为一王道乐土,由大日本帝国来统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先使满洲国独立,而实际上是成为日本附庸的一个新国家。

1931年5月31日两国签订塘沽停战协定^①后,表面上满洲事变已结束。本来,此事变结束后日本必须从满洲撤兵,但日本却从未依照协定进行撤军。后来还继续从日本运来满洲派遣军,支援常驻在满洲的关东军展开军事行动。

另有一种说法指出:“满洲事变就是发展15年战争的第一步”,所谓的“15年战争”,是指从满洲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前后15年间所发生的一连串战争。

如此说来,满洲事变的确尚未完全终止。而且大东亚战争也是满洲事变的口号的一种扩大,即“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两者可以说有完全直接的关联。

大东亚战争的口号“大东亚共荣圈”,表面上是指包含东南亚、印度等地区的人们,应该确立共存共荣的意识。而实际上是要将人们控制在“大日本帝国天皇”的淫威卵翼之下。

满洲事变期间的1932年1月,发生了上海事变。它从1月28日开始到3月3日,为期很短,据说此事变的发生,是日本方面故意安排的一项阴谋。

日军图谋使满洲国独立的计划和行动,引起世界各国的注目,阻碍了它的进行。为了转移各国的注意力,日本故意选择在国际都市“上海”惹事。而它所以在短期间内就平息的原因是,因为在这段期间内,满洲国独立的准备已经完全就绪,上海事变的任务已经圆满达成的缘故。

接着是1937年7月,由卢沟桥事件发端的北支事变。一般大众都将中国大陆称为支那大陆。此事变发生于中国大陆北部,所以称为北支事变。

北支事变是1937年7月11日,日本政府公开发表的正式名称,但如

① 原文有误,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期应为1933年5月31日。

今已不被使用。因为在上海发生大山海军中尉事件后,战火逐渐蔓延扩大至中国中部的阶段,而改称为支那事变,所以北支事变的称呼自然归于消灭。

支那事变的名称于1937年7月7日公开发表以后,一直沿用到大东亚战争为止。因此,日华事变、日支事变、中日战争等,都是一般通俗的称呼而非正式的名称。

自从1941年12月2日,日本宣战^①后,事变才演成为战争,但这也包括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两个名称。如今,一般民众都比较习惯于太平洋战争的称呼,但是当初日本政府向中、美、英、法四国宣战时,所公开发表的名称是大东亚战争。这是因为日本的战线已经扩大到中国、缅甸、印度洋、东亚的全部区域。

所谓的太平洋战争,是英美及其他国家所使用的名称。这是因为主要战区皆在太平洋海域之故。

因此,在1931年到1945年这段期间内发生的几个事变和战争,有数个名称复杂地混在一起,简单的描述当然不容易了解。我们暂且不谈这些令人混淆的名称,在这段前后15年间频繁发生的事变中,人们真是饱尝战火之苦。

昭和时代,日本的首次出兵,是在1927年初向中国山东省进军。此次出兵的目的旨在保护日本侨民,但是尔后的出兵均为军阀的侵略战争。

事变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日本觊觎获取满洲和蒙古所蕴藏的丰富资源,企图侵略满洲,因此引发中国人排日、辱日等活动,但直接的导火线却是柳条沟的铁路爆炸事件,引火人则为日本关东军。据说柳条沟是控制奉天省命脉的军事要隘,选定此处为爆炸点,是日军在前一年就计划好的阴谋。

因此,战火就从满洲开始燃起,成为15年战争的起火点。而后发生的战争都属于计划性的侵略行为。

翌年发生的上海事变,是日本为了转移各国对满洲的注意力,由军

① 原文有误。日本天皇发布《宣战诏书》是1941年12月8日。

部策划导演,在国际都市“上海”所引发的纠纷。首先由日本军部策谋,派人在上海杀害日本的和尚,然后嫁祸于中国,煽动当地的日本人将事情闹大。

接着是1937年的支那事变。根据日本的历史记载,这次事变的起因是宋哲元麾下第二十九军的第三营第十一连的几位中国步兵,因恐惧心和猜疑心,连续发射了18发子弹所引起的。但大家对于是否真由中国兵开火一事,均抱怀疑的态度。有些人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策略,也有人认为是日本方面策略性的开火,总之,至今真相不明。

引起支那事变的卢沟桥,位于北平西郊16公里处,跨越在永定河上,是一座全长225公尺的古旧石桥。在280个栏杆上,每隔两公尺即刻有狮子头,据说建于12世纪的金代,在柱头上所刻有的千奇百态的狮子头,历经金、元、明、清,一直完整地保存至今。在东岸的桥畔,竖有据说是清乾隆皇帝御笔题的“卢沟晓月”的文字石碑,因此才命名为“卢沟桥”。

另外,它又被称为“马可波罗桥”。据说马可波罗前往元朝首都,经过此桥时,曾为它的优雅所吸引而赞扬说:“世界上可能没有一座桥比它更优美了。”因此才有“马可波罗桥”之名。

卢沟桥的左岸(东边)是由城墙环绕着的宛平县城,在此城内驻有一营的中国军队,而在附近的长辛店、龙王庙也有驻军守卫。

当时日军驻屯中国的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也大佐)的总部设于北京,第三大队(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驻屯在距离宛平县城东方约三公里的丰台。这支日本军队将卢沟桥北边一带的田园视为其演习场所。

根据日本战史记载,卢沟桥事件发生在当天(7月7日)晚上,第三大队的第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上尉)在宛平县城北边龙王庙东方地域举行夜间演习。此时的清水中队是以中国军队所驻屯的龙王庙为背景,将假想敌配置在前方进行演习。

10点30分的时候,清水上尉突然想要暂停演习,而向假想敌派出传令兵,但假想敌却误以为是演习的敌兵来袭,就以轻机关枪扫射。虽然演习所使用的是空炮弹,但其声音和火光与实弹无异。更不巧的是,它

正朝着中国军队驻屯的龙王庙方向飞去。

这时候,龙王庙附近响起中国军队的三发枪声,在日军头上穿越而过的却是实弹。清水上尉急忙吹起集合的喇叭,此时又听到十几发的枪声,事态转为严重。当清水上尉全员集合点名后,却发现有一名新兵失踪。

清水中队长发觉事态严重,就立刻向丰台的一木大队长报告。而一木大队长接到报告后又立刻转报到北京的牟田口联队,同时发动大队的兵力,向宛平城东方的一字山进兵,准备应战。这时候又有三发实弹从龙王庙方向飞来。

牟田口联队长接到报告后,立刻下令说:“受到敌人攻击时,立刻还击。”于是一木大队就立刻向龙王庙、永定河堤防附近的中国军队展开攻击。

以上是根据日本战史记载的卢沟桥事件。

但是说也奇怪,那位引发事件的失踪新兵,却于20分钟后,以迷路和在路旁方便为由,平安无事的回到中队。而且,在龙王庙方向响起的枪声也不能证实是发自中国军队。

有一派的人认为那是中国方面过激派所运用的策略性开火,又有一派的人认为那是日本军部的阴谋。

日本于太平洋战争败后举行审判时,在事件发生当时任北京市长的秦德纯,曾经出庭到远东军事法庭为证人,证明这是日本军部所安排的一项阴谋。

但是,此事件是发生在暗夜中,实在无确实的证据可证明。惟一看清事件始末真相的只有卢沟桥而已,除非它会说话,否则将是一项解不开的谜。

日本以这个真相不明的事件为由,借口说:“暴戾的中国必须受惩罚。”于是就发动战争。

上海之役第一次从军

我首次体验战争是在23岁那一年,正是成年不久后的事。从那时开始,我便直接参加战争,也因此使我陷入战争的泥沼中。污秽了曾经

是天真无邪的心灵,即是从此开始。

所谓的战争是指支那事变,我首次踏入的战场是中国中部的上海。当卢沟桥发生的局部事件扩大以后,战火蔓延到中国北部,接着扩展到上海,使它沦为战场。

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日本曾经在此地投下巨额资金,因此此地也住有许多日侨,为了保障其投资权益和侨民的生命财产,所以驻有海军特种陆战队。

上海市的抗日民族情绪本来就很高昂,在卢沟桥事件爆发后,更激发了民众抗日救国运动。不久又发生了一件火上加油的大山事件。它是海军陆战队的大山勇夫中尉和一名水兵,在虹桥机场附近被中国保安队射杀。

这个事件,使得上海方面的局势越来越恶化,负责保护日本侨民的海军特种陆战队,受到中国军队重重的包围而孤立着。日本海军眼见事态严重,就下令在佐世保港待命的陆战队和舰艇立刻增援上海,无奈对陆战不甚专精的日本海军,远不是上海中国军队的对手。

上海是接近首都南京的要津,在长江下游地带,被分为第三战区。配置有蒋介石总统亲自指挥的直系军。

当时海军要求陆战队派兵支援,因此我所属的师团马上接到动员令,我也因此成为直接参战的一员。此次出征上海的任务是援救陷入孤军苦战的海军陆战队,并且保护侨民安全。

上海之役完全的改变了当时日军轻蔑中国人的想法:“对付这种清国奴是轻而易举的事。”这是重新认识强大的中国军队的一场战争。

我所属的部队首先登陆吴淞镇,对上海的外围阵地展开攻势。

我的上海战历如下:

1937年9月1日,登陆吴淞铁路栈桥。

9月2日—5日,参加吴淞炮台和宝山附近的战斗。

9月6日—12日,参加杨行镇附近的战斗。

9月13日—10月2日,参加硕家宅、刘家行附近的战斗。

10月3日—15日,参加蕴藻浜运河附近的战斗。

10月16日—27日,参加大场镇附近的战斗。

10月28日—11月8日,参加苏州河附近的战斗。

11月9日—11日,参加上海南市的封锁作战。

11月12日—14日,参加南翔、嘉宝、太仓附近的扫荡战。

以上是攻占一个阵地所耗费的日数和攻击的主要阵地。

为了攻占上海郊外的一城、一要塞,就耗费了75天之久,由此可见战况是何等激烈和艰苦。相对的,也丧失了许多人命,消耗了许多弹药。人员的补充尚可,但弹药的供给却很缺乏,据说日本本土的弹药均成空库,实在是一场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战役。

上海市的街是沿着长江形成的,它外围的每一个要地,都以钢筋混凝土作成防御阵地,据此要地迎敌痛击的就是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蒋介石直系军。

到处纵横的小运河,非常不利于攻击的行动,它们阻碍了日军的推进,使他们陷于苦战。

为数众多的阵地实在是令人难以区别何者较为坚固,但其中较为特殊的大场镇的坚垒,和苏州河的要害,可以说是上海之役最大的激战地。蒋介石总统也曾自豪地说:“世界各国的精锐部队,以最新式的重武器来攻击,我们至少能奋战三年。”

这些阵地以很厚的钢筋混凝土建成,固若金汤,无惧野战兵器的猛烈攻击。日军攻击坚垒这个要塞,是利用爆炸力来破坏它。

所发动的重兵器包括明治时代的旧式武器和现代化最新式的武器,数量更是惊人。从头到尾,依次排设有步兵炮、山炮、野战炮、重炮和巨大的要塞炮。其他连高射炮也加入地面作战,所出动的火炮达数百门,几乎数不完。

这些火炮一起向狭窄地区的大场镇进行炮击,并且利用飞机从空中进行轰炸。在这样的攻击下,普通的阵地只要一回合,就会被击溃,完全夷为平地,无人幸存。

但是大场镇的坚垒,却能在如此猛烈的连续攻击下,从10月16日持续到10月27日,坚守12天之久,阻止日军的进击。固然阵地是很坚固,但主要的则是中国军队有强烈的抗战意识。

攻占阵地,进入掩体壕内部观察搜索时,发现遗留有许多尸体,他们

虽已死亡,却仍然手握步枪,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证明了配备在上海一带的中国军,是多么精锐的部队。

上海之役是继日俄战争的旅顺攻击以后,最为惨烈的激战。攻击据守此坚固阵地的中国精锐部队,日军有时需要采取同归于尽的战术,造成比旅顺攻击战还要严重的伤亡,真是一场惨烈的争夺战。

出发到上海之前,我从未预料到会有如此激烈的战斗。原以为只要将日本租界周围的中国军队击走,保护侨民安全就达成任务了。而且上海是市街地区,以为只要进行市街巷战即可,不会像野战那样艰苦。

事实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中国军在上海的守备竟是如此坚固。第一波乘着驱逐舰的先锋部队,在登陆的时候就受到顽强的攻击,几乎被全体歼灭。

好不容易才建立桥头堡,对上海外围的阵地展开攻击,然而中国军的阵地都很坚强,攻占一垒、一阵地都要付出许多人命和弹药作为代价。苦战并不只如此而已。

原以为要在上海展开的市街战却变成要塞战。日军单靠着子弹的破坏力和白刃战,向据守要塞的中国军队进行攻击。毫不吝惜地发射炮弹,攻击一城、一要塞。中国方面也不甘示弱地立刻反击,双方昼夜不停地炮击对方。

战况惊天地而泣鬼神,上天似乎因此而哭泣的连日大雨不停,战场成为一片汪洋的沼泽地。虽然如此,战争并不能因此而中止。

搬运弹药和粮秣的辎重兵,全身沾满了污泥,简直像泥人一般。拖着辎重车的马匹,全身也沾满了污泥,无法看清毛色,像泥马一样。行驶在没有道路的田园中,车辆很容易的就会陷入泥沼中,驭兵以嘶嚎的叫声鞭打着马匹。虽然如此辛苦,辎重兵只要完成任务就可以休息了。而在最前线的作战部队,却彻夜未眠地任凭风吹雨打。

连日的大雨,毫无干燥的气象,使外套、军衣、衬衫都湿透了。为了避免敌人攻击而挖成可供藏身的战壕内,完全淹满了雨水。这时候,如果敌人躲在数十公尺前,或我们的姿势稍微高了一点,就会遭到狙击,因此不论吃、喝、拉、睡都必须在同一个地方进行。于是当我们在吃饭时,粪便便在成为水塘的战壕内,沉浮漂荡着,散发出阵阵的恶臭。

在这种不卫生的环境中持续生活，霍乱、下痢等恶性传染病逐渐地蔓延开来，战场上的官兵们深受其苦。记得我开始得病是在对大场镇展开攻击稍前的时候。

从那时起，排出液状粪便的次数显著的增加。然而我并不在乎，照样和出现病状的士兵，食用同一罐头，饮用同一壶水。那位士兵是霍乱患者，经过数小时后就死了。

在这样的生活中，我也染过一般病患出现的症状，往日非常旺盛的食欲，突然的减退，接着就完全的失去食欲。勉强吞食的饭，就会立刻吐出。

同时，肚子感到十分饥饿，一天中有数十次的便意。这段期间内，内裤经常被自然流出的便液沾得湿湿粘粘的。



行进在坎坷道路上的车辆

这种状态持续两三天后,体力大为减退。约走五公尺的路就感到眼前一片昏暗,意识模糊,生命好像就此要结束一般。并且因为体力衰弱而并发夜盲症,到了晚上,眼睛就像瞎了一样。

像这样的重病,要是在国内的话,早就被送进传染病隔离病房,但在战场上,这种程度的病患还不能送往野战医院治疗。因为这种程度的病患者太多了,如果都送医院治疗,则部队就完全失去战斗力。

而且据闻“野战医院是以作战受伤者为优先考虑,生病的士兵则会受到极端冷漠的待遇。”因此不容易住进医院。

一位中队附属的卫生兵,不忍心见我受苦,就鼓励我说:“你最好到野战医院去治疗。”但是被我婉拒了。通常静养中的病人会有护士照顾,而我却仍然在风吹雨打中战斗,和健康的人一起行动,所以病情就更加恶化。我自己也认为已经无生存的希望了。

我自暴自弃地说道:“与其这样病死,不如被敌人子弹打死算了。”然后就跳出战壕,令分队的队友们感到十分棘手。

但是,自大场镇沦陷后不久,我的病状竟奇迹般的开始好转,身体一天一天地恢复正常。每天的排便次数减少,粪便也从液状变成软粪,再逐渐的变成固体状,使我感到非常快乐。粪便正常的同时,体力也增强了,在参加下一次的苏州河战斗时,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眼见许多士兵病死,我却幸运的奇迹般的复原,这应该归功于分队员对我的亲切看护。大家不怕被传染到恶疾,而细心地照顾我。

其中,分队上最有实力的柴田上等兵,接替我担任指挥作战的职务。夜间行动时牵着我的手,渡河时背着我,代替我的手足,帮助我行动。

为了我,特地派卫生兵到后方数公里处的野战医院拿肝油和药品。其他的分队员,也都以各种行动来表示对我的关心,替我分忧解劳。

分队中我最讨厌的那位无赖兵今村一等兵,也毫不吝惜地将国内带来的贵重药品让我服用。

野吕一等兵,冒着枪林弹雨之险,跑到后方领取帐篷和毛毯来让我御寒。他又利用战斗中的短暂休息时间,煮稀饭让我吃。虽然我并无食欲,但是那煮得稀烂的稀饭通过喉咙时,味道真是甘美异常,因为它包含了温暖的友情。

类似的情形说也说不完,分队员们的确很照顾我,那种亲情像灵药一般,使我从死神中奇迹般地复活过来。

经此重病的煎熬后,我体会到在残酷的战场中,袍泽之爱是何等的重要。这件事和激烈的上海之役,将永远留在我心田。

“斩首”的体会

新兵入伍时,常常有人会挨上级长官的训斥:“如此软弱,怎能成为一位标准的军人。”

那么,何谓标准军人呢?他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平时的现役军人应该品行端正、志节坚定,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学术技艺优秀,同时具有这三个条件者,才能被称为标准的军人。

但是在战时,具备这三个条件而升为上等兵的人,并不一定就算是标准军人。

即使人缘很好,学术技艺优良,若缺乏打不倒敌人誓不罢休的勇猛决心,就毫无用处可言。由此可知,标准军人在平时和战时所具备的条件并不相同。

军人上战场的任务是杀死敌人获取胜利。在战场上,军人必须面对“不杀敌人就会被敌人杀死”的决定性场面。

这时候,如果缺乏杀死敌人的勇猛决心,上等兵也只能算是劣等兵。不但如此,自己也会命丧敌手。因此,战场上所谓的标准军人就是“会杀人”的意思。

然而军人的心和正常人并无两样。在正常的社会里,人皆有恻隐之心,谁也不喜欢剥夺小动物的生命,杀人放火的事只有穷凶极恶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任何有正常心的人决不会做出这种丧心病狂的事。

在战场上,我接触到许多军人,经历过无数战斗,逐渐地丧失正常人的心,我变得敢杀人了。若非这样,我就无法生存。军人在战场上成为标准军人一事,一般人绝对无法理解。

起初我也不能算是标准军人。平时在部队里,上等兵是由同年次的军人中选拔优秀者进阶,而列入标准军人之林。但到了战场后,就突然变成差劲的劣等兵。

那是因为我缺乏勇猛的决心。我生性胆怯，自己也觉得无可奈何。我很羡慕比我低阶的一等兵和二等兵。

我于1937年8月27日出征到中国大陆，同年9月1日登陆吴淞铁路栈桥。当时上海之役刚开战不久，同年的8月23日，先锋部队搭乘驱逐舰强行登陆吴淞码头，建立桥头堡，我所属的部队则为后续部队。

到达吴淞口铁路栈桥时，我忽然不寒而栗，胆战心惊。这附近是先锋部队强行登陆的地点，在土壁和铁片屋顶上布满了蜂巢般的弹痕。敌人的枪弹仍然不停地猛烈攻击，在头上飞射而过。

最初子弹只从高空飞射而过，随着部队向前线挺进时，发现子弹声愈来愈低。接近头部，低空飞射而过的子弹，击中附近地面时，引起一阵土烟。

只要被其中的一弹命中，生命就此结束。心想不知何时会被子弹击中，因此不由得恐惧得发起抖来，所谓的军人志节，此刻完全被抛弃到九霄云外。如果能依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我倒很想找个低地俯卧。又如果只有我单独一人的话，我大概早就往后逃跑了。

在前进的途中，突然有一阵恶臭迎面扑鼻。仔细一瞧，原来是横尸遍野，尸体受到炎夏酷日的照射后，体内充满臭气。尸身膨胀得几乎使衣服破裂。眼、鼻、嘴等，布满了蠕动的蛆虫。

我见到这种人间惨状，闻到从这些半腐烂的尸体发出的恶臭时，心头一阵难过，几乎吐了出来。这时候我的表情一定很难看，脸部僵硬，毫无血色，当然也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位标准的军人了。

这还是战争的开始而已，我这样就感到害怕，怎能参加真正的杀人行动呢？我真是最没胆量的人。

接到中队长的突击口令时，我们才向敌人的阵地冲锋，我在一大群战友中被挤压着不得不前进，攻入敌人阵地时也提不起白刃战的斗志。通常敌军在我方展开突击时，我就会害怕得闻风而逃，而没有勇气战斗下去。

我都是茫然的挥动刺枪往前冲，当我感觉到自己正和敌人在交战时，战争已差不多接近尾声了。



用水牛运输物资

记得在宝山附近的一场战斗中,我首次突入敌人的阵地,发现敌兵时感到很狼狈,实在不敢与他们交战。当敌兵逃走后,我才恢复自己的军人的自觉来,而感到十分懊悔。

比我低阶的队友都能勇敢地击退敌兵,而我却对战争毫无帮助。如果此刻有人看到我这种姿态,可能会耻笑我是个胆小鬼。心里愈想愈丢脸。

那时候我发现刚才逃走的敌兵中的一人,正沿着壕壁要往上爬。我下定决心将他杀掉,就立刻追过去,伸出刺枪,但却又不敢刺下去,结果还是以丑态草草结束。

本想一枪将他刺死,可惜心技不合一,正要刺入时,我的腰就先软下来,整个人向前扑倒。不但如此,对方也被我跌倒的声音吓着而滚下来

压在我的身上,当我慢腾腾地恢复正常时,他已趁隙逃走。如果对方有斗志的话,我可能早就被杀掉,想起来不禁冒冷汗,真是丑态百出。

我的刺枪术,在中队里可以算是数一数二的,每次的各种队对抗赛,我都被选为代表去参加比赛。当时只要我发挥实力,刺杀一两个敌兵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那么,为何我的实力无法充分发挥呢?如今回想起来,答案很明显。那是因为我的内心惧怕杀人的行为,以致心技无法一致。

但是,战场上的军人,如果不敢杀敌,就根本无法完成任务。经过好几次战斗后,我的恐惧心愈来愈淡薄,逐渐地适应战场生活,对枪弹和敌人不再感到害怕。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到达目的地后,就会产生一股冒险成功的快感。突击杀死几个敌人后,会有一种优越感产生,觉得杀人真是一种光荣。

到了这种地步,才能算是一位标准的军人。在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凶暴气概,甚至残杀无辜的居民,抢夺粮食,强暴妇女,而毫无罪恶感。

在战场上的军人,都认为到此地步,才能算是真正的军人。一位标准的军人,也正表示着正常人性的丧失。战争对人类而言真是太残酷了。

“杀人放火、强暴妇女、掠夺财物等强盗行为,如果是在国内,一定难逃法律的制裁,将在狱中了却残生,甚至被判处死刑。即使有九条命也难逃一死。”

军人们都这样说着,而承认自己在战场中所犯过的各种罪恶,但另一方面却说:“杀人放火、抢夺是战争的必然现象。如果承认这些行为是罪恶的话,就无法作战了。在战场上,这些都不能算是违法或罪大恶极的事。”

这就是战场上军人的通论。

现代人听到这种言论后,一定会有疑惑地说:“虽然是在战场,但是会做出这些罪恶的军人的心态也实在令人费解?”

不了解战争的人,当然无法体会出这个道理。一般社会大众都把杀人者比喻为丧心病狂的恶魔,认为普通人绝对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但是,杀人乃战场上官兵们的最大任务,战场是双方的军人,各种兵器,彼此残杀的场所。在战场上,不杀对方的话,自己就会被杀,它是决定杀人或被杀的胜负场所。

起初大家都会感到害怕。军队为了应付战争的需要,平常就实施射击、刺枪术、战争训练等杀人技巧的训练。但是通常在第一次参加作战时,这些技巧很不容易完全被发挥。尤其在参加实战时,面临必须杀人的阶段时,正常的心便会感到恐惧畏缩,而使战技退步。

那么,后来是如何发展到敢于杀人的呢?

登陆吴淞的第三天,在宝山附近展开的战斗,使我初尝杀人的经验。自9月1日登陆吴淞后,在连续三天的战斗中,我总是无法提起杀敌的恶魔心。不但不能杀敌,反而很想掉头逃跑。这段时期内,虽会多次与敌军接触,但我总只是随便地挥舞着刺枪往前瞎冲。

第三天的战斗,我依旧浑然忘我的拼命往前冲,当我恢复意识时,才发现自己正在战斗中,而感到困窘不知所措。

当时有一个敌兵摇摇晃晃地跑过来,看不出有丝毫的战斗意识。我因为较早发觉到,所以先有准备,虽然是在无意识中,也还是一股劲地往他身上刺过去。

当我的皮肤接触到那股温暖的鲜血时,我的胆怯心终于被洗刷掉。心想:“我也可以杀死敌人了”,而信心大增,突然变得很有胆量。

这就是我第一次的杀人体验。

自从杀死那个敌人后,在战场上的胆子逐渐增大,随着作战次数的增加,平常心愈来愈淡薄,发现杀人不但是一种光荣,而且有一种莫名的快感产生。

随着对战场的适应,恶魔心也逐渐增强,偶尔会将俘虏来的敌兵以斩首方式处死。虽然说是战争,但是将敌人首级砍下的行为,实在是太残酷了。这都是因为战场这个鬼地方,使我疯狂而丧失人性。

我的一次斩首体验,发生在占领杨行镇附近的敌人阵地后。当时,有三名敌兵潜伏在战壕内为我方俘虏。本来我们要将他们枪杀,但是,曾经参加满洲事变、有斩首经验的柴田上等兵建议说:“最好用斩首方式。”并且又对我说:“能够砍人头的机会并不多,将来回到国内还可以当

做一种经验谈。分队长,你不妨亲自试试看。”听对方这么一说,因为在部下面前,所以不好意思拒绝。虽然心中有点害怕,但是碍于面子,不得已只好去做。

决定要斩首后,柴田上等兵就很得要领地指挥着部队,押解那三名敌兵到运河的堤岸坐下来。保持此态势来斩首的话,首级被砍断后,身体会自然而然地伸直跃入运河。

当众人在准备的时候,我高举着借来的军刀,站在人犯的背后。虽然鼓足了勇气,但是在挥刀之际,我突然觉得既刺激又恐怖。

事到如今,我当然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显露出自己懦弱的一面,所以只好鼓起最大的勇气,大声喊出:“杀!”同时对准一名俘虏的颈部挥刀砍下。

我所持的那把军刀非常锋利。刀身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很快就将他的头砍断,由于用力过猛,刀尖直落在我的脚尖面前。

与身体分离的首级掉落在地面,从堤防的斜坡上,像皮球一般的滚入运河中,我将目光转向被斩首后的颈部时,发现有一股鲜红的鲜血,像喷泉般地从颈部动脉冒出。当血势逐渐减弱时,身体突然伸直,像要追寻头部一般的跃入河中。

这段过程虽然仅有数秒的时间,我却觉得非常漫长。于是,我拥有了谁都无法体验到的斩首经验。

如此说来,似乎我比普通人还残忍,但事实却不尽然。我从小由笃信宗教的祖母抚养大,她教导我说:“人在世间,最大的罪恶就是夺取生物的生命。”因此,我连一只蚂蚁都不敢践踏。所以,我实在是很不适合从军到战场来杀敌的。

这样的我,经过征兵的检查,被选为军人派赴战场。也许这是生为日本国民所无法避免的事,但是后来我却又被指派担任分队长之职。

当年我只有23岁,如此年轻就要领导十几个部下,心理负担实在很重。如果部下都是现役新兵还好,但他们大都是应召兵,对我而言都是前辈。

有些人在部队只待过一年,有的则待了十年之久。其中某些人在现役时,就曾经参加过实战。其他还包括在社会上已经很有成就的人,和

使人感到棘手的无赖汉。整个分队中,以我的经历最为浅薄。

说来好笑,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强兵,居然是拜自卑感之赐。自从到了战场后,为了避免别人轻视我太年轻,我就故意地显示出威武雄壮的姿态。我杀人并非具有敌忾心,而是为了让分队员们评估我的实力的一种夸示行为。

就这样,我变成了敢杀敌的军人,然而前赴战场的军人们,可以说都是在违背自己的良心下杀人。

为了使在战争途中的新兵们有杀人的胆量,我们曾经做过刺杀敌人的试验。刺杀试验,就是以俘虏或当地的居民做活靶,让没有战争经验的新兵来体验刺杀活人。

被选为活靶的人固然很倒霉,但这对被迫参加试验的新兵而言,何尝不也是一场痛苦的经验。面对俘虏或居民的新兵们,每个人的脸部表情是既紧张又僵硬,两眼充满了血丝瞪视对方,嘴唇不停地在发抖。手握刺枪的态势,就像要逃跑一样,仿佛是在向谁求救一般。

听到“突刺!”的口令时,立刻紧张地喊出“杀!”声,向前突进,但实在是太缺乏魄力了,声音听起来好像在哀叫一般,草草地就对着目标刺下去,这种刺杀法,绝对不可能使人一刺就毙命。

被当做活靶的人,被刺得肉绽血流,非常痛苦,大声地哭嚎哀鸣。这时候的新兵们,被此凄惨的景象所惊吓,又对流出的鲜血感到恐惧,使得杀气迟钝下来。

但是当对方不堪痛苦而哀嚎,血色更鲜浓时,就会想让他提早断气,了结痛苦,并且为了让自己脱离恐怖,就随随便便的一阵乱刺,直到他们断气为止。

看到他们完全不能动弹时才放下刺枪,做深呼吸。这时候,因对方丧命而产生的安心感和杀死人的优越感,交织混杂在一起,首次显现出战场上军人的气概来。

这种杀人的体验,是每一位上战场的军人必经的关卡。能够冲破这个关卡,尔后再战斗时,才能发挥勇猛善战的精神,对于杀人的行动也才会感到无上的光荣。战场真是使人发狂、变得残酷而无人性的罪恶的深渊。

苏州河的渡河战

攻陷大场镇后,注视着右方的真如无线电台,部队继续向前挺进,上海之役的最后难关——苏州河,阻碍了我方的前进。比起大场镇人为的坚固要塞来,苏州河是最难攻克的天然地形要塞。

攻击时的最大难关,在于必须渡过 50 公尺宽的苏州河。对岸布满了无数的中国军,每个堡垒阵地内,都配备有现代化的武器,坚固的守备,使我方无法跨越雷池一步。

堡垒阵地就是以钢筋混凝土做成的防御要塞。除了枪孔以外,四周都由很厚的水泥壁围住,即使用野战火炮攻击也不容易破坏。在堡垒阵地枪林弹雨般的攻势下,想要渡过毫无掩蔽物的苏州河,实在是比登天还难。

但不论多么困难,我们绝不能中断攻击。这时候,我们向这种不利的地形和坚固的防御地挑战的战法是,充分发挥大和精神的肉弹攻击。

所谓肉弹攻击,就是由工兵队潜入河中,以人柱架成一座桥,让渡河队通过。架桥的工兵队,必须是和渡河队一样有不畏死亡的敢死队。能在敌人火力的密集攻击下,平安无事的渡过一条细长的小桥,到达对岸,真可以说是一项奇迹。

最初的强行渡河完全失败,接着有第二次、第三次反复的强行渡河,但是大部分未到中途,就受到猛烈的射击,中弹掉落河中。

虽然如此,战法仍不变更。而且作战指挥部愈加兴奋,以强硬的督战口吻说:“不论失败几次,必须连续做到成功为止。以军人的死来填满苏州河,让部队踏着渡过。”

在这种毫无道理的命令下,渡河的人就像被宣告死亡一般,不少人因此而葬身在苏州河的泥水中。我所属的大岳队,在以往的战斗中都是在第一线作战,但这次开始渡河之初,却被安排退居到第二线休息。虽说是第二线,其实距离苏州河岸只有 50 公尺左右。

在那里,我们看到好几幕敢死队赴死出征的情景。出发前,由队长举杯向每一位队员诀别,饮毕后,以兴奋的口吻说:“各位的生命已经交给我,希望和我一起成仁。如今你们应该知道,这里是日本男儿的葬身之地。”这样鼓励后就出发。

表面看来似乎很戏剧化,却充满了任何著名演员也无法演出的悲壮感和疯狂般的气氛。处于相同境遇的我,对于前去赴死的袍泽,感到十分哀痛。

但是我并不能将它视为他人的事。因为我自己不知何时也必须前往那个死地。在休息的时候,总觉得似乎在生死之间徘徊一般。

以往我曾经历过多次的危险,每次总认为绝无生还的机会,但是当战斗结束后,我却又能平安无事的活下来。

但是此刻的状况比过去任何一次的危险更险恶,我估计自己只有两成的存活机会。在对岸无数支枪炮的扫射下,能冲过河中那座 50 公尺长的小桥,实在是一项奇迹。我想只好以接受死亡宣告一般的心情来面对它。

这种心情实在令人讨厌。虽然我尽量的假装平静,内心却一直无法稳定下来。

向死神报到,实在是一件大事。更何况我只有 20 多岁,真不想就此结束一生。静静地坐着,也会有一股不安笼罩心头,不做任何行动反而更加难受。

反观其他人,发现大家的表情都和平常大不相同。也许不做某种行动就无法隐藏内心的不安,于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写家书。

虽然只剩下无法预知的短暂生命,大家却都写道:“我很平安,请放心。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请特别照顾孩子,不要让他感冒。同时请你多保重身体,代替我料理一切家务。”道出自己对家人的关心。

大家都在家书中指出自己很健康、平安,但如今却即将前赴危险之地,也许当这封信寄达家人手中时,他们也可能同时接到“为国捐躯”的死亡通知。想到这里,我实在难过的想对大家说:“喂!大家不必写信了,这样只会令家人伤心罢了。”

话虽这么说,其实我自己也同样的拿出信纸来写家书。和大家一样,我在信的开头就写道:“我很平安,请放心。”因为这样,好像可以使过去都很健康的身体一直持续下去,而冲淡对死亡的不安似的。但是写完后,重新再看一遍时,我才发现竟和平时的家书有所不同。信中写道:“父亲、母亲大人膝下:我很平安,请放心。我目前正在苏州河畔待命中,

随时准备渡河。渡河的结果如何,相信在近日中您就可以从报纸或收音机报道中获知。万一在这次渡河战役中,我有了三长两短,请您认为我是勇敢的为国捐躯而感到光荣。如今天气愈来愈寒冷,请您保重身体,最后敬祝福安。”

虽然文句很平凡,但却有一点和平常不同,那就是对双亲大人的称谓语,通常我都是写“爸、妈”,这次却写“父亲、母亲”。以前我也曾经写“父亲、母亲”,但那是在前往战地当兵时,写在附有遗发、遗指甲的遗书上。这次写信给父母亲,比起当时写遗书的心情,总觉得有更接近死亡的意味。想到自己即将面临死亡,而且死亡的气氛愈来愈浓厚,悲壮之情不禁涌上心头。

意识到死亡,使我觉得如此年轻就离开人世实在太可惜了。女人、佳肴、与家人在榻榻米上团聚的情景等,一幕幕的浮现在眼前,使我对人世间的留恋之情,更加浓烈起来。

死亡真是令人恐惧。俗话说:“死有轻于鸿毛。”这话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当我面临死亡时,才知道生存的重要。

我渴望避免渡河,但愿大岳队不会下达渡河的命令。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罢了,战场上绝不可能有如此美妙的事。当我正在做这个美梦时,已经不知道有几队的人马向渡河挑战,无数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在苏州河的浊流中。

数小时后,大岳队终于下达了前进的命令,我不得不勇敢地参加渡河。

大岳队下达的前进命令是在11月6日的傍晚。

中队长大岳中尉接到命令后,立刻集合全体队员宣告命令,然后举行诀别酒会,由中队长致词道:“我祈盼各位同志英勇作战,达成使命。”然后全体一起干杯。虽然我向来是滴酒不沾,但是面临此情此景,我只好把这杯酒当做是今生的最后一杯茶水,一口饮尽。辛辣的酒液刺激着我的喉咙,使我感到异常兴奋。也许还是因为我腹中的虫,闻到异样的酒味而开始作怪吧。

就像流入腹中的美酒和讨厌的虫在混战一般,我的心情也开始混乱起来。盼望(不愿意死)的心和另一种(管他的)自暴自弃的心,交相冲突

成为卍字形。

翌晨,趁着黎明尚未破晓的时分,全体开始秘密前往渡河点附近,藏身于河畔的低地,等待决定性一刻的来临。

附近有数个工兵队,每人头戴着钢盔,全身赤裸,仅着一条内裤,低身前往河里。这些工兵队,就是为了让大岳队渡河而去架桥的敢死队。

有些人对他们说:“工兵同志,请多多帮忙。”然而他们都默然无言地通过。也许这是因为要前往死地的工兵官兵们,已经没有开口说话的时间了。

看到这种情形,心想苏州河对他们而言,也许就是通往地狱的奈何桥。但那不只是对工兵,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样?

只要架桥完毕就要立刻出发。在等待的时刻中,内心非常焦急,频频产生尿意,最后实在太麻烦了,就在原地解决。

工兵队已经前往多时,却仍未传来任何消息,只听到持续不断的枪炮声。

我甚至心想:“但愿架桥失败。”但同时又想起:“今天失败还有明天,还是早日完成较好。”

工兵架桥行动终于成功了。破晓时分,鱼肚般的阳光透过云层照射大地,乳白色的朝霞清晰可见,接着就传来“开始渡河,各分队向前进”的命令。接到命令后,过去一切的妄想就立刻消失无影。看到小队长藤少尉跑出去,我也大声地喊道:“我也要去!”就拼命地冲出去。

来到岸边,往河中一瞧,只见工兵所架的那座小桥,在晨曦中朦胧得像一只大蜈蚣。在桥上,先出发的同志们正在一个个鱼贯快跑通过。

敌人的枪炮向桥面集中扫射,打在河面就像骤雨一般产生水花,使我瞬间产生“已经没有希望了”的心情。

但事到如今,我也只好不管生死地拼命向前狂奔。在这 50 公尺的距离里,万一不幸被子弹命中,就只有死路一条。如果幸运的话,就可以活命到达对岸。

我率领着分队,在不稳定的桥上狂奔。敌人的视线虽被早晨耀眼的阳光遮住,但似乎每个人都对准着我射击一般,千万颗子弹从我身边穿过。

通往机关枪扫射的附近时,不知不觉中感到恐惧,使得行动延缓下来,这时候我赶紧自责道:“不可停止。停止就会被击中。”

这样,跑了十公尺左右时,我突然觉得肚子似乎受到强烈的冲击,我意识到自己已经中弹。同时因为过分的恐惧而绊倒,跌落河中。

究竟被射中哪个部位,我无法知道,但觉得似乎不是重伤。于是我想再跑一次,准备爬上桥时,却又害怕挡住后面狂奔的队友,因此就先回到刚才出发的地点,但是在那里待机的卫生兵,却把我当做伤员收容,带到医疗所包扎。

卫生兵检查的结果,并未发现有流血或擦伤的情形。但是我确定曾经受到冲击。当我正感到疑惑时,另一位卫生兵脱口道:“哦!这个部位被射入一颗子弹。”

但那并非我的身体。原来是我身上所佩戴的皮带被一发子弹射中。一发子弹,也许是因为距离太远,子弹没有穿透就停下来。从我当时佩戴的位置判断起来,它在距离肚脐左边三公分的地方。

我觉得太意外了,就仔细地察看,原来是我随身携带的千人针^①束腹带中所放的五钱硬币挡住了子弹,它被击得凹陷下去。

千人针束腹带就是众人为了祈祷出征军人好运和平安,由每人缝一针而做成的东西。虽然是一种迷信,但大家都深信佩戴它可以避免子弹上身,因此前往战场的人都会穿着它。

在那一件束腹带中,我为了超越死线(四钱)和苦线(九钱)^②,而装入5钱和1元的硬币。射中我的那颗子弹,命中五钱的硬币使它凹陷后失去了穿透力。虽然子弹的力量不强,但若非碰到硬币,它照样可以穿透我的肚皮。

腹部被贯穿是一项致命伤。因此,我的确是因为这个5钱硬币的保护,才能超越死亡线。

平时信心淡薄的我,一直不相信神会帮助人,但直径不过二公分的5钱硬币,竟能挡住子弹使我平安无事,这的确是天助我也。

① 日本一种习俗,在一块厚布上由1000个属虎的女人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以祝平安。

② 日语中“死线”与“四钱”、“苦线”“九钱”谐音。

以上就是我的苏州河渡河战记。

在无情的战场上，竟有如此的神助和奇迹发生。我很幸运的受到神助。

当我半途脱队，被带到此地包扎，正为奇迹式捡回生命而高兴的同时，其他的人已经成功的到达对岸。渡河成功后，过去一直很顽强抵抗的中国军，就像山崩一般，已经溃不成军地逃走。

苏州河的阵地总崩溃后，我军继续进兵到法国租界的右侧，将南市封锁，上海之役也就此暂告一段落。这时候我才体会出生存的喜悦。

“南京大屠杀事件”与我

令人厌恶的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式，对战后出生的人而言，战争只不过是一句历史名词罢了，不知何因，至今仍有不少人为了“南京大屠杀事件”而在争论不休。

有一派认为没有人可以证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事实，他们认为也许曾经真的有一些战争而引起的暴虐行为发生，但是大部分的传闻都是过分夸大的宣传。

相反的一派则认为传闻都是事实，大家应该虚心忏悔反省才对。

在战争中担任作战指挥要职的人曾经说：“事情不能说完全没有发生过，但并不如传闻中那么残酷。参加进军南京的军队，因为是紧急动员，品质较差，其中有不少军人的修养不够，又受到战场心理的煽动，所以才会做出一些暴虐的行为。”就这样地把罪过完全转嫁于下级军人，上层阶级的责任则全部推得一干二净。

每次听到这些争论，就使我感到怀疑？为何至今仍要讨论这些事情？

我敢断言“南京大屠杀事件”是事实。因为身为军人的我，曾经参加过入侵南京的作战，事实上也犯过暴虐的行为。

我曾经亲眼目睹、耳闻这个事件。除了我以外，当年参加入侵南京作战的军人，尚有多人生存在世。他们都很了解“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内幕，但为了避免勾起伤痛的回忆，他们都不想证明它。

我推想，有心人的否定“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想抹煞日本战史的污

点,因此才刻意歪曲事实。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确是日本战史上的一大污点,但它并不能轻易地就抹煞掉。而且我认为我们不但不可以歪曲事实,我们更应该坦承错误,虚心反省,让后世子孙引以为鉴。因此,我打算根据自身的体验来记述这件事。

我所要记述的是以身为军人的我,站在当年曾经亲历其境,参加入侵南京亲眼目睹、耳闻“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立场上,本着人类的良知和赎罪的心情作一个忠实的记述。

根据中国方面的说法,“南京大屠杀事件”是日军攻占南京三个礼拜中,杀害了三十多万中国军民。

我不知道被日军杀害的确实人数有多少,但我并不认为中国方面所说的数字太夸大,也许实际的数目更大也说不定。“南京大屠杀事件”的范围不只是南京地区而已,它是从上海附近开始到南京被攻陷后的扫荡战为止,在辽阔的范围内所发生的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大悲剧。

详加区分的话,它包括从上海附近开始到南京为止、占领南京时和占领后的扫荡期等三个阶段。

最初是向南京攻击前进中,南京攻略战是支那事变的许多场战斗中最大的一场战斗。

参加作战的军团包括,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方面军、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和登陆杭州湾协助上海战的柳川平助中将率领的第十军。

它们都是历经数次大战役的军团,趁着战胜的余威,彼此争功夺利地说:“千万不要输给别的部队。南京应该由我们的部队先占。”而像怒海狂涛般地涌向南京进击。

从上海到南京的直线距离约三百公里,而攻击的部队因为必须迂回前进,所以至少要走400公里以上。

像如此大规模的机动战,作战指挥却发生了严重的错误。那就是,战斗前进中的部队和补充弹药、粮秣的兵站部队(并非正式的名称,仅为了和战斗部队有所区别)之间,没有保持均衡的距离。

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也是蒋介石总统(当时是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的根据地。因此守备非常坚固,从上海到南京的重要地点,都配置有蒋介石总统的直系精锐军。再加上各地居民强烈的抗日意识,发挥了总体力量,协助南京的守备。

虽然如此,战斗部队仍然按照预定计划进攻,但是中国军队每次要退却时,都会破坏河川的桥梁,挖毁道路,在地面埋设地雷,阻碍日军的攻击,因此载有辎重的车辆部队就无法追赶得上。

打机动战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足够的弹药和粮秣供给战斗部队。无弹药就无战斗力,粮药未继,当然就会影响到战斗力。

向南京进攻的战斗部队,从上海附近出发五六天后,就和兵站部队的距离愈拉愈远。这时候,仅能做到战斗上不可缺乏的弹药补给,而在粮食方面,就无法供给到前线战士的手中。不论战斗精神如何旺盛,饿着肚皮的行动实在令人非常难受。

此种情况持续下去的结果,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暂时休战,等待兵站部队赶上;一是继续前进到饿死为止。但是以永不退却的精神标榜的日军作战指导者,却不让战斗部队休息,反而下达“在当地征收粮食,以谋自活”的征收命令。

征收命令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其实这与抢夺当地居民的粮食无异。过去也曾经发生过征收行为,但是在下达征收命令以前,大家总是怀有罪恶感。

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

虽然一切作为都是为了实现南京攻略这个大目标,但实在太不人道了。这个征收命令,使下级官兵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

这不单是中日两国间的问题,而是已经扩大为在上海的世界各国的机关都知道的国际问题。

事情发生的地点与国际都市上海很接近,因此,知道这件事情的主要国家都派遣调查团到现场查明事实,于是日本方面不能再置之不理。

事实明朗化后,各国都开始加以非难。日本国内同样发出批判的怒吼,对所谓圣战的本质产生怀疑。

因此,军部的上层阶级就借机混淆视听地发布警告说:“攻击军各部队,必须体会圣战的真义,不可作出丧失皇军面子的行为。尔后如果有抢夺居民粮食、强暴妇女的行为发生,将严重处罚犯过的人。”因而禁止征收粮食。

但是上层阶级所做的这个决定并不合理。禁止征收粮食虽然是情非得已,但补给粮食的路线却尚未打开。这就好像是要部队不必吃饭,继续前进作战一般。从情势看来,上级确有他们的困难。但是站在高处下达命令,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未免就太不合理了。

对于在前线作战,直接受到影响的下级官兵而言,事情并非以“不合理”这句话就能解决。事关他们本身的死活,究竟是要服从命令,继续前进到饿死,或者违反命令,继续征收,已经变成二者择一的问题了。

作战官兵们的答案是非常明显的,就像俗语“饥饿就无法作战”一样,没有粮食就无法战斗。

基于这个理由,在战场一端指挥小部队作战的下级队长九就命道:“当初命令我们征收以谋自活,如今却又说不可抢夺粮食。真是可恶,军队不吃饭怎么能打仗。”因而继续地征收。

军部的上层阶级,对于发出的警告受到轻视,恐影响其威信,因此无法默认而采取对策。

以作战指导的名义,派参谋人员到前线附近,由宪兵队来进行告发,只要有被害人单方面的检举,案件就成立,因此有多人受到检举。

被检举的人立刻被移送军法会议审判,有的被免职,有的被降级,一切功劳都被抵消掉。由于日本的军队极端重视本队的名誉,深怕自己队中有犯罪者,因此下级队长就指示说:“事情做完,应该自己好好地收拾。”意思就是要毁灭证据。

所以,下级官兵们为了保护自己,毫不考虑地杀掉无辜的中国百姓,这才发展为“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导火线。

以上就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初级阶段。

接下来的是占领期间的暴虐行为。涌入南京的攻击部队,趁着战胜的余威,在街上放火烧毁民房,不分军民肆意滥杀,将俘虏大量的集体屠杀。而在扫荡残敌期间,为了扫荡战败的残兵,任意烧毁民房,连无辜的

民众也一起杀掉。“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的范围是如此的广阔,因此不能限定的说:“只是在这里发生的事。”

日军于12月1日从上海附近出发,同月13日到达南京,17日举行入城仪式,这期间,由大军团所做出的暴虐行为,可以说是超乎我们的想像之外。

参加入侵南京的日军,做了许多受国际间非难的残暴行为。当时的高级军人曾辩解说:“因为参加进攻南京的军队是紧急动员的,所以官兵的素质很差。”其实这是应该负责者将责任推到下级官兵身上的一种卑劣的推托之词。参加入侵南京的军队是由现役、预备役为干部,皆为战时动员的部队中的最优秀的。

而且他们大多数是从上海征调来的部队,并非为了入侵南京才紧急动员的部队。

说来好笑,在上海作战时,他们从未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罪行,但是同样的官兵参加入侵南京的战斗时,却做出遗臭万年的残暴事件。

由此看来,“官兵的素质太差”并非正确的理由。当然,发生这种事件的理由,是无法简单的一语涵盖,但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师出无名”。

本来,下级官兵只是依照命令行动即可,但我认为他们就是因为不明白作战的目标何在,所以影响到战斗意识,甚至于降低了道义。

这可以从上海之役得到证明,军人们在保障权益和保护侨民的目的下作战,所以没有非法行动发生。也许这并不能算是我所说的主要原因,但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前后共花费四个月的上海之役结束时,下级官兵们都松了一口气,认为可以高高兴兴的活着回国。在阵地待了几天后,他们听到了令人兴奋的传言,内容是说:“根据可靠的消息,上海之役的预期目标已顺利达成,上海派遣军只须留下一部分人员担任警卫工作,其余的大多数将在近日内凯旋归国。”官兵中的有识之士似乎在证明这项传言无误一般,也评论道:“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是不扩大事件,许多政治家和稳健的军人也都尽量在努力,以期早日收拾残局,所以事变不久就可获得圆满解决。”因此归国似乎已经成为定局。

对事变缺乏认识的军人们都很相信这项传言,尤其是有家眷的人,都很高兴地写信向太太说:“如果事情顺利的话,可能本年度就可以退伍。我想今年过年时,我们一家人一定可以团聚在火炉旁,享受天伦之乐。”

但是,高兴持续不了多久又传来新的消息,指出今年可能会有新的作战开始,而使得那些相信可以凯旋归国的人大失所望。这一次的作战是为了入侵南京,因此必须展开长途远征。

南京是蒋介石总统的根据地,因此守备特别严密坚固,官兵们也预想此役可能是一场不亚于上海之役的激烈战。据说距离南京还有300公里,由地图就可知道离海岸很远。

要攻击到如此遥远的地方,不但不是在收拾残局,反而会扩大事变,这样怎能凯旋归国呢?由于官兵们对凯旋归国的期望很高,因此失望也很大。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尽量的相信可以凯旋回国,而盼望作战即将结束的传闻是谣言,在11月下旬真的下了一项决定性指示:

“上海派遣军最近就要展开新的作战行动。驻留期间尽量养精蓄锐,兵器、被服要好好保养整理,以免阻碍作战行动。”这个作战指示下达后,兵器、被服充分的补足,又相继举行战备检查,作战开始已经成为事实。

从那时候起,官兵们都变得特别暴躁。作战一开始就会有百分之几的人会丧命,也会有百分之几的人受伤,甚至高达百分之几十也说不定。伤亡的多寡虽然无法预知,但是大家都认为自己已经有伤亡的命运,因此显得自暴自弃。

“我们出征的目的,原来并非是为了保护上海的日侨。为何上海派遣军还必须进攻到南京呢?”

“我以为好不容易就要回到妻子身旁,如今又要我去渡危险的桥。”

“上级长官都把我们军人的生命视为小虫一般。好像是消耗品。非得被装入白木盒子(装骨灰),才能回到日本。”

官兵们都如此的抱怨着。

后来,每天都出去征收,晚上就拿出征收来的酒,一边喝闷酒,一边对高级军官发出不平之鸣。

上海之役是一场相当激烈的战斗,因此大家都认为下一次的南京攻略战,可能没有希望活着回来。有目的战争总比较提得起劲来,如今不知为何而战,就像要走入黑暗的迷境中一般。

军人们都一致地显现出暴躁的情绪,但其中以内藤一等兵最为明显。他是中队里年龄最老的兵,国内留有妻小六人,被部队征召来的可怜虫。如果家庭生活富裕的话还好,但是过去他似乎为了养育妻女,每天都当杂工,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

他经常担忧家中的生活状况,当初听到即将凯旋归国的传言时,他表现得很有精神,如今反而变成最可怜、最失望的人。过去表现很忧郁的他,突然像变成另一个人一般,脾气非常暴躁。

“事到如今,我不再乖乖地守规矩了。我已不是以前的我。我才不怕长官。”这样经常地说长官的坏话,变成令大家感到棘手的人物。他的暴乱行为特别多,队友们都加以指责,但我却一点也不怪他。

内藤一等兵其实是一位过分老实的人,所以当他正陶醉在即将回国的美梦中时,突然又听到必须继续留下来作战的命令,精神上受不了如此的打击,因而性情大变。

身为军人,一切行动都要服从命令,被派往任何地点都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内藤一等兵的心情确实有值得让人同情之处。

虽然我以他作为例子,但是并非只有他一人如此而已,其他的军人也有许多类似的情形发生。这些人都说:“我要随心所欲地行动,谁也不能管我。”所谓随心所欲地行动,就是以比军人处于更弱的立场的中国民众为对象,来发泄其心中的不满。

在部队中身份最低的军人,除了民众以外,再也没有人的身份比自己低。由于上级军人的态度,造成他们这种不平衡的心理。即使身份再低,既然生为一个人,都是有意识,有思想的。但是上层阶级却不表明目的,就将自己当作傀儡一般来操纵,实在太不应该。如果远征的地点不超越南京,而且战争的目的也很清楚时,大家就不会如此暴躁。

像这样,南京攻略军在作战行动开始以前,下级官兵的情绪就很暴躁,而“征收自活”的命令更是对它火上加油。

纵然没有“征收自活的命令”,他们也会随心所欲地行动。但是经上

级下令去抢夺粮食以谋自活后,他们的罪恶意识就完全消失,而做出和强盗无异的行为,见到妇女就加以凌辱,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成为与盗匪一般无二的军人。

我认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发展成为空前绝后的残暴行为——“南京大屠杀事件”。

“征收”是日军利用敌人粮食的一种战法。但是“征收”也是强迫征收百姓存粮的一种强盗行为。原则上应该以相等的价格来购买,但是在战场上都没有这样做。当地百姓所储存的谷物和家畜,是为了渡过长期寒冬的生命之粮,当然不肯供给入侵的敌军。即使愿意也要以交易的方式进行,但是作战行动中的战斗部队都没有钱可以支付,因此才会采取抢夺的手段。在离开太仓附近前往南京的途中,我才首次知道“征收”是军事用语。

我所属的大岳队,向南京进击的经过路程是从太仓附近开始出发,经由昆山—苏州—无锡—句容而到达南京光华门。经过昆山时,和跟随在后面的兵战部队的联络就逐渐疏远,到了苏州附近则完全失去联络。

结果无法补给粮食,身上携带的干粮也完全食尽,只好饮用太湖的水,暂时得到一点温饱感。

征收命令就是在这个时候下达的。但是充满正义感的大岳中尉在决定实行征收以前,内心有点犹豫不决。身为职业军人的大岳中尉,对皇军的自觉心比别人强,不论多么饥饿也不肯做出与盗匪无异的行为。

但是若不征收,人马就会饥饿,尤其马匹都已经变得骨瘦如柴,开始咬食对方的鬃毛和尾巴上的毛。

到了这个地步,体贴部下的大岳中尉,为了自己所爱的部下只好放弃正义感,下令实行征收。

苏州近郊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丰富的水源,苏州米的品质很高,这里是有名的大米仓。军人们争先恐后地出去征收,好不容易找到米饭才放下心来。我也经常出去征收,当地的农民家似乎都很富裕,每次侵入村庄后,都能满载而归。

起初内心很不好受,一想到那些人为了渡过长期的寒冬所储存的粮食被抢夺后,不知会过着如何痛苦的生活,不禁感到内疚不已。瞧见那

些躲在暗处的居民以仇恨的眼光偷看我们时,我恨不得早点逃离现场。

但是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后,理性慢慢地淡薄了,罪恶的意识也消失了。到此阶段为止,情况还不错,但是后来征收行为受到禁止,取缔也严格起来。

因此,为了毁灭证据而杀害证人的残酷行为开始发生。以前大家都称强盗、强奸、杀人等行为为畜牲的行为。我在过去的几场战斗中,曾经杀过几个人,但还未杀过无辜的百姓。因此我都自认为自己还存有人性,绝对不肯杀害民众。然而自以为有人性的我,进兵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时,却杀害了无辜的村民。

来到这附近时,战线朝向南京像逆扇形一般的狭窄起来,成为集中到南京的态势。此刻的中国军队也认为是最后的抵抗,而加强守卫来阻止日军前进,使前线停滞为胶着状态。这时候的大岳队改为预备队,退居第二线休息。我认为与其做无益的活动使肚子饥饿,不如好好睡觉休息。

吃过早餐后就开始睡觉,但是,当睡眠充足后又开始觉得无聊,闷得发慌。这时候队友向我说:“分队长,你怎么如此爱睡。睡得太久眼睛会烂掉喔!不如我们出去征收吧!”经他们怂恿后,我因正觉得无聊,就立刻表示同意,同时随口说出:“到了南京就有许多漂亮的姑娘,所以我暂时不要女人。只想多吃一点,培养好体力。如果能征收到一只大肥猪,不知道该有多好!”

由于战线很狭小,而且战况呈胶着状态,所以到处都是军人。每一个村庄都被人征收光,不但无法征收到一只大肥猪,连一只小鸡也找不到。

我们就继续前进,走到一处无人居住的村庄时,很幸运的抓到了几只鸡。正想回部队时,突然发现村庄外围的田中洼地,有一对年轻男女像支柱一般俯卧着。看来似乎是被阻断躲避之路,找不出逃生之路的逃难夫妻。

当他们被发现后,就坐在田中,手掌合并开始苦苦地哀求。虽然我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但似乎是要我们网开一面,让他们逃生。

仔细一瞧,那位女性长得相当漂亮,年龄约为二十四五岁,男的三十

岁上下,从气质看来,似乎是上流阶级的年轻夫妇。虽然他们穿着很简陋的棉衣,但是每当她低头哀求时,臀部显得异常性感,不禁使人产生邪念。

分队员们竟然忘记“找女人不如先找食物”这句话,对她垂涎三尺,露出贪婪的眼光,形成欲罢不能的情势。

那位男性似乎已经察觉情况不妙,就故意以演戏的口气哭着哀求。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但不知何故,每次都觉得很生气。“我才不会被你这种哭法欺骗。”我对那位男子大声斥责,接着向分队员们说:“我们来料理她吧!”

“料理她”就是侵犯那位女子的意思。

平常很胆怯又自以为有人性的我,当时为何会如此,我实在想不出任何理由。事后反省的结果,也许是因为我认为反正她迟早都会被人侵犯,不如由自己来侵犯。或许我是因为在队员们的面前,故意想扮演成坏人也说不定。

另外,也许是因为想到要侵犯女性时,不自觉地恼羞成怒,所以才故意冲动地脱口而出的。反正要放弃这样美貌的女子总觉得太可惜,这也是事实。综合以上的理由,我才产生侵犯的心理。

其他分队员,平常很少见到我有如此积极的态度,当时虽然顿感诧异,但没人表示反对,于是就决定侵犯那位女性。结果,那位女性当然是惨遭我们的凌辱。

当然我也是从犯之一,但是事后我眼见她被多人轮暴后的凄惨景象,不禁产生怜悯之心,觉得非常后悔。同时也想到昨天出去征收的军人,因为侵犯妇女,经被害人向宪兵检举后,受到处罚的事情。

听说此地附近有许多宪兵,万一这对夫妻直接去控告,我们全分队可能会受到处罚,但我又不想将他们杀害。事后有分队员建议说:“事情如何处理?如果太多情的话,反而对我们不利。”我虽然听见了,却假装没有听到。当我们正准备赶紧逃离现场时,不知是哪一队的班长突然跑来说:“小心,附近有宪兵。”说完就跑开。这位班长可能了解我们这件事会有不良的后果,才特地跑来警告我们。

听到这个警告后,我下定决心要杀人灭口。虽然于心不忍,但是为

了全体分队员的安全,实在没有办法。

然而,我没有勇气亲自下手,也不敢下令杀人。

这时候的柴田上等兵,体会到我的苦衷,于是指示分队员们做好灭口的准备,我则站在远处看着。说在远处看比较好听,其实我是故意逃避的。因为我不忍心看,所以就低头以双手遮脸,两眼紧闭。

然而耳朵还能听到队员们杀死他们时喊出的强有力的“杀! 杀!”声,以及他们惨绝人寰的哀叫声。

最后我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一看,发现被绑在树上的那对夫妻,身上不停地涌出鲜红的血。我突然受到良心的苛责,但是内心却又卑鄙的辩解道:“这不是我的罪过,一切都是战争所造成的。”然后仓皇地逃离现场。

这就是我所犯罪过的暴虐行为。

入侵南京城和屠杀居民

入侵中国首都南京的南京攻略军,于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经过几天的扫荡后,于17日正式举行入城仪式。

参加入侵南京的各部队官兵,在南京城大街的两侧整齐的排成一列,由最高司令官松井大将率领各将领在中间阅兵,这种威武的军容,可以说是支那事变中场面最浩大的入城仪式。

参加仪式的人员,是由各部队推选出来的,人数约为两三成。参加的官兵们,对于能参加这史无前例的南京入城仪式,都感到无上的光荣,非常感激与兴奋,红着脸,目光炯炯有神。

我也是参加入城仪式的代表之一,但我却想到和能参加入城仪式的感激心情完全相反的事来。

那就是数万人的军队中,表面上看来大家的形态都一样,然而每个人的个性却完全不同。百人百色,千人千样。其实这应该是毫不值得提起的问题。

但当时我并不觉得它无意义,反而非常重视。军人们都穿着一样的制服,使用相同的装备。然而每个人的个性却不同,有的很乖僻,有的很狡猾,使长官感到很棘手。

编组成军队之前,先经历征兵检查,集合体格健全的人,施与军事教育,使素质均等、齐一,然而与生俱来的品格却无法改造。现役期间还好,但是以召集兵为主的战时编组部队,就会产生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

我年纪轻轻的就担任分队长的职务,统领十几个部下,深深体会到领导统御的困难,因此才会对不值得提起的问题感到重视。

编在我分队的士兵中,也有几个和我一样很难应付。其中最难缠的就是今村政五郎一等兵。他是召集兵,年纪大我五岁。

他过去的行为令我害怕,据说他以前是地方上的恶霸,背部有文身,一有不高兴时,即使对方是军官,他也会脱下衣服以威胁的口吻道:“喂!臭小子,你不要太神气。虽然我可以忍耐,但我背上的这位‘般若’先生可不能忍耐唷!”

这样威胁后,他几乎都会使用暴力来对付反对他的人,因此同伴们就送他一个“般若政”的绰号,而不理会他。没有直接关系的人,只要避免和他在一起就不会惹祸上身,但身为他的直属分队长的我,好比抱了一颗定时炸弹一般,不知何时会爆炸,只好每天战战兢兢。

幸好般若政自认为是个大男人,所以不会把我这种小人物当作对手,可是在前往战场途中,在运输船上,他却以小队长须藤少尉为对象发生口角。因为须藤少尉是位预备军官,因此在一般士兵的心目中反不如士官学校出身的现役士官受人敬重。

发生口角的原因是,少尉想利用阶级来威逼他,有点气势凌人。

据现场其他士兵们的说法是,般若政在甲板上与人聊天时,少尉正好从旁经过,看到般若政没有向他行礼,于是就责骂他,而引起般若政的不快。

听到消息后我立刻赶往现场,看到少尉嘴唇破裂,正留着鲜血,似乎已经被他打过。这时候少尉仍然坚持阶级观念而说:“你竟敢犯上,我绝不饶你。”看起来好像是压制他了。但实际上的胜负却已很明显的对他不利。

照这种情形下去,般若政可能会乘胜追击,继续殴打少尉。而在士兵们面前失尽颜面的少尉,也许会恼羞成怒的持刀砍杀般若政。

正在僵持不下的时候,幸好有柴田上等兵出来调解,化解了这场危

险的纠纷,但我仍不放心,此事已成为我心中一项隐忧。

自从他们两人交恶后,我就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每当情况不妙时我就很担心,等到平安无事时我才放下心来,每天看他们两人的脸色,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般若政于武汉之役时为国捐躯,死得轰轰烈烈。

另一位使我畏惧的人是铃木贤太郎一等兵。他并非凶暴型的人,而是当时所谓的思想危险的人物。

据说他在学生时代,曾经以左翼的斗士自居,参加各种活动,受到警方的监视与注意。

服役前的安全调查资料中,注明着“危险思想者,要注意”。因此也经常受到宪兵的监视。这次被征上战场是从拘留所内调出来的。

当时具有红色思想的人都被视为危险人物,虽然他是本队少数具有大学学历的人物之一,却因此项原因而丧失了当预官的资格,且只能担任一等兵。

现今的思想虽然很自由,但当时具有“左”倾思想者,都被视为重犯一般。我一直深怕他发生问题,引起宪兵的介入。

在战争途中,铃木一等兵也许自认为无法和军国主义保持同一步调,所以就放弃日本国籍,投降中国军。

还有一位令我头痛的人物就是高桥广道一等兵。他被征召以前在一座寺庙出家当和尚,却喜好酒、色和赌博,可以说是一个玩乐主义者。

来到部队的初期,为人温厚又见识广博,使我误认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高僧,因此就以“大师”的称呼来表达内心对他的尊敬。

但是到了战地后,他就故意复萌,经常聚众豪赌,驻留太仓期间也开始强暴良家妇女。“大师”初到太仓时,偶然发现一对从上海避难到此地的年轻夫妇,他就威胁那位先生并强暴了他的妻子。食髓知味后,就经常出去猎色,甚至要我陪同前往。

事情若仅如此尚无大碍,但后来却因为他独自一人出去,被愤怒的村民打死后而引起轩然大波。搜索队出动去寻找“大师”的尸首和行凶的人时,抓了许多名男女回来,因此事情就惹到我身上。

如果把他们都移送宪兵队的话,恐怕会东窗事发,连我也脱不了关

系。如果不送宪兵队的话,只有当场处理,别无他法。

因此我就将详情告知搜索队的人,他们都以了解的口气说:“好,我们懂。一切让我们来处理。”就这样随便把他们全部处死。这些士兵都是在上海之役体验过杀人的强者,所以杀人对他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

当我知道后,一切都太晚了,那批被捕的男女均倒在一片血泊中。

虽然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我为了隐藏自己的罪状,竟然害死了一群无辜的善良百姓,真是阿弥陀佛,罪过极了。

结果我当然是逃过了一劫,但也因此犯下了天地难容的大罪。这件惨事的起因是我和“大师”曾经一道去强暴良家妇女。“大师”被杀可以说是他自食恶果,而我如果接受公平审判的话,当然也是有罪的。

除了般若政、铃木一等兵、大师等三人之外,还有两三个人同样使我感到头痛。但我并不打算一一介绍,仅就其中之一,让我觉得最可怕的野吕万方一等兵,提出来向大家介绍。

野吕一等兵比我早一年入营,仅如此就令我感到恐惧万分,再加上他性喜暴力,在第一年当兵期间,队友们就以“鬼万一等兵”的绰号称呼他,对他深怀惧心。我因为有他这种部下,所以更是害怕。像这样,把这些不寻常的人当做部下的我,实在太辛苦了。

所以我才会对初见面的军人的经历感兴趣,想要探个究竟。对于不值得提起的问题也表示关心,其原因就在此。

就如同自古以来大家都把战争视为“战火”一样,战争和火之间是有因果关系存在的。在日本战国乱世时代的战记之中,描述武士们的战争,烧毁了民家,使无数民家化为灰烬,所以至今仍有许多关于战争和火的因缘的故事流传。

因为这一次的战争而来到中国大陆的日军中,据说有一部分是采取“三光作战”的战法。

“三光”就是“杀光、抢光、烧光。”亦即对敌人不分军民全部杀光、将财物资源全部抢光,将人们居住的市街、村庄全部烧光。

我在范围广大的战场上行动时,曾经在许多地方看见被烧毁成瓦砾堆的市街和被烧毁得只剩下焦黑柱子的村庄。

战争结束后回乡的居民,因家园被毁、储存的粮食被抢尽而漠然的站立在废墟中,此情此景看了实在令人感伤。

但是,眼见这种凄凉情景会感到哀伤的我,也在前后数年间的战场中,烧毁过无数无辜百姓的家园。

有一次,因为怀疑某村庄有游击队潜入,于是就放火将它烧毁,一户也不留。另一次,单凭直觉认为某村庄有利敌的行为,就将村庄烧毁,将村民全部杀光,不留一个活口。

对居民而言,这实在是无妄之灾,但是日军却单凭自由心证,在无重大理由的情形下,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

我首次犯下烧毁民房的大罪,是在入侵南京的途中,一处名为“句容”的邻近村庄。

当时我所属的大岳队,以预备队的姿态跟随在第一线部队的后面。

随着接近南京,中国方面的抵抗也愈来愈顽强,在句容前方不远处呈现胶着状况,于是部队就暂时停留在当地。在那一段短暂的停留期间,分队中的野吕一等兵伙同其他分队的士兵,一行五人不知前往何处去征收食物。

当时在附近仍有许多战败的敌兵潜伏着,他们少数人到离开街道的地方去行动,实在很危险。而且在战况不明、不知何时就要前进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忽视这个道理,私自外出行动。

我心中突然有一股不祥的预感。如果他们平安无事回来还好,万一发生问题,事情就闹大了。不巧的是,总攻击的行动正要开始,大岳队也接到了前进的命令。

此刻我再也无法隐瞒了,于是怀着恐惧心向中队长报告,虽然中队长非常愤怒,但事情既已发生又不能不处理。

如果是不懂人情的队长,也许会以“大事为重”的理由,不理睬他们而率队出发,但是很体谅部下的大岳中尉,却立刻召集干部商量后,派出搜索队。

这个临时的搜索队,是由发生问题的本分队和丹羽分队的队员组成,由身经百战的三宅班长担任指挥。

仅两个分队的兵力,就敢进入敌方游击队和游击队潜伏的地区,实

在很危险。途中经过两三个小村落,未发现任何迹象,再继续前进约八公里后,看到一座周围用土墙围成的村庄,约有五六十户人家。

“这个地方很可疑。”说着班长就在村庄前方下令停止前进,然后自己带着三名士兵不知要前往何方,约30分钟后就抓回三名状似当地居民的男子。

班长似乎打算从他们口中探出消息。结果不出所料,他们一回来就叫翻译人员沟口一等兵进行问话。

“你们有没有在附近看到几名日本士兵?坦白说。他们到哪里去?现在又怎样?如果有任何隐瞒?你们就没命。”

那三个居民看到班长拔刀在恐吓,可能是惊吓过度,一时竟答不出话来。班长却以为这是无言的反抗,而大声呵斥道:“臭家伙,你竟敢不合作。我要你的命。”同时高举军刀,做好砍首的准备姿势。

也许是因为我不认为他会真的砍下去,所以当我看到他那把锋利的军刀掠过居民的头部时,我的确吃了一惊。

锋利的刀锋不偏不倚地砍断其中一位居民的首级,滚落在草丛中,从切口喷出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草木,所以其他两位居民此刻非常害怕。于是就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道出。根据他们的说词,住在前方那座村庄的都是普通老百姓,但最近有几十名中国游击队员潜入。今天白天里,突然来了几个日本军人。不久就响起一片枪声,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村庄内,他们不知详情,也不知道那几名日本士兵的下场如何。

听到这里,大家都判断野吕一等兵可能是因为征收而遭到杀害。下一步只需前往确认,然后准备收尸。但是不超过30名的兵力,想要从正面挑战实在太危险,一不小心很可能全部被歼灭。

于是班长就决定等到入夜村民全部熟睡后,放火烧毁村庄,趁居民们狼狈逃亡之际,一举将他们全部消灭掉。班长是一位沙场老将,作战经验丰富,他的作战策略从未失败过。

等到深夜,认定村民都熟睡时,我们就越过土墙,到处放火,不久火势迅速蔓延起来,火光到处乱窜,将整个村庄烧毁。酣睡中被大火惊醒的民众,争先恐后地仓皇出逃。

这个时候,我们乘虚而入,展开突击行动,见一个杀一个,只在十几

分钟内就再也看不到一个会动的人影，到处散落着死尸。

其中也有类似游击队的武装人员，但我们并未遭到抵抗。也许是因为在睡眠中遭遇突袭，慌张过度而误将两个分队的兵力视为一个中队，以致丧失战斗意识。

战斗结束后，在火光照射下检查死尸后，才发现几乎都是普通民众。

尸体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10岁左右的小孩，以及老婆婆、老公公。

较灵活的游击队员早就乘隙逃跑，只剩下这些行动迟缓的老百姓，这种情景在火焰的照射下，更增加一股残酷的味道。

我在突袭行动中，内心激起一股敌忾心，不分男女老幼，见面就一枪刺杀，但等到恢复平常心时，实在不敢目睹这场惨状。

找到野吕一等兵们的尸体后，终于确定了我们刚才的想法，五具尸体都被暴露在村庄的中央广场。每个人的衣服都被剥光，阳具都被割掉，塞在自己的口中。

可能是他们进入村庄后，正要对妇女非礼时，遭受突袭被杀害，村民们为了报复才如此做。看到这一幕惨况时，不禁对杀害居民的行动产生了罪恶感。

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是，野吕一等兵们想进入村庄征收，又想强暴妇女。依理来说，野吕一等兵们的死亡是罪有应得，自作自受。

如果要勉强说出村民的罪状，也仅是收留游击队而已，但因为那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而我们却视它为利敌行为，把民众安居的村庄烧毁，杀尽无辜的村民。

虽然这是战争中发生的事，但未免太过分了。我们冒险行动，烧毁村庄，杀害那么多人，这究竟对进攻南京有何贡献？其实完全没有。

战争经常会发生这种无意义的事情。

(中略)

战争与疯狂

“南京大屠杀”在教科书上的记述发生争议时，我曾和一位干部级的

自卫队官员就此问题加以讨论。

那位自卫队官员对我所承认的事加以反驳道：“关于俘虏的处理，国际间订有明确的公约，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虐待和杀害。对于民众更是不用说。因战争而产生的无心的军人，也许会有过分的行为，但是像众人所传言的数十万人的大屠杀，我认为是战胜国为了责难战败国而自行捏造的。我相信南京大屠杀是一项夸大的宣传。”

那位自卫队官员出生在没有战争的时代，对于战争的知识很缺乏，所以当然会有这种观感。他加入自卫队后，可能学习研究过与太平洋战争有关的战略和战术，但对于战争所蕴藏的内幕却一无所知。

不了解战争的人是无法推测和想像战争所蕴藏的内容的。就像我还未踏入战地以前，也是一直深信国际间所协定的事会为大家确实的遵守。

可是到了战地以后，我才知道战场是人间伦理无法适用的地方。战场是无法律的地带。战场上的官兵们是以胜利为绝对的目标，为了胜利是没有战场伦理的。

而且，战争时的人是一种狂人。战争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的残杀，它原本就是一种疯狂的行为，所以在前线直接参与作战的官兵们，当然会因此发狂而丧失人性。

和平时时期站在人道立场来考虑战场伦理的人们，和战争时的人们是完全两样的。所以，在战场上才会完全无视国际协定。

从开始日军就无视于国际公约。那是在吴淞炮台及宝山附近的战斗告一段落时所发生的事。

我所属的大岳队，为了攻击下一个目标“杨行镇”，前进到一处小村落时，先到达的部队俘虏了几名来不及逃走的中国兵。

我因受好奇心的驱使，第一次前往参观俘虏，发现他们的双手都被紧紧地反绑在背后。如此就已经太过分了，接着我又看见一名挂着中尉肩章的军官，往他们的身上拳打脚踢，然后威胁说：“我一定要砍断你们的头。”

虽然这名中尉是想替自己的部下报仇，但若因此而杀害俘虏那未免太过分了。我们当然很了解该名中尉因部下战亡而气愤难消的心情，但

这是不成理由的。

起初我因为不忍目睹此状,所以就跑离现场,但另一方面却又很渴望看那可怕的场面,于是再度跑回现场,结果发现俘虏们都已经惨遭杀害,首级分家倒卧在血泊中。

我刚到战场不久,就一再目睹许多非人道的行为,而感到非常愤怒。像类似的事情,在战场上有如家常便饭一般的被实行着。

来到中国大陆扩大战场的日军,其非人性的暴行可说是罄竹难书。“南京大屠杀”就是其中一例,也是最令人议论不休的。而其他类似的屠杀行为,虽然有大小之别,但只要有作战就一定会发生。我之所以敢如此断言,乃因我也是其中的一分子。

虽说战争会使人发狂,但做出暴行的终究是日本的军队。

日军攻占中国大陆的部分领土时所犯下的暴行,使得中国人民愤恨难消,永远无法忘怀。

我和一些战时到过战地的同伴们,于中(中共)日建交后,曾经再度一道前往中国大陆,当我们从上海前往南京附近,到达某一条街道时,感受到人们的眼光充满了仇恨,使得我们不寒而栗。经过将近五十年后的今天,他们怨恨的心情仍未消失,因为日军实在是做了太多灭绝人性的坏事。

如此说来,也许大家会认为日本军队特别可恶,其实在战争中,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是大同小异的。

以美军为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军的潜水艇就曾经攻击载有伤患的日本医护船,和载有要返回日本的平民的非武装船,将它们击沉。

太平洋战争的末期,美军的飞机也曾经投下炸弹和烧夷弹,攻击日本民间的设施和民房,使市街夷为平地,杀伤无数平民。如此看来,美军和日军的行径并非两样。

如同日军以武士刀砍杀中国人,以刺刀刺死中国人,美军是以炸弹来大量杀伤日本人的。如同日军放火烧毁民房,美军是投下烧夷弹将日本的城市和乡镇夷为灰烬。又如同日军强暴中国女性一样,美军也曾经强暴日本女性。所以当时的日本人非常气愤地怒骂美国为“魔鬼畜牲”,并且怀恨在心。

我在战争末期，曾经目睹轰炸东京地区的 B29 型美机被日本击落后，飞行员被愤怒的民众杀害的情景。

当那位飞行员着地时，民众就马上群起而攻之，有的以木棒敲打他，有的则向他投掷石头，一名中年妇人一面辱骂说：“这个鬼家伙。你杀死我先生，我要杀死你。”一面举起拳头般的石块，状似母夜叉般地一直敲打他。这妇人因先生遭遇空袭死亡，悲愤交集以致像发疯一般丧失理性。

像这样的战争，使人们不分军民都被逼得像发疯一般。

对于前往中国大陆的日本军队做出非法行为的原因，有一本书解释说：“日本军队会做出残暴行为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所动员的下级官兵，被迫从事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而感到力不从心，以及被暴露在有生命危险之虞的境地，因此才会有兽性的表现。”这是我们可以了解的事。军人们会变成野蛮人究其原因，人类原本就是一种野性的动物，后来是经过进化过程，才组成人类社会，建立区别善恶的法律，重视人道。

但战场是一处很特殊的社会。踏入战场面临那种社会时，人们就会恢复争斗的野性，对敌国的人们，即使做出任何犯罪行为也不会有罪恶的意识。因此，力量较强的一方就会任意凌虐虚弱者。

诸如此类的因素不胜枚举，但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陷入战争的漩涡中，大多数人都会疯狂起来。战场上的军队会做出残暴的行为，都是由于战争所引起的。我想做过这些伤天害理之事的官兵们，当时也都是一种毫无理性的狂人。

从军慰安妇

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女性，除了被战胜国官兵凌辱的战败国女性外，还包括与战争无关的很多女性，她们被利用来供战地官兵们发泄性欲，她们的贞操也受到蹂躏。

这些被送到战地奉献肉体的女性，就是所谓的从军慰安妇。

所谓从军慰安妇就是随着部队到战地，担任处理战地官兵们性欲的工作的女性。她们依照军队所规定的代价来出卖灵肉，表面上看来似乎和普通的卖春妇一样，但内容却有所不同。

一般的卖春妇大都是因个人的原因出卖肉体,但从军慰安妇的最大目的是为了战争的遂行而出卖肉体。因此她们在军队所管理的慰安所内,处理军人的性欲。

这些从军慰安妇配置的范围很广,所以人数相当多。虽然我无法获悉确实的人数,但根据某种记录显示,大约每40名军人配有一名从军慰安妇。

一名女性要以40名男性为对象,处理其性欲,这实在是非常不容易。如果是平均40人对一人那还好,但是在条件恶劣的最前线守备地,有时候一天要应付七八十人,甚至100人。

一天要应付100位男性,假定24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每小时约要应付四人,换句话说,每15分钟要处理一人。若扣除最低限度的睡眠和吃饭时间,则每小时约需处理七八人。

虽然军人因为对女人很饥渴,所以会很快地就解决,可是如此连续不断地工作,对慰安妇的肉体而言,实在是过重的负担。

慰安妇之间就曾经流传着一首歌,名为《我的肉体并非橡皮做的》。慰安妇所拥有的也是有生命的肉体,整天不断摩擦的局部是会发炎的。虽然如此,她们也无法休息,只好利用井水来冷却,或用扇子来扇凉。她们的肉体与其说是人体,不如说是处理男人性欲的器具。

我因为在最前线服勤的机会较多,所以很了解在前线的慰安妇的肉体是如何被蹂躏的。

我有一段时间曾驻守在最前线的警备地,当时常驻的军人约有一千名,但慰安妇却只有七名。因此,军人若想得到瞬间的快乐,是在非常不容易。

要到慰安所的那一天,必须特别早起,做好准备,在慰安所开始营业的时间之前出发。然而一到慰安妇的房间前时,才发现早就有一大群人在那里排成长龙。

当时的军人,早就失去做人应有的尊严。无论是老爷般的老兵,童颜的少年兵,都一致渴望早一点接触到女体的猴急模样,实在是滑稽透顶。为了节省时间,在慰安妇的房间内,经常保持三个人在等待着。

这三名男性中,一名是刚办完事准备回去的人,一名是正在办事的

人,另一名是正准备接手的人。像这样,他们连让女体获得短暂休息的时间都觉得可惜。

每个军人都是如此,所以在那里工作的慰安妇相当忙碌。她们一天的工作时间表如下:早上9点到下午5点应付士兵,晚上6点到9点应付士官,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应付军官,几乎毫无休息的机会。

特别忙碌的时候,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在男人腹下吃饭团。有时感觉脚部、腰部麻痹,想要入厕也无法起身,于是就当场方便。夜间睡眠也是在男人的拥抱下假眠。她们竟能忍受如此痛苦的肉体折磨,实在令人惊讶!

像这样,所谓的皇军,为何需要这些违反人道的慰安妇呢?当然像我这种下级的士兵是无法知道其理由的,但据说是为防范像入侵南京的官兵们的非人道行为再发生而设置的。

向南京攻击前进的日军的非人道暴行,我已经在前面记述过。那些暴虐行为被世界各国获知,成为国际问题时,军部的上层阶级就说:“前线官兵会变得如此凶暴,是因性欲无法满足所引起的。”因此,就有了用“女性去安慰战地官兵,处理其性欲,安抚其暴躁的心”的对策,这是我听到的一项传闻。

战后我听一名曾经参与慰安妇企划的人员说,当初在招募慰安妇时,为了募集足够的人数,着实费了相当大的精神。

起初是向日本国内的一般女性招募,但后来大家知道是要前往战地,出卖灵肉供军人发泄时,一般外行的女性都不肯去,甚至连有经验的风尘女子也踌躇不前。

虽然如此,却也不能采用强硬的手段,否则将会伤害到国民感情。所以不得不以欠老板金钱的妓女为对象,先替她们偿还债务后,再请她们来参加,但这些人的脾气大都很暴躁,实在不是适当人选。然而在短时间内,想要招募足够的人数又确实很困难。

不过日本军部一旦计划实施的事情,无论有多大的阻碍他们都有办法去克服它。

当日本军部的上层阶级,发现利用国内女性来充任的计划遭遇困难时,立刻将目光转移到当时日本属地的朝鲜半岛,因为朝鲜半岛有数百

万名年轻女性。若在大日本帝国的淫威下招募,一定可以在短时间内募集数万人。最初派遣一批媒介者到韩国去招募,然而绩效不彰。

军部眼看招募的方法太缓慢,就采取强硬手段,运用警察的力量来进行征集。军部命令朝鲜总督府驱使其管辖下的警察开始募集。与其说是募集,不如说是出去猎捕女性。

募集的对象是16岁到20岁的未婚女性。被警察列入名单的人,无论任何理由都不得推卸。想逃跑的人惟有死路一条。据说被列入黑名单的少女中,有的因悲伤而去卧轨自杀,有的在逃往深山时被老虎吃掉。但是自杀和逃避都会连累到父母,真是想死也不容易。

像这样,被强迫征集的年轻女性,在为国奉献的大前提下,这一些女性,以爱国挺身队、殉国服务队等美名,送往战地当慰安妇。

日本女性占百分之几,朝鲜女性占百分之几,正确的比率我虽然不清楚,但是战地的官兵,只要听到慰安妇就会联想到朝鲜女性,因此我估计慰安妇中朝鲜女性所占的比率约为70%—80%。如今虽然无法找出此比率的正确数字,可是据说当时在中国大陆约有十万名韩国慰安妇。

女性到战地本来就是很危险的事,更何况把她们送到最危险的前线,暴露在危机下,从事处理官兵性欲的工作,这实在是太无人道了。虽然如此,但是当权者为了推行战争,根本就无视女性们的宝贵贞操和生命。

此外,在没有慰安妇的偏僻地区,就征用当地的女性为慰安妇。从日本和韩国招募慰安妇很困难的阶段,征用战败国的女性却是轻而易举的事。

和上述的例子很相似的是,日本战败后为了解决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官兵的性欲问题,提供一部分日本女性,设立慰安所。需要这种设施的理由,和日本军部当初设立慰安所的情形是一样的。

由于美军进驻日本后,强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政府为此曾感到苦恼不已,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为了“新日本的再开发,以及保护全日本数千万女性的贞操”,必须牺牲一部分女性为防波堤的石头。

计划决定后就由民间来负责实行,当时的政府提供5 000万日元为

保证投资贷款,结果创立了 R·A·A(国际亲善协会)。它就是专门处理美军官兵性欲问题的国家许可的卖春所。

“征求愿为复兴国家紧急措施挺身的新日本女性。年龄 18—30 岁。食宿、衣物、粮食完全公费,待遇优厚。”这是招募女性的一个广告词。见此广告后应募的,大都是因为战祸失去家庭的少女,或者是先生战亡的年轻寡妇,大家的境遇都很凄惨。

如何从性饥渴的美军手中,保护日本女性的贞操,是东久迩内阁的重要课题之一。但当时的执政者认为除了提供女性去处理他们的性欲外,别无良策。

为国家紧急建设工作的新日本女性,其所担任的工作就是处理美军官兵的性欲。这和日本军队所设立的性欲处理慰安妇并无两样。

如果要勉强说出二者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从军慰安妇是为了“战争的遂行”来处理日军的性欲,而新日本女性是为了复兴国家来处理进驻军的性欲问题。

像这样,在战争中和战争后,女性的肉体都为战争而牺牲了。牺牲的女性不但贞操被蹂躏,连肉体、精神都被折磨得非常虚弱,生命就这样被摧残掉了。

想要了解战争,翻开战史来研究大局上的事情,当然很有意义,但我想若从战争与女性的因果关系来加以研究的话,也许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军国之母 军国之妻

战争所留给女性的各种灾祸,前面已经说明过,但还有一项不能等闲视之的,即是战争与女性的因果关系。如爱子被征召到战场的母亲,以及心爱的先生被送往死地的妻子们的心情。

前往战地的人,生死经常只在刹那间。每次交战就会有百分之几的人员战亡或受伤,昨天刚接到来信说他很健康,而今天却突然传来他“战亡”的消息,如此这般的事是经常有的。

身为母亲的人,眼看养育 20 多岁的爱子被送往如此危险的战地,其心境当然十分悲痛。对心爱的丈夫被送往战地的妻子而言,更是伤心

欲绝。

但当时的国情是战争重于一切,把自己的儿子或丈夫送往战地,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心爱的孩子和丈夫战亡时,大家都会说:“他们已经光荣的为国捐躯。”而一般的国民也赞誉这些女性为“军国之母,军国之妻。”

“为了国家请勿挂念我们,祈望你能光荣的为国捐躯。强忍住眼泪鼓动爱子,欢送爱子到黎明的车站。”

这段歌词是《军国之母》中的一节。

“为了东亚和平,何必哭,何必叹! 你的遗孤,我一定会将它养育成人。”

这是《军国之妻》中的一段歌词。

像这样,必须将最心爱的孩子和丈夫的战亡,视为光荣的捐躯而不能悲伤。

虽说是为了国家,但和心爱的人诀别一点也不感到悲伤,这实在是自欺欺人。将爱子和丈夫的死,视为奉献国家而感到光荣,实在是处于军国主义风潮中无可奈何的事,所以只好强忍住眼泪和内心的悲伤,军国主义的国情,使得人们不得不如此隐藏真情。

出征的战士谁无父母,出征的官兵中也有许多人早已娶妻生子,因此这件事情,在战争与女性的关系上,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家母于我出征期间,曾经成为军国之母,现在,她是非常高兴我能生还的非军国之母。我要出征时她含着眼泪送我。她并没有希望我光荣的战死。

出征后的事情我当然无法知道,但后来我才知道,当我在战场的三年多的时间中,母亲为了祈祷我能平安回来,每天早晚到离家三公里的一间寺庙去拜拜。

其间她也有身体不适的时候。当她卧病在床时,心中一直挂念道:“如果因为我今天休息,没有去祈祷,我的孩子被子弹击中的话,过去的祈祷不就白费了吗?”

出征当初,她一直祈祷我能身体健全、毫发无损的平安回家,但一听到上海之役有许多人战亡时,母亲就改变祈祷为:“万一失去双脚或手也

没关系,只要他能活着回来就好。”此外,她也曾向神明许愿。只要我能平安回来,她甘愿放弃食用自己最喜爱吃的东西。

这并非只有家母如此特别。凡是把爱子送往战地的母亲,其心态都是一样的。表面上装作是“军国之母”,暗地里却祈祷自己的孩子能平安无事归来,辛苦的扮演着双面人的角色。

因为我能平安回家,所以家母的祈祷并没有白费,然而有许多的母亲,却无法看见爱子平安归来。

我的分队员小关一等兵的母亲,是一位命运特别坏的人。小关一等兵是在襄东之役开始前约一个月才编入我分队的新兵。

他的运气奇差无比,踏入战场不到两个月就战亡。我送他的遗物到他家中时,才了解到他母亲有一段特别悲惨的命运。

据她说,小关一等兵是三位兄弟中的老么。他们年幼时父亲就过世了,她含辛茹苦地养育他们二十多年,好不容易使他们长大成人,正感到欣慰时,战争突然爆发了。最初是老大被召集到上海战亡,接着,现役兵的老二又出征到武汉作战,不久却因病死亡。惟一剩下的小关一等兵,她正祈祷神明保佑他能平安回来,想不到竟无法逃过死神的魔掌,她就这样失去了三名爱子。

接着她又说:“还可以哭的时候还算幸福。如今泪已干、心已碎,想要哭再也流不出眼泪了。”

母亲和妻子失去最心爱的人时,其悲伤的心情是一样的,但夫妻关系却另有一层特殊的意义。

我的分队员野吕一等兵应招时,太太正怀着第一胎的身孕。他经常向我们说:“今年12月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我快要当爸爸了。我应该保重自己的身体。”但他却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就阵亡了,事情是发生在孩子诞生的那个月。当然人死不能复生,但他的太太却要面对孩子诞生的喜悦和丈夫死亡的噩讯,这种悲喜交集的情绪实非常人所能忍受的。

但是身为“靖国之妻”的人,只能强颜欢笑,不能让人看出心中的悲哀。

战争时期,丈夫战死,其妻就被称为“靖国之妻”。这是将妻子奉献给亡夫之灵的一种无形枷锁。因此,丧夫的妻子就必须背负起亡夫的灵

牌,不能再婚。

“靖国之妻”的美名,反而更加深可怜女性的痛苦,造成无数的悲剧。以下就是一位熟人的妻子的故事。

他应招时结婚才三个月,还沉醉在新婚蜜月中。不幸的是,他到战地不久就战死了。当时这位年轻的寡妇,当着众亲友的面说:“虽然我们结婚不久,但如今我已是靖国之妻。我要带发为尼,终生陪伴亡夫之灵。”令在场的人非常感动。

当时那位年轻寡妇内心的真实感受究竟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她表面上不如此也不行。从那时候开始的两年间,她一直在“贞女之鉴”的赞誉中,保持着“靖国之妻”的身份。

然而“靖国之妻”也是女人。有一次,她因为不自觉所产生的迷恋之情,和一位男性交往,结果怀了身孕。这时候,“靖国之妻”受到严厉的批评,以往的赞赏换为“不贞女”、“不义者”,最后甚至被称为“非国民”,社会的舆论逼使她只好走上自杀之途。

虽然如此,大多数将丈夫奉献给国家的妻子,都能以“靖国之妻”的美名为荣,以它做为精神支柱。但这种光荣和精神的支柱,却因战败而消灭。战败后,国民过去一直隐藏在内心的对军部的反感与不满,立刻爆发出来,并且对曾经当过兵的人表现很冷淡。国民都已经了解战争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战亡者的遗族就再也无法受到特别的敬重。

战争结束后,从国外陆续复员的军人和一般的平民,一齐涌到狭小的国土上,使得人口突然暴涨,以致粮食短缺,日本列岛变成饥饿列岛。国民的道德低落,公德心也逐渐淡薄。为了生活,必须购买黑市的粮食,大家都从城市涌向乡村去购买食物,抢夺乡下人的食物。无法搭上列车的人,就把车窗打破,强行挤上去;无法挤上时,就将双手攀附在行驶的列车的窗框上,只顾自己,毫不考虑他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男人可依靠的战争寡妇,其处境更是凄惨。

战争中偶尔会来照顾自己的人再也不来了,“靖国之妻”也不再受人重视了。为了生活,她们不得不和男人们一较长短,有时跳上列车,有时就在车站的长条椅子上过夜。

想买东西没有钱,只好把衣柜中的衣服拿来与乡下人交换食物。衣

物换尽时,就脱下身上的衣服和别人交换,这种生活被称为“竹笋生活”。

但是到了竹笋生活之后,一切就完了。把衣物卖光后,除了做小偷或出卖灵肉来获取食物外,别无他途。

当时的街娼突然激增。是因战灾生活陷入苦境的小姑娘和战争寡妇加入所致,她们为了生活只好出卖灵肉,以赚取金钱来购买粮食,除此之外实在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虽然是为了生活,但是这种职业,却是于法所不容的,于是政府就开始取缔街娼。做街娼虽是违法的行为,但他们是因战争而失去丈夫的,身为柔弱的女性,被放置在战败的混乱社会中,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执政者非但未能寄以同情,善加关照,反而只会予以惩罚,实在毫无道理。

我曾和一位出卖灵肉的战争寡妇谈起此事,她说:“我把最重要的先生奉献给国家,但是战败后,国家就不再照顾我们。在这种战败的混乱社会中,叫我们这般柔弱的女子如何活下去。能卖的东西都已卖光,如今惟独肉体可出卖了。”

像这样,战争不知祸及多少柔弱的女性,使她们遗憾终身。

(下略)

[曾根一夫著、陈惠堃译:《南京大屠杀亲历记》,
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1986年6月。]

23. 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续)

——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

曾根一夫

“南京屠杀”是虚构的吗？

战争结束已近四十年了，现在是该把这战争记忆整理归档的时候了。值此，关于“南京屠杀”事件，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论争：一种认为“南京屠杀”是不争的事实；一种则认为“南京屠杀”是虚构的谎言并试图抹杀这段历史。

在此，我要用我的亲身经历来揭示这段历史。

我很奇怪，怎么到现在还会有人说什么“南京屠杀是虚构”、“是战胜国的谎言”之类的话，并企图歪曲事实。而且我发现，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一些刚过 50 岁还不到 60 岁的人。

而南京战役开始时已懂事的人，如今少说也有 60 多岁了。就说当时攻城的部队官兵，最年轻的士兵如今也有六十七八岁了。

以此推算，现年 50 来岁的人，当时还是幼童；现年 40 来岁的人，当时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如果是当时参与指挥南京攻城的高级将领，出于掩饰自己的罪行之目的而否认（南京屠杀）的话，我还能理解，但是一些不了解真相的人说没有，这就让我不能理解了。

还有一种怪论，有人说：“不可能屠杀了 30 万人，这是夸大其词。因为根本没有证人。”

参加南京攻城战的官兵中还有很多生还者。其中有亲身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也有虽然没有亲手杀人却亲眼目睹的人。他们说：“那些连战争这两个字怎么写都不知道的人吵吵些什么？”但他们自己之所以不站出来反驳，只是因为（南京屠杀）是无须争辩的事实。为这样的事实进行

争论显得太无聊了。

所谓“南京屠杀”，是 47 年前日本侵略中国时，日本军队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

昭和 12 年 12 月 1 日，日军发动了南京战役。在向南京进军的过程中，以及进城时和进城后的扫荡残留敌军时，屠杀了大约三十万中国人，其中包括已经投降了的中国军队官兵以及普通老百姓等非战斗人员。同时，进行烧杀抢掠并强奸妇女。

这里提到的 30 万这个数字，是中国方面的提法。在审判南京战犯时提出来的，并且用于现行的中国的历史教科书。

一提到这个数字，就会有人说：“中国人就喜欢夸大其词。”的确，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如“万里长江”、“白发三千丈”之类的夸张修辞法。

上海战役时，为了支援久攻不下的上海攻城部队，第十军（第六、第八、第一一四、第五师团的一部^①）从敌阵营背面的杭州湾北岸金山卫登陆，并且放飞了大量书有“日军百万（大军）杭州湾上陆”的宣传气球。说是为震慑中国人，只写“日军三个师团杭州湾登陆”的话，其效果不会好，于是采用了“日军百万（大军）”这种中国式的夸张宣传方式。

我不否认中国确有夸大其词的传统，但同时我还认为，据此将它与“南京屠杀”联系起来则是不妥当的。

除了中国方面提出的这个 30 万的数字，还有一个是日本在战败无条件投降之后，远东军事法庭裁判时出示的那个数字：共屠杀中国军队俘虏、非军事平民 11.5 万人。

这和中国方面的数字相差甚远，问题就在大屠杀发生期间。即，中方指的是约六个星期期间，而远东军事法庭却没有提出明确的期限。

要想了解“南京屠杀”的真相，这些数字当然必须弄清楚。但是在这之前，日本人必须承认，日军曾大量屠杀过中国人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必须回顾一下历史。

有几个与大屠杀有关的事实。第一，昭和 13 年 2 月 18 日，中支那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中将、第十军司

^① 即第十军直属的国崎支队。

令官柳川平助中将被撤职,部队被解散。

这三位将军是指挥了攻占蒋介石政权的大本营南京的战役,并因占领有功而荣获特殊功勋的功臣。他们被撤职的背后,是被追究了他们为南京屠杀所承担的责任。

与此相关,据说,松井大将曾被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叫去,受到了严厉的训斥。

同样,传说当时的外交部长广田弘毅对军队在南京干的大屠杀十分震怒,警告了陆军大臣杉山中将^①。

而在南京,南京战役后根据不扩大战争的方针,也有出于整顿队伍的目的,(部队被)改编为中支那派遣军,由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

以上都是发生在上层的事情。当时对一般国民一直是绝对保密的。只是到了战后,此事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被揭露出来,并且将松井大将等五名有关人员处以极刑后,一般大众方才知晓。

当时,围绕南京大屠杀并没有出现激烈的争论。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南京大屠杀纯属战胜国捏造”之言论渐渐抬头了。

然而事实是不容歪曲的。在南京屠杀虚构论出现之后,人们纷纷予以反驳。其中有很多是亲身参与南京攻击战、参与或目睹了大屠杀的人。在我写出了《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之后,又有很多人在报纸书刊上为南京屠杀作证。在此,我想引用几篇。

三笠宫崇仁殿下在他的自传《古代东洋史与我》(学生社刊)中有一段文字,虽然他没有直接肯定发生过南京屠杀,却很说明问题。

三笠宫殿下小时候被称为澄宫,我们都是大正11年^②上学的,是同级生,关系很好。下面就是三笠宫殿下自传中的那一段。

“1943年1月,我被补为支那派遣军参谋,前往南京总司令部赴任。”这是第一句,接下来他写道:“我在那儿工作了一年,其间我得知了日本军的残暴行为。这里我只能略举其一二,读者可以理解为

① 原文有误。杉山元1936年11月晋升为陆军大将。

② 即1923年。

这只是冰山一角。”“某青年将军——正因为他是我的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才让我格外震惊——告诉我,若想培养士兵的胆量,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们在活的俘虏身上练习刺杀。”

这里虽说没有直接涉及南京屠杀,但是这段文字显示他感觉到事关重大。但是从他的地位出发,是不能具体说什么的,不过他显然是有根据而写的。

昭和59年7月28日的《朝日新闻》上有一篇题为“详记南京大屠杀,从军士兵日记公开,京都战争展实施委员会”的报道。

报道说,8月2日开幕的在京都市冈崎京都劝业馆举行的“为了和平战争展”上,发现了一本由战死者家属寄赠的曾参加南京战役的当年士兵在现场留下的笔记。笔记作者是一名京都府籍的士兵,该名士兵参加了南京战役,并战死于中国大陆。

由于其家属的要求,没有公开这位士兵的姓名,但这是一本现场记录,作为资料它与回忆录相比,应该更具价值吧。笔记一共两本,记录了从昭和12年8月到昭和13年2月为止约半年期间的事情。报纸选登了攻陷南京的12月13日到全军入城仪式的17日这五天的日记。(以下引自《朝日新闻》8月17日—24日)

12月13日 晴

午夜3时左右,敌军终于不敌我军炮火,猛烈发射了最后一次炮弹后撤退了。

上午7时30分大队放弃阵地,在大道上整队,以堂堂××联队为先头部队,于下午2时30分开进南京城。入城一看,发现城内比想像的要干净得多,没有受到多少飞机轰炸,难民区里聚集着大量中国难民。××大队在坦克的引导下进行了城内扫荡,我们顺利占领了南京,并在难民营前露营驻扎下来。

最先进入南京的第×大队的先遣官兵,是在我们×大队的掩护下,于13日凌晨2时10分将日章旗插上南京城头的。

进城时,×大队本部以及××中队在离城门约二百米处遭遇地

雷,两名×大队本部人员和九名××中队人员身亡。另外,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护城河外围拉着铁丝网,构成完整的阵地。一共有三个城门,都用沙包堵着,没法开门。因此我们是用飞机投弹□□□□□的。

城内有大量败兵,很难扫荡。

一进城,×大队立刻用坦克开路进行了城内扫荡。

12月14日 晴

今天露营于向往已久的南京街头。上午8时30分,我中队整队前往城内的难民营进行扫荡。伤兵、败兵都换上了便衣,他们扔掉了刀枪、弹药,穿着便衣,在一个难民营里与千余名难民混在一起。我们和中国警察一起从中鉴别出了五百多名看似伤病、败兵的人。其中甚至还有连长和相当高级的长官。我们一个小队根本无法杀掉这么多人,所以从第×机枪队借来两挺机枪,加上中队的六挺轻机枪,并集中起所有持步枪的士兵。当所有俘虏被带到城墙边的山脚下后,各种枪支一起开火,把他们统统杀光了。其惨状目不忍睹。此次南京战役,由六个师团同时向南京发起进攻,只留出一条通向长江的路让敌军逃跑。然而,当部分敌军登船逃跑时,便遭到守候在对岸的第十师团^①的迎击而被全部歼灭。前线部队失去了逃路,全部成了残留市内的残兵败将,据说市内共有十万之多。

今天收缴了大量败兵的香烟、袜子、手套等物品。

12月15日

今天因为下午举行入城仪式,上午就没做什么。下午中队去参加入城仪式,我们小队为守卫缴获的武器(野战炮、高射炮)而留了下来。今天我们还缴获了大量罐头。

12月16日

上午8时集合,我们小队和中队一起,为扫荡躲藏在中山门外

^① 原文如此。第十师团并未参加南京攻击战,疑为第十三师团之误。

约三里半的山里的残兵,进入了指定位置。但命令又改变了,叫我们在□□□待一夜,第二天再返回城里。

联队在残兵扫荡中,一共在郊外搜寻到4 000多人。

12月17日 晴

早上6时集合,我们小队作为大队的征缴队回到了城里。回来一看,好东西都被其他部队搜刮一空,什么都没有了。南京再大,也经不起十个师团的进驻。下午3时,分到了南京城内的宿舍。

以上是京都籍士兵的日记。

这位京都籍士兵日记轰动一时的同时,宫崎市也发现了一本原士兵笔记。

这位士兵隶属都城第二十三联队,参加了南京战役,当时是一名上等兵。他后来回国,于昭和49年因肾病去世。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这本笔记和三张当时拍摄的照片。以下引自昭和59年8月5日《朝日新闻》的报道。

12月12日

终于攻克南京了!!(略)下午4时15分(略)南城门上日章旗高高飘扬在晚秋的天空中。

(略)能够实现最先入城的夙愿,这是男子汉一生的骄傲。

12月15日

今天,遇上一队无路可逃的2 000名残兵举着白旗来投降。他们老的老、小的小,服装千奇百怪,武器扔了一地,跪了长长的一路,真可谓天下奇观。因想不出什么处理方法,大家便用各种方法把他们全杀掉了。近来,好像流行肆无忌惮地把无辜的中国人抓来,活埋、火烧、用木棒打死等,以这些连中国士兵也自愧不如的残忍行为来取乐。

12月21日

今天我们又杀了无辜的中国人，我们推搡他们，殴打他们，把半死的中国人头朝下推进壕沟，在他们的头上放火，直至虐待致死。虽说大家是因为太无聊才这么做来解闷的，可这在国内绝对是重大事件。可现在就像杀个猫、宰个狗似的。

12月28日

曾经那么地欣喜，以为战场才是陶冶人格的最佳舞台，如今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只能徒劳无益地反省迄今为止的安逸生活，以期培养些许理性……

以上是一名京都府籍原士兵和一名宫崎县籍原士兵的日记。我想他们两位在写日记时，没有打算给别人看。正因为是私人笔记，所以不可能故意歪曲事实。而且，当天或者两三天后的纪录，应该是很准确的。因此，这两本日记在了解南京屠杀真相的问题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正当有人提出到底有没有“南京屠杀”，并企图歪曲事实时，这些日记的披露，对了解事实真相意义重大。这次公开的京都原士兵的12月13日到17日的日记，共8页，2000余字，完全是毫无粉饰的真实记录。无论多么有学问的人，要想从理论上推翻它们都是不可能的。同样，宫崎原士兵的情况也是一样。

既然有这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我们还不该虚心一点吗？在受害国中国，南京战役沿线的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地，各地政府都表示过：“只有正视中日两国间的历史事实，才能实现真正的友好。”

1983年，即去年12月13日，南京市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中国的提法）46周年，举行了纪念碑奠基仪式。纪念碑位于南京城水西门外的一个街角，面对一条大街。

这里有一条运河，河上的桥在日军进攻时，曾被国民党炸毁。四五十米宽的河面，在日军占领后，被受害者的尸体填满，卡车就碾压着尸体往返于河两岸。据说底下至今还是白骨累累。另外，附近还有一个被叫

做万人坑的地方,据说也堆满了牺牲者的残骸。

在纪念碑的竖立仪式上,南京市市长张耀华发表了如下演说:

“日本是我们的邻国,两国人民自古关系密切。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我们在这里建立死难同胞纪念碑,不仅对中国人民具有深刻意义,对于日本人民来说也是一个警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一方面祭奠 30 万死难同胞,同时要把这鲜血换来的历史教训留传给子孙后代。我相信,这也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大计。”

作为受害国中国,尚且如此大度,而加害国日本却死不松口,还有人上蹿下跳企图永远隐瞒事实真相。

这样下去,真正的日中友好不可能实现。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坦率地承认事实,以安慰死去的 30 万中国亡灵。

另外,我们还应该深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

“南京屠杀”争论之焦点

战争期间发生的事到了战后引起争议的很多,然而像“南京屠杀”这般始终能够让新闻界轰动的事件却不多。这实在很奇怪。

因此在这里我想整理一下争论的焦点。

首先是时间。众所周知,日军从开始向南京进军,到进攻南京城,直到占领南京期间,实施了那场世界战争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屠杀,事情发生在昭和 12 年 12 月。

但是,当时的大部分日本国民是不知情的。了解情况的那一部分人,却始终佯装不知。而在欧美,一批当时在南京的记者对此进行了报道。日本国内始终作为绝密情报处理。直到盟军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才将此事揭露出来,日本国民被蒙蔽了整整十年。

国民之所以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所作所为,是因为政府的保密

态度。

当时的日军称作皇军。所谓皇军,就是天皇亲自统帅的军队。为了美化皇军,那场战争被称为圣战,作战的军队被誉为“祛邪扶正”的正义皇军。

政府尽其手段来美化战争,欺骗国民。

首先是压制报道自由。为了报道战争,各报社都派遣了随军记者,然而是不许报道真实情况的。战场上监督新闻报道的是高级军人。

当时的管理条例如下:

“本次出征是为了即将到来的东洋和平的一场圣战。为实施圣战奔赴战场的皇军是以正义为宗旨的。参加报道的各位请牢记,任何报道决不允许有丝毫损害皇军威信之处。可以报道的如皇军的赫赫战果、皇军官兵的立功故事、占领地和平的恢复。一旦发现报道有损皇军体面,降低国民战斗意志等反战言论,将坚决采取相应措施。请与军方合作。”

所有稿件都根据这个原则被审阅,凡是对军方不利的报道一律没收。仅仅没收也就罢了,还要受到训斥和处罚。

因此,皇军在南京的大屠杀自然关乎皇军的体面。这种事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皇军将颜面扫地。因此,虽然有很多随军记者目睹了南京惨状,却没有一个人报道。即使有,也不会被发表。

当时报道南京攻击战的报纸和广播,异口同声地歌颂皇军的丰功伟绩、赫赫战果。

“正义皇军所向无敌。”

“无敌皇军势如破竹,边战边进,十三天进军三百公里。”

“占领蒋介石大本营南京。蒋介石嫡系部队全军覆没,纷纷投降。”

“皇军盛大入城仪式。东洋和平的春天即将到来。占领地居民赞扬皇军仁政。”

以上都是当时的新闻标题。

对于这些报道,虽说国民不见得全信,但是由于早已习惯了虚假报

道,也没有人想知道真相。没有人在乎我方究竟有多少伤亡,这场战争有多艰难。更何况是那些投降的俘虏了,有谁过问如何处置俘虏之类的事呢?

这时的国民,正沉醉于打胜仗的兴奋之中,白天举旗游行,晚上提灯笼游行,欢呼雀跃,一派节日气氛。当时这被称作士气高昂。

参加南京战役的官兵陆续回国之后,大家都缄口不谈在南京屠杀大量非战斗人员一事。一方面是回国时被告诫不要乱说;另一方面,大家认为这是一种耻辱。

而且,一不小心说漏嘴的话,宪兵、警察就会来找麻烦。每当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士兵回国,一些略知一二的国民前去打听究竟时,一般人都推脱说:“我所在的部队没干那些事。”

“南京屠杀”就是这样被封存了。直至昭和20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并且皇军解散的八年期间,大部分国民一直被蒙在鼓里。

当我听说盟国军队要进驻日本时,最先感到恐惧的是,现在形势逆转,进驻的中国军会进行报复。害怕这点的不仅是我,好像在中国肆意施过暴的人都和我一样害怕。

而完全蒙在鼓里的普通日本国民,一直到此事在联合国远东军事法庭被披露后才得知,因此有些人甚至误认为是捏造的,也是在所难免的。

战时的日本国民就是这样,任凭权势阶层按照自己的需要隐瞒很多大事。

现代人习惯了准确、迅速的新闻报道,可能难以相信居然有什么事能被隐瞒十年之久,为此,我想走点题,谈谈当时的国情。

当时的日本对中国大陆虎视眈眈,毫不掩饰侵略之意。

昭和6年9月,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炸毁了铁路,并以此挑起事端,进兵满洲(中国东北)。还宣称要“建立满蒙(满洲、蒙古)五大民族联盟的理想家园”,从而占领了满洲。尝到甜头之后,昭和12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我们)借口“膺惩暴支,促使国民政府反省”,开始起兵“侵略”中国大陆了。

据当时居住满洲的人说,那时,被称作满人的中国人都说:“日本已经得到了这么大的满洲,为什么还要进攻中国呢?日军再强,要占领中

国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动规模如此宏大的战争，号称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圣战”，将全体国民卷了进来。为了推行战争，个人权利被忽视。如前所述，新闻报道是受限制的。所谓国民的知情权是不存在的。一切以权势阶层的意志为转移。下面就介绍一个例子来看报纸、广播的报道是如何被形势所左右的。

攻陷南京后的第二天，即14日。我所在的分队正在城门外休整时，来了一个随军记者，他说：“请到城头上去一下。举起枪摆一个高呼万岁的姿势好吗？”我也没有什么反对的理由，就答应了他，于是记者拍下了照片。

过了两天，登了这张照片的报纸送来了，我一看，标题是：“第一批进城的勇士们”。之后，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看了这篇报道的人寄来的赞美信件。有一段时间我很不舒服。

当时还没有太在意，后来想起来，当时四周应该都是中国人的尸体。那才应该是新闻报道的最佳题材，但是没有有一个记者去拍照。

后来，日中战争发展为太平洋战争，败战气氛越来越浓。即使是那种情况，与我不利的消息对国民也是秘而不宣的。一旦有谁谈论这些事，宪兵、警察就会以“流言蜚语”、“动摇民心”的罪名将其取缔，有时还会判刑。

因此，国民是无法正确了解战场和战况究竟怎样之类的情报的。强行收集这些情报并进行评论的人们，被作为“反战分子”受到惩处。回想当年，日本人民就像生活在暗无天日的隧道中一样。

因此，败战时，很多国民都说：“不曾想我们已经输成这样了。”

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南京战犯时，当日本军屠杀大量非军事人员的事实被揭露出来之后，有人说：“不否认参加南京进攻的下级官兵中，有一些非分行为。究其原因，是这些紧急动员来的官兵素质不高。其中有个别人尤其恶劣，再受到战场心理的蛊惑，从而出现了这种现象。”

这些话，出自于指挥攻占南京战役的高级将领之间。他们的企图一目了然，就是要将自己的责任转嫁给下级官兵。

然而，对于对战争一无所知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觉得：既然是指挥

过攻占南京战役的人说的,听上去也很有道理。于是便说:“啊,原来如此啊。”从而信以为真了。

但是,那些在高级将领指挥下实施进攻的下级官兵们却被激怒了,他们疾呼:不许胡说八道,推脱责任!

我想说:进攻南京的军队怎么能说素质不高呢?他们是战时组建的部队中最优秀的。之所以将“南京屠杀”归咎于军队素质,是企图将自己的罪责推脱给最底层的下级官兵,这是最卑鄙的行径。

不过,这些在我来讲是不言而喻的事,但对于不知军队组织结构为何物的现代人来说,恐怕不能理解。因此,我想解释一下当时的兵役制度。

当时,日本还是以战争为外交手段,推崇武力的时代,也就是从明治元年建军起,到战败军队解散为止这段时间,凡具备日本国籍的男子,年满20岁者,都有义务接受征兵审查,并按照不同等级服兵役。

所谓等级,是指根据征兵审查的身体检查、学历检查的结果,分出甲种合格,第一、第二乙种合格,丙种合格,丁种(之后为不合格),戊种(次年重审)等级别。

甲种合格,是指那些身体和学历都优秀的人。这种人将在军营内接受两年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的教育。此阶段是为现役军人阶段。现役结束退伍回乡后,在五年零四个月期间,还是预备役。现役、预备役合称常备军役,一旦发生战事,都要立刻奔赴战场。

常备军役结束后,是十年的后备军役。这样,将现役、预备役、后备役加起来,每个人将与军队有十七年零四个月的关联。也就是说,甲种兵役,应该是一旦发生战争时的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

所谓第一、第二乙种合格,其标准与甲种相同。不过,他们只接受120天的集中军事教育,平时留在地方上作为补充兵役。这类第一、第二乙种合格兵役,原是作为战争时期必然发生的因出现伤亡而造成减员时的后备兵役。

丙种,是指那些身高150公分以上,不足155公分的人,或有轻度残疾的人。他们被归类为第二民兵,一生与军队无缘。

然而,从日中战争后期开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军队一直缺员,

于是补充兵役也好,民兵也好,都被大量征召入伍,成为军队主力。

以上是兵役情况的大致介绍。通过介绍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军队从前是每年招收一定量的现役兵员入伍,并施以规定的军事训练,三年之后源源不断地输送给地方。一旦发生战争,即刻转化为主要战斗力。

在组建战斗部队时,根据部队用途,如何配置受过军训的兵员和未受过教育的兵员,其比例就是决定部队素质优劣的关键了。

这里我们将话题回到参加南京进击战的部队的素质问题上。根据以上的兵役种类可以发现,当时的攻城部队中,大部分是由现役和预备役兵员组成的。加上一部分后备役,全部由受过军训的兵员组成。

当然,不能说受过军训的人就是优秀的,没有受过军训的就是低劣的。但是从军人素质上来看,受过军训的兵员是被作为优秀兵员对待的。从这点上看,当时的南京攻城部队,决不比当时其他地区的军队差。

因此,所谓“紧急动员来的军队,官兵素质不高”的话,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在战时曾经听当时分管征兵的军官说过,征兵计划是根据战前编写好的战时名单制定的,绝不是什么临渴掘井式的草率行动。

就算是兵员素质低下,那也是他们上面的高级将官的责任。这里我想举两三个例子。

某总部高级参谋,命令下属官兵到处搜寻食品。吃饱喝足美食后,还命令下属找女人,顺眼的留给自己发泄性欲,剩下的赏给部下。还有某部联队长把中国美女当成战地老婆,让她随军行动。更有甚者,有些部队长官在占领南京期间,将中国的贵重财宝占为己有。

这类例子多得举不胜举。身居高位的人,本应成为大家的楷模,他们尚且如此,部下怎能不效仿呢?

一方面是战场指挥官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的战争目的也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日本借口支那事变而起兵大举进攻中国大陆的目的,写在昭和12年8月15日的政府声明里。声明这样写道:“膺惩支那军,促使南京政府反省。”

“膺惩”就是惩罚,是携带武器的军队去实行惩罚,当然不可能是和

风细雨的行为。

可以说,正是持有这种想法的战场高级军官以及国家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了部分官兵,从而使得战场上的下级官兵变得凶残起来。

而且,进攻南京是占领当时中国首都的战斗,说白了,就是打进蒋介石的大本营。正是这一点,让那些直接参战的官兵们头脑发热。

这里我要说,战斗中的官兵,当他们沉浸于战场的狂热中时,往往会失去正常思维。这一点虽然不能加以证明,但是战斗进程的白热化,往往会淡化官兵们身为人类的意识。这种时候如果碰巧取胜了的话,他们就会失去人类原有的意识,有时会做出平时无法想像的惨无人道的事来。

不单是日本军队,外国军队也是如此。德国军队就曾经对犹太人进行过大肆屠杀。近来还有美国在越南犯下的ソンミ村事件,以及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难民营所制造的屠杀事件。

犯下这样罪行的官兵们,假如他们身处普通社会环境下,一定也是一些善良的市民。这些善良的市民,一旦当了兵走上战场,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肆无忌惮地杀人放火、掠夺、强奸,变得无法无天。同一个人,在普通社会和在战场就会变得如此不同。

我认为,“南京屠杀”时的情况应该也是如此。虽说把人类的犯罪行为归咎于头脑发热似乎是逃避罪责的行为,但是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

进攻南京前夕的官兵们,早已失去了他们的教养和理性。哪怕是最高学府毕业的精英,这时已然与打短工的没什么区别了。他们惟一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这惟一的目的是越接近南京,越发白热化起来,群体心理受变态了的战场特有心理支配,终于犯下了大屠杀这滔天罪行。以上是另一种观点。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以上是我对那种“参加攻占南京战役的下级官兵,是紧急动员来的军队,因此官兵素质不高”的谬论做出的回答。

关于“南京屠杀”,我曾经征求过各地各方人士的意见,似乎最大的争论焦点就是无辜死亡人数问题。

主张没发生过大屠杀的人,特别强调这个问题。

他们说：“传说中的大屠杀是不符合常识的。当时南京居民只有10万人左右。没有30万人可供杀戮。另外，进攻南京的日本军队有六个师团。就算一个师团有4万人，一共只有24万人。假设其中半数人进行了大屠杀，10万官兵杀掉30万人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能的。”

还有人说：“那些主张发生过南京大屠杀的人，是轻信了中国方面的说法。不去想一想南京当时究竟有多少居民，又有多少守军。”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却没有解释，他们为什么说南京当时只有10万人的理由。

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勉强反驳。因为我想，要想计算南京沦陷前后这一段时间里，到底有多少遗留居民和多少留守军队是不可能的。

在南京周边，集结了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等大部队，无论中国军队也好，日本军队也好，都是一片混乱。在这种状态下，底下的部队以排连营为单位，分头行动，实行杀戮。谁能知道确切的数字呢？

底下的部队，没有谁报告过他们杀了几千几万的俘虏和民众。就连那些每天必须填写的各排战地日志或是其他各类报告中也没有任何记载。将军也好，参谋也好，没有谁去统计管理这件事。

因此，47年的岁月，使得这件事变得无从查询了。日本方面提出的数字只能是估测的数字。

但是，当时遗留在南京的居民很可能比日本方面估计的要多。在上海到南京之间，有好几座城市，那里还有众多的市民。此外，还散落着无数的村庄，还有很多村民。不管怎么说，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南京是首都所在地。而且，长江沿岸自古以来就是繁华之地。因此，那一带应该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地区。

再加上为了防备日军进攻，守卫南京的军队增加了不知多少倍。总之，当时上海—南京间的防线，以及南京城外的中国军队（包括正规军和民兵）的数字多得难以估算。

所以，作为受害国的中国，根据前述状况，推测出30万这个数字。

中国方面认为这个数字有充分的资料证据。它们被收集在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中国历史档案馆（资料馆）共同编撰的《史料选辑——侵华日军大屠杀史料辑》里。（以

下摘自报纸等的报道。)

1982年夏天,正值中国方面大力批判日本教科书修订问题之际,中国方面汇总了收集到的文献、幸存者证言笔录、当时负责处理尸体的伊斯兰教徒的证词,以及日军BC级战犯的中国军事法庭审判纪录等,由官方机构编辑成册。

其中,关于牺牲者的数字相当具体。例如:“从1937年12月13日被占领之后,在六个星期里,遭到集体屠杀并被焚烧以至面目全非的尸体有19万具以上。遭到零星杀害,被慈善机构埋葬的尸体有15万具以上,总共30余万人。”

其根据有:中国军事法庭的调查,目击者的证词,28起集体屠杀中有11起有详细情况记录。858起个别遇害事件中有1200位以上的证人作证,有市民的诉状。

其他,关于“强奸妇女”、“烧杀抢掠”等,也以证词、资料为依据,加以详细记载,在“铁证如山,不容抵赖”一项中,还介绍了事件当时滞留南京的欧美人的证词。

此外,迄今为止公认的关于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南京崇善堂所进行的埋葬工作,又进一步明确了他们的组织是为了以回教仪式来埋葬回教徒而成立的。

我感觉,根据上述中国方面收集的资料,的确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了。

自从我出版了《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一书以来,经常受到各方人士询问:“怎么判断30万人的问题啊?”

但是,虽说我参加了南京攻城战,然而不过是一个小兵,就是当时的马前卒而已。因此我不可能全面了解局势。因此,我总是这样回答:

“怎么判断不是答案。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日本是加害国。一个加害者应当注意不要伤害被害国的感情。20万也好,30万也好,我们不应拘泥于数字。就算只有10万人,那也是大屠杀。说出这种话的人是毫不顾忌中国人感情的麻木的人。从他们身上我又看到了战争时期那种日本人趾高气扬的神情。战后的日本人难道不应该稍微谦虚一点吗?”

当围绕“南京屠杀”的争论愈演愈烈之际,一部分人中又出现一种说法:“把俘虏押往收容地点的路上,发生了暴动,为了自卫杀了他们。”以

此主张屠杀是自卫行为。

我也不想多说,这里引用一段南京攻城战时隶属第十三师团第六十五联队田山大队的栗原利一氏(现住小平市)的证言就能说明问题。(引自8月7日《每日新闻》)

栗原当时是班长,他曾经参加过上海、南京、徐州战役,在进攻汉口时受伤,遣送回国。

进攻南京时,栗原所属的部队,于12月13日占领了紫金山东北部的乌龙山炮台,14日又占领了北部城外的幕府山炮台。

此时,135人的第一大队,解除了13000余投降士兵的武装,使其成了俘虏。当时的报纸报道说:进攻南京,战果辉煌,共俘虏14777人。

这些俘虏命运如何却没有提及。根据栗原的证词,他们都被杀了。当时情况如下。

“我们告诉他们,将把他们临时关在江心岛上。但当用船将他们运到江心后,就跟他们拉开距离,然后一起开火进行了处理。当晚我们一船一船地一直杀到天明,然后浇上汽油烧,再用柳树枝干代替钩子,一个一个地拖到长江急流中让水冲走。我部所杀人数为13500人。如今想起来都不敢相信。”

“杀戮俘虏是从12月17日到18日的夜里进行的。中午开始把俘虏两手反绑在背后,再一个接一个地连在一起,然后带到离收容所大约四公里路的长江边上。因为有一万多人,所以等到把他们全部押送到江边时,天已经黑了。远远可以看见江中心有一个岛,上司说:‘把他们收容到那座岛上去。’

“然而,这时突然听到‘射击!’的命令,我们一齐开火,射击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之久。眼前只见俘虏们徒劳地东逃西蹿,为了逃避水平射击,他们拼命地往死人堆上方爬,结果一下就堆起一个三四米高的人墙。”

关于那次屠杀俘虏事件,在栗原氏所属部队发行的《本地部队从战史》中,有如下记载:

军部下达了“处死”的命令,但是山田梅二旅团长却决定将俘虏

释放到对岸去。然而,就在把俘虏分乘在十几艘船上向对岸驶去时,对岸向俘虏开了火。于是,留在岸上的俘虏开始骚乱,袭击看守他们的日本兵,于是我们开火,打死了一千来人。

对于这种“自卫开枪论”,栗原是这样说的:

“那些俘虏,双手被绑在背后,根本无法自由活动,怎么可能进行集体暴动呢?屠杀是事实,应该说清楚。”

关于杀害俘虏事件,究竟是“自卫”,还是“屠杀”?我已解释清楚了。

与此相关,还有人说:“我们一味争论究竟有没有南京大屠杀是没有意义的,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事件的关键在于,是军部有组织地干的呢?还是下面官兵肆无忌惮的个人行为呢?这个问题为什么视而不见,不加争论呢?”

虽然说得很对,但是这一点简直不用争议。日本军队是绝对的命令第一主义。这般大规模的屠杀,不可能是下层人的个人行为。从军队构成上看,可以说这绝对是一次有组织的行为。京都籍的原士兵在日记里这样描述现场实况:因为“我们一个小队无论如何杀不完,只好从第×机枪部队借来一挺机枪,然后调来中队的六挺轻机枪和所有持步枪的步兵”后进行的。显然是有组织的行为。另外,这一点栗原的记述也是很明显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证言。就是原上等兵,曾经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儿玉房弘氏(现住神戸市)8月15日给《每日新闻》的证言。

证言中说道,儿玉氏参加南京战役,并进行集体枪杀,是16日左右。当时,部队准备离开南京郊外的驻地,向西南60公里处的芜湖转移。

有命令叫他们在长江边的一座小山上安放机枪,他们不知要做什么,就在山顶上安放好重机枪。刚安好,就看到山下的洼地里,日本兵押解来无数中国兵的俘虏。就在这时,突然下达了“射击”的命令,于是机枪一阵狂射。

证词说:“简直就是地狱。血柱喷射的情景历历在目。”

据说,当时一共有30挺机枪,每隔50米就有一挺。他还说:“为什么要杀俘虏?尸体如何处理的?其他还有哪些部队参加?无人解答士

兵的这些疑问。”

这是一份证明屠杀是有组织进行的有力证言。

下面的这个就不知真假了。我当时的中级军官曾经对我们说：“要想让蒋介石认输，仅仅占领南京是不够的。我们要让中国人陷入恐怖之中，挫败他们的抗战意志。所以才必须杀这么多的。”

不论怎么说，有组织进行大屠杀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各地参加过南京战役、与大屠杀有关的大量生存者，以及现存的大量战死者的笔记等一再证实屠杀是活生生的事实，然而却总有那么一些人不断叫嚣说是虚构，是夸大宣传，试图歪曲事实。

在我们看来：“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有些人究竟为什么那样说呢？”这实在太奇怪了。

在小岛晋治的著作《从亚洲视角看日本》（亚记书房出版）中，“关于南京屠杀事件”一节里有如下论述：

关于南京屠杀事件，在上次的部分修订时，虽说只提出了词语问题，但当时就有人露骨地抱怨说：“这种日本耻辱的老账没必要翻出来讲吧。”

小岛晋治先生是东京大学基础课系的教授，是高中历史教材的编写者。抱怨他的人想必是文部省了。

另外，还有一位教科书编者家永三郎氏，在教科书的第三次诉讼时提到的关于1980年度的教科书修改特点的处理（引自《“密室”审定的记录》）中，有一节叫做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吗？其中写道：

原稿记述为——占领南京之际，日军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被称为南京大屠杀。

文部省意见——“之际”的提法不妥。容易让人误以为这是军队有组织的行为。

从这里可以看出，文部省的态度是“家丑不可外扬”。其中可以感到国家方针是企图掩盖战争阴暗面。

昭和57年，教科书中关于到底用“侵略”还是用“进攻”的提法问题，发展成了外交问题。当时，曾经有人就这个问题向当时内阁成员做过口头问卷调查。翻开8月7日的静冈新闻，其中有一篇文章，在“无一人承认‘侵略’”的大标题下，登载了对全体内阁成员所做的关于教科书的问

卷调查。其他小标题分别为：难以掩饰的困惑；名嘴的沉默；议会终于开始讨论答案正确与否。

我作为个人，是没有资格批判当时的内阁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所以我也不想一一点名。报道中说，大部分内阁成员都以无可奉告为借口，回避直接答复，或以缄口表示否认。其中有几条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意见，列举如下：

“对历史的评价，因为有主观意识不同的因素，所以没有 100 年时间是搞不清楚的。在现阶段，不是二选一能解决问题。”

“顶多说是‘进攻’吧。各国教科书一般都把本国‘侵略行为’表述为‘打进’之类的。”

“我觉得可以既不用‘侵略’，也不用‘打进’。用‘侵入’较妥。也许有些部分可以称为侵入，这很微妙……不过如果说‘侵略’的话，让子孙万代听起来很难听。一般来说，战争初期是‘打进’，形成战争后叫‘侵入’，打赢了就叫‘侵略’了。”

文章最后这样写道：“在微妙时期，提出这样一针见血的问题，难怪有些人十分为难，甚至给同僚打电话互相确认各自的意向……最后，终于发展到在 6 月 8 日的议会上，针对大家的回答正确与否进行了讨论。据此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对全体内阁的冲击有多大了。”

我觉得这篇文章让我看清了政府对过去战争的态度。

这是一种暧昧的态度，不过也有不暧昧的态度。以下是我听来的，不一定完全准确。说是在石川县加贺市，有一位真宗大谷派常愿寺的主持叫伊势谷功的，长年致力于和平运动，他有个团体为了让大家亲眼目睹战争的恐怖，就放映了电影《侵略》。

《侵略》这部电影由第一部《侵略》、第二部《南京大屠杀》、第三部《三光政策》、第四部《人体试验》组成。

这部电影长达一小时十分钟，既有杀害毫无抵抗能力的妇女儿童的镜头，也有砍下俘虏头颅的镜头，还有强奸妇女后拍摄纪念照的镜头等等，无论哪一个镜头都能让人不愿再做日本人。就是中国人骂的那种“鬼子”。

就在放映之前，团体里的三个青年人受到当地警察的盘查。

所提的问题计有：“你们有多少成员？”“你们有哪些活动？”“你们有哪些学习会？”“你们参加过学生运动吗？”“关于小松基地怎么想？”“你们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为什么让别人看那种电影？”“为什么召集这么多人来？”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了。

有识人士指出：“这明显是在做思想调查，让人想起过去的特高警察。他们的这番举动，确实让我们受到了打击。通过放映这部电影，不得不令我们忧虑：当前我国正在出现一种让人担心的、不能忽视的倾向。”

警察可能有他们的难言之隐，但是他们的举动实在令人吃惊。

对以上事实进行批判和抨击，并非我的目的，因此我要回避对此做出评论。我只想说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现象”之类的含糊提法，以及高压式态度等才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隐藏战时的丑事，甚至加以美化才是无法容忍的。

我们日本人，一提到战争，就去说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说我们是世界上惟一的受害国，受害者意识极强，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还是加害者。

毋庸置疑，广岛、长崎受害极大。然而，中国人的受害程度并不亚于我们。当南京发生大屠杀时，南京周围的居民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们整整六个星期都生活在死亡的恐惧之中。我并非小看原子弹，但是与一瞬间的灰散烟消相比，精神上的恐怖是否更残酷些呢？

而且在“南京屠杀”之后的八年当中，日军仍然占领着中国人的部分领土，实施所谓的“三光政策”，肆无忌惮地烧杀掳掠。

我认为，为了诚恳地反省这一历史事实，我们甚至应该指定一个“战争反省日”，诚心诚意地向各个受害国表达我们的歉意。这才是现代日本人应有的态度。

“南京屠杀”是这么一回事

日本在过去侵略战争中制造的事件里，至今还有很多遗留问题。其中让现在国民最为关心的，好像就是南京屠杀。

每当我说起自己参加过攻占南京的战役,与南京屠杀有过关联等事情时,性急的人就会问我:“那是哪年哪月哪天发生的事?发生在南京的什么地方?杀了多少人?”他们想得到明确的答复。

然而每次我都会先跟他们打招呼说:“这可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那是相当规模的大屠杀。

笼统地说,南京屠杀是指日本军队从上海附近出发,包括进军南京途中直至发起进攻南京的全过程,以及在占领南京前后扫荡残敌期间所发生的全部事件。

对照日程表看的话,从上海附近出发是在12月1日,攻进南京城是12月13日,14日完全占领南京,12月17日将南京城内外的残敌大致扫荡完毕后举行了入城仪式。在此期间,每天都有集体或个别的屠杀发生。战争期间,双方士兵间的互伤是必然的。但屠杀是指以投降士兵和普通老百姓为对象的杀戮。

这是我的看法,除那段时期以外,上海战役结束后,在南翔—嘉定—太仓一带集结期间,自11月15日开始,至向南京发起进攻为止的这段时间也应当考虑在内。

在这段时间内,当然没有发生屠杀。但我认为从发起进攻到占领时发生的屠杀之根源,是起源于这段时间的。

本来在大战告一段落后,应该能稳定地过上几个月的营地生活,进行休整,然而这段生活只维持了半个月。

我所属的部队,于11月下旬在太仓集结后,过了一周左右,收到了向南京进军的内部指示,已决定攻打南京了。于是,那期间每天进行弹药粮草准备和检查装备工作。

从那时起,士兵们开始变得有些烦躁起来,其理由虽然难以说清,但我觉得,其中有很多因素。

上海激战结束后,大家本以为可以好好歇一下的,没想到又接着准备一场难以想像的大规模战役,这对士兵打击很大。另外,原本指望早日结束这次事变的,但一下子失去了可能性,士兵们变得绝望了。

还有,因为南京是中国首都,注定将有一场激战,大家想这次恐怕是活不了了。因此,情绪变得自暴自弃。而且关于这场战争,一直没有什

么可以信服的明文指示。这些因素互相掺和在一起,使得士兵暴躁不安。就从那时开始,在士兵之间出现以“征收”为名进行掠夺的行为了,还有人开始对当地女子进行强奸。

在此之前,并不是没有发生过掠夺和强奸,但真的是极少数。驻军期间一旦有了空余时间,士兵们为了打发无聊的空闲,就会到处走走,进入村子里看到猪啊、鸡啊什么的就抢来吃掉。尝到甜头后,就开始以此为目的地出去走,最后发展到看见年轻女性就施以奸淫。

随着南京战役的开始,这类事件急速增加。当然,当地老百姓决不允许发生这种行为。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些谷物、家畜是为了度过漫漫寒冬所准备的关系性命的重要口粮。如果这些口粮被抢了,那是直接关系到死活的,当然就要抵抗。你抵抗,我就只好抢夺。对女性也是这样,她们自然更不能让敌人对自己侵犯,于是只好强奸。

本来将士们随着休整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心态,但毕竟都是经过三个多月的上海殊死战好不容易活下来的人。于是,敌对情绪、失去战友的愤怒情绪再次被点燃,以至于完全失去了罪恶感。我认为“南京屠杀”就是从这时开始萌芽的。

接下去是进军南京途中。进攻南京的军团是一个以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为主的大军团。上海派遣军从上海附近向南京进发,第十军则从嘉兴附近出发,沿太湖以南向南京发起攻击。这两大军团像两股台风,席卷西行,在句容—溧水一带会合后,直抵南京。

从出发到直接进攻,其间发生的事件我认为可以称作是第一次“南京屠杀”。其中以掠夺为主,其次是强奸、纵火、杀戮。

向南京进军的过程中,日本军队必须以征粮来养活自己。这个情况我在以前的《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一书中已经写过了,但这里可能有新的读者,那么我再说一遍。

参加南京战役的全都是历经沙场的部队。行动一开始各部队就憋足了劲,互相竞争起来。“千万别落在其他部队后面!我们部队一定要争取到攻进南京城的头功!”所以进军如洪水猛兽,势如破竹。

然而,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战略性错误。作为中国方面来说,要保卫首都,当然处处设防。日本方面却没有预料到这些。

其中之一就是,中国方面每退一步,都要深挖道路,破坏桥梁,埋设地雷。这阻挡住了日军的迅猛追击。而且,那些装载大量弹药、粮草的车辆部队也无法行动。结果导致粮草无法跟上战斗部队,联络道路中断。

这样一来补给就变得困难了。部队尽可能保障了战斗所必需的弹药补给,而粮食之类就退居其次了。然而人的生存是离不开粮食的。自古以来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空着肚子是无法行动的。因此,部队上层就下达了“粮秣应从当地征收以自给”的命令。

这条命令不知是最高司令部下达的,还是下面机构下达的,但是确实下达了这条征粮命令。实际上所谓征粮就是抢粮。说是有偿征收,实际不过是个名目罢了。

从军队组织制度上看,有偿征收也是不可能的。军队里把握财权的是经理部,战斗部队和钱款没关系。即使有钱,居民们也不可能把关乎性命的口粮卖给你吧。

于是只能强抢了。打了胜仗的日本军队把敌人的东西当作战利品据为己有,完全没有犯罪意识。下级将士把这称为“蒋介石俸禄”,公然开始抢掠。

然而,几万、几十万将士的粮食需要量是很大的。日本军途经的村落,可以吃的东西全被抢光,一个不剩。当地居民瘦得皮包骨头,怨声载道,造成了之后的问题。

如果就这样放任不管,居民们的怨气,将会给占领南京后的治安带来不良影响。现在有一个更要紧的重大的问题,是国际大问题。

因为国际都市上海近在咫尺,因此在上海—南京间发生的事很快在驻上海各国机构内传开了。了解实情的几个主要国家向战斗现场派出了调查团,要查明事实真相。当地受害的居民看见有人撑腰,就告发日军,日军上层不能再放任不管了。

真相一旦大白,本来就对日本举动感到不愉快的各国,会利用这个机会借国际舆论抨击日本。这件事如果被日本国内民众知道了,也会成为批判战争的借口。

因此军队很快发出了禁止征粮的警告,实际上就是禁止命令。

然而这只是部队上层自说自的、不合情理的命令。如果说禁令是在解决了粮秣运输问题后下达的那还情有可原,可在缺粮问题没有任何改善的情况下从何禁起呢?这对于奔赴前线的士兵们来说就是生死问题了。摆在士兵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暂时停止前进等候粮草车辆部队到来,要么忍饥挨饿地继续前进。

然而,日本军队的传统是只能进不能退的,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停止前进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

结果只能继续前进。但是手中捏着全队士兵性命的前线下级指挥官却说:“没有粮食供给又不让去抢,那让前线战士们吃什么来打仗呢?为了战争胜利我们不得不抢。”于是就继续抢夺粮食。

这么一来,就上升为抗拒上级命令、无视军队威严的问题了。这不能默许。于是上级派了若干参谋,以指导作战的名义深入前线,指挥宪兵队,追查现行犯。

于是不断有人被揭发出来。不只是现行犯,也有片面根据被害者的诉讼,指认揭发出来的。

抢夺粮食当然是不对的,但当时士兵们并不是为了私利、私欲,而是为了执行战斗任务才做的。然而被检举出来的人被直接送到军法会议,接受免官降职、收监下狱等处分。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名声不好的罪犯,上海战役以来建立的功勋就被一笔勾销了。

前线部队的联队长们极其看重部队的荣誉,担心这样的罪犯出自自己的部队,于是下达指示:“要想没麻烦,就要不留尾巴!”

所谓“不留尾巴”其实就是“不留证据,全部杀光!”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

这么一来,将士们越发无法无天了。不仅抢夺物资,还疯狂强奸妇女,然后杀掉,再放火烧光村落。

这仅仅是“南京屠杀”的开端。

分析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事,可以看出事端发生应归咎于日本军队的体制。我认为部队上层唯我独尊的态度是悲剧产生的根源。

接着就是占领南京时的“屠杀”了。

关于这件事,因为我并没有攻进南京城里去,所以无法明确说明事

件的全过程。然而,抢先攻进南京的部队所制造的惨状,我是亲眼目睹的。

我们进入南京城外的街道时,已经是14日了,是占领南京第二天早上的事了。走在大街上,可以看到路旁、广场上到处尸骨累累、横尸遍野。如果都是中国士兵尸体的话,那是战斗的必然结果,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可是尸体中老百姓占了很大一部分。最多的是老人、女人、小孩等行动迟缓的人。其中还有抱着婴儿的母亲,还有不满10岁的儿童。看来那些行动敏捷的军人早就逃走了,只剩下这些行动迟缓的老百姓成了牺牲品。

走到城门前,昨天先攻进来的部队还驻扎在那里。那些士兵们用还没从前夜的亢奋中恢复过来的口气说:“昨天我们到这里来时,那些老百姓也不知道往哪逃,到处乱窜,我们用刺刀一个一个地戳死了他们,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这就叫乘胜追击,我们把这些中国人全杀光了,一个不剩!”

这样干的恐怕不只是这支部队,进攻部队都干了。在他们的屠刀下,各处死伤的中国人数字,可以认为比我们想像的要多。

除此以外,占领南京两三天后,我遇到了真正的大屠杀。是在扬子江边,用机关枪集体屠杀大量的中国人。

这次事件的真实性,曾在战后的某本书中受到质疑。作者认为:南京沦陷后大量中国将士都投降了,之后却没了音信,因此推测这些人全被屠杀了。

可是他错了。被杀掉的不仅仅是俘虏,老百姓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

虽然这么说,毕竟我没有直接参加枪杀。我们去扬子江边的下关领口粮,在回来的路上听说正在集体枪杀俘虏,就跑去看,结果已经结束了。

我因为不熟悉路,又只去过那儿一次,所以不能完全确定屠杀现场的地点。但我记得大概方位是从下关沿着扬子江边往下游方向过去一点的一个空地。

空地地势有些高,扬子江混浊的江水就从旁边流过。就在那块空地

上,每一百人左右为一组被拖出来,然后用机关枪扫射。

我并没有目击射杀场面。然而,我看到了被成千上万人的鲜血染红的大地,看到了漂浮的尸体横陈江中,多得似乎使扬子江的江面都变窄了,因此不难想像事件当时的情形。

听一开始就在现场看的人说,当被带到空地的中国人背对着扬子江站好后,机枪就从前面扫射过来,三分钟不到,一百多人就倒下了。

当所有人都倒下后,再驱赶下一批被杀者过来,让他们先把尸体拖着扔进扬子江后,再把他们杀死。就这样不断反复进行,半天时间杀了恐怕有上万人。

三年后的昭和15年10月,我回国内时,是从下关码头上船沿扬子江顺流而下的。在船上,我想起了那次屠杀,就站在甲板上眺望。只见秋天的野草长得十分茂盛,已经无法辨认哪里是当时的现场了。我想到这些草都是因有了中国人的血为肥料才长得如此茂盛的,心里不由得冒出一股厌恶感。

以上是占领南京时的屠杀。进行这样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却没有理由。我觉得是对蒋介石的老巢——南京进攻时,抢攻部队太急功近利的心情造成的。而且我感觉下级将士们把平日里积累的不满,全部在占领南京的那一刻发泄出来,并发泄到了手无寸铁的弱者身上了。

接下来看看扫荡残敌时期。

在进攻部队全面占领南京城的同时,城外的各部队也开始扫荡残敌了。扫荡时,看到可疑村落就片面地认定有残兵潜伏,于是对此袭击后便放火烧,并杀光村民。

此类事件不仅仅发生在南京,其实每发动一场战役,在扩大领地时,随着占领,便必然地扫荡残敌,烧掉周围村落,杀戮居民。在南京之所以会作为“大屠杀”为世人关注,是因为规模太大的缘故。

我虽然没有亲手屠杀俘虏和居民,但我置身于大屠杀之中。从日本军开始占领南京城到我们离开的20天中间,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中国人的尸体。成百上千的下层部队如同竞赛般地杀人,被杀害的人数可能超出我们的想像。

进行屠杀的人,在普通社会里是被称作良民的人。可他们因为当了

兵来到了战场,就会犯下如此可怕的杀人罪行。

对于被害者的中国人,这些事当然是刻骨铭心,永远难忘的。而对于犯下罪行的日本军将士来说,也是一生都无法治愈的心灵创伤。虽然无法和中国人的悲痛相提并论,但其实双方都是不幸的。

我亲眼目睹的一例“南京屠杀”

如果有人问我:南京攻城部队在冲进城内时,在城内进行了“大屠杀”吗?是事实吗?我只能回答说:因为我那时还没有进入城内,所以不了解事实。

我所知道的是,我听说过在占领南京城后,在中山北路以西、挹江门至汉西门一带区域里的难民区内,发生过屠杀。

据说攻破南京城是在12月13日傍晚。我们过了句容后,离开大队采取了单独行动,并以南京光华门为目标,第二天也就是14日早晨到达了那里。

之前我说过“南京屠杀”是在较大区域里发生的,那时没有城内、城外之区别。

在我们到达的14日早晨,周围并没有正在进行的战斗。城门内外驻扎着很多士兵,他们都是前一天先占领这里的部队的。士兵们以一种还没从亢奋中清醒过来的表情,对我们讲述昨夜进城时的状况,语气很是得意。

然而我们没时间理他们。我们得快点找到大队会合才行。在占领后的大混乱中,寻找一个部队的行踪,比在失火现场找人还困难。

要知道,当时在南京的军团有:上海派遣军(第三、第九、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其他),有四个师团之多;另一方面,从嘉兴附近开来的第十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也是由三个师团组成的。这么多的兵力进入了南京,所以不管走到哪儿满眼都是士兵。

当我们在城门口像迷路一样到处乱转时,发现了各队为后续部队留下的标志。城墙上、房屋墙上、门板上,到处都是。当我们看到了其中有ミヤ、タケ的标记时,顿时放心了。ミヤ,タケ分别是宫田部队、大岳

队的略称。在标记下方还画有指向右方的箭头。这样就能明白大队的前进方向了。

我们沿着箭头所指的方向前进。十字路口、街角处都留下了夕ヶ队指示方向的箭头,我们就靠着这些符号前行。

第一次来到这片土地,对地形也不熟悉,加上街道都成了废墟,现在已经根本记不得我走过哪些地方了。忘不掉的只是烧塌的房屋、小山般堆满瓦砾的马路和遍地的中国人尸体。

右前方可以看见紫金山天文台,顺着城墙往左走,一片很大的湖水呈现在我们眼前。后来凭借记忆对照着地图,发现这片湖水就是玄武湖。左前方为湖面,再向前走,在北边看到的那座山,大概就是幕府山了。

走到湖水前时,城墙已经离得很远了,街道也看不见了。大概因为这里是部队向南京进攻的必经之路,所以沿途村落都满目疮痍,好像才刮过一场飓风似的。

我们的前进方向和攻打南京部队的前进方向相反。旱田附近有个中等大小的村子。一走近那附近就闻到一股异味。我们的鼻子已经习惯了战争的气味,所以一闻就知道那臭气是从尸体身上发出来的。

到了村口一看,果然不出所料,从村里延伸出来的道路上躺满了村民模样的尸体。一看就知道是被集体枪杀的,数量颇多,不下百人,前后左右倒向各个方向。

看着那些尸体,我突然觉得很奇怪。死的人几乎都是男的。虽然也有女的,但都是老太婆。

全是男的和老太婆,让人觉得有些不自然了。我想:“不会是那事吧……”就往村子里面走了一走,又看见了五六十具尸体。仔细一看,这次全是女人和孩子。然而令人奇怪的是,看上去50岁以上的人占了大多数,没有年轻人。

我觉得更奇怪了。我猜想年轻女人在别的地方,虽说这是无聊的,也不关我的事,但是总想知道究竟,于是进了村子深处的房屋。

看了两三户之后,看到了一个被破坏得很严重的屋子。和我猜想的一样,这里躺着二三十个年轻女人,这些女人也是被枪杀的,头部、胸部

等要害部位流着血，都已经死了。很明显，这些女人在被杀死之前是受到过多数男人强奸的。

从现场状况判断，这是昨天路过这里的部队犯下的罪行。很可能是他们袭击了来不及逃难的居民，把女人挑出来，先把男人和老年妇女杀了，这是被杀的第一批。

然后，从女人中间挑出更年轻漂亮的，杀掉被淘汰下来的。孩子们看来是年轻女人带过来的，这是第二批。

第三批就是被挑选出来的年轻女性。这样一来就把村子里所有的居民都杀了。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杀法，想必他们是以年轻女性为目的的。

这种场景连我这个久经沙场的人看了都觉得残忍。为战争失去了理性的军队陶醉在胜利之中，就能做出如此令人类不齿的事来。制造这个事件的那支部队也是在南京战役的大潮中失去理智的部队。

离开这个死寂的村子，再走大约四公里，又看到了一个小村子。村子里，不知道哪个部队的人正在跑来跑去地忙碌着。

看那些士兵的行动就觉得有些异常。我想是不是这儿也发生了什么事？就问了其中一个人。他说：“本以为这儿的人都逃难去了，没人了，没想到藏了好多姑娘哎。”

看上去破破烂烂空无一人的屋子里，经常会藏有避难的女性。想来是士兵们发现了她们，所以忙着到处寻找，看还有没有遗漏的。

我们也是攻击南京部队中的一员，也有过强奸当地女性的经历。虽然很想和他们一起找女人，今天却不行。因为天黑之前找不到大队所在地，天一黑就无法行动了。“看来今天没办法耽搁了。”大家统一思想之后就穿过这个村落前进，村外是一望无际的水田。

这里也有士兵正在追女人。士兵们从水田的四面八方追过来，她们没了逃路，只好跳进泥田中央。这是女人们保护自己的方法。因为士兵们不愿下到水田里，穿着军靴进入水田的话，之后皮革会变硬，行军时磨脚。而且绑腿、裤子，连内裤都会沾满泥巴。但是假如脱了靴子再下去的话，女人们早就逃光了，真所谓会顾此失彼。

即使好不容易进入水田，快要抓到女人时，女人们也会故意跌倒在

泥中,把身体上涂满泥。从头到脚都抹上泥,脸上也全是泥,让人无法靠近她们。而且女人们在危急时刻会用泥巴把士兵们有可能进攻的地方堵起来,这么一来士兵们就没办法了。

此时,被追赶的三个女人像蚱蜢一样跳进泥田。在泥中翻滚,整个人变成了泥人。

本指望士兵们能放手罢休的,没想到他们并没放弃。因为女人们坏了他们的兴致,于是他们把枪口对准女人们,把她们枪杀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做得这么绝的,士兵们之所以这样做了,我觉得还是南京战役的势头使然的。

我们目睹完此事后继续前进了三公里,到了一个房子全被烧掉的村落。住家全被烧了,能看到的最高物体就是烧焦的柱子和瓦砾堆。这样的情景,来到南京后多得已快看腻了。

然而走到近处,在村子中央的广场上,我们看到了几十具尸体倒在那里,他们穿着当地居民的服装。人被烧得半焦,衣服里的棉花还在冒烟。每个尸体都有被刺刀戳过的痕迹。其中有的人头被砍掉了。

我推测,大概是经过这里的某个小部队杀了当地村民,然后放火烧了村子。

其他还有很多,因为所有的事件都大同小异,这里就省略不说了。我们在找大队的途中,走了大约二十公里,看到了很多这样杀害当地村民的例子,却没有什么杀人的理由。勉强要说的话,只能说蜂拥攻进南京的军队发疯了,他们在疯狂地杀人。

这些也都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都一个不漏地收集起来,再统计一下死者的数量的话,该有多少啊。

原航空兵军曹目睹的“南京屠杀”

在写本书后不久,我收到一封读过我前著的井手纯二先生的厚厚的信。

我并不认识这位先生。我立刻打开信封,取出里面的信纸,只见上面写道:拜读了您的《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一书,引起了我百分之百的

共鸣,我非常感动,所以我努力回忆出四十多年前的事,并将这封信寄给您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哥。

接下来就是井手先生所写的他目睹的“南京屠杀”。

之前我写过,“南京屠杀”发生的时期是,包括从昭和12年12月1日自上海附近发兵进军南京,到进入南京城内,扫荡残兵,乃至12月17日入城仪式前后的过程。但是根据井手先生的信来看,“屠杀”持续了更长时间。

这是我所不知道的。究竟是怎样的情况呢?我在得到井手先生允许后,将他的原信引用如下:

我于昭和12年年底开始,到第二年的1月上旬为止,在下关码头的栈桥上目睹的“屠杀”至少五次以上。亲眼见到了码头栈桥下的累累尸体和江面上的浮尸。而且我还拍摄了不少照片。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送给您一部分作为参考。

我于昭和12年7月被征召,并以相等于现役乙干伍长的身份加入了福岗县太刀洗的飞行第四联队,当天经由朝鲜,由铁路向北京开进。

同年12月16日,从北京途经大连,向中国中部开进。

同年12月25日,自吴淞上陆。12月29日,进入南京城外的防空学校旧址。之后一直在南京待到8月,然后经由安庆—庐州^①—信阳—武昌—汉口—上海,昭和14年9月30日到达北满。

昭和15年2月20日,在北满龙镇退伍回国。之后因太平洋战争再次被征召去了南方。

也就是说,我目击的“屠杀”应该是在12月29日至昭和13年1月10日前后发生的事。因为我当时在战斗机部队佐佐部队里做炊事下士官,每天都要去下关附近的粮食厂,所以目睹了好几次“屠杀”。

正如您所说,基于“粮秣应于当地征收以自活”的方针,与在北

① 即合肥。

京每天去市场买菜不同,在南京时,我第一次经历了枪杀牛羊,然后做菜这种事。

俘虏有一万余人。当时采取的是东、南、西全方位包围方式,只留下北面的扬子江,船舶全被有钱人买走了,无处可逃的一般老百姓和士兵就成了俘虏。我听说是因为食粮短缺,才不得已处理掉他们的。

当时城内外张贴着这样的告示,内容如下:招工。开办兵器厂急需熟练操作兵器者。待遇从优。听说这么一来就引来了潜伏在市内的残兵败将,然后将他们处理了。

正如您所说,中支那作战是以建设为目的,是压制、稳定“满洲和北支”的一种声东击西战役,而南京作战,我听说其目的就是破坏,是不顾战后重建的毁灭性战役。身居其地,深感的确如此。

当时,日本国内的政局是这样的:宇垣和平内阁受挫,以此为契机不得不改变中支那作战的基本战略,出动宪兵以恢复治安。次年3月南京维新政府诞生了。据说在昭和12年之前的战略目标里是没有这项计划的。对此我也有切身体会。

在此,我觉得有必要向您说说航空部队和陆上战斗部队的不同点。

在为世人瞩目的出问题的下关码头(我有照片),我亲眼目睹了一位步兵部队的老兵拿着日本刀、哑铃等凶器,将人逐个斩首后推进扬子江里。步兵部队的老兵一边高喊着:“为战友一等兵××报仇!”一边砍人。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时候那个老兵还对我说:“累死了。各位不要光顾看,过来帮帮忙啊!”叫我们协助他。我们航空部队没有像陆战队那样的激战,也没有战友牺牲,对我们来说,没有砍人脑袋的思想准备。虽然能理解砍人脑袋的步兵们的心情,自己却无论如何也下不了手。

这就是后方部队和航空部队当时的实际情况。并不是善与恶、是与非的问题。

另外,在掠夺、强奸等问题上,航空部队和地面战斗部队情况也不一样。

我们征收牛羊等物资时,只要有农家,农民或者主人在场,我们都会给他们一些米、盐和钱什么的再拿走。强奸是听都没听说过。

在这点上,和连日激战、在枪林弹雨中饥一顿饱一顿的陆军士兵们比起来,航空部队所有人过着仿佛贵族般的生活。我想那是差异的根源。

说了很多,以上都是我所亲身经历的事。

假设有十件事实,对自己不利的部分少说,相反,大肆宣扬有利部分。这种做法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赞同的。事实千真万确地摆在那里,几十万人亲眼目睹了,是不容否定和曲解的,是不能肆意更改的。我真希望那些愚蠢的评论家好好反省反省。

以上就是井手先生所写的信的主要内容,省略了部分。

井手先生的来信拓宽了我狭窄的知识面,是十分特别的信。如果是参加过南京战役的将士所写的信,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井上先生曾经所属的部队和南京战役没有任何关系。那是被称作飞行联队的特殊部队。南京沦陷时,他们在北京一带。而所写的一切是飞行部队的人所目睹的,这更是特别中的特别了。

井手先生的来信让我了解到了未知的事实。

我虽然参加了南京战役,但在占领之后没有长期驻扎在南京,因此并不了解之后发生的事。我所属的部队12月17日参加了入城仪式,18日举行了全体战死者慰灵祭。然后因为要移驻新的警备地江阴,便于12月20日离开了南京。

井手先生所属部队据说是12月29日进入位于南京城外的原防空学校的,而那个时候我正在远离南京的江阴附近。

据井手先生说,不仅仅在我前往江阴期间,就连我们在江阴休闲期间及迎接新年的时间里,南京都一直经历着腥风血雨的大屠杀。

现在我知道了,大屠杀一直持续到1月上旬,这和中方所说的屠杀持续了长时间是相吻合的。

关于这些,井上先生在第二次来信里进行了以下描述:

南京城沦陷是在12月13日。我们从中国北部由陆路途经上海到达南京是12月29日。而目睹的数次屠杀是在第二年1月上旬。12月13日陷落和1月上旬的屠杀,在时间上有差距,在这点上是不是值得探讨研究一下呢。

我想,在此期间,军部也很混乱,可能他们企图摸索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结果发现只有这一条路。

(中略)

归纳我的见闻和说明,可以推断,那时有一万人以上的俘虏。在连我们日本军队、连航空部队都不得不靠征缴来自给自足、解决吃饭问题期间,是绝对不可能有多余粮食给俘虏吃的。并且由于无法区别谁是良民,谁是正规军,谁是便衣队,也不可能释放他们。那么只能趁着混乱把他们全杀了——很自然地下这个结论,是不难想像的。当时强硬意见占了上风,更何况全军上下在历经了南京战役的激烈战斗后都筋疲力尽,已经不能正常思考了吧。

我清楚地记得在距离下关码头百米左右的拐弯处,看见那些背着生活用品、正在转移的俘虏们(可能他们就是这样被骗离了收容所的?)而当他们发现前方50米、100米的地方,他们的伙伴正被斩首。于是他们停止了前进,挤成一团。

这就是航空部队所属下士目睹的“南京屠杀”。

从井手先生的来信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感受,专门战斗的部队和后方部队、航空部队等危险少的部队之间有着巨大差异。

正如井手先生所说,航空部队与专门从事野战的战斗部队相比,享受着贵族般的待遇。乘务员和地面工作人员是没有生命危险的。他们身处安全区域,离兵站基地又近,在供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不方便的地方。

虽说同处一个战场,他们却没有直接杀人的任务,不用亲临流血的战场,不用亲历战争的疯狂。

正因为如此,当井手氏在下关看到斩首现场时,有人让他帮忙杀人,他却下不了手。战斗部队征收粮食要靠抢,而井手氏部队却用米、盐、钱

等有偿地换取。也做不出强奸这种事。说明他们在这点上,还没有失去人性。

正因为井手先生处于这样的立场,所以他看南京屠杀的角度和我截然不同。他的这个记录十分有价值:

当年1月左右,我是炊事中士,听当地来的佣人说:

“因为国家宣称南京是首都,肯定不要紧的,所以大家都安心了。等到发觉危险时才发现军人和高官早已渡过长江逃走了,船只全被有钱人租走了,没有钱的市民租不起船。而且当时东、南、西的陆路早被日本军堵住了,惟一出路就是北边的扬子江,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士兵们纷纷脱掉军装逃进城里,混在普通老百姓中间了。”

他就是这样描述当时南京城内贫穷百姓的样子的。

井手先生的信,不仅提供了有关屠杀的证据,还有涉及许多方面的珍贵内容。正是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老先生,想必查阅过大量关于南京屠杀的书籍。

他读了一本称南京屠杀是虚构的内容的书(这里我不想点名批评作者,所以省略了作者的名字),书中写道:

我注意到(略)其中几个问题:

1. 在战场上杀死士兵是“战果”而不是“屠杀”。
2. 完全没有理解战场心理。完全没有身处性命攸关战场的忧虑。
3. 便衣队行动挑起了日本军的猜疑心和仇恨心。

在证言部分里写道:

虽然有“对俘虏处以死刑、杀戮”,但应该把它作为战斗行为讨论,大量杀害非军事人员的事实是没有的。

从以上的记述不难看出：

1. 否定屠杀派并没有否定屠杀确实存在的事实。
2. 作为战斗行为的一环是可以容忍的。与其说当时那些人是被日本军逮捕的俘虏，还不如说他们是无处可逃的、聚集在某个场所的正规军、便衣队和普通老百姓的混合体，这样说更为准确。
3. 屠杀对象里是否混入了普通老百姓，这是否是战斗行为的允许范围呢？

从以上几点可以隐约看出否定者的逃避态度和妥协姿态。

我希望出现更多这样的人，希望把事实的真相诉诸天下。在此，我向井手氏表示深深的敬意。

上海—南京间拾零

最近，“南京屠杀”成为话题，随着围绕该话题的争论日趋激烈，人们开始关注一些细枝末节，把它们作为争论的材料。同样，我也收到了许多质疑信和咨询信。其中就有一封信这样写道：

我看了据说是在南京杀害中国人现场拍摄的照片，士兵穿着夏装令我匪夷所思。南京战役是在12月份的严冬发起的，但是士兵却穿着夏装，您不觉得矛盾吗？不觉得不自然吗？

对于提出这个问题的各位我已经给予了答复。但是，我想除此之外抱有相同疑问的人应该还有吧。所以在此我想作一些说明。

如各位所说，南京战役是在严冬季节。因为军队换冬装是10月份，所以在12月份的季节里穿着夏装也许是让人觉得不自然。但是，这种想法是在正常时期。当然，战地也要按要求换装的，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有时则做不到。正常情况下，士兵们可以在军营里直接从被服库得到供应。但在战地，由于军队分散各地，物资则必须通过运输。这样，驻扎在便于运输地方的军队还好，可条件恶劣地区的军队，由于运输麻烦，所

以物资供应十分不易。南京战役时期就是如此。有些部队一直到出发时都没能得到供给,因此,很多部队士兵一直穿着8月下旬或9月上旬从日本内地穿来的夏装。

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在战场上是常识,在平时却难以理解的现象。因此,屠杀现场的士兵穿夏装就不足为奇了。

在正常社会里,仅仅发现来历不明的白骨就足以构成案件。如果再发现他杀的尸体那就是大案了。奔赴战场的将士们曾经也是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正常人,所以刚到战场时,我们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一到打过仗的地方,就会发现所到之处尸横遍野,尸体腐烂得难以清理,发出阵阵恶臭。半腐烂的尸体可能由于体内充满气体的缘故,膨胀得衣服都快要裂开了。苍蝇成群结队地飞来产卵。尸体的眼、鼻、口等多处生出无数蛆虫,不停地蠕动。由此发出的臭气和阴森恐怖的感觉足以使人面色如土,恶心作呕。

不久,随着习惯于战场,我们都变得见怪不怪,看到尸体也平静并麻木了。到了挺进南京时,人的尸体在我们眼里已变得连猫狗的尸体都不如了。

仅从上海附近出发到南京的途中,单单是我们走过的路上,也看到了成千成百数不清的尸体。

其中自然包括为抗日而战死的人,此外还有集体死亡的难民模样的人,还有男女老少被统统杀光的村落等等。

我去南京的途中,路过一个村落,那里有五十具左右村民模样的尸体倒在地上。有的被砍了脑袋,有的被刺刀刺死,有的被子弹打死。被鲜血染红的尸体重重叠叠擦在一起。看起来他们遇害时间不长,因为流出的鲜血还没凝固。无论对战场多么习惯,这情景看上去还是惨绝人寰的。

正当我注视着眼前惨状时,突然发现血流成河的尸体堆中有东西蠕动。我觉得可疑便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婴儿。居民被杀光了,惟独这个婴儿还活着。难以推测这是善意还是偶然,总之,仅仅对于婴儿他们没有下手。婴儿出生几个月了无从知晓,刚刚会爬的样子。可能是因为虚弱,他连哭的力气都没有,只是手脚不停地挣扎。

我转身离开了现场,心里却想,不杀这个婴儿是对的吗?杀死他能说是不人道吗?

去南京途中所看到的成百上千具尸体中,有的是被作为试刀的对象杀死的。

为了补充在上海战役中消耗的兵力,南京战役开始前,上级便从后方调派来补充兵。为了让这些没有实战经验的补充兵练胆量,上级命令他们刺杀那些作为实验品的活人。这些活人一般是俘虏或是当地居民。这是非常残忍的,却也是当时日本军队的惯用手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以去南京途中的所见为例略作说明。

依稀记得途经苏州一带时。在一个小村落里,由军曹指挥的五十人左右的部队,正准备进行刺杀实践。负责指挥的军曹身穿满是污垢的军服,从那胡子拉碴的严肃表情来看,显然是位身经百战的老将。

士兵好像刚到战场不久,穿着新毛料军装,配备着崭新的装备,看起来很像新兵。好像是在军曹带着补充兵去追赶大部队的途中。

从现场情况判断,好像是军曹在队伍休整时,命令士兵抓来当地居民,让新来的补充兵练习刺杀。

军曹指挥补充兵让十几个居民背靠着立柱,把他们绑在上面,然后命令士兵刺杀他们。但是补充兵们虽然握着刺刀对着居民,可他们的眼睛都看着别处,没有人打算出手刺杀。他们无一例外地两颊肌肉紧绷,目光闪烁。“杀!”军曹发出了命令,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

“你们畏畏缩缩地干什么?这帮胆小鬼!”军曹发怒了。士兵们这才慌忙向前伸出刺刀,但是这样是杀不死人的。这样只能伤及皮肉,一刀又一刀,被刺的人更是难以忍受,他们发出惨叫,异常痛苦。而且,由于是几个人同时刺杀一个人,被刺者一个个浑身被流出的鲜血染红,成了血人。

这样一来,最好的办法是早点结束他们的性命。于是一通乱刀将他们杀死之后,还要像切鱼肉馅似地继续戳下去,这是最残忍的杀人方式了。

在这里体验过杀人的补充兵,加入大部队占领南京时,肯定会大肆杀戮且毫不逊色于老将吧。

在战场上杀人除了刺杀之外,还有用日本刀砍杀,用炮弹、子弹击毙等方式。但是我亲眼目睹了更加变态的杀人方式。

记得在靠近常州一带,我们为了征缴进入一个大村庄。但是已经有其他队伍先来抢走了值钱的东西,所以我们什么也没得到。当准备返回经过一棵大树旁时,我看到士兵们正把绳子系成绳套挂在树枝上。心想他们要干什么呀?于是停下一看才发现下面放着一个踏脚台,他们抓来村民推上踏脚台,并催他把头伸进绳套。

原来是想绞死他。村民用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叫唤,不肯服从。但士兵们群拥而来用刺刀刺他,强迫他把头伸进套子。村民极力反抗,但很快就听任摆布了。士兵们一踢踏脚台他就被吊了起来,一下就不动弹了。

绞死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抓来村民吊起来,大树的每根树枝上都密密麻麻挂满了人。

带头的曹长还说:“我不喜欢流血,太残忍。”但是这种杀人法丝毫不亚于流血的杀人法。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佛教盛行的国家。所以听说我国伟大的僧人过去要去中国修行。因此中国有很多宏伟的寺院。因钟声而出名的苏州寒山寺,还有传说弘法大师曾修行过的镇江金山寺等,有名的寺院不胜枚举。

我想说的是,在人们互相残杀战争面前,神佛的因果报应是说不通的。

有记录称在日本历史上,从古代战国乱世开始,每次战乱爆发,战火都蔓延到神社、佛堂。在中国也一样,佛法界也不能幸免于难。

我记得大概是在丹阳和句容之间的地方。那里有一座虽不知名但似乎有些来头的大寺院。

这座寺院就在我所属的大岳部队停止行军准备露营之处的附近。从先去设营的人那儿得知,寺院里有柴火和水,我们就赶过去了。一看已有其他部队捷足先登了,很热闹。

士兵们在佛堂前的广场上围在一起用饭盒煮饭,仔细一看他们作为燃料烧的柴火,竟然是寺院里的牌位。

在平常,牌位是佛的象征。人们相信如果不敬就会受到佛的惩罚。所以即使是不信佛的人面对牌位也会一脸虔诚,烧香跪拜。

尽管是敌国寺院,烧牌位做饭也是要遭报应的。从佛堂中被拖出来的金色佛像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切。好像战争中的士兵是不会遭到报应似的。

还有一件发生在寺院的事。我所属的须藤小队接受临时任务,离开主街道向前行进时,在树木茂盛的山腰隐蔽处,发现一座寺院似的建筑。

发现寺院后士兵们都异常兴奋,因为在行动中,我们几次发现在这种地方,寺院里通常会有女性避难。

“去看看!”士兵们冲进去一看,果然不出我们所料,那儿有很多女人。但是有其他先到的队伍,女人们已被他们占有了。就在供着牌位的大殿前的地面上,他们正实施奸淫。

我们一进去,剩下的女人们露出恐惧的表情,更紧地挤在一起。她们想又有人要成为牺牲品了。我不由得把目光移向别处,环视了佛堂。发现一个和尚正在打坐,而他可以从座位上俯视妇女被凌辱的场面。开始我还以为是尊佛像,仔细端详才发现原来是个活人。看起来是一个相当有胆量的高僧,在众多日本兵面前,他泰然自若,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他仿佛在对女人们说:“忍耐一下,佛祖一定会保护你们的。”就连天不怕地不怕的士兵们也被这个和尚的气势所压倒,没人敢对他下手。

在南京战役中,我们边追击溃军,边向前挺进。在13天内前进了约300公里,速度相当惊人。同时,这也是一场考验双脚的战争。对于腿力不好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苦战。还没走到一半,由于脚底发炎而难以步行的士兵日益增多。随着这种情况的大规模蔓延,为了减轻一点负重,我们开始扔掉暂时用不上的东西。经过几次大大小小的休整再出发时,连带来替换的内衣、内裤、袜子、信笺、信封等都被扔掉,散乱一地。

除了扔掉行李减轻负重,我们还借助外力。把装备绑在水牛背上,赶着它走。“这真是个好办法,这下轻松了。”大家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但是水牛是喜水动物,一有空它就跑到湖里河里去,背上的行李便泡在水里,把行李的主人弄得手忙脚乱的。

这种事可以归纳为胡闹,过分的是士兵们抓来当地的男人,让他背

三四个人的行李。士兵们把自己的重负三四倍地加诸于他人,把当地人当牛马使唤。

军队行军以一小时步行四公里为标准,称为四公里行军。但是进军南京时军队没有按照标准行军。为了夺回因交战而耗费的时间,军队实行了强行军。

那些当地人跟着强行军队伍,被士兵们呵斥着,一心想跟上部队,看起来十分可怜。如果走了 50 公里或 100 公里即被释放还好。可很多人刚从重负下释放出来就死了。

我们去中国大陆打仗的昭和 10 年,还能看到中国妇女裹脚风俗的遗风。

所谓裹脚就是为了防止妇女脚变大,从幼时起就在脚上缠上布抑制其发育。所以,成人后脚的大小也只有拳头那么大。用那样小的脚来支撑体重走路,就像刚会走路的小孩一样摇摇晃晃的。

听说在旧中国,之所以兴起裹脚风俗是因为男人把女人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在旧中国,男人娶妻必须以金钱为代价,所以穷人娶妻不容易。与此相对,有钱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娶三房四妾。听说有些地位显赫的人有十几位夫人。因此有这么一说,既然娶妻花费了大量金钱,为防止妻子逃跑,要限制女人们的活动能力,所以才裹起了脚。

另外还有其他说法。女人是为男人而存在的,为了提高女性身体价值,通过减少脚接触地面面积使重心不稳,从而加强性器官的肌肉收缩能力。由此,人们认为脚越小的人越美。

以上两种说法,是别人从中国人那儿听来的,其真实性不敢保证。

之后,裹脚被禁止了,所以在年轻女性身上看不见了,但五六十岁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裹小脚的。作了这么多关于裹脚的说明,我想说明的是当日本军队攻入时,那些没有行动能力的女人会有怎样的结局。

我袭击过正在逃难的群众,那种情况下,有行动能力的人可以逃脱,死的多是老人和女人、小孩。其中,还有大概是丈夫的男人用独轮车载着自己的小脚女人一起死去。死时还保持着推车的姿势。独轮车倒了,紧紧抓着车的女人也死了。像这样的惨状所到之处随处可见。

当我们逼近句容时,上面下达命令:“各队迅速占领句容一溧水

一带。”

因为已逼近南京，必须整顿军队阵势，准备发动总攻击。气氛顿时变得异常紧张，从士兵的一举一动中，可以感觉到杀气腾腾的凶险气氛。

当我们进入这一带的某个村庄时，一支从未见过也从未听说过的部队已先到了。在村头一户人家的屋顶上有个炮兵观测所，有士兵正在通过炮镜和测距仪进行观测。给人一种大战将临的感觉。

观测所的对面聚集着一个中队左右的士兵。士兵们正在审问十来名不知从哪儿抓来的穿着正规军服的俘虏。

走近一看，发现其中有一人从身形来看是女性。看起来好像还是将校。虽然她上身着绿色的气派的军服，下身穿着马裤，但从军帽下可见短发的发梢，从娇小的身材和秀气的面容来看必是女性无疑。

在远处观望的我都能看出来，在近处审问的士兵不可能没察觉。既然早就知道了，他们就借口检查身体要俘虏脱光衣服，赤裸身体。

其他俘虏都按照命令脱光了，只有这个穿着将校服的人以强硬的口气抗议。但是，不一会儿士兵们就用武力压制了她的抵抗，随着衣服一件一件地被剥去，裹住胸部的棉布条露了出来。布条一解开，显然是女性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作为将校的好强和自尊一下子消失了，她哭泣着哀求。但是事到如今士兵们是听不进去了。可能是对方将校的身份引起了士兵的兴趣吧，士兵们聚到一起，把她当玩物一样玩弄之后，就将她与其余十人并排在一起砍下了头。

向南京进军的日本士兵似乎都偏爱虐待俘虏。

在关于“南京屠杀”的众多意见中，“在南京城内进行了怎样的屠杀”似乎成了重要问题。

我也收到很多诸如此类的咨询信。如：“南京城内发生大屠杀时，你在城内吗？如果不知道城内屠杀的情况，不能真正弄清事实真相，所以我很想知道详细情况。”

但是我不愿意只把重点放在城内的屠杀上。所以我经常回答说：“我并不清楚占领期内南京城内的情况。因为向南京进军时，我们基本上都在二线。所以到达南京时，一线部队已经占领了南京。我们在南京

城门前改变方向,在城外进行扫荡,并驻扎在城外。所以没有进入南京城。参加南京战役的部队中,进入南京城的恐怕只有百分之几吧。所以我想城内的屠杀也只是南京大屠杀中的百分之几。我认为比起城内,城外的情况更重要。”

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兵,对大局并不清楚。但后来对照地图,我看到我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包围圈。

沿长江西进的上海派遣军从东面和北面包围,部分兵力从镇江横渡长江到达对岸,然后从六合—水口镇向淞县^①进军。

另一方面,从嘉兴附近开始行动的第十军采用了南边路线,在溧水、秣陵关一带改向北方挺进,形成包围南京的南面、西面的阵势。我部也派遣部分兵力占领长江边上的芜湖和太平,另外一队从慈湖镇渡江占领浦口。

攻打南京的军队形成了对南京的包围圈后,同时派遣海军舰艇在长江中巡逻警戒。此时,被包围的中国军队和居民如同瓮中之鳖。

大屠杀就是在这张包围网中进行的。试想乘胜追击的大批军队,进而占领了敌方首都南京,从而军中充斥着异乎寻常的气氛。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屠杀,其规模之大了。

我想是因为城内有美系基督教堂等原因,所以城内问题才显得较为严重。但是若仅就屠杀而言,与城内相比城外情况之残酷简直不能相提并论。

和上海战役时的阵地战不同,南京战役是运动战。进攻并拿下由钢筋水泥筑成的坚固阵地固然是苦战,但是边长途跋涉行军边打仗的运动战也困难重重。最难解决的就是粮草的运输和弹药补充如何与前线打仗军队相衔接的问题。

奔赴前线打仗的军队出发时,虽然尽可能地随身携带了物品,但那也是有限的。虽说兵种要求不同,以携带步枪作战的步兵全副装备为例,总重量大约三十公斤(包括步枪子弹 160 发、粮食,及其他行动中的必需品)。

① 原文如此,疑为宿县。

一旦开战,160发子弹就会迅速用光。战斗需要大量子弹。以当时被称为“虎之子兵器”的九二式重机关枪为例,一分钟发射约为500发子弹。如果子弹不充足,这种枪就只是一堆沉甸甸的废铁,什么用也没有。

和子弹一样,在战争中粮食也是不可或缺的。几万、几十万人的口粮是个庞大数字。

补充弹药和粮食由运输部队负责。但如何能毫无障碍地顺利补充供给,使战斗部队能行动自如则是军部首脑的责任。

在南京战役中,指挥部在这方面出了差错。这种差错不仅在南京战役中出现,在太平洋战争中也导致很多人饿死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菲律宾等地。

和太平洋战争末期不同,南京战役是我们打胜了,所以我们没人饿死。取而代之的则是发生了大量残忍事件。

从上海向南京进军期间,我们沿途掠夺居民粮食充当军粮。这是军队的作战方针。所以我们将从居民那儿掠夺来的食物称为“蒋介石俸禄”,掠夺时没一点罪恶感。

这一点成为军队的常识,我认为毫无疑问这也是导致“南京屠杀”的原因之一。

征粮行动中的首名牺牲者

在此之前,我把从当地掠夺粮食归结为“南京屠杀”的原因之一。我想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作具体说明。对于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人来说,可能会以为征粮只发生在攻打南京期间,但事实并非如此。

日本军队自满洲(中国东北)事变以来,称从敌方居民处抢夺粮食为征粮,并以此为常规手段进行战斗。

这一来,因为“征粮”是战略方针之一,所以打过仗的人都熟知“征粮”一词。参加过战斗的官兵们,虽然数量多少有些差别,但没有人没吃过“征粮”。

征粮就这样在日本军队内公然实行着。它之所以在南京引起争议是因为它发展成了国际问题。这一点前面已经说过,在此就略去不谈

了。虽然上面禁止征粮并开始捉拿现行犯。但是这种制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以柳田伍长为例作具体说明。

各队都有人为此被逮捕，我所属的大岳队也不例外。柳田伍长被逮捕成为第一个牺牲者。

柳田伍长是现役兵，他申报候补下士官并获批准，进入陆军教导学校学习，毕业后提拔为军官，是一个出色的下士官。他本性认真，并且在军营生活中磨炼得顽强固执，不懂得随机应变。因为这种典型的下士官气质，所以他在上海战役中表现突出，如果有奖赏的话，无疑是应该被授予金鸚勋章的。

尽管柳田伍长是这样的人，但在攻打南京期间，正义却没有关照他。

大岳队的行军道路遇到了各种障碍，行动受阻。要道、要塞都被挖断，连我们都惊叹“居然挖得这么深！”河面上的桥梁基本上都被破坏，进攻受到了阻碍。路面上到处立着“小心地雷”的标志，我们只得小心前进。由此，大岳队也陷入了粮食匮乏的困境之中。

可柳田伍长出去征粮，被作为现行犯当场被捕的事，发生在无锡附近。柳田分队全体队员当场都被带走，队员们当天就回来了，但柳田伍长却没能回来。听管人事的准尉说，队员们只是被训斥一顿了事，而柳田伍长则作为统率部下的队长被追究责任，已被送至军法会议。

之后的情况无从知晓，但是三年后我回后方归原队时，与刑满释放在原队工作的柳田伍长偶然相遇了。那时，他已不是伍长而被降职为一等兵了。

以下是当时从他那儿听说的情况。

柳田分队是在经过无锡附近时，与另外一个分队一起由管军饷的加藤军曹指挥出发征粮的。当然这是为了整个中队而进行的征粮。

但是，那天简直可以称为“见鬼日”，脚都快走断了，可是不管到哪个村落，都已被其他部队征收得一干二净，连只鸡也没征到。于是指挥官加藤军曹觉得没希望了，决定打道回府。

归途中，柳田分队脱离了加藤军曹的指挥，他想一边征粮一边回集合地。责任感很强的柳田伍长想到中队的官兵们正饿着肚子，多少也要带点吃的回去。于是对看到的村落一个不落地进行搜索。

但是付出的艰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收获。正当他们打算放弃征粮赶回部队时,发现了一个有二三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大家把它当作最后的希望。进去一看,可能是其他队伍看不上这种小村庄而没进去吧,那儿居然有两头大猪和十几只鸡正在觅食。征缴了这些东西,他想“终于有东西可以带回去了”,刚安下心来,队员们又开始四处搜寻起妇女来。

虽然伍长没察觉,但分队员们却发觉村落里躲藏着居民。有正义感的伍长已经因征粮而心存愧疚了,得知分队员们还企图强暴妇女,顿时大发雷霆。他愤怒地吼道:“今天的目的是征粮,不允许强暴妇女!绝对不允许!”伍长严格下了命令,但队员们听不进去,何止听不进去,他们对伍长的正义感起了反感,抗议道:“别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强不强暴妇女是我们的自由,即使是分队长也无权管这种事吧。掠夺村民粮食和强暴妇女哪个更坏,还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用不着你来管我们!”

这样被反驳之后,伍长无话可说了。而且,分队员们大部分是征召兵,年龄比伍长大,军龄也比伍长长,所以伍长没能力强制地压制他们。

没办法,伍长只有独自留下来看管征收来的食物。这时,附近的房子里传出妇女悲惨的叫声。

伍长想:“开始啦。”他朝着叫声传来的方向走去,听到屋里传出妇女的哭声。这下,他断定,毫无疑问他们正在强暴妇女。伍长的正义感又一次涌上来,他怒火中烧。在愤怒的驱使下,伍长闯进屋里,果然,士兵们把妇女仰面按倒,趴在上面的士兵正兴奋地实施暴行。其他士兵围在一旁等待。一看被压在下面的妇女,竟是一个与其说是妇女不如说是女童的年幼小姑娘。

伍长更加气愤了,他吼道:“她还是个孩子!不要欺负这么小的姑娘,住手!”虽然伍长知道说了也没用,但是愤怒与怜悯一起涌上心头,他忍无可忍。

正如伍长所知,发了狂的队员们毫不理会。正在强暴小姑娘的士兵抬起头,露出淫笑:“虽然是小姑娘也够塞进去的啊,你看……”边说边抬起腰,向人们展示连接处。

遭到队员们这样的反抗,伍长怒气消了,反而感到几分悲哀。想到战场是强者战胜弱者的地方,上下级关系对这帮人来说根本不管用,再

说下去也只是遭人嫌。于是伍长放弃了,忍耐着等待他们结束。

能这样结束就好了,结果出事了。这时候,伍长也好,分队员也好,谁也没注意到附近有条道路。

路过这条路的某参谋听到女人的哭声,便过来查看,结果被他抓了个正着。

以上就是柳田伍长的话。

柳田伍长不是为了私欲而去征粮的,并且他也没有强暴妇女。何止没有强暴,他还试图阻止队员们。虽然如此,但是军法还是追究了他的责任,将他判为罪犯。为此,不仅上海战役以来的功勋被一笔勾销,还被降为一等兵,一生不得提拔。

如果粮草补给顺利进行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为了不出现伍长这样的牺牲者,各部队一个不留地杀死受害者,以此毁灭证据。从而,通往南京的道路被染成一条血路。

可以说,南京屠杀的原因是作战指挥者的判断失误而造成的,最终发展成为“大屠杀”。

我所实施的掠夺和强奸

提起“南京屠杀”,似乎大多数人只会联想集体杀戮中国军俘虏及民众的地狱般场景。

当我提及我们去掠夺、强奸的话题时,有人心怀不甘地这样问道:“本来我是期待着能听到关于大屠杀场面的描述,难道你们就只干了这点事?”

与大屠杀相比,这可能算不了什么。但掠夺物资、强暴妇女的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普通人想要犯下如此深重的罪孽也并非易事。

我想本书读者中可能会有人期待读到大屠杀场面。可是我所属的部队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屠杀,我们只是目睹而已。尽管如此,我们并非为了正义才没有进行屠杀的。只是因为在上海战役中我们部队始终在一线作战,负伤人员众多。也许是这个缘故,在南京战役中我们被派到二线随军而行。因此,我所属的部队事事都落在别人后面,没有屠杀机

会。那时,我年轻气盛总觉得不甘心,如今想来,感到实在是万幸。

进攻南京的军队在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的指挥下,上海派遣军由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率领,沿扬子江西进,第十军由柳川平助中将率领,从南面以包围之势进攻南京。

我所属的部队从太仓附近出发,经过昆山—苏州—无锡—句容一带,以南京中华门为目标前进。最初我们与后方部队联络通畅,弹药、粮草补给十分充足。可是从苏州附近开始,我们渐渐看不到后方跟随而来的辎重部队了。

这是由于中国方面为了阻止我军的快速进击,深挖路面、摧毁桥梁、埋设地雷造成的。

由于这些阻碍使得车辆部队停滞不前,攻击前进的阵形也被打乱了。于是,由后方运输来的弹药、粮草等补给完全中断了。我们因为是二线部队,弹药还没有问题。可是哪怕一天没有粮食也过不下去。从那时起,各个队伍组建了征粮队,开始掠夺当地居民储备的食物。

我加入征粮队是在刚刚过了苏州时的事情。当时征粮队是由三宅上士带领,由我们分队和山崎分队参加组建而成的。征粮队一般比大部队提前三小时左右出发,抢到东西后,到指定地点与大部队会合。

我们绕过大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左右,天色渐渐发白。在微明之中,隐约可见一个大村庄。我们心想:“那里肯定会有很多收获。”走近一看,村庄四面被护城河环绕,根本无法渡过。

“虽然看样子会有很多好东西,但是游不过去。真可惜。这个就暂且算了,我们去找下一个村子吧。”就连三宅上士对这种水寨也无可奈何,站在岸边束手无策。但是往往这种时候,士兵中总会出现比指挥官机敏的人。这时有一个可能是打鱼出身的士兵,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串首尾相连的小船,巧妙地撑到了岸边。

于是我们分批乘上小船进入村子。清晨,天还没有大亮,因为有护城河保护而感到安心的村民们毫无防备地睡着。他们被突然破门而入的日本兵惊醒,惊慌失措,根本来不及把家畜和东西藏起来。

亏得如此,就在村民们还睡眼惺忪、慌乱不堪之中,我们抢到了米、鸡、猪等东西,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大丰收。

我们对村子里的粮食、家畜进行一番片甲不留地扫荡，为大部队弄来了足够两天的食物。但是看到空荡荡的村子里残留着的人们，一种罪恶感油然而生。想到这个村子的村民不知该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时，良心受到谴责。

可是就在我深深自责时，和我同行的其他士兵们开始打起了年轻姑娘们的主意。在古书传记里记载着胜利军队凌辱战败国妇女的事情。然而在如今的战争中这一点丝毫没有改变。而我却犹豫不决。

“这里有很多姑娘噢！”——听到有人喊我便朝那边一溜烟跑过去。所到地点有二三十个女人缩成一团，藏在那里。不仅仅是女孩子，也有已经成家的妇女。

士兵们各自物色着自己中意的女人，强行拉出，而我还是下不了决心。我头脑中的部分想法是：“大家都这么干，不管是对是错跟大家一起干。”另一部分想法却认为：“不可以做坏事。”我在诱惑和自律之间徘徊着。

然而我并不是因为正义感特别强才这样的，我只是优柔寡断而已。

但是我也是一个年轻男子，动辄便会有欲望。我迟迟下不了决心。好不容易狠下心逃离了现场，心里的欲望却没有消失。“大家都这么做，凭什么就我一个人这么固执！强暴女性又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快点去干吧。”——我的心被这种想法诱惑着。不知不觉想强暴的念头又死灰复燃了。就在此时，已经完事的士兵们走过来催促道：“分队长，还没干啊？再不干就没时间啦。”

一听到这话，我不由分说地跑了起来。在士兵面前我的羞怯暴露无遗，令我羞愧难当。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如此窝囊的一面。

本来我是漫无目的地跑的，然而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女人们藏身的房子前，在无意识之中又下意识地以女人们为目标了。

我开始对自己生起气来。如果能像其他士兵那样随心所欲，那该多棒——我对如此窝囊的自己感到无比愤怒。趁着这股怒火我踏进了屋子，屋子里还有五六个被挑剩下的女人。

我一踏进屋子，女人们便纷纷露出惊恐之色，争先恐后地躲向墙角阴暗处，捂住脸，企图逃离我的视线。她们显然已经意识到她们之中又

将有一个被选中。

看到这些我又有些泄气了。可是,我已经无法退缩。我为自己虚张声势,怒吼一声:“过来!”上去就抓住一个女人。

但是底气不足。我只是在虚张声势。一旦接触到女人愤恨的目光,不自觉地又把脸别了过去。我想还是放过她吧,可是一转念感到这样做没有男子汉气概。虽然思想斗争了那么久,最终还是强奸了那个女人。我也是个好色之徒而已。

如果想要强奸妇女的话,一开始就像其他士兵那样做也就罢了。连自己都对自己的优柔寡断感到失望。

终于完事后,我回到了停船的地方。早就完事的士兵们正在那里装船。掠夺来的东西把船塞得满满的。那情形简直就像海盗、土匪一般。我禁不住又想:“难道这就是高喊为东洋和平而圣战的皇军吗?这与山林土匪有何区别!”

我想如果把这么多粮食和家畜都运走的话,村民们就没法过日子了。想到把村民们储备过冬的食物抢走,不知让他们怎样度过漫长的冬天时,我便自责起来。村民们躲在自家房子里面朝这边看,目光里饱含着憎恨,让我恨不得立即逃离此地。

我明明是对村民们怀有同情之心的,却抢夺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发展到最后还强奸了妇女。然而带着抢来的东西和大部队会合时,我又像立了大功似地分起了东西。

我是那种经常自相矛盾的人。既然是非做不可的事,同情也好,不同情也罢,结局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我对自己优柔寡断的性格却很满意。自从来到战场,我感到身上发生了许多异常变化——做人的理念开始淡薄,开始变得会做坏事了。但是做了之后还是会后悔的。我想这至少说明我还残留着人性。

胆怯士兵的蜕变

此前,我曾经说过“南京屠杀”是军队有组织进行的。但有时也并非

完全如此。其中也有属于个人的单独行动。

和我同一个中队的一等兵松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等兵松浦原本胆小得让人无法相信世上竟有如此胆小如鼠的人。我和他是同年的征召兵,作为现役兵入伍,被编入同一中队,加之又同在一班,因此对他的为人了如指掌。

一等兵松浦不仅胆小如鼠而且没有耐性。他家虽然在乡下,却是名震邻里,有“财主爷”之称的富豪家庭。松浦作为家业继承者从小便被当地的大人们尊称为“少爷”,生活十分富足。在这种优越条件下长大的他不知与人竞争为何物。也许他没有耐性这一点正是在这种成长环境中被培养出来的。

因为在那种环境中长大成人,现在加入竞争激烈的军队,他与周围的士兵们格格不入。他被视为劣等兵,与一般新兵相比要挨更多的耳光。而且,其他兵被体罚时会仍然保持直立不动的姿势,默默忍受。他却马上哭出声来,“对不起,对不起”地抱住别人不停地道歉。

即使在如此众多的士兵当中,哭着道歉的情形也是很罕见的。这反而挑起了两年老兵中有虐待狂倾向士兵的兴趣,他成了士兵们茶余饭后取乐的对象。因此,他愈发变得软弱起来。

他的这种胆小至极的毛病,在新兵期间的第二期阅兵之后变成了人人皆知的事情了。第二期阅兵结束后,对新兵的一整套教育也告一段落,开始了卫兵值勤任务。新兵第一个站岗的地方是军火库。那个军火库是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地方。

军火库是营内最偏僻的场所,这一点在任何一个联队里都是一样的。不过我们所在的联队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鬼故事。

那是十年前,一个新兵第一次在火药库站岗时打瞌睡,结果被巡查军官发现,遭到了严厉批评。这个新兵苦恼不堪,投入附近的古井里自杀了。直到现在还传说古井里常有亡灵现身。

虽说没有人亲眼看到过亡灵,但那里仍是一个人们忌讳的地方。大家都是战战兢兢地完成值勤任务的,只有一等兵松浦根本无法值勤。一轮到他在军火库站岗,他就跑到班长那里哭诉,要求换人。最初,班长以这之前没有先例为由,批评了他。后来看他的确深陷恐惧之中,害怕惹

出乱子来,就向人事科打了招呼,把他换了下来。

因为他如此没志气,因此成绩低下。虽然他以排名最后晋升了一等兵,但他是比二等兵还差劲的一等兵。即便是这样的士兵,在卢沟桥事变后也被派往前线。

他垂头丧气,极不情愿地奔赴前线。在前线部队里我和他仍被编在一个中队,但这次没有被分到一个小队,因此不怎么接触了。但是对他胆怯这一点了如指掌的不仅仅是我,来到前线不久后,“胆小鬼松浦”这个称呼已经在士兵中流传开来。

但是,就连“胆小鬼松浦”也有着和常人一样的残忍一面。在占领南京后,大部队驻扎在玄武湖附近的村庄时我偶然知道了这一点。

那时候大岳队扫荡残兵的任务告一段落,为了防止可疑之徒潜入,我们承担了监视通往和平门方向道路的任务。我们在能将街道全景尽收眼底的高处设立了分哨岗,任务就是专门监视街道。这是一项特别轻松自在的工作。即便是再严密的监视,我们也无法分辨出谁是可疑分子,谁是良民,于是我们就摆摆样子监视,打发时间而已。

我了解到一等兵松浦的另一面,是被命令到分哨岗和他一起站岗时的事情。他在站岗时向街道开枪,杀死过往的当地人,我这才看到了他残忍的一面。

被枪杀的都是附近村民,他们并没有什么可疑举动。这个姑且不谈,我在推想为何如此胆小的松浦也敢杀人呢?估计他可能是想显示一下他的射击本领。作为一名军人,他各方面素质都差劲,惟有射击一项是优秀。

军队里有个说法叫“射击呆子”,在反应迟钝的士兵当中有很多人射击很优秀。一等兵松浦也是那类人。射击比较优秀的人会被选为狙击手。但是一到实战时他就会害怕,没有命中率。大概为了挽回名声,他选择了以当地过往居民为目标。

这件事已经让我吃惊不已,然而第二天他又做出了更过分的事情。

第二天早上,他从哨岗上退下后小睡了一会儿。到傍晚时分,他和两三个没有当班的人去村子里散步。回来时,带回来了一名略有姿色的中年妇女和一个看上去十四五岁的孩子。

我看到他们进了休息室,想到“难道又要干坏事了不成?”于是我便走过去看。不出所料,一等兵松浦和另两三名士兵正把那女子的衣服脱光,企图强暴她。

“就算不当班,也是值勤时间。都给我停下来!”

我这样提醒他们,然而那些家伙却充耳不闻。特别是一等兵松浦,他不仅不听,反而突然变得目中无人,反驳道:“分哨长难道不做这种事吗?你是那种有资格干涉我们的干净人吗?”

经他这么一说,我便无言以对。他们看我不说话,便决定以抽签方式来决定顺序。

我想他们若是非要这样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然而,他们轮完一番之后并没有放过那女人。这次他们强拉着带来的小孩和那个女人,要看他们交媾的场面。

女人一看到这情形立刻慌乱地喊了起来。从这样子判断女人和小孩应该是母子关系。虽然我不懂那女人在说什么,但是看样子好像在说:“不行,那样做的话就是畜生了!”

一等兵松浦觉得这很有趣,把女人的两腿强行掰开,逼着那女人和小孩结合在一起。那女人虽然嘴里不停地叫唤着,却无法抵抗。因那小孩是年轻之身,男性之物处于临战姿势,因此结合起来丝毫没有费事。

面对如此不堪入目的事情,他竟然在一旁拍手取乐地观看着。原来一等兵松浦有如此虐待狂的一面。在正常社会里,他的这一面深藏不露,而在战场这一非同寻常的场合,得到了暴露的机会。

第二天,又有两名年过50接近60岁的一男一女被拖来。看来今天他们的兴趣变了,要看他们两人交媾的情景。

一等兵松浦把二人强行推入休息室,用刺刀逼着女人仰面躺下,然后把男人撵到她身上。但是与昨天的小孩不同,那男人已经上了年纪,那至关重要的男性之物未能如人意。

那男人为了打马虎眼佯装着来回动。从后面观看的一等兵松浦发现了这一点:“妈的,想欺骗老子的眼睛!给我真干!”——他怒吼一声,抬起穿着军靴的脚朝着那男人的臀部踢去。

这次踢到了要害,男人闷声倒下,在那里痛苦地扭动了好一会儿。

一等兵松浦的嗜好没有得到满足,接着他又想出更加残忍的方法。他把两人的手绑在背后,一路拖到哨兵指挥所的后面。为了给不当班的哨兵取暖,那里总是烧着一堆火。他强行让两人坐在旁边,然后铲起满满一铁锹滚烫发红的炭火倒入两人的衣服里面。

不管怎么说,炭火直接烧着皮肤的痛苦没人受得了。两个人如野兽般狂吼乱叫着在地上来回打滚。之后炭火又引燃了衣服里面的棉花,冒出了白烟。

据说在江户时代有一种叫做“蓑衣打滚”的刑罚。就是让犯人穿上蓑衣(古时候用麦秸编织而成的一种雨具),然后放火烧死他。一等兵松浦所做的和那是一样的。不知是谁提来了水浇灭了火,不久两个人便断气了。实在太残忍了!这种事情也只发生了一次。我思忖着他为何会干出如此残忍的事呢。我猜他是想洗雪平日被同僚们耻笑的屈辱,便对处于弱势的当地居民下了手。至于为何在哨所里这样做,大概是认为同年入伍的我,已经是分哨长了,肯定会帮他。并且还想在久别重逢的我面前表现一下他也是不好惹的吧。

但是,我意识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虽然我的想法可能显得突兀了些,但可以说导致他这样做的是“南京屠杀”这种整个部队的气氛。更确切地说是南京战役掀起的疯狂气焰使得他这样做的。连他都敢这样做,其他人便可想而知了。

尽管他做了那些事情却依然胆小如鼠。那之后的徐州战役时,在攻打宿县的战斗中,他只是受了点皮肉擦伤便吓得动弹不得了。从那时起,他又得到“软骨头”这个绰号。

一等兵松浦的运气真好,回到国内后,再也没有被招到前线,在地方迎来了战争结束。与我同年的士兵中大多数都阵亡了,他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三年前的“战友会”上,我与他再度重逢,算来有四十多年没见了。现在他一副文弱且怡然悠闲的样子,简直就是个好好先生。无法想像他在南京做过的那些事情。

不仅他如此,其他人也是这样。在战场上犯下罪行的人当中没有几个是坏人。是战争使他们变得残忍。

一等兵松浦便是那类人的代表。他在战场上的另一面就连与他共

同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也并不知道。只有与他一起战斗过的人们才知道他的两重性。也正是这些人才真正了解“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

向中国投降的士兵

在前一本《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中对一等兵铃木有过大约十行字的描述。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特殊事例,提出予以详述的要求。于是我决定把他作为日本军队中的一个特例加以特别描述。

我们那时与现在不同,升学率很低,军队中大学毕业生很少。一等兵铃木便是一个拥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然而同样是大学毕业,有些人甚至是中专毕业都通过了后备干部申请,成了少尉军官,而他却只是一等兵而已。

无论在头脑或学问方面,中队中没有人能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之所以他仍然是一等兵,按当时的说法,他是个“红色分子”。

根据当时的国情,人们把具有“红色”思想的人视为思想危险分子,对他们怀有戒心。

晋升慢的士兵不只他一个,但他很特殊,属于那种“君之代一等兵”(熬千年万年都得不到提升的兵)。这类人除非战死沙场,否则无法成为上等兵。

一等兵铃木是被动员参军的,在编制上属于我的部下。他入伍早我五年,无论是学问还是人品都令我可望不可及。对于我来说他是一个包袱。

仅仅如此也就罢了,可他是个思想危险分子。他的言行一旦不慎就会惹恼宪兵队。如果这只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就罢了,然而追究责任时,不仅分队长,就连中队长也要受到牵连。这让我们非常担心。

一等兵铃木成为我的部下后,我就一直祈祷不要发生宪兵队介入一类的事件。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徐州战役都安然无事。但是就在打完徐州战役归来后,在南京城外驻扎了一个月左右时,发生了一件导致宪兵队介入的事。

那天我值勤归来,一到中队便被叫到了人事科准尉那里,准尉见了

我说道：“铃木那家伙被宪兵队抓去了。我还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似乎不是什么大事。刚才宪兵队联系我们，要我们派一名负责人去把人领回来。我知道你这时很累了，但不好意思，还要麻烦你跑一趟。”

一听到“被宪兵队抓去了”这句话我心中就紧张。一等兵铃木虽然是思想上需要提醒的人，但他为人诚实，不可能做什么坏事。那么如果被宪兵队抓去的话，问题就不可能出在思想以外的方面。

虽然准尉说“似乎不是什么大事”，但我看出来，本来应该是他去的，但他怕了，于是就叫我去。

我只好去了。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宪兵队，听管事的人说明情况，这才放心。

原来事情并非我所担心的那样。据一位负责此事的宪兵队上等兵说，一等兵铃木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与其他队的上等兵发生口角，结果把人打伤了。正巧路过的一名宪兵警告他注意，而他却态度蛮横，于是便被抓了。因他的行为构不成犯罪，因此当天就交给负责人带回来了。

那宪兵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等兵铃木的身世，恶狠狠地说：“一个大学毕业生当这么多年一等兵，看你的样子我便猜到你是怎么回事。今天这事就不追究了，下次再让我碰到决不饶你！给我好好记着！”训斥了一番后，便把他放了。

这件事总算是解决了。虽然有些地方我也想不通，但一想到没事就谢天谢地了，于是谢了那宪兵，把人领了出来。可他本人却并不服。

“简直是蛮横不讲理，这就是军队的做事风格。吵架应该双方都受惩罚，如果说对方受了伤，我也同样受了伤。再说，是对方先出手的。明明是对方有错，凭什么不把他抓来？”一等兵铃木说着说着就发起怒来。听他这么一说，我觉得他生气也是有道理的。

其他士兵们对一等兵铃木的“左”倾思想敬而远之，没有人与他接近，因此他总是独来独往。那天他也是一个人在街上，中途去酒馆喝了瓶啤酒。所谓的酩酊大醉就是指喝了那瓶啤酒。

之后，他去慰安所玩了一圈想要归队，走到街上听到有喧闹声，好多群众聚在一堆。他凑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当地人和一个日本兵在争吵。看来，那当地人是个人力车夫，日本兵坐完他的车之后想不给钱就跑，那

车夫正跟日本兵讨车钱。

人力车夫是个上了年纪的人。拉着日本兵跑了相当远的路，身上的衣服都被汗湿透了。

那个想白坐车的是名上等兵。车夫向他讨辛苦拉车的车费，而他却骂车夫：“滚你的！”想让车夫住口。但那车夫仍追着讨钱，日本兵便又打又踢地动起了拳脚。

一等兵铃木看到这里无法视而不见，便插到了两人中间。他对上等兵说：“你不可以白坐，把车钱给他。这样多丢人，快别这样了。”上等兵发怒了，他怎能容忍被比自己地位低的一等兵管自己呢。就说：“妈的，别多管闲事，不过是个一等兵，敢管我？”他边骂边冲过来打。

铃木被他打中几拳，也火了。于是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当然他还击了对方几拳，上等兵的鼻子流血了——这就是构成了所谓的铃木动手伤人事件。

就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时，突然发现宪兵站在那里。虽然向那宪兵陈述了事情原委，但宪兵并没有判明谁是谁非。当时是把辨明是非的行为一律当作反抗性态度看待的。

宪兵只把一等兵铃木一人带走了。理由与谁对谁错无关，仅仅因为一个一等兵去与上等兵打架就是以下犯上。还有一点，同情中国人就是不对的。

以上就是一等兵铃木为何不服气的原因。按常理来说，他生气是很自然的事情。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劝他息怒。事情总算过去了。

这件事过去半个月左右又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天一等兵铃木仍是一个人外出，傍晚回来时特别兴奋。傍晚点名之后，他便提着从外边弄来的酒走进了我的屋子，坐下来：“今晚陪陪我吧。”看样子像要久坐。

他在屋子中间坐定便自斟自饮起来。一边喝一边带着怀念的口吻，讲述起他学生时代的故事。我不会喝酒，不能陪他共饮，同时他也不是好的聊天对象，因此我能做的事就是听。

据他讲，他学生时代崇拜马克思主义，发起过运动，成为一名斗士。

从那时开始便经常被警察跟踪。

后来通过兵检,参了军,在苏满^①边境的独立守备队服役两年。以他的条件派他去条件恶劣的北满洲留守部队,其实是一种惩罚。这样,整个服役期间他都被贴上了思想危险分子要特别注意的标签,处于宪兵队的监控之下。

其他大学毕业生只用一年时间便通过后备干部审查,退伍成为见习军官。而他用了两年时间,却以一等兵的身份退役。他并非对军队的军衔恋恋不舍,但是一等兵是他能得到的最高军衔,肩上的星从此再也无法增加。

他退役回到地方便上了警察的黑名单,被跟踪监视。这次征兵通知一到便被抓了起来从拘留所直接征召入伍。他的语气变得犀利起来,开始批评国家的战争政策。我不知如何应对。我与他虽然都是当兵的,然而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不管怎样都无法合拍。即使这样,他一个人也讲了两个小时左右。要离开时,他对我这样说道:

“分队长,我所说的话你可能现在还不能理解,可是请你牢记:这是一场侵略战争,分队长和我都成了这场侵略战争的帮凶。不要在这种战争中丧失生命。分队长你还年轻,未来的路还很长,一定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活着回到祖国。我所说的话到那时你便会明白的。”

他反复说了几遍,才扬长而去。

当时,我以为这是他反战言论的老调重弹而已,到了第二天,我才知道不对了。

第二天点名时,一等兵铃木不见了。我们分头去寻找,却不知他的下落。这时我才明白,头天晚上他的举动的意义,估计那天他外出归来之所以很兴奋,肯定是因为他与中共方面的工作人员接了头,制定了脱逃日本军队的计划。昨晚他来到我屋里是为了告别。

整理他留下的物品时发现了一张便笺,上面潦草地这样写着:“给分队长添了麻烦,实在并非本意,但我已决意脱离日本军队。我是日本军国主义不能容忍的人,再也无法参与这种战争。从今以后我要为中共方

① 即中国东北与苏联的边界。

面工作了。希望分队长把这件事埋在心里,并且请不要来找我。衷心希望你能珍惜生命,平安回国。”

一等兵铃木终究还是与这个他无法追随的日本国断绝了关系,脱离了日本民众,投奔了中共。

在我看来,对于一等兵铃木来说这是最好的办法。我把自己的意见向中队长详细阐明,希望让他这样跑掉算了。

中队长也怕因自己队伍中出现思想上的逃兵而背黑锅,于是便给他定了个“意外事故死亡”,便不了了之。从此一等兵铃木的名字便从中队名册中被抹去。“铃木贤太郎”这个名字也从日本国籍中永远消失了。

不知那以后他怎样了,我想他应该从日本军的视线里消失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中国人的谰言引起的屠杀

想要将众多说法归纳成一个“南京屠杀”的原因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让我一个一个地说,倒是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中国的谰言造成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陷害他人以求自保的人。因此当时也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一群狡猾的家伙,上海战役时他们抱臂旁观,南京战役开始后便蠢蠢欲动。南京一陷落他们便与日本军联手,出卖同胞,保全自己。有很多无辜民众因此被杀害。

好些军队被他们说服,出去讨伐村子,杀害当地居民。我所属的大岳队也遇到过这样的事。

那是占领南京的两天后,也就是12月15日的事。那天一早,大岳队驻扎的村子里来了两个军人和一个中国人打扮的男子。两个身着军装的人,看他们的黑领章知道他们是宪兵,而那个中国人打扮的男子则是一个真正的当地人。访者的来意是,为了袭击抗日情绪很强的村子,需要兵力,因此特来向大岳队求援。

据宪兵说,离我们所在地东北方向大约十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子,抗日情绪很强。因地形很利于残兵逃跑,因此有很多残兵从那里逃脱了。

这个中国男子潜入村子调查了一番发现,昨天夜里有很多看似南京政府要员身份的人秘密潜入了这个村子。于是他们打算趁那些政府要员还没离开之际讨伐和烧毁村子,连同村民一举消灭。

一起来的中国人看到南京沦陷,本国处于劣势,便迅速投靠了日本军,与宪兵队结好。为了表示忠诚,便来出卖同胞。以南京陷落为转机,背叛中国投靠日本军的人多了起来。那个男子便是其中一个。

据那投靠者的详细描述,昨天夜里监视村子时发现,后半夜时有五个看似非同寻常的人物进入了村子。据他分析,可能是南京政府身居高位的官员。他让同伴继续监视村子。他说到了夜里潜入的人会溜走,想在天黑之前端掉他们。

宪兵接受了这个方案,他们选择了午饭时间——村民们白天中最放松警惕的时刻——作为袭击时间。

这个村子从地图上看,村子中央是一条大街,沿街两侧民房密布,周围用高两米的土墙围住,南北两头各有一门。从地形和村子的情况上判断,如果行动人数太多,反而有可能被发现。因此决定我和丹羽两个分队的人员来执行任务。

我们火速商定了袭击计划。宪兵的计划是,让两个分队分别潜伏在南北门外的旱地里,等待时机。同时让那中国人的同伴进村四处放火烧村。然后在外面等待时机的分队向逃出来的村民们开枪射击,将他们全部杀死。

仅仅为了几个政府要员就杀害一百来个村民,这实在是残忍至极。如果说村民们帮助残兵逃走的话,那是因为残兵是他们本国的军队。即便藏匿了政府要员也不至于犯下死罪。

用正常思维来思考,杀害无辜民众的行为属于不正当行为。但那时,我意识不到这一点。也许是打赢了南京战役后的那种胜利氛围使然吧。感觉好像是那种攻城劫掠后的杀戮气氛使得我们这样做的。加之,如果退缩的话,就会让“身经百战的勇士”这一称号蒙耻,所以谁都不甘落后。

为了不被村民们发现,我们两三人一组,分散接近目的地。我去的是北门。称它为门其实只不过是个名称而已,它是在土墙上开了一个街

道那么宽的口子,好像是施工一半没有砌好一样。土墙内既没有瞭望楼,也没有放哨的人。

走近门口一看,上面贴着一张纸写道:“此处村民皆为良民,给予保护。大日本帝国南京占领军司令官。”

虽然署名为南京占领军司令官,很可能是在此路过的小部队的中尉或大尉写的东西。

但是对于此地村民来说,这是最值得信赖的护身符。他们深信只要贴上这张纸,日本军就不会来闹事。一想到如此深信不疑的村民们几十分钟后便会有大麻烦,要死在枪口之下,我心底产生了罪恶感。但是已经无法后退了。我们把轻机关枪瞄准北门入口处,等待着放火。

表刚过 11 时 30 分,村子里有两三处地方冒起了白烟,开始放火了。眼看着冒白烟地方的数量不断增加,烟也开始发黄,火开始熊熊燃烧起来。

村民们惊慌地夺门而逃,看见着了大火,便逃出村门外。因为是午饭时间突然着了大火,有人惊慌得手里拿着碗筷就跑了出来。也有人不舍得饭锅,把锅一同抱了出来。

接着就是我们登场了。我的任务就是射杀这些人。有那么一瞬间我感到他们很可怜,但一看到潮涌般的人群一起涌出门外时,便容不得我犹豫了。我鼓足勇气,大声号令:“射击!”

除了发此号令外,我还能干什么呢? 机关枪响了,他们离我们只有五十米左右,夺门而逃的村民们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地。有人慌忙往回跑,又被熊熊火势挡住了去路。在路上东窜西跑一阵后也倒下了。

就这样短短的五分钟,周围已经一片死寂,可想而知南门也是如此。这么短暂的射击,就让这个村子的人全死光了。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村民,根据村子的规模来算,可能不会少于 100 人。

这是令人讨厌的任务,至此我们的任务也结束了。停止射击后,我们在门外集合休息期间,宪兵和那投靠过来的中国人开始检查尸体。

他们想要找到南京政府要员的尸体,但在村口附近散乱的尸体中没有找到。村子里的尸体都被大火烧焦,无法识别,他们找了一个小时,结果无获而终。

此时我开始怀疑是否真的有什么南京政府要员。重新观察那个投靠过来的中国人言行,愈发感到他很奸诈。我猜想是这个中国人为了向日军表白忠心才捏造了此事。就算是找不到尸体,他也可以说是烧焦了无法辨认。

我觉得宪兵、中队长及出动的部队都被策划这场屠杀的中国男子耍了。不过我们只是辛苦一趟,劳而无获而已,那些被杀的村民们却永远无法复活了。真是一场灾难。

我这样想着再去看那些尸体时,只觉得景象格外凄惨。路上成堆的尸体大多数都是老人、女人和小孩。他们满身是血,惨不忍睹。

这也是“南京屠杀”的一个部分,却是由汉奸造成的。也反映了一个侧面。

正义派伍长的堕落

南京入城仪式结束后,刚稳定下来,很快我所在的大岳队又接到了前往江阴驻扎的命令。江阴是位于南京长江下游的一座县城。

12月20日,我们离开南京,于同月31日抵达江阴。如果在国内,今天正好是大年三十。但是,在战地则没有什么岁末年初之分。即使这样,第二天,我们还是迎来了昭和13年的新年。甚至觉得连心情也焕然一新了。

在江阴我们度过了三个多月平稳的营地生活,心境又恢复成常人了。

记得刚刚占领南京时,我曾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那是一张极其凶恶的脸)。那张脸当时让我感到很厌恶。

四个多月前,我们离开祖国出征时,双颊是胖嘟嘟的。而如今颧骨凸出,脸像刀削似的。曾经自认为漂亮清纯的眼睛,如今也变得像野兽一样锐利。虽说是自己的脸,可怎么看都令人讨厌。

外貌改变了,实际上的确有过使外貌改变的经历。我曾经是那么谨小慎微,连虫子都不愿弄死。现在竟然敢杀人。我们像强盗一样闯人民宅,抢夺居民作为粮食的谷物和家畜。一旦发现年轻女子,立刻强暴奸

污。要做这种事,温柔的面相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因此变得凶神恶煞也就理所当然了。

这张连自己都厌恶的充满杀气的脸,在江阴安顿下来后,又逐渐变得柔和起来。

从南京沿长江而下,两岸都是山。江阴就位于两岸之间江面最窄处的南岸。在可以俯瞰江面的山上,建造了炮台,以抵御从水路进攻的敌人。

因为没有进行大的交战,江阴就被我们占领了,所以大街小巷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居民们对军队的敌意也不强烈。在这座县城里,我们以一种悠闲的心境过着安定的生活。这种生活使我们残暴的心肠变得温柔了,面相也变得柔和了。

但我们是第一线主力军,不可能一直享受这种安宁的生活。

进入4月后,为了开赴徐州作战,我们又回到了南京。

我们落脚在一所位于南京城内的中国军官学校的校舍里。过了两三天,来自国内的补充兵员也抵达了。自上海开战以来,每一次有兵员损耗,就有补充人员到来。虽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在这次的补充人员中,来了一位我想念的人,他就是我在国内时的战友伊藤伍长。

他比我晚一年入伍,是个应征入伍兵。他作为新兵来到营地成了我的战友。他是个诚实过头的耿直的人,做事人前人后一样,我喜欢他这一点,所以平时特别关照他。

当时,他虽然是少数具有大学学历的人,但是缺乏积极性这一点成了他的祸根。所以伙伴中有好几个人都考上了甲类干部候补生,成了见习军官,但是他却没能当上。

即使这样,他还是成了一位乙类干部候补生的伍长。在国内,我们还是战友时,我是上等兵,他是最低的二等兵,而现在他的军衔在我之上。但是,伊藤伍长没有忘记当新兵时我所给予他的关照。到了南京,定下了所在联队,工作暂告一个段落后,他就立刻来看我了。

伊藤伍长面对已是下级的我,军靴后跟“哐”地一声并拢,以一个立正姿势,用如当年当新兵时的语气向我报到:“补充兵伊藤伍长到达此

地,现被分配在第六中队,特此向您禀报。”

那天才见面没一会儿,他就因为工作忙而匆匆离去了。回去前与我约定道:“以后我好好去看你。”但是伊藤伍长所属的第六中队驻扎在一个远离我们大队的地方,所以还没等到再次见面,我们就从南京开拔向徐州开进了。

我们大岳队于4月21日离开南京,赴徐州作战。那天我们乘坐机动船,从下关码头渡江来到了对岸浦口。浦口是徐州作战的基地,那里驻扎着先期到达的官兵。在那里我偶然遇见了伊藤伍长。伊藤伍长所属的第六中队比我们大岳队先期完成了渡河任务,正在集结待命。这次见面,我们俩互相谈了分别以来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一直谈到他要出发的时候。离别之际,他说:“我不知道攻打南京城时的情况。但听士兵们说,好像干了可怕的事情,是吧?这次为徐州作战而进行了队伍编组,我受命担任分队长。虽然我初次上战场,有些碎嘴,但我还是告诫我的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决不允许发生类似攻打南京时的事情。战斗中要牢牢记住,不能给将正义作为座右铭的皇军丢脸。”

听伍长说出这样一番话,我不禁怜悯起伍长。因为不像军人的伍长,部下都是些自上海开战以来身经百战的士兵。要带领他们作战是很困难的。不管伍长多么有正义感,战场可是无情的。刚上战场时,我也抱有和伍长同样的想法。看来伍长注定要走与我相同的道路了。我想,当徐州战役结束后,我们再相见时,他一定也会变得满脸杀气吧!

这次分别后,我们各自从不同的路线向徐州进发。在以后的半个多月里,我们没能见面。

向着徐州,向着徐州,人和马向着徐州攻击……

就像歌里的歌词似的,从南京周围出发的各支部队如同汹涌的怒涛向着徐州涌去。

留在我记忆中的徐州作战,是一场为暑热和困倦所困扰的战斗。虽说最初阶段还没达到炎热的程度。但是一进入6月份,白天气温骤然上升。随着深入内地,大陆气温便成了酷暑。

在酷暑中行军的将士们,起初是汗湿的军衣从未干过。不一会儿,就变成脱水状态了。军衣上只剩斑斑盐迹。擦一下脸,脸上也因有盐渍

而感到沙沙的。

对这样的炎热天气,将士们夸张地形容说:“正飞着的麻雀都会被烤焦了掉下来。”

进入酷暑天气后,部队行动就全部转入夜间。虽然白天我们也休息,但通宵行军还是令人犯困,我们几乎是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下往前走。各队为了不出现掉队者,大家就用绳子一个连一个地系成一串走。所以,有时候一个人摔倒在地,全体都会跟着摔倒。

炎热不仅煎熬着日本军队,同样也折磨着中国军队。我们采取夜间行动后,中国军队也同样采取了夜间行动。所以,经常出现中日两国士兵并排行走一个晚上而互相不知情的情况。待到天亮,双方一照面,才发现敌人就在眼前,吃惊之余,慌忙交战。

尽管被炎热和困倦折磨着,在作战期间还是常发生强征强抢、强奸妇女的事情,在此次战斗中同样也有。而且,由于徐州战役是一个包围战,居民们无法外逃避难,所以这种事就格外得多。

下面这件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在从大营集到南平镇的行军途中发生的。

那天夜里,我们照例是通宵行军。清晨,我们到了一个在这一带算是比较大的村落。于是,这个村落就成了我们当天的宿营地。

我用困倦的眼睛环视了一下村落,只见一条宽大的河渠夹在村落中央,河岸上密布着五六十户民宅。很多先期到达这里的士兵正在村落里到处乱窜。

观察了这些人的行为后我感觉到村落里有女人。虽然没能见到女性的身影,但是在历经了多次这种事后,我早已有了一种动物般的直觉。

宿营之后,我在村落里溜达了一圈,果不出所料,村子里留有未来得及外逃的村民,其中夹杂着年轻女性。先期到达的士兵们忘记了困倦,精神十足地在村落里乱窜,这些年轻女性就是他们的猎物。

在村落里转了一圈后,我发现很多士兵们聚集在一个看上去是寺院的大房子前面的广场上,我向其中一位士兵一打听,他满脸得意地告诉我说:“这里面藏着很多花姑娘,大家都在里面轮流玩着呢!”

我和他们一样也是一个无耻之徒,所以一听这话,惯常的战场心理

又蠢蠢欲动起来：我可不能白白错失这个机会。于是，我走进了寺院，看到在放牌位的殿堂的一个角落里，女人们互相挤在一起。就在我眼前的大厅里，有好几个姑娘正在被士兵奸污。虽然这种事在战场上是司空见惯的，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当我适应了室内昏暗的光线，眼睛落在了一位士兵身上时，我大吃了一惊。

因为那位士兵竟然是伊藤伍长。更让我吃惊不已的是，伍长脱下了裤子，正骑在一位姑娘身上。“战斗中要牢记不要给以正义为座右铭的皇军丢脸！”出发前夕这样告诫部下的伍长，在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干出了这种有悖人伦的事。

曾经是那么正派的一个人，也许正是因为他性格软弱，一旦卷入战争这个巨大魔力中，抵抗力才会丧失殆尽吧！

虽然不能断言在那种场合下谁都会那么做，但是我注意到当时像伍长这样正派的人迅速堕落的事例是很多的。面对此情此景，我也视而不见了。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相逢。伊藤伍长后来在宿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战死了。

那以后，我从第六中队的士兵那里听说，伍长一直悔恨到临终。因为痛恨自己的堕落，所以在战斗中表现得异乎寻常的勇敢。伍长无疑是战死的，但据说那是一种自杀式的战死。在有劣迹的士兵中，也有像他这样战死的人。

战死的官兵的故事

在原先写的书中，我曾在“天皇陛下万岁”一章里写道：军国主义为了将战死沙场渲染成是一种更壮丽崇高的行为，因而编造出了战场上将士临死之际高呼天皇陛下万岁后咽气的故事。结果，我收到了很多忠告信。内容都是说他们当然赞同我的意见，但是时至今日就不要再写这种事了。

对于这些劝告，我虽然丝毫没有抵制或挑战之意，但是在这本书里，我还是想讲述一件类似的事情。

我十分理解那些说时至今日就不要再写这种事的人们的心情。他

们认为将士们的死是神圣的,不愿让活着的人们再去惊扰他们。但如果就此罢了的话,那些战死的将士们就无法恢复作为一个人的本来面貌。军国主义的形骸还将继续压在我们这个已成为民主主义现代国家的背上。在言论自由的今天,人们的心声将继续被封锁着。

虽然说出真相是残酷的,但是,既然从战前到战争期间,凡人形貌的天皇一直被尊为神,战后则被降为凡人天皇。我们也应该把战死将士们的那颗普通人的心返还给他们。

这样做,也许会被和平时代的凡人天皇陛下所怪罪。但我还是认为,比起编造出那种臣民在临死之际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故事来,在缅怀所爱之人时,诚实地将一切坦白出来更能让天皇之御心得到安宁吧。

在战争中,被奉为烈士家属的人们,现在没有得到战时那种优待。军国主义是否应该把从将士们那里夺走的那颗普通人的心还给他们的家属呢?

在战场上,我见闻了很多与此有关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一等兵野泽君的故事。

一等兵野泽君是我的部下,但是年龄长我8岁。因为初次见面时觉得他不像一个军人,所以我就客气地称呼他为“野泽君”。

据说野泽君在老家时的职业是一名警官。在那个年代,警官中耀武扬威的人很多,被人称为是“喂,喂警察”。但是,野泽君却是一个为人谦和忠厚的人,根本看不出来曾经当过警官。

野泽君有一位漂亮妻子,据说曾经是酒吧招待。野泽君是在派出所工作时与她相识并相爱而结成夫妇的。但是,在当时的国情下,一位警官与一位招待女郎结为夫妇可是一件轰动的事。

当然障碍是有的。首先是受到顾忌社会舆论的父母和亲戚们的强烈反对,其次是上司们反对。但是,他俩力排众议,顶住压力,过起了同居生活,形成了事实婚姻。即便这样,他俩的爱情依然未被承认。在同居期间,他们的孩子出世了,但是仍然没有被允许入籍。他曾经对我说过,他们是一对不合法的夫妇。

野泽君一谈到妻子,顿时神采飞扬起来。他如此爱恋着妻子。可见他的妻子不仅容貌秀美,一定还充满着激情。

我们出征那天,在送别出征队伍的人群中,我第一次看到了野泽君的妻子。当时她正在与野泽君依依惜别。为了不被从野泽君身边挤开,只见她用姣好苗条的身体奋力挤开混乱的人流。她那身影透出一种顽强。她顾不得害羞和体面,紧紧抱着野泽君不让他离开,野泽君也同样紧紧地抱着她。由于不一会儿他们的身影就被人流淹没了,所以之后发生的事情,我就无法看到了。但是,与妻子告别后上车时的野泽君还泪水涟涟的。

当时我觉得,一个奔赴战场的军人举止像个女人一样是可耻的,所以看见野泽君流泪,一点儿也不同情他。当时我很瞧不起他,心里思忖着(如果命中注定野泽君要战死的话,他决不会高呼天皇陛下万岁的,他心中一定只想着太太)。

但是,在奔赴前线的途中,随着对野泽君思想的了解,我对他的看法也慢慢变了。

“你可以讥讽我是一个不忠之臣,也可以嘲笑我是胆小鬼,但我绝不能死。如果我死了,我老婆和孩子会不幸的。无论如何我都要活着回去!”

“是的,你可不能死哟!不论什么情况,你都不能死,你一定要活着回去!”我这样附和野泽君说道。

到达前线后,野泽君尽量避免去危险多的地方。尽管如此小心,但人的命运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左右的。野泽君还是战死在上海郊外的杨行镇附近了。如果是在前沿阵地激烈交战中死去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却是在撤退到安全的后方时死的。

我所属的大岳队,自参战以来,一直在前沿阵地。所以在进攻杨行镇之前,暂时后撤休整。野泽君就是在那时出事的。

因为连续作战,我们已经五天没睡安稳觉了。所以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真是好久没有睡得这么香甜了。尽管日头高照,强烈的阳光让人睁不开眼睛,但我还在熟睡着。野泽君早就用饭盒煮好了饭。“快起来吃饭吧!喂,贪睡的家伙,该醒醒了,再不睁开眼睛的话,眼珠要睡烂了。”他在一旁唤我起床。

“我还想睡,想睡,人家睡得正香呢,你自己上了年纪睡不着,却吵人

家,真烦!”我一边这样说着一边起身。在野泽君扒拉着热乎乎的饭吃的时候,我忽然发觉野泽君身影很单薄。

我这个人对于吉凶之兆一向不感兴趣,根本不相信预感等等。但不知为什么,那天我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也许是要发生什么坏事的先兆吧!”我顿时觉得不安起来。“肯定是错觉,都是因为在战场上昏了头的缘故。”我一边努力驱赶这种担心,一边不知不觉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昏昏沉沉地才睡了一会儿,中国军队开始用迫击炮射击袭扰后方了。炮弹的呼啸声把我惊醒了。大炮的射程是两三百米远的后方。“我们的敌人朋友可真辛苦啊,每次打又打不中,却还这么起劲地打。”我们正开着玩笑,忽听有人大声喊道:“临时包扎所在射程内,有不少炮弹落在很近的地方。必须赶快转移伤员,否则就要遭殃了,请快帮帮我们!”后方来人向我们求援了。

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在炮弹落下的地点附近有一个临时包扎所。那里收容了很多无法独自行动的重伤员。如果那里被炮弹击中的话,好不容易收容来的伤员都会死去。

“我们去帮一把吧!”我这样招呼野泽君。如果是以往的话,野泽君一定会薄情地回答道:“不行!决不能去落炮弹的地方!我们要当心自己。负责伤员是卫生员的事!”

但这次我觉得野泽君似乎与以往不同,没等我再劝,他就与其他士兵一起向临时包扎所跑去。幸好,就在我们去的同时,敌人的炮轰也停止了,伤员们并没有大碍。

“哎呀,总算松了一口气。真是扰得人不得安生。”但就在野泽君一边抱怨着一边往回走时,重大情况已不是别人了,发生在了野泽君身上。

野泽君满身是血地死去了。原来在我走后,他为了以防不测,钻进了一棵大树下。没想到厄运降临,一枚偏离射程的流弹飞来,竟击中了他藏身的大树。炮弹爆炸,碎片击中他的头部,他当即身亡。

在战场这个地方,无情的炮弹常会干出这种坏事。

从现场的情形判断,野泽君待大家走后,拿出了太太的照片,正看得出神时,炮弹飞来了。他是手心里牢牢地攥着这张照片气绝身亡的。也许他什么都没有来得及想就当即身亡了。但是从他紧握照片这一点来

推测,在那瞬间,也许他想的是:即使死了,也不与你分离。

在这一刻,我才明白,被战争分离的夫妇之间,存在着一种任何权力都无法割断的爱情。

从那以后,又过了三年多,我们这些老兵在战地服役暂告一个段落,回到了国内。我们这次回国是奉天皇陛下的旨意,除了让我们这些长期在战地服务的将士们回国暂时休养,同时还负有繁衍生育下一代的使命。

那时候的年轻男子,除了手握钢枪奔赴战场之外,还有传宗接代的任务。我们做的事都是立竿见影的。

回国后不久的一天,我去给野泽君扫墓时,顺便拜访了他太太。一见面,他太太就直截了当地问道:“请您详细地告诉我,我丈夫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实情。”由于我没有思想准备,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作为一名战士,野泽君的死法并不壮丽。而且,如果告诉她实情:迫击炮弹击中了野泽君,他的头盖骨被打得粉碎,这未免太残酷了,反而更会增添她的悲伤。我思来想去,突然想到“谎言可对付一切”这句话。于是我用称赞的口吻说:“野泽君死得很英勇,是在冲锋时被飞来的迫击炮弹碎片击中倒下的。当时,虽然呼吸已极度困难,但他还是高呼了天皇陛下万岁之后死去的。他直到临终都不愧是我们军人的楷模。”

虽然我知道这样称赞野泽君并不会减轻他太太的悲伤,但我只想野泽君死得有点价值。

但在后来的交谈中,我发现他太太想从我这里探询的并不是我所编造的这些话,而是想确认临终前的丈夫对妻子的爱。

当时的我,因为年轻,无法揣摩处在野泽君夫妇那样境遇中的两颗相爱的心。

而且,我认为在军国主义当道的形势下,如果说出士兵野泽君临死之际手里握着太太的照片,那可是有损其荣誉的事,所以我最终没能说出口。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记挂着野泽君的太太,但是支那事变发展成了大东亚战争,我被再次应征入伍,所以一直都没有机会再去探望她。

从那之后又过去了四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了。与此同时,

军队解体。军国主义统治时代终于结束了！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自由地说出实情的时代到来了。

由于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里，为了生存不得不竭尽全力工作，所以没有多余的时间。战后十年过去了，我总算有时间上门寻访了。但是，当我寻访野泽君的太太时，她已不知搬往何处而去向不明了。

直到现在，这件事还萦绕在我的心底。

教堂里的残暴事件

事情发生在宜昌战斗接近尾声的时候。当时我们所属的部队进驻当阳附近，暂时停战休整。那之前我们一直在襄阳平原作战。

据说当阳是《三国志》中有名的美髯公关羽的出身地。在位于城中心的公园里有关羽墓。周围一带还有很多与《三国志》有关的历史古迹。如果要在进行历史方面的探讨研究的话，这里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但是，比起历史来，普通士兵更关心的是女色、食欲。一旦在当阳驻扎、进入战斗生活后，就又像以往那样开始强征强抢老百姓的财物。当然，我部也不例外。在暂时休战过了两三天后，我们班有位士兵招呼大家道：“我们去抓鱼吧！虽然地方有点远，但是在山谷中的水塘里有很多鱼，如果把堤掘开、把水放掉，就可以抓到很多鱼！去一个分队，人手不够，所以决定和第一班一块儿去抓。”

对此提议，我也没有异议。因为能吃上新鲜鱼，所以我是无条件地举双手赞同。但是，在向集合地走去时，我看到一等兵坂西也在，顿时感到很泄气。

一等兵坂西是个地痞，在他的左胳膊上刺有一个小小的桃子。

据说这是一个符咒，是为了效仿由桃子生出来的桃太郎而刺的，意思是希望成为像桃太郎一样强悍的男子汉。

因为有这么个纹身，所以士兵们都叫他“桃君”。

这个一等兵桃君是个才入伍不久的小流氓，是个不知天高地厚难对付的刺头。我想：和这样的家伙一块儿去准没好事。但又没有返回的理

由,只好勉勉强强地跟着去了。

我们的抓鱼行动出乎意料地顺利。水塘里的大鱼多得抓不完,我们满载而归。因为大家都急于想早点回去,所以返回时,我们抄了条近路。在归途中,我们路过一个有外国人居住的教堂。当时,一位牧师模样的人手里摇着一面小日章旗迎了出来。

虽然不知道他的国籍,但肯定是一个西方人。这些人敌我不分,中国军队在的时候,他就挂青天白日旗;而一旦日本军队攻打进来,他们就换上日章旗。

紧接着出来一位像是他妻子的女人。她用日语说道:“士兵弟兄们,请喝杯咖啡再走。”

一听语言相通,我们顿时起了兴致,决定喝杯咖啡,休息一会儿再走。

牧师夫妇看上去很喜欢与人交谈,他们夹杂着手势用日语向我们套近乎。他们说,因为在日本神户住过一年左右,所以会说那么一点日语。

在我们交谈了约十分钟左右时,里面的房门开了,走出来两位端着咖啡杯托盘的年轻女子。这两位女子虽然身穿朴素的修道服,但是姿容秀丽。像羚羊一样发育匀称的小腿,纤细苗条的身段显出优美迷人的曲线,有一种与国内女子完全不同的风韵。

士兵们顿时停止了和牧师夫妇的交谈,盯住生平第一次见到的两位外国女子的胴体,每个人眼里都闪现着好奇的目光,使劲咽着口水,注视着两位女子的一举一动,看出了神。

他们的目光很快变得淫秽起来,这是平日里那种视女人为猎物的目光。

可千万别发生什么难堪的事啊。我顿时担心起来。

我看了一眼我最担心的一等兵桃君。只见他的眼睛里燃烧着一种怪异的光,那是一种野兽般的疯狂目光。

再不离开,肯定要出可怕的事。我这样想道。于是,我急忙起身准备离开,但为时已晚。

“我们干嘛不大玩一把呢?你们不必担心,这里是战场,在这种地方出没的家伙肯定不是好人。”

一听这话,我知道我已经阻止不了这种事了。因为桃君可不是那种你劝他就轻易罢手的人。他不但不会罢手,反而会闹腾得更加厉害。“我可不像你们,被人一劝就点头哈腰地说:‘是,对不起。’我不是那种人!”对你的劝告,他肯定是大声怒斥你一通,然后照样一意孤行。

事已至此,我对制止桃君已经无能为力。其他士兵们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沉默是上策。因此,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

我们大家的这种态度,无形中默认了桃君的个人行动。

“喂,你这家伙,老子今天要狠狠地教训你一顿!”话音未落,桃君就扑向了牧师。真不愧是个地痞流氓,出手真快。

“你要干什么?上帝禁止暴力。你们不能动粗!”就在牧师抗议的同时,他的脸上已经接连挨了几拳,鼻子里流出了血。

牧师的抗议对已经大打出手的桃君来说,如同耳旁风。

“混蛋,什么‘阿门’、‘苏门’的,我可受不了在这个世上有什么上帝!比起你的上帝的仁慈,老子我更想要的是与女人一起的极乐世界。”

桃君频频出拳,仅一会儿工夫,牧师就被打翻在地。别说反抗了,就连谴责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暴行,端着茶碗走来的两位姑娘吓得花容失色。“哎呀!”她们发出了一声惊叫,哗啦一声,将手中的托盘和茶碗全扔落在地,人也瘫软在地。

牧师夫人本想逃进屋,但好像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傻了,双脚动弹不得,呆立在那里。

说时迟那时快,桃君已像猛兽一般扑向了一位姑娘。这如同一个信号,顿时其他士兵也纷纷仿效桃君,争先恐后地向另一位姑娘和牧师夫人扑去。一场暴乱由此酿成。

“终于闯下大祸了。”我脑子里只有这一个念头,别无其他制止办法。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置才好呢?我想不出合适的办法。此时,开始施暴的桃君等人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为所欲为。我决定在一旁等待他们自动停下来。

但是,当我在一旁注视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时,蓦然想到:对方是外国人。这件事若败露出去,势必酿成严重事件。这可是牵涉到国际关系

的大问题,是会被提交军事审判会议的。想到事情的严重性,我脸都吓白了。

直到此刻,我还是一个能够靠理性克制自己的人。

但是,就在我心里七上八下担心着眼前发生的事情时,一个邪恶的念头慢慢地占据了我的大脑:“万一事情败露了,我即使说我没下手,恐怕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这样,自己若不玩一把岂不是吃亏了吗?若是横竖推卸不了罪责的话,我干脆也入伙算了!事已至此,就破罐子破摔吧!”

一旦拿定主意,我就完全丧失了分辨力,丧失了理智。虽然自己的身份是一个负有责任的指挥官,但是此时此刻我却已经在心里开始琢磨:玩哪个女人好呢?

不到一个小时,一切都结束了。当周围的骚乱平息下来后,我一下又恢复了理智。“恐怕牧师不会就此善罢甘休吧。他肯定会向驻扎在这附近的部队长官上诉告状的。这样一来,宪兵队就会着手调查此事,我们就会受到严惩。”我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

想到事件的严重性,我不由得全身发抖。正当我在反省所犯罪行的严重性和可怕性时,挑起此事的主犯一等兵桃君,却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甚至脸上还浮现出一丝有恃无恐的笑容。他见我担心得脸色煞白,就说道:“用不着多担心,只要不留下证据就没事。我们把这几个人连同这房子一起烧成灰烬,不就可以了么?怎么样,是个好主意吧?”

一等兵桃君想要干的事情是件令人发指的事情。牧师夫妇及修女们一番好意请我们喝咖啡,结果却遭到了我们的暴行,现在我们为了掩盖罪行,消灭罪证,又要将他们连人带房一起活活烧死,这哪是人干的事情。

但是,我无法阻止。我明知这是在犯罪,但是想到只有这样做自己才能得救,所以拒绝不了。

一等兵桃君指挥着士兵们把牧师等人关进了一个房间,然后纵火焚烧。

我在旁边像个傻子一样木然地看着这一切。我知道我是一个没有骨气的窝囊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除了这样做没有其他选择。

少尉军医干出的残暴事情

榊原军医所干出的残暴事情,在性质上虽然与“南京屠杀”不同。但是,因为此事是在攻打南京的战役期间发生的,所以,我想在这里说一说。

虽说战场上发生的事有各种各样,但这件事也算得上是一件典型事例。

少尉在入伍前是一位小儿科、妇产科的开业医生。据说是因这次事变(八一三事变)而被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军医的。

“我们堂堂的皇军勇士竟然沦落到让一位妇产科医生来给我们看病!难道没有更适合我们野战部队的医生了吗?”

“妇产科医生会治疗枪伤吗?”

士兵们这样抱怨道。

但毕竟是医生,总能起点作用吧。没想到少尉真不是个做军医的料,他胆小如鼠,一看到从前线下来的伤兵身上的血,就吓得根本做不了手术。

如果仅此而已的话倒也罢了。不知是否是为了逃避恐惧,他竟然酗酒。常常暴饮白酒,喝得酩酊大醉。

“身为军医却是一个如此荒唐的家伙。如果要指望他来救治伤员的话,原本可以得救的人都会死掉的。”

士兵们愤怒地说道。

在向南京进攻的途中,我所属的大岳队与榊原军医少尉为队长的卫生队偶然相遇。

过了句容,往前走了没多远,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我们无法再继续前进。因此正在行进中的大岳队退到第二线,进入了一个村落,休整待命。由榊原带队的卫生队也来到了这个村落,并在此设立了一个临时包扎所。

卫生队包括榊原军医少尉在内,少尉军衔以下的人员大约三十多人。

在这个全部是男性的卫生队中,仅有一名女性,是一名中国女子。据一名卫生员说:在离开上海不久,他们发现了这位被众多士兵强奸后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女子,少尉救了她。从那以后,这位女子就一直与卫生队同行,照顾着少尉的日常生活。

不过,当初少尉救人的本意并不是为了女子的肉体,而是可怜这位受战争摧残的女子,只是想保护她,把她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但是,在同行的过程中,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少尉与这位女子发生了肉体关系,如同战地夫妻一般。少尉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这一点在卫生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如果事情仅是这样,那倒也平安无事了。但是,同一卫生队的原田中士却用暴力强奸了这名女子,从少尉手中夺走了她。

因为榊原少尉柔弱寡断靠不住,所以原田中士掌管卫生队的一切,是卫生队的实力派人物。发生了这种事,榊原少尉真是打碎牙齿往肚里咽,不敢说。于是这位女子便成了两位男人共用的女人。

因为少尉真心爱这位女子,这一来让少尉妒火中烧,整个人完全变了,变得疯狂暴躁。而且,当他得知这位女子怀孕后,嫉妒之心就更加强烈了。

实际上,女子的怀孕与少尉和中士都没有任何关系,是在这之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少尉却把这件事与中士的事扯在了一起,只要一喝醉酒,就要酒疯,对女子拳打脚踢。有时候竟然拔出军刀胡闹,甚至发生过刺伤女子的事情,幸好伤势都不重。

在那段时间里,少尉喝醉酒胡闹的次数越来越多。如果对此置之不理的话,就会危及女子的生命,因此卫生员们都很担忧,大家商量让女子逃走。可是,因为此事还与中士有关,所以实施起来并不容易。以上事情的原委经过都是我从卫生员们那里听来的。

就在榊原卫生队设立临时包扎所的当天下午,卫生员们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那天,前线发生了激战,运送来了三十多名重伤员。

虽然我是多此一举,但为了证实一下少尉究竟是不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胆小,我去了临时包扎所。

临时包扎所里因一下子送来了这么多急需救治的伤员而显得忙乱

紧张,卫生员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我找到了少尉,正如传闻的那样,他喝得烂醉如泥。

“真是岂有此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竟然喝得酩酊大醉,简直荒唐透顶!这哪像一个对将士们生命负有责任的军医官!”我怒不可遏,不分青红皂白地冲着身边的卫生员伍长骂道。

“实在对不起,队长的那份活儿,我们多干点就可以了,请您原谅他。”下士惶恐不安地道歉。

接着他又补充说:“因为我们队长特别胆小,每次伤员一到,他总是这样,他是在用酒来麻痹自己的恐惧心理。队长平时可是个好好先生,可一喝醉酒,就拿他没办法了。因此,我们总是提心吊胆,怕他做出什么荒唐事来。”

想到下士还要帮着干少尉的那份活儿,我挺同情下士的。可因为依然难消心中怒气,走来走去地想着找个地方出气,结果来到外面。只见包扎所外面排满了运送伤员的担架,有的上面还躺着等待治疗的伤员。他们都只在负伤时做了一下应急止血而已。有一些是刻不容缓急需救治的重伤员。初期治疗关系到伤员生死。可是负有救治责任的军医官竟然喝醉了!虽说你胆子小,这也决不能原谅。

“你还是个军医官吗?”我大声怒斥道。真想扑上去揍他一顿。可是,即使揍他一顿又能怎样呢?我强按心中怒气,没有发作。

如果那天仅此而已倒也罢了,可是没想到,当救治伤员的工作刚告一段落时,伍长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在众人忙着救治伤员时,躲在一旁的少尉见救治工作已告一段落,竟突然变得强硬起来。因为仗着酒性,所以显得格外强悍。

每当他这样,卫生员们都懒得理他。原田中士对这位喝得醉醺醺的对手也是惟恐避之不及的,早就远远地躲开了。

少尉见无人搭理他,愈发暴躁起来。只见他瞪着醉红的双眼,目光凶狠,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拿到什么摔什么,脚踢到什么就踩什么,一通乱砸猛踩,简直没治。即便这样,大家还当作没看见。

“你们这帮家伙,竟敢不把我这个队长放在眼里!所以现在连女人也瞧不起我。我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要搞清楚她怀的孩子是谁的种!把

那个荡妇给我带到这里来!”

他开始胡言乱语。

就在这个时候,不知有什么急事,那位女子恰好走了进来。她并不知道少尉在这里。

“不能来这里,赶快逃走。”就在我为她捏把汗的时候,少尉向她扑了过去。尽管他喝醉了,但出手极快。

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女子吓得惊惶失措。还没等她明白过来,少尉已经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强行拖上了诊断床,并把她仰面朝天按在了床上。

女子还没有来得及反抗,卫生员们还没有来得及阻止,女子已经成了砧板上待杀的鱼。

“接下来他会干什么?”我担心着女子的命运,无法就这样一走了之。

少尉把女子的身体固定在床上,对着卫生员们喊了一通疯话:“喂!你们这些小子们(指卫生员们),为了让你们长点学问,现在给我好好看着,我要把胎儿从这个女人肚子里取出来!”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还没到分娩期呢。难道他是要动手术把胎儿取出来吗?这女子肚里是谁的种,可不关少尉的事啊。

就算少尉是个妇产科医生,可喝得醉醺醺地动手术,母子还是会有失去生命的危险。这简直是疯狂之举。“住手,你究竟要干什么?”我真想大喝一声。但是,转念一想,对方虽然喝醉了,毕竟还是军医尉官,而我不过是其他部队的一位上等兵,即使前去劝说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强按怒气,静观事态发展。

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那位女子。只见她惊恐得脸都扭曲变形了,额头满是大汗。“请放开我!请饶了我!”女子拼命地乞求道。

但是,少尉对女子的哀求充耳不闻,他把女子的衣服一直卷到露出整个腹部便开始动手术了。

这之后发生了什么,从我站的地方看不清楚。即使能看清,我也没有勇气看。

就在我背过身体,紧闭双眼的瞬间,“啊呀!”我听得一声惨叫,回头一看,看见了女子痛苦万状的脸。只见她白眼球暴突,相貌令人毛骨

悚然。

少尉究竟干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也许他在使用手术刀吧,只见手术刀在他手中晃来晃去的。

即使是我这个对医术一窍不通的外行也判断得出,该女子已经没救了。

我惊恐万分,再也待不下去了,赶紧夺门而逃。

后来听知情人说,那位女子死了。

少尉酒醒之后,面对自己干下的恶行,吓得面如土色,对着女子的尸体不停地谢罪。他始终被对该女子的痛苦思念所折磨,最终无法解脱而自杀了。

由此得出了一个病名,叫“战争恐怖症”。这个病名很适合少尉。

如果没有战争,少尉一定是一名温存的医生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可以说这也是战争的疯狂造成的罪孽吧。

宪兵队的疯狂行为

徐州战役结束后,我们部队驻扎在南京城外,稳定下来过了一周左右。有一天,出乎意料有位老朋友来看我。老朋友名叫成濂,与我同年入伍的,是我刚入伍时最早相识的朋友。

我们一相识就亲密起来了。人真是奇怪,喜欢一个人还是讨厌一个人,有时真是说不清。有的人,即使你想喜欢,可任你怎么努力也喜欢不起来。有的人则正好相反,一见如故。我和他就属于一见如故的朋友。

刚当兵时,他是一个耿直又顶真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深山老林里的偏僻乡村。到他那儿的交通极为不便,下了火车转乘汽车,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两个多小时后,从汽车终点站再徒步近三个小时才能到家。

他就是在这样一个交通不便的地方长大的。正因为成长于这样的穷乡僻壤,所以他成了憨直得近乎愚笨的老好人。

成濂的父母好像是以烧炭为生,家境并不富裕。成濂作为家中的第三个儿子,即便退伍回去,也是前途渺茫。因此,他立志当一名国家的职业军人。中途他又转科报名当了一名宪兵离开了。

自分别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见过面。我来到战地后，便渐渐淡忘了他。

久别重逢的成濑已成了一名宪兵伍长。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快回去时，他再三对我说，你一定要来玩。

我也觉得一个多小时的交谈意犹未尽。于是，隔了一天之后，我去宪兵队与他见面了。

宪兵队是士兵们最厌恶的地方。士兵们都畏惧、憎恨宪兵。即使没做亏心事，见了宪兵都会避开。不仅是士兵们，就连外国人都惧怕他们，称他们为“东洋魔王”。

虽然我也讨厌宪兵，但是由于成濑是我以前的同僚，所以就没那么介意。按照他所告知的地点，我去了驻扎在城外的宪兵分遣队。

我去的那天，宪兵分遣队里一片嘈杂忙乱的样子，给人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

我向成濑一打听，他回答道：“是大扫除。”

这儿所谓的“大扫除”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室内室外的清扫。宪兵队的“大扫除”指的是把作为嫌疑犯抓进来的关押人员全部处死。

据成濑解释说，一旦牢房里犯人人满为患，为了关押新抓来的嫌疑犯，便每隔五天或一周就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我们见面的日子正好赶上这种“大扫除”。

“这么随随便便地就把人杀了，如果有冤枉的人怎么办？”我这样问道。

对我的提问，成濑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傲慢地说道：“凡是被宪兵队盯上抓捕来的人，不分有罪无罪，全部作有罪处理。就算你没有罪，拷问之后就作有罪处理。顽固的家伙就严刑拷打。拷打致死的，就编造一份有利的调查记录作为有罪处理，这样案子就结了。关键是以什么方式处死他们，所以问题不在于他们是否有罪。”

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之所以本国人和外国人都惧怕“东洋魔王”，就是因为日本宪兵队是这样一个可怕的地方。以前我就听说，只要被抓进宪兵队，就不可能活着回来。现在看来，的确如此。

“这么多人中间肯定有证据不足的人。如果要一一清查这些人，拘

留所就要人满为患。如此一来,势必要增设拘留所,同时还要增加看守人员。与其费心烦神这些事,不如杀了他们,才是最简便的方法。虽说上级领导表面上并没有允诺我们这样做,但实际上早已默许了。”

成濑伍长这样说道。我完全理解他的话。但我不能理解秉正执法的宪兵队的所作所为。

我们俩交谈了约三十分钟后,成濑带我去了一处羁押所。那里面关押着今天要被处死的犯人。

羁押所是一幢用厚厚的土墙围起来的房子,里面拥挤地关押着二十多名中国人,男女同监。据成濑说:这些人中,有的人与南京政府要员有关系,有的人是间谍嫌疑,有的人是抗日学生。

我把脸贴近牢门粗大的圆孔,朝里一看,阵阵腐烂发馊的体臭味扑鼻而来。昏暗中有好几双憎恶的眼睛向我射来。

我慌忙把脸移开,害怕得低下头。成濑对着这种状态的我,劝道:“这里面如果有你中意的女人,就说一声,弄出来玩玩没事!对年轻女人在杀死她们之前,先让她们慰劳我们是家常便饭。当然不能公开这样做。不过,上级已将这默认为宪兵队的福利了。反正到下午她们都要去另一个世界了,玩一个赚一个。”

可是,我无论如何提不起这种兴致。虽然我是名青年男子,对女性的渴求超过常人。但与那充满怨恨的目光对视的瞬间,我便失去了这种欲望。

我刚急忙走出拘留所,就看见三四名后补宪兵正指使几名中国男子挖一个大坑。这个大坑就是墓穴。

一到下午,“大扫除”就开始了。成濑担任执行官。他指挥后补宪兵把犯人一个个从牢房里拽出来,斩首后即抛进大坑里。

成濑伍长好像故意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实际上人是会变的。他毫无人性地砍下人头、弃无头尸于坑中的样子,活脱脱是一个魔鬼宪兵。

尽管我也变了,但他变得更可怕。也许至今为止,有好几名女性在被杀之前被他强奸了吧。毫无疑问,他已经砍下了不计其数的人头了。

他作为军队警察的宪兵,战争使他疯狂,让他不知道怎样做人了。

关于“南京屠杀”之异议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之后,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南京城里原本和平地生活着的居民被当作射击的靶子;被军刀活活劈开;被浇上石油活活烧死;被活埋致死。更有甚者,还有的人被活活挖出心脏。在一个多月里,惨遭杀害的不下30万人。被烧毁的房屋竟达到全市的三分之一。当时的南京城,累累尸体横卧街头,瓦砾成山。冬日阴冷的寒风,凄厉地刮过大街小巷,更使得南京城像一座人间地狱。”

以上就是中国中学生历史教科书中所记载的“南京大屠杀”。作为受害方的中国就是这样教育后人的。而作为加害方的日本却提出了在南京没有进行大屠杀的说法。

只要回忆距今47年前,即昭和12年12月在南京周围发生的事情,我的脑海里就会接连不断地浮现出一幕幕令人不堪回首的场景:烧焦的房屋和满是瓦砾的大街,中国人的累累尸体横卧街头,被鲜血染红的大屠杀现场,在黄浊的扬子江中一沉一浮地顺水漂流而下的死尸……这些惨不忍睹的场景已经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永生无法忘却。

这一切并不仅仅是我的亲身经历。自从我以前的《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一书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关于讲述南京屠杀的信件。有的人在信中写道:“我在南京也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有的人在信中写道:“我也亲眼目睹了这些场景。”无疑这些情景也深深地印在了这些人的脑海里。

如上所述,从军人员确确实实在南京干了大屠杀。却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否定南京大屠杀。我即使读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书,也不会改变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不过我还是要自己读一下那些持否定观点的书籍。

遗憾的是,在我读过的所有书中,所谓的反驳理由都是一些不屑一驳的无稽之谈。

因为书中尽用道理来解说在战争这个非常时期发生的事情,根本无法说服经历过战争的人,反而变成了无法理解的事情了。因此,即使与

他们争论,也谈不到一起。

虽然我不想介入这些人的争论,但我想对引起我注意的几点反驳理由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反驳理由之一:“如果真的发生过流传至今的大屠杀,那么,参加过进攻南京战斗的大部分军人都应该了解情况。为什么参战将士中,还有人无法确定屠杀现场呢?这就是屠杀事件不确切的证据之一。”

可以说这是一种无知的或是不了解军队组织的人的幼稚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呢?

据说当年攻打南京的日军部队约有七个师团,而不了解军队编制的人误以为七个师团的全体将士都直接参加了战斗,都一起攻入了南京城。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

在攻打南京的军队中,除了战斗部队之外,还有运送弹药粮草的辎重队,看护伤病员的卫生队等等。粗略的估计一下,有三分之一的人员是从后方跟随过来的非战斗部队。所以,那些人不了解后方部队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战部队的将士中,也有的人坚持说并没有进行屠杀。坚持这种说法的人,多数是站在领导位置的高级将领。他们是为了逃避责任才这样说的。

理由之二:“我们承认占领南京时有杀戮行为,但不能说那是屠杀。屠杀应该是指杀戮军队以外的普通居民妇女儿童。至于杀俘虏的行为,应该属于战斗范围之内的行为。必须明确地划清这种界限。”

这是一种可笑的论点。在南京被屠杀的称之为俘虏的人,实际上是已经缴械投降的人。即使以前是军人,但现在已缴枪投降、表示不抵抗,这种人就是非战斗人员。杀死这种人的行为,当然是属于战斗行为以外的行为。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理由之三:“当时在南京的中国人,南京守卫军队有5万人,市民约20—25万人,合计30万人。即使将他们全部杀光也只有30万人。可是其中还有生存者。所以无论怎么计算也不到20万人。中国方面说30万人是一种夸大其词的宣传。如果我们中有谁盲目听信这种宣传,以鄙视自己国家而自得,就是一个精神不健全者。”

对于这种论点,我感到震惊。给中国人带来灾难的是我们日本人,必须谢罪的是日本人,现在却有这种谬论。我觉得现在日本人自我陶醉于经济大国,又开始狂妄自大起来了。

要想挫败中国方面,最好正面交锋、提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一味否认是极不负责任的。

那么,那些人推断守卫南京的中国军人是5万人的证据何在呢?关于这一点,他们是这样说的:“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是军司令官唐生智将军手下的16个师(一个师5000人),约8万到10万人。自上海开战以来,因为兵员消耗,各师的战斗力锐减。所以即使在南京有新兵补充,也应该在5万人左右。”

这种计算,不过是对战争一无所知的人对当时战况的一种简单估算而已。在当时的中国,除了正规军之外,还有民兵。所谓民兵,就是没有军籍的年轻人,平时从事农耕和其他的劳动,一旦有事,就成为战斗人员,加入军团作战。这些兵力是正规军的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

比如,一个师的正规军,一旦发起了军事行动,所经之处的各个村落的民兵便汇集在一起,队伍像滚雪球般地壮大起来。等到达目的地时,人员已经增加了几倍、几十倍。这些人员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制定作战部署的日军首脑层也推测不出来。虽然派过密探去打探,也无法估算出来。

有人说,民兵只有中共军队里才有,国军里没有。事实决非如此。当时,上海地区作为第三战区,配备的是蒋介石总统的直系部队,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同时在上海的各个阵地都投入了大量民兵。甚至在最危险的前沿阵地也配备了民兵。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碉堡据点里也有很多民兵。以至于在开战初期,我们错误地把民兵当成了前沿第一线的主力军,把正规军当成了督战部队。

在南京守卫军中究竟有多少民兵,我们无从知道。但是,我们推测参战人数至少与正规军大致相等。因为就在我们向南京发起攻击的进军途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像是民兵人员的尸体。

除了这些民兵之外,我们也无法测定出南京守卫军的实际数字。

理由之四:“南京城是一个四周被13米高的城墙包围着的城市,市

区面积不足 40 平方公里,而且城中还有山林、田地、飞机场等。繁华街区少,人口密度低,城内城外加起来最多是个 30 万人口的都市。”

这是他们测定南京人口的根据。

当时南京究竟有多少居民,我不得而知。所以,对此我不会举出不负责任的数字。不过,我认为这 30 万人就是平时就居住在南京的人口吧。

当时的南京,由于日军进攻而一片混乱,还有从周边乡镇、村落拥进来的许多避难人群,更是混杂不堪,根本无法计算到底有多少人口。所以说,如果在时隔四十多年后的今天,能够计算出当时的确切人数,简直是骗人的鬼话。

理由之五:“一直传为被大量屠杀的居民妇女儿童实际居住在难民区内,而难民区是受到日本警备司令部保护的。处于日军保护下的居民,遭到日本兵的屠杀,这种事别说是以万,就是以千或以百来计算,也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这完全是在否定屠杀居民妇女儿童的事实。对他们竟能够强词夺理地编造出这样那样的谬论,我深感佩服。

所谓的难民区,是日本军队即将向南京发起进攻的 11 月底,中方考虑到战斗可能会使居住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陷入最恶劣的处境而设置的可以安全避难的区域。这个区域圈定在中山北路、汉中路、西康路约四平方公里的区域内。

中国方面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本方面保证这个地区的安全。但日本军队并未答应。在战斗状态持续期间,无论是什么样的军司令部,也不可能保证敌国居民的安全。

因为一旦保证了难民区的安全,就会被敌军乘机利用。即使他们不采取敌对行为,但败退的士兵会躲进难民区。他们将脱下军装,藏起武器,化装成一般老百姓。因此,即使是难民区也成了日军扫荡的对象。京都府籍的一位老兵在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们扫荡了难民区。”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南京,每次作战中都是这样。在敌国领土的日军将士,在战场上分不清一般居民和敌对分子,所以全部杀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

虽然这是极其残忍的,但日军已把这视为一种常规。只要对自己一方有利,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对普通百姓进行杀戮、掠夺、放火。

这样做,不仅是因为将士怀着对敌人的仇恨和战场心理而淡薄了犯罪感。军队为了治安而采取的作战措施,还让士兵们烧毁村落、杀光居民,在敌军团据点之间制造无人地带。在战场上居然有这种事情,这是以常识难以想像的残酷事实。在他们眼里,人的宝贵生命竟不如蝼蚁之辈。

我想,即使说了上述事实,对于“南京屠杀”这个事件,生活在正常社会里的人,想用正常理论去剖析它,是不可能解释清楚的。作为一个在南京参与过屠杀暴行的犯人,我在此想说一句肺腑之言:“大多数从军人员已经承认了南京屠杀,所以我希望全体国民也应该正视这一事实,并虚心反省。”

屠杀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理由

战争结束之后,当年前往中国大陆、缅甸、法殖民地的印度、南方各地、苏联满洲边境等广阔战场的将士们,都复员回国了。

我的朋友们也相继从各地返回了家乡。在与他们交换战地情况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了一个意外情况。就是在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大陆这个战场是日军施暴的中心。

虽然我们不能说在其他战场没有发生暴行,但是与中国大陆相比,那要少得多。关于这一点,看一下战后各地审判战犯的情形就可以明白了。在南方战场,发生在俘虏营里的情况大多是奴役、虐待,并伴有暴力行为。而像发生在中国大陆的那种大量屠杀俘虏和平民、掠夺财物、强奸妇女等情况好像很少。

那么,为什么会在中国大陆发生如此之多的暴行呢?谈到这个问题,自然就会引发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全体日本国民视中国人为劣等民族。

这种蔑视感并不是从支那战争才开始有的。自从日本人在日清战争中大获全胜以来,就滋长了错误的优越感,开始蔑视中国人。他们称

中国人为“镗锅罗”(zhongguoren 的讹称),以此表示对中国人的极端鄙视。这种情绪甚至渗透到了教育领地,学校里公开向孩子们灌输“我们要讨伐镗锅罗、消灭镗锅罗”之类的思想。所以,全体日本国民都深信中国人是劣等民族。而前往中国大陆作战的将士们就是在这样的国情中成长起来的一代。

更何况他们是抱着“我们一定要惩罚中国”这一目的出征的,所以这种敌视心理就更加强烈。两国之间即使发生纷争,靠诉诸武力惩罚都是不妥当的。仅为了教训一下对方,就挑起军事行动,进攻他国领土,完全是非法行为。但当时的日本却把这种侵略行径合法化了。

这种荒谬的战争目的促使出征的将士们走上了一条非法道路。虽然这不能说明一切,但我认为是理由之一。

自从我于昭和 12 年 9 月 1 日从吴淞镇登陆以来,一直到昭和 15 年 10 月 20 日根据陆支机密第 174 号文归国为止,在这三年多时间里,我随着部队不停地转战中国大陆各地。在这期间,作战行动以中队、大队为单位,时间在两三天左右的出兵行动无以计数。

作为战斗经历留下记录的大规模的集团军行动就有上海战役、南京进攻战、徐州包围战、武汉战役(进攻信阳的攻略战)、宜昌战役(襄东战役)这五大战役。

在这五大战役中,我们可以昂首挺胸肯定地说,“在这里我们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的只有上海战役。

上海战役是从军者们引以为荣的、可以夸耀的战场。这里面自有它的理由。

当年日军出兵上海时,打着一个正当、公开的旗号,这就是保护在上海的居留民,维护其权益。参战的将士们都有一个意识:我们行动的地方是一个国际大都市,那里驻有各国机构,他们会监视我们的行动。再加上打的又是阵地战,行动范围小,因而没有接触到民众。

在下级将士之间,有很多战士自觉地认为:我们是代表本国一亿同胞来到这里的。由于有这样的自觉性,他们还保留着在国内过正常生活时的正常人心理。

我列举上述理由主要是想说明,有明确的战斗目的最重要。

暴行始于上海战役告一段落、部队集结在南翔—嘉定—太仓一带待命的时候。此时我军打着征用的名义,开始掠夺百姓的东西,进而发展到强奸妇女。由于这一带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民宅也没遭到破坏,居民们也都没有外出逃难。所以进入村落,就能找到家畜和蔬菜等。

那时候的下级将士们,因为在上海连续进行了激烈的作战,并且离开国内已有八十余天,一直没有吃到新鲜食品了。在前线几乎以干面包为主,即使吃上一顿米饭,副食品也尽是些罐头、脱水食品,甚至连调味品都是豆酱粉、酱油粉之类的东西。所以,将士们在饮食生理上急需生鲜食物。

士兵们开始走出去弄生鲜食物时,只是小偷小摸而已。但是,由于遭到老百姓抵抗,生鲜食品很难弄到手。于是,自然地变成了抢夺。就在这种抢夺过程中,犯罪意识渐渐淡薄,发展到见到年轻女子就强暴的程度。

这些暴行都发生在向南京进攻的命令下达的时候。从那个时刻起,在士兵们中间开始滋生出一种疯狂的情绪。此时,士兵的作战目的已从“保护侨民,维护权益”变为“讨伐暴支”。

所谓“讨伐暴支”就是用武力惩戒暴戾的支那人。这种惩戒不只局限于战斗之中,抢夺百姓物品、强奸妇女都是惩戒。完全视非法为正当了。

面对日本兵无理的要求,软弱的中国百姓束手无策,“没法子”。特别是很多柔弱女子,为了活命,不得不屈服于日本兵的淫威,这更加使得日本兵逐渐丧尽天良。

到了攻打南京的时候,这种疯狂情绪更加凶猛,最终导致爆发了南京大屠杀。

有这样一本书,书名我记不清了,但是书中有一段话,是这样描述南京屠杀的:“没有正当名分的战争使将士不能理直气壮。当生命面临危险时就会暴露凶残的兽性。这种凶残兽性一旦撞上非战斗人员,就会不分军民,一律杀光。这就是南京大屠杀。”

我同意这种说法。虽然没有正当名分的战争,还有其他更多的含义。但这儿只是表示他们不知道攻打南京的意义何在。拼上命作战的

人,竟不知战争的目的是可笑之极的。但对于下级将士来说,只要像机器人一样听从上级命令,出征、进攻、战斗就可以了。

即便如此,不知道为何而战,就无法鼓起战斗士气。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下级将士鼓不起干劲的。其次是下级将士在生命面临危险时,变得像野兽一样凶残的现象。因为南京是蒋介石的大本营,所以将士们预料进攻中会遭到顽强抵抗,同时,预料经过长途远征后在攻击期间,必定会有百分之十几,或百分之几十的将士战死或负伤,这导致产生了绝望感,并促使他们变得凶残。

这种凶残性不仅在中国大陆可以看到,在其他各种战场都能看到。之所以在中国战场上表现突出,完全是因为日军持有的心态是轻视中国人生命的。

关于“南京屠杀”,我在前面已经记述过了,所以在此就略去不谈了。我想继续谈一谈其它情况。

在下一个徐州包围战中,又发生了与南京进攻战一样的大屠杀。

徐州包围战的作战目的,是包围歼灭集结在徐州一带的中国野战军的50个师。因此,这是一场不同于以往那种以占领政治战略要地、交通要塞、铁路线为目的的战役。这场战役的目的就是杀人,表现在下级将士身上就是凶残。

我们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了徐州。但是,我们没有料到在这之前50个师的中国军队已经安然无恙地撤出了徐州,我们的作战目的以失败告终。

在徐州附近大批屠杀俘虏的暴行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虽然主力军团撤退了,但是,在徐州周边一带,还有好几支小部队部署在各地。由于主力军团已弃他们而去,所以他们也失去了战斗意志,全部逃入山中。但是两三天一过,由于缺粮,他们便开始陆续向日军投降。

有10人左右为一组前来投降的,也有20人左右为一组前来投降的。由于每天都有好几组前来投降,所以弄得接收这些人员的前线部队无法处理了。

这些投降人员的武装虽被解除了,但是如果人数超过我方人员,就

会发生危险。若增加警戒人员,士兵们就会因勤务工作过于繁重而疲惫不堪。而且,也没有这么多粮食供给投降人员吃。该如何处理这批人员呢?于是,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部门的回答是:“格杀勿论。”这也是日军上层领导轻视中国人生命的真实写照。

按照命令,一场屠杀开始了。

最初,我们是把投降士兵悄悄押解到山谷里,或用军刀斩首处死,或用刺刀刺死。但投降士兵越来越多,光靠这种方法已来不及杀光他们。于是,一场高效率的、大规模的杀人暴行开始了。

有的部队把大批俘虏集中在峡谷里,用缴获来的捷克式机关枪对他们扫射,进行枪杀。更有甚者,有的行刑队,把俘虏分成几人一组,让他们相对而站绑在一起,然后逼使他们把手榴弹抱在正中,点燃引爆。因为是在胸部爆炸,所以一枚手榴弹的爆炸力,就能把全体人员炸得血肉横飞,当即死亡。

不用说,除了杀戮之外,还有掠夺、强奸。特别是强奸,凡是进入包围圈中的女性,都成了他们施暴的猎物。

继徐州包围战之后,我们又发动了武汉战役。在武汉战役中,由于我们陷入了中国军队的圈套,因此这场战役是日军在中支战场上打得最艰苦的一场战役。

我们之所以会落入中方圈套,是因为中国国民政府于1938年(昭和13年)6月,研究了战略战术。不再拘泥于一城一池的攻防,而是占据有利山丘地形,诱敌深入,消耗日军兵力。按照这个方针,7月,国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全部迁入四川腹地重庆,把武汉东部的大别山地区作为消耗日军兵力的战场。

昭和13年9月发动武汉战役的日军,就这样完全落入了中方早已设计好的圈套里。

大别山险峻的山峦,层层叠叠不知其数,都延伸至扬子江畔。占据这个天险屏障要害处、迎击日军的是中方一支山地战方面训练有素的精锐部队。他们对大别山了如指掌,如同在家中的院子里一样。

但日军则恰恰相反。由于不熟悉山中的地理、地形,一次次被诱入不利的山隙夹缝中遭到沉重打击。而且,疟疾病也在军中蔓延。那场战

役一直打得相当艰苦。就这样,我们在大别山中连续苦战了三十多天。当我们走出大别山踏入武汉平原时,已完全失去了人性。

再加上军部上层领导还冲着我们嘲笑说:“不过是个镗锅罗^①。”更使我们颜面丧尽,恼羞成怒。

在我离开战地前夕所参加的襄东之战,是一场战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战斗。

自武汉战役之后,大本营也改变了在中国大陆的战争指导方针,制定出一条以确保占领区治安和建立战略上的持久稳定的格局为主的策略。即:加强占领区防守,不搞大规模进攻。如果敌方攻势令人不能容忍,再派兵出击攻打其据点,打完之后即刻撤回。襄东作战是这样一种形式的战斗,由于不用做宣传安抚工作,下级将士的行为便愈发为所欲为。

如果把上述内容概括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最初日军极端藐视中国人,认为:“不过是镗锅罗。”但是,在经历了意想不到的苦战之后,便成了:“他妈的镗锅罗”。从那之后,日军在作战中再也没取得过预期中的战果,战争陷入了长期化的僵局,军部首脑层开始焦躁。这种情绪蔓延到下级将士身上。可以认为:正因为如此下级将士们才愈加肆无忌惮。

原士兵的日记和我的笔记

读了原京都府士兵和原宫崎县士兵写下的日记,感受到作者那种想坦白真相的冲动,令我非常感动。

读着这些朴实无华的词句,过去的那种岁月渐渐形成画面浮现于我的脑海,那种近乎疯狂的杀气让我感到窒息。

面对这些确凿事实的气势,任何反驳言论都会不攻自破吧。就是这些事实真相,才是当今可以向世人证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虽说这是我读完日记以后的感想。但我觉得这些老兵写的有关南

① 日语音译,系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

京占领期间的日记,明确了一些迄今为止一直没搞清楚的问题。其中之一:城内的难民区究竟有没有发生大屠杀。这个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之一。关于这一点,原京都府的士兵在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扫荡了城内难民区。”在难民区内有一所当时是非交战国美国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在这个区域内是否发生过大屠杀?这一直是我所关心的问题。现在原士兵在日记中清楚地写到:扫荡波及到难民区,我们屠杀了很多残兵败卒。

日记中有“残兵败卒模样的人”这样的词。由此可以推测,日军屠杀的不仅是残兵败卒,还包括了当地居民。

日记还有“惨不忍睹的情景”这样的描述。由此我们还可以感觉到,看到对方的遭遇,日记作者心中萌生出的怜悯心情。通过这短短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日军是如何地大发淫威。而面对日军的武力,中国人丝毫没有抵抗。

原宫崎县士兵在日记中也用逼真形象的手法描述了“南京大屠杀”。从字里行间,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当年参加“南京大屠杀”的士兵的心境。

12月12日,作为最先攻入南京城的士兵,他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要将最先攻入南京城这件事作为一生的自豪,可以说实现了一个男儿的平生愿望”。

当时,参加南京攻略战的几十万将士都把第一个攻入南京城作为目标而互相竞赛。能从众多将士中脱颖而出,第一个让太阳旗在南京城门上高高地飘扬,这种自豪感一定是种特别的感觉吧。我非常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甚至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激动。

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中国士兵扔下武器和一切物品、静静地跪在大道旁的样子真是天下奇观。”很清楚地看出他因胜利而得意洋洋的心情。这句话还表明了一个事实,即:当时的中国士兵已经放下武器向日军投降,已完全丧失了斗志。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国士兵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惨遭屠杀的。

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话:“一种以杀人为乐的风气在蔓延开来。”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知道日军是怎样地蔑视中国人的生命。可以想像,当时日军将士残害中国人生命时甚至不如一只小虫子。还可以推测他们

对杀人产生了兴趣。在12月28日的日记中,他用一种感慨的口吻写道:“目前这种状况,算是怎么回事呀。”似有悔悟之意。

占领南京之后,已经过去15天之多,在这期间,屠杀持续不断。可以感觉到士兵对屠杀已开始厌恶了。

作为参加过攻打南京的军人,我与写日记的人们有过相似经历,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们写日记时的心境。而且,越读越觉得那一行行文字在深深地刺痛我的心。正是这些写在日记中的文字,才对我们了解“南京大屠杀”有宝贵价值。

士兵在战地写下的日记,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最能理解。这不是强词夺理,事实如此。

战地士兵的文章中,具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具有一种渗透人心底的气势。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想起了樽田博氏写的《分队长的手记》这本书。

读这本书的具体时间、具体场所,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依稀记得好像是在信阳战役结束之后、部队驻扎在京汉线沿线的镇子上的时候。那是每人轮流一周担任岗哨值勤时的事情。我在从前一班哨兵那里接过执行情况报告的同时,把他读过的旧报纸、旧杂志也一股脑儿地接收了过来。

喜欢阅读的我,捧起一本旧杂志便如饥似渴地从第一行开始读起来。在这本封面封底破烂不堪、看不出书名的杂志中,刊登着一篇名为《分队长手记》的文章。文章描述的是夜袭场景。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不知不觉进入了那个场景,仿佛自己也置身在那枪林弹雨之中。

因为作者是体验实战的士兵,读者我也正在战地值勤,所以马上就有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当我从吴淞铁道栈桥登陆、初次踏上战地时,看着眼前战火纷飞的战场,我就下定决心要把战地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从那之后,无论是在战斗的间隙,还是在行军途中的小憩,或者在野外宿营地的篝火旁,我把战场的情况全部变成文字记录下来,从未间断过。有一次,我把三本正反面都密密麻麻写满字的信纸给一位战地记者看了,没想到,他很感兴趣,回国时,把这三本信纸带了回去。不久他

替我编辑成册,以《故乡勇士手记》为标题,出版发行了。

文章自然很拙劣,现在想起来还感到脸红。由于身处战争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又迫不及待地想把这些非同寻常的事情告诉世人,所以,文章写得像酷暑炎夏热得喘着粗气的小狗。

出乎意料的是,那本小册子受到了极大好评。当时,我自以为成了大作家,竟然自我陶醉起来。几天之后,我平心静气地思考了一番后明白:问题不是我文章的好坏,而是当时后方国民可以通过我的拙作想像身处前线士兵的情形。文章中流露出的那种欲向人们倾诉前线一切实情的真挚情感深深地打动了后方人们的心。这才是文章受到好评的真正理由。

后来,我从前线归来,有人劝我继续写续集。我也觉得这个建议很好。现在是自由之身,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慢慢写了。然而当我提笔想写时,却怎么也写不下去。原因有二:其一,毋庸置疑,我本来就是才疏学浅的人;其二,打动人心的战事记录离开了战场就写不出来。

得到好评的手记,是我在战场上,毫无修饰的、忠实记录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事。而回国后,想像力是增强了,但真实感却减少了。所以在战地写的东西虽然语言朴实直白,没有修辞技巧,却很有说服力。

说些题外话吧,要想用文字表现战地情形,没有体验过战地生活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没有感人肺腑的气势。

深夜,在月光的映照下,哨兵站在城墙上的身姿显得如此罗曼蒂克。但是,哨兵的心境却是各种各样的。夜深人静,独自一人站岗的孤独感;众人都已熟睡,独自一人肩负警戒的悲壮感;不知敌人何时袭来,独自一人面对敌人的危险感;站在与故乡同一个月亮下,独自一人怀念亲人的思乡感。正是这纷繁思绪,才是战地哨兵的真实写照。

而且,当你行进在以太阳旗开路的队伍中时,必然需要一种气魄。如果没有这种气魄,就和演习部队一样了。

只有亲身体验过并了解战地生活的人,才能写出上述这种种心境。正因为是毫无修饰地记录了亲身体验,才不会有编造的东西。

我在战地时和原京都府士兵、原宫崎县士兵一样,也写日记。但是,我的日记大多只有短短的一行字。

当我作为现役兵入伍时,我得知作为私人物品的记事本是允许携带的,于是我特地买了一本厚厚的高级笔记本带去了。

但是,由于第一年军营生活特别忙碌,所以尽管特意挑选了一本页数多的笔记本,但是并没有记录的时间。最初的两三页,我还坚持用楷书工工整整地书写,可到了后来,字迹就渐渐变得潦草起来。

打开这本笔记本,阅读当年新兵时记下的几篇记录,入伍第一年时紧张的军训,繁杂的内务,一天比一天紧张的情景便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记录这些事情,我只记了五六页纸,就将笔记本放入了匣子里,后来就忘了。这一搁就是一年多。

就在这期间,支那事变爆发,我们接到了动员令,即将开赴前线。出发之际,我在整理个人物品时发现了这本笔记本。我想,“也许以后会派上用场”,于是便带它奔赴前线。

当我们从宇品港起航,驶入大海,祖国岛影越来越模糊时,我萌发了写日记的念头,于是我决定使用这本笔记本。

“鸿毛之躯的我得以亲身参加圣战,真是无上光荣。从今日起,为了天皇陛下,为了我大日本帝国,我随时准备献身,死而无憾。我要把这场圣战记录下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写一天,决不停止记录圣战。”

我在笔记本上这样写道。这就是我当时的决心。虽然是豪言壮语,但当时我的确是那样想的。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每日必写一行日记的习惯。有时利用饭后的片刻工夫,有时利用行军路上的短暂小憩。当遇上连续几天持续行军、作战,忙得不可开交时,我甚至在野外一边大便一边写。

总之,三年多来,我始终把它带在身边,走到哪写到哪。由于被雨淋湿过好几次,所以经历了四十多年风风雨雨后的今天,笔记本已破损不堪,订缀纸张的线也已断裂,变得七零八散。但是,对我来说,它可是一件贵重品。

我只要看上一眼当时写下的文字,在那短短的三言两语中,当年的一幕幕情景就会历历在目。

“12月8日,征集队。”虽然只有屈指可数几个字,但是当年那不得不靠抢夺老百姓粮食来充饥的窘况、被抢走粮食的老百姓那怨恨表情、抢

粮时顺手牵羊强奸妇女的事……全都一一浮现在了脑海里。

“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只要一看这句话，我眼前就会浮现出排列在南京城内大街上的军队、进行阅兵的最高军司令官松井大将以及紧随其后的诸位将军那趾高气扬的神情。我甚至还想起了我向从面前通过的松井大将进行注目礼时的那种油然而生的感动。

我说了这么多的闲话，主要还是为了说明在战地写下的文字完全是我忠实记录下来的事实。

原京都府士兵、原宫崎县士兵留下的日记，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是真实可信、无可挑剔的。如果还有人要对此提出异议的话，我想只能是他本人为了伸张自己的主张而在强词夺理。

(下略)

[曾根一夫：《我所记录的南京屠杀(续)

——战史中没有记载的战争故事》，彩流社(东京)1984年12月5日。]

(谷肖梅 袁静文 译)

24. 战争与人

(前略)

在泥泞中前进

上海战役虽然结束了,然而战火本身却没有熄灭的迹象。日军趁着气势,开始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发动急速进攻。晚秋的江南大地,被雨水浇灌成一片泥泞。战士们在泥地里急速前进。右翼是松井兵团(仙台第十三师团等组成)沿着扬子江岸前进,左翼是柳川兵团(熊本第六师团等组成)沿着军用公路前进,彼此俨然就是一副竞赛的样子。

第十三师团对从上海战线向南京撤退的中国军队展开的追击,开始于昭和12年11月12日。晚秋时分,下个不停的雨水浸湿了江南冷冰的大地。进攻的人马使得道路成为一片泥沼。用马匹牵引重炮的山炮兵第十九联队,以及用马驮着大量物资的辎重兵第十三联队都非常辛苦。第十三师团带着满身泥浆前进在道路上。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等待着他们的是福山河沿岸谢家桥镇一线的阵地,以及封锁扬子江航道的坚固阵地——江阴炮台。

泥泞的道路、无数的河流、做好迎击准备的各地的中国军队……然而进攻的速度远远超乎想像。“只要占领了南京,战争也将就此结束。”军人们这么想。即使脚陷入了泥浆中,步伐依然还是那么快。在上海战役中受创的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此时将士们的表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位大队长中健在的只有第三大队长平显美少佐,第一大队在山口宪三少佐负伤后由斋藤二郎上尉代理大队长(不久田山芳雄少佐到任),第二大队在武臣少佐负伤后由片冈俊郎上尉代理大队长(不久后藤常治少佐到任)。另外在联队兵力上,虽然在上海登陆时原有三千六百余人,但在上海一战中有大量人员死伤,尽管在接收了补充士兵后力量有所增强,但第一线兵力仍仅有两千余人而已。以下将主要配备列表加以介

绍,以备参考。

步兵第六十五联队 本部 联队长 联队副官 联队旗手	两角业作大佐(长野) 山本正风少佐(小仓) 久米正元少尉(饭馆)
第一大队长 第一中队长 第二中队长 第三中队长 第四中队长 第一机枪中队长	斋藤二郎上尉(田山芳雄少佐) 山本保中尉(东京) 高桥宗大中尉(川俣) 近藤永昌中尉(埴) 佐藤好中尉(郡山) 宝田长十郎中尉(富山)
第二大队长 第五中队长 第六中队长 第七中队长 第八中队长 第二机枪中队长	片冈俊郎上尉(后藤常治少佐) 角田荣一中尉(郡山) 皆川诚之中尉(若松) 矢本平治中尉(宫城) 铃木一男中尉(北会津) 根本一郎少尉(船引)
第三大队长 第九中队长 第十中队长 第十一中队长 第十二中队长 第三机枪中队长	平显美少佐(仙台) 八卷竹雄中尉(梁川) 斋藤实中尉(坂下) 兼子要喜少尉(浅川) 冈崎宪太郎少尉(矢吹) 三木正明中尉(香川)
△联队机关枪队长	针冈寿上尉(仙台)
△联队炮队长	平林贞治少尉(福岛)
△步兵炮队长	铃木数马上尉(若松)
△联队通信队长	金成正二少尉(岩城)

泥泞的道路没有尽头。一旦进攻的速度减缓,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会从后面单刀独马飞奔上来,威风凛凛地督促道:“你们走不快了吗?”师团长被士兵们冠上了“冲锋枪”的绰号,因为他亲自冲上第一线监督士兵。这是一名猛将型的人物。

关于若松联队的进攻状况,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回忆录中记录得非常详细。将其中的一部分摘录如下:

11月12日早晨,我们若松联队成一系列纵队式进攻。在雨中从齐家村出发,经过罗店镇向黄宅前进。雨越来越大,泥浆没过了膝盖。然后又从汤家宅经支塘镇往梅李镇进军。雨中,江南大地上回响着战士们的军歌。这一带已经没有中国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只有些来自残兵败将零星的袭击而已。地名中的“宅”表示村落,“镇”表示城镇。有的村子连避难的人也没有,有的城镇里则挂起了白旗。

最近,我们联队的进攻相当迅速。我和师团长正在协商的时候联队就出发了,尽管我在后面追,就算到深夜也追不上。如果跟丢了自己的联队,联队长就要切腹自尽。不过途中大家觉察到联队长不在后面便停了下来,这才总算让我赶上了。将士们目不斜视地默默地继续前进。这或许就是福岛县人的部队能成为“强兵”的理由之一吧。

到达梅李镇是11月16日午后。让我们继续看两角的回忆录——

梅李镇——我把这个名字留在了记忆中。因为老陆宅之战时,在阵亡的中国士兵遗体中发现的日记里这样写着:“我们夜宿在梅李镇,马上就要奔赴上海战场了。”我终于到了那个梅李镇。忽然不由得想到,那个中国士兵是否在这里获得了最后的安眠?梅李镇,多美的名字啊。不知什么时候又记起了水户黄门的梅里。无论如何,对我们若松联队而言,梅李镇是个难忘的地名。在那之前是上海苦战所带来的黑暗期,而在此之后我们进入了快速进攻的好运期。

一出梅李镇就是谢河桥镇。

沦为战场之镇的悲剧

一旦沦为战场,最悲惨的就是当地的一般民众。尽管在战斗中他们竭尽所能地避难,可是战争结束回到家一看,家被烧了,田地被践踏了,从此以后便只能流浪街头。而且还不知道家人究竟遭到了怎样的残害。这是成为战场后的土地的实际情形。幸运的是梅李镇没有发生战斗。高岗上的民房鳞次栉比,一眼望去,一片宁静。虽然没有战斗,可是不断有满身泥泞的日本兵进镇。那是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镇子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没有女人和年轻人的身影。一定是找个地方避难去了。女人们害怕遭到强暴,年轻人则担心被当作游击队逮捕。

镇上的人们看着初次遇见的日本兵都面露怯色。因为是外国军队,所以谁也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不安令他们的表情变得生硬。不一会儿,当孩子们拿来花生和枣子糕饼时,士兵们不由得露出了笑容。此时,互相戒备的气氛稍微缓和了一些。身着脏衣服的孩子脸上露出了天真无邪的表情。

战士们由于在战斗之后便立即开始了行军,所以每个人脸上都胡子拉碴的。从25岁到35岁……中间还有些将近40岁的战士。大多数士兵都有妻子和孩子,因此看着眼前的孩子,他们的脸上便浮现出对留在家中的自家孩子的思念之情。那是一种思乡的情怀。

这是若松联队第一大队副官龟冈宇太郎少尉(福岛市庄野)回忆手记的一节。龟冈少尉的长女,也是在即将出征之前才刚刚出世。住在梅李镇宿舍的半夜,第一大队的士兵们一个接一个地醒了,因为耳边传来了哭声。

“哭声让这些‘爸爸兵’们的心揪了起来。虽然没有看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可是深夜却听见了婴儿的哭声。于是士兵们开始挨家挨户地搜查。到处都空空如也。穿过一座倒塌的土墙是一间破屋子,哭声就来自那里。”

出生大概才一周左右的婴儿,因为饥饿在啼哭着。怕他挨冻而用丝绵裹着,可母亲却不见了踪影。“谁去找点砂糖来。”——士兵们分头去

找。不久,用开水冲好糖水,拿棉花蘸着送到了婴儿嘴边。看着孩子停止了哭泣,士兵们这才放下心来。

“无法表达我们的心情。为了让母亲能早点回家,我们决定远离那座房子。士兵们都沉默了。战争就是这样吗?——大家一定都在这么想着。”

第二天,若松联队很早就离开了梅李镇,向下一个目标谢家桥镇进发。那个婴儿的母亲,也许就在什么地方远远地注视着部队的转移吧。梅李镇发生的这件事,仅仅只是战场上的一个小插曲而已。若松联队在行军期间,不时地与埋伏在各地的游击队发生战斗。因此随时都会有死伤者。高桥定治郎伍长(相马市原釜)、池田冲上等兵(浪江町大堀)、助川传吉上等兵(船引町)、松本友治一等兵(双叶郡葛尾村)、佐藤源次一等兵(须贺川市西六丁目)、增子金一一等兵(岩城市上好间)、冈田春治一等兵(大越町下大越)、桥谷田洁一等兵(岩城市汤本)、铃木涉一等兵(岩城市赤井)等,许多人葬身在江南大地上。

前往谢家桥镇的路上一直下着雨,道路积满了泥水。重型武器部队陷在泥浆里,大大延误了进程。谢家桥镇是位于福山与常熟之间 60 公里处的福山河阵地的中心,也是利用名为福山河的小河建立起的一个坚固阵地。

若松联队离开梅李镇的当天傍晚(昭和 12 年 11 月 17 日),作为尖兵的第五中队一口气冲进谢家桥镇,遇到了中国军队的激烈迎击。事后我们从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回忆录上了解到:

尖兵第五中队虽然一口气攻入了谢家桥镇,却遭受到中国军队的强有力的迎击。由于已经是傍晚了,所以我想趁现在有效的炮击之后,通过步兵冲锋来突破敌阵。然而在泥路上部队是一列纵队行军的,重武器部队似乎落后了好大一截。于是我按到达的先后顺序,首先派第二大队在第五大队的支援下发动猛攻,接着派第三大队从右侧突进。虽然在阵地交锋时,先让部队开进(将纵队布置成横队),然后根据敌情开始攻击是常识,但此时我却当机立断,决定保持纵队进行突进。中国军队被攻了个不备,只能放弃阵地后退

了。而我军尾追前进时,中国军队却在福山河前停了下来,转而开始反攻。

谢家桥镇的战斗自此正式展开。先头部队里的代理第十一中队长兼子要喜少尉(浅川町)、高桥平作中士(北会津村川南)、江川等伍长(西会津町上野尻)等人先后中弹牺牲。

谢家桥镇的战斗

谢家桥镇的房屋是沿着福山河而建的。杨柳与太鼓桥在水面投下倒影。如果没有战争,这里一定是个宁静美丽的小镇。可是,此刻这个镇却处在激烈的枪林弹雨中。11月17日夜,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保持着纵队行军队形冲进了镇的中心。中国军队虽然先后退了一段,却在小河前改变阵势,展开了猛烈的反攻。小河上原本有四座桥,可当他们得知日军进镇了之后,便毁掉了其中的两座。还不仅仅如此,根据最初攻入镇里的第五中队长角田荣一中尉(郡山市富久山町小泉)、第九中队长八卷竹雄中尉(梁川町中町)的回忆,发生了以下的事情。

“中国军队是以剩下的两座桥为后退底线的,他们蜂拥般聚集在河的对岸。中国士兵为了不让我们逃脱,在桥上点起了火,他们则在一边监视着。就这样,战斗转变为他们誓死拼搏的反击。”

“后来检查战死者的尸体时,在一个像是指挥官的人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封军令,上面写着‘不能让日本鬼子通过谢家桥镇’、‘死守战线’等。”

转而反攻的中国军队并没有足够的兵力,不久他们便成了瓮中之鳖,踏上了被全歼的悲惨之路。但是若松联队也出现了如古内忠政中士(新地町福田)、熊田清智一等兵(须贺川市)、渡边高治一等兵(大熊町)等众多阵亡者。问题是,小河对岸的中国军队的阵线就像老陆宅阵地那样坚固,一旦想要渡过剩下的两座桥,很有可能会被机关枪扫射而全体阵亡。这时,紧跟在若松联队后面的横尾润中士山炮兵十九联队赶了上来。其中香取孝辅上尉的第七中队带着四门炮冲上了第一线。炮兵们将炮拆解后,晚上偷偷地把部件扛在肩上,潜入隔着小河距离敌方40米处,然后重新组装,做好射击准备。

既然敌人建立了坚固阵地,那我们姑且试试用炮口射击怎么样?香取上尉的大胆提议让我吃了一惊,我决定请他协助。所谓炮口射击就是与敌方的枪口相对,从极近的距离高速发炮的一种攻击方式。这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在炮的前进过程中必须十分慎重。于是香取上尉在敌前40米处完成了这项任务。

这是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回忆录的一节。

第二天,即11月18日早上7时,炮口射击开始。由于是近距离炮击,瞄得十分准确。中国军队也因为来自面前的出乎意料的炮击而开始溃逃。立刻,若松联队第二大队从左边的桥、第三大队从右边的桥上渡河,冲入了对岸的阵地。这次香取上尉指挥的在敌军阵地面前的炮击,之后被记入了陆军战例集,成为炮兵战术的一个范例,内容如下:

这次战斗中,第七中队从小队长到分队长都详细调查了敌军阵地的结构,全队齐心协力,成功到达了敌前40米处。准备周到、行动果敢的时候,即使是火炮也能够运送到敌军面前。

第七中队获得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颁发的战功奖状(对特殊军功的奖状)。“将大炮推进到敌前数十米,直接瞄准前方占有优势的敌人进行射击,为确保谢家桥镇做出了巨大贡献。”奖状中的一节这样写道。

虽然过了河,中国军队的反击却异常激烈。若松联队第三大队与敌军展开了正面相互投掷手榴弹的近距离战。但是,到了夜里,由第二大队的一部组成的挺进队悄悄行动,先在后方的村子里放了火。这样一来,中国军队终于放弃谢家桥镇后退了。在这场战斗中也有很多士兵牺牲,如:山口进中士(北会津村荒井)、远藤武雄伍长(原町市石神)、佐藤正胜伍长(岩代町小滨)、星三治郎伍长(田岛町枪泽)、柳沼一郎伍长(郡山市菜根屋敷)、小松龙马上等兵(塙町常丰)、三川安则上等兵(大熊町熊)、渡边计义上等兵(下乡町桧原)、丹治健造上等兵(安达町涉川)、菊池与市上等兵(伊达町伏黑)、高木惠三上等兵(岩城市常磐磐崎)、桥本今朝

治上等兵(郡山市田村町严江)、菅野金次郎一等兵(福岛市下川崎)、蛭田仓之助(岩城市勿来町山田)、铃木隆一一等兵(须贺川市滨田)、永山丰三一等兵(塙町石井)、菅野琴一等兵(东和町南户泽)、须藤卯三治一等兵(安达郡大玉村玉之井)、铃木八郎一等兵(古殿町宫本)……此外还有很多阵亡者。

在这次战斗中,用手榴弹打近距战而阵亡的渡边国男伍长(第二机关枪中队)和小平二郎伍长(第九中队)获得了第十三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的表彰。战士们将战友的遗体火化后,把遗骨装入小盒内挂在胸前,再次投入急行军。江南的道路到处一片泥泞。

踏着泥泞的道路开赴南京

中国军队一旦固守阵地开始抵抗后,就以誓死不移的精神对日军进行猛烈抵抗。上海的老陆宅、马家宅的战斗也可以称之为典型战例了吧。虽然这是其他战场的事情,但当我去占领的阵地察看时,发现竟然还有用锁链捆住双脚的少年士兵。一问那个负伤的少年士兵,他说:“是我自己要求被捆的。”再问原因,他回答说:“为了要战胜自己懦弱的心。”对于他那颗为了保卫祖国的纯真的心,我只有惊叹的份了。然而转入后撤作战以后,中国军队的行军速度变得非常之快,真是怎么也追不上。据我们所知,日军以每天八里为行军目标,而中国军队则是12里。听说当时欧美步兵的标准是六里。总而言之,中国军队自从开始后退以后,步伐就快得令人难以追上。重武器不多,行动比较便利,也算得上是他们逃得快的原因之一吧。

这是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高桥义雄中尉(西会津町野泽)的回忆手记中的一节。

11月18日,若松联队沿着扬子江岸的江南大地向南京急速进攻,突破了设在福山河一带阵地的中心位置(谢家桥镇)。然后再次冒雨在泥泞中前进。包括谢家桥镇在内,我们所路经的城镇多数都已被烧毁,一片狼藉。前方没有日军,可能是后退的中国军队放的火,好像是为了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利用的东西。

20日经过港口镇。已经离开上海走出了约一百五十公里。离目的地南京也只剩一半路程了。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史里有如下的记载。

在第十三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骑马监督之下,炮兵队冒雨在泥泞的路上继续艰难前进。要追赶先头的步兵部队不是一般的辛苦。还必须给后面赶上来的部队在各处先留下标记,这是一个急上加急的急行军。战士们由于11月的寒风和疲劳的缘故都消瘦了,他们用稻草绳绑住破破烂烂的鞋,在泥泞中向前进攻。

这就是行军的实际情况。雨终于在22日停了下来。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在日记中写道:

到顾山镇时雨停了。我联队在此解除了师团尖兵的任务,在久违的太阳下晾晒军装。远处的青山隐约可见,战士们想起了故乡福山的山峦,思乡情切。我联队此后开始作为师团预备队向江阴炮台发动进攻。江南大地,秋意深深浓霜遍野。小菊花、南天竹颜色正艳。

此时,以南京为目标的日军,正在江南大地上一字排开反复进攻着。右边是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大将),左边是杭州湾登陆军(柳川平助中将)。更详细一点说的话,第十三师团从扬子江最右翼进攻江阴炮台,第十六师团、第十一师团、第九师团的主力部队急攻无锡。另外,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也正经由太湖南部向南京急速进攻。各师团都是一副称之为“以南京为目标的马拉松比赛”一样的进攻态势。

在南京的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此时通过德国向我国多次发出和平呼吁。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提出了“中国与日本一起参加对苏的共同防御”、“中国对日赔款”等条件。蒋介石总统称:“不能接受这些日本单方面的主张。”因而断然拒绝,和平的道路越来越遥远。即使日军占领了南京,战争也难以就此结束。11月20日,日本政府设置了大本营,战争进入了持久战状态。

若松联队于11月23日到达了镇守江阴炮台的前沿阵地长径镇。一度放晴的天空再次下起了雨,那是一场夹着雪花的初冬的雨水。长径镇是个位于小运河沿岸的小镇,在小运河对岸设有坚固的堡垒阵地,镇后的长寿河附近是第二线阵地。根本善次郎伍长(矢祭町丰里)、小池重雄一等兵(石川町野木泽)、荒川清一等兵(岩城市常磐鹿岛)、铃木国太郎一等兵(东白川郡饺川村)等许多人在长径镇的战斗中阵亡,他们都是在为了争夺小运河上仅剩的一座桥梁而展开的激烈战斗中牺牲的。

“在长径镇的战斗中,我们若松联队的三一式山炮队晚上悄悄把炮推进到敌前30米处,等到早晨进行直接瞄准炮击,步兵趁中国军队动摇的瞬间从桥上发动突然袭击,这样,总算得以成功前进。”

这是指挥联队炮中队的平林贞治少尉(福岛市矢剑町)的回忆。炮兵和步兵同时采取行动。

连续的战斗与行军

江南的道路一片泥泞。从扬子江吹来的初冬寒风冷彻透骨。第十三师团(由福岛、宫城、新泻出身的士兵编成)经过谢家桥镇和长径镇,急速奔赴江阴。离目标南京还剩150公里的行程。战斗——强行军——战斗……在此过程中,战士们累得疲惫不堪。从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的斋藤义雄一等兵(福岛市濑上字五月田)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当时士兵们的心情。

11月21日。早晨7时出发,开始行军。目的地是哪里,士兵们完全不知道。早上开始下起了雨,行军也变得非常辛苦。江南已经进入晚秋,就连中午都觉得寒风彻骨,全身就像棉花一样疲惫。傍晚,找到一户人家休息时,突然“嗖——”地射来一发子弹。似乎前方一公里左右有敌军阵地。于是我们停止吃晚饭,全体进入戒备状态。入夜后,我军在两个地方设置了警戒阵地,士兵们轮番警戒。轮流速度很快,我那晚共执勤四次,睡觉的时间也没有。我一边执勤一边和战友们聊着故乡的事情。在战场上也只有这些话题可聊了。

11月22日。昨晚由于敌人的猛烈射击我军没能前进。匆匆忙忙地吃完早饭,便按照中队长的命令去侦察敌情。我和战友金作君同行。我们在前方发现了类似兵营的地方,敌兵好像在里面。我们一靠近便遭到了轻机关枪的袭击,于是便潜伏在泥田里。只要抬头就必死无疑。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敌方仍旧攻势未减,我们只好在泥田中匍匐着调转方向,才总算回到了我方阵地。幸好后来山炮队炮击了敌方兵营,我们才得以在轻机关枪的掩护下前进。午饭和晚饭都没吃。晚上11时左右,战斗终于结束了。战友荒川清上等兵阵亡。这次战斗后来好像被称为长径镇战斗。

11月23日。长径镇的敌人还没有消灭干净。我是轻机关枪射手。我们两个分队进行了突击,终于成功地在敌方阵地上竖起了日章旗。我方有很多人阵亡,我们将他们埋葬了。在此期间友军出发了,开始强行军。想要追却怎么也追不上他们。傍晚时刮起了风,我们没有宿舍,非常冷。半夜12时左右终于追上了友军,吃了宵夜。天很冷。躺在战友身旁,聊着的仍旧是故乡的话题。

战斗与强行军,士兵们在泥泞中前进。刚刚经过的是哪个村?往后要去哪个镇?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是遵照命令前进。身着湿漉漉的军衣,睡在被毁的民房里。与战友间的短暂的话题是故乡。

11月28日。每天都在不停地行军。没想到的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能走上极好的道路了。这好像就是通往南京的大道。雨后晚秋的阳光十分难得。听说前方的村落里驻扎着敌军,所以途中战车停了下来。当我们依然照原计划前进时,果然遭到了意外攻击。我们中队立即应战,这一战就是三个小时。敌人仍旧没有退却。直到傍晚时分,敌军才终于安静下来。于是我们进入那个村子里宿营。

11月30日。不知已经走了多少天。除了行军、作战还是行军、作战,没有休息。我们沿着军用公路向江阴城进发,在距离江阴还有三里的地方遇上了大约五百名敌军。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敌

人在付出了惨重的死伤后开始向后撤退。战友田边操一等兵头部中弹牺牲，他虽然是上海战斗以来的勇士，却也终究战胜不了敌人的子弹。分队长斋藤伍长负伤，已经用担架将他送往后方，似乎没有性命之忧。江阴城的敌人仍旧没有撤退的意思，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行军、战斗。士兵们就生活在那样的循环往复之中。江阴之战在这一天以后，成为南京追击战中最激烈的一场战斗。

江阴是上海—南京之间扬子江岸最大的军事基地。矗立于江边的肃山上大小共设有 60 门炮，严密监视着往来于扬子江上的船舶。从 320 毫米口径的要塞炮到 150 毫米口径的加农炮，排成一个长阵，构成了所谓的扬子江封锁线。位于这个巨大炮台旁边的就是江阴城，人口有一万多人，是江阴县的首府，四周环绕着高耸而美丽的城墙。

第十三师团就进攻江阴下达了如下命令：“如果敌人做了严密部署的话，这座城就是几近于坚不可摧的堡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一味进攻，要先封锁敌人行动，再行突破前进。”但是，小野良二少佐的骑兵第十七大队先行侦察后报告说：“敌人似乎没有坚守江阴炮台的意思，而主力部队也好像正在争先恐后往城外逃跑。”于是第十三师团决定对江阴进行正面进攻。进攻阵式由右翼部队（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联队和新发田步兵第一一六联队）和左翼部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和仙台步兵第一〇四联队）组成。

伫立在悠悠的扬子江畔的古城江阴，如果没有战争，这一定是座能够让人沉醉在历史浪漫中的城市。然而，对于士兵们来说，完全没有那份闲情逸致。眼前等待着他们的只是一场拿生死做赌注的战争而已。江阴城边的扬子江虽然非常狭窄，却有着大河一般的风情。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这是李白在武汉为送别将要前往扬州的友人时所作的诗。扬州虽然只是位于江阴上游对岸的一座古城,可一些士兵却忽然把江阴的情景与这首诗的氛围联系在一起了。悠悠江水与天空在远处水天相接,一望无际,让人感到中国大陆的幅员辽阔。在此仅供参考的是,扬子江这个名字源于扬州的扬子津,在中国一般称其为长江。

对江阴的进攻态势已经准备就绪。毫无疑问,古城已经被包围在死亡的烟雾中了。所谓的战争就是如此冷酷无情。

六、攻占南京的前后

江阴城的战斗

中国的古城,大多都有很高的城墙。它们是为了抵御外敌、守卫城池,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倾注了大量汗水建造而成的。北京和南京虽然是大城市的例子,但即使是地方上稍微大一点的小镇,有很多也是由高耸的城墙包围着的。每座城墙本身也都是在倾诉一个城市的历史。江阴(江苏省江阴县城)也是这类城市其中之一。高度只不过超过人头的城墙,长16公里,团团围住这个拥有一万多人口的城镇。引入扬子江水的北门外的护城河,已经变成了被称之为灯港的用于汇集民船的码头,据说这里自古以来就是绢布、药材、陶器的中转站。而且,城里的天宁寺与城外的惠山寺相互映照,更是美不胜收。

江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沿扬子江而下距上海50里,逆流而上离南京50里。这里作为扬子江的交通要塞自古以来就非常繁荣。另外,江阴城外的肃山和钟山上都筑有炮台,严密监视航行的船只。因而可以称得上是扬子江的“水上门户”。

围绕江阴进行的战斗,于昭和12年晚秋的11月20日由前哨战拉开了帷幕。第十三师团将进攻部队分为两部,沼田德重少将率领的第二十六旅团(新发田和高田的步兵联队)从右边发动进攻,山田梅二少将率领的第一〇三旅团(仙台和若松的步兵联队)从左边发动进攻,在突破了南闸镇和板桥镇的阵地后逼近江阴。在此期间,各地所发生的激战就不用多说了。例如,第二十六旅团长沼田少将在花山镇附近由于遭到中国军

队的反攻而被孤立,在得到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救援后才得以摆脱危机。还有为了协助作战而赶上来的岩仲战车队,在青阳镇附近受到了同样的包围攻击,几乎被逼入绝境。幸好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赶到,总算成功脱离险境。

在城墙保护下的江阴,仅靠步兵的力量是难以攻陷的,因此我军接连几天发动空袭。趁此机会,第十三师团在攻下一个又一个前沿阵地的同时不断前进,于12月1日到达了江阴城下。全师团倾尽全力的总攻即将开始。

“师团决定攻击江阴城和肃山的炮台。右翼部队的第二十六旅团主要挺进江岸,攻击肃山炮台,如果可能的话再向江阴城的东门施压。左翼部队的第一〇三旅团由若松步兵六十五联队进攻江阴城的西门,仙台步兵第一〇四联队进攻南门,然后冲进城内。总攻的开始时间是12月1日下午1时,各队从各自的所在地出发,一鼓作气向攻占目标进发!”

在此,让我们以若松联队的西门进攻为中心来看看战斗的情形。对西门的攻击安排是,由右重点进攻的第三大队(平显美少佐),左一线进攻的第二大队(后藤常治少佐),以及作为机动队的第一大队(田中芳雄少佐)中的岩仲战车队,同时切断敌人退路。对于进攻情况,我想通过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回忆录的概要来做一番简单介绍:

12月1日下午1时刚过,守卫前沿阵地横塘里的中国士兵,抵挡不住我联队的猛烈进攻,开始出现动摇的迹象。我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攻势之后,中国军队终于开始后退了。平显美少佐不失时机地命令第三大队全员进行追击。距离西门还有三公里多,他们一鼓作气地追了上去。溃逃者与追击者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先恐后的马拉松追击战。敌军和我方都跑成了一团。

联队通信队的金成正二少尉也加入了追击战当中。他背着电话机跑步前进。配线的士兵紧追其后。金成少尉一边向联队长传达“第三大队正与敌人一起向西门前进”的实况,一边奔跑。外护城河上有一座桥,中国兵想要切断这座桥,却被我们赶跑,随后我们过了桥。我们一直冲到了西门的正前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门关

上了。几乎同时,门前发生了大爆炸。在滚滚浓烟中平少佐喊了好几次“大家没事吧”。我的耳朵却由于爆炸听不见了。第三机关枪中队三木正明中尉腿部负伤,还有许多士兵牺牲。逃入城内的中国兵,开始不断地从城墙上扔手榴弹下来。可是,我们的士兵们却坚守在西门附近并没有后退。就在西门的这番混战时,工兵第十三联队长岩渊经夫少佐赶到了。他指挥30名工兵在门上安装炸药。下午4时过后引爆炸药。可怕的轰鸣声和烟雾……大门完全被炸飞了,所有士兵都冲了过去。然而没想到的是,里面居然还有一扇内门没法突破。

这就是西门的激烈战斗。大爆炸时,渡部七郎准尉(下乡町榑原)、朝仓佑之柱上等兵(福岛市下川崎)、宇内常喜上等兵(耶麻郡热盐加纳村宫川)、铃木达雄上等兵(棚仓町近津)等阵亡。随后在大门爆破后的突击中,桑名正治伍长(长沼町信浓町)等多人阵亡。

血与泪的奖状

突击,写到这里已经好几次用到这个词了。激战时奋不顾身地闯入敌人的阵地中去。这就是突击。

“突击可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无比的勇气啊。”

有实战经验的人如是说。或许在前进途中就会牺牲,又或许闯入敌人阵地后被打死。生死各半,不,必须要有十之八九会牺牲的心理准备。士兵们在被一张红纸征召入伍之前既有务农的,也有普通职员。但是既然已经被送上了战场,就务必要克服心中的恐惧。这就是军队,这就是战争。

“无论怎么样有勇气,实际上还是害怕突击。心里虽然想着一定得站稳了,却怎么也站不起来。结果只有叫一声‘加油’,给自己的内心下达一个超越生死的号令,然后再站起来。这是突击的真实心态啊。”

“为了突击而站立、奔跑,可是却无法清晰地看着前方奔跑,这真是一件残忍的事。战场原本就是互相厮杀的地方,所以有时不积极地向前冲锋就不会有自己的生存之路,也可以说是死里求生吧。提起害怕,匍

匍在战壕中,当枪弹集中射来的时候,非常自然地就会双手抱头趴在那儿。”

“在夜袭突击的时候,我最害怕的其实是同伴。在黑暗中乱斗,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同伴刺伤。如果对眼前的黑影稍一犹豫,自己就会被杀。所以必须当机立断地用刺刀向黑影刺去。在黑夜里有时的确会分不太清楚敌我。”

“接到了突击命令,如果因为害怕而无法出击的话,以后就会被战友们冷眼相待。有些人就是因为感受到了这种气氛而去突击的。也就是所谓的被军队这一集体逼出来的突击啊……这和适应战斗可不一样。”

说了一大段关于突击的闲话,但是看看在大陆的战斗记录,突击的场面相当多。上海的老陆宅战斗、谢家桥镇战斗,以及现在的江阴城的战斗,其间不断出现突击战。

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于12月1日黄昏突击江阴城的西门,形成了以第三大队为中心进攻城内的战斗态势。可是外侧的大门虽然被炸毁了,内侧的大门依旧岿然不动。必须要把它炸开。2日凌晨2时刚过,工兵第十三联队的爆破班利用黑夜悄悄靠近内门,费尽心思把炸药装好。“战士们攀上城墙附近的树,把绳子勾到内门上,人顺着绳子爬过去,然后安装炸药。工兵们的技术简直神乎其神。”若松联队的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回忆录中这么写道。凌晨4时爆破。与此同时,第三大队的士兵们攻入了城内。

同一时刻,仙台步兵第一〇四联队也从南门突击成功。城内的巷战持续了四个小时左右,城内的守备兵力不多,到上午10时,城墙和县政府上都插上了日章旗。这时肃山的炮台也被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联队、新发田步兵第一一六联队等成功攻下,而钟山的炮台也落入了若松联队的第二大对的手中。肃山和钟山上一一直封锁着扬子江的巨大的要塞炮此时只留下寂寞的身影。

上海—南京的扬子江沿岸最大的军事基地江阴,就这样完全落入了第十三师团的手中。那时是昭和12年12月2日的上午。

江阴战斗中也有很多人阵亡了。小泉久一少尉(大熊町大野)、金成龟太郎少尉(岩城市平研町)、宫崎一郎中士(浪江町大堀)、渡边治伍长

(二本松市大平)、河户三郎(福岛市大森)、远藤武上等兵(古殿町宫本)、柳沼次良(郡山市安积町永盛)、生天目甲之助(塙町笹原)、高木三平(岩城市常磐磐崎)、小林一会(小高町沼上)、大峰清太郎(岩城市丰间)、吉田重太郎(盐川町驹形)、阿部美次(福岛市庄野)、国分正见(同市左仓)、三瓶理喜男一等兵(岩城市三和)、松本勘次(会津若松市祝町)、柏木一(东和町太田)、小手森喜三郎(灵山町石户)、佐川信孝(岩城市泉)、小野寺平卫(喜多方市)、横田武广(郡山市中田町)、佐佐木经雄(岩城市常磐磐崎)等等。

若松联队在江阴城的果敢进攻,获得了军方的奖状。

“若松联队作为向南京进攻的先遣队,前进途中突破了各个坚固阵地。在进攻江阴城的战斗中,巧妙地抓住战机,果敢突击,为战斗的全盘胜利奠定了基础。”

若松联队开赴南京

所谓战争,无论是胜是败,似乎都会给人留下虚无之感。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扬子江岸的江阴城内为胜利高呼万岁。虽然这场战斗甚至赢得了奖状,可是在拥有胜利感的同时,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感觉堵在心里。这一定是面对许多战友的牺牲而产生的虚无的感觉。

若松联队在上海的老陆宅、马家宅战中战死 616 人,之后在谢家桥镇—长径镇—江阴城的持续进攻作战中战死 80 人,总共牺牲 696 人。而从若松兵营出发时的组成兵力为 3 600 余人,因此战死率达到了两成。此外,1 500 余人负伤,300 余人患病,全都离开了部队。阵亡和伤病人员合起来共有 2 500 人。一起从若松兵营出发的 3 600 多名战友中,至今仍然平安无事的仅有 1 100 余人而已。这些数字显示了登陆以来进攻距离为 150 公里的两个月的战斗是何等的惨烈。同时也告诉了人们,战争是怎样轻易夺取人的生命的这一事实。当然,在若松的兵营里,被那一张红纸召集而来的士兵们在经过短期训练之后,就一个接一个地被送到在前线战场上的联队中去。作为补充兵力到达上海马家宅的士兵有 420 余人,到达江阴城的有 370 余人。然而,加上这些人,联队的总兵力仍不足 2 000 人。

攻克江阴城的第十三师团在四周警备了一段时间后,于12月7日开始行动。主力部队向扬子江沿岸人口20万的镇江急速前进,另一部分(新发田步兵第一一六联队主力)横渡扬子江去控制北岸的靖江城。也就是要完全控制南岸的江阴城和北岸的靖江城,确保扬子江航行安全地渡江作战。

第十三师团主力所开赴的镇江,是扬子江南岸上海—南京之间最大的城市。如果能攻占镇江,南京也就唾手可得。让我们从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史的概要来看看南京作战的大致情况。

12月7日,第十三师团从江阴城西门出发。顺序为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师团卫生队、仙台步兵第一〇四联队。至此为止前方不再是泥路,部队在坚实宽阔的军用公路上行进。疲惫的脚时不时地被鞋子磨破,这是一次无情的急行军。7日,行军30公里;8日,行军25公里,就这么继续着,第四天即10日进入镇江。连日来的急行军,人马都十分疲劳。拖着跛脚的人、掉队的人混在各个队伍里乱成一团。我们自从登陆以来第一次在镇江看到了电灯。镇江也是从前遣唐使阿倍仲麻吕^①、空海和尚等人求学的城市。第十三师团没有在镇江好好休息,11日继续前进到达了高资镇,渡过扬子江向北岸的扬州进发。

扬州因为是杨贵妃的出生地而闻名于世。^②

从江阴城到镇江,中国军队的抵抗是零散的。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镇江郊外的镇江蚕丝学校宿营时,接到了新的命令:

“第十三师团主力渡过扬子江向北岸进发。此时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与师团主力分离,由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梅二少将指挥,向南京开

^① 阿倍仲麻吕(698—770),中国名晁衡,日本遣唐使。唐玄宗开元五年(717年),晁衡因汉文修养良好而被选为遣唐留学生,当时他不满20岁。入唐以后,他的学识和品行,很快受到唐朝皇帝和学界的赞赏,先后任校书、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和镇南都护等职。

^② 原文如此。

进,攻占乌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台,为军队主力能够顺利地攻下南京做准备。山炮兵第十九联队行方正一少佐的第三大队,以及小野良二中佐的骑兵第十七大队,也配备到若松联队开赴南京方面的行动中去。”

若松联队奉命直接参加南京攻击战。暂时与师团主力分离而向南京进发的若松联队,虽然在这之后巧妙地占领了乌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台,实际上却被卷入了意想不到的事件里。镇江的街市灯火通明,柏油马路四通八达。当时,福岛县内有柏油马路的只有福岛、郡山、会津若松等各市的中心街道,士兵们似乎非常不习惯走这种坚硬的道路,看看当时的日记一定能找到“脚走出了茧子真受不了”这样的字眼。另外,由于国内的电灯没有普及到山区,因此也有些记录表现对城市灯火的惊奇之情。并且还有士兵写道“离南京已经很近了,战争也许很快就要结束了吧”。然而,不能就此沉浸在轻松的感慨之中。若松联队转而开始向南京急速前进。

这时,日军对南京的进攻态势已经切实准备就绪。12月12日当天,上海派遣军的第九师团和第十六师团经句容向南京的正面逼近,杭州湾登陆军的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从芜湖方面向南京的背后不断逼近。这样,攻入南京只是时间的问题了。若松联队于12月13日从镇江开始进攻。

攻克南京与逃兵

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由于从四面攻来的日军而即将陷落。一部分军团聚在城门前,眼看着就要攻入城内。“只要占领了南京,战争就要结束了。”——因为日军士兵们是坚信这一点而一路进攻而来的。有文章是这样描述当时士兵们的心情的:

对士兵们而言命令是绝对的。如果想活着回去,无论如何必须要进攻到南京。士兵们之所以能够忍受奔赴南京的漫漫长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并不是因为士兵们自身迫切盼望着攻占南京。但是,他们确信只要占领了南京,自己就能从这场战争中解放出来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在日本人的常识中,占领首都就是敌方的失

败——即意味着战争的终结。

但是

可是,实际上战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陷入了泥沼的深渊……

无论如何,日军以比当初作战计划快了一个月的速度蜂拥至南京周边地区,三天内攻破首都防卫线,包围了以唐生智将军为守将的十万中国军队。于是从12月12日到13日,日军突破了各地城门,涌进城内。40万一般市民因为无路可逃而惶惶不知所措。消息灵通的日本报纸,10日就报道了“南京陷落”的消息,国内各地陶醉在一片庆祝胜利的欢乐气氛中。

现在,让我们把话题转到进攻镇江的第十三师团上。师团主力虽然已经从镇江渡过扬子江向北岸进发了,但这时(12日)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又接到了特别命令:“占领南京郊外乌龙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指挥官是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梅二少将。兵力方面除了若松联队之外,还包括山炮兵第十九联队、骑兵第十七大队等,共计两千两百余人。在此,让我们以根据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日记完成的回忆录,来看一下当时的事件经过——

12月12日——若松联队到达了镇江的金山寺以西地区。这个地方有很多寺院和名胜,如果是一般旅行的话,真想花上几天在附近好好转转。可是,现在是进攻接着进攻……上面下达了在某个学校宿营的命令。并且命令:“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少将,指挥若松联队以及配属部队,攻占乌龙山和幕府山的炮台,为军主力能够顺利地攻下南京做准备。”

师团主力已经向扬子江北岸进发了,虽然我早想到了若松联队会奉命援助渡江,但这仍然是个意料之外的命令。不过若松联队至今为止一直都只是从旁进攻,这次是第一次能够登上正面舞台的一角,这么一想的话倒也不错。

12月13日——老早就从军方得到了“攻占南京”的通报。若松联队首先在天没亮时派遣田山芳雄少佐的第一大队出发攻占乌龙山炮台。接着,主力部队以后藤常治少佐的第二大队为先头部队向

幕府山东面方向前进。这个地方受到南京战的余波影响，有败退的中国士兵出没，一般百姓则是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

乌龙山炮台是位于南京紫金山东面的要塞阵地，备有 18 门各种大炮，监视着扬子江，给逼近南京的人很大的压迫感。但是，在日军已经攻入了南京城内的此刻，炮台成了无用之物，中国兵已经放弃守城。田山少佐的第一大队于 13 日下午，由第一中队的长泽市太郎少尉担当尖兵登上山顶，扬起了日章旗。

与此同时，联队主力在确认乌龙山炮台已被占领的同时，依旧照原定计划赶往幕府山东面的杨梅宅。夜色渐渐降临。这时，若松联队突然遇到了意料之外的中国的大部队。那是一支全副武装却失去统率的大军。虽然失去了统率，却拥有数量庞大的兵力，如果正面交锋的话，仿佛随便一捏就能轻易粉碎若松联队这仅有两千余人的小部队。他们似乎是从南京城内逃出来的。

然而，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虽然全副武装，却没有向我们发起攻击。我方一说“扔掉武器”，他们立即遵照指示做了。这就是那支没法把他们一一逮捕的庞大军队。很多人这么回忆说：“虽然他们没有攻击我们的意思，但是要冲进那么庞大的大军里去，实际上我们还是非常害怕。”若松联队就这样继续前进了。虽然应该解除大军的武装，但眼前最重要的是遵照命令攻占幕府山。

12 月 14 日——我和角田荣一中尉下令第五中队冲入敌人的大军中，攻占幕府山。谁也不知道冲入敌人的大军之中会发生什么。我用水杯为他们的成功祈祷。第五中队（配备一个机关枪小队）出发以后，联队主力一边解除中国兵的武装，一边前进。他们人数众多，我们四周弥漫着一不小心他们就有可能发难的紧张空气。

若松联队不知何时卷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态中。

若松联队遭遇的降兵

日军已经陆续涌进了南京城内。没有保住首都的中国军队向还没有被日军揽入包围圈的幕府山方向溃逃而去。也许是想渡过扬子江逃往对岸。可是,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已经往那边进发了。

昭和12年12月14日天没亮,兵力两千两百余人(配属了山炮兵第十九联队等)的若松联队卷入了那队中国大军的漩涡中。他们已经失去了统率,虽然有武装却似乎完全没有战意。最初我们想把每个中国兵都收容起来,可是这样一来光是俘虏就会有本联队两三倍的人数了。结果只有通过“扔掉武器”的形式,让他们自己把步枪扔进河里,然后我们再走进他们的大军里。

此时要进攻幕府山炮台的角田荣一中尉(郡山市富久山町小泉)的第五中队,在炮台入口的鸠山镇附近,也意外地陷入了中国兵的大军里。角田中尉这样回忆道:

忘不了那天的事情。我们一行120人向幕府山方向前进,天空挂着一弯新月,月光中忽然出现了人数众多的大军的黑影。我立刻感到‘一旦战斗的话必定全部牺牲啊’。既然怎么样都得死……下定决心后,我在路上坐下来点燃了一支香烟。一旦他们靠近的话就只有拼死一搏了。这就是所谓的傻大胆吧。然而,我们刚对靠近过来的他们一开枪,对方所有的人都举手投降了。他们虽然都有武装,可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

我们把他们解除武装后又一个个押着他们。平均一个人押五六人,简直忙不过来。带着这么多俘虏是不可能步行进攻幕府山炮台的。对于这些中国兵,我们只能把他们的武器重重地摔在石头路上,或者扔进河里,然后继续前进。就这样,在上午10时左右,我们总算到达了幕府山顶的炮台。残留在炮台的中国兵到底还有些战意,我们经过一番激战,终于占领了炮台的监视所,为了向友军告知占领的消息,又在那里竖起了日章旗。

同一中队参加了幕府山攻击队的樋口藤吉上等兵(保原町二丁目)

也这样回忆说：

我们只有 120 人。尽管如此，我们却在大量的中国兵中间前进。真是非常紧张。他们全副武装。虽然没有想反抗的样子，我们却不知道万一发生什么的话他们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举动。最初想把他们当俘虏抓起来，带着他们前进。但由于俘虏人数不断增加，最终还是决定‘释放’他们，还他们自由。于是再遇到新的中国兵时，就‘让他们放弃武器’，解除武装后继续前进。即使如此，在这么多的中国兵大军中前进，这次的幕府山进攻的确需要很大勇气。

结果根据有关人士回忆，第五中队“仅仅在幕府山大概就解除了约三千人的武装。”而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在根据日记完成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2 月 14 日上午 11 时，联队主力到达了幕府山东部地区。同时我们看见了幕府山炮台上飘扬的日章旗。虽然还不了解角田中尉和第五中队是从哪里、是怎样突破的，可日章旗确实是已经树立在山上了。人数众多的中国兵，他们一定是那种即使抵抗也会立即举手投降毫无斗志的军队。联队在中午之前控制了周围地区，完全占领了幕府山炮台。

尽管这样，若松联队还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抓到了很多俘虏。对于俘虏人数，有的说：“一万人左右”，有的说：“不，没那么多”。联队的人也不了解实际数字。联队机关枪中队的大友登茂树少尉（梁川町栗野）说：“我们没有一个一个地解除武装，清查人数。”两角联队长的回忆录里写着数字。这个数字好像是以来自于各中队的报告为基础得出的。

在幕府山一带抓到的俘虏人数十分庞大。最初的报告是 15 300 余人。但是仔细调查以后，由于其中还包括妇女孩子和老人等非战

斗人员,后来又据此分类释放了一部分。剩下的有8000人左右。

为什么俘虏中还混有妇女孩子和老人呢?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的日记中有记录。“12月13日——所到之处都是阵地,即使想找宿营的地方,但房子全都被烧毁了,一点办法也没有”。以及“12月14日——向幕府山前进。一到炮台附近就为如此庞大的降兵人数而苦恼。附近的文化设施、村庄,全都被敌人烧毁了。”失去了家园的人们大概就是这样混进军队里的吧。总之,我们立即释放了非战斗人员。

若松联队抓了大量俘虏。然而,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们陷入了窘境……

南京是中国的古都。例如在魏、蜀、吴鼎立的“三国时代”,三国首都分别是魏都洛阳、蜀都成都、吴都建业(南京)。其后的西晋时期首都建业改名为建康。西晋灭亡后,又作为吴、东曹、宋、梁、陈等的首都,历经了几朝的兴衰。后来为了与北方的北京相对,更名为南京。这里原本就作为“王气之地”,多次成为那些想要称霸中原的人的揭竿之地。还有紫金山、雨花台等很多历史名胜。这是一方地势起伏、历史动荡的土地。而如今,充斥在南京的是军靴的响声,以及市民的慌乱。战争的悲惨,凝缩在南京这片天地里。道路上随处都躺着战死者的尸体,而遭到破坏后的一切都是那么凄惨。因为上海的战场是郊外,而南京的战场却是市区。

七、南京事件和混乱的局面

屠杀事件的背景

南京几乎被日军全面占领的时间,是从昭和12年12月12日—14日。蒋介石将军的国民政府已经逃离了南京,把首都迁往了汉口。而镇守南京的唐生智将军,在日军逐渐逼近时,也已经悄悄地渡过扬子江向北岸逃去。也就是说,在南京只留下了失去统帅的中国士兵和被战火围困的市民在四处逃窜,场面极其混乱。

早在南京陷入这场混乱的几天之前,日本国内已经有了占领南京的

相关报道,到处弥漫着庆祝胜利的喜庆气氛。尤其当11日上午10时收音机里的临时新闻广播了占领南京的消息时,于是在福岛县内汽笛声一时间响彻天空,庆祝活动随之拉开了帷幕。虽然实际上当时南京还没有被占领,但军部已经提前下达了指令,庆祝活动已经完全准备就绪。

福岛市于上午11时拉响了汽笛,13 000名市民聚集在福岛的一小校园内。手里握着小日章旗的市民们一边在市内游行,一边高唱着“纵然有几万敌人……”的军歌。到了晚上,还有一万人提着灯笼列队在市内的繁华大街上游行。

郡山市的麓山公园内也聚集了一万市民,白天是手握小旗游行,晚上是手提灯笼游行。在岩城市的平地区也有市民高唱军歌游行,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大街小巷。在军都会津若松市,除了小旗游行以外,晚上在鹤城还举行了焰火大会。此外,县内各地也都同样举行了庆祝活动。

“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攻占了这里以后,战争就要结束了。县民们都抱着这样的想法。因此,当天的活动其实包含了大家庆贺‘战争结束’的喜悦心情……”

从昭和12年—20年,战争一共持续了八年。但是,像这样有组织、有准备的盛大庆祝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原本有很多人相信“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认为“占领南京”之日就是结束之时,如此隆重地准备庆祝活动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吧。

与日本的热闹场面不同,沦为战场后的南京,尤其在12日—14日之间,处于异常的混乱之中。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空袭,炮击城门等处,战车队挺进城内……中国军队先是防卫作战,然后逃亡。一般市民乱成一团,还发生了抢劫事件……市区各处发生火灾,炮声轰鸣,南京陷入了难以名状的混乱之中。就在这样的状况下,“南京大屠杀”发生了。徒步走过中国现代史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如下写道:

日军于12月12日进入南京。当时还有中国士兵和市民想要通过仅剩的一个城门前往扬子江北岸。场面极度混乱。他们有的就在准备过河时遭到空袭而溺水而死。日军在南京杀了42 000人以上的市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孩子。而在从上海到南京

的途中估计杀害了30万非战斗人员。进入南京城内的大约五万日军,犯下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屠杀、掠夺等暴行。

这是斯诺的《亚洲的解放》内容概要,所谓的“南京大屠杀”就以这种形式被传播开来,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战后的军事审判对这次事件进行了审理,当时的军队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南京突击队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等相关人员被判处死刑。

这一切是不是日军的罪孽,我不打算再去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想引用另一篇由在南京取材的美国记者查尔曼·德丁所写的报道:

12月12日起日军的炮击开始到达市中心。中国军队似乎已经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抢劫商店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市民们这时已经放弃财产而竭尽所能去保护自己的生命。到傍晚时分,几千名中国兵脱下军服,或偷或借地换上了平民的衣服。深夜,通讯部^①大楼被人放火,火势一下子蔓延开去。中国兵开始从下关乘船向扬子江北岸逃跑,很多人在一片混乱中被淹死。13日,虽然市区的战斗还在继续,但中国兵的大部分已经全无战意。还没来得及从下关逃走的士兵被逮捕,日军开始进行有组织扫荡。入夜以后虽然还不时有战斗发生,但到14日中午,武装的中国兵已经被完全被消灭,日军占领了南京。

这是第三国的人所写的现场报告记录。掠夺、放火、混乱中的死亡,这些事情相继发生。在日军闯入市区以前,就已经发生了危机,许多人死亡,许多民居被烧毁。我并非要为日军辩护,因为把他们推向如此绝境的不是别人,正是日军。

更远一点来说,我不得不认为,是战争本身导致了如此悲惨的事态发生。的确是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情。

^① 原文如此,似为交通部。

若松联队和俘虏

南京在日军进攻的前后变成了一个混乱的城市。前半段是由于战败而自暴自弃的中国兵的暴乱,后半段是占领南京入城后的日本兵的暴行——因此造成很多人死亡。在这个混乱之城里的美国记者查尔曼·德丁通过电报发回了详细的报道。我们来看看后半部分:

进入南京城的日军,把放弃武器失去救援的中国兵有组织地集中起来处死。从枪杀到刺杀。日军在三天内虽然自称扣押了15 000名中国兵,但其实处死了大约两万人。平民也不时地成为日军的牺牲品。日军进入一个地区后,闯进每家每户,盗取粮食物品等。抵抗的话就被枪杀。记者在某个地区看到,这个地区由于炮击几乎完全遭到破坏,遍地都是逃出后被杀害的平民尸体。我想这些死亡人数与中国军队士兵的人数大概一样。当然日本军团内部本身也有人保持着纪律,但总的来说日军在南京所留下的足迹,已经成为评价日本这个国家时的一个污点。

这是关于闻名世界的“南京屠杀”问题的报道。如果这是事实(在此想再强调一遍),就不能把它简单地说成是在战争这种异常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也必将给人们留下十分不快的印象。而不论怎样,沦为战场后的南京成为了一个混乱与恐怖的城市,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此有件事值得关注。即从13日夜至14日早晨,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南京郊外的幕府山一带逮捕了大量俘虏,而这些俘虏最后又是怎样处置的?根据若松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以日记为基础完成的回忆录来看,上面写着当初俘虏有15 300余人,后来释放了其中混杂的一般百姓,剩下的有8 000人左右。在此我想通过回忆录来介绍一下俘虏后来的情况。

我们把8 000人的俘虏关押在幕府山脚下十几栋狭长的建筑物(我想大概是幕府山炮台使用的建筑物)里。周围只围了两三根不完整的铁丝网。暂且先把储藏在炮台地下仓库里的食物搬运上来,

指示他们自己烧火做饭。

若松联队到这个阶段为止似乎还没有以开枪等方式杀人的意向。

“当时，若松联队在不断的进攻中消耗了大量兵力，在幕府山时只有大约一千数十人左右。这点兵力不可能全面处置大量的俘虏，只能在四周安排卫兵监视。晚上做饭时发生了火灾。火势不断蔓延开来，场面极为混乱。虽然立即派遣第一中队进行灭火，但这场火是俘虏们计划好的，他们趁着当时的混乱，一半的俘虏逃跑了。当然日军立即开枪射击以制止他们逃跑，但黑暗中步枪无法瞄准。根据报告显示，‘逃亡4 000人’。”

放火、逃跑……这时担任收容俘虏建筑物的警备工作的是第十二中队（八卷竹雄中尉），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是这样的：

建筑物是草屋顶的狭长的简易木板房。开始时并不感觉他们是俘虏，只不过既然看他们有投降的意思，就让他们全体在那里宿营了。虽然已经解除了武装，但并没有一个一个地搜他们的身子，所以可能有的士兵身上还藏有炸药。虽然我们的警戒并不严，但他们却开始复仇了。一下子两栋房子就全部被烧毁，一半左右的士兵趁机逃走了。但是我们，说实话心里想的却是“这下安心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8 000人的话，从地下仓库取出来的粮食只够稍微填一下肚子。他们好像已经几天没有吃过东西了，争抢着吃那一点点的粮食。而我们，为了让他们有东西可吃而只能拼命地四处奔波寻找食物……并且我们还担心，万一他们由于饥饿而引发暴动的话，就凭我们联队会压制不住他们。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两角联队长的回忆录：

俘虏的逃亡，一般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但我却认为他们逃跑反而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粮食不足。所以我决定不向上级汇报逃跑的事，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八卷中尉说：“在他们之中，有一个被称为参谋的中校。他虽然混在一般士兵里，态度却一直没有妥协过。看起来他好像负责内部指挥。”俘虏人数到这个阶段时减到了4 000人。

无情的军令

昭和12年12月中旬——这一天对南京来说是最坏的日子。攻入南京的日本军队对战败的中国士兵进行无情的扫射，四处逃亡的一般民众也被卷入这场杀戮，造成很多人死亡。有时他们还向已经投降的中国军队开枪，死者无数。这些死者一个接一个地被扔进扬子江中。

这其中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捕获的俘虏们后来怎么样了？根据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的回忆录记载，当初的俘虏人数是“15 300余人”。这超过了至今为止最为可信的16日的《朝日新闻》报道中南京特电“若松联队逮捕俘虏14 777人”的数字。而15 300余人的俘虏中，释放了非战斗人员后，剩下8 000人左右。但是据说在收容所的火灾中一半左右的俘虏逃跑了，最终剩下“4 000人左右”。

这时运输队还没有追上来。粮食也没有了。虽然士兵们自己都没有食物了，但若松联队的相关人员回忆说：“上级安排我们给俘虏寻找食物，真是非常辛苦。”他们饿得“出了收容所的院子后就拔草来吃”。实际上我们非常担心“因此而万一引起暴动的话，我们联队能否镇压得住呢”。15日和16日也好像都没有充足的粮草供应。

司令官的入城式于17日举行，不允许有任何的闪失，所以军^①方面向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栴二少将下达了“处置俘虏”的命令。并且军还频繁地督促这项处置任务。山田旅团长坚决拒绝执行。我也支持山田旅团长，表明了自己“恕难从命”的态度。但是军却下达了执行处置的强硬命令。

处置好像就是“杀”的意思。

山田旅团长含着泪向我们联队说明了原因。经过种种考虑之

^① 指上海派遣军。

后的结果是,除了趁着黑夜让俘虏逃跑之外别无他法。这对于作为联队长的我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事。我叫来第一大队的田山芳雄少佐,下达了如下的命令:“17日晚上,把逃走后剩下的俘虏全部集中到幕府山北面的扬子江南岸,趁天黑,用船把他们送到北岸释放。为此,立刻去附近的村庄收集船只,预备好中国人舵手。”——这就是我的命令。

违反军方命令,两角联队长决定释放俘虏。关于这件事山田旅团长的日记里有如下记录:

15日——我派本间少尉去师团询问关于处理俘虏的事情,得到是“处理掉”的命令。各队没有粮食苦不堪言。从俘虏军官那里听说幕府山有食物。给俘虏提供食物已经变得非常困难。16日——派相田中佐去司令部商量处理俘虏的问题。在监视俘虏方面,田山大队长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

虽然山田旅团长已经去世,但他在向记者追述时曾提到,派遣相田中佐“是去传达不能杀俘虏的意思”的。他还说到,结果,考虑得都让人厌烦了,“我和两角联队长商量决定,晚上悄悄地把俘虏放掉”。

那么,为释放所做的准备真的进行了吗?曾属于第一机关枪中队的箭内享三郎准尉(福岛市泉)这样回忆道:

田山大队长和我们第一机关枪中队的中队长宝田长十郎中尉商量要在扬子江岸建一个船码头。我们接到命令后,就前往江边砍柳树,搭建造码头用的脚手架,并且割出了一片足够集合的地方。砍倒的树木和砍下来的枝条就那么堆了起来。说实话,我们不是神,那个时候完全想不到那些木头和枝条居然会被他们当成武器,成为攻击我们的元凶。我记得为了搜集船只我们来回在江边查探,一共找到了十艘左右的船。

箭内准尉说,砍下来的树木和枝条,后来被俘虏们握在手中当棍棒来使,成为释放时发生“暴动”的原因。联队炮中队的平林贞治少尉(福岛市矢剑町)也说:“我们这些军官接到内部命令说——以极为秘密的形式,把他们送往对岸,不行的话就送往下游的镇江方面。”

但是,这样的释放准备工作,还是由于意外事态引起了混乱。

偶然射向俘虏的枪弹

昭和12年12月17日,南京入城式举行了。骑在上面的日军将军们,满脸都是得意洋洋的笑容。第十三师团第一〇三旅团长山田梅二少将、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长两角业作大佐,以及集中成一个中队的士兵也参加了入城式。若松联队收容的四千名左右俘虏,将在入城式结束以后的晚上释放。而释放行动的最高潮,却突如其来地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首先我想介绍两角联队长的回忆录:

17日,我和山田旅团长一起扛着军旗参加了南京的入城式。松井司令官骑着马款款而来,紧接着在他身后的是鸠彦王宫、柳川司令官。当年信长、秀吉入城时也不过如此吧,能够列席如此隆重的入城式令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在这之后,松井司令官等和各将领们干杯。结束后,我们参观了紫金山等地,傍晚时分,回到了幕府山的露营地。刚回来,第一大队的田山芳雄少佐就报告说:“俘虏们已经顺利地集合完毕。”夕阳西下,天色暗下来了。俘虏们正被送往扬子江北岸,他们一定在为将被释放而高兴吧,我在宿舍的书桌边这么想。但是,突然之间,江岸方向传来了枪声。那一定是……我心里想着,枪声却一直没有停。突发了不测事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俘虏集合后,第一队乘着小船向扬子江出发了。船上有两三百人。来到中游附近时,却从对岸射来了子弹,小船随即开始失去平衡随波逐流。大概是对岸的中国兵误以为日军要渡河进攻。俘虏们听到这枪声,立刻认为是日军把他们赶上江面后再执行枪杀的枪声。一瞬间集合地变得一片混乱。很多俘虏一下子炸开了锅,疯狂地四处逃窜,简直控制不住。不得已只好开枪力图让他们静下来,

但由于是黑夜,大部分人向陆地上逃走,还有一部分则跳入扬子江中。第二天早上我也去看了,因被我们开枪击中而倒地的人非常少。一切到此结束了。说简单的确是很简单,然而这就是事实。表面的东西有太多夸张成分。处理完毕后,我把一切如实地向山田旅团长报告了,旅团长也放心了,明白了我的意思。释放后的士兵,也许再次拿起了枪也说不准。但是,他们恐怕再也不能变成原来那样的勇士了吧。可无论怎样,即使只枪杀了少数的俘虏,也总是会让人心中不快的,尽管国际法也是允许枪杀逃跑者的。

我想指出的是,这部回忆录并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写的。这是已经去世的两角联队长在他生前偷偷地借给记者的,是一部已经写完了的回忆录。记得当时他说:“人们都认为南京大屠杀是与若松联队有关的,而真实情况就写在里面了。”两角联队长是个有人情味的联队长,它亲近士兵下属,而在战斗中又具有决断能力。他把回忆录交给记者时说道:“有太多误传了……”脸色也随即阴沉了下去。

在此,再来看看山田旅团长的日记:

17日——入城式。参观中山陵、军官学校,5时归队。18日——为俘虏的问题而绞尽脑汁,前去视察江岸。19日——由于俘虏的事而推迟出发时间。上午,为全体出发做准备。20日——从下关前往浦口。途中横尸遍野,10时到达浦口会见国东支队长。

淡淡的语言。但从18日的记录也可以看出前一晚事件的痕迹吧。还能看出有多少死者,以及19日似乎对死者作了处理的事情。

虽说是不得已才开枪的,可无论如何还是向俘虏们开枪了。那么死亡人数到底是多少呢?这是想要确认的一点。在第三次补充兵力的17日夜,从日本赶来南京编入联队的丹治善一上等兵(福岛市大森)等人对此还记忆犹新:

那段记忆还十分清晰。因为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第一次目睹战

场,而且还有那无数的死者……我们这些新来的补充兵力 18 日早上,突然被带往江岸现场,要给我们展示一番战争的残酷场面。死者在河岸一角有的被摞在一起,有的则散乱地摊在地上。我想那也许死了千人以上吧。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整理死者时,大概只有四百人左右。无论如何只要有这么点死者,看起来也会觉得非常多啊。死者大部分被扔进了扬子江里。

其实在这场骚动中,若松联队也死了七人。有的负责警备的军官和士兵被俘虏们用砍倒在江岸的树木和枝条为武器打死,还有的则是被同伴的子弹误杀。可想而知当时是怎样的一番混乱场面。总之,在这 4 000 名俘虏之中,一大半趁着黑夜的骚动逃走了,一成左右在枪弹中倒下。

战争中的悲剧

在日军举行南京入城式的 17 日夜,若松联队计划将 4 000 名俘虏释放到扬子江对岸去。此时对岸传来的枪声却刺激俘虏而引发了一场暴乱。为了制止俘虏的暴乱日军开枪了。虽然大半的俘虏逃走了,但是江岸边上仍旧留下了近一成俘虏的尸体。鲜血与无数的死者……混乱之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片阴森的景象。

让我们通过当事者的叙述再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原第十二中队长八卷竹雄中尉(梁川町中町)这样回忆说:

我想从幕府山到江边大约有四公里左右。我们为了释放他们,让他们列成四列纵队步行前进,他们并不知道目的地。我们人数很少,不知道会不会在什么地方发生暴乱,所以比他们还要紧张。果然途中他们就开始逃跑,连我们中队有的士兵也被他们挟持走,然后途中被他们杀害。虽然付出了这样的牺牲,但无论如何我们仍然为了释放工作而做着持续的努力。

照他的话来看途中就有不少人逃走了。不过既然是要释放的,所以

似乎日军也并不在乎,但他们仍旧认为不将俘虏释放到对岸去是不行的。第一机关枪中队的箭内享三郎准尉(福岛市泉)也这样回忆道:

去江边集合的最紧张时刻,一瞬间暴乱发生了。他们一起站了起来,开始挥舞着树枝什么的袭击卫兵,打倒他们然后逃跑。有的跳进江水里,有的向陆地上跑,黑夜中的突然事件就这么发生了。我军的机关枪开始射击了。这时在我附近的第一大队长田山芳雄少佐喊道:“停止射击。”然而,由于当时实在太混乱,没有人服从命令。

田山大队长大喊“停止射击”也没有用,枪声还是持续了好一阵。而且在这场混乱中枪弹好像也打到了我方的同伴。第五中队长角田荣一中尉(郡山市富久山町)说:“当时非常混乱,虽然我跟在队伍最后面,可是由于我方的枪弹也朝自己人射过来了,所以还是不得不趴下来躲避。”

在这意想不到的骚乱中,若松联队死了七人。联队机关枪中队的大友登茂树少尉(梁川町栗野)回忆说:“我的中队里也死了军官。他被卷入俘虏的暴乱之中,身上被刺达七处之多。在那样的暴乱中联队只死了七人,或许的确算得上是比较少的了。”联队炮中队的平林贞治少尉(福岛市矢剑町)说:“虽然是不得已而开枪的,却仍然是一幕遗憾的悲剧。结果在我的回忆里那就是一次‘战斗状态中的事态’。”

除他们以外我还听了很多当事者的叙述,情况大致相同。释放计划导致了偶发的暴乱结局,敌我双方都有多人死亡。这样一个事件,其本身就是“战争的悲剧”。作为参考的是,在战后的战犯审判中,若松联队的这次事件没有被追究,因为这并非故意,而是偶然发生的。

若松联队在20日带着不幸的回忆离开了南京,从下关渡扬子江向浦口进发,之后与第十三师团主力会合,参与所谓的淮阳平原警备任务。

“第十三师团驻扎在滁县附近,警戒六合、来安、沙河集、全椒、朱龙桥、桥林镇、江浦等各地,以确保淮阳平原的安定。在此期间,师团必须警戒北方和西北方向,尤其要为进军西北方的临淮关做准备。”

这是南京作战后第十三师团的任务。马上就要在此迎来昭和 13 年的新年了,各联队于是在以下的各驻留地作短暂休息。部署情况是,在两万人口的滁县驻扎的是师团司令部和山炮兵第十九联队;以滁县为中心的南部地区的是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在西部朱龙桥的是仙台步兵第一〇四联队;在西北部张八岭的是骑兵第十七大队;在北部沙河集的是新发田步兵第一一六联队;在东部来安的是高田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等。士兵们是由于坚信“只要占领了首都南京战争就将结束,可以回故乡了”而一路苦战而来的。然而,南京虽然攻克了,战争却并没有结束的迹象,战士们因此非常失望。山炮兵第十九联队史这样记载着:

攻克南京之后就能凯旋了——将士们这样认为。昭和 13 年的新年没有门松也没有年糕,虽然每天都过着不自由的生活,可只要想到马上就能回日本了,大家都忍耐着。对于由大多数都有家室的征召兵所组成的特设师团而言,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和平没有实现。因为近卫内阁对战争对手的国民政府发出了“蒋介石不配当我们的对手”的声明,战争陷入了胶着状态。士兵们即使想回家乡,但这个声明让战争变为长期化作战了,回归故土的希望已经破灭了。他们不得不在这条没有尽头的泥沼之路上继续走下去。

冬天已经到了。身着夏装被送来上海的士兵们,在那之后继续向江南前进,衣衫褴褛地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离开故乡几个月了……”这样的歌声从他们的口中唱出来,心里还挂念着故乡的妻儿每天是怎样度过的。比这个更让他们心情沉重的是,该怎样把同乡伙伴战死的消息告诉他们的家人,遗族们知道后又会怎样伤心难过呢?不,自己说不定在将来的不知哪一天也会死去。被放逐到这样的战场上,逃也不是,躲也不行。战争中的士兵,只能跟随着军队,按照命令,奔赴死亡之地。和平的期望最终还是化为乌有。前方还有多少苦难的道路在等着我们?无法预测的战争之路只是一味地延续着。

若松步兵第六十五联队就这样渡过扬子江,开始了淮阳平原的驻留

生活。然而,战争的风云在飘荡,不知道何时又必须再次出动了。驻留的日子在险恶的空气中一天天继续下去。

(下略)

[福岛 民友新闻社编:《福岛 战争与人》(1 白虎篇),
福岛民友新闻社(福岛市),1982 年 10 月 30 日。]

(刘恋 译 赵仲明 校)

25. 手记：一个特务兵的证词

高桥五城

昭和12年9月9日,我应征编入第十三师团辎重兵第十三联队第六中队。10月7日在上海饭田栈桥登陆,参加了第二次上海之战、南京之战、徐州之战、汉口之战、宜昌之战等战役,昭和15年4月15日随队回到仙台原来的部队。我作为一个特务兵踏破三千里路程,经历了连续的恶斗苦战,其艰苦的程度无法用笔墨来加以形容,就像一首歌里所唱的“假如运输车的车轮是战士,电线杆上也能开出花,画上的达磨也能翩翩起舞”。虽说我的军衔只有一颗星,是最下等的特务兵,但在我们特务兵中,不仅拥有知识丰富的学者型的人,也有黑社会的头目,还有称得上国家栋梁的电工学教授,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我则被视为那种没有教养的一类人,经常被下士班长殴打,遭受白眼。

登陆之后,最初从月浦镇到张家角再到刘家行的运输,是如同沼泽地的泥土淹没膝盖的极其艰难的行军。不断有马倒地,还有数百名士兵掉队。部队中有500匹马(占了马匹总数的三分之一)不是鞍伤就是骨折,或是因为疲惫过劳而无法使用,在我们中队里死了15匹马。

我自己的马被战车的轰响声惊得狂奔起来,逃入三岛的野战阵地。虽然被我追上了,但由于疲劳,马一头栽倒在地,后来在三岛部队休息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才回到自己的部队。由于班长一味地训斥新兵,加上战友之间无法相互联络,指挥新兵的系统就乱成一团。有的人跟着别的部队跑了,不知去向。

战况是这样的,大场镇的总攻击中,10月15日—25日的进攻,使敌人整个崩溃了。在皇军怒涛般汹涌的猛攻下,敌人兵败如山倒,到处可以见到敌人堆积如山的尸体,我们一直追击到南京。

大场镇的战地堡垒是在外国人的指挥下建成的,非常坚固难攻,好多士兵在攻克这个阵地的战斗中阵亡、负伤,这个阵地在战史中也是有名的。

这个阵地周围散乱堆放着的水泥袋上印有“浅野水泥”的字样，友军难以攻克的敌人战壕前的铁丝网旁边，横着一块标有“藤仓电线 KK”字样的标牌。

我无法知道，究竟是销售军火的商社早就以最快的速度向中国出售这一类的物资而获取暴利，还是通过第三国的中介向中国供应这样的物资，但是日本人死在日本制造的商品前这种不正常的事情发生，却使我愤怒得咬牙切齿。

恶劣的商人们暗地里销售这些物资以获取利益，而用一张一钱五厘就能买到的红纸征召来的士兵却“为了祖国”而死去。

我的眼前浮现的是那些为了攻克用日本水泥建起来的堡垒和日本制造的铁丝网而牺牲的卫国英灵。

上海之战、南京之战、汉口之战之后，运送部队的船只回国时满载着钢铁、大豆、豆渣、煤炭、砂糖、皮革制品等各种东西，将它们作为战利品运回日本。这是在圣战的美名之下的强盗行为。

进入南京之后，在某广场上（军官学校的院子）可以看到敌人的六门重炮。大炮的尾部刻着“大阪兵工厂”的字样。

据说攻占中山门、光华门的部队被这些重炮打得非常惨。敌人不知是什么时候得到日本制造的这些重炮的。同行的将校（中尉）告诉我，这些是老式大炮，被部队废弃后并没有当垃圾处理掉，而是经过商社之手卖到了这里。

“为了祖国”而被自己国家造的重炮打死的士兵们实在太可怜了。

昭和 12 年 12 月 12 日，三个“12”连在一起，所以攻克南京之战难以忘怀。当时第十三师团在南京扬子江对岸浦口以北的滁县。

我是作为在浦口的师团兵站部的仓库警备兵，是从联队被配属到该师团的。作为与南京的总司令部以及第十三师团联络所的联络将校中尉的勤务兵，我在攻克南京不久便进入了南京城内，趁着军务空闲的机会，与将校一起在南京市内外四处转悠了一下，这对我来说是件很幸运的事。

目睹南京屠杀的尸体

我们乘坐海军的汽艇来到下关，扬子江漫长的江岸死尸堆积如山，

并散发着恶臭,鬼泣神惊般的场景令我感到自己身处战场,这是一幅令人发指的凄惨景象。我在等待去停泊司令所^①领取资料的将校时,清理南京城的卡车正在我的旁边工作。当几辆装着尸体的卡车停下来后,士兵们立刻跳了上去,翻开尸体的衣服口袋,将钞票、钱币一盗而空。一个士兵将装满铜币的麻袋提起来,对我嬉皮笑脸地说道:“喂,特务兵,你不要钱吗?”

死者是神,从神身上盗钱的只有鬼。我只是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些人的举动。我这样一个下层的辎重兵,一个只有一颗星的士兵,对着没有我说话余地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只有感到悲伤。

在雨花台和其他两个刑场上,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很大的场地里横躺着众多尸体,腐臭味扑鼻而来。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在南京司令部召集起各师团长,泣声感慨:“胜利占领首都南京的伟大功绩,由于大屠杀的行为而变为泡沫。”

根据远东军事法庭审判记录,南京城内的市民、俘虏中有 60 200 人被杀害,近郊的难民有 57 000 人被饿死,或被残忍地杀害。在中国进行的南京审判据说有 30 万人被杀害。

“胜者为王败者寇”,在胜者单方的审判中,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南京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在雨花台被枪决。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远东军事法庭审判中被处以绞刑,据说没有一个辩护和证词起作用。

我在南京市内向在场的五六名士兵打听过当时的情景,下面是我了解到的情况。因为南京之战是追击战,兵站的粮草供应不上,在当地征收粮草也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期。入城时就是处于这样的境地,搞不到给俘虏、难民吃的粮食,各收容所都因粮食问题而发生暴动,并发生了巡察将校以下的士兵有五人卷入大众的暴动并因此丧生的事件。

攻克南京之后,为控制南京以西的各地,将各部队都派了出去,警备部队人手不够。此时出现了一些潜藏在难民中煽动暴动的分子。逮住这些人将他们处刑之后,就如同捅了马蜂窝,难民们骚动起来,只能用重

^① 原文如此,似为南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

机枪或轻机枪打死他们。

蒋介石下达了“坚壁清野”的训令,也就是说,老百姓们在逃走时只留下一个空房子,田野全部用火烧得不剩一粒粮食。

粮食征缴中既收不到中国米,也收不到豆类。日军在进攻南京城时所受的损失,正式公布的是,战死 2 300 名,负伤 6 400 名,而实际上我想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在南京城中华门的战斗中,步兵第一一五联队的大队长、群馬县出身的信泽清三郎少佐阵亡。

对于在这之前发生的隐藏着无数秘密的事情——如尼港事件^①、济南事件^②,以及对战争结束后的回国者、移民满洲的农垦人员的袭击、屠杀和滥用私刑等等——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南京屠杀的真相,正如上面所说的,是由于粮食不足而导致的对暴动的镇压。

徐州之战之后,虽说口头上叫着要严肃军纪,但也发生了军官将当地女子占为小妾、下士官无端殴打部下等事件。我就被打得后牙粉碎,咀嚼困难。

昭和 14 年 5 月,我被派到四国通寺特别部队做小行李队员。这是个毒气部队,回到原来的部队后也不能对人提及部队的行动,我被恐吓道,万一泄漏秘密就要被处以死刑。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战场上真正冲锋陷阵的是下级的士兵。

作为一个从战争的地狱中爬出来的幸存者的证言,以上是我向世人传达的自己亲眼目睹的事实。就此搁笔。

[《群馬县人的战争秘录——走向战败》,
あさを社(群馬县),1979 年 8 月 15 日。]

(赵仲明 译)

① 1920 年 2 月—5 月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时,驻守黑龙江尼港的日本守备队和居民被俄国人全歼,史称“尼港事件”。

② 1928 年春,北伐军攻占济南后,杀害了济南的部分日本侨民,日军借故增兵济南。5 月 3 日,日军向济南发动进攻,与中国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屠杀中国军民五千多人,造成“济南惨案”,亦称“五三惨案”。

二、日军官兵证言与供词

1. 田俊六的询问调查书

(1946年1月14日)

编者注：田俊六，1938年2月任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将。

Q：你从松井将军那儿接受军队时，军纪处于什么样的状态？

A：在南京事件后，军纪非常散漫。

Q：松井将军被替换，是因为占领南京时他的军队不遵守军纪，这种说法是真的吗？

A：我想恐怕也有那样的理由吧。但是换防的理由，我想是因为作战的目的达到了。即他已经占领了南京。

Q：接任军队指挥权的时候，你听过这样的话吗？占领南京的日本军队将女人们拉走并提供给慰安所，男孩子和男人紧紧地绑在一起，然后枪杀他们。外国的观察员们对这种事还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而那也是松井被替换的理由。这情况准确吗？

Q：我听过关于这样的暴行。某种程度，这种暴行的结果是大本营决定替换指挥官，我想这也导致了松井被招回。

[日本一桥大学吉田裕教授提供]

(罗萃萃 译)

2. 朝香宫鸠彦询问调查书

(1946年5月1日)

编者注：朝香宫鸠彦，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陆军中将。

Q：有很多人抱怨你们吗？或者说在南京驻扎时，你知道在你指挥的部队中有一部分军人做了有损名誉的事吗？

A：东京的总部向松井将军的司令部抱怨，松井将军于是命令我部不允许做如侵犯中立国财产和强奸这样的违法事情。

(中略)

A：我们进攻南京时，我想南京的人口大约二十万人。

Q：松井将军曾经抱怨你，说你的部下在执勤以外的时间里，干了很多坏事。你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A：我通过司令部得到松井将军的通告的。很明显东京司令部向松井发出了通告，松井才通告我的。

[日本一桥大学吉田裕教授提供]

(罗萃萃 译)

3. 藤田进的询问调查书

(1946年5月2日)

编者注：藤田进，时任日军第三师团师团长，陆军中将。

Q：关于(在南京的)难民营的保护工作是由什么人负责的？

A：是军司令部。

Q：那就是说是松井将军吗？

A：松井将军的司令部一直负责这项工作。我不知道责任人是谁。但是负责任的人是从松井将军那儿接受命令的。

(中略)

A：入城式的时候，我看见到处在燃烧，但我不知道失火的原因。

Q：在对待城内难民的问题上你发布过什么样的命令吗？能想起来吗？

A：我记得我们对军队的命令是日本士兵决不能靠近这个特别地区。我命令我的师团不要靠近难民区。

Q：你是说这些命令是接受我们司令部的命令后发布的吧？

A：大概是，我是这样想的。这些是警告和提醒，不是军令。

Q：你是说那些不是命令，只是警告吗？

A：只是提醒。

Q：提醒日本军队远离难民营吗？

A：是的。

Q：你知道从12月12日至1938年4月1日，即从日本军进入南京城开始到4月1日，有十万以上的中国人被杀的事吗？

A：虽然没有听过那种事，但知道撤退的中国士兵在长江淹死的

事实。

Q: 大多数中国士兵在淹死前,在江边被刺刀刺死或被枪杀的事,你知道吗?

A: 那时,因为我的师团离南京很远,这些传闻是事后不久听说的。

Q: 大概是事后什么时候?

A: 我是在入城式时听说的。

[日本一桥大学吉田裕教授提供]

(罗萃萃 译)

4. 佐佐木到一口供

(1955年4月6日)

自1937年8月我任前日军第三十旅团长期间,受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指挥。我的部下有第三十八联队,联队长是助川大佐,和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野田谦吾大佐。我曾率领部下,在南京附近紫金山进行过侵略战争。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7月。]

5. 太田寿男供述

太田寿男笔供

(1954 年 8 月 3 日)

一、姓名 太田寿男

生年月日 1897 年 1 月 2 日(58 岁)

原籍 爱媛县松山市鲋屋町 27 号

家庭人员 2 人(妻、子女 1)

二、现住所 兵库县印南郡东志方村大泽长冈方

三、学历[略]

四、任官后经历

1918 年 12 月 任骑兵少尉,盛冈骑兵第二十四联队,训练兵

1921 年 10 月 派至东京户山学校(学习体操、剑术)

1922 年 3 月 归原队,训练兵,任骑兵中尉

1922 年 9 月 派至千叶县陆军骑兵学校(学习马术、调驯新马、有线通信)

1923 年 7 月 归原队,新马调驯教官

1924 年 3 月 派至千叶县陆军骑兵学校(学习无线通信)

1924 年 7 月 归原队,通信及新马调驯教官

1929 年 3 月 任骑兵大尉,盛冈骑兵第二十三联队附,经理委员

1930 年 3 月 任盛冈骑兵第二十三联队中队长

1933 年 1 月 姬路骑兵第十联队留守队训练兵

1933年10月 任骑兵第十联队中队长,10月中旬到任,当时部队正驻扎于哈尔滨

1933年10月中旬—11月下旬 参加吉林省内讨伐,与联队共同行动于马鞍山、磐石、黑石镇、延吉、三岔口地区

1934年2月 为进行密山附近肃正,随同联队驻扎密山至2月末

1934年3月 任密山附近土地收买工作班掩护部队长兼工作班长副官,驻扎密山至3月末

1934年5月上旬 随同骑兵第十联队返回姬路

1934年10月 派至千叶县陆军骑兵学校(学习战术、教练)

1935年7月 归原队,中队长

1936年8月 任骑兵少佐,香川县善通寺骑兵第十一联队附首席经理委员

1937年8月 善通寺骑兵第十一联队留守队附教育、经理主任

1937年10月中旬 任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10月下旬随同司令部在华中许甫镇^①登陆,之后在常熟和许甫镇从事扬塔及联络业务(在常熟至11月下旬,在许甫镇至12月15日)

1937年12月15日 从许甫镇返回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司令部已前进到南京),任扬塔主任

1937年12月25日 任南京碇泊场芜湖支部长。12月26至1938年1月9日在芜湖进行粮秣扬搭施工厂

1938年1月10日 芜湖支部撤销,返回南京碇泊场司令部扬塔主任

1938年1月下旬 以船舶运输监督军官身份往返大连(5天)

1938年4月上旬 以船舶运输监督军官身份往返香川县坂出港(14天)

1938年6月上旬 任计划主任

1939年3月1日 任皇族附武官(贺阳恒宪附)返回东京

1941年8月 任骑兵中佐

① 原文如此,应为浒浦镇。

1941年10月中旬 任第四十师团骑兵队长,10月下旬到驻扎在江南省(湖北)鄂城的骑兵队就职,之后警备该地区。

1941年12月下旬至1942年1月下旬 参加第二次长沙作战,行动于长沙北部地区

1942年5月 任第二十九师团长统裁于部,参加现地教育,来到荆门(约一周)

1942年6月下旬 第六师团在进行地区内讨伐,担任留守警备,驻扎岳州约三周

1942年8月中旬 警备地区变更,移驻贺胜桥,担任该地警备

1942年11月下旬 警备地区变更,移驻武昌,担任该地警备

1943年2月上旬至同年3月上旬 参加江北作战,沿以监利为中心的扬子江右岸地区行动

1943年3月1日 任库页岛第八十八师团副官,3月20日返回武昌,4月2日由汉口出发

1943年4月16日 到库页岛上敷香第八十八师团司令部,任师团副官(担任人事、军纪风纪、内务、师团乘马委员长工作)

1945年5月上旬 师团配备变更,随师团司令部移驻库页岛丰原,职务同前

1945年8月下旬 在库页岛丰原第八十八师团司令部被俘

(中略)

六、1937年10月下旬华中许甫镇登陆至1939年3月上旬返回日本前的罪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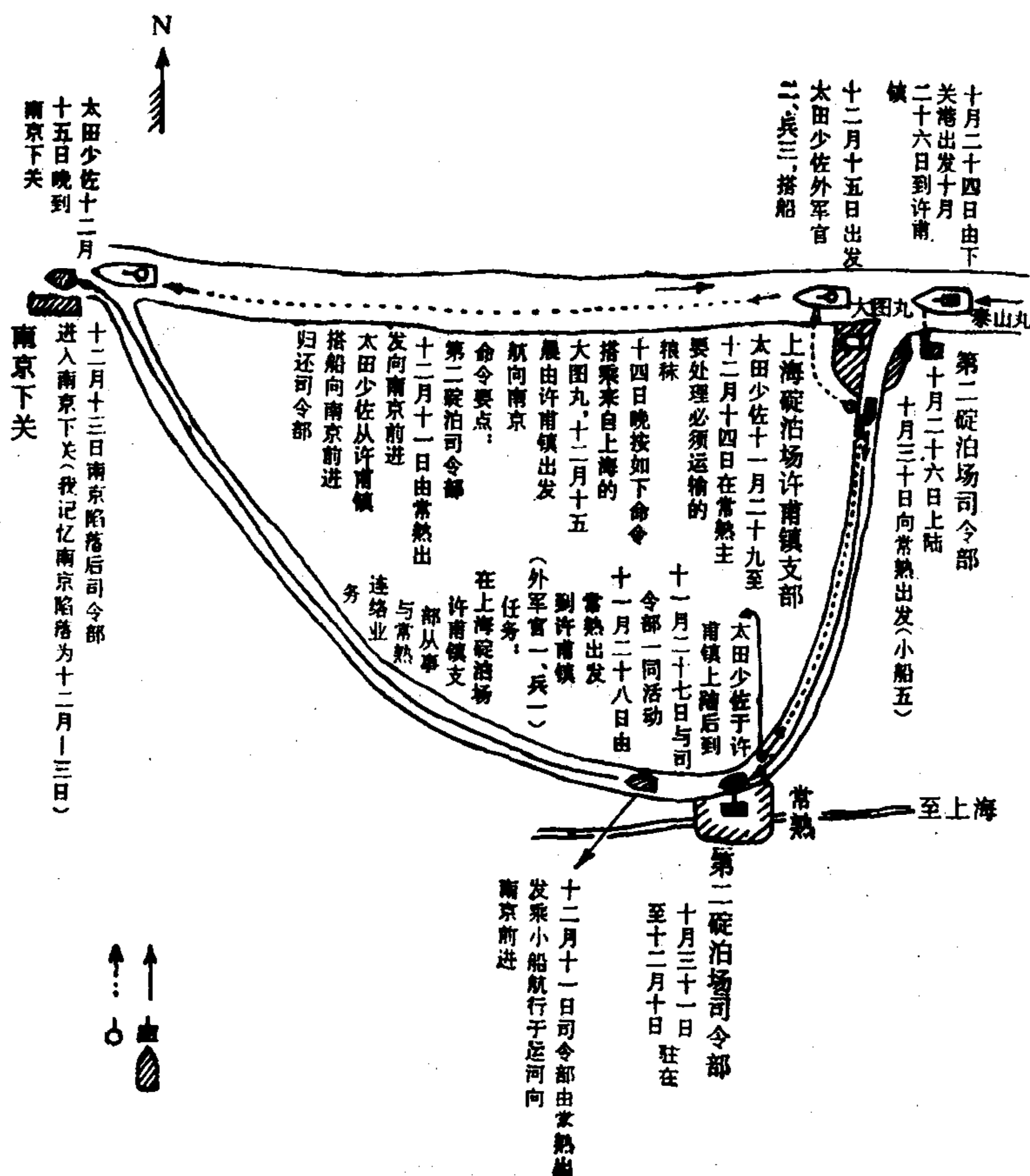
(一) 南京陷落前的罪行(1937年10月下旬至1937年12月中旬):

1. 任香川县善通寺骑兵第十一联队留守时(担任教育及经理主任),于1937年10月中旬被任命为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员(第二碇泊场司令部新组建于大阪,编制为:司令官1名,部附军官13名,翻译2名,下士官15名,计31名)。10月24日于下关港乘医院船泰山丸出发(泰山丸是将上海伤兵运到下关港,在上海方面航行的船只,除第二碇泊场司令部

的人员外,同乘该船的有约三十名护士)。

2. 1937年10月26日在许甫镇登陆(在许甫镇设有上海碇泊场许甫镇支部)。在该地滞留约三日后,10月30日司令部由许甫镇出发,乘机帆船航行于运河上,10月30日傍晚到达常熟,在此地设置了司令部,10月31日开始业务。

1937年10月下旬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在许甫镇
上陆后至到达南京前司令部和太田少佐行动略图



我负责装卸货工作,指导来自许甫镇方面的粮秣卸船业务。

当时卸船量虽然不多,但所卸粮秣是送往驻在常熟的兵站支部,供给进攻南京而过往常熟的部队所用粮秣。我以装卸进攻南京部队用的粮秣而参加了进攻南京的作战。

3. 11月中旬我奉命与苏州碇泊场司令部联络而出差,有军官1名、士兵4名,乘小船航行在运河,往返于苏州(两天)。归途中,在常熟西约两公里处掠夺约三十只在池子中浮游的鸭子(虽然没有居民,但显然是住在附近村庄的中国人民所有)。

4. 11月27日我接到常熟司令部司令官如下命令:

太田少佐率军官1名、士兵2名到上海碇泊场许甫镇支部,担当与常熟司令部的联络任务。我11月28日由常熟出发,与前记人员一同乘小船在运河上航行,11月8日傍晚到达许甫镇,此后主要业务是处理应运往常熟的粮秣。

5. 12月14日接受第二碇泊场司令官如下命令(此命令是由1名军官、1名士兵乘小船从常熟方面传达下来的):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于12月11日由常熟出发向南京前进,太田少佐率许甫镇第二碇泊场司令部2名军官、3名士兵,从许甫镇乘便船向南京前进,返回司令部。我得到上述命令后,与许甫镇支部联络结果,了解到12月14日傍晚大图号船来到,便搭此船,11月15日早晨由许甫镇出发,顺扬子江向南京航行(大图号船装载了粮秣)。

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除太田少佐及2名军官、3名士兵外)是12月11日由常熟出发,乘小船航行于运河上,12月13日南京陷落后进入南京下关,此后即定位南京。

(二) 到达南京后的罪行(1937年12月中旬至1939年3月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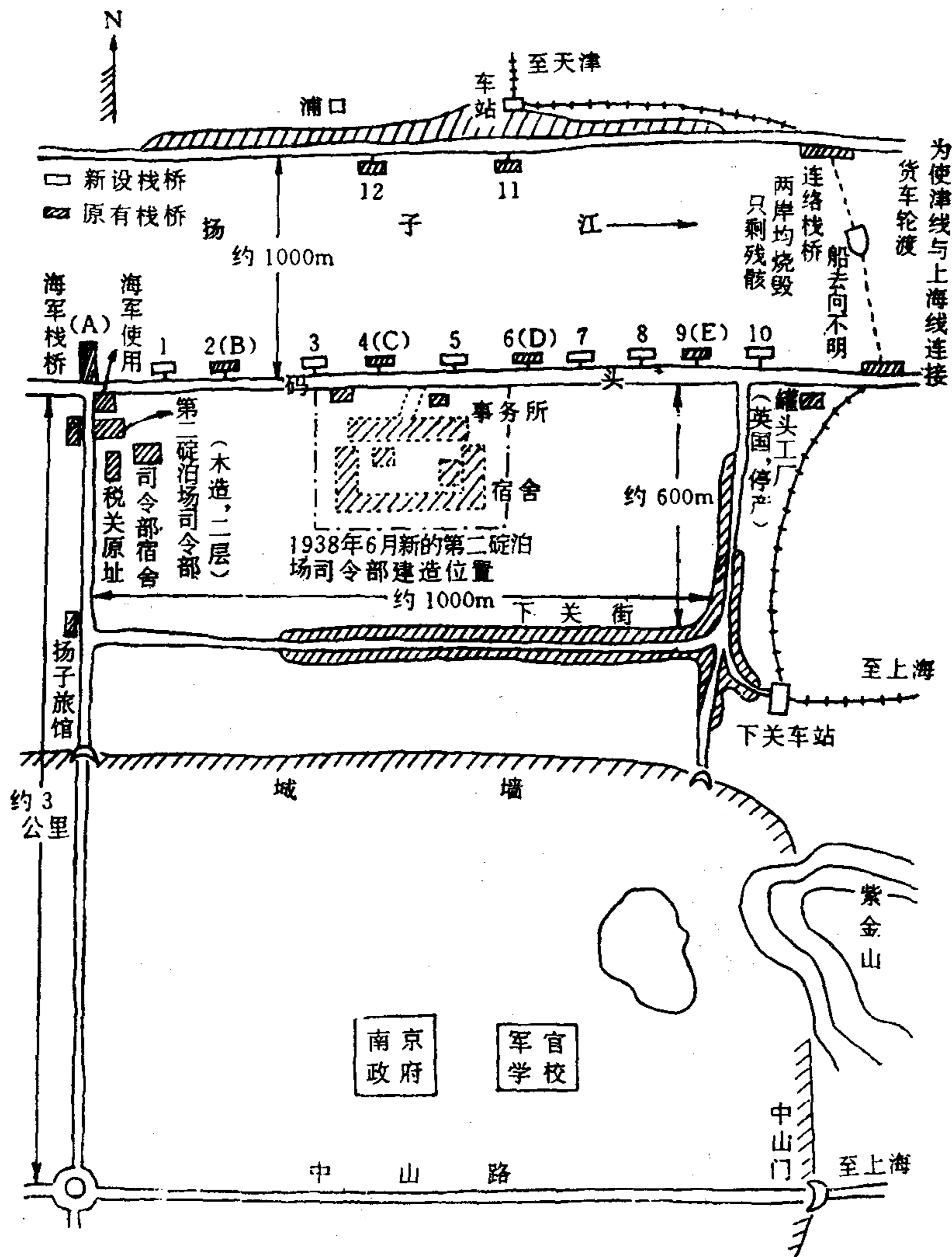
1. 关于南京事件的罪行

1937年12月中旬攻陷南京时,日本军杀害抗日军俘虏及居民总共有约十五万人。我12月15日傍晚到达南京下关,在下关司令部得到如下内容的司令官命令:

“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与南京占领军协定,处理下关地区的中国人尸

1937 年 12 月南京沦陷后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到达

南京下关时期南京下关附近略图(第二)



体,现由安达少佐担任,太田少佐协助。”

我立即与安达少佐(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面谈,得知如下事项:

(1) 处理方法

大部分由下关码头及其稍下游处投入扬子江。

一部分在浦口东约四公里处烧掉掩埋(主要用汽油烧,利用洼地、地头等),南京市内的尸体由占领部队用卡车运到扬子江岸,直接从码头上流投入扬子江(其数约五万)。

(2) 南京碇泊场司令部为搬运尸体所用人员及器材

配备小船 约 30 只(带有发动机,船员 2 名,1 只船约能装载尸体 50 具)。

卡车 约 10 辆(距码头较远的尸体用汽车搬运,每辆约能装 50 具)。

配备陆上运输队 约 800 名(碇泊场司令部到达南京时即由第十一军配备)。

(3) 运搬状况(下关地区碇泊场司令部承担部分)

甲、下关地区大部分是运到码头投入扬子江,一部分是用小船运到稍下流投入扬子江,距离码头较远的尸体使用卡车或手推车等,近的用赶制的简易担架搬运。运搬任务由陆上输送队承担,处理方法与货物相同,大部分是用搭钩进行,尸体中还有一些负重伤没有完全断气的,对这些人用搭钩向头部及心脏部扎,使之断气然后运搬。

乙、到烧毁、掩埋地点的运搬配备有小船,每次 30 只,每日约运 10 次,约进行 2 天。

由输送队往小船上装运。

由占领部队人员约 500 名,进行烧毁及掩埋作业。以上人员不知是占领南京部队的哪个部队。这些人是用小船运到作业地点的。

(4) 关于处理的尸体概数、处理天数、类别等事项

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处理尸体是从 12 月 14 日开始的,大体进行 5 天,14 日、15 日下关地区作为一地区,由安达少佐负责处理。我于 1937 年 12 月 15 日傍晚由许甫镇回到南京碇泊场司令部后,作为二地区,我负责西半部,16 日、17 日、18 日处理 3 天尸体。

各时期及各地区所处理的数目及其他状况说明如下:

甲、12 月 14 日、15 日是下关地区没有划分区域,全部由安达少佐处理的时期,估计尸体总数约有 10 万,其中:

从码头及稍下流投入扬子江者约 3.5 万\计 6.5 万(包括重伤运到

烧毁掩埋地点者(两天大体结束)约3万/濒死者1500名)

以上人员中重伤濒死者约1500名

12月14日、15日两天为了加快速度,不仅在白天,就连夜间也进行处理。

乙、12月15日傍晚我回到南京下关后,16、17、18日3天将下关地区分为东、西地区进行。

各地区状况如下:

安达少佐负责的地区(东部)

投入扬子江数(包括一部分运到稍下流投入)约1.6万名

以上包括重伤濒死者约250名

太田少佐负责地区(西部)

投入扬子江数(包括一部分运到稍下流投入)约1.9万名

上述数字中重伤濒死者约350名

计3.5万名(内有负重伤濒死者600名)

以上全部总数如下(5天内碇泊场司令部处理数)

运往烧埋地点数:约3万

投入扬子江数:约7万

(内有负重伤濒死者约2100名)

计约10万

丙、南京事件中处理的尸体总数

南京碇泊场承担数	约10万	}> 估计共15万
进攻南京部队处理数	约5万	

上述尸体种类为:被捕的抗日军(估计约3万),其他为居民,有男女老少。总之,尸体中居民是多数,这是很清楚的。

(5) 对南京事件的认罪态度

如上所述,南京陷落时日本军的非人道行为,现在不用再说,其罪恶是极其严重的。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也承担尸体处理,我也作为司令部的一员在南京下关指挥处理,不只搬运尸体,我配属的输送员中对负重伤没有停止呼吸者,使用搭钩刺扎其头和心脏致死而进行运搬者数约有350名(抗日军多少,居民多少,现已记不清,但记得居民占多数)。事实

是不仅运搬尸体,而且杀害了抗日军及居民约 350 名。

我过去对南京事件已坦白认罪,但是不充分,今天我根据以上事实对自己的罪恶进一步加以深刻认识,以此表示我对南京事件的认罪态度。

太田寿男口供

(1954 年 8 月 14 日)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太田寿男。

问:今年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 58 岁。

问:你的原籍是什么地方?

答:我的原籍是日本爱媛县松山市鲋屋町 27 番地。我的妻子和一个小孩,他们住在兵库县印南郡东志方村大泽长冈方。

问:你都受过什么教育?

答:我于 1903 年 4 月入学,1911 年于爱媛县立松山中学毕业后,同年 9 月至 1916 年,先后入过广岛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及东京陆军中央幼年学校。1916 年 12 月,入东京陆军士官学校,至 1918 年 5 月于同校毕业。

问:把你出校后的经历讲一讲?

答:1918 年 5 月,我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被派到盛冈骑兵第二十四联队任见习士官,同年 12 月升任少尉。1921 年 10 月至 1922 年 3 月,在东京陆军户山学校学习,出校后,任骑兵第二十四联队中尉。1930 年 3 月任骑兵第二十三联队大尉中队长。1933 年 10 月中旬来到中国,任骑兵第十联队哈尔滨留守联队中队长,至 1934 年 5 月调回日本姬路。1936 年 8 月升任骑兵第十一联队少佐联队附。1937 年 10 月下旬第二次来中国任华中第二碇泊场司令部部员(驻于南京、武汉等地),1939 年 3 月回东京,任皇族附武官。1941 年 8 月晋级中佐,同年 10 月中旬,任第四〇师团骑兵队长,11 月上旬第三次来华(在扬子江北部一带活动)。

1943年4月1日,调我到桦太第八十八师团任副官,1945年8月于桦太丰原被捕。

问:你在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任职期间,怎样配合日本军队行动的?

答:1937年10月下旬我任第二碇泊场部员期间,除了输送攻打南京的部队外,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进攻南京的部队输送物资,保证弹药及粮秣的供应。

问:第二碇泊场司令部何时到达南京的?

答:在未占领南京以前,第二碇泊场司令部设于常熟,1937年12月13日占领南京之后,第二碇泊场司令部就随着部队同时进入南京,驻在下关。此时我受司令官命令,到上海驻许甫镇支部去联络船舶任务,我是在15日到南京。

问:你到达南京之后,具体的又作了哪些事情呢?

答: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之后,曾在市内进行了大屠杀。我是12月15日到达南京的,我到达之后就接受了运输尸体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碇泊场司令部拨给我800名运输兵,我和安达少佐各率400名。此外,还拨给运输尸体使用的10辆汽车、30只汽船,在这之前安达少佐就已经在14、15两天处理了65 000多具尸体。但其他部队也自行处理了一部分。

问:把你亲自参加运输尸体的情况讲一讲?

答:当我在15日傍晚到达南京碇泊场司令部之后,司令部的司令官命令我说:“安达少佐正在处理尸体,现在命令你和安达少佐共同完成这项任务……”当我奉到命令之后,就在南京下关码头上,分东西两个区域执行任务,安达在东部处理,我在西部处理,两个区域共使用30只汽船、10台汽车。从12月16日开始至18日两天的时间,经我处理的尸体有19 000多具,安达处理了16 000多,加上头两天安达自己处理的那65 000多具,碇泊场司令部共处理了10万以上的尸体。其中除有3万多具是掩埋、烧毁的以外,其余的都投到扬子江里去了。我想其他部队自己处理的至少也有5万人。被杀害的人们绝大部分是市民,还有一部分抗日军。当我刚到下关的时候,还看见有日本军队仍用机关枪向他们扫射,我记得被扫射过的许多人之中,还有很多带活气没死过去,而仍在呼

吸着的人。

问：经你处理的有多少是仍在呼吸活着的人？

答：经我处理的将近 2 万个尸体里边，就有 350 多个是被扫射后仍在呼吸未死的。

问：你对这些人是如何处理的？

答：在处理这些活人的时候，我命令部下，先用装货的钩子将他们打死，使其绝命后，再用钩子搭到船上，投到扬子江里去。

问：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答：我清楚认识到这也是一种惨[残]无人道的杀人行为。

以上供词已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与我供述无误。

被讯问人 太田寿男

太田寿男口供

(1954 年 11 月 10 日)

讯问员：秦耀东

书记员：赵苏苍

翻译员：崔元述

问：你由 16 日开始处理尸体到多答完的？

答：我由 16 日开始一直处理到 18 日才完。

问：你共处理几天？

答：经我处理的是 3 天。

问：经你处理的有多少尸体？

答：在我处理尸体的 3 天当中，共处理了 19 000 多具。在这同期间内，安达处理 16 000 多。

问：在你处理的尸体中间，有多少是负伤而有活气的呢？

答：在我处理的 19 000 多尸体中间，带活气负伤的人有 350 多名。

问：你对带活气的是如何处理的？

答：我对这些负伤带活气的人，命令部下用铁钩子将其绝命再搭到船上运搬的。

问：那么你和安达在这3天中间共处理了多少？

答：共35 000多，这是和安达少佐二人处理的。

问：头几天安达少佐自己处理的是多少？

答：在我们两个人分工以前，他就处理了65 000多。

问：那么经碇泊场司令部处理的有多少？

答：共达10万以上。

问：其他部队不处理么？

答：自己也处理。

问：那么其他部队处理的有多少？

答：据我所知约5万多。

问：这次处理的尸体共有多少？

答：据我所知有15万多。

问：这些尸体都投入扬子江里去了吗？

答：大部投入扬子江里去了，也有一部分是烧毁或埋葬的。

问：烧或埋的共有多少？

答：我上次说45 000人，现在我要订正一下，当时我说错了，没有45 000具，估计大约有3万多具。

问：司令部配属给你和安达的运输兵有1 000名么？

答：没有1 000名，共有800名，安达和我各率400名运搬的。

问：关于运输尸体这方面，以上说的属实吗？

答：这是经过反复的想，才想出的这些问题，确实是实际、真实的。

问：在运输尸体这方面，有什么补充？

答：我没有什么补充。

以上口供经翻译用日语向我宣读，与我供述无误。

被讯问人 太田寿男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北京)，1985年7月。]

6. 中野忠之寿供述

中野忠之寿笔供

(1954年7月17日)

南京大屠杀的罪行

1937年12月11日以后于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及扬子江上。

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方针

方针：决定在南京城内及其周围，将抗日军军人及抗日爱国中国人民从东西南北四方加以包围，逐次压缩包围圈，以实行一人不剩的大屠杀。其经过如次：

与隶下各师团之军命令的要旨

甲、与第五师团国崎支队(步兵三个大队4000名，有上陆用舟艇装备)的命令：

“支队应利用舟艇横渡太湖，务利用水路迅速出芜湖市(南京西方120公里)，渡过扬子江左岸，击破所在地的抗日军，以进出浦口之线，遮断从南京向西北方脱逃之抗日军的退路，将抗日军于扬子江上歼灭之。”

乙、第六师团(兵力24000名，配属有野战重炮第六联队)：

“师团应与第九师团交待[接?]第一线(昆山附近)，利用其机动力，向太湖西方迂回，迅速出至江宁镇—板桥村之线，遮断从南京向西方逃脱之抗日军的退路……”

丙、第十八师团：

“师团应以其主力从太湖西方侵入芜湖市，防卫来自西方的抗日军之进攻，以掩护军在南京一带的行动……”

依据以上的军命令，第五师团国崎支队于12月12日进至浦口；第六师团于12月12日进至安德门；第十八师团于12月10日进至芜湖。

1937年12月12日在南京城周围之侵略军师团的位置地点

甲、第五师团国崎支队以其主力进犯浦口,以其一部进犯浦口上游的扬子江左岸堤防阵地,占领完了。

乙、第六师团对南京城西方四公里安德门开始攻击,其联队的部署如下:

左第一线为步兵四十五联队——自扬子江右岸堤防至南京—江宁镇公路北侧某河以北的地域;

邻接四十五联队之左为步兵二十三联队——某河以南菊花台北端之地域;

邻接步兵二十三联队之左为步兵四十七联队——自牛首山贯连通济门之线的两侧;

邻接步兵四十七联队之左为步兵十三联队——为四十七联队的右翼,地名不详;

野战重炮第六联队主力,协力于步兵二十三联队的侵略行动。

丙、第九师团在第六师团之右翼,其攻击重点指向光华门,其一部已进至光华门一公里内外之地点,直接对光华门进攻中。

丁、第三师团在第九师团之右翼,攻击重点指向中华门,进攻中(距离不明)。

戊、第十六师团在第三师团之右翼,攻击重点指向玄武门,进攻中(距离不明)。

己、第十一师团以其主力位置于扬子江右岸,一部位置于扬子江左岸,向南京城及浦口进攻中(距离不明)。

庚、自日出至日没的期间,用轰炸机对南京城内进行无差别地轰炸。

如上所述,压缩了包围圈,于12日,第六师团步兵二十三联队夜袭安德门抗日军阵地,占领了南京城西方的据点。

1937年12月13日各师团侵略南京城的状况:

甲、左翼第一线,第六师团自午前5时,以配属重炮(15生地榴弹炮)一个联队的兵力,射击南京城,至午后4时由破坏口侵入城内,各步兵联队侵犯进路如次:

(1) 左第一线步兵四十五联队(在扬子江右岸堤防——南京城西北

角之线)向下关方向进出;

(2) 邻接步兵四十五联队之左的步兵二十三联队,自南京城西北角破坏口侵入城内,从城内北侧向下关方向压缩进犯;

(3) 邻接步兵二十三联队之左的步兵四十七联队,自南京城通济门侵入城内,向东北方向压缩进犯;

(4) 邻接步兵四十七联队之左的步兵十三联队,自步兵四十七联队之右侧侵入城内,向东北方向压缩进犯。

乙、在第六师团之右的第九师团,以肋坂联队(步兵)进犯光华门,侵入城内,将所在的抗日军和抗日爱国中国人民向东北方压缩中。

丙、在第九师团之右的第三师团,以中华门为进攻重点,侵入城内,将所在的抗日军和抗日爱国中国人民向东北方压缩。

丁、在第三师团之右的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自玄武门附近进犯城内,向东北偏北方向压缩。

戊、在第十六师团之右的第十一师团,将其主力配置于自南京城东南(偏东)角至扬子江右岸堤防,向南京车站(下关)方向进犯。

己、第十一师团之一部在扬子江左岸向浦口进攻中,对于在扬子江上舟筏中的抗日军和抗日爱国中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庚、在浦口及在其上流堤防之第五师团,自城内进出至下关,对于乘舟筏渡往北岸(扬子江左岸)的抗日军和抗日爱国中国人民,在扬子江上进行了大屠杀。

辛、自午前6时至午后3时之间,连续用轰炸机无差别地轰炸城内东北角附近。

在以上的全般状况下,我(第六师团步兵二三联队四中队一小队三分队长,伍长)在中队长尾形的指挥下,率领部下10名与中队主力100名一同从破坏口侵入城内,持枪侵犯中国和平人民的住家240户,逮捕中国妇女2名(病人,俱为22岁)及抗日军少尉军官刘某(男,22岁),并将中国和平人民男女老少2400名驱至东北方下关,在下关及扬子江上的舟筏里,以重机枪及步枪,将他们做了大屠杀。在这个屠杀中,我指挥分队员10名曾逮捕抗日军军官一名(刘某,22岁),侵犯中国人民的住家40户,将中国和平人民男女老幼400名驱至东北方下关,在

下关及扬子江的舟筏里,以重机枪和步枪对他们做了大屠杀。其中有中国妇女2名于12月14日以自力脱出险境,对于抗日军军官则奴役他直至1938年5月下旬,因要开始下一次的侵略行动带着他不便,就把他放了。

中野忠之寿笔供

(1954年8月26日)

我前后侵犯过中国三次:第一次是由1932年12月至1933年9月的时期;第二次是由1937年8月至1941年5月的时期;第三次是由1942年6月至1945年8月的时期。我现在供述我在中国所犯的严重罪行之一部分,第二时期的两个罪行:

1937年12月中旬,在南京市下关发生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所震惊的大屠杀,这次惨案我亲手夺去了400名中国人民宝贵的生命,我更参加了2000名的大屠杀,是我所犯的最严重的罪行。当时我之所以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乃是为我的思想所支配,在我少年期、青年期、法西斯奴隶军队时期、法西斯警察官时期等等,逐渐地增加了我的军国主义思想的强度,并更加深刻,这从我犯罪的过程中可以明了看出来的事实。

当时支配着我的思想的是:在中国的首都南京,将抗日爱国中国人民一人不剩地加以歼灭,这才可以向全世界宣扬“天皇的神威”;是日本人民最大的利益;也是向全世界显示日本民族的优越性;我这样做才是当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誉,也是为日本人民做师表。我是怎样去执行的呢?仅举其过程中的一个例子,即能说明:

我是分队长(伍长),率领部下10名自昆山迂回太湖西方,连续强行军500公里以进犯南京,于途中,部下福田一等兵脚磨成伤,两脚心肿起到了不能穿鞋的严重程度。我当时像疯人一样,累次加以大骂,并对他做了如下述的威吓,使其参加了南京的大屠杀:

“你忘了你是陛下的股肱么?我决不容许你在‘敌人’的首都面前掉队,你不是九州的男儿么?你忘了你生在‘天孙降临之地——日向

国’(宫崎县)么?你不能忘掉在出国时所发的誓言吧!”我以对待奴隶的态度大骂他,强制他爬着走,把他带到南京,使其执行了南京大屠杀。我这样像疯人似的对待部下的态度,也给了其他部下以很大的影响。

我在南京城内“扫荡战”中,我的凶恶程度,即用下述一例就能说明,从城墙进入城内之后,拿着枪刺闯进抗日爱国的中国人民房舍,不分天棚里面、床下、箱中、水缸里头等等到处搜查,将抗日爱国中国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一人不剩地驱至下关,用重机、轻机、步枪等对2400名进行了大屠杀。

在我进行这样滔天的严重罪行时,是怎样忠实积极并且主动地去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做这样的野蛮侵略行为,即从我经过18年的今天尚能清楚地记忆着当时主要的军命令、师团命令要旨的事实,就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

在这个滔天罪行的过程中,另一方面我的思想中,还主要存在着如次的问题:侵略中国首都南京之后,并要给在南京周围的抗日爱国中国人民以决定性的打击,这样蒋介石一定投降于日本侵略者,那么日本就可以任意地统治中国,这对于我自身也是有利益的。由于这种思想起了主要作用,于是在我进行如上述之严重罪行(时),甚至认为是“神圣的”、“正义的”行为。

中野忠之寿口供

(1954年10月)

问:你把参加南京侵略战争和大屠杀事件的经过情况,和你所知道的共杀害多少人?是怎样杀害的讲一讲?

答:我们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为了将抗日军民一网打尽,因此将全军兵力周密的部署,分三路进攻南京,所以在1937年12月中旬攻下了南京。在侵略战争中,我在六师团步兵二十三联队四中队任一小队三分队长(伍长),在中队长尾形的指挥下率领部下10名与中队主力100名一同从破坏口入城内。我逮捕中国妇女两名,抗日军少尉军官一名,并参

加将中国和平居民的男女老幼 2 400 多名驱逐在下关扬子江的舟筏里，以轻重机枪及步枪对他们进行大屠杀，在这一屠杀中，我指挥分队员 10 名，用轻重机枪和步枪屠杀了 400 余名。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北京)，1985 年 7 月。]

7. 东口义一供述

编者注：东口义一，1912年生，日本奈良县人，农民出身。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炮手，上等兵。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时在第二十师团第一〇三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任曹长。

东口义一笔供

(1954年8月21日)

1937年12月上旬，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外紫金山下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在侵略作战时，步兵炮小队盘踞在上述地点，我当时是第三炮手上等兵，午后4时执行马厩勤务时，在离马厩约60米处，发现一名中国商人样子的男人，约25岁。我报告小队长后，得到口头命令：“冲破日军包围者，以抗日军之嫌，予以射杀。”于是拿起马粮放置场的步枪，射击两枪，将其打死。其后进行尸体检查，掠夺小型照象[相]机1台，1元银币3枚。

1937年10月上旬，在浙江[江苏]省常熟东郊，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侵略作战时，我作为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上等兵而参加。目标是：歼灭抗日军约一个大队的兵力，第二大队从道路的两侧进攻。分队长吉村军曹为使第五中队进攻有利，指挥15名分队队员，进入第五中队的中央阵地。当时，我按分队长吉村的命令，为歼灭抗日军的重火力，对射击距离1200米的目标，发射榴弹约15发，炸死抗日军8名，炸伤3名。由于此炮击，第五中队长以下250名侵入了抗日军阵地的一角，并击毙抗日战士25名。

1937年11月中旬，在浙江[江苏]省常熟、无锡间的追击战斗中，步兵第三十八联队是作为联队的尖兵大队而行动的。当时，我以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上等兵身分[份]参加的。在追击向无锡方向后撤

的抗日军的一个大队之际,分队长吉村军曹指挥 15 名队员,为造成尖兵中队的有利条件,进攻到第六中队的后面。当时,我按分队长命令,三次调换阵地,每次都以 1 500—1 800 米的距离向抗日军发射榴弹 20 发,炸死抗日军 20 名。同时,由于第六中队的进攻,杀害抗日军 25 名,给大队的进攻造成有利条件。

1937 年 11 月中旬,在浙江[江苏]省无锡东部,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采取侵略行动时,我是作为炮兵小队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参加的。为歼灭抗日军,第二大队主力进攻南京道路,为使中队有利而进入中央阵地,按观测手所示,须歼灭无锡入口的道路上的水冷式机枪。于是,我奉分队长命令,按射程 900—1 000 米发射榴弹 5 发,歼灭了机枪阵地,炸死抗日军 14 名。继而为了大队主力的进攻,变换阵地,又发射榴弹 5—6 发,因而中队主力侵入抗日军阵地,炸死抗日军 40 名。中国妇女 5 人也被第八中队所射杀。

1937 年 11 月下旬,在浙江[江苏]省句容东侧右方高地,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采取侵略行动时,我是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炮手,参加战斗。以歼灭在句容东侧一带进行反击的抗日军一个大队为目标,第二大队在联队左侧进攻时,市川中尉使第二分队进入大队的中央阵地。我按吉村军曹的命令,以 1 200 米的距离发射 5 发榴弹,目的是歼灭句容市右面的迫击炮阵地。因此而破坏中国和平农民的民房一栋,炸死抗日军 14 名。为歼灭该高地的水冷式机枪阵地和进攻大队主力,奉市川中尉的命令,用大队炮两门发射榴弹,使步枪中队得以冲锋,击毙妇女 2 名,小孩 1 名,抗日军战士 2 名。

1937 年 12 月上旬,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外紫金山麓,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采取侵略行动时,我作为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而参加。第二大队在某村庄盘踞时,发现抗日军约 60 名突破包围线沿铁路线前进中,小队长根据步哨的报告命令吉村军曹以下 7 名,进入村庄西部高地阵地。我奉分队长命令,为歼灭 60 名抗日军战士,按 800 米距离,发射 5 发榴弹,结果炸死 15 名抗日军战士。

1937 年 12 月上旬,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外紫金山麓,步兵第三十八联队采取侵略行动时,我是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上等兵。当

时,抗日军以一个大队的兵力,在紫金山一带阻击侵略军。为歼灭抗日军,第二大队在联队中央进行攻击,与此同时,步兵炮小队的第二分队,进入第五、六中队的中央阵地。我根据分队长的命令,为粉碎抗日军的水冷式机枪阵地和造成第五、六中队进攻的有利条件,按1 000—1 200米距离,发射榴弹25发,结果炸死抗日军战士12名。由于我的炮击,水冷式机枪被歼灭,第五、六中队进入阵地,后退的抗日军35名被击毙,100名抗日军被解除武装成为俘虏,由第五中队的一个小队送到联队本部,其后的处理情况不明。

1937年12月12日,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外下关车站东南部附近,第三十八联队侵略南京时,联队长助川大佐为歼灭抗日军指挥三个大队(约4 000名),击毙和虐杀抗日军战士和中国爱国和平居民约1 000名。第二大队在联队的中央进攻,大队长水谷少佐以下1 300名,在上述地点,包围了抗日军和密集的中国居民,并以大队的重武器杀害450名。当时我是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上等兵,根据分队长的命令,与分队员一起,为除掉埋在道路上的地雷,进入第七中队的中央阵地,对被包围在下关两公里范围内的密集中国人民,以800—900米的距离,发射榴弹约12发,进行扫射炮击,结果炸死抗日军及中国和平居民125名。

1937年12月15日,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内,第十六师团三十旅团步兵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侵略和盘踞时,根据联队本部附教育系增田忽太郎的口头命令:“华中方面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入城时,恐有中国人民反抗,为进行防止,对侵犯难民地区和可疑的人,须全部逮捕。”第二大队附金星武夫中尉等60名,在南京城东南部游园地区广场,收容中国爱国和平市民约一万人以上,侵犯了所谓难民区。当时,该师团辎重联队军官等50名将汽车20辆开来,加上60名,共110名,将中国和平人民当作嫌疑者,逮捕男子600名,装上20辆汽车,在辎重队的警戒下,送到南京下关该师团工兵联队船舶队。之后,船舶工兵队将600名人民和船只,全部爆炸杀害。当时,我是炮兵小队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按分队长吉村军曹的命令,指挥兵9名,为逮捕当成抗日军嫌疑者的中国爱国和平居民,侵犯所谓难民区,借口是在下关码头从事装船作业。逮捕时,9名分队员拳打脚踢。我也用十四年式手枪进行威吓,以辅佐分队

长。结果与9名队员一起,逮捕中国和平居民80名,集中到一定场所后,装上三辆汽车,送到下关船舶工兵队,最后被工兵队爆炸、虐杀。

1937年12月18日,步兵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盘踞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内军官学校时,在军官学校西北空地里,联队本部附教育系增田大尉声称,为教育见习士官,将10名抗日军俘虏斩首。关于此事,按“大队日日命令”,在步兵炮小队长的命令下,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指挥某一等兵,按大队本部中西军曹的指示,我以下9名在挖掘深1.5米、宽1.2米、长2.0米的埋尸体坑时,联队本部教育系某助手及5名士兵将用麻绳绑着的抗日军押送到现场。我将一名抗日军的眼睛蒙起来,并使之坐在坑前。增田大尉举着自己的军刀说:“就这样砍!”在10名见习士官面前,把他斩首了。其他9名抗日军则被见习士官分别斩首。当时,我和其他9名在10米外的位置担任周围警戒,直接帮助他们砍头,把尸体埋在坑中。

1937年12月19日,侵入浙江[江苏]省南京的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在盘踞在城内军官学校时,我——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和以下14名,在连[联]络系熊本军曹指挥下,带着步枪、锹和十字镐,到南京城内军官学校东飞机场中央道路上集合,师团兵器部某大尉称,要实地检查中国步枪弹和日本步枪弹的杀伤力,关于屠杀,细节由熊本军曹作指示。我以下14名按熊本军曹的命令,挖一个埋尸体的坑(深1.5米、宽2.0米、长10米)和筑两个射击台。当时,由该大队的第七中队的两个小队(30名)警戒,用三辆汽车拉着50名抗日军俘虏到现场。兵器部某大尉令步枪中队使抗日军士兵一[两]列纵队站在距射击台两米的位置,手和手、脚和脚都绑着,眼睛用白布蒙着,然后由兵技曹长某二名对离射击台两米的成两列纵队的50名抗日军士兵,用日本步枪和中国步枪各射击一发。结果,中国步枪打穿15名,日本步枪打穿12名。当时,由兵器部某大尉和军官下士官10名进行检查,然后将其余的23名抗日士兵,在30米外的场所,用轻机枪两挺加以射杀。结果50名抗日军全被杀害。参加此次屠杀的45人,在距现场50米的位置上,用枪刀担任警戒。当时,我和浅川一等兵在距现场50米的三叉[岔]路警戒中国人通行,直接帮助屠杀。最后,与浅川一起将4名抗日军尸

体投入坑中,然后与其余 43 人一起将坑掩埋。

1937 年 12 月 15 日,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下关门附近的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侵略南京城之际,我是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三号炮手上等兵。为歼灭抗日军,第三十三联队由和平门进犯。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一大队由下关铁道专用线向城内进犯,在城内下关门附近的干线道路上,击毙中国和平居民 80 名。当时,我属于第二大队,按分队长吉村军曹的命令,对下关铁道专用线的门起约 10 米的城外采取警戒态势,如有抗日军由门而出全部杀害,对第一大队的杀害进行了帮助。

1937 年 12 月 17 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内盘踞时,我(上等兵炮手)与同事庄司上等兵一道,为了掠夺,侵入军官学校讲堂,摘下讲堂正面悬挂的中国人民领袖孙中山先生的画像,带回小队,交给炊事执勤者说:“把它烧掉。”当成柴火烧掉了。

1937 年 11 月 11 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在浙江[江苏]省南京城外盘踞时,分队长吉村军曹和另一人,在宿舍附近的避难沟里搜查抗日军战士中发现两名中国和平妇女,年约 30 岁,两人对她们进行了强奸。然后,吉村军曹令一人监视,他回宿舍告诉分队队员。于是,我(上等兵炮手)带领四名士兵到避难沟现场,用刺刀威胁两名 30 岁左右的妇女,并用手殴打,轮奸了两名妇女,一小时后,该二妇女向东南方向离去。

1937 年 12 月 14 至 16 日,在南京城中盘踞时,小队长市川中尉集合下士官召开诤衡会议^①,为了在会后的会餐会上将中国妇女作为小队的慰安妇,对村田军曹做了指示。为此,村田军曹指挥 10 名士兵,侵入宿舍附近的中国民房,谎称让妇女洗衣服,抓了 10 名妇女,投入宿舍地下室,在枪刀监视下,强制地由小队全员 60 人进行了轮奸。我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对 25 岁和 30 岁左右的中国妇女进行两次轮奸。宿舍变动时,把她们留在那里而离开了。

1937 年 12 月 14 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在南京城内盘踞时,我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上等兵,为给小队准备营房,在分配给大队副官的公寓式房屋里寻找炊事用房时,发现一个地下室。我拿着

^① 原文如此,含义不明。

十四年式手枪侵入地下室,看到三名避难的中国妇女,为满足自己的性欲,逮捕最年轻的一名妇女,正好另外两名离开了,便乘机用手枪威胁,强奸了那个妇女。

1937年12月14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步兵炮小队在南京城内盘踞时,根据小队长市川中尉的命令,我作为第二分队炮手上等兵在分队长吉村军曹指挥下,以打扫战场和搜索隐匿武器为目的,侵入军官学校内的中国民房,结果发现看家的一名35岁左右的妇女,我用十四年式手枪相威胁把她强奸。

1937年12月上旬,在浙江[江苏]省句容,步兵第三十八联队第二大队采取侵略行动,战斗完毕部队集结休息之际,我和14名分队队员在句容北面的道路上休息。当时,该大队机枪中队的下士官等7名放火焚烧中国民房,4座民房被烧毁。我看此种情况心想:“就便接着烧吧!”命令两名初年兵把容易烧的椅子、桌子、筐子和稻草等堆积在另一座房屋里,并从附近拿来柴草,把中国农民的房屋和家具全部烧了。

(原编者注:该笔供包括其全部罪行,此件只取有关南京大屠杀部分,并省略了小标题。)

东口义一口供

(1954年9月28日)

问:讲一下在战斗中杀害中国人民的事实!

答:1937年10月上旬,我们第二大队参加了“南京战役”。我以步兵炮队三号炮手上等兵参加了在江苏省常熟东方郊外的攻击战斗,共杀害了抗日军战士约30名,打伤3名,其中我奉分队长的命令射击榴弹而炸死约8名抗日军战士,打伤3名。

问:你怎么知道你炸死几名炸伤几名呢?

答:由观测手的报告听到的。

问:继续谈!

答:1937年11月中旬,在江苏省常熟和无锡之间对抗日军进行追击时,我也参加这次战争,共杀害了约45名抗日军战士。当时我依分队

长的命令射击榴弹而炸死了约 20 名抗日军战士。

1937 年 11 月中旬,我们又向江苏省无锡东方进攻,这次集体杀害了约 54 名抗日军战士。我以步兵炮小队第二分队炮手,依分队长的命令射击榴弹而炸死约 14 名抗日军战士。此外,由第八中队射杀了 5 名中国妇女。住民的杀害情况忘了。

问:为什么射杀妇女呢?

答:妇女和居民避难时,第八中队从后面追击射击而杀害的。

问:以后又参加了哪次战斗?

答:在 1937 年 11 月下旬,我又参加了在江苏省句容东方的高地的战斗。当时我依分队长的命令发射榴弹而炸死了约 14 名抗日军战士。由于我的炮击掩护,该步兵中队冲锋而射杀了 2 名妇女,1 名小孩和 2 名抗日军战士,在这次战斗中共杀害了 19 名。

1937 年 12 月上旬,步兵三八联队第二大队在江苏省南京城外紫金山麓准备进攻南京城时,由放哨发现有 60 名的抗日军要突破日军的包围线,而向中队作了报告。所以市川中尉命令吉村军曹以下 7 名侵入西方的高地。而我依分队长的命令发射榴弹,结果炸死约 15 名抗日军战士。

1937 年 12 月上旬,我们在江苏省南京城紫金山麓附近进行战斗,在这次战斗,抗日军被杀害了约 47 名,并俘虏了 100 名。其中由于我的榴弹而炸死约 12 名。100 名的俘虏送到联队本部后怎样处理,我不知道。

1937 年 12 月 12 日,在江苏省南京城外下关站东南方附近,步兵三八联队长助川大佐指挥 3 个大队约 4 000 名,射杀及虐杀了约 700 名抗日军战士和约 300 名和平居民。我所属的第二大队在水谷少佐的指挥下,对被日军包围了的抗日军民,用大队的重火[武]器杀害了约 450 名。这时我依分队长的命令,发射榴弹而炸死了约 80 名抗日军和约 45 名和平居民。翌日三八联队主力又在下关附近的大街上射杀抗日军战士约 80 名,那时我在城内担任警戒,协助第一大队的射杀。

问:你把在下关车站射杀抗日军民的情况详细讲一下!

答:当时以包围的形态把军民关在城内,而从两方面无差别地进行射击屠杀的。

问：接着讲下去！

答：占领南京后，三八联队本部附教育系增田忽[惣]太郎大尉命令“中支那方面军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要入城，入城时恐怕中国人民反抗，所以把难民区的可疑者全部逮捕起来”。因此，金星武夫以下 60 名侵入所谓难民区，把认为有抗日军嫌疑者一齐逮捕，共逮捕了约 600 名，而把这些人都送到南京下关的师团工兵队船舶队。以后将 600 名中国人民装在一只船内，在长江中连船一齐爆炸而虐杀了。当逮捕时，我指挥 9 名士兵协助分队长，欺骗说为在下关码头装货工作而进行逮捕。我用十四年式手枪威吓，连打带踢，和 9 名士兵一齐逮捕了约 80 名之后，装上货车送到下关船舶工兵队去，结果都被虐杀了。

问：继续讲！

答：1937 年 12 月 18 日，在南京城内的军官学校，步兵三联队本部教育系增田大尉为了教育见习士官，而将被俘的 10 名抗日军战士砍首。当时，我和 9 名士兵在周围担任警戒，并挖坑，把 10 名的尸体埋于坑里。

1937 年 12 月 19 日，在南京城内军官学校东方的飞机场，师团武器部某大尉为了试验中国的步枪和日本的步枪的杀害能力而杀害了 50 名被俘的抗日军战士。当时我和 14 名士兵担任挖坑、警戒及埋没尸体的任务。

问：为什么别人屠杀中国人民时，你总是作警戒、挖坑和掩埋的任务呢？

答：都是按命令的。

问：讲一讲你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其他罪行！

答：我参加了放火烧毁民房的事件，如 1937 年 12 月上旬在江苏省句容的战斗后，部队在休息时，由大队机枪中队下士官某以下七名，对中国人民的房子放火而焚烧了四座房子。我看到这个情况想“顺手再烧吧！”而命令两名初年兵把容易烧的椅子、桌子、筐子以及谷草堆积于另一座房子内，我放火把房子及其家具一切都焚烧了。

问：你为什么要放火呢？

答：当时我充满着帝国主义思想，烧毁中国人民的房子都不在乎。

问：接着讲！

答：其次我讲强奸的罪行：

1937年12月13日，在南京城内，我用手枪威胁而强奸了一名20岁左右的中国妇女。

问：你为什么把日子记得那样清楚呢？

答：因为当天正是入城的日子，所以记得很清楚。

问：继续讲！

1937年12月14日，在南京城的军官学校后面，以搜查武器的目的而侵人民房时，用手枪威胁而强奸了一名35岁左右的中国妇女。

问：你强奸了多少中国妇女？

答：共强奸了5名，此外有两件轮奸罪行。

问：讲一讲轮奸的经过！

答：是。1937年11月中旬，我们盘踞在南京城外时，分队长吉村，外军曹一名，在搜查抗日军时，在一条避弹沟发现了两名中国妇女，他们两个轮奸后又告诉我们。我（上等兵）领了四名士兵到那里用刺刀威胁轮奸了这两个妇女，以后放走了。

同年12月中旬，我们盘踞在南京城内，小队长市川中尉指示村田军曹指挥10名士兵侵人民房，以洗衣为名，强抓了10名中国妇女，扣留在地下室，让60名小队员轮奸。我前后两次轮奸了两名。

问：你们把这10名妇女轮奸了多少天，这些妇女受到了什么伤害？

答：轮奸了有两天，有什么伤害我不知道。

问：你有没有奴役中国人民？

答：有。1937年11月上旬，步兵三八联队第二大队在江苏省福山镇附近行动时，因为下大雨，在大路上炮队不能前进，因而小队长猪冈少尉命令指挥班长喜多曹长以下15名，去逮捕中国人民和劫取两只小舟。因此喜多曹长去抓15名中国农民扛小舟来。我依分队长的命令，把一门大队炮和25发炮弹装在小舟里，之后，我和分队长外三名坐在小舟上，而使七名中国农民用绳子拖小舟。另外使五名中国农民背弹药箱，直到常熟，这样奴役约有15公里路。

问：你在中国期间奴役多少中国人民？

答：共约190名，累计人数约690名，都是强迫地抓来搬运武器或行

李,进行奴役的。

问:你在中国期间破坏了多少中国人民的房子?

答,在战斗期间炸坏了约 8 座民房外,还破坏 6 座民房和一栋军官学校的房子。大部是为了修建马棚和炊事用的燃料,以及火葬同僚尸体等目的而破坏的。其详细经过,我在笔供中已写清楚了。

问:你参加过掠夺居民财产吗?

答:我在侵略中国期间,在历次作战中参加了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马、牛、粮食、蔬菜、猪、鸡、马粮等,其具体数字在我的笔供中已统计出来了。

问:是怎样掠夺的?

答:都没有给钱,被拒绝的时候,进行殴打而掠夺的。

问:你在笔供里面所写的都真实吗?

答:是,都完全属实。

(原编者注:口供中只取有关南京大屠杀罪行,在其他地方暴行从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北京),1985 年 7 月。]

8. 日本军官黑漱市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

(1954年4月4日)

被检举者：佐佐木到一

一、1937年12月攻入南京后，他任南京警备司令官之职(听四五二和田说的)。

二、1937年12月25日，我在南京目击以下情况：

(一) 在南京下关扬子江岸有500具弃尸(中国人)，由日本军汽艇将其拖入江心。

(二) 南京城内有15间房屋成为废墟，其中有像政府机关那样大的建筑物。

检举者与被检举者之关系：我入中国时，知其名。

检举者：第三十九师团步兵二三二联队第一大队大尉黑漱市夫。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

中华书局(北京)，1995年7月。]

三、日本随军记者回忆

1. 日中战争侧记

冈田西次

(前略)

十、被占领区政治组织的筹建

——从自治委员会到维新政府

经过近一个月的激烈战斗,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先遣登陆部队的战局,也随着 10 月 2 日第九师团在上海郊外成功渡过苏州河而发生了改变。在上海周边,中国部队的防线开始逐渐崩溃,第九师团和其他部队乘胜追击。与此同时,11 月 5 日,柳川兵团也从杭州湾登陆进军。两支部队彼此呼应,终于在 12 月 13 日彻底占领了南京城。

在中日两军作战期间,损失最为惨重的就是交战区和部队驻扎区内的中国百姓。家园被烧毁,家产和物资不是被掠夺就是被征收,收成在望的农作物也毁于一旦……农村的满目疮痍真是笔墨难书。市区方面,激战过后的上海北部及东部工业区的九百多家工厂被烧毁和破坏。战前上海地区 5 200 家工厂中,被战火殃及的就达 2 900 家。交通运输业的损失更为严重。京沪(南京至上海之间)及沪杭(上海至杭州之间)两

铁路线上的铁桥、隧道几乎全部被摧毁,运输物资更是有90%以上被盗或遗失。

面对战后的瓦砾废墟,为避战火而离家园的各地元老及一些开明人士纷纷从避难地返回,在占领军的协助下着手组建治安维持会。随着回流难民的日益增多,本着“相互扶持”的精神,以“当前的生活和战后的重建”为目的,又组建了自治委员会。这些组织模仿中国的旧制度,与当时中国的自卫保甲形成连带责任制,为维持治安、民众生计及恢复经济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其中,上海浦东地区的治安维持会就是在日军特务部(先前的驻沪武官随着派遣军的登陆变为军司令部特务部部员)楠本实隆大佐的指导下最早成立的。它标榜“亲日与和平”,由大同市政府创建,苏锡文被委任为负责人。苏锡文是台湾人,精通日语且很有才能。当时流行扩大市区,苏锡文一上任,就为行政管辖区的扩大化做出了努力。

不久,苏锡文便将其不断发展,直至规模升级,改称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并迎来了新市长傅筱庵。傅筱庵是宁波人,战前为上海通商银行总经理。北伐之前,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因追随五省联军总司令、军阀孙传芳反对国民党,在革命军平定上海之后曾被通缉过。傅筱庵是周文瑞推荐给特务部的。周文瑞是当时台湾银行上海支行的买办,此人还是清朝邮传部右侍郎盛宣怀的孙女婿。盛宣怀曾因开办大冶铁矿而与日本交往密切。新任市长傅筱庵为了报答周的盛情,任用周为市财政局局长。

当时华中占领区内产生的治安维持会、自治委员会等组织,到昭和13年3月成立维新政府时已达43个。这些组织的管区与日军的作战区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与当时的中国行政管辖区相同,因此便产生了各种矛盾,这也是无法避免的。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只是畏惧日本宪兵而迎合日军,不考虑当地民众的得失,甚至有人只顾中饱私囊。随着日军宣抚班①宣传活动的展开,民众对战后日支应有关系的理解加深了,这些自治组织与宣抚班互相协作,为保护一般市民的生命财产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日军进攻面的扩大,地方警备的兵力及力度都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日军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也由面向线、由线向点地减弱。

为此,自治组织的工作便日显其重要性。另一方面,生活物资的配给、难民的救助、伤病员的医疗等日渐激增,这些更涉及到财经来源问题。鉴于这种情况,主张成立一个统一的行政组织也就成为必然。昭和 13 年 3 月 28 日,维新政府(梁鸿志任行政院长)终于产生了。

维新政府成立时已成立的自治组织一览表
选自昭和 14 年 8 月维新政府行政院刊《维新政府的现状》

地 区 名	组 织 种 类	成 立 年 月 日
宝山县	自治委员会	昭和 12 年 9 月 23 日
无 锡	同 上	11 月 14 日
吴 县	同 上	12 月 1 日
苏 州	同 上	12 月 1 日
月浦镇	同 上	12 月 13 日
杨行镇	同 上	12 月 13 日
常 州	同 上	12 月 29 日
南 京	同 上	昭和 13 年 1 月 1 日
太 仓	治安维持会	1 月 1 日
滁 县	自治委员会	1 月 8 日
上海南市	同 上	1 月 11 日
沙 川	同 上	1 月 13 日
吴 兴	同 上	1 月 16 日
常 熟	同 上	1 月 23 日
鸭窝沙	治安维持会	1 月 25 日
丹 阳	自治委员会	2 月 1 日
芜 湖	同 上	2 月 5 日
松 江	同 上	2 月 16 日
太 平	同 上	2 月中旬

续表

地 区 名	组 织 种 类	成 立 年 月 日
淳 化	自治委员会	2 月 19 日
索 野	同 上	同 上
九 华	同 上	同 上
东 山	同 上	同 上
清 宠	同 上	同 上
京 令	同 上	同 上
湖 熟	联合会自治会	同 上
袭 都	自治总会	同 上
真 如	同 上	2 月 22 日
杭 州	同 上	3 月 1 日
上海沪西一	同 上	3 月 7 日
同 三	联合会自治会	3 月 15 日
月浦镇	自治总会	3 月 20 日
丹 阳	同 上	3 月 25 日
沪西总会	同 上	3 月 23 日
崇 明	同 上	3 月 27 日
扬 州	同 上	同 上
镇 江	同 上	不 详
湖 州	同 上	同 上
南 汇	同 上	同 上
奉 贤	自治总会	同 上
金 坛	同 上	同 上
崇 德	同 上	同 上
嘉 定	同 上	同 上
丹 阳	同 上	同 上

续表

地 区 名	组 织 种 类	成 立 年 月 日
吴 江	自治总会	3 月 27 日
昆 山	同 上	同 上
青 浦	同 上	同 上
南 浔	同 上	同 上

(中略)

十二、作者亲历的南京攻城战

到昭和 12 年 10 月前后,一直顽强阻击日军从吴淞口登陆的中国军队,由于大厂镇、苏州河前线被突破而转为劣势,日军各方面军就此乘胜追击,11 月 19 日左右已直逼常熟、苏州、嘉兴。参谋本部在接到了“乘胜追击,一举攻克南京,将蒋介石政权置于死地”的前线部队报告书后,便以此为中心,就今后的作战指挥展开了认真而热烈的讨论。

无独有偶,11 月 5 日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第十军(柳川兵团),却在 11 月 19 日清晨向所属各部下达了全力以赴进攻南京的命令。为此,参谋本部也在讨论了各种方案的基础上下达了命令,即撤销原上海方面军发布的作战地区最前线只能到苏州、嘉兴线为止的指令。这样,从政治策略来讲就改变了,也可以说是放弃了原有的不将事态扩大化的方针。因此,华中方面军也开始堂而皇之地向首都南京发起了进攻。突破苏州、嘉兴一线继续进军,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态。因为稍微试想一下就会明白,此作战已完全脱离了不将事态扩大化的基本方针。退一步考虑,即使一定要打这场进攻首都南京的战斗,也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争取全面和平的难得之机会。开战之前,再次预测一下能否和平解决,如行不通,至少也该做好一切与作战相应的政治宣传工作,使政策和战略两者相互呼应。否则不仅会失去这独一无二的战机,更会加大将日军拖入持久战泥潭的危险。关于这一点,松井石根方面军司令官以前就提出追

击中国军队,将战场推向南京的建议。在中央方面,以陆军部和参谋本部为中心对此展开了各种争议,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负主要责任的参谋本部对放弃不扩大方针极为重视。多田参谋次长是强硬的消极论派,而石原将军的后任下村定作战部长则是主张进攻的积极论派。两派激烈辩论的结果是采用积极论。而作为我们派遣军特务部的任务,就是着手进行一些与作战相宜的政治工作。可是进攻的速度却超出了预料,以至于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南京就已沦陷了。错过的机会让人遗憾终生。

攻占了首都南京,不只失去了和谈的机会,更加不幸的是发生了一些部队对一般市民进行的大屠杀事件。消息一传出,中国舆论哗然和震惊,使得国际形势在更加恶化的同时,也加强了中国民众团结一心誓死抗战到底的决心。

此次作战,我与负责经济、金融的原田运冶(原就职于东洋经济)等文职人员一起,加入朝香宫司令部^①,向南京进发。我们的任务是,入城后尽快接管南京市内政府管辖的各种金融机关,同时调查在新占领城市发行日军军票所发生的实际情况。正如前面所述,从11月5日柳川兵团从杭州登陆以来,华中方面军的所有部队便规定由军票代替以前的日银券。首都南京在集中了大量的军队之时,军票发行是否适当,对今后的军票策略都将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正好是南京沦陷前一天的傍晚,我与朝香宫司令部一起,在南京东部的温泉镇汤山宿营。下面是那天晚上突发事件中我的一两个片断回忆。

过去作为华中方面的最高司令部是上海方面军司令部^②,后来在其之上,又新设置了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其司令官则由原上海方面军司令部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继续任,统一指挥上海方面军和第十军(柳川兵团)。而空缺出来的上海方面军司令官则由朝香宫鸠彦王中将就任。那天晚上,上海方面军司令部占领了一处被战火摧毁得很厉害的温泉旅

① 即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因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为朝香宫鸠彦,故名。

② 原文有误,应为上海派遣军司令部。

馆。黄昏时分,司令部的卫兵们骚动起来,原来是在司令部的西北方出现了敌方的小部队。他们是受到日军的三面夹击,突围出来后在汤山寻找出路的中国士兵。碰巧看到了正在来来往往地构筑阵地的日本士兵,使用机关枪扫射司令部。当时的司令官正是刚上任的朝香宫殿下,副官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当然司令部里有一些骑兵卫士,但兵力并不足以击退敌方。副官向隶属的炮兵部队寻求救援,可是好像不在附近,最后只好将配置在附近的高射炮拉了出来。不是对空而是向水平方向射击,不管怎么讲结果是对方的枪声哑了。这时,有消息说俘虏了对方的几名士兵,特别是看到几名下士兵慌忙拔刀加入肉搏战时,让人感到了战场的残酷。大概是心疼那些本不是传家宝的挂腰军刀是花了大钱才做成的吧,总之更残酷的战斗没有继续下去。

此次跟随我的侍卫还是中村国一,他与我同车前行。中村国一的正式归属是陆军华中方面军特务部。在别的章节里我也曾提到过,中村是桑名市人,我也曾在那里待过。同是桑名市人的众议会议员并任陆军政务次官的加藤桑四郎,为他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就把中村送到了上海。中村总是称我“武官”,视我为主人似的,对我事无巨细、照顾有加的同时,且舍身相护。中村还是个有胆识的男儿。到了上海后,他拿着介绍信,并没有马上找我。当时,海军陆战队正在市内逐户搜查战败的残余敌兵及便衣兵,中村对此颇感兴趣,便加入其中。干了一段时间后,就在上海的日本人中出名了。据那些日本人说:中村总是不带任何武器,冲在最前头,而且总能搜查到,真是勇敢啊。

那天晚上在汤山,中村也为我找到了一处可以入浴的浴池。他重新换了里面的热水,并进行了清扫,正准备接我来洗澡时,进来了一位老军人要洗。中村大声怒吼地制止了他:“这个浴池在(冈田)武官没进来之前,我不会让任何人入浴”。这位老军人是我的上级,军参谋长塚田攻中将^①。后来,塚田中将告诉了我这件事儿,并对我说:“你真有个好部下。”我虽然感到很不好意思,但对中将的行为亦感到钦佩,因为他听到中村的怒吼后,便毫不争辩地到其他的浴池去洗澡了。

① 原文有误,塚田攻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参谋长,陆军少将。

第二天早上,因为战况非常紧迫,我便告别了原田等人,与中村两人乘车追上了前卫部队,并立志要第一个登上南京城。随着城墙的逼近,敌方火力变得更加密集。因为夹在前卫部队和大部队的中间,我们只能断断续续地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在越来越密集的炮火中,中村忽然喊道:“太危险了!”便让我横卧在座椅下,用垫在下面的毛毯将我从头盖上,他则骑在我身上,将自己变成了盾牌。现在一想起已经过世的中村,他的人品和当时的情形就会浮现在眼前,像一幅生动的画面,呼之欲出。

随着队伍的前进,映入眼帘的除了道路两边的累累死尸之外,就是那些战败的中国士兵。有些人刚从城墙上逃出,却又马上被抓缴械,和战俘一起遣送回来。在一个小广场上还看到了一队像念珠一样,一个挨一个地排着的战败兵。他们神情漠然,中间居然还夹杂着一些女人。面对死亡,人的心理是很特别的,是一种凄惨、悲壮的亢奋。而这种状况可能更触发了那场与日本武士道精神相悖的、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当天进攻南京的部队,有从正面的右侧各路进军的第十六师团、第九师团、第三师团先遣队、第一〇四师团及第六师团,还有迂回从背面进攻的第十三师团和国崎支队。无论是哪支队伍都像竞赛似的,为能第一个登上城门而进攻。想像中,这场进攻与其说是一场有统一指挥、有条不紊的战斗,倒不如说是让人觉得更像一个为争第一而奋力猛进的运动会的接力赛。

硝烟中我避开横在街上的尸首从中华门进了城。首先钻进了最近的一家交通银行总行。银行内没有想像中的混乱,而是阴森紧闭。工作人员一定是一开始就有计划地进行了撤退和避难。金库内既没有重要资产也没有任何账目。

市内火灾随处可见,道路上混乱不堪。终于又发现了一家中国银行和其他银行,可是无论哪家银行都和先前的交通银行一样。后继的人城部队除了搜索残兵之外,还负责维持治安等工作。夜幕降临,空气中弥漫着烧焦的糊味,火光映红了夜空。我们正犹豫是否在寒夜中露营时,东方却已露出了曙光。

第二天一大早,我到城外吊唁了我中学时的同窗伊藤善光大队长。他是这次从光华门进攻,为了能够第一个登上城墙而阵亡的。

没过多久,城墙外和近郊一些相对来说没有遭到战火摧残的地方出现了无论哪个占领区都曾有过的小偷市场。这些对军票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呢?为此我紧急联络了金融专家宗像久敬(日本银行驻上海代表兼军事顾问)、藤松正宪(该处副手,现足利银行会长)及替地大三(该处副手,现高千穗董事)等。

这在平时也会见到,中国在这样动荡的局势中,难民把一些盗窃的赃物拿来摆摊贩卖,因此产生了被称为小偷市场的地方。有一次,在别的市场,宗像帮我鉴定,很便宜地买了一只花瓶。宗像曾在英国伦敦工作过。工作之余,他经常去伦敦博物馆研究那些从中国拿去的古陶瓷,是这方面的专家。现在我们去那些市场全无挖宝的心情和打算,目的只想看一下在这些连一支香烟都可以买卖的市场上,当地居民对日本士兵拿出的军票会有什么反应。刚开始被日本士兵强行要求收下的军票,由于一两天后用军票换取日本产的生活必需品的交换所的出现,便悄然从这些市场向一般市场流通开来。

随着市内清剿告一段落,就要举行入城大典了。作为特务部的一员,我也可以以骑马的英姿参加这一生难遇、一世难求的盛典,心里非常期盼。但是,最终还是因要汇报南京攻陷前后蒋介石政府的动态及其他情况而被急召回国,未能参加入城仪式,实乃终身憾事。后来看到了松井大将在入城式上骑马入城的照片。另外,将军还送给我一幅亲笔题写的入城诗。每当我看到这幅字时,总能感觉到:这个入城仪式对松井将军来说,也一定是一生一世的盛典和骄傲。可就是这样一位热爱中国、为亚洲的前途而担忧的将军,其隶属部队却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丑恶的不赦之罪。这种罪恶之痛用死也无法解脱,让人不堪忍受。

(下略)

[冈田酉次:《日中战争侧记》,东洋经济新报社(东京),
1974年3月20日。]

(赵仲明 译)

2. 上海时代

——记者的回想

松本重治

编者注：松本重治，时任日本联合通信社上海支局局长。

(前略)

在为日中和平而努力的漩涡中

最高指挥官松井的训诫

1937年12月13日傍晚，南京被完全攻陷。17日，中支那方面军在最高指挥官松井的率领下，各部队首脑和选拔出来的部队一起举行了入城仪式。16日随军报道部部长深堀(游龟)中佐给我来了一个电话，邀请说：“17日开始，上海至南京的铁路，途中若有中断之处说不定需要换乘卡车，但不管怎么说已经恢复通车了，一起去看一下占领后的南京怎么样？”据说17日下午乘上火车，预计18日早上就能到达南京。这样一来，我还可以顺道看望一下在前线随军的“同盟社”的同事们，所以我立即答应了他：“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我在两件毛衣的外面又套上了“同盟社”本部邮寄来的冬季军服，背包里塞满了随身用的各种用具，同时还念念不忘地带上了琼·凯基库送给我的一小瓶白葡萄酒，按照约定的时间，向北火车站走去。

深堀部长是今年夏天就任于报道部的。上任以来，他多次与我们这些记者尽情畅谈，并常一同上前线视察，是一个非常随和可亲的人。听说他还是九州藩主的后代，在日本的熊本或是长崎附近还有一座小的深堀城池呢。有着这样背景的深堀部长却是一位温文尔雅、对人亲切且充满幽默的人物。列车上，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一位年轻的军医，他自我介

绍说是“上仲军医中尉”，听了名字才知道，他是友人浦松佐美太郎夫人福姬的弟弟，在圣路加医院工作，现应征入伍，以前我们还在东京见过一两次面。在战争中，能遇上友人和熟人，更让人感到一种怀旧的伤感，这也许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吧。深堀中佐为我带了些罐头和其他食品，我也拿出我的白葡萄酒，大家一边喝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旅途。到了晚上，车厢内非常寒冷，我要了六条毯子盖着睡觉。一路上，列车时而停车时而又缓缓地开出，第二天，即18日的早上到达了南京。作为“同盟社”的随军记者尝过各种苦，但从当时的情形看，我们的这次旅途真可谓是游山玩水了。在到达南京之前，深堀中佐告诉我说：今天有一个陆海军联合举行的阵亡将士祭奠仪式。因为我非常想见识见识最高指挥官松井，便强烈要求说：“请作为特例，让我也列席吧。”

到达南京后，我首先去拜访了“同盟社”南京支局。因为战事，支局要一两天后才能重新开始工作。我又来到了“同盟社”随军记者的临时办事地点，那是在中山路占领的一处空房。本想慰劳一下同事们，可是除了坚守在那儿的联络员之外，大多数的记者和摄影师都因采访已奔赴各处了。谁也没能遇见，真是遗憾。

祭奠仪式开始的时间是下午2时，因为必须提前半小时入场，我便和深堀报道部长一起急忙赶往举行仪式的地点故宫飞机场。那天是多云，风不是很大，可是刮在脸上还是有刺痛的寒意。从昨晚开始下的小雨已变成了雪，积雪把会场点缀得好似涂了一层淡妆。下午2时之前，所有列席部队都整装列队入场完毕。环顾会场，中央面东而设，祭坛用白布装饰，祭坛的中央摆着供酒，另外还供奉了各式山珍海味的供品。在祭坛的后方是一个高达几米的四角白木，上面写着“中支那方面军陆海军阵亡将士灵牌”。战死的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们也包含在内。周围竖立着的木桩上垂挂着白布。战场上的祭奠会场，虽然布置得简单朴素，却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

作为祭祀主，陆军的代表是最高指挥官松井，海军的代表是“支那方面舰队”司令员长谷川。两位在仪式准时开始的号角声中步入会场，就座于祭坛附近。在两人身后就座的有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近藤战队司令官，再往后就是各部队首脑及将士，大约有五百人。仪式是依照神

教的法式进行的。松井、长谷川两指挥官庄严地诵读了祭文,接着日高参赞代表川越大使宣读了悼文。在两祀主供奉“玉串”^①的同时,陆海军的号手们吹响了《国之镇》,全场的将士一起对空鸣枪告慰亡灵,仪式在肃穆的气氛中结束。

我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谁想最高指挥官松井却突然起立,面向以朝香宫为首的所有参加祭奠的人员,开始说教式的演说。深堀中佐也和我一样,以为又有什么要开始了呢,一边感到惊奇一边听了下去。“你们!攻克南京令皇军军威大振一事,却由于一部分人的暴行而让皇军的威望一落千丈。”原来是怒斥啊。老将军边流泪边严肃地训斥着官兵,“到底给我做了什么事?你们!作为皇军这是应有的行为吗?!你们,从今天开始以后,要严厉整顿军纪,绝对不允许再虐待无辜的市民百姓,这也是对牺牲者的供奉。”等等,全是痛彻心扉的话语。“松井先生说得太棒了!”我不禁在心中呐喊起来。回头向深堀中佐提出了我的恳求:“日军的暴行、屠杀,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不论怎么说,请报道部长一定同意把松井大将训诫的新闻公布于众。”深堀中佐说:“松本君,我也非常赞成。但现在要征得方面军参谋的同意才行,我这就去问,你等一下。”

过了20分钟左右,深堀中佐回来了,我一听他说“参谋说不太赞成此事”,就又怂恿说:“深堀中佐,允许打电报发布这条新闻,会成为你作为报道部长为日本做出的最大贡献,如果不允许,我也认为是你报道部长的职责所在。”想了片刻,深堀中佐说:“松本君,你考虑得对。不管参谋说什么,这是我作为报道部长的责任所在,同意打电报发表这条新闻。”“太好了,谢谢。屠杀、施暴的消息听到了不少,从松井大将的讲话来看,事实上好像是做了更可怕的事,不是吗?发表这条新闻可以帮助日军挽回一些声誉,我们一定要发这个电报。”“松本君,给我做吧。”我抓住深堀中佐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南京大屠杀”事件

第二天,即18日,我回到上海之后马上就去了支局(同盟社上海支

① 在日本神教的祭祀中使用的挂满纸条等的树枝。

局)。在给东京发电的同时也给英文部部长堀口君(在瑞典)发了一份电报。恳求他将新闻译成英文后发送给路透社及其他各英文报纸。堀口君也非常赞成我的做法。第二天早上,这条虽然很短的新闻,便登载在了上海的《字林西报》等各种英文报上。但是,虽说最高指挥官松井的态度令人钦佩,可一想到被松井训诫的那些日军在南京等地所犯下的最可耻的施暴、屠杀、放火、虐尸等罪行,还是令我心痛之极,不能容忍。

到了第二年的4月,曾在上海南市难民区一起工作过的田伯烈来到了同盟总社事务所。他告诉我说,他编写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录》一书,决定出版发行了。然后他说:“这件事,虽说非常对不起善良的日本人民,但从广义上说,我只是想告诉世界,战争改变了人,是应该让人感到可悲可憎的事。可这本书还是作为反日刊物编辑的。特别是对于日高先生和松本先生两位,南市难民区的建立得到了你们的鼎力相助,而我却好像用这样的恶意回报了你们的好心,所以我的内心也感到万分痛苦。另外,鉴于目前的时局,我避免使用真实姓名,但在序文中我还是向两位表达了衷心的感谢。不管怎样,说到底还请把它作为反战编辑刊物接受吧!”听了田伯烈这番有良知的話后,我说:“田伯烈君,我也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也认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和屠杀是最可耻的行径。你的著作,也许现时具有反日的作用,但绝不会一直如此。对于中国,还有全人类,我们日本人才该在真诚谢罪的同时,把你的书作为精神食粮认真反省。你这样有礼貌地来向我说明,反而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从那以后,一直到6月份我才买到了那本书,本想从头到尾通读一遍,可实在忍受不了列举的那一条条罪行事实,读到一半便放弃了。听说这本书在伦敦发行的同时,中文版也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在对田伯烈君反战的良知和善意行为表示敬意的同时,我也在私下开始认真考虑“日本是否该从中国撤兵”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再述。

从那以后经历了三十多年,当我在为撰写这本回忆录做准备时,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在日中两国国民之间,引发了各种争议。田伯烈君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录》也从中文版译成日文,由龙溪书舍出版发行了(1972年2月)。接着,本多胜一氏的《中国之旅》成书,还有早稻田大学的洞富雄教授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南京事件》一书。

第二年,铃木明氏著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出版,他在此书的结束语中写道:“时至今日,事件的真相谁也不知道。”尽管我怀着痛苦的心情读了本多氏、洞教授、铃木氏的书,但我仍然怎么也无法把握整个事件的真正全貌。即使如此我也不想做什么反驳。我以为比起被害者的人数来,更让人心痛的是日军的那种反人类的行径。

最近我拜访了新井正义、前田雄二、深泽干藏三位原同僚记者。他们作为随军记者都在南京陷落后为采访而在南京停留过数日。为慎重起见,我直接与他们进行了交谈。特别是深泽氏,他一直记着随军日记。读了这些日记,对我有了极大的帮助。从12月16日到17日三人都亲眼目睹了如下事实:首先,从下关往草鞋峡方向的河岸一带有大量被焚烧后的尸体,有人说大约有两千人,也有人说大约两三千人。大概是先用机枪扫射,再浇上汽油烧死的。另外,在原军政部的院内,进行了对年轻将校和下士官的“新兵训练”。用中国俘虏当靶子,让新兵用带刺刀的枪练习刺杀,刺中的人被扔入防空壕中。前田氏说:在看到第十二、第十三个俘虏被刺杀时,自己就已经呕吐不止,所以马上离开了。他在军官学校院内也看到了用手枪射杀俘虏的情景,看到两人被杀后,就看不下去了。三人的谈话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当时究竟是战斗还是施暴、屠杀已经无法区别了。他们还说,根据大本营发布的中国军队阵亡九万的数字来看,也有人认为是有相当数量的被屠杀俘虏算了进去,因为日军在进攻中形成了包围南京的态势,下关、雨花台等地的中国军人大多数都被杀害了,但这些也应看成是战死的数目。此外,对妇女的施暴、残忍的屠杀等确实发生过,但说是作为军队有组织的行为,还是不大令人相信。三位都是屡经考验的资深记者,他们认为,几十万被屠杀是没有的,除去战死者之外,被屠杀的受害者该有一两万吧。前田氏为了社会栏目的采访还跑了许多地方,听说南京被占领后,14日、15日进行了严厉的便衣兵搜捕行动,但以12月20日左右为界,无论是市民的生活,还是街头的秩序都恢复了常态。

对于18日最高指挥官松井的训诫,听说某部的师团长还嘲笑了一番。但不管怎么说,第二天开始,除了担当警备的第十六师团外,其余部队开往芜湖或移往城外。但是,作为警备留守南京的第十六师团的一部

分士兵却又继续施行了暴行和屠杀。这一点,南京难民区的委员之一贝茨教授,已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出庭作证。贝茨教授和我也有些个人交情。几天后,我在轻井泽遇到了他。他不太愿意开口,只说了一句:“当时真是太可怕了,我什么都不想说了。”尽管“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和被害人数到现在还是个谜,但他在我们日本人的心里却留下了一个想抹杀也抹杀不掉的创伤。这是不争的事实。

(下略)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记者的回想》,
中央公论社(东京),1975年3月25日。]

(赵仲明 译)

3. 步行随军

佐藤振寿

编者注：佐藤振寿，时任每日新闻社摄影记者。

(前略)

有名无实的华盛顿旅馆

我停留在无锡时，与报社的一位同事取得了联系，他跟随的是攻打常熟的部队。我将以前拍的胶卷给了他派来的联络员。

无锡恢复了平静。然而自 28 日夜晚大批日本兵进入城内以来，到处都是日本兵。

日本兵的增多虽然使得城内治安好起来了，但我和摄影师山上却没订到双人房，最后好不容易才住进了华盛顿旅馆。旅馆只是名字是外来语，有床的房间都被先来的客人订走了，结果虽然睡在了屋顶下，可那却是一间既没床也没椅子的大厅。

我将带来的一条薄毛毯铺在木地板上，就这样睡在上面。躺下时肩膀、脊梁骨和腰都咯咯作响。因为太累，总算是睡着了，但睡得不安稳，再加上肚子饿，只觉得寒冷彻骨。

29 日早上，匆匆吃完简单的早饭，于 9 时 30 分左右从无锡出发，跟随行军部队一道前往常州。

在无锡肋坂部队本部时，我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我失足踏进民宅旁边的水沟中，身体一歪，好像扭伤了左膝，一走路左膝就痛。

我一瘸一拐地走着，不觉来到了大路上。就在这时报社的车来了，谢天谢地，于是我便坐了上去。这真是绝处逢生。车子加速开了一会儿，追上了正在行军的队伍，这时听说常州已被攻陷了。

这个消息让我坐不住了,于是不停地给司机鼓劲,总算到了常州。我们好像是捷足先登第一个抵达的。又向前开了一会儿,迎面驶来一队小型坦克,我便以太平禅寺塔为背景,拍了张照片。



从杨行镇去前线(前者为笔者)

坦克开得比汽车还快,履带和引擎轰然作响。我一打听,原来是独立轻装甲车第二中队的坦克。后来在南京的时候,我受到了那个队长藤田实彦少佐的热情接待。

笔者跟随并进入常州的队伍是第十六师团的片桐部队^①。笔者为片桐部队的两位军官拍了一张合影,但后来这张照片引发了重大社会问题。

为“斩杀百人”的两位军官拍照

社会部记者浅海一男从无锡起一直与我同行。这位浅海记者把我

^① 即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联队长为片桐护郎大佐,故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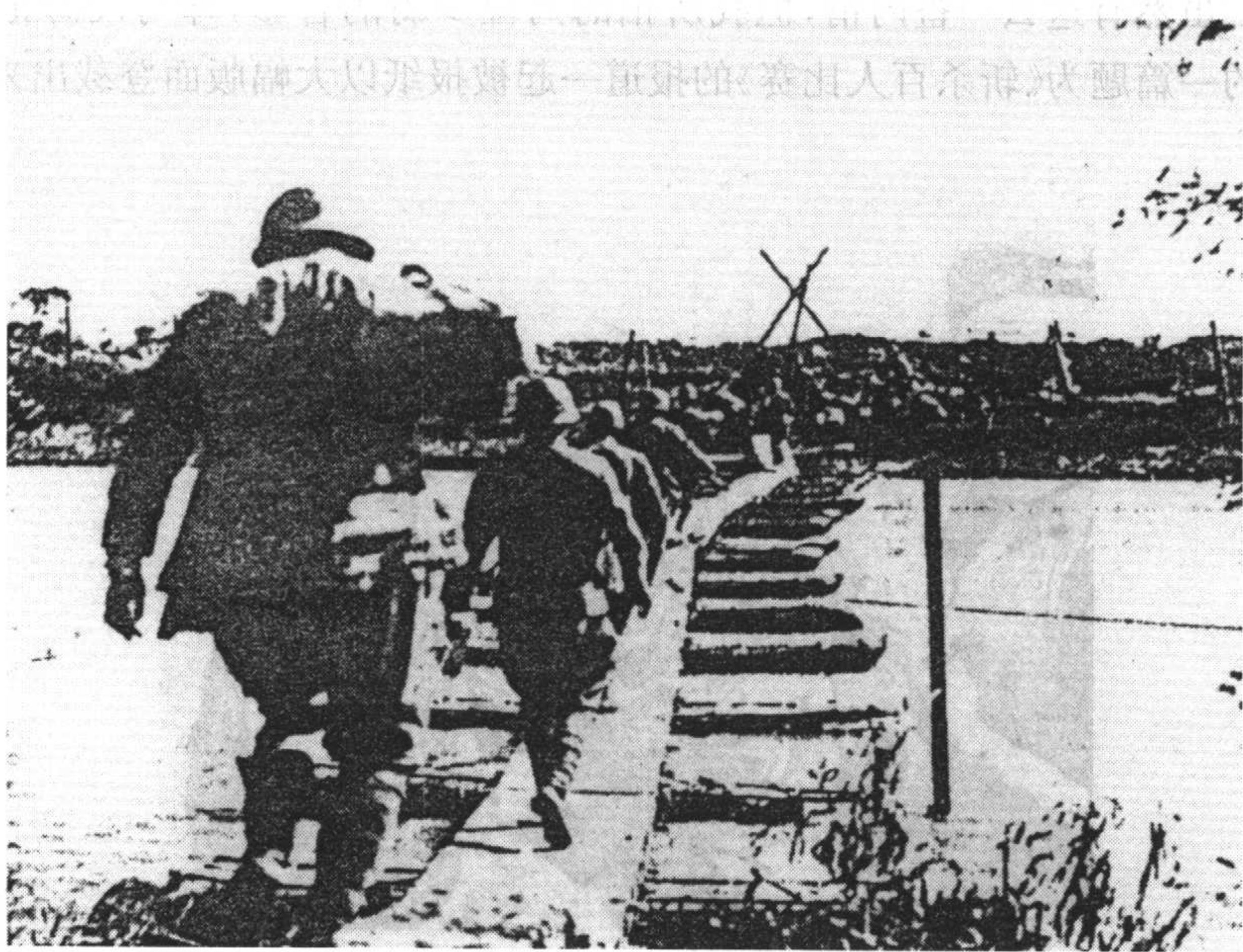
叫到了常州城门旁边的一家旅馆。

“能不能给两位军官照张相？他俩的烟也抽完了，你能送点给他们吗？”浅海问我。

离开上海出发时，我在装着胶卷和粮食的旅行包里放了一百来包“红宝石皇后”牌香烟。想抽烟的话，一摸旅行包便能找到一两包烟。浅海记者知道这事，好像他想在采访两位军官时，用那些香烟来打开局面。

他献上烟后，能从军官那儿打听到什么呢？我竖起耳朵听着浅海记者与两人的谈话。其中一位是大队副官野田毅少尉，另一位是炮兵小队长向井敏明少尉。他们聊的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话题：从现在起至攻入南京城前，看谁能先斩杀 100 名中国士兵！

听了两位军官的话，我还有没弄懂的地方。我这人啊，只要哪位同行拍了出色的照片，我便想刨根问底地打听各项数据，如胶卷型号是什么？镜头光圈是多少？快门速度是多少？总要问明白后我才心服口服。



第一〇一师团津田部队通过工兵架设的浮桥向对岸胡家庄挺进

他们虽然说从现在开始到进入南京城前要斩杀 100 名中国兵,但不知是由谁来确认这个数字。没人确认便无法证明他们斩杀了 100 个人这个事实。我向两位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得到了如下的答复:野田少尉所杀人数,由向井少尉的士兵负责清点,而向井少尉所杀人数则由野田少尉的士兵负责清点。

我虽然明白了大意,但是他们能在具体什么时候的白刃战中砍杀中国兵?这个问题仍然叫人纳闷。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战斗中,他们几乎接近不了敌方士兵,也可以说几乎不会拼刺刀的,只有在极少出现的肉搏战中才有可能挥舞日本刀砍中国兵吧。

在那种情况下,战场自然陷入了混战之中,而大队副官野田少尉则负有协助大队长,并将其命令传达到各中队的重要职责。另一方面,向井少尉身为炮兵小队长,必须指挥炮兵进行射击。不管是野田少尉还是向井少尉,他们在上述状况下如何能够手挥军刀砍杀中国兵?这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疑问。

虽然有这么一番内情,但我所拍的两位少尉的合影,却与浅海记者写的一篇题为《斩杀百人比赛》的报道一起被报纸以大幅版面登载出来。



联络员(左)、记者藤田信胜(中)、笔者(右)在吴淞前线

我只是在常州见过两位少尉一面,就在快要淡忘此事时,在距南京不远的地方,又碰到了浅海记者。他厚着脸皮向我讨烟:“那两人还在竞赛呢,能不能再借点烟用用?”

战后再次遇见浅海记者时,他问我:“市谷军事法庭的检察官传讯过我,他有没有到你那里去?”浅海记者说他因为写了《斩杀百人比赛》这篇报道,被中方检察官询问过当时的情况。我虽然没有牵扯进去,但后来也被其他机构传讯过。

作为摄影师,我的名字出现在两少尉合影的说明中,结果《新潮周刊》的一位记者发现了这条线索,便从《每日新闻》的人事部打听到我的住址,跑到我家来。他来采访的目的是想让我告诉他有关野田、向井少尉的事实真相。

据说,由于报纸上的新闻惹出的麻烦,战后回国的两位少尉受到了南京军事法庭审判,并被执行枪决。他俩连太平洋战争都安然度过了,结果却遭此意外杀身之祸,我禁不住哀悼起他们。此后,我与向井少尉的女儿通过信。她似乎曾多次前往南京凭吊亡父。

常州城内小憩

不知是因为攻打南京战役的迫近,还是因为中国军队撤退得太快,日军每天不断向前挺进。每当部队占领一座城市,我就以该城城墙或城市中标志性建筑为背景,拍下高呼万岁的日本兵,并以此为证,表示已占领了该城。

如果国内读者在这些新闻照片中发现了本地部队的名字,必定会为老乡的勇敢表现而欢欣鼓舞吧。然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内心总问自己:只是这样做行吗?

我在前线附近跟随着部队,目光时常会被眼前的战况所吸引,然而即便想拍下那些镜头,我首先也必须考虑自己的安全。因为这一原因,即使成功地拍摄了被占领的城墙上的照片,可作为摄影师,心中不免还是很惭愧。

11月30日这一天,我都在常州城内的旅馆里休息。战地记者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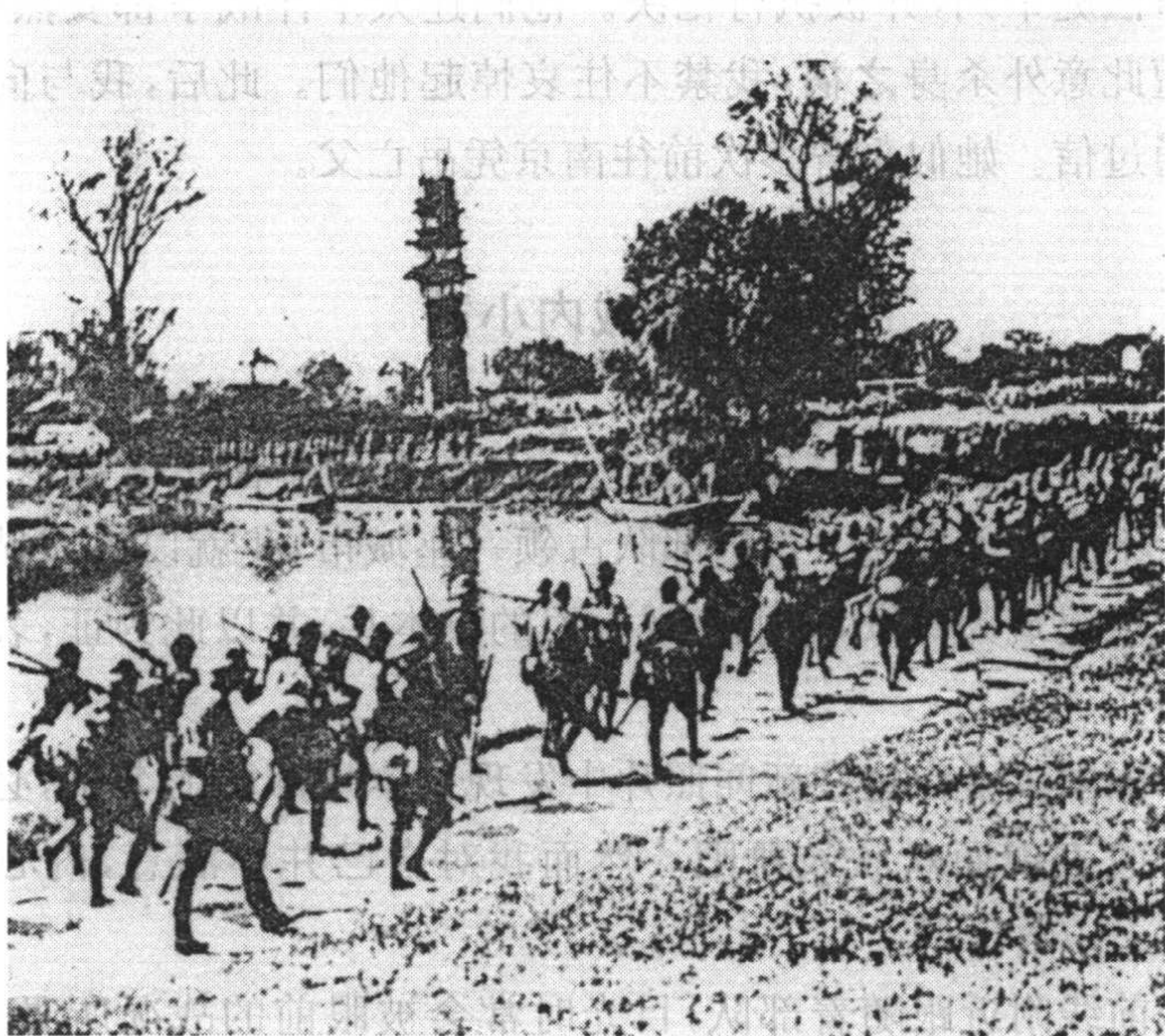
前往各自采访的部队询问战况。部队里一有新动向,记者们必须采取与之相应的行动。

无线电技师在旅馆旁边竖了根天线,定时与上海方面通讯。我们跟随的第十六师团似乎在上海向南京的进军中领先了。

由于部队出发去下一站丹阳了,常州城内的日本士兵人数锐减,因此拍照对象也少了。

也许是因为急于追击,日本兵用枪打死了一头猪后,只用刺刀割去猪腿肉。我一看,发现还有可以食用的部分,于是掏出猎刀,仔细地割了下来。

社会部、地方部的记者们白天去司令部和联队本部采访,傍晚回来后便忙着赶写稿件,然后用无线电报发稿。我是摄影师,天黑不能拍照,所以便承担了做饭工作。



梅李镇河映衬的左塔,在上海前线看不见的风景

总共有七八个饭盒,我用其中三个做了20份饭,剩下的饭盒用来煮肉汤,然后再用带来的盐调味。正好民宅厨房里有丢弃的锅,我用罐装

黄油把猪肉炒一下，就当下饭的菜了。虽然想吃青菜，但在前线，只要能吃饱、有床睡就是万幸了。

无线电技师在烛光下拼命地按着无线电发报机的键钮。或许是稿件太多，嘀嘀嗒嗒的声音到12时还在响着。

11月30日，先头部队自常州向丹阳进发，4时15分抵达奔牛镇附近。敌军正放火焚烧丹阳和金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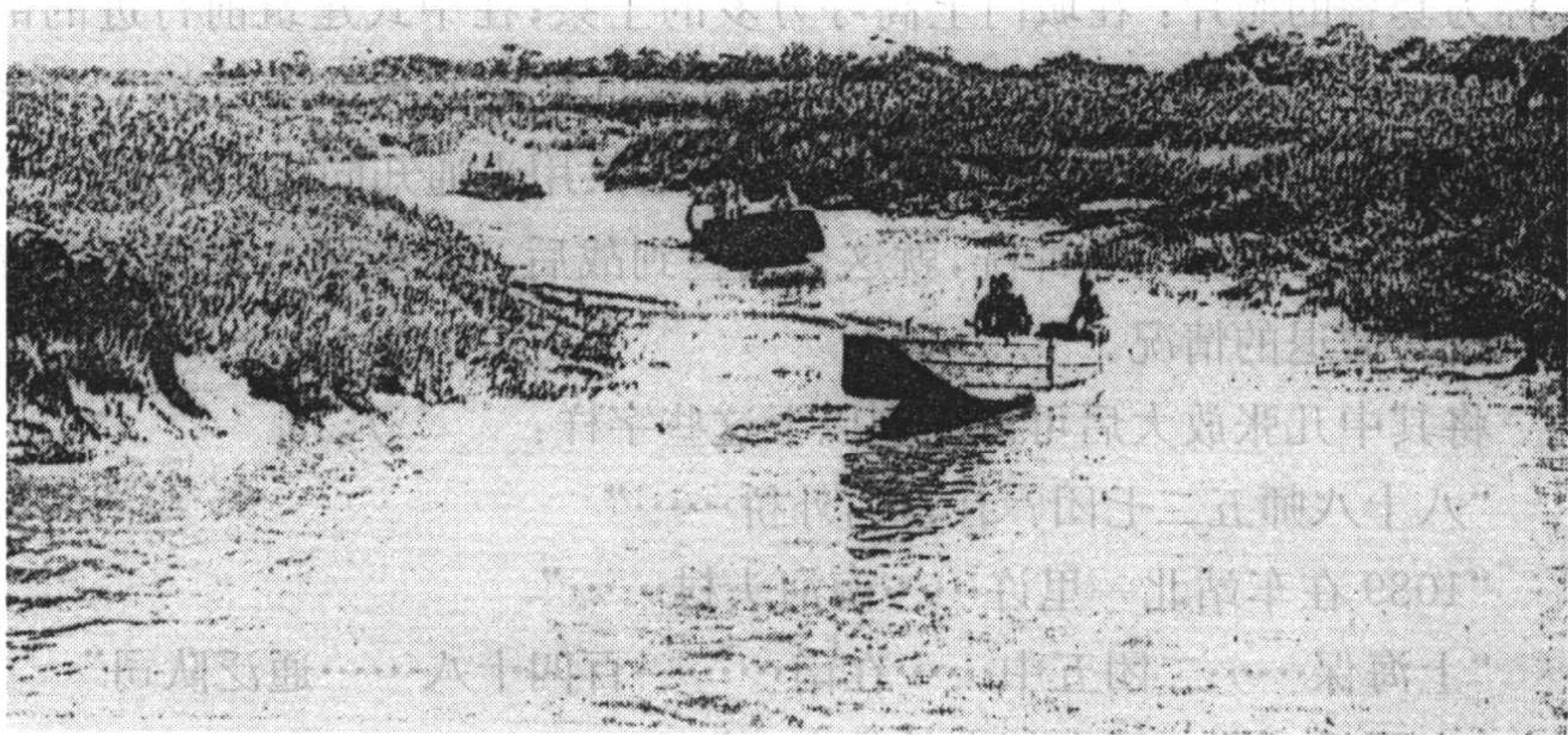
（《饭沼日记》）

进 攻 无 锡

11月30日，我在常州休息。回想起来，吴淞战役、白茆口抢滩登陆等事件历历在目。9月25日登陆吴淞，如今终于来到了这里。

我虽在前线摄影和采访，但同时也关注着其他报社的摄影同行的好作品。我总在担心：没输给《朝日新闻》吧？没输给《读卖新闻》吧？前线总部的无线电技师与上海方面联络之后，得知上级并没有批评我，看来效果还行，于是我决心再接再厉。

可一想到自己以第一〇一师团的随军记者身份从上海出发，一路穿越战线，长途跋涉过来，禁不住自嘲是吉卜赛摄影师了。



令日军烦恼的天然河流屏障，在上海战事后也对物资的运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1月下旬作战经过：

派往上海的部队，在突破吴福阵地后，沿泥泞道路继续追击。其中，第十三师团于28日占领青阳镇。重藤支队追击敌军至常熟西部地区，并于27日封锁了江阴至无锡的通道。此后，部队按作战命令向无锡北部地区集结。第十六、第十一师团及第九师团主力向无锡挺进，于23日起进攻驻扎于无锡东面阵地的敌军，并于25日占领了该地。

此前不久，我军司令官获悉敌军仍从无锡往常州及其西部撤退。故于22日命令第十六、第十一师团指挥其追击部队向常州追击。随后于25日命第九师团率其部分兵力利用太湖的水路行动，再派主力部队向常州追击。另外，命令第十一师团主力向无锡附近集结。（第十一师团主力与重藤支队因被调作他用，此后向上海集结。）

各师团追击队伍沿京沪铁路、江南大运河、太湖及太湖北岸通道进行追击，于29日进入常州。

（《战史丛书》第420页）

11月27日，我跟随胁坂部队进入无锡时，拍了一些如同在西餐菜单上称为套餐的照片：在城门上高呼万岁的士兵；在中式建筑前行进的部队等等。后来又用自己的莱卡照相机对着百姓家的板墙随意拍了几张照片。板墙上写了些文字，看样子是中国士兵用来通知同伴的留言。

这些底片一直没有冲洗，就这么搁置到战后。这些照片反映了中国军队慌忙撤退的情况。

将其中几张放大后可以识别以下这些字样：

“八十八师五二七团？在盘门外桥……”

“1089 在车站北一里许……南河头村……”

“上海保……二团五中……在南……一百四十八……通泛队司”

“奇□兵三营二团在相白外集合→”

在另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

“一五四师九一九团直进”

丹阳陷落 夜宿城外

11月1日我在吴淞战线上采访。此后过了一个月,终于在常州迎来了12月。



在京沪铁路苏州附近,胁坂部队的士兵正运输物资

车子从上海开来了,前线似乎有情况,所以我们离开常州出发了。在常州得以休整两天,所以腿疼也减轻了一些。浅海记者与我一道乘车到了奔牛镇,下一个目的地是丹阳。半道上我们下车跟在第十六师团大野部队后面步行,走的是一条沿着江南大运河河堤上的小路。目的地丹阳似乎发生了火灾,升起的浓烟抹黑了秋日的天空。

后来我们才得知12月1日的《饭沼日记》中记录的一件很棘的事情:

……此外,武器方面因无法进口黄铜,如不将弹壳运回国,则炮弹将供应不足。步枪及刺刀国内已缺六万把,亦应运回。木村少将

称炮弹已无法再制造了。(木村少将时为武器局局长兼大本营野战武器长官)

即便是在战事最为激烈的时期,大运河上都有帆船(民船)驶向丹阳方向。令人费解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前往战区?

河堤很窄,士兵们排着纵队前进时,后面又来了一队骑兵。领头的骑兵说了句什么,于是一声令下:“向一边靠!”我和行军的队伍立即停靠在路边。

事后才知道那位骑兵是师团长的护卫兵,跟在后边的便是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中将。师团长看都不看我们一眼,径直向黑烟滚滚的丹阳飞驰而去。

12月1日 晴 发自常州

下午1时左右出发去奔牛镇。因不走镇江大道,而走老路,因此弃用汽车,骑马去吕城镇。下午6时前抵达。与草场少将会面,听取有关此前占领吕城镇的报告。

报告称上午11时30分左右占领了吕城镇,但此时仅占领了第一线。后方第二线的实际占领时间已近傍晚。敌军凭借迫击炮在大范围内从正面顽强抵抗。因此,本队先头部队片桐部队的一个大队在草场少将(第十九旅团长)的指挥下原地待命。

今夜侍从军官(后藤中佐)与草场少将率部驻扎在吕城镇。

(《中岛日记》)

我跟随着大野部队,沿河边小道走到了吕城镇。因为腿脚疼得厉害,于是决定在草场旅团本部附近过一夜。

我在当天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12月2日,6时起床,早饭后出发。搭便船在丹阳前方两公里处上岸,当夜宿于草场旅团。激烈的枪声至6时左右平息了,因为丹阳城已被攻下。”

说到实际情况,得从清晨起床做饭时讲起。我为其他记者准备了两个饭盒,自己一个饭盒,一共用三个饭盒做了饭。细分起来,两个是煮米

饭的,其中也掺了一些当地米,另外一个猪肉汤,上面漂着中国勤杂工不知从哪儿摘来的青菜叶。

我和几个日本兵一道乘上了江南大运河上的一艘民船。中国人灵巧地摇着橹,帆船悠悠向前驶去。全副武装的士兵们也走累了,正好可以和我们一样歇一会儿。

船向前划着,可枪声愈来愈激烈。最后,船不得不在离丹阳两公里处靠岸。那儿有日本兵,一打听,原来他们是第十六师团的草场旅团。

由于在离前线很近的地方留宿很危险,所以我们决定在指挥部旁过夜。下午6时左右,捷克机枪和我军机关枪激烈地交火,到下午6时,激烈的枪声才平静下来。丹阳已被攻下,今晚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12月1日

第十六师团先头部队于9时30分抵达丹阳东南约五公里处,第九师团先头部队于8时30分抵达金坛东面约五公里处。方面军下达进攻南京命令。

(《饭沼日记》)

战局开始变化。《第十六师团中岛师团长日记》中对此多有提及:

12月2日 晴 吕城镇,王村西部村庄,距丹阳1.5公里。

上午9时30分从吕城镇出发。

草场部队命一中队自正面,一大队自右面进攻。

第一、第二大队(欠第一中队)自左迂回至丹阳北侧及西南侧,待炮兵抵达即开始正面突击。因奔牛镇以西无路可行,基本是从农田中穿过。四处遍布地缝状水渠,需要工兵施工,故无法如期前进。大队长决定以门板为桥推进炮队(然大炮仅有两门)。

已命令部队尽量不要从正面进攻,要等待两侧迂回队伍到位。两支队伍于下午5时左右抵达各自目的地。敌军已被完全包围,因傍晚不宜撤退,故判断敌军极有可能趁着夜晚撤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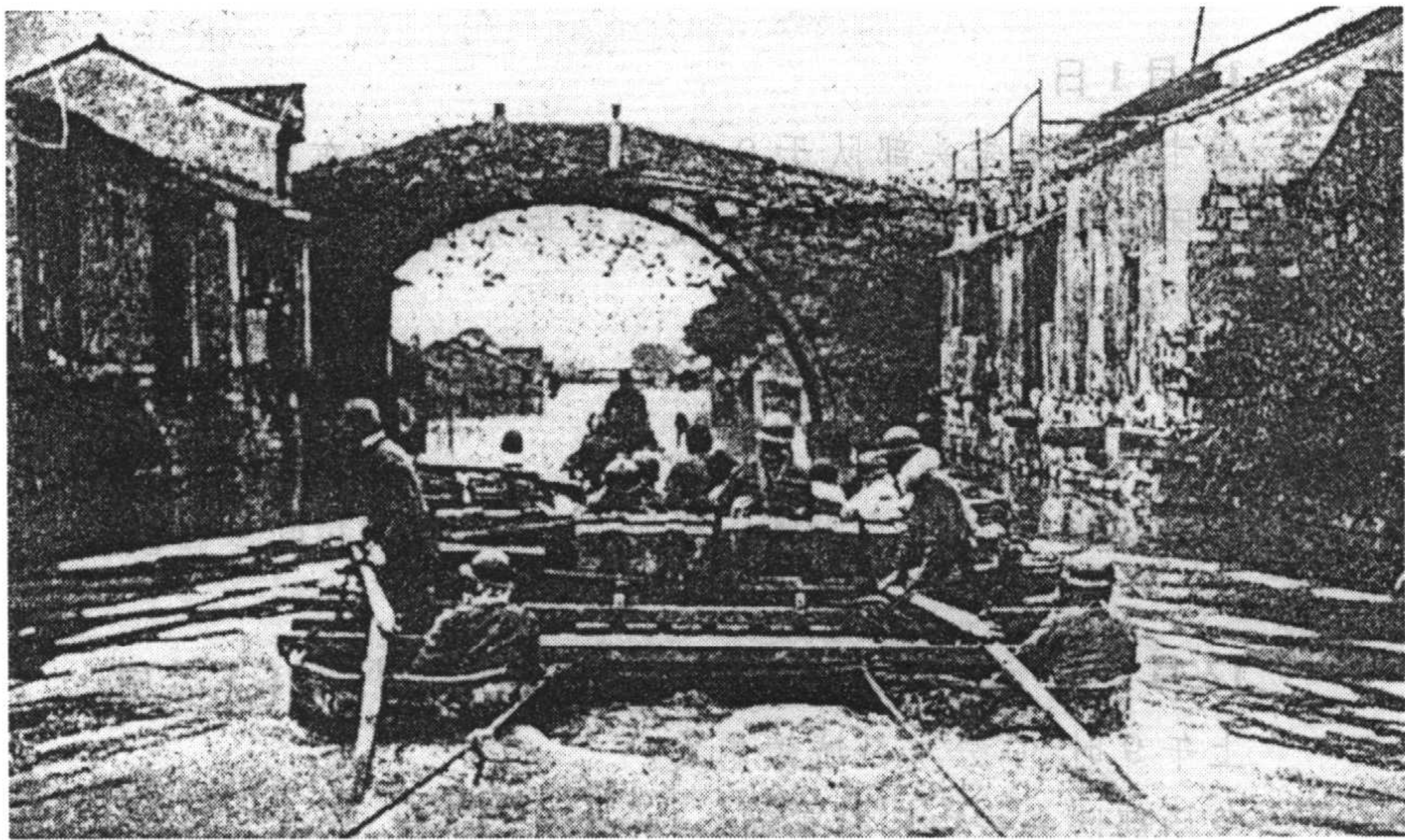
(《中岛日记》)

12月3日笔者记录：

“天气晴朗，早晨起床，进入丹阳城。中午，与后续部队（总社记者团）取得联系。夜宿中正门外新亚旅社。”

头天晚上十分平静，得以安睡。一大早我便起床吃了早餐。说是早餐其实就是塞了些食物果腹而已。敌人并未发动进攻，于是我们随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进入丹阳城。不知是不是因为敌军昨夜就撤退了，好像并未进行激烈交火。

从中正门进城时，护城河上的桥虽遭火焚烧，但并未烧尽，于是日本兵不慌不忙地从桥上走了过去。中正门外的一家中国旅馆里有不少空房间，今晚我报社的宿舍就定在这儿了。



从苏州到无锡约50公里的大运河上，机动艇牵引着满载炮弹的铁驳船航行

负责无线电的安田技师架好通讯天线，准备发送记者们今晚的稿件。晚饭照例又是肉汤，不过我特意做咸了一点，这样可以当菜吃。

趁着暮色，我在宿舍周围来回走了走。一片停车场模样的开阔地上，停着许多日军中型坦克。入口处用中文写着“汽车站”三个字。宿舍旁驻有中型坦克部队，大概不会被敌人袭击了吧。想到这便放心了。

然而，这种放心感转瞬即逝。坦克发动引擎，随之留下履带的轰鸣

声,不知开往何处了。

后来又有士兵来到宿舍,大概是中正门的卫兵。那士兵交待说:“晚上中正门要关门,我们就在门后,有什么事通知一声。”这一来,对于待在城外宿舍里的我们来说,万一敌军来偷袭,绝对是死定了。无奈之下,只好将从中国士兵那儿缴获的步枪顶上子弹,架在房间的角落里。

城门外如果房子孤零零地亮着灯,很容易成为敌人袭击的目标,所以大家商定加强灯火管制。但是,到了联络时间,无线电技师安田必须开始工作。他只好就着烛光一边看记者的稿件,一边按着发报机键钮。总之,我们把夜间灯火管制放在了第一位。

室外空气带来初冬的寒意。能在屋里过夜,是仅次于吃饱饭的幸事了。床有些硬,但可以伸直腿。不过为防意外,鞋子和背包都放置得整整齐齐,不敢有丝毫懈怠。一躺到床上,行军的疲劳便袭了上来,将我拉入梦乡。

丹阳静悄悄 前线在推进

12月4日我的随军记录写道:“天气晴朗,停留在丹阳,市内无事。”

然而这与实际情形略有出入。也就是说,不论何时发生情况,我们必须跟随军队行动。因此我一大早便起来,用饭盒烧饭并草草解决了早餐。就在这时,中国随从匆匆忙忙地跑来了。

原来,跟在后面的友军部队分别乘坐小帆船赶来了。照片上的河流可能是江南大运河的支流,两岸树木丛生,水面比较狭窄,小帆船上插着日章旗,没有列队行驶。拍摄好的照片上注有说明文:“片桐部队。”

丹阳路况不好,总社汽车无法开到前线附近。我们的粮食不够了,但用来摄影的胶卷倒是足够的。拍好的胶卷都交给了徒步前来的联络员。

我在丹阳城内转了转,可能是太累了,这会儿许多队伍都歇息了。大概是因为前往南京的部队已经出城了吧,城内静悄悄的。

12月4日

……第十六师团先头部队8时40分在倪塘(句容东面约十五公里),第九师团先头部队9时在西王岗(天王寺东面两公里),第一一四师团(第十军)9时在张家山(溧水东面约十三公里),各部队前方均未发现敌人。

下午4时左右第九师团先头部队抵达位于句容南面约七公里处的二圣桥。师团主力紧随其后。第十六师团部队自清晨起基本未前进。

傍晚时分第十六师团的先头部队攻入位于句容东面约六公里处的太平庄。

(《饭沼日记》)

丹阳城内虽然一片寂静,前线却正往南京方向推进。

沿上海至南京大道前进,在句容向右拐

总社的汽车终于来到丹阳。下面是12月5日我的记录:

“乘车沿上海至南京道路前去句容。不久便赶上了行军队伍。”

我们得知前方部队正和中国军队交战,于是决定下车。这支队伍是片桐部队第三大队,大队长是富山少佐。我们决定跟在他们后边,不去句容,而是向右拐。走了一会儿,看到几栋民房,听说今晚就住在这儿,地名好像叫贾岗里镇。

我们这些随军记者就睡在大队本部的一个角落里。

我们在民房里生起炉火,一边取暖,一边和富山大队长天南海北地聊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哪个中队的人,听说大队本部里住着报社记者,便做了些牡丹饼送过来了。以前我虽然吃过,但馅的味道早忘了,于是就和大队长一道品尝起来。

我们将稻草铺在泥土地上,裹上毯子,晚上不用担心敌人袭击,所以睡得很香。遗憾的是为防不测,睡觉时没敢脱鞋子。在无锡受伤的膝盖又疼起来了,室外气温越来越低。

12月5日

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部队今晨9时左右来到句容前方约四公里处。朝香宫殿下亲自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第九师团先头部队4时左右抵达南京东南方约五公里处，有二三百名敌军在溃逃。

方面军指示：进入南京城是历史性之辉煌事件，禁止各师团单独入城。

（《饭沼日记》）

12月5日 晴 丹阳至祝家边

(1) 草场部队将步兵第一中队及炮兵留在正面，率其他部队沿句容—汤山镇方向右迂回。迂回至句容敌军侧后方。部队也因此进不了句容，滞留于祝家边周围。

(2) 今晚与草场部队联系中断，情况不明。

(3) 近来草场部队一再使用迂回战术，与正面部队未保持联系，便贸然插入敌后。句容正前方仅留有一支步兵部队，且其任务并非进攻，是负责掩护炮兵的。此种规模的迂回行动务必加以控制。

（《中岛师团长日记》）

中岛师团长对草场旅团的行动似乎颇为不满，然而，第十六师团后方参谋在《步兵少佐木佐木久日记》里却又这样写道：

12月5日 于句容东面八公里处祝家庄

我在丹阳住了两夜，实在不舍得离去。我的房间在宽敞的办公室旁边，我深深地眷恋着这房间，然而很快就要分别了。整个上午大家在野战仓库商量各项事宜，决定由我和酒井大尉率部共同追赶主力部队。

北风格外寒冷。与北支那战线相比，我们已经相当幸运。可进入12月份这儿也很冷。最近早上结的冰相当厚。我们追过一支支部队，来到祝家庄附近歇了下来。追击部队重视迂回包围，尽量避

免正面冲突。主干道方面仅有一个中队在留守,主力已从句容北面向敌后迂回。位于句容东部地区的敌军虽然没有强大兵力,但他们依靠碉堡进行顽强抵抗。

我在祝家庄附近过了一夜,房子虽然像个猪圈,不过有蒿草垫床,还有炉火和毛毯,还是很暖和的。如果去普通民宅的话,肯定没炉火。与其挨冻,倒不如用这种近于露营的方法过夜。

这里介绍了派遣军参谋长的《饭沼日记》、第十六师团的《中岛师团长日记》和第十六师团后方参谋的《木佐木六日记》。各自特点十分鲜明。

虽然都在攻打同一个敌人,但想法却迥然不同。让普通老百姓来看的话,他们便禁不住会想:所谓的战争记录原来如此啊。

在南京东部丘陵行军

12月6日

5日夜里,我在贾岗里富山大队舒服地过了一夜。今天还是和部队一道行军。在这之前,每天早晨我必须准备好午饭和晚饭。

在贾岗里可以用上百姓家的厨房。我用中国大锅做了一锅稍微硬了点的菜粥,在粥里掺了一大半南京大米,还加了些肉和青菜,咸淡适中。

行军时,我们跟在富山大队后边。道路穿过一片平坦的草原,四周看不到一棵树。那里是南京东面磨盘山系的一部分,海拔虽不高,但颇具高原情趣。一路上没有遭遇敌人,让人觉得是在郊游。

我们没走多久,在12时左右追上了草场旅团指挥部。有些人一当上旅团长之类的官职,态度随即强硬起来,以显示其威严。然而到了草场旅团,经副官介绍之后,却发现草场旅团长的形象与我想像的大不一样。

他没穿军官制服,穿着普通士兵的冬装,再加上没戴肩章,所以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老头儿是个应征老兵。草场旅团长身材魁梧,讲话也很

和蔼,顿时让人感觉非常亲切。

我们又跟随草场旅团主力一道前进。下午3时左右,来到一所占地面积很大的中国步兵学校。晚上安排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叫李家村(?)的地方宿营。司令部就在旁边,所以不用担心敌人袭击,可以安心睡个好觉了。

这天的战局看来没有多大变化。第十六师团长在《中岛日记》中写道:

12月6日 祝家边至句容

我得知昨夜步兵中队进攻并已占领句容,且我军欲尽快与草场部队取得联系,以便了解前方状况,故先率部前往句容。

句容地区的桥梁已遭破坏,且北面道路又有敌军轻机枪阻击,加之炮兵尚未赶到,如突击损失必然重大,则命炮兵向前推进并进行炮击。另外,今夜预订计划如未得以实现,则宿营于句容。

今夜与草场部队未取得联系。

佐佐木部队似有部分兵力已进入山中。

12月7日,我在草场旅团司令部过夜,因为觉得那所步兵学校里可能有些值得拍的东西,便去了一趟。然后又跟着草场旅团继续行军。

路上我们在老百姓家休息时,有位士兵在门口杀了一头猪,我想割点猪腿肉下来,但刺刀不太好使。剩下的肉很多,我就用猎刀全部割了下来。已经是初冬时分,气温不断下降,所以肉装在饭盒里不用担心变质。

行军途中,部队接近梅塘村时,受到右侧高地上敌人的袭击。枪声听起来较为沉闷,不像是捷克机枪,可能是重型机关枪。

我们当时正走在地势稍高点的田埂样的小道上,所以我连忙跳到低洼的地方躲避子弹。那时,我只顾拼命逃跑,不小心压在了一名士兵身上。当时我只注意到他穿的军服,以为他只是一名普通士兵。

敌军攻击停下来后,我才长长舒了口气站了起来,正准备向压在身下的士兵道歉时,一看吓了一跳,原来那人是旅团长草场少将。



在梅塘村激战后缴获中国军队军旗的大野部队

我一个劲儿地低头赔不是，而旅团长毫不介意地回到开始行军的队列中去了。

当时我因为脚疼，便把背包让中国随从背着，把钢盔也挂在背包上。枪战发生时，不见了随从踪影。等找到他时，却发现他竟然早已把我的钢盔戴在了自己头上。

敌军阵地位于高地上，而且相距较远，所以我们只能用大炮还击，但未见成效。后来枪声终于小了，我们也走到了梅塘村。百姓家的房屋虽然简陋，但凑合着能躲避子弹。

这儿也来过日本兵，他们是步兵第二十联队（大野联队），已先开拔了。后经调查得悉，他们与中国军队激战到9日早上，夺取了中国军队的军旗，取得了重大战果。

先走的那些步兵们也宰杀了一头猪。那头猪嗷嗷地叫着。猪身上的肉硬邦邦的，我一下刀子它就惨叫。如果这声音被敌人听到，我们肯定又要遭受枪弹袭击了。为了防止发生这种麻烦事，我拿起猎刀割断了猪的喉管，不让它再叫唤。

12月7日 晴朗

屋外洗手间里结冰厚达五六公分,让人想像出前线生活之艰辛。

(《饭沼日记》)

我把去年冬天去滑雪时穿的那件妹妹织的高领毛线衣翻出来穿在身上。

12月7日

句容西面的敌军已经撤退。指挥部于上午9时前从句容出发。野战重炮堵塞了前方道路,极为碍事。据闻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及步兵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战术高明,均回避与敌军正面交锋,力图迂回作战。因此,主干道上竟见不到一兵一卒。白天行军时,师团指挥部与步兵尖兵同时前进。果然,在进入颜家村时,遭到敌人的火力袭击。步兵散开,炮兵向前,形同遭遇战一般。面对早已等候在阵地里的敌军,我们毫无战术,这是一场无序而混乱的战斗。敌军炮弹狂轰滥炸而指挥部却束手无策,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师团长负伤,军医部长慌忙赶来,却被训斥。

师团长来到部队后面,我们也转移至指挥部。刚立起身不足一分钟,便有两枚迫击炮弹落下,险些丧命。

迫击炮弹落在身边爆炸,有人受伤。听说师团长左大腿部受穿透性枪伤,我很吃惊。看来我们必须考虑选择怎样的位置。晚上我们住在一所炮兵学校里。(中略)

主干道方面,今天在汤山镇遭遇敌军正面抵抗,我右侧支队和追击队伍正在继续深入敌军后方。敌人左边与右边的联络极差。

(《木佐木久日记》)

南京近郊的“温泉”

对于从上海来的随军记者和摄影师们来说,现在最大的课题便是哪

支部队最先进入南京城。因此,我们都在南京附近的前沿阵地占好位置,等候消息。

为了将记者的稿件从前线发送出去,无线电技师带着发报机与我们同行。发报地点就成了前线基地了。我通过上海来的情报,了解到跟随其他队伍的同事们的情况。金泽君在第九师团,中岛君在第十军,松尾在第六师团。综合这些情况来看,我跟随的第十六师团草场旅团的行动路线是正确的。

12月8日 晴朗

初冬的阳光柔和而温暖。今天是个小阳春的天气。敌人也会感觉很暖和吧。人只有安全时才有这种心境。在梅塘,我们进了民房后就出不来了。这儿是个只有两三间房屋的小村子,我们刚要外出,敌人好像知道我们在这儿似的,捷克机枪的子弹就飞了过来。虽然明知这儿距离南京不是很远,却丝毫动弹不得,真是令人痛苦。米虽然有些不够,但猪肉还有许多,感觉食物很充足。我的背包里装着罐装奶油和大瓶的餐桌上用的精盐。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盐是如此重要,想来实在应该感谢那位为我装上盐的人。

我们今天一整天都没离开梅塘一步。

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突破各自前方敌军阵地,并继续前进……

(《饭沼日记》)

昨夜,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第一大队自东面、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第一大队自北面攻入汤水镇并占领之。

(《中岛师团长日记》)

然而,中岛师团长因负伤不能入浴而懊恼不已。

12月8日 于汤水镇

我师团及炮兵旅团指挥部住在支那军引以为荣的炮兵学校内。

今天上午8时左右,敌军突然发射了数枚迫击炮弹,致使我十几人负伤,七匹战马死亡。炮弹坠落地点位于校园内,距我们所处位置约五十米,情形壮观至极……(中略)

我们向昨天敌人用来抵抗我军的水泥碉堡方向走去,走进了汤水镇。我去泡了温泉。冒着枪林弹雨在温泉中洗去征尘,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多亏这温泉水,把我乌黑的脸和手脚洗干净了。

(《木佐木久日记》)

以前虽然在地图上见过汤水镇这个地名,但还是第一次听说那儿真有温泉冒出来。

12月9日 晴朗

军人不论何时都必须服从命令,不过对于我这样的非战斗人员则无此要求。然而,为了在战场上自我保护,与其说是在服从军令,倒不如说因为在危急时军队可以保护我才跟随军队行动的。

今天8时左右,旅团指挥部出发了。炊事班的人怕掉队也紧随其后。前面要翻越一座磨盘山,也许是最后一道难关。中国随从不知从哪买来了一瓶香酒。睡前用毛巾浸上这种香酒敷在左膝上,第二天早上疼痛就会缓解。跟随部队前进的时候,我虽然开始时走在前头,但由于膝盖的缘故,渐渐落后了。

丘陵地势起伏不大,但路只有一条。部队排成一行长长的纵队。半路上,前面有人喊道:“传令!原地休息!”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救星驾到。尽管自己不是士兵,也照样怒吼一声:“传令!”然后便背着包,啪嗒一声倒在了地上。休息时间转眼便结束了,感觉非常短暂。当出发号令传来时,我满腹怨气地站起身来。

同路的是步兵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他们不愧是现役士兵,虽然身负沉重的背囊,扛着步枪,戴着钢盔,全副武装,但走在山地上依然如履平地。

我一边护着疼痛的左膝,一边拼命追赶着队伍,但还是渐渐落后了。背上的背包也愈发沉重,我便让中国随从背着。为了不至于被队伍落

下,我拖着双腿向前走着,但我的步子还是赶不上队伍的速度。

终于,部队在离南京还有一里的地方宿营了。我长舒一口气,走进了上边分配的民宅中。

大野部队在梅塘与敌军激战到9日早上。他们夺取了敌方军旗,所以我便以军旗为中心拍了张照片。然而,我一边要护着膝盖,一边还要跟着大野部队的官兵行军,实在是痛苦。因为要抢拍他们翻越磨盘山、进军南京的照片,所以我还不能把照片照坏了。

12月9日 于愤头^①

我住的地方可以算是温泉旅馆了,然而凌晨3时左右就被电话吵醒。

以下是关于前线部队追击情况的报告。

这儿的温泉位于首都南京东面五里处,对东京来说相当于热海、伊豆等地区。但与之相比,这儿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寒村。世间总是充满讽刺,据说当年蒋介石曾在我们住的这所房子里招待过专田参谋。我军将战斗指挥部往西面推进,成了炮火下的战斗指挥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第一大队、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对愤头西面约一千米处的主干道两侧的高地发动了进攻,碉堡内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不断爆炸的野战炮弹和迫击炮弹声、登上斜坡并占领坡顶时步兵们的欢呼声、日章旗和勇往直前的坦克队等,从后方看起来,整个场面俨然是一幅广角镜头拍摄的全景画面。左边的大队于下午2时左右,右边的大队于下午3时30分左右占领了敌阵地。

(《木佐木久日记》)

士兵喊道:“到这儿来!”

我跟随的第十六师团大野部队沿着连接上海和南京的主干道,在距

① 原文如此,似为南京东郊的坟头。

句容不远处向右拐去。平缓起伏的丘陵是磨盘山脉的一部分，仿佛要挡住日军进军南京的道路。

路上我们宿营在梅塘。村子在一个山洼里。村里农民围了个两百多平方米的池子。士兵们走进分配好的房屋，卸下装备后，不做饭和没其他事的士兵便聚集到池边。

初冬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午后的斜阳照射在房屋后面，正好成了晒太阳的好去处。刚过晌午，我正休息着，突然听到了士兵们的欢呼声。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便朝着声音传来的地方走去，一看，水池中央有十几只鸭子在游来游去。有位士兵举起三八式步枪准备打鸭子。旁边有人拦住他说：“就算你打中了，怎么拎回来？”

于是他拿了根长竹竿来赶鸭子，然而鸭子却逃到对面去了。他跑到对面去赶，结果鸭子又逃走了，就是不过来。他们喊着：“到这儿来！”就好像围着鸭子玩游戏一般。

我看了一会儿，想起自己该去做晚饭了，便回去了。

天黑之后，摄影师无法拍照了，而记者们要写当天采访的新闻，无线电技师则要将新闻稿发送出去，此时摄影师总是最清闲的，这样一来，伙房的活儿就落在我头上了。

士兵们这会儿忘却了战争杀戮的残酷现实，忙着追逐鸭子。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暂时流露出的童心。

被胁坂部队抢先了

12月10日

我们翻过南京东面高原地带磨盘山脉，穿过平缓的丘陵地带，来到了平原地区。那里有个叫向尚村的村庄，恬静的田园让人想起平日悠闲的生活。然而枪声愈来愈紧，我们只得待在屋内。

跟在前线部队后面，看见的就是敌我交战，全然不知同事们所在部队的近况。

不过我们在紫金山山麓行军，就意味着接近南京了。中国军队越来越猛烈的抵抗便是证据。

在和大野部队一道行军的途中,我们突然受到敌人火力袭击。捷克机枪的射击声将初冬的天空震得隆隆作响。士兵们立即散开,三五成群地向能看见敌阵的山冈冲去,有站着、有跪着等,各自用不同射击姿势进行还击。

当时我的位置距小山冈顶七十米左右。我快速将焦距调至最远,并按下快门。当时还以为这张照片虽然拍下了士兵们的射击姿势,但不放大的话,可能不会被采用。结果没想到那张照片竟被冠上《壮烈! 南京城进攻战第一报》的大字标题,登在了 12 月 21 日发行的《东京日日新闻》上。

对于我来说,这是第一次亲眼目睹日军在野外发动攻击的场面。我想,也许正因为原先自己不知野外作战为何物,才觉得抓住了好机会。

12 月 10 日

今晨主干道两侧正面部队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一个大队和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一个大队将上麒麟门附近敌军赶走,并击溃马群西侧两高地敌军的顽强抵抗。此外,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主力自紫金山东南角,沿着山脊逐步攀登。据报峰顶各处均设有掩蔽式重机枪掩体。

步兵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左翼稍稍前进,占领了陆军兵营,然该方面炮兵配合不力。

(《中岛日记》)

我在磨盘山行军途中,因敌军火力封锁而被困在民房内。联络员十分勇敢,他冒着危险前来告诉我一条消息:我们社的前线总部就在附近。之前我一直跟随第十六师团草场旅团指挥部向南京前进的,得此消息后,便选择跟随大野部队了。

12 月 10 日,第九师团已经从南京城光华门攻入城内。总社摄影部的同事金泽君便在胁坂部队工作。如今被第九师团抢先,我心里确实有点郁闷。

《东京日日新闻》昭和 12 年 12 月 10 日的号外上,以大字标题写道:

“东南城门悉数占领，皇军攻入南京城内。”

【大校场 10 日发，同盟社】“10 日下午 5 时，胁坂部队之先头部队占领光华门，将日章旗高挂在城墙之上，并攻入城内御道街，战果正在不断扩大。”

【上海 10 日发，同盟社】“在我军总攻之下，南京城东侧及南侧各城门已于傍晚夺取。”

然而，当时我们完全不知道日本国内新闻报道情况。后来看到当时的报纸，非常吃惊。有部分报纸描写了根本不曾发生的战况，真让人目瞪口呆。

在这里忍痛将报社名和特派员姓名隐去。

××新闻 12 月 8 日

【急报××特派员 7 日发自紫金山】“南京近在眼前，胁坂、人见、伊佐、富士井各部队（都属于第九师团）彻夜急行军，其先头部队已到达紫金山。7 日黎明，部队穿过晨雾，将日章旗竖在紫金山顶。自山顶俯身望去，南京城横卧脚下，如今实际已成我军囊中之物。”

然而 12 月 8 日、9 日的《饭沼日记》中并未写到紫金山顶上日章旗飘扬一事。

12 月 9 日

第九师团的旅团指挥部抵达高桥门，炮兵正在散开，然炮击未果。第一线正好位于机场附近，准备占领机场。第十六师团第一线部队正在攻击麒麟门附近负隅顽抗之敌军。

（《饭沼日记》）

战场上打野鸡

接近南京之后，晚上我不再露宿野外，而是改睡在民房里。初冬的夜晚气温虽然急剧下降，但睡前好好地烤火取暖后还是能睡得香甜。可能是因为这里只听到远处的炮声，不再有捷克机枪刺耳枪声的缘故吧。

早晨的阳光,照射在土墙上,屋内浮现朦胧的亮光,我才发觉早晨已经来临。我切身地感到日复一日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首先想到的是该去做早饭了,然而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一日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排便。

走出房门,脸接触到初冬寒冷的空气,我打了个寒颤。东方已经大亮。远处,山梁描出了一道黝黑的曲线,向左右延伸而去。我在地上拾起一根短木棒,朝着山梁走去。我找个地方,挖了一个小坑,然后再慢慢松开裤带,解开纽扣,褪下羊毛衬裤和丁字形兜裆裤,最后弯下腰,将屁股探了出去。一阵风越过山梁吹来,眼前枯萎的棉花秆簌簌发抖。

开始的第一个动作,每个人可能不一样。有人在大便之前要先解小便,我就是这种人。如果不小心将解手的地方选在上坡的话,小便就会淌到自己的鞋底下。结果只好用带来的木棒将小便引到安全之处。

以上说的都是基本动作,在大便的时候需要加倍小心。由于行军途中摄取水分不足,大便容易硬化。排到地面的大便会堆积得很高。如果置之不理的话,就会碰到肛门。因此必须一点点地蹲着挪开,以免其接触到肛门。

这种滑稽的排便方法,是一位老练的下士官教给我的。即使是在战场上,每天的工作也是从上厕所这种日常行为开始的。大完便站起身整理衣裤时,朝四周一看,会发现一两个大完便的士兵站在棉花地里。

仔细看那些士兵,发现他们都面朝同一个方向,也就是太阳升起的方向。这可能是人的本能吧,大家都朝着同一个方向的话,解完手整理衣裤时,自己的重要部位就不会被人看到。如果看到别人那种不体面的模样,别人可能会感到难堪,自己也好像干了什么坏事一般。

顺便提一句,不知是从哪里传来的风气,士兵们出门解手时,为了谨慎起见,都要跟旁边的人打个招呼。这就是所谓的“去打野鸡”。在约一个月时间的前线生活中,大家都用这种山里人打招呼的语言打完招呼,再去上所谓的野战厕所。

听说有位士兵去“打野鸡”时,底下被流弹击中了,至于留下了什么后遗症,我也没问。

紫金山麓野火带

12月11日,凌晨3时起床。原先通知是6时出发的,可能是因为前线发生了变故。天未亮,我匆忙准备好早饭,吃完后提前出发了。拂晓的山路看不清脚下,只好跟着前面士兵的背包前进。

紫金山山脉向右前方延伸着,山顶在黎明的天空下显得黑黝黝的。敌人从紫金山顶用重机关枪之类的武器向我们扫射。然而,正如“黑夜里放枪吓唬人”这句谚语所说,我军的位置他们根本看不清,所以不用担心被击中。

为了对付这群敌人,我军在山麓放火烧山,火焰直向山顶冲去。野火连成许多条火龙,我想将这场景拍下来,然而苦于无三脚架,还要随部队行动,所以不得已放弃了。

这天晚上在行军路上,听旁边的一位士兵说了件有趣的事:“想边打瞌睡边行军的话,只要抓住前边军马的尾巴就行了。”

天快亮时,道路由平路变成了上坡。山上敌军可能发现了我们,朝我们开火了。前边有栋山中少见的钢筋混凝土四层楼房,简直像在迎接我们一般。我们争先恐后地冲进屋内。原来这里是中山文化教育馆,位于东凹子。草场旅团指挥部随后也赶来了。我推想和旅团一道的话,可以了解整个战局,对报道南京攻陷情况也很有利。

我们在楼内察看了一下,发现玻璃柜中陈列着有关孙文的资料以及建设中山陵时使用的瓦。

我、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神原政雄,还有《京都日日新闻》的记者与摄影组,再加上其他三四名职员,总社成员一共有八个人。

草场少将所率领的旅团指挥部安排在一间大屋子里,与我的住处相隔两个房间,里面挤满了旅团指挥部的人员。

虽然在楼房里不用担心迫击炮弹袭击,但我们却是又冷又饿。关键是太冷了,如果能睡着的话,大概会忘记寒冷和饥饿吧。我在四周寻找,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结果发现了一张组合式床。非它莫属了,于是我组装好后便躺下睡觉了。

我军对南京的攻势愈来愈猛,炮弹的爆炸声,飞机和炸弹爆炸声一直传到中山陵附近的东凹子,我根本就无法入睡,只得起来,将饭盒里剩的一点饭拌上开水,一股脑儿灌下了肚。

大宅壮一先生来前线

12月12日,中山文化教育馆外从一大早起枪炮声便轰鸣不止。原南京分局志村冬雄局长冒着枪林弹雨突然来访。志村局长掌握的情报表明:我们已经来到距南京最近的地方。后面就是杭州湾登陆的部队即第十军,再往后就是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了。



12月12日与志村在每日新闻社前线本部。

左起:“东日”社会部副部长金子氏、志村、笔者、大宅壮一

我们目前正在等待时机抢先进入中山门,但苦于粮食不够。志村局长得知此事后,告诉我们从这儿下山,往南京方向走,就能在五棵松找到报社的前线总部,并表示愿意带路。

路上会遇到不时飞来的捷克机枪的流弹,但新闻纪录片摄影师神原

君依然跟随志村先生下山了。因为我和神原君身上有翻越磨盘山脉时拍的底片,都想尽早交上去。

报社前线总部中,除了社会部编辑金子义雄先生外,还有一位堪称稀客的社友——大宅壮一先生。以前我在东京时曾蒙大宅先生照顾,如今一见,倍添亲切之感。

前线总部里有个好消息正等着神原君的到来:他妻子生下了一个男婴。神原君身在战场,听到这条喜讯,激动不已。然而我们不能在五棵松前线总部停留太久。如果不跟着草场旅团指挥部,就无法掌握南京攻城战情况。大宅先生也决定与我们一道回到位于山上的中山文化教育馆。

大宅先生在《改造》杂志昭和13年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香港到南京入城》的报告文学。其中“第一章”专写在香港的生活,“第二章”则专门描写攻陷南京的情况。

这里摘录一些与我有关的部分:

……听说敌军仍在顽强抵抗。我担心今天(12日)能否进入城内。

天亮时,我照例早早起来了。志村君去了一趟中山陵附近的马群一带。回来后,他劝我去那边看一看,以便了解战况。他说虽然有时会有流弹,但只要小心一点,并无危险。

那天日落时分,东日摄影组的佐藤君和电影组的神原君来了。他们两人跟随其他部队去了前线,有许多天没联系上了。佐藤君是我在东京时特别要好的朋友,与他在此相见,颇有他乡遇知己之感。

据他们说,现在他们住在与一栋名为中央(山)文化教育馆的四层楼房内,坐落在与中山陵一山之隔的丘陵上。楼内设有豪华的沙发,与我现在住的简陋民房是不能相比的。最重要的是,战斗就发生在他们眼前,看起来不需要望远镜之类的东西。

听说那边虽然只有十名报社特派员,却因为粮食问题而犯愁。所以我们在背包里塞了许多用卡车从上海运来的日本米和各种罐装食品便出发了。

那天早上,我们要穿过一片被迫击炮封锁的区域,再走很多路,才能到达目的地中央(山)文化教育馆。路上,我们趁着炮声暂停的当儿,猫着腰边爬边跑,终于平安抵达了目的地。然而,那儿有人告诉我们,即使要解小便,也不可以走到屋外去。(中略)

我们打开背包,其他报社的职员们顿时欢呼起来。大家立即分好任务,准备晚餐。惟独把我当作客人,怎么也不让我帮忙。(中略)

只有我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又一次登上了屋顶。战斗的中心位置已从中山陵移到了中山门,战斗似乎异常激烈,仔细听好像能听到枪炮声和工兵进行爆破的声音,甚至还有人的喊叫声。冬季少有的温柔月光笼罩着四周,一派秀美……不,是肃穆的景象。

从隔壁的草场旅团指挥部来了一位副官,说是要分点日本酒给我们。我先拿出一个饭盒,结果他让我再拿一个出来。于是他倒给我们两饭盒日本酒。

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开始唱歌。我们唱的是当时流行的《野营之歌》。酒酣耳热,歌声越来越响亮,最后成了合唱。结果旅团指挥部的副官来了,他说正在通信,问我们能不能不要唱了。我们被说得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不唱了。歌声刚停,屋外便传来枪炮声,看来攻陷中山门已为时不远了。

12月12日

早晨前方状况经确认大致如下:

佐佐木支队穿过尧化门,正向西挺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位于第一峰东侧鞍部。

片桐部队仍停留在中山陵前方。据说中山陵极为坚固,难以攻击。然步兵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深深插入敌阵之后,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又将右大队左移。此种行动实为借花献佛之举。师团期望左翼部队从右面打开战局,然而片桐竟采取此种求稳避难之法。

大队长见手下两位英勇善战的联队长都没有很好发挥作用，故而把指挥两个大队的工作委任给青柳少佐负责。大佐率部退回预备队所处位置，并按规定就此事向草场少将征求意见。少将立即来到指挥所，表示：一切以设法打开局面为先，既然这么委任了，暂且这么任命吧。

然而实际情况依旧毫无进展。虽然片桐部队占领了中山陵，但时间已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攻下第一峰之后，只是水到渠成之事。

今日炮兵清理阵地之后向前方进发。此外，为用火力袭击第一峰，将野战炮兵一个中队分配给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令其从两侧进攻第一峰。

中山陵上敌军已甚少（或无），片桐部队终于攻入敌阵，然战果甚微。

日落后，与昨夜相比极为安静。既无反攻，亦无机枪射击。敌军恐怕已经撤退或者逃走。若果真如此，则因第十六师团占领第一峰及西山之故，目前正是攻破南京城的大好时机。

深夜3时从睡梦中被惊醒了，100毫米加农炮大队（独立攻城重炮兵第二大队150毫米加农炮之笔误）本部、第一中队及混成骑兵团请求援助。他们遭到欲从南京外围或城内撤退的败兵袭击。

彼等因身处后方便麻痹大意，一遇偷袭，则慌忙奔来报告，称敌有一千，又称敌有两千，夸大其词。

（《中岛日记》）

以下为《饭沼日记》中的记录：

12月12日 晴朗

佐佐木支队突破前方敌军阵地，正在前进。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野田部队）夺取紫金山第一峰敌阵一角，战果正进一步扩大。山上硝烟弥漫。

第九师团右翼正面在城墙上正在开辟两条冲锋路线。

第十军、第六师团开始准备攻击西南角。

5时30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占领紫金山,为我军旗增光添彩。
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乃第十六师团之精锐。

步兵第九联队(片桐部队)夜袭中山陵。

佐佐木旅团(第十六师团第三十旅团)先头部队于傍晚抵达和平门。

极为繁忙的南京沦陷日

昭和12年12月13日,我的随军记录极为简单:“清晨起床。中山陵、中山门于夜半被攻克。先至中山陵,后至中山门。阳光灿烂。当夜我们一行在励志社同宿。前去国民政府、军官学校及大使馆。”

不过实际情形远没有这样简单。那天非常繁忙。在这里,让我以报纸和图片杂志上登载的照片为线索,来再现一下当天的情景吧。

昨晚食物充足,饱餐了一顿。中山文化教育馆外枪炮声震耳欲聋,天亮时分才安静下来。从草场旅团指挥部副官处得到情报:中山门已于今天凌晨被我军拿下。如此一来,我必须尽快奔赴现场。

即便是现在去中山门,也能找到许多摄影素材。由于进入南京城后也无法乘车,所以必须作好徒步的心理准备。因此吃饱饭成了头等大事。于是我打开昨晚的饭盒,查看一下剩饭。

摄影准备一切就绪,匆匆吃完早饭,走出中山文化教育馆。刚出门外,右边山上的捷克机枪就开火了,我们一时间动弹不得。旅团本部卫兵拿出重机枪,朝着对方阵地扫了几梭子,捷克机枪立刻哑了。

走出楼房正门,横在眼前的是条上坡路,两边种植的灌木遮住了中山陵。草地上降了霜,踩在上面沙沙作响。到了坡顶,前边就是中山陵了。

初冬的太阳低低地斜在天边,阳光虽然微弱,但很温暖。我一心想着赶紧到中山陵去,脚步却还是快不起来。好不容易到了地方,仔细一看,有三座建筑物。当然,最高处的建筑物里面应该有孙文的雕像。走进屋内,发现孙文的雕像正端坐在椅子上,雕像是汉白玉的。一想到自

己就是为了拍下这幅画面而不远千里从上海走到这里的，心中便涌起一种新的冲动。

雕像周围放着几只花盆，可能是以前用来做盆景的。还有一些正反面都是厚纸，里面是用白纸折叠起来，形状如同佛经的书散落在地上。那大概是用来歌颂孙文功绩的书。后来我向专家请教过，说有可能是“奏本”。

我站在中山陵的最高处，拍了张俯瞰中山陵建筑的照片，顺便也拍下了南京城全景。这时，城内虽然没有传来很大的声响，但可能发生了火灾，紫色的烟在初冬斜阳的照射下袅袅升起。

中山陵的三座建筑外围都架着茂密的江南毛竹。有的说这样是为了迷惑飞行员视线的，有的说是为了让坠落下来的炸弹滑到外面去，士兵们的解释众说纷纭。

然而，南京市内陷落前夕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特派员志村摘录了一个外国人的部分日志，发表在当时（12月2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周日下午版）上，题为《南京痛苦战栗的一个月》。此处选出几段：

（南京总社专电 18 日特派员志村发）

9 日 城外展开猛烈决战。

10 日 紫金山麓附近日军的氢气球高高升起，南京全市在这个绿色鱼形怪物面前止住了心跳，然而气球如同信号一般，顿时枪弹炮弹如下雨般落在支那军的重要设施里。人们只是惊叹炮弹射击的精确。向市民们保证死守南京三个月的唐生智及全体将士都无一例外地不知所措。夕阳将落之际，光华门附近战事激烈。

11 日 战斗整日整夜无休止地持续着，毫无胜算。自来水已停。

12 日 城外支那军土崩瓦解，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教导总队抛下学生抗日军，蜂拥入城。唐生智盛怒，命其所率第三十六师逐个枪杀这些逃兵。然其人数众多，实难处理。晚上 8 时许，唐生智与宪兵已不知逃往何处。有残兵放火掠夺，四处陷入惶恐之中。电灯熄灭，月光惨淡，恍若世界末日，电话完全中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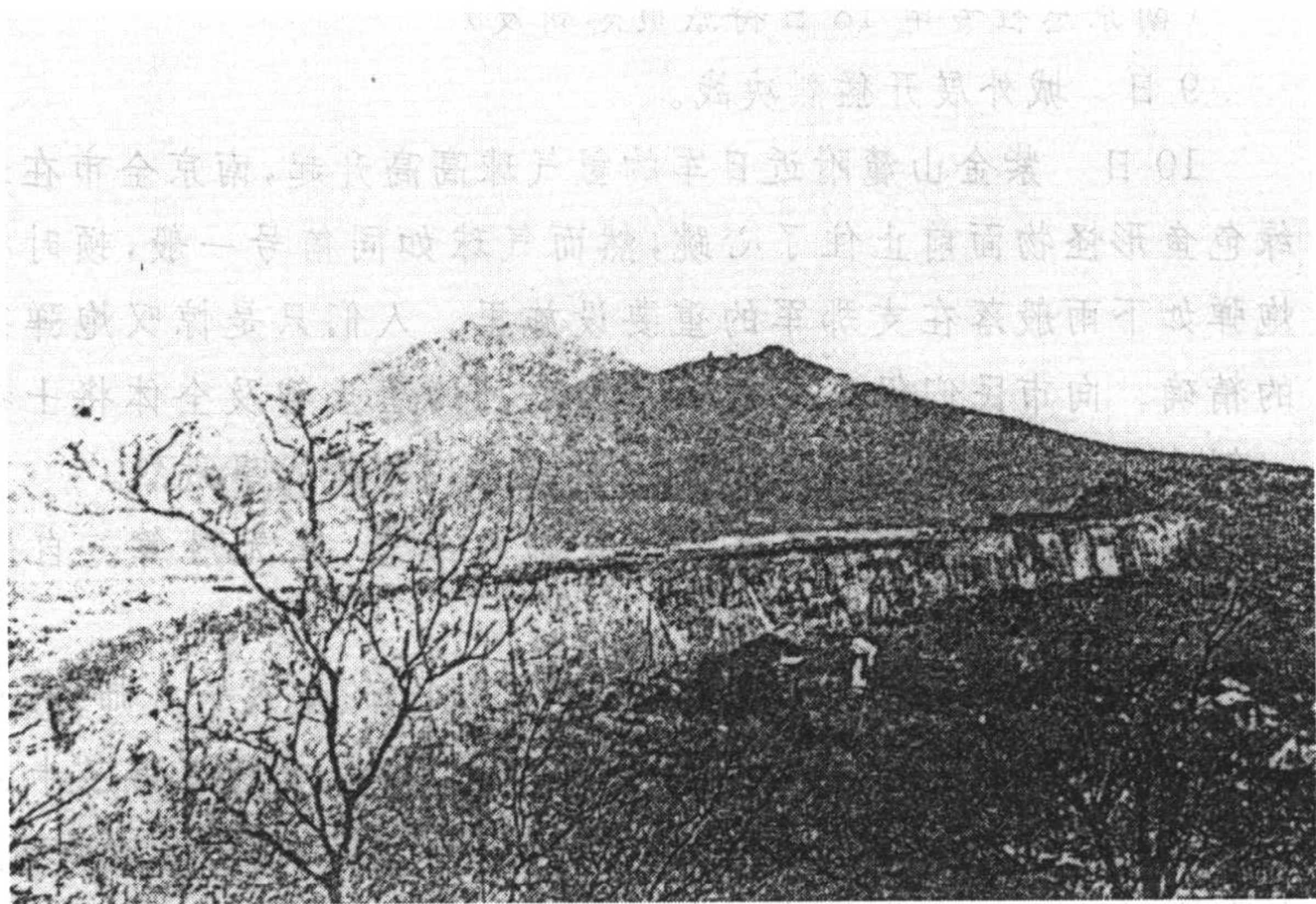
13日 日章旗高高飘扬在城楼之上,上午全城淹没在日章旗之中,枪声相继停止,日军铁蹄轰然入城。

我背对着摆放孙文雕像的那座建筑,沿着花岗岩铺成的参拜道,向中山门奔去。当时我脚上穿的是野战鞋,鞋底下钉了鞋钉,走在参拜道的石头路面上很不方便,但我还是跑了起来。紫金山南麓的中山陵参拜道尽头处,建有一座石造牌坊,那儿有许多徒步前来的士兵。我以中山陵为背景,拍了张纪念照。

跑了几个小时,连看一下手表的时间都没有。来到连接上海—南京的道路上。此时我发现机动部队因为无法通过中山门,道路被堵住了。小型坦克停在路面上,天线上小小的日章旗迎风飘动,就像节日里东京的市内电车一样。

我穿过这些堵在路上的车辆,准备前往中山门,然而中山门这边的城墙已经倒塌了。

走近中山门,发现铁门上用白粉笔写着几个字,字迹清晰可辨:“昭和12年12月13日凌晨3时10分大野部队占领”。



12月13日摄于中山门上。远处为紫金山主峰

中山门内堆积的土袋坍塌之后,形成了一个陡峭的土坡。我走上坡顶,跟在大野部队的军旗后面来到中山门上。

中山门上的士兵们,这会儿围在军旗下正在高呼着万岁。

可以眺望到中山东路的地方,野战炮兵第二十二联队(三国部队)观测组,把炮兵望远镜架在中山门上,监视着中山门前的中山东路。

中山门坍塌的城墙下,云集着大批步兵部队,准备登城门。已经上去的士兵们互相庆祝对方依然健在,其中有些人甚至高兴得拥抱起来。

我从中山门拍了张中山东路的照片,然而城门附近并没有被严重毁坏的建筑物,右侧有一座中式建筑,再远处还有一座,除此之外便没有高层建筑了。

我借三国部队的炮镜向中山东路远处看了一下,发现正前方建筑物的前面,有一群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士兵自左向右行进着。开始我还以为是中国士兵,不过后来注意到他们所穿军服的颜色和日军一样,而且既然他们见我们占领了中山门却不进行攻击,那当然是友军部队了。

我在中山门上拍了一张日本兵的庆功照,然而仅凭孙文雕像和士兵们三呼万岁的模样,似乎并不足以表明我们已经攻陷南京,占领了敌人首都。

从中山门到中山东路,没有发现残兵。下了中山门,我沿着中山东路左侧向前走去,路上遇见了一位以前见过面的《朝日新闻》联络员。他住在上海,比我更了解中国人的生活。我独自一人或许有危险,与他同路就放心了。我们顺着右边民房的屋檐向前走去。不一会儿,他在一间民房前停住了脚步。

“记者先生,我找到好东西了!”

于是我走了过去,刚一靠近,我便闻到了从敞开的门里飘出的阵阵芳醇的香气。走进一看,墙边垒了两层老酒(绍兴酒)的酒坛。我从下边取出一坛酒,打开盖,拿起旁边的酒勺舀了一些酒尝了尝。甜甜的淡黄色的液体,咕噜噜地滑入了喉咙。

我带来的七合^①大小的水壶,都装满了绍兴酒。

^① 日本传统容积单位,1合相当于0.1升。

出了这家酒店,我们又沿着中山东路走了一会儿。这时,原南京分局局长志村先生领着两三个日本兵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

志村先生对我们说:“过一会儿我要去国民政府,咱们一道走吧。”我想,去国民政府或许能拍到一点象征我军已经占领南京的东西。

志村先生在南京待了很长时间,对当地很熟。他领着我和两三个士兵,在拐来拐去的小巷里走了一会儿,面前顿时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广场。那里有根巨大的门柱,上面写着字。千真万确,那几个字就是“国民政府”,这正是证明占领南京的绝佳材料。

于是,我让志村先生拿着我带来的《东京日日新闻》的社旗,让士兵们(比土平部队第九山炮联队第一大队)手举小日章旗,登上大门门楼。然后将照相角度调到恰好能看清“国民政府”四个字样的角度,拍了两张照片。

志村先生从门楼上下来,和我一同走进了国民政府大楼。到处都是些空荡荡的像礼堂一样的房间,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拍的东西。我放弃了摄影的念头,快步向大门的方向走去,来到了广场。广场中央停着一辆摩托车。走近一看牌子,竟是“宝马”牌的。

我不知道车子是哪儿出了问题。凭我那点少得可怜的摩托车知识来判断,应该是因为没有车钥匙,所以引擎才无法启动的。于是我将换挡柄拉到空档,开始推动车子。我盘算着把这辆车推出国民政府,去中山东路,最后把这个战利品据为己有。

然而,志村先生让我把这辆摩托车扔了。他说:“总社的飞机要来上海,准备运走 13 日攻陷南京的新闻纪录片及照片原稿,联络员过一会儿要通宵开着摩托车把那些东西送到上海。你就别再推着这种开不动的摩托车了,耽误时间!”

从中山门向中山东路看去,第二栋建筑就是中国军的军官俱乐部——励志社。据说下午 4 时中山门就恢复交通了,报社前线总部已从五棵松搬到了这里。

我想了一个点子:将准备收作战利品的宝马摩托车暂且推进路边的防空洞里,明后天再来取。结果,过了几天,别的士兵发现了这辆车,骑着它满街乱跑。

沿着中山东路向中山门方向走,马路左边有几栋混凝土建筑,其中一栋挂着社旗。

金泽喜雄君跟随着进攻光华门的胁坂部队,与他同路的高柳记者将他的胶卷带了过来。高柳记者还告诉我一件战场轶事:他沿着城墙从光华门向中山门行走时,路上突然撞见一个残兵,他赶忙大吼一声,那个中国兵好像负了伤,不声不响地逃走了,他这才捡回一条性命。

当天夜里,联络员将大家的胶卷送到上海,其中有神原君的新闻纪录片,有我跟随第十六师团拍摄的作品,有金泽君跟随第九师团拍摄的作品,还有大阪《每日新闻》松尾跟随第六师团拍摄的。

飞行员驾驶着洛克希德运输机,将胶卷送到福冈。从南京到福冈要花15小时40分钟。这些照片将从福冈电传至大阪、名古屋和东京。分第一号和第二号两期,发表在《南京占领写真画报》的正反两面的照片号外上。

进入南京城之后,在各部队工作的记者、摄影师和无线电技师的住宿问题成了棘手问题。当时,上面为我们选了一栋离中山门两公里左右,面朝中山东路的钢筋混凝土建筑。那儿原是励志社,相当于日本的陆军军官友好团体偕行社。由于目前报社相关人员仅有十名,这栋两层大楼应该够住。然而等到要睡觉时,才发现睡在哪儿成了问题,宽敞的房间里只有两把扶椅。

于是大家商量用抓阄来决定睡觉的地方。结果我抽中了台球桌。桌垫看起来软绵绵的,仔细一瞧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浅绿色的毡子下面铺的竟是石头。真是太倒霉了。

没有人对我说起过炸坏中山门城墙的是什么大炮,我也是最近才从《南京战史》上得知的。原来是众所周知的“240毫米榴弹炮”。虽然我知道上海战线上用过240毫米榴弹炮,但报纸从来没有报道过这种重型大炮运到了南京。我本人一直跟着士兵们在第一线附近行动,主要以步兵部队为采访对象,因而对炮兵部队的活动并不很清楚。不过我做梦也没想到那样沉重的240毫米榴弹炮会被运到南京。

以前在上海看过240毫米榴弹炮的射击实况。麻袋一般大小的炮弹将中山门炸开一道缺口时,情形一定很壮观,中国兵恐怕也被吓破

了胆。

我从中山门的缺口处登上城门，自内朝外望去，铁门内侧严严实实地填满了许多土袋。

第八十八师兵营内“裁决”中国兵

一夜过后，到了12月14日早上。

我昨晚住宿在中山门内中国军将校的社交机关——励志社。一天前，还在中山陵附近的山上受冻熬夜，今天又何以来到此地呢？这我不禁感到命运的离奇。

近些天，跟随其他师团的本社同事陆陆续续在这里汇合了。这样一来，没有住宿条件的励志社也就不便再滞留了。很快“南京通”志村寻到了新住处。

由励志社出来，沿中山东路向前走，即来到与中山路和中央路交叉路口的交通指挥台前面，那儿有家中国旅社，这就是我们的新住处。旅社名字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是一间有50个铺位的大旅社。“大阪每日”的松尾曾跟随第十军步兵第六十六联队（宇都宫）一起率先进入中华门。这次他带来厨师随从照料我们的伙食。我幸运地摆脱了炊事员的工作。

在这家旅社前的广场上，我们照了张合影。一共41人，每一张脸都是那样熟悉。其中现在仍然在世的只有四位了。想来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这期间，我经历了日支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后还经历了战后的混乱期。

总之，现在大家都失去了奋斗目标，一味地沉浸在一种完全解脱的感觉中。

这时，有一个联络员跑来告诉我，励志社那边好像出事了。

虽不知出了什么事，但还是带上相机前往，以便弄清真相。

到了目的地，那儿有一扇大门，两侧都有步哨，我先照了一张全景。

进门一看，里面一座兵营式的房子，房子前面是广场。广场上坐着一百来人。他们被反绑着手，像是被俘虏来的伤病员。他们面前已掘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

右边坑前的日本兵举着中国军的步枪,让中国兵跪在坑边,枪口抵住后脑,扣动扳机。枪声响起的同时,中国兵如表演杂技一般,一倾身,向着坑底翻落下去,成为一具尸体。左边坑前的日本兵光着上身,举起上刺刀的枪,叫着“下一个”,将坐着的俘虏拖起来,命令他们走到坑前,然后“呀”地大喝一声,猛地将刺刀扎进中国兵的背部,中国兵即刻跌落坑中。偶尔有个中国人在向坑边走的时候会突然转身全力奔跑,试图逃走。察觉不妙的日本兵便迅速将其击毙。开枪的地方距我不足一米,子弹就擦着我的耳边飞过去。那一瞬间实在是危险至极。

实行枪杀与刺杀的日本兵们脸部都扭曲着,难以想像他们是正常人。他们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了一种疯狂的境界。

在战场上杀敌,是在一种被迫的条件下进行的——不去杀人,就会被人杀,但在杀害手无寸铁、毫无抵抗力的人时,如果不拼命将自己的精神提升到近乎疯狂的状态,恐怕是难以下手的。

事后,我向同伴说及此事,他反问我:“身为摄影师,你为什么没有将那些拍下来呢?”我只得回答说:“如果拍了照片,说不定我也会被杀。”

似乎亲见过此类事件的不只我一人。为了从东京跟随第一〇一师团,我乘军用船从大阪去的上海,同行中有一位记者同仁——《东京朝日》的足立和雄君。

阿罗建一所著的《南京事件见闻》(图书出版社刊)一书中记载有他与足立记者的对话。内容如下:

——都说在南京发生了大屠杀,您所见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不能说完全没有无辜者。攻进南京的第二天,我想应该是14日吧,我见到日本兵枪毙了几十名中国兵。中国兵是并排站在壕沟前被枪决的。地点不太清楚,但不是难民区内。

我所见到的地方与足立记者说的似乎并不是同一处,但同样是14日发生的事。

那么我所目击到的事,又是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从我拍摄的大门照片上可见到“驻军第八十八师司令部”的字样,并且营房门两侧有步哨

所,其中右边的哨所上可见“伊佐部队,棚桥部队”的字样,左边的哨所因在阴影处,可见“棚〇〇,俘虏收容所,缴获品集中所”的字样。

“驻军第八十八师司令部”的白色浮雕字被涂成了黑色。

下面横着雕有“青天白日”字样,也是浮雕。

说起第八十八师,在中国军队中作为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很有名气。

然而,在第八十八师营房大门两侧的步哨所上写的“伊佐部队,棚桥部队”,这是上海战役获得勇战奖章的第九师团步兵第七联队第三大队的通称。

想逃避刺杀的中国人要逃的方向是广阔的广场,从那个方向可以看到建筑物。于是我与联络员一同前往。在那座建筑物前有一架短小结实的单座战斗机,探头看那操纵座,可见里面有仪表盘,表盘上是眼生的俄文。我想起自己曾读到过日本战机在南京空袭时与苏联战机空战的报道。

我试着坐上操纵座,面前有一个似乎是瞄准镜的东西。我朝里看了看,从中可以看到两条十字型的细线。这架望远镜究竟是何时所用的呢?我产生这样的疑问。在望远镜的安装部位可以看到螺丝,我想拆下来看看,于是从口袋中取出硬币来,憋足了劲儿想用硬币把它拧开拆下来,可怎么也不行。看来不用专门工具是取不下来的,我只好作罢。我依稀记得那架苏联飞机的型号是 И-16。

后面的这幢建筑又是什么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开始巡视。走着走着,几根细竹竿横挡在我们面前,似乎要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不在意地刚要把它们挪开,联络员大喊一声阻止了我。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看,只见有手榴弹悬挂在那里。

这种手榴弹是德国制的,木柄上装有弹体,是上海战线上很常见的那种。使用时握住手柄瞄准敌阵地投出去。在手柄的底部有一个金属帽,拧开金属帽,里面有一只金属环,上面系着一条线绳。这里面有一个小装置,拉开金属环几秒后,弹体就会爆炸。

我看了看那些横放着的细竹竿,那几枚手榴弹的金属帽已被拧掉,金属环不正悬挂在那儿吗?如果我一不小心碰到了竹竿,没准就立刻完

蛋了。或许中国兵从南京撤退时设下这个机关留作纪念吧！

因为在进入第八十八师的营房门后，穿过庭院才发现一架苏联制战斗机的，所以我想，这儿莫非是城内的故宫飞机场？

在《第九师团作战经过概要》的报告中，缴获品一览表上写着：“飞机四架”。我所见的这架苏联制战机，或许就是这四架中的一架。

这天过后，很多同伴都离开了南京。有些人要跟随抢滩登陆部队去バイアス湾^①，有些人要回到内地去出席南京攻击战军事报告会。

由于击沉“帕奈”号事件余波未平，对美英还有顾虑，バイアス湾作战计划被取消了，因此全体人员都回到了内地。

各地都盛行召开以家乡为中心举行的乡土部队军人报告会。其中有的人留着乱蓬蓬的胡子，穿着军服讲述前线的生活，让听众惊奇不已，从而为报业促销大大地出了力。

第十六师团的入城仪式

12月15日，也就是占领中山门的两天以后。南京城内好像还有残兵。我走在难民区边上的中山北路上时，有一个身穿牧师衣服模样的中国人从难民区走出来。或许是因为我穿的不是军服的缘故吧，他边用英语和我打招呼边走过来。他说，这里是红十字会难民区，希望日本兵不要进入。

在难民区周围，生命力极强的中国人已经摆起了露天摊子。他们左臂上戴着日章旗袖章，图案就像在白底上画着梅干。他们显出一种对记者拍照毫不关心的样子。有人在卖自家田里种的蔬菜，有人卖旧衣服，还有人在卖带汤的水饺。他们向路过的日本兵打招呼：“当兵的，不吃些饺子吗？吃了可得付钱哦！”于是这位士兵不在乎地把步枪在肩上正了正，接过中国女人递过来的大碗。我便拍下了他拿着筷子开始吃水饺的情景。

这一带，孩子们脸上看不出害怕日本兵的神情。下午2时举行第十

① 原文意思不明，疑为广东的大亚湾。

六师团的入城仪式,所以,我等候在中山门附近。

入城仪式如期举行了,却有牙缝里被东西塞住的奇怪感觉。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各大报纸在12月16日当天的报纸上均使用了诸如下列大标题的报道:

《世界战争史上灿烂一页》

《皇军明日南京入城仪式》

《前线部队昨日已入城》

看了这样的报道,读者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所谓前线部队究竟是哪支部队呢?其实就是第十六师团。虽然使用了缺字符号〇〇,但“大每”、“东日”等报还是刊登了完整的报道。标题不大,但写着“第一线功勋部队,昨日先驱入城仪式”。作者就是跟随第十六师团从北支那转战至中支那,直到占领南京为止的随军记者,“大阪每日”京都分局的记者光本。

(本社特派员光本于15日发自南京)

由松井最高指挥官主持^①、于15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山门举行的隆重的入城仪式上,走在队伍前列的将是率先攻破紫金山、中山陵等南京正面主要阵地的第一线〇〇(中岛)部队。在辉煌的入城仪式中,〇〇(中岛)部队将站在所有部队的最前面。入城当日,晴空万里,是个极好的入城日子。几天前还是战火纷飞的紫金山,现在似乎正在酣睡似地浮现在半空中。中山门东面,入城部队正在陆续集合,下午2时,以〇〇(中岛)长官为领头的列队已经在城外丘陵上列队完毕。另一方面,在城外,自中山陵开始,最先冲入敌阵,并作为入城仪式队列部队的大野部队也一字排开。

下午2时30分,入城仪式开始了。先驱的骑兵进入了被我军炮弹炸毁的中山门,铁蹄轰然作响。走在前面的是井上卫队长,他那傲人的胡子在今日也愈发显得威风凛凛。马背上英姿飒爽的〇〇(中岛)长官古铜色脸上的皱纹也好像更深了一层。看来登陆后

^① 原文如此。第十六师团于12月15日举行的入城仪式,松井并未参加。

的二十几天里,在南京城外领军作战的长官是辛苦了。跟在后面的是负责攻击中山门及中山陵的〇〇(草场)长官,从北部城外大迂回至紫金山北部,并果敢进行大歼灭战的〇〇(佐佐木)长官,再下来是片桐、助川、野田的各先头部队长官,还有笠井、森、今中、柄泽和松田长官,最后是作为行进列队压阵的大野部队、青木部队,举着飘扬的日章旗,迈着威武的步伐进入了中山门。

下午3时,入城行进队伍已经进入国民政府,这里,在〇〇(中岛)长官三声“万岁”的高呼下,在曾经是蒋介石处理政务的房间里,大家一同举杯庆祝,辉煌的入城仪式结束了。

如同光本记者写的那样,第十六师团的入城仪式,在中岛师团长的带领下,步伐威风地举行了。此时我在中山东路北侧的高处,将中岛师团长的先头部队入城仪式场面拍摄了下来。当然那胶卷也交给了联络员并送到了上海。

大阪每日新闻总社将我们特派员拍的胶卷全部予以保存。然后在审阅后的胶卷盖上“验讫许可”或“不许可”的印章,再封上密封膜整理保存。战后,要是查找第十六师团入城仪式的照片,就会看到中岛师团长的照片上盖着“不许可”的印章。也就是说,这张照片不能刊登在报纸上。

12月5日的《饭沼日记》记载有“禁止各师团单独入城”这样的警告。尽管如此,各部队却敢于打破这一限制,这其中也一定有其理由吧。

12月14日

一、关于入城仪式一事

我一直不愿从中山门入城。

与争名夺利之小人一同行动,实为本人之耻辱也。

据报12月9日、10日,步兵第三十五联队(第九师团)之一大队已占领紫金山。

该联队随即进入我作战地界,并于10日及11日在中山门一带开辟了突击路线,企图率先从中山门方向攻入南京。

我师团从正面翻过与紫金山平行的山梁即可向谷地进攻。如向谷地一带进攻,则必从高地向下冲。然第九师团正面为平原地带,并非敌军重点防御区域,故而得以迅速接近光华门。其意图欲破坏城门进入城内。然未能入城,战况亦毫无进展。加之有护城河阻拦,难以攻入城内,故其闯入其他师团所辖战区。此举甚是不义。

13日晨,我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一个中队凌晨3时30分攻入城内,第三十五联队(第九师团富士井部队)的件之大队随后进入城内。第二十联队(大野部队)极为愤慨。

13日夜,驻于汤山镇之军司令部遭附近残兵进攻,第九师团明知该处为第十六师团作战区域,竟迅速派遣步兵一个联队进行护卫。敌方仅为残兵败卒而已,无须派出一个步兵联队。如此阿谀奉承之行径,我实难坐视不理。我不屑与此种小人为伍同入南京,故任由彼等进入南京,我部则转入下关方面。

然幕僚间多有异议,或认为师团长应以师团官兵名誉为重,委曲求全,自中山门光明正大进入城内。此说亦无不妥,故而决定从中山门入城。

12月15日 晴暖 中央饭店

虽然已有部分扫荡队伍入城,本日重新以入城仪式入城,以庆祝占领南京并告一段落。

各队在不妨碍执行善后处理任务之范围内,派出代表队参加仪式。在师团指挥部各部队长陪同下,于下午1时30分自中山门入城。

国民政府办公大楼暂时充当师团指挥部。一行进入该楼,升国旗,与会各部队长官及将领三呼大元帅陛下万岁。今日特许饮酒,众人举杯共庆喜事。

其后,下午4时许,走进师团指挥部临时宿舍——中央饭店休息。(下略)

(《中岛日记》)

看过中岛中将的日记,可以了解到15日那天入城仪式的详情。但是关于超越战斗辖区的事,关系到师团长面子,对于我这样的百姓来说,自然是似懂非懂,并没有什么好解释的。

最初,对于第十六师团的入城仪式,中岛中将显得并不积极,他是在同意幕僚的建议之下才决定举行入城仪式的。为什么中岛中将入城仪式的照片经陆军省审阅后就不许发表呢?在青山学院女子短期大学的教授木村久迩典所著的《在反抗权势的骨气中生存的帝国陆军另类个性派将军——中岛今朝吾》(光人社)一书中,能够找到让作者认同的语言。虽说是偶然,但作者跟随第十六师团自中山门入城之时,就有一种命中注定的感觉。

我与中岛中将

话要说到前一年即昭和11年发生的二·二六事件,中岛今朝吾中将在事件后补任宪兵司令官。

昭和12年1月20日,广田内阁集体辞职,冈田内阁上台。当天夜里,赋闲在家乡伊豆长冈的陆军大将宇垣一成接到命令,火速拜见天皇。

大将乘坐东海道线列车前往。夜深时,列车在横滨站停下。大将下车去站长办公室,在那里换上从东京家里送来的朝拜服。

当时,我作为《东京日日新闻》摄影组成员,和两个同事开着两辆车在横滨车站等待采访大将。我们打开灯光,先拍下了宇垣大将下车时的情景。走到横滨车站的出站地下道时,这里已守候着许多新闻纪录片摄影师,一时间显得拥挤不堪,只听见一声声“别挤!别挤!”的吆喝。

宇垣大将上了早已等候他的车子。车开上了东海道线,也就是现在的国道一号线。由于是在深夜,因此路上几乎看不见其他车辆,各个报社的车都以宇垣大将所乘的车为中心前后围成一圈向前飞驰。

为了拍到坐在车内的大将,我们把车开到与大将车子并排的位置。我把照相机从车里伸出去,选好角度调好闪光灯后按下了快门。

拍完照,我便让位给其他报社。司机车技高超,他驾着汽车在别的车子中间左穿右插,从六乡大桥上越过多摩河。

刚过大森警察署没多远,突然,一个头戴防寒呢帽,身穿两层和服外套的人强行拦下了大将的车,并且飞快地上了车。事后我才知道,这人就是宪兵司令官中岛今朝吾中将。

据木村教授说,中岛中将是为了帮寺内陆军大臣传话才强行拦下大将的车的。听说要传的话就是:“由于主要幕僚的反对,请放弃组阁。”中岛中将在泉岳寺附近下车,宇垣大将的车接着驶向皇宫,从板下门拜见了天皇。

此后,尽管宇垣大将多方努力进行组阁,却没有实质性进展。这期间松井石根大将作为组阁参谋,在宇垣内阁本部处理事务。

宇垣大将着手组阁后的三四天,晚上九十点钟的样子,松井大将在家中接到了中岛司令官直接打来的电话。

“阁下好像在协助宇垣组阁吧,宇垣阁下现在出面组阁,已经遭到军方反对。可能会有不祥之事发生。我正在劝说宇垣阁下,您应该大义灭亲啊!请三思!”中岛中将对电话大叫一番,便将电话挂了。

为这件事,外面对松井大将与中岛中岛的矛盾多有传言。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机会拜访中岛师团长了,但我总认为昭和12年1月24日深夜发生在东海道国道一号线上的事,同12月15日第十六师团的人城仪式一定有某种潜在联系。

中国女人在哭泣

12月16日是个晴天。为了实地拍摄一些南京居民生活情况的照片,我乘报社的汽车在市内转了几圈。然后又到南京城外东北方向的玄武湖拍了几张风景照。回来的途中,在经过难民区附近时,发现一群人围在一起,吵吵嚷嚷的,接着又有中国女人向我们的车子冲过来。车刚停下,她们便从副驾驶的窗户里探进身子,嘴里好像在恳求着什么。我不懂汉语,所以也不明白她们在说些什么,不过从她们的语气可以判断她们是在请求帮助。

车子避开成群的妇女,开上中山路。我们发现许多排着队的中国人。据说他们是被押送的中国俘虏,他们穿着和普通市民一样的衣服混

进了难民区。问了宪兵,说是大约有五六千人。于是我在所摄照片的说明上加进了这一数字。

步兵第七联队(金泽、伊佐部队)第二中队的井家又一先生于昭和8年入伍,他的日记发表在《南京战史》上,他对当时情况作了详细描述:

12月16日

上午10时出动,开始扫荡残余敌军,并缴获高射炮一门。下午部队再次出动,共抓获年轻敌兵335人。难民中看起来像俘虏的家伙全给抓来了。不过他们中不少人有家眷,带走他们时,家属们就抱住士兵们的手脚,不停地哭泣,我们很是为难。记者为报道此事下了汽车……结果被支那人重重包围,最后连记者也落荒而逃。

这篇日记如实记载了从难民区驱赶中国俘虏的情景。其他士兵的日记也记载了“裁决”中国便衣兵的情况。我没有去过现场,所以并没有资格评论。我很有把握写的只是我亲眼所见的在第八十八师兵营内广场上“裁决”中国俘虏的情景。

12月15日晚上8时30分发出的步兵第七联队作战命令第11号文件中写道:

一、至今日为止抓获的中国兵多为下等上兵,尚未发现有高级官员。军官可能身着便装,藏身于难民区之内。

二、联队将于明日在难民区中全力搜捕和歼灭中国兵,宪兵队亦将参加此次行动。

步兵第七联队的战斗详报中记载:“从12月13日到20日期间,6670名中国残兵被刺杀或枪杀。其中大部分是在16日被处决的。”这些和前面提到的步兵第七联队的作战命令相吻合。

步兵第七联队长伊佐大佐也在日记写道:“14日、15日、16日三天时间对6500名中国军队俘虏进行严厉处置。”

步兵第七联队参战者与《南京战史》的编委们再次讨论时,强调他们只是迫于当时形势,忠实地执行了扫荡命令而已。

然而,最近(昭和 63 年底)他们在回答同一师团的土屋正治先生的问题时说:“现在想起来,真为联队长对当时情况的错误判断深感悔恨。”

(《南京战史》第 331 页)

南京入城仪式

12 月 17 日 晴

今天是期待已久的南京入城仪式的日子。对于日本军来说,这还是首次攻破并且占领敌人首都。

12 月 17 日 晴朗

入城仪式于下午 1 时 30 分开始。风和日丽,仪式圆满结束。先检阅部队代表队列,再于国民政府举行遥拜天皇仪式,高呼三声万岁之后,众人同饮御赐美酒。海军司令长官一声令下,全体三呼万岁。下午 3 时 30 分左右返回。首日平安无事,心中甚喜。

(《饭沼日记》)

像我这样到上海后才开始随军采访的报社记者,能有幸报道进入敌人首都的入城仪式这一新闻,实在是令人意外的荣耀。正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落后于其他报社。可是具体该怎么做呢?我和同事金泽君商量了一下,终于想出一个办法。

首先必须把中山门拍进照片,其次要以中山门为背景,拍摄松井大将为首的将军们。因此必须在中山门附近找一个较高的地点来拍摄照片。

前一天,也就是 16 日,我去中山门附近预先看了一下,却没有找到我能攀登的高层建筑。即使有高的地方,由于将军们在仪式中要抬起右手回应士兵们的敬礼,拍摄地点不好的话,将军们的脸就会被手挡住。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必须选择中山门右侧位置。可是右侧却连一点高处都没有。这可真是个难题。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中山东路右侧,也就是面向中山门马路右边的位置,有一排很高的电线杆,不过没有能踏脚的东西。显然,只要弄到梯子就行了。可是如果我们在大白天搬个梯子在中山门旁跑来跑去,一定会被其他报社的人察觉的,所以这件事必须傍晚时分才能进行。

一名联络员加上两名中国随从,每组一共三人,分头去找高五米左右的梯子。找到梯子后,到中山门附近集合。

办法虽已想好,却不知能找到几架梯子。下午4时左右,我在中山门附近焦急地等待着。这时,两个中国人分别抬着梯子的两端走了过来,怎么看都像电线修理工。

根据摄影距离,我们选择了四根电线杆。所谓摄影距离也就是在第一根电线杆上拍好照片后,能迅速赶往第二根电线杆上继续拍照的距离。接着再定下第三、第四根电线杆。确定好四根电线杆后,我们便把梯子横放在电线杆下面。

这天夜里,我召集看管梯子的联络员,决定了入城仪式那天的行动步骤。在下午入城仪式开始前10分钟,也就是1时20分时,我们把梯子竖着靠在电线杆上,并且在梯子上挂上我们报社的袖章,绝对不让其他报社摄影师使用。

入城仪式终于开始了。走在前面的是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右后方是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左后方是第十军司令官司柳川,从列队站在中山东路两侧的代表部队方向传来“向右看齐”、“向左看齐”的号令。在号手们吹奏三遍《将领军号》(《走向大海》)的旋律中,场面宏大的阅兵式开始了。

松井大将一行直接从国民政府大门进去了,几乎与此同时,海军方面的支那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官大川内、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及其以下的幕僚等也从扬子江岸的挹江门进入了南京城。他们在检阅完从中央广场列队至国民政府的陆战队之后,走进国民政府内与陆军将领们欢聚一堂。

过了一会儿,在《君之代》的号声中,国民政府正门上方,一面巨大的日章旗冉冉升起。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大的一面旗子,竟然连折痕都找不到。同时在场的木村伊兵卫对我说道:“阿振,我给你拍一

张吧。”于是我便站在国民政府门前，让他以大日章旗为背景，为我拍下了一张照片。

这面日章旗由棉布做成，长33尺1寸，宽22尺6寸，正中的太阳直径为14尺2寸。昭和12年12月18日出版的报纸上，各报社都用特大号标题，以华丽的词语描写了入城仪式的盛况。

列举标题如下：

《光耀青史 南京入城仪式》

《功勋部队 肃然排列》

《松井大将 堂堂阅兵》

《展开于空、陆的壮丽画卷》

《英姿飒爽 朝香宫殿下》

《功勋海军亦列席参加》

这种电线杆加梯子的作战方案成功了。虽然也有新闻纪录片的记者



木村一兵卫在国民政府前为笔者拍摄的照片

者采用了这一战术，但是在报社方面还是被我们垄断了。然而后来再看到当时的胶卷，我不由得叹息道：“还是不行啊。”因为在第二、第三根电线杆上拍的照片中，有些照片把靠在别的电线杆上的梯子也给拍了进去。当时如果把用完的梯子卸下横放在电线杆下就好了。每个梯子边都有总社的联络员，如果事先合计一下就没事了。虽然想了个好主意，但在这点上却是千虑一失。直到现在，每次看到这几张照片，我都会直冒冷汗。

在这场壮丽的人城仪式

上,军方对我们新闻工作者下了一道非常严格的命令:有一个人的脸绝对不许照出来。那个人就是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因此报纸在报道时,一般都写成某某长官,有时写成蒙面将军。

在国民政府院内举行入城仪式时,中间摆放着一个铺着白布的不太高的台子。松井大将、朝香宫殿下、柳川中将与长谷川海军司令官都站在上面。由于仪式以这几位为中心,可以说遮去柳川中将军的脸是不可能的。因此大家决定让我从国民政府的门上,让金泽君从门内来拍摄仪式全景。从《东京朝日新闻》上可以看到,只有柳川中将军的脸朝别的方向,看不见脸。其他将领的脸部虽然有的没有正对镜头,但还是可以辨认的。

当时采访团除了团长外务省情报部小川升一书记官、情报部的后藤光太郎、老熟人木村伊兵卫外,还有渡边义雄和两名纪录片摄影师,他们都是到南京来采访入城仪式的。

搜集信息似乎比较困难。因此我向木村通报了当地宣抚工作的情况后,决定同他一道进行采访。

昭和13年3月,在银座的三越开办了一场“南京—上海新闻照片展”。它跟普通新闻照片不一样,摄影效果非常好。有很多人去看了这场展览,我也去看了。根据当时的印象,我还在《一亿人的昭和史——禁止发行照片集》中写进了一篇名为《禁止发行的照片》的短文。

占领南京时,最奇怪的禁令莫过于要在报纸上把某司令官的名字换成圆圈,甚至要求把照片上这位司令官的脸涂黑使别人认不出来。这名○○中将就是杭州湾登陆部队司令官柳川平助中将。后来在国内开办的占领南京照片展上,许多照片都宣扬了皇军的武威,比如在飘扬着日章旗的国民政府大门上高呼万岁的照片。然而,以松井大将为首的军官们在国民政府广场的台子上高呼万岁的照片却出了问题。照片为1×2米左右的巨幅照,可以清楚地认出每个人。松井大将在中间,左边是朝香宫,右边人的脸竟成了无面怪样。我虽然看过不少照片展,但像这样把脸涂成灰色的照片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名字被写成蒙面司令官,照片估计也被蒙面了

吧。想故弄玄虚这也未免太拙劣了。

在攻陷南京的当天,即12月13日,我从中山门进入城内,遇见了中川纪元画伯、中村芽衣子的父亲——幽默作家中村正常先生,以及曾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一道待过的大宅壮一先生。入城仪式那天,诗人西条八十先生也到场了。

西条先生在文艺春秋社发行的杂志《话》上,发表了一首歌颂入城仪式的诗。

歌声话语俱无息,
斗大金字石墙壁。
国民政府城楼上,
飒飒飘扬日章旗。

上面的内容节选自报告文学《光辉的南京入城仪式》中的一首诗。

《皇军大捷之歌》

12月18日发行的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了南京入城仪式。据说朝日新闻社兴奋之余,于第二天即12月19日决定,要为庆祝攻陷南京征集颂歌,歌名为《皇军大捷之歌》。

朝日新闻社开始征集《皇军大捷之歌》后,到截止日那天,十天内共收到应征作品35991首。评委们从中选出了一首当选作品和五首佳作。当选作品的作者是住在大阪的福田米三郎先生。他得到了1500元奖金和一枚纪念奖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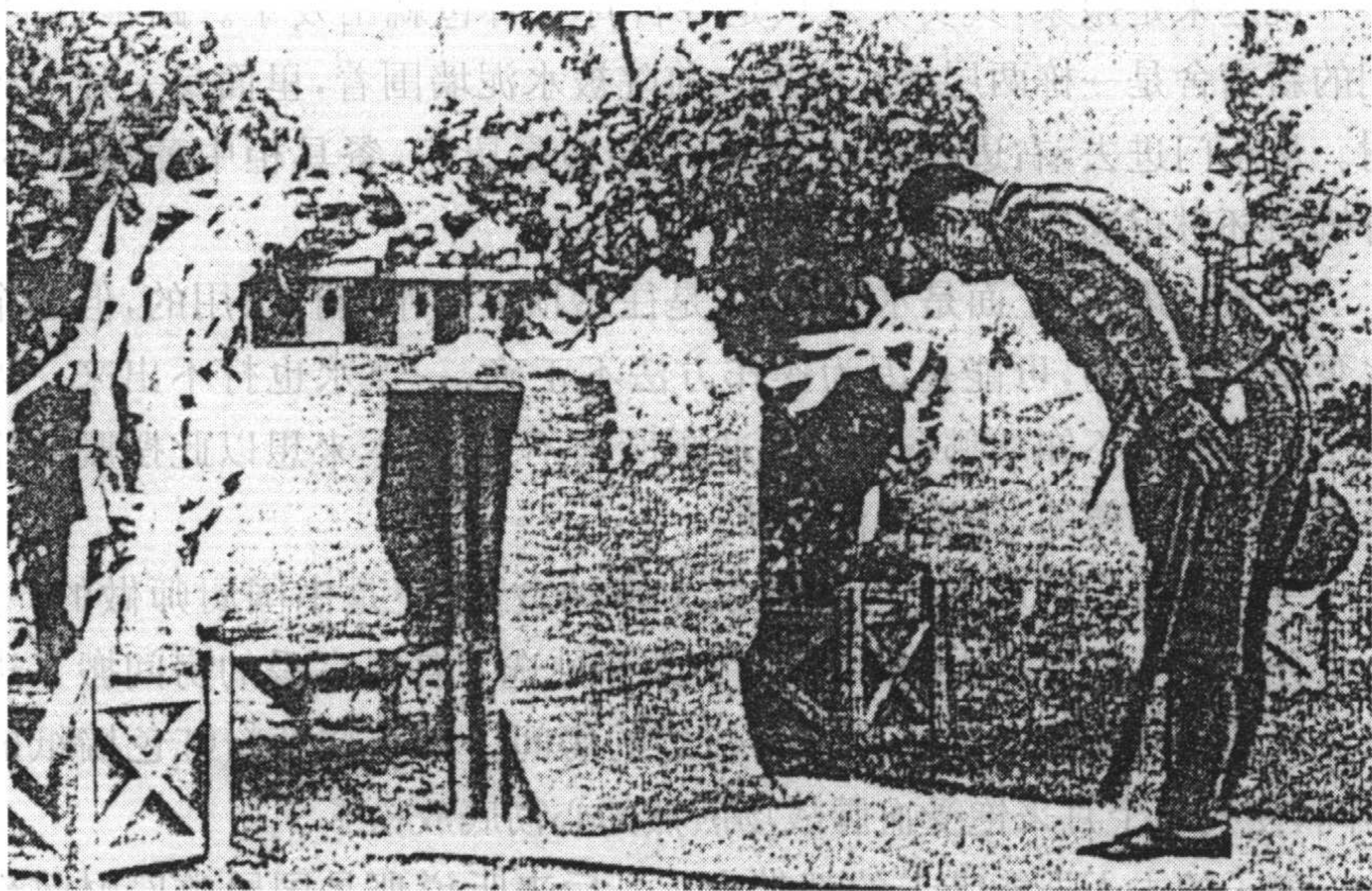
首都南京终攻陷,
灼枪热炮手中卸。
队长莞尔露笑意,
登上城墙一豪杰。

皇威煜煜旭日彩，
皇军大捷万万岁！

凄凉的慰灵仪式

入城仪式的第二天，也就是 18 日，陆海两军共同举行了慰灵仪式。地点选在城内故宫飞机场。用白布围着的祭坛中间插着灵牌，上面用黑墨汁写着：“中支那方面陆海军阵亡病歿将士之灵位。”还摆着从上海运来的供品。

各支部队代表列队站好后，天空开始飘起了雪花。仪式会场周围摆放着方型木制花盆，里面种着杨桐树，挂在树枝上的纯白纸条在西北风中哗啦啦地飘荡着。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在阵亡者慰灵式上

四周静寂下来，鸦雀无声。

“准备开拍！”这大概是 NHK 录音组的录音信号。可突然传来的声音与环境很不协调。

到了预定开始时间：2 时。陆军代表松井大将和海军代表支那方面

舰队司令官长谷川中将在军号声中出现,并在祭坛附近就座。在他们不远处坐着朝香宫中将、柳川中将和大川内陆战队司令官,接着在后面的各部队列席代表约五百人。

寒风彻骨。慰灵仪式按神道式进行着。松井、长谷川两位指挥官用庄严的声音读完祭文,然后献上玉串^①。号手吹奏《镇国之神》,后面列席的官兵同时行举枪礼致敬,以慰烈士在天之灵。慰灵仪式虽然已经结束,我却怀念起《东京朝日》记者滨野嘉夫君来。他在东京时同我在摄影采访方面展开竞争,是我的一个好对手,却不幸在雨花台采访时牺牲了。

仪式一结束,有关攻占南京方面的一系列报道也随之告一段落。记者和摄影师同事们都陆续回上海了,宿舍里显得空荡荡的。因此我们想挑一个小巧舒适的宿舍搬进去。

说起来是搬家,其实大家只是各自背上背包就出发了。路很近,我们的新宿舍是一栋两层楼小洋房。前院被水泥墙围着,里面是一片白杨树。从正门进去,右边是宽敞的客厅,左边是厨房,餐具柜中葡萄酒杯、香槟酒杯琳琅满目。

从大门进去,正面是水井水泵,是往屋顶上的水箱打水用的,但这个水泵是手动式的,可能是因为操作方法不正确,一点水也打不出来。因为用中国随从不知从哪取来的水冲厕所很不方便,本来想以此摆脱使用西式厕所的不便的,结果却没成功。

一日三餐都用从上海带过来的丰富的食品,还是中国厨师做的,令人十分满意。二楼有六间卧室,每个人都挑选了各自喜爱的房间搬了进去。我选了好像是十七八岁少女住过的房间。四壁贴满粉红色墙纸的房间,使我三个月来饱受血腥战场煎熬的心彻底放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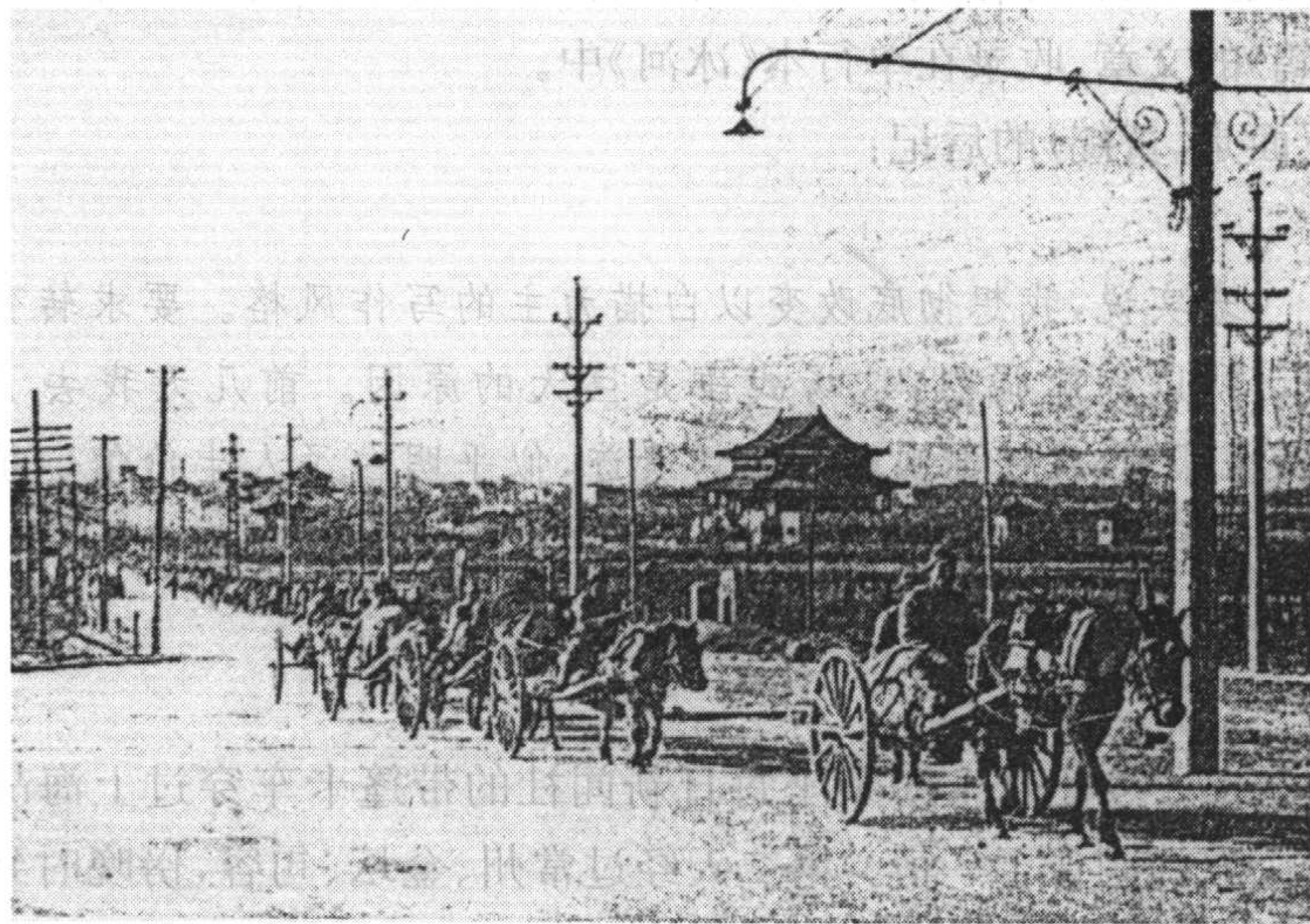
房子的主人把能带走的都带走了。后来听说那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徐汉先生的宅邸。可以看出,他从南京逃跑经过了长期准备。不过有一件华丽的中式服装却被丢下了,可能是忘记带走了吧。那是件墨绿色天鹅绒上印着玫瑰花图案的衣服。

① 日本风俗,玉串是一端缠着布条或纸条的杨桐树枝,在拜神时献神之用。



入城式结束后,宣抚班在难民区派发糕点和香烟,许多市民聚集了过来

沿中山北路往北走就是被称为“安全区”的地方。在那里,中国难民们开始了他们日常生活。左臂上戴着日章旗袖章的男女老少,一点也不惧怕日本兵,闹哄哄地兜售着物品。他们浑身都洋溢着活力,让我佩服不已。



第十六师团入城式后,师团辎重兵联队柄泽部队
经过被清扫过的中山东路向城外移动

攻陷南京城之后,过了些日子,军队动向也开始发生变化。可能他们已经顺利修好了被中国军队破坏的桥梁道路等设施,日本军的卡车不断开进城里。我偶尔会给他们拍些照。然而战后才知道当时是不允许拍照的,因为可能会把中国兵的尸体拍进照片。

12月20日,也许攻陷南京已过了一个多星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中将视察了光华门战场。因为捷足先登南京城而声名大振的胁坂部队就隶属于朝香宫中将。我拍下了中将在坍塌城门前询问战况的场面。官兵们在回答朝香宫中将提出的问题时,都显得十分紧张。

这个时候,从上海来了几位久负盛名的作家,一行中的林芙美子女士堪称万绿丛中一点红。林芙美子女士平易近人,身姿妖艳,让一个多月没见过日本女人的我们感觉她美得耀眼。

林芙美子女士虽住在高级洋房里,但水的问题好像让她很不方便。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据说有位记者在院子的白杨树上贴了张稿纸,上面写着:“林芙美子女士排便处。”眼尖的林芙美子女士看到后,笑着说道:“讨厌,会被报社人笑话的。”说完把纸撕碎扔掉了。

林芙美子女士由南京回国后,根据自己跟随军队的印象写了一篇名为《黄鹤》的文章,收录在单行本《冰河》中。

下面是《黄鹤》的后记:

老实说,我想彻底改变以白描为主的写作风格。要求转变的愿望之所以如此强烈,这场战争是巨大的原因。前几天我去了趟南京,在那里,我仔细观察了战场遗迹,似乎明白了人生价值。虽然有段时间我陷入了沉思,但我终于决定写下了卷头这篇名为《黄鹤》的作品。

林芙美子女士从上海乘坐每日新闻社的带篷卡车穿过上海战役的旧战场。在江阴住了一宿。第二天经过常州、金坛、句容,傍晚时到达南京,住进了我们宿舍楼。

昭和 13 年 1 月的上海

她在文中又称,南京在她心目中“原以为是一座极为乏味的城市,可一看到南京那如同新垦土地般宽阔的街道,不禁大为惊叹(心想这真是南京么?)。”

来访者中还有一位是小型坦克队队长藤田实彦少佐。所谓“小型坦克”就是两座位的“九四式”轻型装甲车,一个是驾驶员,一个是机关枪射手。这种坦克在进攻南京中华门时,快速逼近目标,极好地配合了步兵行动。

大阪每日报社的松尾摄影师曾跟随藤田部队拍摄过进攻中华门的照片。因为这个原因少佐经常来大阪每日报社南京分局。我曾经偶然得到了一件中国将校的冬大衣。刚穿到身上,藤田少佐便向我要道:“佐藤,能不能把那个给我啊。”那时已经是 12 月下旬,天气很冷,南京也开始降霜了,而藤田少佐还穿着夏装。少佐穿上我送给他的中国军大衣后,把原来的中国少将肩章撕掉,换上自己的肩章。

进入南京已经二十多天了,日子依然很平静。我听说在下关处理了战俘,便急忙赶往现场观看,却没有发现相应的痕迹。

起重机将过年用的四桶酒从货舱吊上岸,再由中国战俘将桶搬走。这时,一个战俘一不留神,将酒桶滑倒在地上,日本兵看见了,使用枪托揍他。亲眼目睹着这一幕,心想,再不对,也不至于那样做吧。

慰灵仪式结束后,没有什么正式的节日活动了。于是我坐车到市里去采访。现在,难民区和市区南部轰炸和炮击的痕迹很少了。北部的海军部和交通部附近的街道上,尽是一些散乱的物品,似乎是中国兵往城外逃跑时毁坏民房的结果。

市区街道上不时有小的火灾发生,其原因还不太清楚,市内警备状况还不稳定。不过,我算是彻底明白了输掉战争意味着什么。

攻陷南京过了没几天就临近年底了,城内渐渐恢复了日常生活秩序。12 月 23 日,藤田车队要捣年糕,我们便应邀坐上了接我们的车子。因为小型坦克队具备运送燃料的卡车,所以大米等物资很丰富。我以轻

型装甲车为背景,拍了张他们捣年糕的照片,画面效果不错。以此作为迎春写照。

战场上见到的野生动物

说起战场上的动物,并不仅仅是指军马、军犬和军鸽之类。在炮声隆隆子弹乱飞的战场上,一眼看去,是见不到野生动物的。

有这么一个成语:丧家之犬。这个成语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失去主人的狗忍饥挨饿的样子。我们为了避开敌人的流弹,躲进了留在战场上的民房里。虽然说不至于连狗都憎恨日本人,但有两三条狗围过来,摆出一副马上要咬我们的架势。那些狗的嘴边都沾有血迹,这表明它们已经开始吃此类食物了。

不单是狗,无人居住的房屋里也会突然蹿出一只猫。它以猫科动物特有的捕猎步伐悄无声息地行走着。虽然没有袭击人类,但猫的眼睛里却射出令人恐怖的寒光,更令人恐怖的是猫嘴边的血迹。

在战场上我只见过一次野鸟。地点是在离吴淞河两公里的杨行镇附近。可能是因为那里离前线激战区域很远的缘故,偶尔听到流弹发出的像小鸟鸣叫一般的声音,有时还能听到迫击炮弹偏离目标后发出的爆炸声,周围出奇的安静。

树枝上有一只比日本乌鸦稍小一点的鸟,在轻快地跳来跳去。它和全身漆黑的乌鸦不同,从胸部到腹部都是白色的。问了旁边的士兵,回答说有可能是喜鹊一类的鸟。喜鹊属于鸦科,分布于日本佐贺、长崎两县,据说是自然保护野生禽类。那只鸟一声不响地向树林里的民宅方向飞去。

那时南京战役已经结束,我们去了杭州。占领杭州可以说是兵不血刃,这点和经过激战才占领的上海、南京等城市是截然不同的。从上海经过松江、嘉兴和南浔镇,我们坐着双排座卡车,卡车奔驰在收割后的庄稼地上。

第一〇一师团也将主力调往上海了。附近连日本兵的影子也见不到。天气很好,冬季祥和的景色让我忘却了战场。

我坐在卡车副驾驶的位置上,一只大野鸟吸引了我的目光。它站在庄稼地里,距我们 300 米。正巧我身边带了防身用的步枪,于是我停下车子,举枪对准那只鸟,然后按照军事训练时学的要领,扣动了扳机,结果却打空了。鸟一动没动。后来想想,那只鸟也许是秃鹫的一种吧。

从上海到南京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没有听到过一次麻雀的叫声。

再见,南京

上海方面下来指令,命我们离开南京。12月24日,从上海开来一辆带篷卡车。藤田坦克部队正好也有卡车去上海买年货,我们的车便跟在他们后边出发了。

同行的分局职员和联络员们觉得我从上海开战以来,长期随军东奔西走,一定很辛苦,所以好心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我却因此承担了让司机保持头脑清醒的任务。另外,因路况不好,还得提防车前轮陷进坑里。

下午3时出发。车通过灰黑色的中山门时,离日落还早。阴暗的云层下,紫金山起伏的山峦连绵不绝。掩映在江南竹林中的中山陵呈一片灰色,模糊难辨。不过我却想起了12月13日自己从东凹子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出发,不顾一切攀登陡坡的情景。那天我从东凹子出来前去迎接大宅壮一先生时,报社的前线总部还设在五棵松。

冬天日头很短。车前灯虽然开着,却已分辨不出哪边是五棵松了。积水在路面上的坑洼里闪着光。“右边有坑。”我向司机提醒道。

联络员可能就是骑摩托车沿着这条路从南京去上海的。车一开上这种破路,我便明白了联络员的辛劳。来时我们是从丹阳过来的,在不到句容的地方向右拐的,所以就算别人告诉我这儿就是句容,我也没什么印象。和上海战线不同,这儿经常能看见小山丘,不过路上看不见一丝灯光。

前方出现一座城墙,那是丹阳。那里能看见灯光,可能驻有警卫部队。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吕城镇。道路一片漆黑,我们绕开路上的坑洼继续前进。吕城的下一站应该是奔牛镇。这附近的路我一点都不清

楚。以前我曾跟着部队在一条名叫江南大运河的河旁小道上走过。印象中,我还拍摄过丹阳方向发生大火时浓烟染黑天空的景象。当时我很奇怪丹阳已成战场,为什么居民们还会摇着帆船急急忙忙地往回奔呢?

天黑下来了,路边的风景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注视着车灯照射下的路面,时不时地提醒司机哪里有路坑。后车厢里坐着的三四个人,估计都睡着了。

过了常州,然后便是无锡了。我想起那时由于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我和胁坂部队队长被困在了民房里。在那里,两名随军记者牺牲了。我在躲避捷克机枪子弹时,脚踩进沟中,左膝被严重扭伤。后来历尽艰辛才跟着第九联队的富山大队翻过了磨盘山。

过了无锡便是苏州了。我没有走过这条无锡到苏州的公路。因为以前是从苏州乘船来的,所以只见过石桥和土堤。

终于到了苏州,我们稍微休息了一会儿,狼吞虎咽地吃完了从南京带来的饭菜。

到了苏州,上海也就不远了。道路虽然不是很宽阔,但是马上就要到昆山了。不过我并不知道从苏州到昆山的路。因为11月21日那天,我是沿铁路线走到苏州的。现在我们经过的这条汽车道很窄,而且坑洼不平。按说路边有一些大小不等的湖,不过晚上都看不见了。听司机说,他当联络员时,这条路不知跑过多少趟,可谓是轻车熟路了。

“佐藤先生,请您注意路坑。”旁边的人这样提醒我的时候,已经是凌晨2时了。从昆山再往前就是吴淞河战役的旧战场了。周围民房不是很多,不过天亮时能依稀看到几幢。远处有一片起伏不大的平地。以前可能是棉花地,中间有一条路,远远地朝上海方向延伸过去。

“看到了。”司机说。我遥望东方,夜幕尚未退去,但可以分辨出形同真如无线电发射塔一样的东西。公共租界的灯光依稀投射在东方的云彩间。

南翔和真如都是吴淞河渡河时经过一番苦战的旧战场。径直穿过那里,便来到虹口日本租界。

凌晨5时,我们抵达分局。回来了,终于活着回来了。直到此时我才能独自体会到幸存下来的安全感和喜悦之情。我用带来的惟一一块

洗脸用的香皂洗好了内裤。

回想起来,当初为了去苏州,11月20日我便动身前往昆山了。进入南京之后,又于12月24日离开了南京。其间34天,没有洗过一次澡。装在水壶里的水是贵重物品,要用来做饭的。河渠和池塘里的水又不干净,刷牙只能用水壶里的水。那段时间大概刷过四五次牙吧,不过根本就没有刷牙之后的那种清爽的感觉。

贴身穿的内衣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还好有兜裆布,我预备的五条兜裆布全换完了,算起来一星期换一条。偶尔遇见水很清澈可以洗衣的池塘和河渠时,就用随身携带的洗脸香皂洗一洗。如果不必担心白布被敌人发现的话,我就将内裤系在背包带上,在冬季暗淡的阳光下边行军,一边晾晒。

河渠的水如果不干净就无法刷牙和洗脸。我在民房里烤火取暖时,将稍微有点浑的水装满一壶,放在火堆旁。水开之后,盖好盖子放着。这样一来,即使有时突然要出发,也可以不慌不忙地把热水壶挂在背包上离开。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最好的款待便是洗澡了。分局的四楼有个一次可供六七个人使用的澡堂。

我先冲了个澡,洗干净脸和手脚后,进入浴池。我伸开四肢,发现自己的脚异样地白皙。这是一双有一个多月没有接触空气,而且也没有沐浴过阳光脚。然而,它很能走路,并没有半途抛锚。

洗澡时重要的便是洗头了。我先把头上浇上热水,再将洗脸用的固体香皂使劲擦在头发上。用双手一揉头发,泡沫便出来了。然后再用指尖拼命地抓头皮,简直要把泡沫按进头皮里一般,最后用热水一冲,流下来的水都成了红褐色。

我又涂上香皂,重新洗了一遍,然而水仍是红褐色。如此三四次,我累得不行才作罢了。

仔细一想,这应该是因为汗、油脂和炉火的烟尘渗到头发里的缘故。身上用香皂咯吱咯吱地搓了两三遍,终于洗干净了,然而头发我只好放弃了。

换上崭新的衬衣时,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

以前来上海时,我住在日本旅馆辰巳屋。到了上海战役迫在眉睫时,报社的同事们陆续从国内赶来,辰巳屋便住不下了。花园桥附近的英资旅馆、翠菊旅馆也接待客人,不过不提供伙食。于是10月19日我搬到了那里,一天3日元。

去南京时行李全都寄放在房间里了。所以在分局吃完早饭后,我便回到旅馆。离开上海的这段日子,这间旅馆也增设了各种服务设施。我二话没说便径直奔向理发店。

去南京之前,我就开始留长头发了。不过因为在前线待得太久,也没有打过发蜡。长头发被剪掉之后,终于要洗头发了。冲洗头的水变成了红褐色。理发店老板用洗发水洗了两三遍后,吃惊地问道:“先生,您这是去哪儿了?”

“大概一个月前去了南京。”我回答道。

他立即点点头,表示理解。

我的胡子并不多,但一刮完胡子,我觉得自己终于又恢复成一个常人了。

剩下的事就是睡觉。从昨晚离开南京到今早抵达上海,整整15个小时,我一直坐在卡车的副驾驶座位上充当副驾驶,所以非常疲倦。我躺到旅馆软软的床铺上,开始午睡。没有捷克机枪声和迫击炮声,一切安全。我昏昏沉沉地一觉睡到傍晚。

[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南京战史资料集》(二),

偕行社(东京),1993年12月8日。]

(奚欣华 译)

4. 侵 略

——中国战线从军记者的证言

小俣行男

编者注：小俣行男，日本《读卖新闻》特派员，随军记者。

序 言

——我在战场上所见

战后出版了各种战事记录，使人感到关于日中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似乎已写得差不多了。然而，对战争的感受因人而异，同一场战争，前线、后方截然不同。因此，关于战争的手记，无论多少人写都是写不完的。

新闻记者写了不少战事记录，但是，大概还没有一个记者经历了卢沟桥事变到太平洋战争这一整段历史并将其写成书的吧。既幸运又不幸，我作为一个随军记者，经历了从日中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缅甸之战这一过程。从1938年1月到1942年8月，近五年时间，日军把战争由中国扩大到太平洋，我是这一过程的现场见证人。当日本人或亚洲民众再一次问起战争到底是什么时，我感到我所记录的亲身经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于是我决定执笔著书。

南京刚刚陷落，我就作为《读卖新闻》的特派员到了上海。不久，随军到了已成为徐州会战前哨战的长江北岸的苏北战场。徐州会战后，开始了武汉作战。于是，我又乘扫雷艇，越过水雷区，随军溯长江而战。后来参加了田家镇要塞的攻防战，在庐山我看见了东京部队的战死者堆积如山。

庐山和汉口的战斗一结束，日军就溯长江900英里，把战线推进到宜昌。

宜昌陷落后，我即奔广东。转而入广西南宁，再越过镇南关进入法

属印度支那(越南)。在谈判期间,我从法属印支军的阵地上看到了攻打过来的日军。这虽说是进驻北部法属印支,其实是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线。

我随军从西贡到马来西亚,然后进入新加坡。随第五师团渡河后,参加了布基帖马激战,在几十门大炮的猛烈轰击下,在无数战死者中,我竟奇迹般地活下来了。于是,我采访山下奉文和帕西巴尔两位将军,打电报询问山下将军是否同意。

最后由曼谷前往缅甸。从缅甸回国,被召入伍,直到战败。

回顾一下自己的随军记者生活,可以说是一段随军参加侵略战争的生活。武田信玄(公元1521—1573年,日本战国时代武将。——原编者)曾在他的军旗“风林火山”(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名言“疾如风,徐如林,侵略如火,不动如山”的缩写。——原编者)上写有孙子的一句话——“侵略如国”,我经历的好像就是那样的战争。但古时的“侵略”一词是在“快速进攻”的意思上使用的,而我所亲睹的战场情景却是烧房、毁城、杀人、被杀、抢粮等一幅幅地狱图。侵略战争以凄惨的悲剧告终。

用电影和电视可以描写战场,用演员的演技可以反映战场上的士兵,但是,电影和电视毕竟与真实事物不同,即使拍摄出几个出色的场面,也无法使人感到“死”的恐怖。在今明生死未卜的恐怖中生存的将士的形象,被侵略的民众的表情,这绝不是我们的口笔、图像所能表达的。

况且,战争结束已经35—40年,对战争的看法也变了,人们甚至从心中把这些史实淡忘了,竟会发问:那里曾发生过怎样悲惨的战争?当我们向战后的10代、20代青年们问起“12月8日是什么日子”时,大多数人已不知道了。对于现在的青年来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一天已快要消失在九霄云外了。

这场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许多被征前往中国的人都有实际感受。因为进兵占领中国的城市,无论谁看后都知道是侵略战争。可是在当时,只要有反战的言论就会遭到重罚。许多人相信在关系到日本命运的“圣战”中捐躯是国民之“荣耀”这种宣传,被送到战场。士兵们甚至连前面的敌人是怎样的敌人都不知道。同敌人对话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在日本人之间交谈战争。一旦开上前线,不打对方,自己就要被打死。当

亲密的战友纷纷倒下去时,就产生了“为战友复仇而战”的心情。被一张红纸召集起来的士兵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充当了侵略战争的工具。再加上向国民灌输日本是“神国”的思想,人们在这种思想的禁锢下蔑视其他民族,所以屠杀、虐待中国人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战场就是以集团进行的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掠夺等一切凶残暴行的场所。

当然,因一张红纸而不得不死于异国他乡的大多数士兵、军官、新闻报道人员都是这场愚蠢至极的战争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忘记,那些日本军人们是如何加害中国以及亚洲民众的。

实际战场,远不是电影和电视所描绘的那种场面。我也不认为我的笔能充分描写出战争的实际情况,我只是想如实地披露自己的所见所闻。

第一章 战场就是凶恶的集团犯罪场所

“这太残酷了”——到上海的第一天就遇上“砍头”

离开长崎去上海。

船,越过玄海滩的骇浪,驶进黄色的长江。江口 50 公里宽,与其叫江,不如说是海的延伸。从长崎上船后,还是第一次看见大陆。说是大陆,只不过是出现在水平线那边的一条线。长江三角洲的平原并不像日本那样见山即见陆,而是先呈一线。

沿长江驶入黄浦江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右侧那已成为废墟的吴淞。所有的房子都被炮火摧毁了,街上瓦砾成山,是一座死气沉沉、渺无人迹的废墟。

“这太残酷了……”

我第一次见到一座死城。它清清楚楚地展现出战争的激烈和可怖。但这仅是战争的一斑,到上海一看,使我受到几倍乃至几十倍于此的震惊。

我到达上海是南京陷落不久的 1938 年 1 月 13 日。当时我尚未结婚,25 岁。

从陆军省一得到“随军执照”,第二天晨报第一版就刊登了我和摄影

师船越的照片及一则增派两名记者的通告。其中这样报道：华北方面军南下，华中派遣军开始北上，到处都翻滚着同中国军队决战的风云，因此决定派遣两名特派员。上面决定派船越去北京，我去上海。出发时，正力松太郎社长到东京车站送行。

船越去釜山，我从长崎乘联络船长崎丸去上海，临别约定“南北两军会师时再见”。

长崎丸从长江驶进黄浦江，到达日本邮船在上海停泊的淮山码头。战火已经熄灭，但从杨树浦往闸北去时，所见都是整街整街的瓦砾，没有一个居民的影子。这是日本陆战队同中国的精锐部队经过战史上罕见的数月殊死拼杀所留下的痕迹。双方的炮火把砖瓦建筑物炸得粉碎，到处是断墙残垣，其上弹痕累累。

联结虹口公园附近的日本陆战队本部和黄浦江岸码头的一条道路——北四川路上竖着密密麻麻的墓碑。

光是死守这条通路就丧失了千百条生命！《读卖新闻》分社位于一片废墟的角落——亮着少数几盏电灯的虹口侧面（上海公共租界日军警备地段）。我在挂着英国国旗的派司公寓五楼卸下了行装。

一到分社，我头脑中所描绘的理想战场就成了泡影。分社一共有四个房间，除了办公室、食堂，还有特派员的寝室。说是寝室，连一张床都没有。就地铺上一条毯子就算是床了。我刚和衣躺下，一个联络员脸色吓人地跑了进来。所谓联络员，是在战线上投送稿件、给记者和摄影师运送粮食的人。哪个报社的分社都有几个联络员。他悄悄地对我说起刚才看见砍头的事。日本宪兵在这座公寓附近的小公园里绑了五个中国人，砍了他们的头。“日本刀真快呀！把手绑在后面，让他们跪下，刀蘸了水往下一落，咔嚓一声，脑袋就离开身体飞到空中，在三尺多远的地方掉了下来。胸腔里喷水似地涌出三股鲜血，然后渐渐变弱，没有头的身体咕咚栽了下去。现在大概还在杀呢……”

真令人毛骨悚然！

“那些人随身带着什么武器吗？”

“没有，什么都没带，仅仅怀疑他们是间谍。”

在这里，被认为可疑的中国人，一点也不经过认真调查，当然也没有

什么裁决,只凭现场的宪兵军官一个命令就被砍头了。以后,这种暴行不断有所见闻。日军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把无辜的中国人简单地“处理”了。

“这太残酷了……”

我喃喃自语。我感到以前所想像的战场情形彻底崩溃了。

我们在报社,应该说对战争情况要比一般人知道得详细,然而这么残暴的事却从来没有传到东京。只要处在东京,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被“圣战”这种词藻所欺骗。新闻记者也不例外。人类相互残杀的战场当然不会是“神圣”的,但人们每天所听到的就是什么“化作护国神鬼而牺牲”,什么“活在永恒的大义中”,什么“了东洋和平之圣战”……战场就不知不觉地成了“神圣”的。“为国捐躯”,“为民族献身”——大家都认为战场就是如此庄重的地方。

然而到此一看,所谓战场却成了“理所当然”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的恐怖场所。

南京大屠杀

到达上海分社的那一夜,深夜时分两个在上海招募的联络员武田和哇崎从南京回来了。他们是乘带跨斗的摩托来的,弄得满脸灰尘,只有眼睛闪着异样的光亮。

“真冷啊……”

脸冻僵了,话也说不出。两人都是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3日)后开始返回的,到今天为止正好是一个月。他们洗了澡,一边喝着威士忌,一边讲了很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扼要地记录了他们以抑制不住的激动语调讲述的情况。

在南京,到处都可以掠夺,强奸。刚进城时,还有很多建筑物,可是翌日就开始放火,主要建筑物全被焚毁。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

“进到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留作纪念。”

一个联络员这么说着,拿出一双绣花布鞋给我看。又递给我一张名

片,说:“这是放在桌子抽屉里的宋美龄名片。”上面确实印有“蒋宋美龄”字样。

老百姓一个不留地从自己家中被赶了出来,收容到建在中华门旁边的“难民区”。

俘虏有10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当时在笔记中写道:“12月15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一开始就确定的方针。)

因此,俘虏被日本兵带到长江岸边的下关排队斩首。第一排杀完,让第二排把尸体抛入江中,然后排成一行同样杀头。就这样从早晨杀到晚上,一天不停地杀也只杀了2000人。

第二天杀累了,就抬出了机关枪,摆两挺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面向江岸,让俘虏排成一行,嗒嗒……扣动了重机枪的扳机。俘虏们一起往江里逃,然而没有一个人能挣扎着跑到对岸。

后来军里传令:“俘虏不杀了,送到后方,去修筑道路和干其它苦役。”

此时已有不计其数的俘虏被杀了。长江上漂满了中国士兵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江水,惨不忍睹啊!

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的英美警备区发行的英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上,登载了身着便衣的青年、女人、孩子的尸体的照片,都是由侨居在南京的外国人拍摄的。但是没有枪杀这些俘虏的详细报道。

我听完联络员的叙述后,再一次感到“圣战”的形象崩溃了。我开始相信“皇军”的军规是“严格”的。战斗结束后,已投降的俘虏会被“严格”地处理。这简直是屠场!而且,让即将被处决的人来处理当着他们的面处决的人的尸体,还有什么比这更为残暴的行为!

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

“究竟杀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

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日军“一扫而光”。

在纸币堆上烧饭

联络员继续说——

在苏州我们跑到著名的寒山寺看了看,把寺中挂着的古画摘了下来。因为只要是寒山寺的宝物,都可卖个好价钱。还有一些联络员冲到富豪人家盗来了金条。据说在南京还有人从博物馆盗走了贵重的文献和古董。

后来还听一个摄影师说,他把华北著名的卢沟桥上的石狮弄下一个运到东京去了。“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地的这座石桥上,并列着一大排石狮。因为很多,我弄了一只,装入由天津开往日本的空船,带到东京去,打算放在庭院中当个点景石。”

后来又听这位摄影师说,因觉得这样做实在太过分,就把石狮子贡献给了靖国神社。我是直接从这位摄影师那里听说的,所以返回东京后,就到靖国神社内探寻了一番,但并未发现有石狮。

那时候,部队一占领城市就冲进民房进行掠夺。一边吆喝着“有没有败兵”,一边挨家挨户地搜查,趁机把贵重金属、古董和法币(当时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发行的纸币)等装入自己的腰包。当时传说第一线部队有的士兵背包里填满了法币。据说最初日军士兵不知道中国的法币可以作通货使用,不少人认为“败国的纸币等于废纸”。

还听说过这样的事。在南京,士兵们从银行里抱出一堆堆成捆的纸币,问道:“分队长,这怎么处理?”下士官马上说:“失去了首都的国家,纸币也毫无价值——烧!”

部队就用纸币烧饭盒里的饭,一边嚷着:“用1万元还没做熟,再拿5000元来!”以后知道法币是最通用的货币时,后悔不迭。

不少联络员还去前线收购这些部队随身带的法币。酒保(在部队内卖日用品和饮料、食品的商店)的商人和联络员发现士兵们带着法币没机会用,都想兑换成日元,便借机做起法币生意。一般是用十分之一面值去兑换,即10日元可兑换100元法币。这些人再将法币拿到上海钱庄(兑换所)根据当日行情兑换成日元。那时日元和法币基本相同,有时

法币价值高于日元。

报社中的联络员也有各种人物,最初都是由东京派来的编辑总务科员担任,在上海战线上,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驾着摩托车,把吴淞的新闻稿送到分社所在的租界,或是从陆战队本部穿过正在进行巷战的北四川路,把稿件送到分社。以后,随着战线的扩大,联络员显得不够用了。不能从东京大量派来,只好在当地招募。

侨居在上海的日本人,在战争爆发时大多撤往日本国内,但是有些人即使回国也没有依靠,就留在上海没走。他们中间有的成为部队的翻译,有的当起酒保商人,有的进特务机关工作,也有的成了报社的联络员。还有从日本渡海来上海想找些赚钱的事干干的,这类人也被留用为联络员。

一旦从军报道部领到联络员臂章,就可在战线上自由走动。不少人利用这种方便,从前线的士兵手中套购法币,或拼命搜集古董。战场居然也是一个挣钱的地方!

当时的战况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当时的战况。1937年7月7日在卢沟桥触发的日中两军的冲突一再扩大下去,日军占领了北平(北京)、天津后,进一步增加兵力,把战火燃向华北。同年8月13日,驻扎在上海虹口地区的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同中国军队之间也挑开了战端。

日军陆战队方面常驻兵力有3200人,加上增援的3000多人,共有6000余人。中国方面是由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指挥,以曾在1932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作过战的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为主力,是一支精锐部队。而且,中国方面自从第一次上海事变以来,在上海周围、江湾、大场镇、真如等地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即使在被称为卢沟桥事变的日中战争中,这次百日战争也是一场最大的激战。

日军最初派遣陆战队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从吴淞、川沙镇登陆,接着又增派了第九师团、第十三师团和第一〇一师团。为了支援这次上海的战斗,日军派陆军三个师团由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从侧面攻击,这样日军总兵力达20余万。中国方面也投入了50多个师,张发奎任右翼总司

令,朱绍良任中路总司令,陈诚任左翼总司令,指挥中国最精锐部队与日军展开了殊死决战。同年10月7日,日军成功地渡过了蕴藻浜河(俗称吴淞江),然后攻占了大场镇,陆军与海军陆战队会合,完全占领了上海,并追击败退的中国军队,沿途又占领了南京、杭州。攻占杭州的东京部队第一〇一师团把杭州交给第十八师团后,撤回上海。

“队长,让我也烧它两三幢吧!”

战斗已经结束了。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的日军调整战线,集结在南京和上海的郊外。

首都南京陷落后,已没有什么大战斗了。东京部队不久也像神话故事中征服鬼岛的桃太郎一样,摘载珠宝,以胜利者姿态撤回了上海。

谷川部队(步兵第一〇三联队——麻布)驻江湾,饭冢部队(步兵第一〇一联队——赤坂)驻南市,福井部队(步兵第一五七联队——佐仓)驻真如,津田部队(步兵第一四九联队——甲府)驻龙华,这样东京部队(第一〇一师团)就集结在上海郊外。

我是为“中原逐鹿”大战——从北边(华北)到南边(华中)以徐州为中心的战役而派来上海的,但据南京方面的情报,向徐州进攻尚未开始,我就专心采访驻扎在上海近郊的东京部队。

由于第一〇一师团往返于上海和杭州之间,士兵与家庭的联系中断了,家中老少都翘首盼望着士兵的消息,《读卖新闻》又是以东京为中心的报纸,所以我想逐步报道一下这些士兵的情况。现在是个机会,因为战斗时,报道都是以战局为中心,无法传送一个个士兵的情况。现在战斗结束了,部队又撤回到上海,在这里把所遇到的士兵的谈话记录下来,拍上一张照片发往日本国内。家属看见在战地的儿子和丈夫很有精神的照片登在报纸上该有多高兴呀!我想着亲属们看报纸那种喜悦劲儿,每天往来于东京部队之间进行采访。

“喂,士兵们,集合喽!”我大声召集士兵们。有时让在小河边的士兵们拿着钓鱼竿拍上一张照片,下面分别写上他们的姓名、级别、籍贯等。有在龙华古塔下持枪警备的,有在南市香甜地吃着野战饭的,等等,我把这些场面都摄入了镜头,发往日本国内。里面有步兵、工兵、炮兵,其中

第一〇一师团的最多。我从日出忙到日落,从这个部队转到那个部队,回到分社后马上着手整理这些材料,赶写稿件直忙到深夜。再马不停蹄地将稿件航寄到本社总编室的办公桌上。

这个计划取得了很大成功。战地的消息传到急需了解情况的日本国内,人们争相购买《读卖新闻》,——“今天××上报纸了!”《读卖新闻》的销售量迅速增加。

中国军队的主力虽然退到南京的长江以北,但是在上海近郊还有不少狙击日军的败兵,所以只身一人在战场上走是很危险的。可是我把危险都抛到脑后了,仍旧从这个部队走到那个部队进行采访。当我与郊外的部队告别,返回位于虹口一隅的《读卖新闻》分社时,一般都搭汽车或摩托车,有时也摸黑独自步行回去。夜里,一走进漆黑的闸北那烧焦的废墟处,狗就叫起来。一只狗一叫,马上不知从什么地方聚集来好多狗,有时达一二十只。狗在这一片烧焦了的原野上是找不到东西吃的。

“要留神啊!上海的狗吃士兵的死尸,像狼一样凶狠!”别人还对我说,当狗像狼一样露齿吠叫时,你一逃它就扑上来,你拿着棒子朝狗走去就要挨咬。我默默地走着,也不加速。狗在离我200米左右处尾随吠叫,最后也就死心跑开了。

我还曾遇到过这样的事。倒在路旁的死马肚子在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吃惊地止步一看,从马腹中爬出来一条大狗,在吃已腐烂了的马肉。吃马尸的狗,吃人尸的狗,饿狗成群的战场——我就是往返于这样的街道中。

为了采访,我一直与部队朝夕相处,因此我耳朵里灌满了见不得人的暴行。

上海陷落的同时,东京部队进攻杭州。军队所到之处,村庄全被烧毁。有时坐落在道路两侧的民房正在燃烧,后面的部队无法通过,只好停在村口,或者迂回前进。战场上往往使人丧失人性。有的士兵就这么说:“队长,我不见火灾就睡不着,今晚上也让我烧它两三幢吧!”

江南地区一二百里水田连着旱地,看不见山和树,可是这里即使最简陋的土房的柱和横梁也使用木材。这些木材究竟从哪儿运来的?不难想像,这里的人要盖一间房屋需花费多少心血啊!然而在士兵们说笑

间就放火烧了与他们毫无冤仇的民房。人们都说,哪里冒烟,就知道日军打到什么地方了。他们为了前进就放火烧村庄,所到之处,黑烟腾空。

“有关皇军的威信,把那村庄烧喽!”

炮兵部队驻扎在距上海很近的松江。队长是当时一个著名的右翼领袖——大日本生产党的桥本欣五郎大佐。他被征召到前线当部队长。这个部队有两名士兵悄悄地溜出部队去搜寻女人。他俩在一个村子里发现了姑娘,正在搂着要行凶时,被村里人发现而杀了。这两个士兵的行为无疑是违反军纪的,然而桥本大佐知道后暴跳如雷——士兵不好,可也不能饶恕这些杀死他们的村民。

“这关系到皇军的威信,一定要惩罚他们!”大佐登上高高的塔顶吼道,“是哪个村子干的?!给我烧!”

“从那边,到这边——”士兵在塔上指点着。命令很快传下来,组织了放火队。那一夜,熊熊的烈火烧了两里多远,村庄街道一片火海。塔上的大佐模仿火烧罗马的暴君尼禄的姿势观赏着这场大火。

在沦陷的杭州,一些胡作非为的士兵们洋洋自得地向我讲述着:

西湖畔著名寺院的池塘里养着大鲤鱼,是属于国宝级的高价鲤鱼,全被士兵们用网捞起煮熟吃了。听说那种观赏用鱼味道并不鲜,但士兵们满不在乎地说:“一吃,味道还真不错。”

这种行径就连某些军官也颇为恼火:“吃那种鱼的是哪些家伙?!”可这已是马后炮了。国宝级也好,什么级也好,拿被侵略者的东西是侵略者的自由。这种风气在当时的日军中很浓厚。因此,在被侵略的地方,人,也有同样的遭遇。

在沦陷的杭州,经常搜截姑娘。日军一到附近,村民们都跑得精光,逃得慢的姑娘被抓住后,就被士兵们强奸了。有些人家在壕沟边上挖个藏身洞,洞口用草掩盖,将家财、用具、鸡、猪等和年轻姑娘一起藏到里面。

有个士兵悄悄向我诉说:“搜寻到藏在洞里的姑娘,一带出洞外,她就拼命地逃跑。士兵们喊着:‘姑娘!’‘姑娘!’追着取乐。姑娘无处可逃了,就跳入河中。河水太深,救不上来,姑娘就这样被活活淹死了。真可

怜啊！他们竟以此取乐！”

还有个士兵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进入贮藏室，在干草堆中发现了年轻的女人，准备押走时，年轻女人进行反抗。他挺起刺刀威胁，女人迫不得已，用手抓住刺刀，手掌被割开了，鲜血直冒。

“那么后来呢？”

后来把她的手按住了。

如果返回家园，他也许会像一个朴实的青年那样生活。我再次注视他的那张脸，看不出任何痛苦的表情。大概因为那并不是杀人吧……他肯定一点儿也不感到痛苦。

在战场上听到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暴行，但这些事是绝对不能写的。只让写些什么在战场上邂逅的友情和前后方的佳话等，这类军中的所谓美谈。

我往来于部队之间，搜集这类能打动日本国内人心的佳话。如士兵们看见了被抛弃的废马，于心不忍，牵回来细心照料，带着那匹马行军50里……听到这些事，我的心也稍好受些。

也有使人感到欣慰的事

一天，驻上海郊外龙华镇的津田部队的长田好置大尉（甲府人）对我说：“在杭州，名取伍长收养姑娘的故事真太有意思了。”那是津田部队开进杭州时的事。长田大尉部下的名取金一伍长，在分配给他的西湖湖畔豪华宅邸的二楼一个房间里睡觉，突然墙上的挂轴哗啦动了一下。有败兵！伍长一跃而起，朝挂轴踢去。他意外地发现，挂轴后面是一个通往屋顶阁楼的秘密通道。伍长顺着通道悄悄地摸上去，用手摸索着发现了一扇门。

推开门，打开手电一照，意外的景象映入眼帘：一个少女紧紧地搂着躺在床上的母亲，脸色苍白，一抬头发现伍长，吓得浑身直哆嗦。姑娘旁边有四个小孩，睡着了。

姑娘搂着母亲，那充满悲哀的眼睛震撼了伍长的心，他默默地退了回去，把挂轴按照原样放好，堵上通道，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悄悄地钻进被窝。

翌日起,伍长不让人知道,偷偷地给母女们送剩饭。少女和母亲对送饭来的伍长合掌流泪。少女自述叫杨秀英(16岁),是杭州弘道女学生,会讲英语和北京话。母亲有病,佣人们都逃走了,她和患病的母亲抱着幼小的弟妹无法逃,只好躲避阁楼里。

伍长就像对待自己可爱的妹妹那样,每日送饭,给予照料。不久,这事传到长田大尉的耳朵里,他让少女出来住到明亮的房间。少女很高兴,她给大家演唱在学校里学的美国民谣,慰问伍长和他的部下。快乐的几天过去了,不久部队要撤回上海去了,伍长就把保护这一家子的事委托给了宪兵队。

“再见了,请你好好照顾妈妈!”

少女用北京话说:“战争结束后,我和母亲一起来拜访您。”并在照片后面签了名。她紧紧地握着伍长的手。

有一张名取伍长和少女杨秀英站在西湖畔拍的纪念照,我借得之后,驱车返回分社。我以《诗都纯情话艳事——一士兵和中国少女》为标题,把这事刊登在社会版第一条位置。

被日本兵刺死的日本记者

我刚到上海时,南京、杭州已被攻克,战斗已告一段落。我不太了解前线情况。不过,《读卖新闻》的上海分社却因那些从前线回来的记者和摄影师的夸夸其谈而显得热闹起来。据他们说,《读卖新闻》的记者们在前线极其活跃,捕捉、赶写了许多特讯。

在东京部队战死者最多的吴淞江渡河战中,拍摄友田恭助之死的是《读卖新闻》的采访小组。话剧演员友田恭助(女演员田村秋子的丈夫)在前线任赤羽工兵队伍长。《读卖新闻》的记者和摄影师是偶然发现友田伍长的,在战壕中拍摄友田伍长同部下谈话的镜头,忙碌中不觉天已黄昏了。

第二天,决定东京部队的主力渡河,赤羽工兵队用铁舟运送步兵部队渡50米宽的小河。对岸敌人的机枪爆豆般地响了起来,有些小舟还未到达对岸,舟中的士兵就全部阵亡了。

友田恭助也把铁舟推入小河,划桨出发。舟上载着12名步兵。在

离对岸5米之处,友田胸部中弹,抱着船桨倒了下去。摄影机一直追踪着他,直到最后。这段胶片后来被收进新闻纪录片中,在东京的电影院放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拍摄这个电影的是真柄摄影部长。分社的另一位摄影师(名叫森,是电影部成员)对我说:“我们赶到时,《朝日新闻》已捷足先登,拍摄完毕,走了。没法子,只好围着劲头十足的友田转悠。后来天黑了,回不去了。我们想,《朝日新闻》肯定寄出了有关干劲十足的友田在前线的报道,便决定这次一定要拍摄得稍详细点。然而,第二天拂晓就下令渡河了。战场上的特讯是走不走运的关键。”他从是否会追悼友田之死,谈到追悼是否会成为特讯。这就是自己也不知道何时会被打死的战地新闻记者的气质。

说起来,这位森君也写过出色的特讯,那就是《用单翼返航的桎村机》。

由舰队报道部得到消息说,空袭南昌的海军战斗机返航了,森和记者二人往上海郊外的江湾机场赶去。因汽车的缘故,出门晚了30分钟,刚赶到机场,成果发布会已结束了,各报社的记者正纷纷在往回赶。森他们只知道进行了激烈的空战,击落了几架敌机。

各报社记者都已回去,也只好听听他们的报道了。正当他们也要回去时,在空战中折了一只机翼的桎村机喘着粗气似的飞回来了。飞机的一只翅膀从中间齐崭崭地折断了,然而并没有失去平衡,受了这么重的伤竟奇迹般地生还!摄影机拍摄了这架飞机出现在基地上空到安全着陆的整个过程。尽管去晚了,却得到了这么个特讯。

真柄摄影部长在攻克南京时,使用远摄镜拍摄了攻进光华门先头部队的纪录片。打着太阳旗的士兵攀登被炮弹炸塌的城墙,终于爬上去了,士兵挥舞起太阳旗……攻打南京时,最先冲入光华门的是金泽第九师团的胁坂部队伊藤大队。可不一会儿,部队遭到了反击,城墙上摇旗的士兵、冲进城的士兵以及包括大队长在内的人几乎全部被歼。后来又发动了第二次、第三次突击。

在这次光华门攻防战中,随军记者也战死了。最初冲到城墙下的部队全部被歼,只有一个《福冈日日新闻》的记者还活着。他蹲在战壕里等

待后面冲进来的友军救援。随军记者穿的是代替军服的土黄色制服。那位记者一看见再次冲进来的友军,便站起来挥手。可是一个日本兵以为阵地上已经没有日本人了,断定这肯定是个中国兵,便上前一刺刀,扎进记者的胸膛,刺死后看见臂章才知道被杀人是《福冈日日新闻》的记者比山国雄。

日本人的新闻记者被日本兵杀死了,不过当时也没酿成别的什么麻烦。因为是在人与人相互搏杀的前线发生的事,最多叹息两句“真可怜”或者“命运不好啊”就完了。陆军报道部将此事件说成是“遭到敌人袭击而战死的”,报纸也这样报道,家属也真以为是“战死”的。

已有好几个新闻记者战死了。《读卖新闻》的记者渡边,就是在进攻无锡时被中国军队的机枪打死的。

日本兵在神圣的场所也随地便溺

我到上海后对驻沪日军进行了一段时期的采访,所以一直没有机会去前线。不久,由东京部队的麻布三联队编成的谷川部队奉命出发,我去战场采访的机会来了。据说这次战斗不是像上海战役和南京战役那种壮观的主力 and 主力之间的决战,而是去扫荡位于上海鼻子底下的长江口上一个小岛——崇明岛上的残敌。

1938年3月17日,我们从位于黄浦江上的饭田栈桥搭货船向崇明岛出发。黎明前,把白布条呈十字系在身上的士兵换乘快艇,我们也顺着绳梯下到一艘快艇上。天还没亮,小艇前面架着机枪朝对岸驶去。

靠近岸边时,听到了啪啪的枪声,两三发子弹嗖嗖呼啸着飞来,我连忙趴下。可是,枪声只响了那么几下。

不一会儿,我们登上了崇明岛。最早登陆的小艇被打死了两名士兵,岸边的敌人已败走了。

天亮了,放眼望去,岛上绿油油的麦田无边无际。使人无法想像,这一片和平的乡村变成了战场。我怎么也不能相信,长江中竟有长28公里、宽12公里的岛屿。我们找了一个能够看见城墙的地方观察战斗的情况。没多久,还是这支经历上海激战的部队占领了城门,冲进了城。

激烈对射是预料中的,所以不那么紧张。部队宿营在崇明城内,本

部设在一座富豪的宅邸里。

这一夜,我睡在一个雕花的大床上。士兵们常说,在战场上是一夜当财主,一夜当乞丐。这一晚上我像个大财主似的躺在柔软舒适的被窝里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三楼爬到房顶,上面还放有桌子和椅子。这里是个绝好的瞭望台。院子里的木莲花盛开,春风吹拂,暖洋洋的。我本想悠闲地欣赏一下崇明城内的春色,可就在我登上去的刹那间,令人恶心的情景使我惊呆了:下面到处都是粪便。这好像是昨夜来设营的士兵干的。

这座美丽的庭院,一夜间已变成了一座粪池了。如果是长期驻扎则会建一个厕所,只住一晚上,士兵们就在房子下面和庭院角落随意便溺。100多个兵,100多堆粪。战场原来竟是粪场!

在江南即使是最富有的人家里也往往不建厕所,只在室内的角上放一个“马桶”供便溺,天一亮,把粪便倒掉,冲洗干净。经常发生这样的笑话,日本兵错把马桶当作盛饭用的饭桶往里装米饭。

虽说没几个厕所,但这样到处拉屎也让人受不了啊。为此发了好幾次火。

后来我到了南京,想去中国革命之父孙中山长眠之地——中山陵看看。不料,登到石阶顶上一看,陵中满目粪便,墙上到处乱涂着“××部队占领”字样。

我登上广东中山纪念堂高耸的塔顶时,竟也发现三大片粪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碑也是如此。那是中国革命先驱们举行起义被逮捕、屠杀的地方,可现在成了日军拴马场,遍地都是马粪。要如此照搬的话,那么日本的伊势神宫和明治神宫的大殿上也可以到处便溺喽!中国人知道这种事,将会是怎样的心情啊!要说“圣战”,即使是敌国,也应尊重该国的文化和民心。

崇明城外斩首

占领崇明县城的第二天,士兵们在城内挨家挨户搜查时,听到一所民房里传出婴儿们声嘶力竭的哭声。走进屋里一看,是个有两百多初生

婴儿的托儿所。昏暗的屋内，婴儿们躺在小筐里，都并排地放在搁板上。尽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保育员们全都逃走了，因而也无法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是收留居民的孩子，则没有挂上姓名牌，是收拢来的弃儿吧，又显得太多了；或许是上海周围的私生子吧！

婴儿们都快要饿死了，哭闹着要吃奶，有些已哭得精疲力竭，奄奄一息了。部队的军医对此也束手无策。部队本部没有牛奶，军医和卫生兵们只好把大米弄成粉末，用开水调成糊状给婴儿吃，但为时已晚，婴儿每天死一二十个。

“这简直是地狱！”军医收拾着变冷的婴儿尸说道。一周内死了一百多个，其余婴儿的命运谁知如何啊！

警察署的拘留所里有六名犯人，看来像是长期过着囚禁的生活，一个个须发蓬乱。听翻译说，这些都是“海盗”，他们是乘帆船落荒逃到这个岛上被抓住的。警官一听说日军来了，都逃之夭夭，这些“海盗”则仍被锁在囚室里。

和部队一起进来的宪兵决定将这些“海盗们”斩首。既不知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也不查询一下六人是否同罪。既然中国方面没有杀他们，日军又凭什么杀呢？尽管如此，“把这些家伙斩首！”一句话，他们便成了日军的刀下鬼。

我也去看了这可怕的行刑场面。黄昏，警察署前面来了一队士兵。不一会儿，六名犯人被押了出来，前后跟着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顺着碎石铺成的路向城外走去。街上静悄悄的，只有士兵们的脚步声，那声音便显得格外响。一出小小的城门，便看见城墙外挖了几个坑。六个人分别跪在坑前。有的彻底绝望了，默默地跪在那里。有的掏出不知藏在什么地方、皱巴巴的纸币递到宪兵面前苦苦哀求。一会儿，宪兵军曹拔出军刀蘸了蘸水，一把抓住最右边一个犯人的头发，提起脑袋。那人紧闭双眼。刹那间刀光一闪，只听得咔嚓一声，那人的脑袋飞了出去。扑哧，鲜血从脖腔中喷了出来，没有头的躯体栽了下去。

军曹静静地擦着刀上的血迹。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军刀一起一落，一个人的生命就结束了，而且是用身首分离这种最残酷的方法杀死的。直至现在，每当我无意中望见军刀这类东西，就好像见到了什

么令人恐怖的怪物。

接着,一个年轻的军官拔出军刀,“嗨!”的一声砍了下去,可只在犯人的后脖颈上砍了个石榴大小的刀口,鲜血直冒。军官急了,再一次举起军刀刚要砍,那个浑身是血的犯人手脚动弹着挣扎了一下,栽进了坑里。后面四个人的脑袋全飞了。

在尸体上面盖上了土。第二个砍头的好像没有死,土层微微地动着。一个士兵在上面使劲踩了一会儿,土不动了。

夜里,我失眠了。一闭上眼就看见离开躯体的脑袋飞向空中,滴溜溜旋转着。这样过了三四天,我一上床还是做起脑袋飘浮在空中的恶梦。

“梅翳英魂……”

这种凄惨的情节是不准报道的,连谈论也不准。在搜寻有报道价值的话题时,我听说有一位军官“为勇敢战死的三位敌兵建墓碑”,于是急忙去采访,并在墓碑前拍了照。那位军官好像是位俳句诗人,他用木牌写上“梅翳英魂覆墓土”的诗句,并注明“冈村少尉敬献”字样,竖立在掩埋着三位敌兵的坟前。我把这篇新闻稿寄到东京,登在1938年4月3日的《读卖新闻》社会版,占三栏,并配上照片。下面是原文,略作改动——

“梅翳英魂覆墓土”——冈村少尉敬献俳句

【小俣特派员自崇明岛报道】杨柳枝崭露翠绿的嫩芽,夕阳西斜。在崇明岛春晖门外,一位皇军军官将一束梅花献在一个崭新的墓碑前,碑书“中华民国三勇士之墓”的墨迹还未干,夕阳的余辉映照着他墓前瞑目祈祷的情景,令人肃然。

军官是最先冲进崇明县城的谷川部队冈村恒彦少尉(家住东京市杉并区一宫前町1675)。18日攻打崇明县城时,担任突击队的冈村少尉同白石顺事少尉(家住东京市丰岛区西巢鸭2—219)一起向敌人猛烈进攻,在春晖门前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敌军溃退了。可是有三个中国士兵仍坚守在城外土堤后继续进行殊死抵抗。勇敢的冈村少尉悄悄地迂回到土堤后面一看,三个人身上都背着十几颗手

榴弹,尽管皇军已攻到距阵地 20 米处,但三个人谁也不逃,拉开架势等皇军一逼近就投弹。

冈村少尉见此骂了一句:“可恶的东西!”从背后用机枪猛扫。子弹打在士兵的手榴弹上,随着轰隆隆巨响,三名士兵都被炸死了。

多么悲壮的情景啊!冈村少尉不由得喊道:“真痛快!”然后登上城墙喊万岁。可是战斗结束后,三位无名战士的身影总是浮现在冈村少尉的脑海中。只有三个人还坚守城墙的那种英雄气概深深打动了冈村的心。“尽管是敌人,也应该让他们庄重地升天。”他把三名战士埋在城外土堤的旁边,还立了一块墓碑,献上“梅翳英魂覆墓土”的俳句,祈祷其冥福。

诗人西条八十读了这篇报道后十分感动,作了一首长诗,松田文雄为此诗配上画,刊登在 1938 年 6 月号《妇女俱乐部》杂志的两面插页上。

这件事我是以后才听说的。因为我在战场上,所以不知道此报道引起那么大的反响,也不知道西条八十的诗作刊登在《妇女俱乐部》杂志上。1981 年秋天,84 岁的冈村恒彦逝世后,其长子恒昭(在日本广播协会工作)在刊行父亲的俳句集时收录了《梅翳》一首,并拿着收录了我当时写的新闻报道和西条八十诗作的俳句集来见我。

在日军还处于优势时,给敌兵建墓的事虽时有所闻,但都是“无名战士之墓”,还没见使用过“勇士”之类的字眼。于是师团司令部便有人议论:“把抵抗皇军的中国士兵称为勇士,成何体统!”冈村少尉被司令部叫了去,要求他撤去墓碑,撤销对敌兵的“勇士”之称,冈村没有答应。由于谷川部队长的斡旋,墓碑才原封不动地竖在那里。据说,战后在棒球杂志社工作的冈村,曾打算再一次前往参拜三勇士的墓碑,但直到 84 岁逝世,始终未能如愿。

部队随意拉人做苦力

谷川部队登上崇明岛的同时,饭冢部队足立大队(第一〇一联队一大队)也占领了位于长江北岸的南通。

我等候开往北岸要港——天生港的班船去南通。南通是一个有日

本纺织厂的大城镇。江岸绿柳成阴。我独自乘上黄包车(人力车),沿途观望,田野盛开着金黄色的菜花,展现在眼前的是一派恬静的田园风光。我心情十分平静地来到了南通。

来到这里感到吃惊的是,这里开设着生意兴隆的妓院区。一扇门上写有“吉原”两个大字,好像是东京部队在里面。进门便是一个大池塘,四周是土墙垒的房屋。几个年轻姑娘和士兵在池边戏耍。这里不愧是个现代城镇,女人们的服装很整洁,美人也很多。听士兵们讲,妓院刚开设时美人颇多,大队本部开拔时带走了几个出类拔萃的。池畔桃花怒放,真是一派春色烂漫的桃源风光。

但是,好景不长,徐州会战已迫在眉睫。日本的华北方面军沿津浦线南下,华中派遣军由南方开始北上,在南京的第三师团(名古屋)、第十三师团(高田)从南京对岸的浦口沿津浦线北上布阵在蚌埠附近。日军南北呼应准备围歼以徐州为中心设防的中国40万大军,一场日中战争史上最大的会战即将展开。

为此,在上海和南通的东京部队也奉命出击。其任务不是直接进攻徐州,而是挺进到江苏省东海岸的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一带,牵制集结在徐州附近的一部分中国军队。东京部队的饭冢部队(赤板)和津田部队(甲府)的一部分参加了这次作战。

桃源乡景的南通只留小部队驻守,主力部队都北上到靠近海岸的江苏省东部地区去了。我随军采访了这场战役,详细记录了在李保镇、三仓河、栟茶镇等地作战的东京部队的战斗情况和战死者情况,陆续将稿件发往东京。

使我难忘的是这次战斗中进入李保镇时的情形。因连日不停地下雨,整个镇子都湿漉漉的。我住在一所颇觉阴森的民房里,烛光下写稿直到深夜。白天详细地记录了在士兵中的所见所闻,夜里只要一到预定的宿营地就根据笔记写新闻稿。士兵们一个个都睡死了,我还在写,经常写到凌晨两三点钟。为了尽可能快速而详尽地把前线士兵们的消息传到故乡,时常将军官和士兵的姓名、籍贯也写入新闻稿内。

战地的早晨来得特别早。我经常是刚睡下就响起了准备出发的哨声,常常是一夜未眠就又出发了。行军路上总是处于半睡眠状态,途中

一有小憩倒地就睡——在我随军时期一直过着这种紧张的生活。

这一天我写稿一直写到快天亮,就在竹床上铺上被子想打个盹。刚钻进被窝,一个士兵来告诉我准备出发。这是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可是听他说这里好像是癫痫患者的家,说屋角就睡着一个长满脓疙瘩的男人。大队本部说过,中国有60%的癫痫患者在东海岸一带。这一带战乱连绵,也没有隔离设施,患者放任自流。一听说“癫痫”,我背上一阵发怵。真的,这种病是接触传染。要是昨晚睡的那张床是癫痫患者的,那可如何是好?!

连洗一洗身子的时间都没有就出发了。我把写好的新闻稿塞进背包,穿上湿漉漉的外衣就走了。身上也不知怎么直发痒,想到不知什么时候会得那种病就感到沮丧。

从这里往北去三仓河的行军途中,士兵们一发现有男人就抓来当苦力帮他们背东西,或是推车。途中休息时检查他们的脚,大多都长着疙瘩,也不知他们是不是癫痫初期患者。我看见烂脚就觉得恶心。士兵们检查苦力的身体,把有肿包的人全都放走。一见脚上有肿包,就往回赶——“谁要这样的!”那些突然听到让他们回去的人便一窝蜂似地逃散了。

用钱雇苦力的不多,我从没见过有这种事。总之一进村,就把年轻人带来,叫他们背东西。不仅是年轻的,连上了岁数的人、步履蹒跚的老人都拉来充当苦力。因为都是长途行军,便把除了枪以外的所有东西都让苦力们背着,经常是苦力比日本兵多。到了宿营地就把这一批放了,在当地再找一批。

“交出姑娘!”

部队开进了三仓河小镇,村公所的人举着现做的太阳旗出来迎接。中国兵都逃走了,就这么一枪没放、滴血未流地进镇了。

黄昏时分,独轮车吱吱嘎嘎进了镇子,是各村头面人物带着猪和鸡等贡品来慰问日军。他们一卸下东西,便俯倒在队长小仓隼人大尉面前。步兵出身的青年军官小仓大尉以传说中的君王的神态接待了他们。

由村里头面人物组成的治安维持会一成立,队长便急忙提出“需要

姑娘”。维持会的代表说：“这个镇上没有妓女，要是良家姑娘也行的话，可以从附近村庄中找一些。”数日后，集中了十几名年轻姑娘为日军开设了安慰所。

安慰所也是临时凑合的。要了一些较大点的民房，在几个屋里放上床，把女人往那儿一放便做起生意了。由于部队不能直接管理安慰所，便由随军翻译来管理。

这一带是上海的“粮仓”，物产丰富，还饲养着许多猪和鸡。

我的宿舍离警备队本部很近。宿舍是一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几十个大筐，筐里都装满了鸡蛋。“唉呀，都是鸡蛋！”士兵们惊呼道。这些鸡蛋大概是运往上海、南京的，可能因战乱无法运走，就放在仓库里了。

晚餐一人五个鸡蛋，酱汤放鸡蛋，菜还是鸡蛋。还有的士兵早晨起床后用鸡蛋洗脸，“哈，这么奢侈的生活，在国内简直不能想像！”一边用鸡蛋洗着长满胡子的脸，一边打闹着。

(中略)

第二章 深夜听到了死者的哭声

在南京的强奸、掠夺、屠杀

以长江中游的九江为前进基地，正式开始对武汉的进攻。武汉是由汉口和隔着汉水的铁都汉阳及长江对岸的武昌组成，俗称武汉三镇，是联结北京、汉口、广州的纵贯南北的铁路枢纽，是最大的抗日据点。

蒋介石以汉口为中心，把第五战区的40个主力师布防在大别山脉，进而命令以广东军为先头的30个师由南昌附近北上，集结在德安到庐山一带，准备从侧面打击进攻武汉的日军。

而日军方面，从华北转来的第二军(司令官是东久迩稔彦中将，辖第十师团、第十六师团、第十三师团)由北面对付布防在大别山的中国军队，沿长江而来的第十一军(司令官是冈村宁次中将，辖第六师团、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六师团、波田支队、第二十七师团)，加上华中派遣军直属的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六师团、第十五师团、第十

七师团和第二十二师团,其中第六师团、第三师团、第十三师团等部队在长江北岸向前推进,第一〇一师团、第一〇六师团等进逼庐山之敌。中路由海军第十一战队(即溯江舰队,司令官是近藤英次郎少将)率领大批炮舰和陆战队在长江上进击。这是第一次在一条战线上投入陆军14个以上师团,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武汉之战的规模有多大。

我撤回南京,等待随军采访。攻克武汉之战一开始,我就成了海军随军记者,在溯江舰队。在九江得的痢疾也比想像的要轻,现已痊愈。拿来当饭吃的炼乳使我身体得以康复。

终于要随军参加大战役了。这次出征直到汉口攻陷前可能回不了南京了,应该说声“再见吧,南京!”我和前线组的几名记者及摄影师驱车前去夫子庙。

夫子庙就是位于南京城尽头靠近中华门的孔子庙。秦淮河流经庙的附近,河两岸的饭馆鳞次栉比。河上飘浮着叫做画舫的带有屋顶的小船,船上能打麻将,还能喝酒。卖东西的小船穿行于画舫之间,载着拉胡琴唱歌的歌女的小船靠在画舫旁边。河面上,洗麻将牌的哗哗声音彻夜不停。这里说的是昔日的秦淮情调,如今我们游览的秦淮已成一片废墟。河边焚毁了民房残壁比比皆是,其中有几家从火灾中幸存下来的饭馆。有一家破旧的饭馆写着“日华亲善馆”,店内既没菜,也没白酒,只有啤酒和女人。这些就是战争所留下的伤痕。

日军侵占的地方不仅遭到放火、杀人、掠夺的灾难,战火一停,紧跟而来的就是粮荒、经济混乱。由于长期受列强侵略和军阀统治,当时的中国人民十分贫穷。在如此贫穷的中国人民身上再加上通货膨胀和粮荒,可真是无法忍受!在随军途中,无论到哪个村庄,都能看见那些骨瘦如柴、肚子鼓胀、浑身赤条条的小孩。

我眺望着前年末日军冲进南京城时大概也是鲜血染红的秦淮河,想起了我上任那天从南京来的联络员那里听到的南京大屠杀情景。

从那以后直到战败一直过着极其紧张的随军生活的我,甚至到战后都未曾看过杂志上登载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战后我看了各种文献,如登巴利编写的《战争意味着什么——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等,再一次深切地感到那两个联络员所述之事毫无夸张之处。

登巴利当时是《自由贸易保卫者》的特派员。他在那本著作的前言里介绍了三位可以信赖的日本人。由于考虑到当时正处于战时状态,没有披露这三个人的姓名。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三个人是松本重治(当时任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现在是国际政治学家)、日高信六郎(当时任驻南京的外务省参事官)、宇都宫直贤(当时任华中方面军少佐参谋,战败时为少将)。

在上海战役时,登巴利为了保护大批的中国百姓和积极援助设立由法国神父伽其诺倡议建立的难民区(设在南部市区,通称伽其诺难民区),其间得到了松本的尽力帮助。预料南京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态,便通过侨居南京的外国人组成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合作,承担救济难民的工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情形,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长一职由日本的同盟国——德国的实业家拉贝(西门子洋行)担任。委员会成员有三名德国人、七名美国人、四名英国人和一名丹麦人。

只要通读一下登巴利的那本书,就可了解到有多少委员会的成员挺身而出,救济中国的百姓。某个英国委员评价德国委员的活动“近乎奇迹”,还说:“我为了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甚至也想带上纳粹的徽章。”编入此书附录的该委员会递交给日本帝国大使馆的诸文件中,有一份要求日本方面妥善处理百姓问题的《被害报告》,列举了大量日军暴行,下面摘录几段——

第5件 12月14日夜,连续发生日本侵入中国人住宅和强奸、强行带走妇女的事件。为此引起了大骚乱,数百名妇女转移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The Ginling College)院内。因此,3名美国人为了保护院内3000名妇女、孩子,昨夜在学院内过夜。

第15件 12月15日,闯进汉口路中国人住宅的日本兵强奸了一名少妇,并强行绑架了三名妇女。其中两名妇女的丈夫在追赶日本兵时被开枪打死。

第18件 12月15日夜,许多日本兵侵入位于桃源的金陵大学的建筑物,并当场强奸了30名妇女,其中几名被6个日本兵轮奸。

第 56 件 12 月 18 日下午 4 时,日本兵在颐和路 18 号强行索取烟草,对方拿出来时一犹豫,日本兵便用刺刀扎那个男的侧头部。此人现住在鼓楼医院,已无望救活。

第 62 件 12 月 18 日,设在陆军大学内的难民所送来的报告。16 日,日军强行带走了 200 名男人,可是只回来了 5 名。17 日带走了 26 名。18 日带走了 30 多名。被抢走的东西有现金、行李、1 袋米和 400 多条医院的被子。杀害了 1 名青年(25 岁)。打倒了 1 名老太婆,20 分钟后死亡。

第 178 件 1 月 3 日(1938 年),以日军军官需要洗衣妇为名,12 月 20 日从铜银巷强行带走的 6 名妇女中的 1 个来到鼓楼医院。据她说,她们被带到市中心偏西的一所房子里,她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是日军的军用医院。妇女们白天洗衣服,可到了晚上被通夜强奸。岁数大点的妇女一晚上被强奸一二十次,年轻漂亮的妇女一晚上被强奸 40 次。1 月 2 日,两名日本兵把来到医院的那位妇女带到一所没有人的学校校舍,用刺刀扎了她 10 刀。其中 4 刀扎她的脖子,切断了脊椎方向的肌肉,往手腕上扎了 1 刀,往脸上扎了 1 刀,往脊背上扎 4 刀后,士兵们以为她已死,就弃之走了。别的日本兵发现她后,把她抬到熟人处,又抬到医院(此患者因患髓膜炎现已死亡)。

第 382 件 2 月 1 日,吴长生(译音)返回尧化门外自己家时,7 名日本兵带来一个老太婆,强迫二人性交,日本兵在旁边哈哈大笑。

第 442 件 2 月 2 日,有一家子正往城内运送蔬菜,在中华门附近遭到几名日本兵盘问,日本兵强迫那人跪在路上,交出‘花姑娘’。他们命令那人把蔬菜扔掉,那人一抗议,士兵抓起枪托就朝他的小腿砸去,两条腿被砸折了。那人花了两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挪到医院。

到 1938 年 2 月初为止,共向日本方面提出 444 件暴行。因为是向占领国递交的文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报告的事件太多了。而且,这些仅是发生在安全区内的事件,安全区以外地区的状况则更无法想像。各国

的大使馆也不一定安全。苏联大使馆被烧了,美国、英国大使馆也不例外,连同盟国德国大使馆也遭到麻烦。

我们看看日本兵是怎么说的。据1971年1—12月《朝日文艺》连载的太平洋战争研究会所写《不寻常的最前线》一文,战时为——四师团一等兵的田所耕三(水户人)讲述——

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送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20个人玩弄。在仓库周围选个有阳光的好地方,用树叶之类铺好。士兵们拿着有中队长印章的纸,脱下兜裆布,等着轮到自己。

新泻的一个家伙一个人去城内强奸,可是怎么也不回来。大家都去寻找。把男人们全部抓起来,让他们说出那家伙的下落。还一刀砍了一个示众。于是坦白了,那家伙在一个像防空壕似的贮藏苹果的仓库里,已经变为一具尸体了。当他把女人带进去时,被后面一把三齿叉子扎倒在苹果上……

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强奸完了就杀掉。往往是强奸完后一撒手,女人就逃跑,便从后面向女的开枪。因为不杀的话会给自己惹麻烦。一旦让宪兵知道了,会被送交军事法庭的。尽管不想杀,但还是杀了……虽然在南京几乎没有宪兵。

这是对普通居民的残害。对俘虏又是怎样呢?有些议论给人们的一个印象是日军没有大量屠杀俘虏,“南京大屠杀是虚构”;也有与之争论的。说是“虚构”的一派人始终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屠杀俘虏不是事实。

就我的所见所闻来说,日军事事实上轻易地就把俘虏“处分”了。即使对一般老百姓也以“大概是便衣”为理由轻易地杀害了。

在登巴利的书中说了这么一件事:坚守在下关的车间里的54名工人中,有43名以“发电厂是政府机关”为理由,被拉出去枪毙了。当日本警官让开工送电时,由于没有懂行的工人,结果抓瞎了。

《每日新闻》特派员铃木二郎记者写道,他12月12日(应该是13日,

误记)去中山门时,“……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排成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捅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他感到日本兵好像要刺杀他一样。也真有那种事,前不久就有记者被日本兵误杀。

……真是令人神经错乱的回忆。去了那个地方后,在归途中再一次钻进励志社的门去看看。刚才还是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现在院内的大树下用铁丝绑着十几个败兵。个个脸色惨白,破衣露肉,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用呆滞的目光盯着我。

这时,咔咔走进来几个日本兵,有两三个拿着软云梯,看样子是工兵。他们毫不理会我站在旁边。他们中的一个站在大树下,吼道:“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突然举起尖镐对准一个俘虏的头砸了下去。那是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俘虏。

闪光的镐尖咔嚓一声扎进头颅,鲜血咕嘟一下冒出来,这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事。看着这惨景的俘虏们拼命挣扎,可是无济于事,在别的士兵的暴力下,不能动弹。

这些俘虏中,有些穿着军装,但也有百姓模样的。看到这种杀戮,我一刻也不想停留,转身逃走了。

(《我目睹了那次“南京悲剧”》,载《丸》1971年11月号)

关东军参谋说“中国人是猪”

战时状态可以说是个疯狂的时代。由日本人记录下自己同胞所犯下的野蛮行径,心情实感抑郁。自己无法制止这种野蛮行径,然而又不能报道这些残暴行为(即使写了也无法报道,否则要被处分),却还要专门写“皇军之勇战”的情况。因而记者作为“南京斩百人竞赛”的证人被传到东京审判法庭一事,大概也与此有关吧。铃木记者曾写道——

作为一个现场记者,直至今日我才渐渐有了写下这份《证词》的

勇气(作者注:指战后26年的当时)。南京大屠杀在后来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惊。当时处于硝烟、尸体和血河中的我,由于一时的“责任感”,对战争这种行为的错觉,以及对国际战争法的无知,尽管是件耻辱的事,却仍没感觉到。

目击南京大屠杀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期间,也屡屡目击过屠杀。因经常在残酷的战斗和战场上置身于大批的尸体和血腥中,神经都处于麻木状态了。还不能不承认,每当看见眼前大批倒下的日军战死者,就会腾起一种一心想对敌报复的复仇心,就会闪出嗜虐心理。(中略)最后,我要对正视事实、真正觉悟了的、有勇气承认“我屠杀”的人们表示敬意。

连新闻记者的心理都是如此,所以,一般的士兵不把中国士兵,更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也就不足为奇了。有关在南京屠杀俘虏一事,不妨再听听田所这个人的叙述——

在城内扫荡了残敌。抓住军官和士官学校出身的家伙就把他们绑在柳树上作为靶子,一边教新兵射击和刺杀方法,一边杀掉。日军将校和下级军官砍那些跪在尸坑前的俘虏的脑袋。我嘛,因为是第二年的兵,所以用刺刀捅。这种事在城内持续了十来天。当然,是奉命干的。

那时我们驻下关。我们用铁丝网上的铁丝把抓到的俘虏每十人捆成一捆,推入井中,然后泼上油烧死。有种杀法叫‘勒草包’,杀时有种像杀猪一样的感觉。干着这些事,对杀人就会变得无动于衷。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再者,因为是命令也就不去多想了。

有用机关枪扫射杀人的。把机枪架在左右两个山包上,嗒嗒扫射。

谈话中士兵们说出了“因命令”这句话,这似乎是顶头上司、小队长、中队长们的罪责。然而,事实上在当时的日军中,就没有把中国人当

人看。

南京入城仪式中,最高司令官松井石根就日军在刚攻入南京时的野蛮行径,流着泪做了训示(也就是说,日军所犯下的暴行已达到令世人发指的程度,在此惨状下,最高司令官迫不得已做了训示)。采访当时情景的松本重始谈到了司令官的感慨(《上海时代》下卷)。然而,师团长们对那篇训示都嗤之以鼻(花山信胜:《发现和平》)。

1936年5月,松本就对中国的态度问题与当时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后为兵务局长,少将)进行了交谈。田中说:“……坦率地讲,你(松本)和我看待中国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你把中国人看作是人,而我把中国人当作猪,无论怎样处置都可以。因此,我不想对你们谈我的设想是什么……”

听到此话的松本,也不顾自己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用激烈的言词谈了感想:“……说得过于坦率了,从日本军人那里听到如此疯狂的想法和言词,是空前绝后的。让这种不通情理的家伙策划关东军的谋略不仅毫无道理,而且应该为日本而感到悲哀……”(《上海时代》中卷)。

正因为军首脑有“中国人是猪”这种想法,就会下令“不管女人、小孩,是中国人统统要杀,房屋全部烧毁”(平松鹰史:《乡土部队奋战记》),下级士兵们形成“强奸、掠夺、胡作非为”的风气也是必然的结果。

既然杀人都毫不在意,掠夺更是家常便饭了。被侵略地方的东西都是侵略者的“战利品”。士兵们从百姓家中暴掠粮食和金钱,而军队有些上层人物则像纳粹把欧洲的名画作为战利品一样,把中国的文化、瑰宝盗往日本。

下面要提到的把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盗回日本的事件,军界说是从战火中保护舍利。也许,不能把这与“战利品”等同起来,但对中国方面来说,毕竟是难以容忍的掘墓盗运回日本的行为吧!

陆军在郊外建飞机场时,铲掉了一座鬼火闪闪的古坟。可谁能想到这座古坟是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师之墓。

埼玉县岩槻市有座慈恩寺。因它同西安那座与三藏法师缘由颇深的慈恩寺同名,就把舍利收藏到那里了。由于舍利是擅自拿走的,战后中国方面有权予以索还,后由佛教界有关人士将它送往台湾了。送归台

湾时,分下一部分舍利,供在为它建造的石塔中,以此来祭祀分骨的三藏法师。

因神话传说中的孙悟空而扬名于世的三藏法师的舍利,在藏入慈恩寺以前,一部分被失敬装入瓶中悄悄地带走了。拿走的人是在北京和南京有名的被称为“大陆浪人”的水野梅晓。他把这些舍利和中国的文献等带回到麹町三番町自己家中。后来由于空袭紧张,他把这些东西疏散到位于埼玉县饭能市西北名栗河上游,名栗村字鸟居的平沼弥太郎府中。平沼那时是饭能银行的总经理。后来因地方银行合并,又成为埼玉银行的总经理。

水野梅晓死后,舍利和文献都收藏在平沼府上的一间屋中。战后,我陪五岛庆太去平沼府,他请我们看了舍利和文献。10张榻榻米大小的室内展开了满满一屋的贵重书籍。据说这一件件都是宋、唐的书。这些文献收藏在模仿正仓院建造的校仓型建筑物内,玄奘三藏法师的舍利祭祀在白云山后山中的祠堂里。

地狱之河,溯江中的水雷区

游秦淮的翌日早晨,我和摄影部的三轮登上了停靠在南京下关码头的军舰安宅号。我在当时的随军笔记中写道:“8月17日,安宅号离开南京港,18日经芜湖,19日经安庆。在芜湖、安庆间屡遭炮击。20日到达九江。”

安宅号虽说是军舰,但只是一艘800吨的炮舰,是专供长江上使用而造的吃水浅、平底的河船。尽管如此,桅杆上飘着司令旗,架着15厘米口径的大炮,浮在江上,确是一艘漂亮的军舰。这类炮舰有势多号、二见号、比良号等,都具有便于江上作战的特点,并都参加溯江作战。

这艘安宅号是溯江舰队的旗舰,第十一战队司令部就设在这艘小舰上。因近藤英次郎少将司令官和参谋们都在这舰上,本来就狭小的舰舱越发显得拥挤不堪。

《读卖新闻》是我,《每日新闻》是西村,《朝日新闻》是村田,同盟通讯社是村上。四个新闻单位各一名摄影师。我们这一帮人上舰后就被领到士官室。室内的大饭桌是我们的办公桌,吃饭时成了近藤司令以及下

士官们的餐桌,晚上则成了我的床。

即使这样,因军舰很方便,还是难得的。只要乘上去,它就会自动驶往战场,不用像陆军那样,边行军边受炮火的威胁,也不用担心饮水问题。香烟只要傍晚去酒保那里一趟,便能买来三四筒我喜欢的50支装的樱桃牌。想喝酒的话,托托主计长就能搞到红乔尼哇加。还可以洗澡,洗完后穿着浴衣喝着威士忌,写写战况新闻。这么奢侈的随军生活简直不能想像。

虽说如此,可酷热也使人难以忍受。白天即使在江上都很热。一上甲板,连个遮阳的东西也没有,任火热的太阳暴晒。一下到士官室,就如同进了蒸汽浴场,狭窄的船内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但要说热莫过于轮机房。一进机舱就开始大汗淋漓,不久连汗都出不来了。据轮机长说,是因为机舱内的潮气和汗已达饱和状态,汗出不来。

夕阳西沉,江边的景色十分迷人。一到晚上,因实行严格的灯火管制,几十艘船漂浮在江上竟看不见丝毫光亮。我们搬出折叠椅,上后甲板乘凉。即使在这时候,水兵们还在用望远镜不断地瞭望江面,这是为了防备不知何时可能会触上随波漂来的水雷。舰上几个地方设置了瞭望哨,严密监视江面。一开始,眼睛不习惯黑暗,睁大了什么也看不见,习惯了便能看清楚江面的一切了。一次,水兵在前方发现了漂来的水雷,突然探照灯把江面照得如同白昼,13毫米的机枪响了起来,曳光弹拖着烟花般的尾巴向水雷飞去。不一会儿,响起了可怕的爆炸声,同时江面上升起巨大的水柱,水雷被引爆了。假如发现晚了,军舰触雷的话,结果将怎样?一想到这里,便会笼罩上一层不安的情绪,感到这块极乐之地的军舰顷刻间将会变为驶向地狱之舟。

从随陆军部队苦斗过的湖口到九江,舰艇顺顺利利地溯江而行,不过,在驶出湖口刚登上行程时,吃惊地发现一艘红肚子船倾翻在鄱阳湖的入口处。这是条医院用船——桔号,遭到空袭后搁浅倾翻了。桔号曾是一艘从东京到大岛的班船,专门载着游客去观赏三原山神火和山茶花,后来被征用,如今船底朝天躺在了那里。

就这样,安宅号平安无事地抵达九江。从这里往前就是溯江部队的最前线了。水路上布满水雷,中国军队在两岸构筑要塞继续进行殊死地

抵抗,难以攻陷的坚垒延续到汉口。

8月23日,安宅号从九江出发,开始向汉口进军。由于遍江水雷,扫雷颇费时间,溯江部队迟迟不能前进。

长江江面在这一带达四公里之宽,然而能够通航的水路却有限,搞得不好就有搁浅的危险,真有点儿棘手。现在长江的水位已开始慢慢地下降了,枯水期即将来临,一旦搁浅只能等到来年的丰水期,否则船是无法浮起来的。听在安宅号上给我们领航的老人说,以前“日清轮船”的船在这附近搁浅了,由于当时已是枯水期,船被搁在陆上。农夫们来到退了水的陆地,种上麦子。船长去上海运粮食,船员们只得在麦地中过冬。冬去春来,夏天又代替了春天。小麦收割完后大雨降到大地上,长江的丰水期又来临了。台风由东海登陆,水量急剧增加,麦地渐渐地又被江水淹没,船开始浮起来,但那已是一年以后的事了。

靠着老人的指点,安宅号终于在广阔的江面上摸到一条水路,向前挺进。扫雷艇差不多集中清除这条路上的水雷,因此,军舰驶过之后,不是水路的地方留下很多水雷,快艇时常触雷。随着冲天的水柱,快艇被炸上了天。在这段时期,当初从南京出发的几十艘扫雷艇几乎都从江上消失,被江水吞没了。无奈只好用机动小艇取而代之。有纪州熊野二川那种带有飞机螺旋桨一样装置的机动小艇,即在浅底小船的后边装上大推进器的小艇。

海军拿来这些机动小艇在隔10米左右的距离排放两艘,中间拉上特制的钢丝绳,打算利用这套装置来挂水雷。一挂上水雷,使水雷沉下去的钢丝绳就会断开,水雷便上浮。于是,用小艇前面的机枪射击水雷的触角将其引爆。我们每天都能瞧见几十个水雷就这么被报销了。

在九江的上游有个叫新洲的江心小洲,一过那里,江面陡地变窄了。虽说窄,也有一千多米宽。水流很急。

变窄的河道往西北方向划个大曲线的地方,有个叫武穴的城镇,其对岸(南岸)有个叫马头镇的地方。在彭泽也有个马头镇,溯江部队曾在那里遇到过顽强的抵抗,吃尽苦头。而在这里也有要塞式的坚固防御阵地,阻止了舰队的前进。从武穴往西北的上游有个田家镇。一驶到那里,山从两边紧逼过来,江面突然变窄。半壁山由北耸立在江岸上,紧靠

它前面的就是象山。

这里是《三国志》中有名的“铁锁沉江”的天险。魏国的曹操把 80 万大军组成船队南下而来，吴国孙权的大将军周瑜仅用 3 万人马迎战。周瑜在田家镇从两岸拉上铁锁链，曹军一挂上铁链，周瑜的部队就迎击。曹军无法前进，溃败了。大败的曹操终于断了出入长江下游的念头。天下从此呈魏、吴、蜀三足鼎立之势，进入三国时代。据说半壁山的岩壁上至今还刻着颜真卿书的“铁锁沉江”四个大字。防卫汉口的蒋介石军队敷设无数个水雷来替代铁锁链，从象山开始在两岸的群山上构筑了炮台，等待着临近的日本舰艇。

进发九江的陆军南岸部队从陆路攻击马头镇，但是战线呈胶着状态。因此，海军溯江部队在 8 月 30 日向南岸的马头镇驶去，让陆战队士兵部队登陆。马头镇陷落了，陆海两军于 9 月 14 日上午 10 点 30 分会师了。陆战队在南岸丘陵上进行了半月之久的寸土必争的激战。

马头镇的最前面有座叫三尾山的红土秃山，从那里到马头镇的四海里行程被称为“火焰山水道”，即使在广阔的长江全线可以通航时，这里也只有一条很小的靠近南岸断崖的通道。中国军队在这条狭窄的水路上布下了 2 000 颗水雷，从三尾山到马头镇修筑了堡垒阵地，攻击靠近的舰艇，形成了一个能阻止水陆两路前进的坚固阵地。扫雷队冒着机枪猛烈地射击，一个一个地引爆水雷，陆战队一个一个地摧毁阵地，齐头并进，终于冲进了马头镇。我们乘的安宅号也时时前去炮击陆战队前面的敌人阵地。我们一边利用军舰上的“大眼镜”窥望陆上，一边写战况报道。我们写的新闻稿从安宅号用联络班船送往九江的海军武官府，再从那里发往各社的战地分社。

(下略)

〔(日)小俣行男著、周晓荫译：《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南京大屠杀……》，世界知识出版社(北京)，1985 年 7 月第 1 版。〕

5. 南京城内的大屠杀

今井正刚

编者注：今井正刚，日本东京朝日新闻社特派随军记者。

屠杀事件的原因

虽然这不是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直接原因，但使得这一事件发生的一个最大的理由就是日本军队的入城仪式。在皇军浩浩荡荡开进南京城，举行盛大的庆典活动之际，哪怕一个敌兵都是不允许残留在南京城内的。当时总司令部的意图就是要彻底扫荡敌人的残余势力。于是，这种大扫荡的目标就是杀得一个不留，直至发展成为疯狂残暴的行为。

在顺序上有点颠倒了，作为对当时南京的回忆，请允许我在此再一次地写出我曾经写过的南京入城仪式的报道。这也是当时处于异常兴奋状态下的一个随军记者所写报道的其中的一个样本。简单地说，在昭和12年12月18日的《东京朝日新闻》的晚报头版头条位置上，那是一个用全文一倍半的印刷体组成的报道，字体大得使人头晕目眩。

【今井特派员17日发自南京】令人激动的这一天，一亿同胞齐声高唱，今天在南京城头，万岁的呼声响彻云霄，这是一个使得整个世界震惊和喜悦的雄壮的入城仪式。皇军参加圣战的将士们在中支那转战四个月，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他们攻克了敌人的首都，制服了全中国，由此奠定了东亚和平的基础。仰面眺望翻腾的日章旗，谁能禁得住自己激动的泪水？

目睹极其庄严雄伟的入城仪式，向祖国转播这一实况的记者挥舞起激动与兴奋之笔。南京，晴天，这一天碧蓝的空中没有一丝云彩，刀剑入鞘，新的战场上洒满和平的曙光。中山门、光华门、通济

门、中华门、和平门、太平门，从飘扬着日章旗的各个城门，一大清晨参加南京总攻的各部队就举着光辉灿烂的日章旗陆续入城。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总共三公里的主干道——中山路的沿线，排列着拂去征尘、气宇轩昂的士兵们。一眼望过去，北边站立着上海派遣军，南边站立着从杭州湾登陆的部队。沾着血迹的军帽下，熠熠生辉的黝黑的脸庞洋溢着喜悦，燃烧着令人激动的热情。下午1时，全体部队集合完毕。以金玉之身亲自参加了攻克南京之战的朝香宫中将殿下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中山门。同时乘车到达的还有××部队长以及松井大将。在中山门，下车并站立着的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眼里闪烁着激动目光，他的脸上印刻着上海之战的征尘。

下午1时30分，朝香宫殿下走在最前面，松井司令官次之，各部队司令、各幕僚骑马进场，开始了这一历史性的仪式……

报道还有很长的一大段，记录着到处洋溢着欢乐和激动，这样的报道充斥着每天报纸的版面，不难想像整个日本沉醉在怎样的气氛之中。战争的异常心理，以攻克南京为高潮在整个日本蔓延着。

如果说实话的话，我关于入城仪式的报道是在前一天的16日傍晚写就的。也就是说是一个预定性稿件。只是将当天的天气情况空了出来，按照预定的顺序事先写好了稿件并用电报发了出去。就在入城仪式的前夜，即我写就这一预定稿件的当晚，接线员伊藤忠君（已故）将脑袋探出窗去在那里眺望着夜幕中的天空。他说：

“今井先生，天空中布满了星星，是个好天。明天一定是晴天。你把天气也写上去吧。”

“行啊，就写晴空万里吧。”

我这样回答他。

看不见的民众

就这样准备好的南京入城仪式，毫无疑问是隆重而庄严的。但是一个奇妙的现象是，在观摩这幅宏大画卷的，除了和部队穿着同样草绿色

军装的新闻记者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可以称作是一般民众的人。

也就是说入城仪式的沿线,除了排列成行的战士队伍,连一只猫都是不允许通行的。一定是敏感地考虑到在总司令或者宫殿下通过的时候,万一出现一个举止无礼的捣蛋鬼的话,那就会成为一桩大事件。也许就连敌国国民流露出的憎恨目光是皇军的耻辱这一点都想到了吧。在站立在步武堂堂的阅兵行列两侧的部下兵将们的礼枪声中慢慢地通过。而伴随着这一切的,只有被打碎的瓦砾和死亡的气氛。

为了举行这一入城仪式,两三天前就有严厉的军令传达下来。军令中说:不允许一个敌人在南京城内残存。也许残兵脱掉军服换上了便衣隐藏在市内,必须彻底搜查扫荡干净。于是,从进入南京的13日晚上开始,特别是14日、15日实施了严酷的“扫荡残敌”的行动。14日那天,战士们因为刚刚进城,一边高喊着万岁,一边忙着奔波在国民政府、军官学校等市内的重要场所。15日那天,因为后天就要举行入城仪式,所以大家的行动都集中到了扫荡上。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从15日傍晚到深夜这段时间实施的。

在一进入中山门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临时支局。到了15日听说市内已经没有危险了,我们便从早晨起三三两两地外出观看。

进入国民政府的大门,通往大礼堂长廊的中间部位的屋顶上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洞,留有炸弹炸过的痕迹。但是大礼堂屋顶的瓦片没有碎,正沐浴着冬日和煦的阳光。

“我们海鹰号的轰炸应该已经将这里炸得片瓦不存了呀,我可是写了那样的报道的。”

我边说边往前走,当走到战前的朝日通信局所在地的大方巷一带时,我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在主干道上没见到一个人影,而这里都是中国人。虽然只是些老人和孩子,无论是哪一家的窗口上都透出一双双充满恐惧和不安的眼睛。这一带大概是难民的集中区吧。已经有好多天没见到平民百姓了,社会部的记者渐渐来了兴趣。

我们两三个男人来到了一家看上去很大的洋式房子的人家。

“这一带没有部队吗?”

“没有。”

“这是谁的家？”

“唐先生家。”

“……唐生智？”

“是的。”

提到唐生智，就是指挥部队死守南京的南京警备司令。

“唐将军一直住到什么时候？”

“11日。”

“那就是陷落的两天前了。”

就在此时，晃着刺刀的一帮士兵吵吵嚷嚷地进了门。

“记者先生，他们是当兵的？”

“好像不是。是下人什么的吧。”

“那怎么会知道，喂！脱掉帽子让我们看看。”

突然，一个士兵夺过那个男子的毛线帽。也就是说如果额头是白的就可以断定是当兵的。

“呵，不白，行啊，过来。”

士兵猛地勾住了男子的肩膀。

“他不是当兵的啊。”

“便衣队躲在城里，所以男人都要带走。”

手持上了刺刀的枪的士兵们押着男子吵吵嚷嚷地离开了。

目睹大屠杀的妇女和儿童

进入以前的支局，这里也聚集着二三十个难民。有人从里面欢叫着奔了出来。是支局雇佣的女仆和男仆。

“喂，安全回来啦？”

一上二楼就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迷迷糊糊地来了睡意，许多天以来终于有一个如同回到家里睡午觉的感觉。

“先生，不好了，快来呀。”

我被变了脸色的女仆拍醒。我赶紧问是怎么回事？

据说就在边上的空地上,日本兵集中了大量的中国人准备杀掉。其中还有附近西服店的姓杨的老板和他儿子。因为两人都不是当兵的,女仆让我快点去救他们。如果不抓紧的话他们就要被杀了。

我跟在女仆的后面,杨太太的大麻脸上淌满泪水,在那里打着哆嗦不知所措。我和中村正吾特派员(现朝日新闻美国总局局长)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那是在支局附近的小山坡上,时值黄昏。空地上黑压压地蹲着四五百个中国男子。空地的一边是倒塌后残留的黑砖瓦墙。对着这面墙并排地站着中国人,六人为一组。在距离他们身后二三十步远的地方,日本兵用步枪一起对着他们射击,他们直直地往前倒,在身子快要倒地之际,背后又被刺上一刀。“噢”的一声,断魂鬼一般痛苦的呻吟在夕阳照射的小山坡上回荡。接下去又是六个人。

一批接着一批的人被杀,蹲在空地上的四五百人之多的人群用无助的眼神看着他们一排排倒下。这种无助、这种虚无究竟是什么?

四周围着的众多女人和孩子们茫然地看着这一切。如果仔细注视他们一张张脸,那一定是面对自己的父亲、丈夫、兄弟以及孩子的被杀而充满了恐惧和憎恶。他们一定发出了悲鸣和哭泣。可是我的耳朵什么都听不见。我只觉得“砰、砰”的枪声和“啊”的叫声充满了我的耳际,眼前只见西下的斜阳将黑色的砖瓦墙染得通红通红。

我气喘吁吁地对站在我身边的军曹说道:

“他们中肯定有的不是军人。请您救救他们。”

我斜视了一眼军曹表情僵硬的脸。

“西服店的老板和他儿子就不是当兵的。我们用身价担保。”

“你知道是哪一个?”

“我认识的。他太太在,叫一声的话就会出来的。”

我不等军曹回答就把杨老板的太太往前推。杨太太大声地叫起了杨老板的名字。

人群中满脸皱纹的老头和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跑了出来。

“就是他们俩。他们绝对不是残兵。他们是开西服店的,经常出入我们朝日支局。喂,你们两个快回家去。”

广场上的人立刻都站了起来。只要拜托这个人就能得救。也许是这种想法将人们从无助和虚无中解脱出来了吧。人群一下子跑到我们跟前,抓起我们外套的袖口。“还继续下去吗?看看那里,女人一个劲地在哭啊。尽管要杀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但不会找个女人和孩子看不到的地方吗?”

我们激动地一口气说完上面的话。晚霞已经从空中消失。我和中村君将一言不发并且表情僵直的军曹撇在一边先行离开了空地。从我们的身后又传来了枪声。

我离开了大屠杀的现场。尽管我救了两个男人的性命,但我的脑海中没有涌现出任何的感慨。这也只不过是在我眼前出现的战场上军人行为的一个镜头而已。就连我自己都陷入了异常的心理之中。

带向屠场的队伍

夜色降临在沦陷后没有灯光的首都。我们聚集在油灯前小声地谈论起傍晚发生的事件。

我们突然注意到从门外宽阔的柏油马路上传来了“嗒、嗒、嗒”的隐约的脚步声,而且那脚步声一直不停地持续着。是数百人、数千人的脚步声。在这中间还不时地夹杂着“咔、咔、咔”的军鞋声。

我们披上外套,飞奔到结了霜冻的马路上。我看到了好长好长的队伍。是从哪里将他们集合来的啊?我一眼就看出这是一支望不到尽头的中国人的队伍,他们将被带到屠杀场,这是一支送死的队伍。

“去哪里?”

“下关。扬子江的码头。”

“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立刻回到住地,在外套内加了一件夹克衫便追随队伍而去。

我们拼命地跑在漆黑的马路上。江海关漆黑的建筑遮住了夜空,那是下关栈桥。

“谁?”

黑暗中突然一支刺刀枪在眼前发着微光。

“朝日新闻。”

“去哪？”

“江边。”

“不行，请走别的道。”

“没有其他的道啊。”

“那请明天早上再去。”

“刚才不是有很多中国人通过吗？”

“……”

“他们去了哪里？”

“我不知道。”

“是要去对岸吗？在这半夜里。”

“嘭、嘭、嘭”，远处传来蒸汽机的声音，如同紧绷的弦放松了下来。

“船开动了吧。”

“应该是吧。是不是部队在行动啊？”

似乎松了一口气的流动哨放慢脚步和我搭起话来。

“不抽一支吗？”

我说着从口袋里掏出骆驼牌香烟。

“啊，不过我在巡逻。”

这个看上去人挺不错的战士接过我递过去的烟，刚要放进口袋，此时，突然响起机关枪的扫射声，我们就像两脚受到了重重的冲击。随着一阵“啊——”的喧闹声，反方向又响起机关枪的扫射声。

“……”

“真动手了。”

“动手？对那些中国人？”

“呵，我想是吧。因为他们有些残兵。一下子是干不完的。”

“快走。”

“不行。记者先生，太危险了，会有流弹飞过来的。”

事实上，如同放烟花那样，建筑物的影子在发光，有时传来“砰”的响声，子弹打在铁板上弹起来的声音震耳欲聋。

不知有几万人。不难想像，他们中间除了百分之几的残兵外，大部

分是南京市民,他们是从少年到老年的男子。

从市内各处集中起来带到江边的这些老少男人,仅用步枪是来不及将他们都杀尽的,于是从东西两侧用机枪的交叉火力射杀。

“好冷。”

我们在附近找来了一些树枝生起了火。

“刚才在支局旁边时有一辆车从我们边上通过吧。”

中村君说。

“上面坐着洋鬼子。”

“我想那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吧。这件事马上就会传到日内瓦吧。”

“我真想写下来。”

“总有一天吧。暂时还不能写。不过我们可是都看见的。”

“是啊,让我们再去看一下吧,用自己的眼睛。”

说着两人都站了起来。不知何时又响起了机关枪声。

消失的两万人

我们到了江岸。浑浊得如同日本酱汤般的扬子江依然像一条黑带子在流淌,乳色的晨雾覆盖在水面上。早晨即将来临。

一眼望去,码头一带变成了层层堆积的黑色的尸山。在那些尸体之间晃动着蠢动的人影,50人、100人,他们将尸体拖到岸边扔到扬子江里。挣扎的呻吟、流淌的血、抽筋的手足、加上犹如哑剧般的寂静。

可以隐约地看见对岸了。如同月夜里的沼泽,码头一带发着暗光,那是血。

一会儿,作业终于结束了。“苦力们”在对岸被排成一排。“哒哒哒……”机枪声响起。身体向后倒下,又翻转过来,这群人犹如跳舞一般掉入江中。

就这样结束了。

从摇摇晃晃向下游驶去的汽船上射出的枪弹穿过水面,溅起几条水波,随即消失。

“大概两万人。”

某个将校说。深夜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左右两岸集中飞来的机枪弹雨中,一边叫着一边踉跄地掉入了降了霜的扬子江中。尽管枪弹一直射到了水面,但还是有人抓住了江里的什么东西,或许他们能够死里逃生。但这是真正的扫荡。

南京的入城仪式就是在这样打扫过的舞台上进行的,并且我还预先写下了那份稿件。那都是同一天发生的事。毫无疑问,那是一种异常心理。

我想,那简直不能想像是打了胜仗的部队所为。难道那不是被什么东西逼得走投无路的人由于绝望而做出的疯狂之事吗?事实上,上海之战以来,从大场镇攻克战到南京攻克战的所有战斗,都受到了中国军队极其勇猛果敢的抵抗。“那是什么中国军队。”我们曾经如此地蔑视他们,后来才知道真不该那样想,他们其实是极其凶猛的敌人。这变成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支配着全军。于是,“我们胜利了”——这样被释放出来了的紧张感,不需要再介意羞耻和舆论,变成一种残忍的杀戮行为而表现出来。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那种异常心理就没有了去处。“记者先生,猜猜吧。”

手提机关枪的士兵,用从四处找来的一些破板生起了火。这是心中藏着秘密的人之间所具有的亲近感。渐渐燃烧起来的破板上,白霜开始融化,发出“滋滋”的响声。

[《特集·文艺春秋·我在现场》1956年。]

(赵仲明 译)

6. 石川达三询问调查书

(1946年5月11日)

编者注：石川达三，时任日本《中央公论》驻华中特派记者，1937年岁暮随军赴南京采访，并于1938年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

(前略)

A：我是在1938年1月15日进入南京的。

(中略)

A：我之所以根据在南京发生的事写这本书只是因为我们国家不报道真相。我们的人民不知道在国外发生的事，所以我要把在国外发生的事写出来，把事实告诉人们。当然，这本书是虚构的，没有真实可靠的记录。

(中略)

Q：在南京期间，你没有见过日本军队犯的罪行和所施的暴行吗？

A：因为我是在那一事件结束后进入南京的，所以我本人没有看到施暴情况。

Q：不过，你还是听到发生了什么事吧？

A：是的，关于那些事多少听到一点。

A：……因此，日本军队在城内抓了很多俘虏。

Q：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A: 没有准确的数字,我想大概有两万人左右。

A: 日本军队占领南京时,还有 50 万市民在南京。

Q: 你还知道些什么?

A: 在西北边的 UKO 门^①附近有栋三四层的楼房。中国战俘被关押在那里并被浇上汽油烧死了。

Q: 你知道有多少人被烧死吗?

A: 不知道。

Q: 此外,你还知道其他发生的事吗?

A: 中山门的附近有个飞机场。日本士兵把中国战俘带到这个飞机场用机枪扫射杀死了。

Q: 知道有多少人吗?

A: 不知道。

Q: 此外,还听说什么了?

A: 我听说有日本士兵把中国战俘带到长江堤上砍死了。

Q: 用刀吗?

A: 是的。我想解释的是,由于日本军队的进攻速度太快,而让后勤部队跟不上来。日本军队的粮食非常缺乏。考虑到向中国战俘和平民提供粮食,那是相当困难的问题。

A: 我用完全小说化的手法写了《活着的士兵》这本书。

Q: 你所说的虚构就是你在南京实际从日本士兵那儿听到的事情吗?

A: 是的。

Q: 换句话说,你不是虚构的。那些事是以你在南京收集的资料为基础而写的吧。

A: 有时,以创作为目的,让故事有了具体的角色。比如,有的事件是在南京发生的,在我的书中却让它发生在其他的战场上。就是这样小说化的。

Q: 但是,在你的书中所叙述的事都是你在南京实际听说过的事吧?

^① 原文如此,似为挹江门。

A: 我得到的这个消息并没有明确的出处。

Q: 然而,你一定是在南京哪个人那里听说那些事的吧? 是日本士兵或是其他什么人?

A: 是的。

Q: 在西北边的城门附近,有多少中国战俘被烧死呢?

A: 准确的数字不知道,我估计有 4 500 人。

Q: 有多少人在长江边被刀砍死呢?

A: 不知道。

Q: 在飞机场大概多少人呢?

A: 不知道。

Q: 你是从日本士兵那儿听说这样的暴行吧。关于那些暴行,你也在你的杂志中提到了吧?

A: 我收集了几个士兵的私人资料。

Q: 他们有过这样的行为吗? 他们是否说过那样的行为是得到上级军官的许可呢?

A: 我没有听那些士兵说过自己参加过那样的暴行。我和士兵们在一起生活过。我从我的伙伴那儿听说过这样的事。我认为,杀一人或两人可能是士兵自身的原因,但杀 10 人、20 人或者 30 人的时候,似乎必须得到大队长和旅团长的认可。

[日本一桥大学吉田裕教授提供]

(罗苹苹 译)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⑩ 日军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ISBN 7-214-04227-4



9 787214 042279 >